

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  
美国自由的故事

〔美〕埃里克·方纳 著



# 美国自由的故事

〔美〕埃里克·方纳 著

王 希 译



商务印书馆

2002年·北京

*Eric Foner*

**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

© 1998 by Eric Foner

根据诺顿书屋(W. W. Norton & Company) 1998 年版译出

# 目 录

|                       |     |
|-----------------------|-----|
| 中文版序言 .....           | 4   |
| 序 .....               | 8   |
| 第一章 美国自由的诞生 .....     | 23  |
| 生而自由的英国人 .....        | 23  |
| 自由的民主化 .....          | 36  |
| 第二章 自由者所称的自由 .....    | 58  |
| 奴隶制与共和国 .....         | 58  |
| 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 .....    | 70  |
| 第三章 一个自由的帝国 .....     | 82  |
| 美国民主的成长 .....         | 85  |
| 自由劳动与奴隶劳动 .....       | 96  |
| 第四章 年轻共和国中自由的界限 ..... | 112 |
| 想像的共同体 .....          | 112 |
| 围绕自由界限的斗争 .....       | 126 |
| 第五章 自由的新生 .....       | 147 |
| “我们都宣称为自由而战” .....    | 147 |
| “何谓自由?” .....         | 153 |
| 第六章 契约自由及其反对者 .....   | 174 |
| 镀金时代的自由 .....         | 175 |
| 劳工与共和国 .....          | 185 |
| 重新划分自由的界限 .....       | 194 |
| 第七章 进步时代的自由 .....     | 206 |
| 经济自由的种类 .....         | 208 |
| 自由与进步时代的国家 .....      | 222 |
| 第八章 公民自由的诞生 .....     | 236 |



## 2 美国自由的故事

|                       |     |
|-----------------------|-----|
|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自由的危机.....    | 244 |
| 谁是美国人? .....          | 268 |
| 第九章 新政与自由的重新定义 .....  | 280 |
| 保障与自由.....            | 281 |
| “一种新的美国观”.....        | 299 |
| 第十章 为自由而战 .....       | 310 |
| 四大自由.....             | 312 |
| 爱国主义式的同化.....         | 333 |
| 第十一章 冷战年代的自由 .....    | 351 |
| 自由世界.....             | 354 |
| 消费自由的胜利.....          | 369 |
| 第十二章 六十年代的自由 .....    | 385 |
| 自由运动.....             | 387 |
| 新左派.....              | 401 |
| 权利革命.....             | 418 |
| 第十三章 保守主义的自由 .....    | 428 |
| 保守主义的再生.....          | 429 |
| 里根革命及其之后.....         | 445 |
| 致谢 .....              | 463 |
| 索引 .....              | 466 |
| 附录 方纳：一个并非神话的故事 ..... | 513 |

**为 达 精 短 而 作**



## 像自由这样的字

有些字像自由(freedom)  
说出来甜蜜动听美妙无双  
在我心弦的深处  
自由无时不在尽情地歌唱

有些字像自由(liberty)  
它们却使我忍不住哭泣哀伤  
假如你知道我所经历的一切  
你就会懂得我为何如此悲伤

——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

## 中文版序言

有机会为《美国自由的故事》的中文版作序，我深感荣幸。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显赫的军事、经济和文化强国，这似乎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对美国以外的人来说，在这样的时候了解美国的历史和价值观，似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自由是美国人判断和界定个人和民族的第一概念，自从18世纪末获得民族独立之时起，美国人就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负有特殊历史使命的人民，有责任把自由的恩惠带给全人类，为那些在美国之外逃离压迫的人提供一个避难所。当然，美国人并非世界上惟一珍视和热爱自由的人民；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里，我们目睹了发生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中的争取自由的斗争。但是，因为自由的概念在美国生活中占据了极为中心的位置，不了解自由在美国演变的历史，一个人便无法真正地懂得美国社会。

尽管许多人把自由看成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哲学范畴，或者是一个几乎不因时而异的概念，本书要提出的观点却是：自由的内涵总是在不断地受到挑战，自由的历史始终是一个充满了辩论、分歧和斗争的故事。在美国，自由的内涵曾经变化过多次，就在我们进入21世纪的时候，美国人关于自由内涵的辩论仍然没有结束。与此同时，我所称的自由的“界限”——即谁有权享有自由——的问题，也还在辩论之中。在我们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许多人曾被排除在享有自由的行列之外。令人最为震撼的例子当然要数非裔美国人的经历。直到内战结束以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一直处于受人奴役的状态之中；内战之后，他们又继续饱受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多重歧视。同样，美国妇女也曾经被长期地剥夺了许多被男性理所当然地视为是构成美国自由基本要素的权利，包括选举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及获取竞争技术工作的能力等。其他群体的美国人同样也感到他们曾被剥夺了真正的自



由。基于对这些历史的观察,本书认为,推动自由在美国历史上扩展的动力,正是来自这些被排斥的群体按自己对自由的理解、不断开展的争取享有完整的自由的斗争。无论是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女权运动、劳工争取“经济自由”的努力,还是激进派和持不同政见者对言论自由的要求,所有这些“围绕自由的界限所展开的战斗”都有助于扩展了所有美国人享有的自由的内容。

尽管本书的重点是讨论美国国内的社会和政治斗争如何不断地主导了自由涵义的变化,不可忽略的是,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也影响了美国自由的概念及其内涵的演变。当世界处在一种史无前例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全球化的时刻,我们非常有必要记住:自由的历史是一部实实在在的国际史。例如,在20世纪,美国人所称的“自由世界”与其外部敌人——先是纳粹,而后是冷战时期的共产主义世界——的斗争就曾经有力地影响了美国人自由观的形成。同样,其他国家中的许多人也把美国看作是自由的化身,并竭力仿效和追求美国的价值观以及那些支撑这些价值观的体制——包括民主政府、自由的市场经济、基于平等公民权之上的法律制度等。

美国自由的概念曾经与弱势群体在美国社会中争取更大权力的斗争密切相关,但在过去一代人中,自由的概念逐渐与形形色色的政治保守派的观点掺和在一起。保守主义自由的主要内容看上去是由一连串否定性的主张所构成——包括否定政府的作用,否定社会责任,否定对个人随心所欲和消费选择进行限制,以及否定一切具有广泛意义的社会性目标、但可能对一个全球性的资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自由市场的形成进行干预的活动。如同在许多过去的历史时刻一样,许多美国人相信,美国的政策和体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美国的政策和体制代表了一个应其他国家所仿效的榜样。

关于美国自由,有两点认知非常重要:沐浴在21世纪曙光中的美国自由的定义是一个特定的民族国家的历史的产物;目前(在美国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由观决不是美国传统中惟一的自由观。同样需要认识到的是:全球化——或自由本身——并非不可避免地只能以一种单一形式在全世界出现。一个国家学习和研究另外一个国家的历史经验并没有错,但要紧的是,它必须

## **6 美国自由的故事**

同时学习和研究他国的成功和失败。我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激发起一场关于自由的过去和未来的国际对话，并希望我们两国的人民都能从中受益。

埃里克·方纳

2001年7月于纽约市

## 序

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在美国人的自我感觉和意识中,没有任何其他的概念比自由更为至关重要。作为我们政治词汇中的一个中心词,“自由”(freedom)——或经常与之交替使用的同义词“自由”(liberty)——深深地嵌入在我们历史的文献和日常用语中。独立宣言将自由列为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之一种;联邦宪法把保卫自由的恩惠宣示为自己存在的目的。为使自由获得新生,美国打了一场血腥的内战;为保卫四大自由,美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捍卫自由世界,美国又卷入了冷战。美国人对自由的热爱不仅仅只是由那些以自由为题材的旗杆、帽子和塑像来表现,而且也通过采取具体的行动反映出来,无论是焚烧(英国人的)印花税票和越战时期的征兵卡、逃离奴隶制的压迫,还是为争取选举权而举行示威等。当被要求对自己的行动作出解释,或说明为什么这样做是正确的时候,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下场合,美国人很可能会回答说:“因为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街上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是白种人、黑种人、红种人或黄种人,”教育家和政治家拉尔夫·邦奇在1940年写道,“都知道这里是‘自由的土地’……和‘自由的摇篮’。”<sup>①</sup>

美国人对自由的信奉和投入时常给外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仅如此,美国人拥有的另一种信念也使外国人深为震撼,用英国作家詹姆斯·布莱斯

---

<sup>①</sup> Gunnar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 (New York, 1944), 4. 关于“freedom”与“liberty”是否等同的讨论,参见:Hanna P. Pitkin, “Are Freedom and Liberty Twins?”, *Political Theory*, 16 (November 1988), 523-52; Quentin Skinner, “The Idea of Negative Liberty: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in *Philosophy in History*, ed. Richard Rorty, et al. (New York, 1984), 194n.; and David T. Konig, ed., *Devising Liberty, Preserving and Creating Liberty in the New American Republic* (Stanford, 1995).

的话来说,美国人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懂得如何欣赏自由的“惟一的人民”。与其他国家相比,自由的概念看上去的确在我们的思想宇宙中占有一个更为显赫突出的位置。有关经济秩序的正义性问题或种族和族裔群体间的关系等问题,在其他地方通常被视为是与平等或社会有关的问题,但在美国,这类问题则往往是用自由的话语来讨论的。今天,如果要美国人在自由与平等 xiv 两者之间作一选择的话,四分之三的美国人会将自由排在平等之前,这个比例远远超过西欧人和日本人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在近期的一次民意测验中,一位参与者宣称:“当一个美国人的意义就在于拥有自由。”<sup>①</sup>

尽管美国人崇敬和热爱自由,但却没有写出几部讨论自由概念的理论著作。在我们的学术成果中,可以说找不出任何能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论自由》或艾赛亚·柏林的“关于自由的两个概念”相媲美的著作。美国人对自由的论述通常是以历史的而不是以理论的方式进行的。从那些冠之以《自由人的土地》的历史教科书,到那些记述自由在北美大陆生长和发展的多卷本史学专著,只要是讲述我们过去的历史,自由始终是一种最通用的“万能叙事体”。将自由的概念融入历史经验之中,自然有它的价值,但这些著作往往倾向于给自由下一个固定的定义,然后再来追溯它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历史过程。一般来说,这些著作把美国自由与某些自古以来基本上一成不变的思想联系起来,或将其与立宪政府形式以及公民和政治自由联系起来,而后者正是从英国继承而来并为“建国之父们”加以体制化了的结果。当这样做的时候,这些著作实际上画了一条延伸至过去的垂直线,以此为标准来为现存的这样或那样的自由定义寻找历史的根源,并与此同时排除了其他许多看上去与这种事先决定的标准不相符合的自由定义。这种方法往往认识不到其他的一些因素——如那些与主流思潮相悖的声音、被否决了的立场以及遭到排斥的理论

---

① James Bryce,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2 vols. London, 1889), II, 635; Herbert McCloskey and John Zaller, *The American Ethos: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MA, 1984), 18; Seymour M.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 Edged Sword* (New York, 1996), 101, 145; Pamela J. Conover, et al., “The Nature of Citizen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Empirical Comments on Theoretical Themes,” *Journal of Politics*, 53 (August 1991), 819.

等——在决定自由的涵义时是如何发挥影响的。文化批评家艾伦·布卢姆曾宣称：“我们的故事是一部辉煌而胜利地向自由和平等两大原则进军的历史。”但是，如果将自由的历史描叙成是一种直线式的进步，必将会无视废奴主义运动者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在内战后曾指出的一种情形，即“革命有可能走回头路”。自由可以通过斗争而得到，但也可能被夺走。<sup>①</sup>

在本书中，自由这个被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称为是“具有魔力但难以言表的词”的历史将是一个充满辩论、异见和斗争内容的故事，而不是一大堆超越时间限制的哲学范畴或概念，也不是一部朝着一个既定的终极目标逐渐演进的叙事历史。自由语言本身具有的那种通用性掩盖了一大堆对自由完全不同的理解和使用。因此，任何人试图建立一种“真正的”自由定义并以此为标准来判断和衡量其他的自由定义，显然是毫无意义的。我不把自由看成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范畴或一个事先决定的概念，相反，我认为自由是一个“在根本意义上具有争议性的概念”，也就是说，自由因其本质决定了它必然是一个导致争论的主题。人们使用一种自由概念的时候，已经自动地开始了一场与其他具有同等竞争力的自由定义之间连续不停的对话。<sup>②</sup>

xv 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曾经说：“每个时代都按自己的口味来重新确定自由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sup>③</sup>我不打算讨论抽象意义上的自由，我希望把自由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展现在美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内，不同内容的自由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和实践的以及占主导地位的和被斥为异见的自由观之

---

① Homer C. Hockett and Arthur M. Schlesinger, *Land of the Fre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1944); Oscar and Lillian Handlin, *Liberty in America, 1600 to the Present* (4 vols. New York, 1986-94); R. W. Davis, "The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Freedom," *The Historian*, 55 (Summer 1993), 629-34; Donald W. Treadgold, *Freedom: A History* (New York, 1990); M. Stanton Evans, *The Theme Is Freedom: Religion,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Tradition* (Washington, DC, 1994); Bloom in Todd Gitlin, *The Twilight of Common Dreams* (New York, 1995), 40; Higginson in Willie L. Rose, *Rehearsal for Reconstruction: The Port Royal Experiment* (Indianapolis, 1964), 408.

② Carl Becker, *New Liberties for Old* (New Haven, 1941), 3; W. B. Gailie,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n. s., 56 (1955-56), 167-98.

③ 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New York, 1953), 173.



间存在的那种对立和冲突是如何持续不断地重新界定了美国自由的内涵。自由从来就是一个充满冲突的战场,众多的定义在这里竞争和交锋,自由的定义因而不断得以创造和再创造。在某个时代处于边缘位置的自由定义到了另外一个时代则可能变成一种主流意志;当环境发生变化时,一些曾经长期为历史所抛弃的自由概念会重新复活,焕发新的生命力。自由的内容决非只是通过国会内的辩论或政治文献得以界定的,自由的内容同时产生在(奴隶制下的)种植园内、罢工的纠察线上以及私人家庭的前庭和卧室之中。美国自由的故事中有一批背景丰富多彩的角色,从托马斯·杰斐逊到玛格丽特·桑格,到富兰克林·D. 罗斯福,以及到那些在内战中力图使他们的解放带有实质性内容的前奴隶们。

“新的历史环境,”杰斐逊在1813年时写道,“……呼唤新的文字和新的词句,要求把旧的文字转用到新的客体之上。”美国自由的历史为我们探索美国文化的深度、观察美国历史上思想与社会经验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变化的模式,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角度。正是因为自由一词所包含的普遍性,所以对自由的研究决非只是一种词义学意义上的演练。社会批评家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在一个世纪前写道:“历史往往浓缩在老百姓的口头禅之中。”<sup>①</sup>在我们的政治语言中,自由正是占据着这样一个极为核心的位置,不了解关于自由的多方位辩论,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懂得美国的历史。这部关于自由思想的历史的讨论,并不打算自称是一部关于美国历史的综合性叙述,但本书强调,将自由作为一个观察美国历史的组织性主题使用,可以帮助我们对那些不熟悉的历史因素予以高度重视,并以新角度和新方法来审视那些我们熟悉的历史事件和时期。自由的历史点亮了社会和政治运动的目的和思想。它展示了在美国革命、内战、冷战这样的历史危机中,自由的语言是如何渗透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中的,而这些历史危机又是如何永久性地转化了美国的政治文化的。观察自由的思想如何被用来为不同的目的服务以及这些使用所揭示的

---

<sup>①</sup> Cynthia S. Jordan, “‘Old Words’ in ‘New Circumstances’: Language and Leadership in Post-Revolutionary America,” *American Quarterly*, 40 (December 1988), 491; Henry Demarest Lloyd, *Wealth Against Commonwealth* (New York, 1899), 498.

更为广远的信仰体系,相对于只是了解某一个别自由定义的演变来说,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既然自由包含的不是一个单独的思想,而是一个多元价值的复合体,围绕它的定义的斗争必然是一场同时涉及思想、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较量。作为一种带有道德色彩的思想,自由被用来表达各种各样的冤屈和希望、对现实的恐惧和对未来的展望,并被用来说明所有这一切同时存在的合理性。自由  
xvi 既是一种最为古老的老生常谈,又是一种最为当代的追求和渴望。在我们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里,自由曾被当作一种“抗议者的理想”,也曾被用来作为一种维持现状的理由。自由将我们的文化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但同时又暴露了美国宣示的理想和它的现实之间存在的种种矛盾。从废奴主义者到当代的保守主义者,所有的群体都意识到,“抓住”类似自由这样的词等于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了一个具有威慑力的位置。“人们如此地操纵和玩弄自由概念,”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在冷战初期写道,“到最后自由变成了一种强者和富者掠夺弱者和穷人手中剩下的一切的权利。”但是,就在这些话写下后不久,本世纪最伟大的群众运动便通过“自由乘车”、“自由学校”以及持续不停的“现在就给我自由”的口号重新焕发了自由语言的活力。<sup>①</sup>

如同我们政治语言中的其他中心内容——譬如独立、平等和公民资格等——一样,自由的定义与再定义也是借助假定存在的对立面来进行的。“独立”的意义取决于一个表示“依附”的概念,“白人”的涵义取决于黑人的定义,“自由”的内容也就取决于不自由的内容。这种二元对立论是美国人观察和理解世界的一种范式,它在揭示一部分现实的同时,又掩盖和粉饰了另外一部分现实,并且还隐藏了这样一种事实:即那些看上去相互排斥的思想事实上在意识形态方面是有内在联系的。<sup>②</sup>在殖民地时期和 19 世纪,正是奴隶制帮助界

① 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New York, 1986), 17-19; Theodor Adorno, “Messages in a Bottle,” *New Left Review*, 200 (July-August 1993), 7.

② Martin Oswald, “Freedom and the Greeks,” 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Freedom in the West*, ed. R. W. Davis (Stanford, 1995), 36; Joan W. Scott,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1989), 5-7.

定了美国人对自由的认识。事实上本书的第一部分就是探讨奴隶制的存在如何促成了(以)种族(为界限的)排斥性自由定义的形成,同时也揭示了那些自认为被剥夺了全面自由的人——如抗议“工资奴隶制”的工人以及反对“性别奴隶制”的妇女——如何使用自由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愤怒和冤情。在近代,尤其是当美国宣称自己是自由世界的领袖的时候,共产主义世界的存在则帮助界定了美国自由的涵义。

对于自由这样一个复杂多面的题目,没有一项研究可以自称是权威性的。类似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出作者的个人兴趣与选择;另一个历史学家无疑会就这个题目写出一本完全不同的著作。我对自由历史的研究方法是以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为中心的:自由的内容、致使自由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和自由的界限——即谁应该享有自由的问题。

在讨论第一主题时——即美国人如何理解和认识自由的思想——我关心的问题远不是自由的抽象定义,而是那些使自由获取了具体内容的辩论和斗争,人们对自由的认识如何受到社会运动、政治和经济事件的影响,以及这些认识反过来如何影响了这些运动和事件。没有一个包罗万象的定义或一套思维范畴可以准确地概括自由所包含的捉摸不定的内涵。然而,如果自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它决不是一只空荡无物的船只。美国人对自由的理解多次改变,但关于自由的辩论却趋向于集中在自由思想的某些方面。这种辩论的历史决定了我在本书中打算集中讨论的有关自由的几个维度。

一个关键的维度是政治自由,或者说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这段故事始于美国革命,当时流行的对自由的理解集中在一个社会是否有权争取政治自决的问题上。在19世纪,政治民主(直到内战之后,这个词一直被定义为男性白人选举权)成为了自由内涵的中心;而那些被排斥在民主之外的群体正是使用自由的语言来要求获取投票权的。即使是在今天,当自由的内涵更多地包括了个人权利的时候,作为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的自由观念并没有从我们的政治文化中完全消失。政治自由的问题与我们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另外一个问题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自由与政治体制的关系。自由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实践;它是一种价值复合体,也是一种贯穿于法律和公共政策中的经

验。一些美国人把政府权威视为一种对自由的威胁,而另外一些美国人则把政府权威看成是争取约翰·杜威所说的“有效自由”的一种手段——即左右那些决定自由界限的体制的能力。<sup>①</sup>

美国人对政府爱恨交织的关系通过自由历史中另一个关键的维度表现出来:公民自由或者说个人可以用来反抗权威的权利的演进。今天,为权利法案保护的公民自由是美国人自由概念的中心内容。但这种情形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事实上,在我们历史上的许多时刻,无论是19世纪30年代对废奴主义者集会的镇压,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恐红”运动,还是冷战初期麦卡锡主义的横行霸道,个人权利都遭受了严重的限制和剥夺——并且经常是以自由的名义进行的。公民自由在美国的发展绝非是一个直线进步的故事或者是一个仅仅由一系列最高法院的判例组合起来的简单故事,相反,它是美国自由故事中的一个发展极不平衡并且充满了残酷较量的部分。

xviii 此外,还有另一种始终与美国生活相伴的对自由的理解,这就是自由所包含的道德或“基督教”的理想。从清教徒殖民者到当今的许多保守主义者,都把自由的首要涵义定义为一种在个人行为中遵循某种道德规范的能力。这种定义与自由的另一个反复出现的维度——个人自由,或者说,个人在不受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做出重要的个人决定的能力——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在美国革命时期,作为个人选择的自由主要与民主政治和宗教认同等有关。到了19世纪,个人自由逐渐被用于表示一个人是否获得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天生才能的机会。在20世纪,“选择的能力”可能成为了自由认知中的最重要的因素,这种认知也是消费者市场爆发性发展的结果之一。在个人解放的名义下,作为美国自由史上重要一章的20世纪60年代把“选择的自由”推进到几乎所有的个人生活领域,从穿衣打扮到“生活方式”乃至到性关系。

自由的最后一个维度是经济自由:即什么样的经济关系构成了个人在工作生活中的自由。经济自由的内容随美国历史的进程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美国独立后一个世纪内,经济自由集中表现在个人的经济自主能力上,这

<sup>①</sup> Robert B. Westbrook,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Ithaca, 1991), 165.

种思想为革命时期的自食其力的小农生产者奉为神明,也为内战前“自由劳动”思想的倡导者推崇备至。随着工业经济的日益成熟,成为小业主的目标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变得不再现实的时候,新的经济自由的定义开始出现:镀金时代的“契约自由”、进步时代的“工业自由”(即工人要求在公司企业的决策过程中有一席之地)、新政时期的经济保障以及最近出现的要求具有在市场经济中参与大众消费的能力等。

在自由的理解和运用处于杂乱无章的情况下,自由的不同维度对于我们建立一种认识自由的秩序是一种有用的方法,但这些维度不能被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或相互排斥的。没有任何一套固定的范畴能够全面地表现处于历史中的个人对自由的体验和解释,也无法完整地解释自由的一种定义如何影响了自由的其他定义。自由是一个变化多端、捉摸不定的概念,它远远地跳出了学者们精心设置和规定的界限。许多人同时信奉那些看上去完全相互矛盾的自由定义——如:“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一种由艾赛亚·柏林大众化了的对自由的区分),或作为个人权利的自由和作为增强群体与民族国家权力和影响的自由。自由不仅适用于个人、社区、家庭和家庭成员之间,也适用于国家本身;争取自由既是个人行动也是集体斗争的目标。惟一不变的是关于自由的辩论本身;正是这种对自由不顾一切的专注为我们理解美国的过去提供了一个契合点。

讨论自由不可避免地要提出自由生长所必需的环境问题。这个问题—— xix  
即自由的社会条件——是本书的第二个主题。即便那些只接受纯粹的“消极”自由的人,例如只将自由定义为免受外来强制性压力而拒绝将自由视为经济自主或增强政治能力的人,也必须指出那些非法压迫是由什么内容构成的。美国人至少都曾在此时或彼时把政府权威、追求统一化的社会压力、官僚体制、类似传统家庭式的所谓“私有性”的安排以及集中化的经济权力等看成是享有个人自由的障碍。从革命时期开始,规范(享有)自由条件的努力一直没有间断过;当时普遍把拥有生产资料看成是实现个人自主的必要条件。这种努力一直延续到20世纪。在这个时期,女权主义者寻求重新界定性别之间的关系,以争取男女之间享有同等的自由;与此同时,美国人在其他问题上又陷



人严重的分裂,这些问题包括:贫困和经济上缺乏保障是否应被看成是一种对自由的剥夺以及政府是否有责任来减轻这种形式的对自由的剥夺。这些对于自由的辩论凸现了这样的事实:即所有关于自由的讨论都不可避免地是政治性的,无论这些讨论以什么名义进行,它们都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公共体制、经济与社会关系将如何影响到那些可供个人选择的机会的本质和范围。所以,通过考察自由的社会条件,自由一词也因而进入了历史学家J. R. 波尔所称的“正义语言”的范畴。<sup>①</sup>

如果自由本身始终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战场,本书的第三个主题——谁应享有自由的恩惠的问题——也是这样的一种战场。美国立国的前提是,享有自由是全人类的权利;但美国却公然剥夺过许多她自己人民的自由,指出这一事实并不新奇。为人们难以察觉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关于自由的研究如何对冈纳·缪尔达尔所称的“美国信念”的普遍性提出了质疑;这种“美国信念”笃信所有人都拥有基本尊严,拥有不可剥夺的享有民主、自由和平等机会的权利。当代许多作者将这种信念看成是我们历史中的一个共同主题,一种能够超越“碎化”的途径,这种碎化据说对历史研究和社会本身都产生了严重的干扰。这部自由的历史的确也希望对近期史学写作面临的批评作出一种回应;这些批评指出,由于当代的历史写作变得如此分散和琐碎,以至于不再可能将美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我们的历史决不仅仅是一种把构成美国人的那些时常暴躁不安的群体的个别经验加在一起的总和。这部关于美国自由的历史认为,在探寻美国历史上的联结性力量方面,我们必须开拓新的思路。本书突出地表现了我们的共同文化中的那些普遍性原则实际上是如何构建在差别的基础上以及将相当数量的美国人被排斥在这些原则的惠顾之外的基础上的。路易斯·布兰代斯在1915年写道:“自由将我们编织在一起,使我们成为美国人。”<sup>②</sup>但是,如同自由这个词本身的定义一样,自由享有者的范

① William E. Connolly, *The Terms of Political Discourse* (Lexington, 1974), 166; J. R. Pole, *The Pursuit of Equality in American History* (rev. ed. Berkeley, 1993), 6.

② Myrdal, *American Dilemma*, 2-5;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19;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围始终是处于争议之中的。

按照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那个极受推崇的定义,一个国家远非只是一个政治实体,国家也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一个想像的政治社会”,它不仅具有地理的界限,同时也具有思想上的界限。<sup>①</sup>自由所包含的实质性内容越多,那些界定美国民族性内涵的包容性和排斥性界限也就越为重要。既然自由是作为一个美国人应该拥有的一套实用的权利和特权,享有自由的界限就具备了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因此在书中对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这个问题就是:谁是美国人(以及谁有权享有美国自由)?

如果说通行的美国信念是我们历史上一个长盛不衰的特征,那么,以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存在为轴心的对自由的限制也是我们历史上同时存在的一个特征。<sup>②</sup>在所有限制自由的界限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基于种族、性别和阶级差别基础上的界限。这些界限本身的内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我使用这些概念并非为了赶时髦,而是因为在限制享有自由的范围时,它们是最为经常使用的分界线。非白人、女奴与劳工都曾亲身经历了这样的困惑:即一个人的自由状态常常与另一个人遭受奴役的状态同生共存。奴隶主的自由是基于奴隶制存在的现实之上的;男人自我标榜的自主则是以妇女居于从属地位为前提的。同理,正是通过对享有自由的界限的斗争——即少数民族、妇女和劳工们为争取他们所理解的自由而进行的努力——自由的意义(以及自由的经验)得以加深和转化,这个概念本身也因此延伸到最初不曾包括在它的意图之内的领域。

美国自由的故事不是一个简单的、描述一个又一个的群体如何相继争取到一套固定不变的权利的史诗性故事。在我们的历史上,在被排斥的群体要

---

(New York, 1992), 27, 118; Ross E. Paulson, *Liberty, Equality, and Justice: Civil Rights, Women's Rights, and the Regulation of Business, 1865-1932* (Durham, NC, 1997), 2; Louis D. Brandeis, "True Americanism," in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ed. Philip Davis (Boston, 1920), 639.

①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London, 1991).

② Kenneth L. Karst, *Belonging to America: Equal Citizenship and the Constitution* (New Haven, 1989); Rogers L. Smith, *Civic Ideal: Conflicting Visions of Citizenship in U.S. History* (New Haven, 1997).

求进入享有自由的范围的压力之下,权利的定义一次又一次地发生转化。将自由定义为一种普遍的、与生俱来的人权和把自由看作是一种真正的人类理想的人,并不只是那些创立了这个名义上宣称致力于自由但在现实中却深深依赖于奴隶制的建国之父们,而同时也包括废奴主义者,他们力图将自由的恩惠推及所有的黑人,无论他们是自由的还是处于奴役状态之中的;也包括那些  
 xxi 紧紧抓住民主自由的语言、要求获得投票权的妇女们;也包括那些移民群体,它们坚持认为出生地和文化背景不应成为享有美国自由的限制。正是这些不同的群体争取自由的斗争将平等的概念升华至自由语言的中心位置,对另外一些美国人所坚持的平等是自由的对立面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与生俱来的公民资格和所有种族的美国人都应享有平等的法律保护这两项原则,是反对奴隶制斗争和内战的结果,现已成为美国自由的中心内容。妇女运动则向流行的将公共与私有领域分离的观点提出挑战,率先将自由的思想运用到生活中最亲密的关系之中。公民自由在司法上得到承认部分地源于联邦最高法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些法律的推翻,这些法律——如要求新移民在公立和私立学校中必须使用英语授课——主要是为了限制新移民对自由的享有。

本书的书名刻意要表现一种模糊不清或讽刺意味(也许可以被称为一种后现代主义式的手法),这一点也许是不言而喻的。所谓故事,既是一部由真实事件组成的历史,又是一种创作。在我们的历史上,自由既是一个现实,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神秘意味的理想——对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来说,自由是一个活生生的真理,但对其他美国人来说,它又是一个充满残酷意味的戏弄。对有的美国人来说,自由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对其他人来说,用小马丁·路德·金的挚友和哲学家塞缪尔·杜波依斯·库克的话来说,“自由不是一种礼物,而是一种争取而来的成就。”从“历史和道德的角度来看”,库克解释道,自由“是经过无数的斗争、悲壮的失败、眼泪、牺牲和悲痛后的成果”。<sup>①</sup>

<sup>①</sup> Clayborne Carson, ed., *The Papers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Berkeley, 1991-), III, 204.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自由以及界定自由内容的斗争一直是我自己研究和写作的中心题目。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研究的是自由土地党的问题,我先前出版的著作中有三本的书名包含有“自由的”或“自由”的字样。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的研究生训练是在理查德·霍夫斯达特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个训练帮助我建立起一种长期的对思想与经验之间、社会运动与政治经济体制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关注。过去 30 年来的学术发展已使当代史学家要比霍夫斯达特以及他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更为明显地认识到,在任何美国史的写作中,必须包括不同美国人的不同观点和声音。但激发我写作这部著作的雄心与霍夫斯达特那一代人的雄心是同样的——即写出一个能够连贯而生动地表现美国政治文化以及它特有的政治语言本身演进的故事。

今天,人们经常要求历史学家写作一种以自由的理想为基础的、具有凝聚力功能的历史,以增强共同的民族认同感。但是,正如当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说,历史学家“恰恰是一批专职的要记住那些他们的公民同胞希望忘却的事物的人。”<sup>①</sup>美国人有时也会“忘记”,那些在我们看来 xxii 是固定不变和亘古永恒的事物,实际上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并始终不断地受到质疑。自由的故事不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英雄史诗,它没有一个预先设定的开始和结尾,相反,它是一个不设界限的同时充满成功与失败的历史,它是一部关于一个民族就自己政治文化中的关键思想展开的一场永无止境的争论的纪录。在这场漫长的跨越时间限制的对话中,自由的内涵如同美利坚本身一样,始终是具有多面性的,始终是具有争议性的,始终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

<sup>①</sup> Lynne V. Cheney, *Telling the Truth: A Report on the State of the Human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1992), 40-44,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9, 1995; Eric Hobsbawrn, *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 (New York, 1994), 3.





## **美國自由的故事**

## 第一章 美国自由的诞生

3

美国自由诞生于革命之中。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继承而来的自由思想得以转化,新的自由思想得以出现,有权享有宪法所称“自由的恩惠”的人的定义受到了挑战并得到了扩展。美国革命给后来数代美国人留下了一份用之不尽却又矛盾重重的遗产。革命创造了这样一种幻觉,即在这个充满压迫的世界上,美国是自由的惟一的避难所,这种幻觉在当今美国的政治文化中仍然存在。但是,在自由的襁褓中诞生的美国同时也藏匿着一个快速增长的奴隶群体,这种情形至少说明,开国领袖们那种将自由宣示为普遍的天赋人权的豪言壮语是极不真实的。

### 生而自由的英国人

“自由”一词当然不是在 1776 年才突如其来地闯入美国人的词汇中的;事实上,在 18 世纪跨越大西洋的政治话语中,没有其他任何词比“自由”使用得更为普遍和经常。殖民地时期的美国继承了多种自由的定义和理解,早期的理解可追溯至古希腊的城邦时代,近期的则可溯源于启蒙运动。有的定义奠定了当代自由概念的基础,其他的则完全不为今人所熟悉。

在英属北美殖民地中,自由通常被定义为是一种精神状态,而不是一种政治或社会地位。在古代社会,缺乏自制力往往被看成是一种被奴役的状态,是一种自由生活的对立面。“展示给我看看,世上谁人不是奴隶?”塞涅卡曾写道,“此人是性欲的奴隶,彼人是金钱的奴隶,其他人则是野心的奴隶。”将自由看成是一种对道德规范的绝对服从,这种对自由的理解在基督教的宇宙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而后者则弥漫渗透于早期殖民者的世界观中。在所有基督教盛行的地方,解放的思想都被奉为神明,但基督教奉行的解放指的是

精神上的解脱,而不是世俗意义上的解放。基督教义认为,自亚当的堕落开始,人类总是为自己的情欲和感情所俘虏。对于基督徒来说,自由意味着抛弃这种带有原罪的生活,接受耶稣的教诲。“凡上帝精神所在之处,”新约全书宣称道,“自由也就同在。”在这种定义之下,遭受奴役与获取自由是两种不但不矛盾、反而相互强化的状态,因为接受了基督教教诲的人在“从原罪之中获得解救”的同时,也成为了“上帝的仆人”。<sup>①</sup>

在马萨诸塞殖民地落户的清教殖民者,深信他们的殖民地是真正的基督教的化身,从而把他们对自由的精神定义播撒进美洲的土壤之中。殖民地总督约翰·温斯罗普在1645年对马萨诸塞立法机构的一次演讲集中地反映了清教徒的自由概念。温斯罗普将“自然自由”与“道德自由”作了严格的区分:前者是“一种走向邪恶的自由”,而后者则是“一种只行善事的自由”。这种自由定义的基础是对自我的否定和对道德的选择,与当时那种对言论、宗教、运动和个人行动自由的严格限制是非常吻合的。个人的欲望必须让位于社会的需要,“基督教自由”意味着对上帝意志的服从,对世俗权威的服从,以及对一整套不言而喻的、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责任与义务的服从,而且这种服从必须是百分之百地出于自愿。新英格兰殖民地法院审理的最普遍的民事犯法行为是“蔑视权威”。不受限制地享受天赋人权的个人,在后人想像中是一种自由的化身,但对清教殖民者来说,却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典型和一种对自由的诋毁。“当每个人都依循自己的想像去追求自由的时候,”清教牧师托马斯·胡克宣称:灾难将不可避免地降临,因为“所有人都会为了个人利益而侵害公共利益”。<sup>②</sup>

① Seneca, *Letters from a Stoic*, ed. and trans. Robin Campbell (London, 1969), 95; Orlando Patterson, *Freedom* (New York, 1991), xvi; David B. Davis,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Western Culture* (Ithaca, 1966), 85-90; II Corinthians 3:17; Romans 6:20-22.

② Perry Miller and Thomas H. Johnson, eds., *The Puritans* (2 vols. New York, 1938), I, 205-07; Edmund S. Morgan, *The Puritan Family: Religion and Domestic Relations in Seven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rev. ed. New York, 1966), 26; David H. Fischer, *Albion's Seed: Four British Folkways in America* (New York, 1989), 202-03;

在清教殖民地以南的那些更为世俗的殖民地中,公共权威相对薄弱。即便在新英格兰地区,如18世纪早期的历史文献曾强烈地哀叹道的,殖民者中原有的那种自愿接受以自由名义制定的公共规范的热情很快消退了。到了18世纪50年代,将新英格兰视为上帝为人类准备的一个特殊避难所的思想已经为另外一种范围更为广泛的思想所兼收,后者将整个盎格鲁—美利坚新教世界看成是一个反抗专制和天主教的堡垒。但基督教关于自由是一种精神解脱的思想却一直延续到革命之后,甚至直到我们今天的时代。殖民地后期出现的宗教复兴运动,也就是历史学家们常称的“大觉醒运动”,实际上进一步 5 强化了这种对自由的认识。在独立之前,类如乔纳森·鲍彻这样的牧师还坚持认为,“真正的自由”意味着一个人“无拘无束地去做一切正当的事,约束自己不做一切不正当的事”;自由不是“一种使我们为所欲为的权利”。<sup>①</sup>

这种将自由与道德行为等同起来的做法,在18世纪的大西洋世界中,也以世俗的方式迅速繁衍生长。如果宗教自由指的是对上帝的服从,那么“世俗自由”则意味着对法律的服从。远在古代社会,亚里士多德就曾告诫人们:不要把“遵纪守法的生活当成奴隶制”来看待。法律是自由的“拯救者”,而不是自由的敌人。近代研究自由的哲学家们也对“不受限制的自由”和“一种法治下的生活”做了明确的区分。约翰·洛克曾写道,自由并不意味着让所有人为所欲为,而是指“依照一种通用的规则来生活,这种规则对社会中所有人都是一致的,并为立法机关所制定”。正如洛克的思想所示,只要法律是由民选的议员们所制定和颁布的,而且不是以专断的方式来实施的,世俗形式的自由就

---

Harry S. Stout, *The New England Soul: Preaching and Religious Culture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New York, 1986), 15; Hooker in Allen Carden, "The Communal Ideal in Puritan New England, 1630-1700," *Fides et Historia* (Fall-Winter 1984), 25-38.

① Helena M. Wall, *Fierce Communion: Family and Community in Early America* (Cambridge, MA, 1990); Richard L. Bushman, *From Puritan to Yankee: Character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Connecticut, 1690-1765* (Cambridge, MA, 1967); Jack P. Greene, *Pursuits of Happiness* (Chapel Hill, 1988), 35-76; Barry A. Shain, *The Myth of America Individualism: The Protestant Origins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Princeton, 1994), 193-240; Jonathan Boucher, *A View of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Thirteen Discourses ... 1763-1775* (London, 1797), 511.

必须以遵从法律为基础。由此,我们看到不列颠自由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这同时也是大西洋两岸社会与政治思想中的一个基本概念。直到18世纪70年代,大多数殖民者都认为自己是当时人类所知道的最自由的政治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sup>①</sup>

到18世纪,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这个“被发明的传统”已经成为盎格鲁—美利坚政治文化中的一个中心特征,也成为当时正在不列颠逐渐发育成型的国家意识中的一块重要基石。英国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由自由的个人组成的共同体,把自己的历史说成是“一部自由的历史”。英国人深信自由是所有不列颠人的共同传统,深信不列颠帝国是世界上惟一的自由储藏地,这种思想首先使英国对北美的殖民化行动得以名正言顺。随后,它又将英国与天主教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帝国战争看成是一场自由与专制之间的决斗,这种看法同时在殖民地和宗主国广为流传,甚得人心。不列颠式的自由思想推崇法治,坚持一个人拥有在其所居住的社区认可的立法下生活的权利,主张对政治权威的专断行为进行限制,而且力主实施受普通法保护的类似陪审团制这样的权利。这种自由的定义与新教传统相互认同,并经常被英国人洋洋自得地用来区分他们与那些天主教国家的“被奴役的”臣民。<sup>②</sup>

当然,对于产生了约翰·弥尔顿和约翰·洛克的著作的国家来说,把自由看成是人类的一种自然状态,这一思想并不足为奇。但不列颠的自由却恰恰不是普天之下共同享有的。不列颠的自由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通常还充满

---

① John P. Reid, *The Concept of Liberty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icago, 1988), 32; *Aristotle's Politics*, trans. Benjamin Jowett (Oxford, 1908), 261; Charles S. Hyneman and Donald S. Lutz, eds., *American Political Writing During the Founding Era 1760-1805* (2 vols. Indianapolis, 1983), 1, 23;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ed. Peter Laslett (Cambridge, 1988), 284, 306.

②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New York, 1983); 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New Haven, 1992), 35, 53-55;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1963), 77-101; John R. Reid, "Liberty and the Original Understanding," i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Liberty: Seaver Lectures at the Huntington Library* (San Marino, CA, 1988), 3-6; Forrest McDonald, *Novus Ordo Seclorum: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Constitution* (Lawrence, 1985), 36-40; Reid, *Concept of Liberty*, 48-50.

了对外国人的仇视；它认为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的国家都处于“被奴役”的状态之中——不是为教皇、暴君，就是为野蛮所统治。“自由……不会在其他地方生长，”诗人约翰·德莱登写道，“自由是英国臣民独享的权利。”不列颠人在宣称自己是自由国土的公民的同时，又将成千上万的非洲人贩运到新大陆去当奴隶；对此他们并不觉得有任何自相矛盾或不妥之处。“不列颠人决不，决不，决不会成为奴隶，”当时的一首流行歌曲这样唱道：“统治世界吧，不列颠。”歌中并没有提到英国人不能拥有奴隶，因为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几乎没有人认为非洲人有权享有英国人的权利。<sup>①</sup>

此外，不列颠式的自由也不被看作与英国国内在个人自由享有上存在的巨大差别有任何不相称之处，当时的英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贵族社会，具有一个限制严格的“政治社会”（指那些拥有投票权和担任公职权的人）。虽然普通法的保护延伸至所有人，但因财产资格和其他的限制，18世纪英国的选民人数不到男性成人人口总数的5%。〔“选举地方官员的权利，”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在他的《论政府之首要原则》（1768年）中指出，对于不列颠自由来说无关紧要，人们“可能享有公民自由，但并不一定享有政治自由”。〕不列颠法律也不把劳动看成是完全自由的。管制流浪汉和无家可归者的法律对那些明显地缺乏生活来源的人予以惩罚。“主仆”法则要求仆人绝对服从主人，违反劳动合同者将作为刑事犯罪受到处罚。英国皇家海军在国际水域里耀武扬威，保卫英国自由不受到外来侵犯，但这支海军的水手却是被壮丁队从伦敦和利物浦的街上强行抓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不列颠式的自由也是一种直接由中世纪衍生而来的产物，因为在中世纪，“自由”意味着自治或通过合同、宪章、王皇诏令对某些特殊群体予以免征税收在内的种种正式的特权。只有那些享有“城镇自由”的人才能够从事经济活动。这种中世纪式的对自由的理解构造了一个等级世界，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权利几乎是不存在的，而政治与经济特权只能

① James Kinsley, ed., *The Poems of John Dryden* (4 vols, Oxford, 1958), I, 450; Colley, *Britons*, 351-52; David Eltis, "Europeans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African Slavery in the Americas: An Interpreta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8 (December 1993), 1415-23.

为某些社会阶级所享有,其他的阶级则被剥夺了这些权利。这种早期的、限制性的自由思想在早期北美殖民地也存在过,例如,殖民地时期纽约市的法律就曾规定该市的一些行业只对拥有“自由人”法律地位的人开放。<sup>①</sup>

无论它具有何等的局限性和排他性,诚如历史学家戈登·伍德所说:“怎么强调 18 世纪英国人对他们闻名于世的自由的自豪程度都不为过。”这种观察同样可以用来形容美洲殖民地对于宗主国所抱有的自豪感。如果愿意的话,不列颠自由可以划分成一些具体的组成部分,正如当时许多的作者所倾向于那样做的。政治自由指的是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公民自由指的是保护个人人身和财产不受政府的侵犯;个人自由指的是凭良心行事的自由;宗教自由指的是新教徒有权按自己选择的方式来祈祷上帝。但不列颠自由的整体大于所有这些具体的自由的总和。不列颠自由既是一套具体的权利,同时也是一种民族特性,也是一种精神状态。这种自由定义包含着如此广泛的使用范围和如此多元的适应功能,以至于它能与那些后来看上去与之并不和谐的因素相安无事地和平共处。<sup>②</sup>

譬如,不列颠式的自由囊括了有关政治权力的相互矛盾的不同态度。一方面,这种自由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与民族国家的兴起是分不开的,而且正是在英国开始成为世界头号帝国的时候达到了发展的顶峰。但与此同时,对政治权威运用进行限制又是不列颠自由的关键。权力与自由被普遍地认为是一对天然的敌人,通过他们制衡的宪政体制和他们信奉的、包括国王在内的任何

---

① Gordon S. Wood,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92), 57; W. A. 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 England, 1714-1760* (London, 1977), 16; Joseph Priestley, *An Essay on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and on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Civil, and Religious Liberty* (London, 1768), 12-14; Jonathan A. Bush, "Take This Job and Shove It": The Rise of Free Labor," *Michigan Law Review*, 91 (May 1993), 1396; J. H. Baker, "Personal Liberty Under the Common Law of England, 1200-1600," 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Freedom in the West*, ed. R. W. Davis (Stanford, 1995), 178; Fischer, *Albion's Seed*, 201; Graham R. Hodges, *New York Craftsmen, 1667-1850* (New York, 1986), 3-5.

② Wood,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3-14; Michael Kammen, *Sovereignty and Liberty: Constitutional Discourse in American Culture* (Madison, 1988), 55-56, 74-75; Reid, "Liberty," 2.

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原则,英国人声称他们创设了防止政治专制的最佳方式。这些观念和思想不仅深深地构建于上层政治体制之中,而且也为更加广泛的英国社会所接受。劳工、水手以及手工匠人等对普通法和不列颠自由这类语言的使用,在迫切程度上一点儿也不比政治传单的作者们和议员们逊色。到18世纪时,自由人这一概念不再像在中世纪时期那样只是代表一种法律地位,而成为了大众意识形态中一个感召力巨大的因素。在大西洋的两岸,自由成了“造反者的战斗口号”。抗议剥夺传统权利的群体行动此起彼伏,赋予了自由具体的定义:对暴政的抵制。“我们是自由人——不列颠的臣民——我们不是天生的奴隶”,这是课税调节者喊出的口号,他们在18世纪60年代对西部地区没能在南卡罗来纳议会得到足够的代表权而提出抗议。<sup>①</sup>

作为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力的自由与作为一套具体的、需由政府保护的个人权利的自由两者之间势必产生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有助于区分当时正在盎格鲁-美利坚世界中迅速蔓延的两种政治语言。其中一种语言即为学者们所称的“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尽管在18世纪的英国很少有人使用这个词,它容易使人联想起查理一世被斩首的时代)。“共和主义”将对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奉为自由的基本内容。共和主义的根源可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甚至还可追溯到更古的时代;它认为,作为一个社会性成员,当一个人能够抛开个人利益而追求共同福利,他就获取了人生的最高成就。当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共同权利时,共和主义式的自由具有扩展性和民主性。它同时也具有排他性和阶级性的一面,因为它认为只有拥有财产的公民才可能具备名为“美德”的素质;而这种“美德”在18世纪的理解中,不仅是一种个人<sup>8</sup>的道德素质,而且也是一种将个人感情和欲望服从于公共福利的意愿。“只有

---

① Liah Greenfi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 1992), 71-74; 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1967), 56-70; Bush, “‘Take This Job,’” 1397; Bushman, *Puritan to Yankee*, 271; Allan Kulikof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pital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Yeoman Classes,” in *Beyo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ed. Alfred F. Young (DeKalb, 1993), 92. 在此处以及本书的其他各处引用语中的斜体字(在中译本中均改为加着重号的字。——译者按),均出自原文。



具备了美德的人民才能够享受自由，”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写道。<sup>①</sup>

如果说共和主义式的自由是一种公民和社会的平等权利，而这种权利又只能为一个“自由的国家”（即一个根据被统治者的同意而运作的国家）的公民所享有，那么，18 世纪的自由主义所推崇的自由则基本上是个人性的和私有性的。根据现代自由主义理论的鼻祖洛克的理论，建立政府的目的是对“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些为所有人所享有的天赋人权提供保护，政府的权利应该基本上被限制在这个目的之内。对于洛克和他在 18 世纪的信徒们来说，自由并非意味着对公众生活的参与，而是意味着个人的独立自主——即“不要屈从于其他人的反复无常、难以确定和无从知晓的武断意志。”保护自由必须要保证涉及私人生活和个人问题的领域——包括家庭关系、宗教意愿、经济活动——不受国家的干预。所谓公共利益，并非是一种政府有意追求的理想，而更应该是自由的个人追求不同私利的结果。<sup>②</sup>

正如历史学家皮埃尔·马尼特所指出的，自由主义将“公民”与“人”分离开来，将生活的政治领域与生活的社会领域分离开来。一些批评家把自由主义式的自由斥为自私自利和缺乏公益心的借口。“我所挚爱的……自由，”埃德蒙·伯克写道：“不是那种孤身独处的、与世隔绝的、自我中心的、自私自利的自由。如同每一个人必须根据他自己的意志来规范他所有的行为，我所讲的自由是一种社会性自由。”为什么自由主义对 18 世纪等级分明的大西洋世界具有吸引力，要理解这一点其实并不难。因为它对一系列的法律特权和政府机制——从特许公司的经济特权到法律认可的宗教排他主义——提出了质疑，这些特权都是个人进取和成功的障碍。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强调人类

---

① Philip Pettit, *Republicanism: A Theory of Freedom and Government* (Oxford, 1997); Albert H. Smyth, ed., *The Writings of Benjamin Franklin* (10 vols. New York, 1906), X, 80; Morton J. Horwitz, “Republicanism and Liberalism in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Thought,” *William and Mary Law Review*, 29(Fall 1987), 66-67.

② Quentin Skinner,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Cambridge, UK, 1998); Locke, *Two Treatises*, II, 22; M. M. Goldsmith, “Liberty, Virtue, and the Rule of Law, 1689-1770,” in *Republicanism, Liberty, and Commercial Society, 1649-1776*, ed. David Wootton (Stanford, 1994), 197-98; James P. Young, *Reconsidering American Liberalism: The Troubled Odyssey of the Liberal Idea* (Boulder, 1996), 25-36.

拥有政府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这种思想为那些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妇女甚至奴隶挑战那些限制他们自由的种种规定打开了大门。<sup>①</sup>

最终,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将被视为不能共存和相互矛盾的自由理论。但在18世纪,这两种语言却相互重合,而且经常相互强化。对于现代人来说,许多革命时期的领导人既是共和主义者(因为他们关注公共福利,强调公民对政治体制的服从),又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极为重视个人的权利问题)。这两种政治意识形态可同时激发人们对宪政政府、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以及限制专断性权力的坚决支持和信奉。两者都强调对财产的保护是自由的基础。此外,新教道德观的普遍传播冲淡了人们对后来所谓的自由主义非道德论的疑虑。

在殖民地时代,“自由”自然成为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关于政府和社会的认知的结合点。在重视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与强调公共自由的共和传统两者之间,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相互矛盾之处。除此之外,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共和主义者,还是那些两者兼而有之者,大部分18世纪的政论家都认为只有某一类人才能够完全地享有自由的恩惠和行使自由的权利。大西洋两岸的政治思想中共同拥有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公理:凡依赖于他人的人必然缺乏自我意志,因而没有能力参与公共事务。颇具影响的政治理论家理查德·普莱斯曾写道,自由基于“一个通行的思想之上,……即自我导向或自我管理思想”。那些连自己的生活都主宰不了的人自然不应在管理国家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政治自由必须要以经济独立为前提。<sup>②</sup>

因此,如纽约出版商约翰·皮特·曾格在1735年所描述的,财产就这样被“编织”到18世纪对自由的理解中去了。以财产为后盾的独立自主是自由

① Pierre Manent,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Liberalism*, trans. Rebecca Balinski (Princeton, 1994), x; *The Correspondence of Edmund Burke* (10 vols. Cambridge, UK, 1958-78), VI, 42; Isaac Krahnick, *Republicanism and Bourgeois Radicalism: Political Ideology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and America* (Ithaca, 1990), 4-11.

② Richard Price,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of Civil Liberty...* (London, 1776), 2-3. 近期关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在18世纪的相互关系的讨论,参见: Nathan Tarcov, “A ‘Non-Lockean’ Locke and the Character of Liberalism,” in *Liberalism Reconsidered*,

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塞缪尔·约翰逊的词典将“独立”定义为“自由”；托马斯·杰斐逊则强调说，依赖他人一定会“带来低三下四的恭顺和唯利是图的小人行为，并会扼杀美德的萌芽，为野心的塑造准备适用的工具”。因此，无论在不列颠本土，还是在殖民地，拥有财产无一例外地成为获取选举权的必要资格。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在他那部《英国法律评析》（1765—1769年）中写道：实施这种要求的“真实理由”，是因为不拥有财产的人将不可避免地“立即为他人所主宰”。由于缺乏自我意志，这些人的选票也将对“公共自由”造成威胁。不光家庭仆人是令人看不起的缺乏个人自主的例子，靠工资谋生也被普遍地认为是一件不甚光彩的事。在17和18世纪的英国，工资劳动常常与被奴役和丧失自由联系在一起；只有那些掌握着自己劳动力的人才被看作是完全自由的。不列颠民歌和民间传说常常把流浪汉、吉普赛人、响马甚至乞丐加以浪漫化，把这些人描述成比那些挣工资养家糊口的人更为自由。要到许多年之后，工资劳动与真正的自由相符合的思想才为公众广泛接纳。<sup>①</sup>

那些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设计者曾经希望在北美复制一个宗主国式的等级社会结构。但从殖民地的早期起，从不列颠和欧洲大陆来的移民始终对新世界抱有这样的期望：新大陆将能够把他们从旧世界的经济不平等和普遍经济依附的困境中解放出来。1607年，约翰·史密斯刚在美洲落脚就立即观察到，在美洲“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自己的劳动力和土地的主人和拥有者”。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大部分移民希望获取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为了吸引移民，那

ed. Douglas MacLean and Claudia Mills (Totowa, 1983), 130-40; Lance Banning, "Jeffersonian Ideology Revisited: Liberal and Classical Ideas in the New American Republic,"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 ser. 43 (January 1986), 3-19; James T. Kloppenberg, "The Virtues of Liberalism, Christianity, Republicanism, and Ethics in Early American Political Discours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4 (June 1987), 9-29; and Joyce Appleby, "Introduction," *American Quarterly*, 37 (Fall 1985), 469-70.

① Zenger in Michael Kammen, *Spheres of Liberty: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Liberty in American Culture* (Madison, 1986), 24-26; Samuel Johnson,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2 vols. London, 1755); Thomas Jefferson,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New York, 1964), 157; 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Portland, 1807), Bk I, 171; Reid, *Concept of Liberty*, 73-92; Christopher Hil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1974), 219-38.

些鼓动移民的广告大肆宣扬这种期望,把新大陆描绘成一个充满了获取财产的机会的地方。所以,那些到美洲来的移民在他们想像的自由中总是包含了这样一种期待,即能够获取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和将一份不动产传给自己后代的能力。<sup>①</sup>

以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来界定自由,自然就在那些能够充分享受自由的阶级与无法享有自由的阶级之间划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在18世纪,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对于大多数不列颠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即便是在北美殖民地的人口中,大部分人按这个标准也不是真正自由的。殖民地中没有英国的世袭贵族制,殖民者们曾为殖民地没有“高于自由人之上的任何等级”而洋洋自得。但在自由人之下却有许多的等级。革命前夕在美洲殖民地上劳作的50万黑奴自然不被算在自由人的圈子里。对于自由的妇女来说,她们的公民身份为她们的父亲和丈夫的公民身份所包括,她们在法律上并不拥有支配自己劳动力的权利,她们争取经济独立的机会几乎完全不存在。与此同时,在男人眼中,妇女天生缺乏理性、勇气以及自决所需要的广泛能力,而这一切都是一个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所必备的素质。事实上,独立自主的思想也是部分地通过性别来界定的;不管是在经济还是政治领域,独立自主都是一种男性特征,依赖他人则是妇女的正常地位。<sup>②</sup>

时常被人们忘记的是,在殖民地时期,即便在白人男性人口中,也有多种不同形式的半自由状态的存在,包括契约佣工、徒工、家庭仆人、流放的罪犯以及被强征加入王室海军的水手等。北美殖民地上的自由是以一种地位连续体

---

① Philip J. Barbour,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Captain John Smith (1530-1681)* (3 vols. Chapel Hill, 1986), I, 332; Jack P. Greene, *The Intellectual Construction of America: Exceptionalism and Identity from 1492 to 1800* (Chapel Hill, 1993), 75, 104; Greene, *Pursuits of Happiness*, 193.

② Eric Foner, *Tom Paine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 (New York, 1976), 27; Linda G. DePauw, "Land of the Unfree: Legal Limitations on Liberty in Pre-revolutionary America," *Maryland Historical Magazine*, 68 (Winter 1973), 355-68; Elaine F. Crane, "Dependence in the Era of Independence: The Role of Women in a Republican Society,"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ts Character and Limits*, ed. Jack P. Greene (New York, 1987), 259-61.

的方式存在的,在这个连续体中,从被剥夺了所有权利的奴隶直到独立自主的财产拥有者都有,而一个人在一生中很可能在这个连续体的范围内占据不止一个位置。自动放弃特定时间内的自由的契约佣工是整个殖民地时期非奴隶劳动力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迟至 18 世纪 70 年代早期,从英格兰和苏格兰来到北美的移民中大约有一半左右的人仍然是契约佣工,他们都签订了合同,以履行规定时期的劳动换取一张来到美洲的船票。契约佣工经常与奴隶肩并肩地在田野里工作。如奴隶一样,他们也可被主人任意买卖,受重刑处罚;他们对合同中规定的责任的履行(法律术语为“特定履行”)是由法院来强制执行的。<sup>11</sup>“许多黑人的待遇反倒更好一些,”一位女契约佣工在 1756 年抱怨说道,而她自己却被强迫着“不分昼夜地”工作,然后还要“被绑起来遭受鞭打”。当然,与奴隶不同的是,契约佣工可以期望从奴役中获得自由。假如他们能够从契约佣工时期挺过来(殖民地早期时候,许多契约佣工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契约佣工对主人的依附将得以解除,并接受“自由之职责”。一位宾夕法尼亚的法官在 1793 年说:契约佣工成了“奴隶与自由人之间的一个中间阶层”。<sup>①</sup>

如此众多的不自由劳动力在北美殖民地的广泛使用突出表现了一个极为普遍的现实,即拥有财产的男性家长享有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也因此享有与之相伴的自由。这种现实对于拥有奴隶的种植园主来说,尤为明显。他们早就将自由与主人地位等同起来。但对于北方城市中那些拥有一两个奴隶或契约佣工的手工业主来说,上述现实也是一种非常真实的写照。(在纽约和费城,手工业主和工匠们常将自己的独立自主引以为荣,但他们却属于当地最大的奴隶主之列。)与此同时,小自耕农们引以为荣的独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

---

① Robert J. Steinfeld, *The Invention of Free Labor: The Employment Relation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aw and Culture, 1350-1870* (Chapel Hill, 1991), 3-5, 46, 101-02; Jean B. Lee, *The Price of Nationhoo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Charles County* (New York, 1994), 44; Bernard Bailyn, *Voyagers to the West: A Passage in the Peopling of America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1986), 166; Wood, *Radicalism*, 51-55; Isabel M. Calder, ed., *Colonial Captivities, Marches and Journeys* (New York, 1935), 151-52.

处于依附地位的妇女劳动基础之上的。当时流行的一句谚语曾说：“女人的活儿总也干不完。”这句话一点儿也不夸张。自耕农家庭中由妻子和女儿们承担的煮饭、洗衣、打扫房屋以及其他一些农业上的辅助性杂活儿，实际上划分了自食其力和经济依附之间的界限。在殖民地时代那种以家庭为基础的经济中，独立自主的基础就是能够对他人发号施令。宾夕法尼亚的律师詹姆斯·威尔逊在1774年写道，自由与依附他人是“两个对立而且不可调和的概念”。威尔逊没有意识到，既然根据定义，自由人是一家之主，自由与依附之间也存在着一种难以摆脱的联系。<sup>①</sup>

18世纪，美洲殖民地的社会分化开始加剧，一个富有的贵族阶层开始出现，它不仅在政治、宗教和经济体制中行使越来越大的控制权，而且也要求社会下层对它表示尊敬与服从。但是，到美国革命发生时，北美殖民地的非奴隶男性人口中大多数都是拥有自己土地的小自耕农。因为家庭仍是经济生产的中心，没有财产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比起当时的英国来要小得多，工资劳动制度也远不像英国那样普遍。在自由人口中，财产分布的普及程度高于欧洲大陆的任何地方。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在北美殖民地上居住着“西方世界前所未闻的成千上万个最自由的人”。<sup>②</sup>

由此可见，对个人依附地位的深恶痛绝以及将自由等同于独立自主的思

---

① Shane White, *Somewhat More Independent: The End of Slavery in New York City, 1770-1810* (Athens, GA, 1991), 6-12; Gary B. Nash and Jean R. Sonderland, *Freedom by Degrees: Emancipation in Pennsylvania and Its Aftermath* (New York, 1991), 20-21; John M. Faragher, "History from the Inside-Out: Writing the History of Women in Rural America," *American Quarterly*, 33 (Winter 1981), 540-48; Linda K. Kerber, "I Have Done . . . much to Carrey on the Warr": Women and the Shaping of Republican Ideology After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1 (Winter 1990), 236-39; Robert G. McCloskey, ed., *The Works of James Wilson* (2 vols. Cambridge, MA, 1967), II, 725.

② Lee, *Price of Nationhood*, 17; Alan Kulikoff, *The Agrarian Origins of American Capitalism* (Charlottesville, 1992), 7, 21-22; John L. Brooke, *The Heart of the Commonwealth: Socie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Worcester County, Massachusetts, 1713-1861* (New York, 1989), 42-44; Greene, *Pursuits of Happiness*, 72, 188; Joyce Appleby, *Liberalism and Republicanism in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MA, 1992), 155.

想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根源相当深厚,这不仅是因为殖民地从英国那里承袭了类似的意识形态传统,更因为这些思想与社会现实是一致的——生产资料的广泛分布使得这种(哪怕是)数量极小的经济独立成了相当大量的殖民者亲身体验过的一种生活经验。1782年,来自法国的随笔作家埃克托尔·圣约翰·德·克雷维克曾指出了美国社会的特征——即“分布相当均衡的小康生活”——这种特征将成为后来把美国称之为“生产者共和国”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构成一种与这个基础相呼应的必然推论,即财产的普遍拥有是自由的社会前提条件。<sup>①</sup>

## 自由的民主化

北美殖民地拥有的一系列条件,包括财产的普遍拥有(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政治活动的广泛参与)、薄弱的贵族势力以及一个远不及在英国那样有权有势的教会,使其具备了深厚的民主潜力。但仍需经过争取独立的斗争,这个社会才得以不仅转化成为一个没有国君的共和政体,而且转化成为一个将平等和机会奉为其存在基础的国家,并使之能够骄傲地宣称自己是全人类的自由之乡。正是美国革命引发了公共辩论以及一连串的政治和社会斗争,而这一切则将自由的概念深刻地民主化了。

美国革命是以自由的名义进行的。在争取独立的道路上,没有什么词能比“自由”更经常地得以使用,尽管这个词很少得到准确的界定。当时有“自由树”、“自由旗杆”、“自由的儿女”以及那些数不清的类似于《一部自由的战车》和《论自由之美丽的演说》这样题目的传单(后者是约瑟夫·艾伦1772年在波士顿的布道词,这场布道曾是独立前几年最为轰动的公众演讲)。在整个殖民地,人们通过为自由举行假葬礼的方式来向1765年颁布的印花税法及其他类似的英国法令进行挑战。这种假葬礼的演出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当一具

---

<sup>①</sup> J. Hector St. John Crèvecoeur,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ed. Alfred E. Stone (New York, 1981), 67; Ronald Schultz, “The Small-Producer Tradition and Artisan Radicalism in Philadelphia, 1720-1810,” *Past and Present*, 127 (May 1990), 85-86.

棺木被运送到坟地,棺木中死去的人突然神奇地在最后一刻活了过来(接下来便是参加葬礼的众人们兴高采烈地冲向酒店,庆祝自由的复活)。对于抵制英国权威的人来说,自由不光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激情。即便是那些一贯冷静持重的人也对“自由的甜蜜”表示出热切的期盼。结果,各种各样的希望和期待都体现在自由的理念之中。一位英国移民在1775年抵达马里兰后不禁感叹说到:“他们都为自由发疯了。”<sup>①</sup>

革命时期的美国人并不是一开始就着意将所谓英国人的权利转化成为普遍人权的。殖民地的第一个王室敕令——1606年的弗吉尼亚宪章——授予了殖民者以与居住“在我们英国领域内”的所有臣民同等的各种“自由权、特许权和豁免权”。一个半世纪之后,北美殖民者仍然一如既往地享有浓厚的英 13 国民族主义意识,坚定不移地表示对英王和英国宪政的忠诚。当18世纪60年代殖民者对英国法令和法律进行抵制时,他们最初启用的思想武器是强调殖民者作为在不列颠宪政框架之内的“不列颠臣民(应享有)的权利”,而英国宪政则被视为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好的政府制度”。在反抗英帝国政策的斗争初期,殖民者所启用的政治原则是源远流长的传统的英国原则(包括无代表权不得被征税、由陪审团仲裁的法庭审判惯例等),其抗议的方式——从请愿、散发传单到群众活动等——也都是为宗主国所非常熟悉的。尽管有时人们声讨18世纪60年代英国法律法令——如印花税法、征用民房法以及唐森德法等——侵犯了人的自然权利,但人们更多地是谴责这些法律违背了“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权利和特权,”尤其是侵犯了免受专制政府的迫害和保障财产的自由权以及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决定自己所在的政治社会的法律的权利。

① McDonald, *Novus Ordo Seclorum*, 4-13; Kammen, *Sovereignty and Liberty*, 56-57; Alan Heimert, *Religion and the American Mind: From the Great Awakening to the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1966), 400-01; Ann F. Withington, *Toward a More Perfect Union: Virtue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New York, 1991), 145-47; James MacGregor Burns, *The Vineyard of Liberty* (New York, 1982), 2-3; Lee, *Price of Nationhood*, 118.

② Theodore Draper, *A Struggle for Power: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96), 33, 219; John M. Murrin, "A Roof Without Walls: The Dilemma of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in Richard Beeman, et al., ed., *Beyond Confederation: Origins of*



棺木被运送到坟地,棺木中死去的人突然神奇地在最后一刻活了过来(接下来便是参加葬礼的众人们兴高采烈地冲向酒店,庆祝自由的复活)。对于抵制英国权威的人来说,自由不光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激情。即便是那些一贯冷静持重的人也对“自由的甜蜜”表示出热切的期盼。结果,各种各样的希望和期待都体现在自由的理念之中。一位英国移民在1775年抵达马里兰后不禁感叹说到:“他们都为自由发疯了。”<sup>①</sup>

革命时期的美国人并不是一开始就着意将所谓英国人的权利转化成为普遍人权的。殖民地的第一个王室敕令——1606年的弗吉尼亚宪章——授予了殖民者以与居住“在我们英国领域内”的所有臣民同等的各种“自由权、特许权和豁免权”。一个半世纪之后,北美殖民者仍然一如既往地享有浓厚的英 13 国民族主义意识,坚定不移地表示对英王和英国宪政的忠诚。当18世纪60年代殖民者对英国法令和法律进行抵制时,他们最初启用的思想武器是强调殖民者作为在不列颠宪政框架之内的“不列颠臣民(应享有)的权利”,而英国宪政则被视为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好的政府制度”。在反抗英帝国政策的斗争初期,殖民者所启用的政治原则是源远流长的传统的英国原则(包括无代表权不得被征税、由陪审团仲裁的法庭审判惯例等),其抗议的方式——从请愿、散发传单到群众活动等——也都是为宗主国所非常熟悉的。尽管有时人们声讨18世纪60年代英国法律法令——如印花税法、征用民房法以及唐森德法等——侵犯了人的自然权利,但人们更多地是谴责这些法律违背了“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权利和特权,”尤其是侵犯了免受专制政府的迫害和保障财产的自由权以及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决定自己所在的政治社会的法律的权利。

① McDonald, *Novus Ordo Seclorum*, 4-13; Kammen, *Sovereignty and Liberty*, 56-57; Alan Heimert, *Religion and the American Mind: From the Great Awakening to the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1966), 400-01; Ann F. Withington, *Toward a More Perfect Union: Virtue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New York, 1991), 145-47; James MacGregor Burns, *The Vineyard of Liberty* (New York, 1982), 2-3; Lee, *Price of Nationhood*, 118.

② Theodore Draper, *A Struggle for Power: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96), 33, 219; John M. Murrin, "A Roof Without Walls: The Dilemma of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in Richard Beeman, et al., ed., *Beyond Confederation: Origins of*

直到1774年,弗吉尼亚殖民者仍然经常地将自然法与其他一大堆杂七杂八的权利诉求联系在一起,把它们统统看成是“自古就有、宪政意义上的和特许的权利”。同年,第一届大陆会议在为殖民地的行动辩护时,也是诉诸于“英国宪法的原则”和“英格兰王国的那些自由的和本土出生的臣民的……自由”。<sup>②</sup>

但随着冲突的日渐加剧,殖民地领袖们开始将英帝国的政策看成一个旨在摧毁美国人自由的巨大阴谋中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殖民地对英国的抵制不再被看成是一个反对某一具体的英国法律的斗争,而转化为自由与专制在全球范围内的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篇章。1774年的不可容忍法取缔了马萨诸塞的议会,关闭了波士顿的港口;在殖民者眼中,这些法律代表了英国人“奴役殖民地”计划中的最后阶段。从那时起,那些深嵌于18世纪帝国斗争中的思想——抵制专制政府的权利和将自由视为上帝的使命的看法——开始被用来反对英国本身了。<sup>①</sup>

独立的到来使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权利在北美变得毫无意义。直到1775年3月,埃德蒙·伯克还在向英国议会保证说,殖民者追求的并不是“抽象的自由”,而是“遵循英国思想、基于英国原则的自由”。但日益深重的危机不可避免迫使北美殖民者采用更抽象的天赋人权和普遍自由之类的语言来支持自己的诉求。此刻,美国社会的两种思想——把新世界看成是“完美自由”的未来圣地的新教思想与把旧世界视为堕落于腐朽和专制之中的世俗思想——得以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将有关不列颠自由的思想转换成为了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权利,并将北美作为人类自由的避难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首先能够完全彻底地感悟并抓住美国独立所具有的这种令人震撼的前景的人,却是一个1774年才抵达北美的来自英国下层社会的移民。1776年1月,在他

---

*the Constitution and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Chapel Hill, 1987), 340; Hyneman and Lutz, *American Political Writing*, I, 45-46; Julian Boyd,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Princeton, 1950-), I, 141; Greenfeld, *Nationalism*, 410-16.

① Pauline Maier, *From Resistance to Revolution: Colonial Radica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Opposition to Britain, 1765-1776* (New York, 1972), 161; Bailyn, *Ideological Origins*, 119; Nathan O. Hatch, *The Sacred Cause of Liberty: Republican Thought and the Millennium in Revolutionary New England* (New Haven, 1977), 50-54.

那本当时传阅最广的名为《常识》的小册子中,托马斯·潘恩宣称道:

哦!热爱人类的人们……挺身向前来吧!旧世界到处充满了压迫。自由在全世界受到追逐。亚洲和非洲早已经将它驱除,欧洲也把它视为异己,英国也已经对它下了逐客令。哦!接受这个逃亡者吧,及时地为人类准备一个避难所吧。<sup>①</sup>

如同潘恩后来指出的,他写作《常识》是为了帮助人们“争取自由”,但《常识》却宣示了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最终将激发19世纪美国那种把美国视为“自由的帝国”的思想。因为美国,惟有美国,才不受那些压迫旧世界人民的体制——如君主制、贵族制以及世袭特权等——的束缚,才是普遍自由可以生根的地方。六个月后,独立宣言不仅痛斥了英国将“绝对暴政”强加于殖民地的企图,也启用了人类拥有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在其中自由仅次于生命列在第二位)的思想,从而将殖民地的反抗合法化了。在独立宣言看来,“自然法和自然界中的上帝”,而不是英国宪政或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传统,使殖民地的独立得以合法化。自由不再是一套具体的权利,也不再是某一政体或某一民族在某种特定社会环境下享有的特权,自由变成成为一种普遍的、不受先决条件限制的权利。但是,这种普遍自由的理想与北美社会充满不平等的现实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将困扰革命时期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的美国公共生活。<sup>②</sup>

这样,如果说美国自由的根源来自基督教自由和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传统,那么它作为一种新的、独特的意识形态却是在争取独立和创建民族国家的斗争中诞生的,用麦迪逊的话来说,这场斗争将美国定义为“为文明世界制造自由的作坊”。在这个“思想共和国”(借用卢梭的话来说)中,一个新创造的民族历史和一个假定存在的国家目的两者都以自由思想为轴线而得以产生。杰

① Edmund Burke, *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16 vols. London, 1803), III, 49-50; Hatch, *Sacred Cause of Liberty*, 3-14; Ruth H. Bloch, *Visionary Republic: Millennial Themes in American Thought, 1756-1800* (New York, 1985); Foner, *Paine*, 78.

② Foner, *Paine*, 75; Greenfield, *Nationalism*, 423.

斐逊在1775年写道：“我们的先父们背井离乡，来到这片土地上，目的是为了寻求一个有世俗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居住地”；在驱动殖民者到美利坚来的许多动机中，这的确是一种令人振奋的（虽然也是有局限意义的）写照。至于未来，潘恩在《常识》中那句激动人心的文字——“在我们手中掌握着让世界重新开始的能力”——则将美国革命升华为一个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重要性事件，这个思想在当时的报刊文章和布道词中甚为流行，被人们反复传诵。由此可见，从一开始，对自由的倾心和执着构成了美利坚民族主义的精髓。<sup>①</sup>

在坚决果断地否定英帝国的威权统治的同时，美国革命也对北美内部存在的承袭式权力结构提出了挑战。在潘恩看来，美国革命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是一场思想上的革命：“我们用与从前不同的眼光来观察，不同的耳朵来倾听，不同的思想来思考。”在与英王以及英国世袭贵族制的原则相决裂的同时，许多美国人也抛弃了人类生而不平等的思想，并与充斥着特权、恩赐以及表现这些权贵传统的固定等级的旧社会一刀两断。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的那句看上去就事论事的名言——“所有人生而平等”——实际上宣示了一个颇为激进的原则，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测它所包含的全部涵义。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社会，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的基础通常被认为是对权威的服从——臣民服从统治者，妻子服从丈夫，子女服从父母，奴仆和学徒服从主人，奴隶服从奴隶主。不平等是殖民地社会秩序的基础所在，而革命在许多方面使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失去了原有的合法性。如此而来，美国自由不可避免地和平等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了（至少对那些处在自由公民圈子内的人是如此），自由意味着法律面前的平等、政治权利的平等、经济机会的平等，以致对有些人来说，意味着社会条件的平等。“无论何时，当我使用‘自由’或‘权利’这两个词的时候，”潘恩写道：“我希望人们懂得它们两者之间是完全等同的……如同水一样，自由总是往低处流的。”<sup>②</sup>

① Adrienne Koch, *Power, Morals,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Ithaca, 1961), 105; Boyd, *Jefferson Papers*, I, 199; Foner, *Paine*, 78; Hans L. Kohn, *American Nationalism: An Interpretive Essay* (New York, 1957).

② Philip S. Foner, ed.,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2 vols. New York, 1945), II, 243, 286-87; Wood, *Radicalism*, 6-7, 24-27, 232-40; Lee, *Price of Nationhood*, 42.

在美国革命追求平等的气氛熏陶下,长期实行的依附关系和种种形式的不自由突然失去了原有的合法性。今天,我们非常熟悉阿比盖尔·亚当斯对她丈夫发出的“不要忘了女士们”的呼吁以及她关于妇女与男人一样同样不应“为任何我们没有发言权或代表权的法律所控制”的评论。但约翰·亚当斯对此呼吁的回应并不太为人所知,他的回应反映出当时各种传统等级观念正在崩溃的情形:

我们被告知我们的斗争放松了所有的政府束缚,孩子和学徒变得不听使唤,学校和大学变得动荡不安,印第安人开始蔑视他们的监护人,黑奴开始不把他们的主人放在眼里。

- 17 对于约翰·亚当斯来说,这种要求平等的运动,包括他妻子对政治自由的要求在内,都是违背事物的自然规律的。<sup>①</sup>

最后,革命并没有能够取消男性家长一贯享有的来自他们的妻子、子女、雇工和奴隶对他们的服从。对于自由人来说,自由的民主化是极为显著的,尤其是在向惟有产者才能参政这一传统的挑战方面。“从补鞋匠到参议员,我们都成了政治家,”一位波士顿人在1774年写道。在所有的殖民地中,竞选活动变成了无拘无束的对政府基本职能和功能的辩论,这些辩论涉及到每年一度的选举、普选权、宗教宽容甚至于废除奴隶制等内容;参加辩论的人中不光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有普通的手工业者、小农场主和劳工,而后者则正以一个具有自我意识感的阶层开始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基本上由“下层社会”成员(其中也包括了仆人和学徒)组成的民兵则变成了“政治民主的学校”。民兵队伍的成员要求拥有选举所有指挥官的权利,并坚持认为,不管是否达到了规定的选举年龄或者是否拥有财产,所有的士兵都应该有选举权。由此,民兵们建立了一个将延续许久的传统,即那些被排除在公民社会之外的群体可以以投身军队为由来要求获得完整的公民资格。

---

<sup>①</sup> Charles F. Adams, ed., *Familiar Letters of John Adams and His Wife Abigail Adams During the Revolution* (Boston, 1875), 149-50, 155.

在革命时期,曾有人要求选举要年年举行,并要求扩大选民队伍;这些人所期望的不止是割断财产与选举权之间的联系,而且也希望重新定义“财产”本身。到革命时期结束时,财产的概念已经扩展到了将权利、自由以及有形物质的占有等包括在内的程度。麦迪逊在 1787 年的制宪会议上宣称道:“一个人在他的言论以及言论的自由传播中拥有财产,在他人身的安全与自由中拥有财产。”几年后,他还提到,政府有责任同时保护拥有财产的权利和一个公民在他的权利中的“财产”。也就是说,财产不一定成为享受自由的一种资格,但自由却可以被想像成为是一种财产。<sup>①</sup>

财产也包括了对自身的拥有,这种思想有力地推进了政治国家的民主化。如果所有人都拥有一种包含在他们的权利中的财产的话,从逻辑上讲就没有理由不让所有人参与政治管理。独立前各殖民地对选举权都作了非常复杂的限制和规定,虽然各地的规定不尽一致。相对于英国来说,殖民地对选民财产资格的规定中所包含的排斥性要轻微一些,但这种财产资格的规定在各地无一例外地禁止那些被认为缺乏独立判断能力的人(如雇工、仆人、学徒工和穷人等)参与政治。妇女通常也被排除在选民的范围以外(尽管有的时候拥有财产的女性——通常是寡妇——也曾参与过投票)。许多殖民地还对选民的宗教资格作了这样或那样的规定。争取独立的斗争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那些处于政治国家以外的成千上万的人参与政治。一位马里兰的作者写道:“每个穷人都拥有一个生命、一份个人自由和一种拥有他的收入的权利。”因此,选举权应该是一种普遍的权利,而不应成为一种特权:“与生俱来的自由投票权”是“一个自由人的最崇高的权利”。一群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北卡罗来纳人在 1776 年递交的一封请愿信中也宣称道:“选举权”是“一项基本的、与自由不可分离的

<sup>①</sup> Draper, *Struggle for Power*, 468; Gary B. Nash, "Artisans and Polit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Philadelphia," in *The Origins of Anglo-American Radicalism*, ed. Margaret and James Jacob (London, 1984), 174-77; Ruth Bogin, "Petitioning and the New Moral Economy of Post-Revolutionary America,"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 ser., 45 (July 1989), 391-94; Kammen, *Sovereignty and Liberty*, 78; James A. Henretta, "The Nineteenth-Century Revolution in Civil Liberties: From 'Rights in Property' to 'Property in Rights,'" *This Constitution*, 19 (Fall 1991), 19.

权利”。<sup>①</sup>

保守派的爱国者则竭力声称旧的选民资格限制是合理的。约翰·亚当斯坚持说,财产,惟有财产,才能意味着独立;没有财产的人不会有“他们独立的判断力,他们的言论和选票都将为某个有产者所操纵”。亚当斯担心,取消选民的财产资格将“混淆和消灭所有的差别界限,将把所有人都压制在同一平面上”。而这正是革命时期激进的民主派想要争取的目标。但在争取把选举权从特权变为普遍权利的过程中,民主派却往往不敢向全民普选权的方向迈进,他们甚至连所有自由人的普选权也不敢提。民主性最强的新的州宪法,如宾夕法尼亚州的宪法,取消了对选民的财产资格要求,代之以纳税的要求,这种取代使州内自由男性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人获得了选举权,但却将一小部分人(主要是乞丐和仆人)继续排除在选民队伍之外。尽管潘恩认为参与政治的权利“是一个人作为人所必不可少的”权利,但他也认为,那些自愿去当家庭仆人的因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自主能力,他们的投票权可因此而被暂时终止。潘恩仍然认为,“自由将因为对他人的依附而遭至毁灭。”尽管如此,既然纳税并没有使人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以纳税作为选民的资格规定却代表了一个与殖民地实践截然不同的方向。用一位来自马里兰的作者的来说,在决定政治国家的范围时,这种规定将“个人自由”提高到了一个比财产的拥有更为重要的位置上。<sup>②</sup>

总的来说,革命见证了选举权方面的一次伟大扩展,一些州用纳税取代财产的拥有,另外一些州降低了对选民不动产资格的要求,但更普遍的做法则是赋予士兵以选举权。当然,有关选举权的辩论此后继续进行了若干年。对于白人来说,民主化的历程要到杰克逊时代才得以实现;对于妇女和非白人,这个过程会更长一些。但即便是在革命时期,这个过程对当时流行的自由定义

<sup>①</sup> *Maryland Gazette* (Annapolis), August 15, 1776; Marc Kruman, *Between Authority and Liberty: State Constitution Making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 (Chapel Hill, 1997), 87-96.

<sup>②</sup> Robert J. Taylor, ed., *Papers of John Adams* (10 vols. Cambridge, MA, 1977), IV, 210-11; Foner, *Paine*, 143-44; Kruman, *Between Authority and Liberty*, 91-95.

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如果不是在法律上的话,至少在大众的革命话语中,自由与普选权成为可以交换使用的两个词语。一位居住在马萨诸塞州莱诺克斯的居民在 1778 年写道:“当一个人在选举中不能有自己的声音时,他何以能被称之为[是]自由和独立的人呢?”由此可见,政治自由——一种自治的权利——不仅如同过去那样意味着人民有接受自己选出的代表管理的权利,同时也意味着个人有参与政治的权利。<sup>①</sup>

如同在政治事务中一样,革命也重新划分了经济领域中的自由与不自由的界限。在殖民地时期,奴隶制是多种不自由劳动制度中的一种。革命后 25 年内,随着契约佣工制度和学徒工制度的迅速衰落以及工资支付形式的家庭佣工迅速转化为黑人和白人妇女的专门职业,奴隶制与自由之间的中间地带消失了(至少对男性白人来说是如此)。这些劳动形式的消亡远远早于英国,消亡的原因有多种,包括领取工资的雇佣工人的数量不断增多以及相当数量的契约佣工和学徒工利用革命所带来的机会抛弃他们的主人。但自由的民主化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所谓“部分的自由”是不应该存在的,奴役状态与共和国公民的身份显然也是不相称的。1784 年,一群“有尊严、有教养的”纽约人把刚到岸的一船契约佣工予以释放,理由是这些人的地位“与这个国家非常幸运地建立起来的自由思想……是相冲突的”。

到 1800 年时,契约佣工已经彻底地从美国消失了,而学徒工制度也几近苟延残喘,这一切使得自由与奴隶制之间的对立更加尖锐,也使得为后来被称为“自由劳动”所支撑的北部经济与一个更加依赖奴隶劳动的南部之间的对比更为明显。在这个过程中,“主人”和“仆人”两词的内涵发生了转换。在北方,只要它们与个人自由发生冲突,这些词就不再被使用。工资劳工改口称他们的雇佣者叫“老板”,而不称“主人”,而家庭佣工也被改称为“助手”或“帮工”。在南部,“主人”则是指奴隶主,而“仆人”则变成了奴隶的一种委婉说法。<sup>②</sup>

<sup>①</sup> Robert J. Dinkin, *Voting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 A Study of Elections in the Original Thirteen States, 1776-1789* (Westport, 1982), 27-39; Kulikof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98.

<sup>②</sup> Steinfeld, *Invention of Free Labor*, 102-03, 122-28; Sharon V. Salinger, “To



在意外事件的冲击下,革命时期的美国人不仅探讨了自由的定义,也讨论了维护自由的方式。美国人对自由的社会条件十分关注,尤其担心一个拥有相当数量的依附性公民的共和国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1776年6月颁布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是由种植园主和政治领袖乔治·梅森起草的,这份很有影响的宣言将公民视为“享有同等的自由和独立”,指出了自由、独立和平等这几种特性之间的联系。诺厄·韦伯斯特宣称:“对土地财产实施一种普遍的可以承受的平等分配是国家自由的全部基础。”他还说,“平等是一个共和国的真正的灵魂,”比起出版自由、陪审团制的审判以及其他一些“自由的保障”来说更为重要。即便是像约翰·亚当斯这样的保守派,虽然对当时的种种有关民主的期望充满了怀疑,也承认“同等的自由”要求“社会的每个成员”能够获取土地,“由此大多数的人可以拥有小块土地。”这个目标与其说是争取社会条件的真正平等,不如说是为了推广以家庭为基础的经济独立以及消除诸如广泛贫困之类被视为独立自主的障碍的社会条件。<sup>①</sup>

在独立宣言的开头,杰斐逊将人们熟知的洛克的三要素中的“财产”改为“对幸福的追求”,这一改动将这个国家的命运与一个无限定的、民主的过程联系起来了,通过这个过程,个人发展自己的潜力,实现自己生活中的目标。不受政府阻挠地实现个人的成就将成为美国自由的一个中心思想。如果把机会平等真的当成美国社会的一个目标,那么它所带来的结果可以如同对条件平

---

*Serve Well and Faithfully*”; *Labor and Indentured Servants in Pennsylvania, 1682-1800* (New York, 1987), 142-53; Bernard Elbaum, “Why Apprenticeship Persisted in Britain But Not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49 (June 1989), 346; Bailyn, *Ideological Origins*, 234; *New York Independent Journal*, January 24, 1784; Albert Matthews, “Hired Man and Help,” *Publications of the Colonial Society of Massachusetts*, 5 (March 1898), 225-56.

① Rowland Berthoff, “Independence and Attachment. Virtue and Interest: From Republican Citizen to Free Enterpriser, 1787-1837,” in *Uprooted Americans*, ed. Richard L. Bushman, et al. (Boston, 1979), 105-07; *The Debate on the Constitution* (2 vols. New York, 1993), I, 255-58; James L. Huts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i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ristocracy, and the American Concept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1765-1900,”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8 (October 1993), 1079-84; Charles Francis Adams, ed.,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10 vols. Boston, 1850-56), IX, 376-77.

等的要求一样,对传统体制和等级制带来几乎同等的破坏性效果。许多革命时期的领袖人物认为,在新的共和国里,机会平等可以导致一种大致的条件平等。随着世袭特权和重商主义垄断的瓦解,争取财富的道路对所有有天赋的人敞开,贸易中有了“完美自由”,工人有了寻找自己称心如意的工作的自由,这一切将使所有勤劳的公民获取财产。尤其是在新世界的特殊环境下,大片广袤无涯的土地唾手可得,独立的自耕农和手工匠人数量众多,自由放任式的经济与分布广泛的经济自主看上去并不矛盾。没有政府的偏袒,社会通过自然运作会产生出正义、自由和平等。杰斐逊曾指出,既然国际上对美国谷物的需要在不断增加,普通的美国人受惠于商业自由,从而为一个勤奋的、拥有财产的公民群体创造一个物质基础。一个有限政府可以使自己的公民在取得经济独立的同时,也变得富有美德,化解秩序与自由、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冲突。<sup>①</sup>

自主与自由之间这种相互强化的等同自然也引发了有关自由的社会前提条件的问题。如果经济上的依附会造成了一个人政治上的屈从,共和国的公民获取生产性财产的权利是否应该得到保障?财产的拥有与自由的联结在从前是用来划分政治社会的界限的,这样做将那些无产者排除在政治社会之外;但这种联系现在可以被转化为那些寻求获得土地的人的一种政治权利。譬如,西部边民在与英国人、债权人、地主和印第安人争夺西部土地享有权利的斗争中,就创造了具有独特风格的自由语言。1785年,一群俄亥俄人在给国会的请愿书中,指责地主和土地投机者侵吞和垄断大量土地,他们提出了“赋予我们自由”的口号。这些居民对土地优先享有权利的要求基于这样一种思想:拥有财产,如同一位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议员所说,是“自由必须附带的并为所有人所期望的一种情形”。

其他人则寻求另外的途径,要求政府保障那些不具备经济自主——以及

---

<sup>①</sup> Merrill D.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New Nation: A Biography* (New York, 1970), 289, 304; Foner, *Paine*, 90-97; Appleby, *Liberalism and Republicanism*, 261-73. “对幸福的追求”这个短语在18世纪并不少见。杰斐逊在其博览群书的阅读过程中很可能遇到过这个短语,这个短语“在他的记忆中迟迟不肯褪去”——Pauline Maier, *American Scripture: Making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97), 134.

由此而来的自由——的人享有这种自主。在革命的激进思想中,对平等的要求也导致了对政府的新要求:即政府必须为所有美国人平等地享有民族独立带来的“恩赐和福祉”提供保障。独立后各州政府的民主化使得一大批旨在支持经济自主的法律得以实施,如减缓债务人的负担、实行更为公平合理的税收率以及向那些没有土地的人直接赠予土地等。在自由的名义之下,有人甚至提出了对个人所能积累的财富的数量加以限制的要求。无论这些法律和要求本身是否明智(这些经济上的法律和要求使那些主张奉行谨慎的财政和经济政策的人十分警惕,他们发动了要求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中央政府的运动,这种企图最后通过联邦宪法得以实现),这场辩论至少表明革命已将自由的经济条件问题推到了政治的前沿。<sup>①</sup>

如同他的许多同代人一样,托马斯·杰斐逊也认为,缺乏经济资源就等于缺乏自由。杰斐逊虽然主张建立一个有限政府,但他同时也相信政府可以帮助创造一个保障自由的体制框架。他最引以为荣的成就包括弗吉尼亚的那些废除限嗣继承(即为了使财产保留在家族内而对财产继承人的顺序作出特别规定)和长嗣继承(即家庭中的土地由长子继承)的法律,这样的限定可以防止出现“未来的贵族”,并为“一个真正的共和政府”打下基础。为了实现同样的目的,杰斐逊还提议,赠予“每一个(尚无土地的)成年人”50 英亩土地,这在他看来是政府保障公民自由的另一条途径。<sup>②</sup>

杰斐逊的终生朋友和同事詹姆斯·麦迪逊也认为独立的小自耕农构成了“公共自由的最好基础”。他写道,一个共和政府的立法应该致力于“将极端富有降至为一个平常富有的地位,将极端贫困提高到一个不愁温饱的地位”。但是麦迪逊缺乏杰斐逊那种天生的乐观主义,他认为,经济上的相对平等将是一

---

① Alan Taylor, "Land and Liberty on the Post-Revolutionary Frontier," in *Devising Liberty*, ed., Konig, 81-88; Christopher L. Tomlins, *Law, Labor, and Ideology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New York, 1993), 81-82; J. R. Pole, *The Pursuit of Equality in American History* (rev. ed. Berkeley, 1993), 134-35; Gordon S.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 (Chapel Hill, 1969), 403-05.

② Garrett W. Sheldo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omas Jefferson* (Baltimore, 1991), 72-77; Boyd, ed., *Jefferson Papers*, II, 308; Peterson, *Jefferson*, 106.

种短暂的现象,为此他深为恐惧。在制宪会议上,他警告说,经济发展将不可 22  
避免地产生一个无产者占多数并充满了贫富阶级冲突的社会。当一个民主体制中的多数派对自己的无产地位充满愤怒而要求剥夺富人财富的时候,一个政府何以能够继续依赖这种民意生存下去?对于麦迪逊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对政府的结构做这样一种设计,即防止任何一种单独的经济利益独霸政府的权力。联邦宪法之所以出现那些复杂的制衡机制和分裂主权的设计,部分地是为了保证共和政府在经济不平等出现后能继续生存下去(同时也是保证不平等的财富聚集不会受到政府的干预)。但麦迪逊和杰斐逊又都相信,新生美国的独特环境将大大延缓类似于英国和欧洲的经济不平等的出现。向西部扩张,这对旧世界来说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出路,但对于新大陆却是“自由国家”的支柱。一个魅力无穷而且持续长久的美国梦想——一个由自由的并因无穷的自然资源而变得平等的个人组成的社会——由此而得以产生。<sup>①</sup>

一个充满活力的政府究竟是一种对自由的威胁,还是一种由一个具有美德的公民群体所主导的政治自由的化身?对于潘恩来说,政府是一种必要的邪恶,一个“(人类)丧失了天真的标记”。塞缪尔·亚当斯在1785年的写作中称,既然“我们的政府是以自由为目的的”,政治权威就不能被看成是一种对自由的威胁。<sup>②</sup>但是,革命释放出来的要求平等的巨大呼声仍使各州一些有声望的领导人坐立不安,他们害怕美国独立的实验会因此而前功尽弃,除非他们能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将大众激情阻隔在政府之外。在创立以保障“自由的恩惠”为目的的政府体制时,制宪者们将人们对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新的理解予以体制化,这些新的理解将对后来的美国历史历程具有深刻的影响。

在制宪大会期间,一位来自马萨诸塞的作者曾写道:在争取独立的斗争

<sup>①</sup> Gaillard Hunt, ed., *The Writings of James Madison* (9 vols. 1900-10), VI, 86, 96-99; Max Farrand, ed.,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4 vols. New Haven, 1911-37), II, 203-04; Jennifer Nedelsk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Limits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 (Chicago, 1990), 2-7; Lance Banning,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in *Devising Liberty*, ed., Konig, 41-42.

<sup>②</sup> Foner, *Paine*, 91; Kammen, *Sovereignty and Liberty*, 56-57.

中,“公众的愤怒是站在自由一边的。”然而,在制宪者们看来,此刻自由已经失去了它的吸引力。1775年,约翰·亚当斯曾坚持认为,“一个民主专制在语义上是自相矛盾的。”但像麦迪逊这样的国家主义者在18世纪80年代却认为,全民自治政府虽为政治自由之精髓,但对于财产的保障却是一种威胁,必须加以钳制,以保证自由的生长和繁荣。麦迪逊在《联邦主义者文集》中写道:“自由可能因对自由的滥用而受到危害,也可能因对权力的滥用受到危害。”或者换句话说,私有性的自由可能因公共自由而受到威胁,个人自由可能因政治自由——即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权力——而遭受损害。麦迪逊此时影射的是18世纪80年代出现的蓬蓬勃勃的州一级民主化运动,以及在1786—1787年间“谢斯反叛”对公共秩序的挑战。参加反叛的自耕农中有许多人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老兵,但此时却负债累累,反叛者强行关闭了马萨诸塞州西部的法庭,防止他们的财产落到债权人手中。他们还启用了自由树和自由杆这些当年争取独立的斗争曾使用的标志,作为自己事业的象征,但这样的做法并没有赢得法律和秩序的监护者们对他们的同情和支持。<sup>①</sup>

制宪者们最终在共和政府和社会稳定之间作出了妥协,方法是将政治权力分散开来,禁止州侵害财产权,对相互竞争的各社会群体的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野心进行制衡。麦迪逊并没有放弃“人民的美德”是自由的最根本的基础这一思想。但在一个自私自利的野心大有淹没公众美德的世界上,自由的保障只能依赖于政府机器,而不是人民的品格和素质——对当时的政治精英来说,这是(美国自由)从共和主义前提滑向自由主义前提过程中的重要一步。尽管如此,共和思想还是在革命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存下来,这种思想认为,政治决定和经济关系应该反映的是公共福利的内容,而不是私利的获取。

麦迪逊、汉密尔顿以及其他的宪法起草者们是一群国家创建者。汉密尔顿

---

<sup>①</sup> Herbert J. Storing, ed., *The Complete Anti-Federalist* (7 vols. Chicago, 1981), IV, 144; Gordon S. Wood, “Freedom and the Constitution,” in *Freedom in America: A 200-Year Perspective*, ed. Norman A. Graebner (University Park, 1977), 47; Jacob E. Cooke, ed., *The Federalist* (Middletown, CT, 1961), 428; David P. Szatmary, *Shays’ Rebellion: The Making of an Agrarian Insurrection* (Amherst, 1980), 60-69.

中,“公众的愤怒是站在自由一边的。”然而,在制宪者们看来,此刻自由已经失去了它的吸引力。1775年,约翰·亚当斯曾坚持认为,“一个民主专制在语义上是自相矛盾的。”但像麦迪逊这样的国家主义者在18世纪80年代却认为,全民自治政府虽为政治自由之精髓,但对于财产的保障却是一种威胁,必须加以钳制,以保证自由的生长和繁荣。麦迪逊在《联邦主义者文集》中写道:“自由可能因对自由的滥用而受到危害,也可能因对权力的滥用受到危害。”或者换句话说,私有性的自由可能因公共自由而受到威胁,个人自由可能因政治自由——即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权力——而遭受损害。麦迪逊此时影射的是18世纪80年代出现的蓬蓬勃勃的州一级民主化运动,以及在1786—1787年间“谢斯反叛”对公共秩序的挑战。参加反叛的自耕农中有许多人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老兵,但此时却负债累累,反叛者强行关闭了马萨诸塞州西部的法庭,防止他们的财产落到债权人手中。他们还启用了自由树和自由杆这些当年争取独立的斗争曾使用的标志,作为自己事业的象征,但这样的做法并没有赢得法律和秩序的监护者们对他们的同情和支持。<sup>①</sup>

制宪者们最终在共和政府和社会稳定之间作出了妥协,方法是将政治权力分散开来,禁止州侵害财产权,对相互竞争的各社会群体的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野心进行制衡。麦迪逊并没有放弃“人民的美德”是自由的最根本的基础这一思想。但在一个自私自利的野心大有淹没公众美德的世界上,自由的保障只能依赖于政府机器,而不是人民的品格和素质——对当时的政治精英来说,这是(美国自由)从共和主义前提滑向自由主义前提过程中的重要一步。尽管如此,共和思想还是在革命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存下来,这种思想认为,政治决定和经济关系应该反映的是公共福利的内容,而不是私利的获取。

麦迪逊、汉密尔顿以及其他的宪法起草者们是一群国家创建者。汉密尔顿

---

<sup>①</sup> Herbert J. Storing, ed., *The Complete Anti-Federalist* (7 vols. Chicago, 1981), IV, 144; Gordon S. Wood, “Freedom and the Constitution,” in *Freedom in America: A 200-Year Perspective*, ed. Norman A. Graebner (University Park, 1977), 47; Jacob E. Cooke, ed., *The Federalist* (Middletown, CT, 1961), 428; David P. Szatmary, *Shays’ Rebellion: The Making of an Agrarian Insurrection* (Amherst, 1980), 60-69.

可能是“活力”政府的最积极鼓吹者。他希望这样的政府能将新生的美国变成世界事务中一个强大的商业和外交力量。他坚持说,权力与自由是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因为自由要求“一个适度的权威来有力地制定和执行法律”。尽管麦迪逊对政府的想像与汉密尔顿不尽一致,他也竭力寻求增强国家权威。麦迪逊认为,对自由的威胁来自于州一级那种不受节制的多数派权力。尽管制宪大会否定了麦迪逊提出的国会有权否定州法的提议,联邦宪法还是创立了一个比起以前由邦联条款建立的那个羸弱无力的权威要有力得多的中央政府。<sup>①</sup>

因此,制宪者们在将自由看成是政府权威的基础的同时,也把它看成是一种必须加以钳制的、对正当政府管理行为的威胁。在这个意义上,宪法代表了一种从与争取独立的斗争相伴的强大民主潮流中的后退。“那种流荡在所有阶级中的热情曾鼓舞我们在 1774 和 1775 年去选择自由,现在这种同样的热情又促使我们来拥护政府,”宾夕法尼亚州独立战争时期的领导人本杰明·拉什写道。“所有阶级”是否都真的同意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因为批准宪法的过程导致了一场关于如何最好地保护政治自由的全国性大辩论。反联邦主义者——指那些反对批准宪法的人——坚持认为,在自由与权威之间,联邦宪法的重心太偏向于后者。他们相信,自由掌握在那些追求共同福利的较为小型的社会中比掌握在一个遥远的、保护私有利益的联邦政府手中更为安全可靠。帕特里克·亨利抱怨说,宪法所期望建立的“集权性政府”有可能产生一个以自由为代价的“庞大的帝国”。“什么是自由?”南卡罗来纳的詹姆斯·林肯肯写道,“(自由是)管理自己的权力。如果你们接受这部宪法,你还有这种权力吗?绝对没有。”<sup>②</sup>

当然,宪法最后得到了批准,交换条件的一部分是在其中加入权利法案。

---

① Jonathan Elliott, *Debates in the Several State Conventions on the Adoption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5 vols. Washington, DC, 1830-36), III, 536-37; Harold C. Syrett, ed., *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 (27 vols. New York, 1961-87), II, 649-51; Jack N. Rakove, *Original Meanings: Politics and Year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stitution* (New York, 1996), 289-97.

② L. H. Butterfield, ed., *Letters of Benjamin Rush* (2 vols. Philadelphia, 1951), I, 418-19; Elliott, *Debates*, III, 53, 607.

反联邦主义者指责说,原宪法中没有为“那些人所拥有的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提供免受政府侵犯的保障,而没有这些权利,就“没有自由可言”。麦迪逊则坚信,宪法的制衡机制已经为自由提供了保护,再加权利法案则显得“多余或毫无意义”。他认为,限制联邦政府权力的修正案将无助于制止不受限制的各州的多数意志对自由造成的危险,而不对权利做具体的列举则会导致立法机构在未来的运作中对此恣意为地加以滥用。对于权力的滥用来说,“羊皮纸障碍”将在最需要发挥作用的时候变得最没有效力——这是人们在观察了相当一批大众歇斯底里症肆虐的时代之后得出的结论,这样的时代包括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恐红运动和 20 世纪 50 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时代;在这些时候,所有的政府部门往往联合起来,心安理得地对言论自由进行任意践踏。<sup>①</sup>

今天,当美国人要给自由下定义时,他们会本能地引用第一条宪法修正案,尤其是其中对言论、出版和宗教自由的保障。但权利法案在宪法批准时却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而且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一直被人遗忘。直到 20 世纪,它才被奉为一种最为精美地体现美国自由的形式。尽管如此,权利法案非常微妙地影响了自由的语言。因为权利法案只适用于联邦政府,而对州政府并没有约束,所以,它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集中化的国家权力对自由的威胁最大。同时,权利法案也开始了漫长的将自由当作权利来讨论的过程——这种把自由看成是一套具体的法定权力和特权的做法正是从自由的旧定义那里衍生而来的,不同的是,此刻这些权利将适用于组成政治社会的“所有的人民”,而不是某一特定的群体或某一特定的地区。在 20 世纪中被称为“权利话语”的运动其实表现了自由与民主之间在美国生活中始终存在的一种紧张关系。因为权利既是民主的,同时又是一种对民主的否定——权利的民主性体现在任何人都可以要求得到权利;其不民主性体现在:为了保护权利,必须抵

<sup>①</sup> *The Address and Reasons of Dissent of the Minority Convention of the State of Pennsylvania to Their Constituents* (Philadelphia, 1787), 52; Rakove, *Original Meanings*, 316, 332-35; Jack N. Rakove, "Parchment Barriers and the Politics of Rights," in *A Culture of Rights: The Bill of Right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Law 1791 and 1991*, ed. Michael J. Lacey and Knud Haakonssen (New York, 1991), 136-38.



制权力——包括人民自己的权力——对权利的侵犯。譬如，人们捍卫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因为它们既是反对政府干涉个人意见的保护机制，同时又是民主政府运行的基本要素，因为没有思想和信息的自由流动，选民和立法者们无法做出明智的决定。<sup>①</sup>

尽管如此，言论自由在第一条宪法修正案中被当成了一种属于个人的个人权利，这种思想实际上标志了一个颇为激进的新方向。“言论自由”一语起源于英国，目的是为了保护议员在议会中畅所欲言；最初指的是议员拥有的一种不因其其在议会辩论时的发言而受到迫害的豁免权，而不是一种公民批判政府26 的权利。在整个殖民地时期，一些个人和报纸主编都曾因对立法者和他们的行动发表过“煽动性”评论而遭到惩处。殖民地时期的报纸对政治问题总是不乏争论。1734年，当约翰·皮特·曾格对王室委任纽约总督的批评被宣布无罪时，一道经久的防线由此而建立，作为一种先例来反对以煽动诬陷罪为名的指控。然而，即便是笃信“自由取决于出版自由”的杰斐逊，也坚持那些以“虚伪不实的事实”误导公众的人必须受到惩罚。尽管如此，如果这些权利的法律实施还有待于落实的话，权利法案已经确立了言论和出版自由在大众所理解的美国自由定义中的基石地位。<sup>②</sup>

更为令人注目的是宪法对宗教自由的承认。在不列颠，长期以来，宗教异见分子曾使用自由的语言，试图要求取消测试和组合法，这些法律剥夺了非英国国教徒的各种权利（但他们中很少有人——包括天主教徒在内——呼吁宗教自由）。在殖民地中，多种不同的宗教派别——包括教友会、圣公会、门诺宗、莫拉维亚教会、路德宗、长老会、浸礼会、罗马天主教会和犹太教——同时

① Kenneth R. Bowling, "'A Tub to the Whale': The Founding Fathers and Adoption of the Federal Bill of Rights,"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8 (Fall 1988), 223-26; Celeste M. Condit and John L. Lucaites, *Crafting Equality: America's Anglo-African Word* (Chicago, 1993), 48; Martha Minow, "Interpreting Rights: An Essay for Robert Cover," *Yale Law Journal*, 96 (July 1987), 1860-1915. 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New York, 1986), 249-53.

② Leonard W. Levy, *Emergence of a Free Press* (New York, 1985), 3-19, 37, 129; Bernard Bailyn, "Jefferson and the Ambiguities of Freedom,"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37 (December 1993), 509.

并存,殖民地的宗教自由程度显然高于宗主国。但是,虽然像罗得岛和宾夕法尼亚这样的殖民地早就开始实施宗教宽容的政策,但革命前的宗教自由之所以得以兴起不是因为实践提倡宗教宽容的理论而是由于宗教多元的现实所至。在英属北美殖民地上,完全的政教分离是不存在的。1682年,宾夕法尼亚向所有只信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的人提供“基督教的自由”,即便如此,担任公职的人还是必须宣誓,重申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在革命前,大多数的殖民地都动用公共基金对宗教机构予以资助,而且在选举权和担任公职方面对天主教徒、犹太人甚至持异见的新教教徒实行歧视。在独立前夕,在马萨诸塞的浸礼会教徒如果拒绝缴纳用于资助当地公理会牧师的税收时,仍将遭到监禁(“当我们的国家正在如火如荼地呼吁自由的时候,”这些受害者抱怨说:“他们却剥夺了他们邻居的自由。”)①

如同在其他领域里一样,革命促进和加速了一个改变宗教自由涵义的运动。为推动政教分离,杰斐逊这样的自然神论者和福音教派的成员携手联合起来了;杰斐逊希望建立起一道“分离的城墙”,从而将政治和思想的自由发挥从神学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福音教派则希望保护宗教不受政府的腐蚀和包围,并将宽容视为帮助男人和女人过上真正的基督生活的一种出路。在新生的美国中,传统深固的教会瓦解了——即它们的公共财源和法律特权被剥夺了。在州一级,宗教和公共权威之间仍然继续相互支持,并通过种种规定,27禁止非基督教徒担任公职,继续惩罚那些犯有渎神罪和违背礼拜日规定的行为。然而,联邦宪法本身并没有包含任何涉及上帝的言词,是一部百分之百的世俗文件。宪法禁止对联邦官员附加宗教资格或条件,并通过第一条修正案

① John P. Roche, "American Liberty: An Examination of the 'Tradition' of Freedom," in *Aspects of Liberty*, ed. Milton R. Konvitz and Clinton Rossiter (Ithaca, 1958), 131; Leonard W. Levy, *The Establishment Clause: Religion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Chapel Hill, 1994), 1-17; Robert T. Handy, "The Contribution of Pennsylvania to the Rise of Religious Liberty in America," in *Quest for Faith, Quest for Freedom: Aspects of Pennsylvania's Religious Experience*, ed. Otto Reimherr (Cranbury, 1987), 21-25; William G. McLoughlin, ed., *The Diary of Isaac Backus* (3 vols. Providence, 1977), II, 774.

禁止联邦政府对宗教问题立法,这些做法都极大地背离了英国和殖民地时期的宗教实践。在宪法之下,如同一个宪法的批评者所指出的,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任何一个天主教徒、穆罕默德信徒、自然神论者甚至一个无神论者”都可以成为美国总统。<sup>①</sup>

与言论和出版自由一样,宗教自由反映出这样一种信念,即麦迪逊所称的,良心是所有权利中最为“神圣”的,良心自由决不应该受到任何政治权威的影响或惩罚。比其他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宗教自由成为革命时期那一代人在界定“权利”时所遵循的范式,在这种范式下,宗教自由的权利被看成是不受政府干涉的隐私权。宗教自由为美国是自由的堡垒的思想提供了新的理由。在他成功地抵制了弗吉尼亚一项为资助基督教教会而征税的法案之后,麦迪逊曾坚持说,政教彻底分离的理由是为了强调独立的意义,即“为那些遭到迫害和压迫的所有民族和宗教提供避难所”。宗教自由也为麦迪逊式的保护自由体制提供了一个模式。麦迪逊写道: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公民权利的安全必须与宗教权利的安全一样。这种安全一方面由利益的多元化构成,另一方面则是由教派的多元化构成。”一个宗教上的自由市场将防止任何一个群体利用政治权力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在一个基督教占绝对主导地位(尽管并不一定是人人都去教堂)的国家里,政教分离在公共权威和被定义为“私有”的领域之间划了一条分明的分界线,同时也强化了这样的思想,即权利存在的目的是钳制政府的权力。<sup>②</sup>

因此,革命不但使美国基督教而且也使宗教自由的观念得以民主化了。

---

① William L. Miller, *The First Liberty: Religion and the American Republic* (New York, 1986), 56-63; Levy, *Establishment Clause*, 27-29, 56; Bill J. Leonard, "Varieties of Freedom in the Baptist Experience," *Baptist History and Heritage*, 5 (January 1990), 3-5; Stephen Botein, "Religious Dimensions of the Early American State" in *Beyond Confederation*, ed. Beeman, 317-20; Isaac Kramnick and R. Laurence Moore, *The Godless Constitution: The Case Against Religious Correctness* (New York, 1996), 32.

② Robert A. Rutland, ed., *The Papers of James Madison* (17 vols. Chicago, 1962-91), XIV, 766-68; Hunt, ed., *Writings of Madison*, XI, 188; Lance Banning, *The Sacred Fire of Liberty: James Madiso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Ithaca, 1995), 128-31; Kramnick and Moore, *Godless Constitution*, 17.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政教分离为各种宗教派别的兴盛创造了社会和政治空间,但作为这种分离的一部分的、强调个人权利的文化却对教会权威形成了一种威胁。莫拉维亚弟兄会的经历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莫拉维亚弟兄会是在革命前夕从德国移居到北卡罗来纳的,据莫拉维亚教会的长者说,该教会的年轻人,如同革命年代的其他许多美国人一样,坚持要求得到“他们应有的自由和人权”。对教会长者来说,所谓“美国自由”不过是“一种陷入 28 诱惑的机会”,一种对自我牺牲和社区忠诚的精神的威胁,而这两者是基督教自由的基础。然而,尽管有这些恐惧,教会的解体并没有终止宗教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恰恰相反,由于宗教自由,革命后的美国目睹了宗教流派不可思议的繁荣和生长。今天,尽管有关宗教和政治之间适当关系的辩论还在继续进行,但是仍有 1300 多种宗教在美国得以生存和信奉。<sup>①</sup>

“向美国自由的巨大洪流投降吧!”一位南卡罗来纳立法机构的成员在 1777 年向他的同事们呼吁说。<sup>②</sup> 自由的洪流不仅将英国的权威冲刷得一干二净,而且也扫荡了世袭制的原则、得到确认的教会、长期奉行的尊卑贵贱习俗以及对政治社会的陈旧限制。但是在一个关键的领域,自由的浪潮遇到了它无法抗拒的障碍。作为自由的对立面——奴隶制——在革命时期开始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牢固地深植于美国生活中。

---

① Nathan O. Hatch, “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Market Revolution,” in *Devil's Liberty*, ed. Konig, 253-56; Elizabeth Sommer, “A Different Kind of Freedom? Order and Discipline Among the Moravian Brethren in Germany and Salem, North Carolina 1771-1801,” *Church History*, 63 (June 1994), 221-34; Marvin E. Frankel, *Faith and Freedom: Religious Liberty in America* (New York, 1994), 84.

② Heimert, *Religion and the American Mind*, 391.

## 第二章 自由者所称的自由

### 奴隶制与共和国

除“自由”之外,18世纪法律和政治文献中最常用的另一个词是自由的对立面:“奴役”。奴隶制与人类文明一样的古老久远,它的喻义可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几乎所有的压迫形式在不同的时期中都被描述为一种奴役形式。在18世纪,自由与奴役经常并列成为“社会中幸福与悲惨的两个极端”。奴隶的处境普遍地引起人们的恐怖与反感。波士顿的商人内森·阿普尔顿说:“当一个英国人描述他可能遭遇到的最大祸害时,没有什么能比一个非洲奴隶的地位更令他感到恐惧的了。”但在当时的政治话语中,奴役状态主要用来表示一种政治类别,是对一个人的个人和政治自由遭到专断政府的剥夺的简称。所有在公共事务中没有发言权的人,一份出自1769年的要求扩大不列颠选举权的请愿书称,可以说都是“处于被人奴役的状态”。在独立以前,奴隶制在反抗英国的语言中占有重要一席。许多北美殖民者最终将他们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一种受后者奴役的形式。<sup>①</sup>

18世纪60年代的殖民地作者偶尔也会将现实的奴隶制和喻义上的奴隶制直接地联系起来。在这方面没有人比詹姆斯·奥底斯做得更直截了当。在传播和普及英国议会无权对殖民地商业进行课税和管理的思想方面,奥底斯的传单起了很大的作用。奥底斯坚持认为,自由必须是普遍的:“如果不是人

---

<sup>①</sup> David B. Davis, *Slavery and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1984), 19; Roger Bruns, ed., *Am I Not a Man and a Brother. The Antislavery Crusade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 (New York, 1977), 136, 341; John P. Reid, *The Concept of Liberty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icago, 1988), 38-45; F. Nwabueze Okoye, "Chattel Slavery as the Nightmar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ies,"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 ser., 37 (January 1980), 3-28.

- 31 人都生而自由的话,那人何以为人?”在奥底斯看来,黑人绝非一群只是生活在寓言中的人物,他们的受人奴役的地位向自由的美洲人展现了一种令人生畏的命运;黑人也是有血有肉的英国臣民,他们也“应该享有所有英国臣民的民权”。<sup>①</sup>

但奥底斯并不代表大多数人的观点。当大多数爱国者的领袖人物提及奴隶制的时候,他们指的是自治政府的权利遭到否定或者不得不遵从他人的意志,而不是指贬低到成为一种财产的地位。“没有代表权而遭到课税的人,”宾夕法尼亚的约翰·迪金森说,“就是奴隶。”托马斯·潘恩曾将世袭制认定为是“一种奴隶制”。他强调说,“代议制政府是自由。”直到18世纪60年代,殖民者还一直把不列颠作为自由的土地并引以为豪。但作为他们争取独立斗争的一部分,他们对宗主国的这种看法开始改变。在独立前夕,作为“一个奴隶王国”的英国和一个“自由人国家”的美洲两者的鲜明对比成为反抗英国的一种标准语言。“现在的问题是要自由还是要奴隶制,”费城的激进分子詹姆斯·坎农在1776年4月宣称道。即便是在那些奴隶人口占多数的地区,人们也大言不惭地尽力使用类似的语言。南卡罗来纳的一位作者在1774年写道:南卡罗来纳是一个“自由的圣地”,“允许奴隶制在这里建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sup>②</sup>

尽管他们从未公开明确地提及过,但对于发动美国革命的人来说,殖民地中成千上万真正的奴隶们近在咫尺的事实却是与自由的意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埃德蒙·伯克曾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演讲反对英国对殖民地施行高压政策,他提到,因为北美南部的殖民地领袖十分熟悉真实存在的奴隶制,所以他

<sup>①</sup> Bernard Bailyn, ed., *Pamphle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1965-), I, 420-22, 446-47.

<sup>②</sup> John Dickinson, *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Philadelphia, 1768), 3; Philip S. Foner, ed.,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2 vols. New York, 1945), I, 390; Henry S. Commager and Richard B. Morris, eds., *The Spirit of Seventy-Six* (2 vols. Indianapolis, 1958), 1, 297-98; Gordon S.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Chapel Hill, 1969), 32; *Pennsylvania Packet* (Philadelphia), April 8, 1776; Peter Force, ed., *American Archives*, 4 ser. (6 vols. Washington, DC, 1837), 1, 512.

们对喻义上的奴隶制才会如此神经过敏和百般警惕。当自由在一个地方只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普遍权利的时候,伯克说道,“那些享有自由的人是最为自己的自由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人。”南卡罗来纳的戴维·拉姆什在他的《美国革命史》(1789年)一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还将美洲的历史是一个自由不断进步的历史这种思想广为传播。拉姆什写道:对于奴隶主来说,没有什么比被“贬低”到与自己的奴隶同等的地位的恐惧更能有效地激发他们起来反抗英国的统治,因此可以说,在南部殖民地,是奴隶制“在自由的居民中培育了一种自由的精神”。<sup>①</sup>

在崇尚自由的同时却又从奴隶制中谋取利润,并非只有美国人才这样做。在古代社会,“自由的内容之一便是对他人进行奴役的自由。”作为一种精神境界的基督教自由并没有禁止对奴隶的拥有,这种凡世习俗在圣经中也是得到认可的。在18世纪的英国、法国和荷兰,自由的思想都得以生根开花,但这些国家同时也都深深地卷入了大西洋奴隶贸易之中;的确,不列颠人是如此地珍32  
爱海洋自由,以至于在其中包括了他们的商人将奴隶贩运到他们想去的任何港口的权利。虽然他们自己在这方面并不比美国人好到哪里去,但英国的观察家们却热衷于一再指出殖民者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明显的虚伪。塞缪尔·约翰逊就曾问道:“我们怎么总是从那些驱赶黑奴的人那里听到对自由的、最大声的疾呼?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独立宣言使马萨诸塞的前王家总督托马斯·哈钦逊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宣言列举的)这些权利绝对不可被剥夺”,那么美国人如何解释自己“剥夺非洲人的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站得住脚的呢?即便那些支持美国独立的英国朋友,如理查德·普莱斯,也担心奴隶制的存在会使革命的承诺大打折扣。1785年,他在给杰斐逊的信中写道:如果“一个为了将自己从奴役之下解救出来曾经如此努力地奋战过的人民竟然如此心安理得地要对他人实行奴役”,那么,美国的独立与从前那种“贵族暴政和践踏人类”的亘古历史相比,实在谈不上是一种新的开端,“在欧洲的具

<sup>①</sup> *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16 vols. London, 1803), III, 54; Charles S. Hyneman and Donald S. Lutz, eds., *American Political Writing During the Founding Era 1760-1805* (2 vols. Indianapolis, 1983), II, 723.

有自由和美德的朋友们”会因此而“感到羞辱的”。<sup>①</sup>

的确,自由与奴隶制之间的矛盾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我们今天很难相信当时阻挠废除奴隶制的势力竟会如此强大。至革命发生时,奴隶制在美洲已可谓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体制了;奴隶制在所有州里都存在,在马里兰以南的社会中,奴隶制是那里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基础。正是奴隶制,使那些生产主要农产品的殖民地成为英属北美辖区内最富有的地区。当时有一位法国人已经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即对于南部的种植园主来说,“控制几个黑奴”,无论是在自我定位还是在获取社会地位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正如众所周知的,当托马斯·杰斐逊写下那些生命力永恒的文字、强调人拥有不可被剥夺的自由权的时候,他本人正拥有 100 多名黑奴;在他的生活方式中,他所珍爱的一切,从慷慨大方的施舍和享受到追求和欣赏艺术与科学的闲情逸致,最终无一不是建立在奴隶的劳动之上的。<sup>②</sup>

奴役黑人的现实并不一定与美国白人对自由的理解相矛盾。事实上,有人会说,正是因为有了奴隶制,共和自由才可能实现,因为奴隶制将一大批依赖他人而活着的穷人排除在外,把公共事务的领域留给了那些因拥有财产而享有独立的人。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拥有奴隶,是获取经济独立自主的途径之一,而后者通常被认为是享有真正的自由必不可少的条件(弗吉尼亚州在 1780 年颁布的一条法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该法律规定,所有参加过独立战争的退伍军人可以得到 300 亩土地和一个奴隶的奖励)。共和理想中的社会由独立的、积极追求公共福利的人所组成,这种共和理想与对那些公民圈子以外的人实施的奴役并不矛盾。亚当·斯密曾指出:在一个共和政体内,要废除

---

① Moses L. Finley,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New York, 1983), 12; Bill J. Leonard, "Varieties of Freedom in the Baptist Experience," *Baptist History and Heritage*, 25 (January 1990), 10; Dr. Johnson in David B. Davis,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70-1823* (New York, 1975), 275; Thomas Hutchinson, *Structures Upon the Declaration of the Congress at Philadelphia* (London, 1776), 9-10; Julian Boyd,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Princeton, 1950-), VIII, 259.

② Marquis de Chastellux, *Travel in North America, in the Years 1780, 1781, and 1782* (2 vols. London, 1787), II, 56-57; John C. Miller, *The Wolf by the Ears: Thomas Jefferson and Slavery* (New York, 1977).



奴隶制将十分困难,因为“制定国家法律的那些人本身就拥有奴隶”——这样, 33 “自由人的自由”实际上导致了“对奴隶的最大压迫”的产生。如此而来,那种基本上视自由为私有性权利的自由主义式定义,以及那种把政治国家看作是一群人为寻求对天赋人权的保护而组织起来的观点,也就可以十分方便地用来捍卫奴隶制了。在自由主义式自由的定义中,没有什么比政治自治权和财产不受政府侵犯这两条原则更为重要的了。这些原则实际上宣示:未经同意就剥夺一个人的财产(包括奴隶财产),将是对他的自由的一种侵害。拥有财产的权利,来自弗吉尼亚的阿瑟·李声称,是“所有其他权利的监护者,剥夺人民的财产权,实际上等于剥夺他们的自由”。如果政治自由的核心原则是政府必须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而建立,那么,要求奴隶主放弃他们拥有的奴隶财产,将如同把奴隶主本身降低到受奴役的地位。<sup>①</sup>

尽管如此,因为美国革命赋予了自由一个十分绝对的价值观,对殖民地时代的各种狭义上的自由形式发动了如此猛烈的冲击,并将自由定义为一种普遍权利而不再是一些只为某种特别的人民或只在某个特定的地域才能享有的具体权利,革命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北美大陆的奴隶制地位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任大法官约翰·杰伊后来指出,独立前,尽管大西洋世界的启蒙思想(如孟德斯鸠、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人的写作所示)都认为奴隶制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在经济上是低效无能的,是一种野蛮时代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但“几乎没有人……怀疑奴隶制的正当性和正确性”。在革命期间,奴隶制第一次在美洲成为了公众辩论的焦点。首先在 1773 年呼吁“美国自由的提倡者”要“支持普遍自由的事业”的不是英国的批评家们,而是来自宾夕法尼亚的

---

① Edmund S. Morgan, *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 (New York, 1975), 380-85; Adam Smith,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ed. R. L. Meek, et al. (Oxford, 1976), 181; John P. Diggins, *The Lost Soul of American Politics: Virtue, Self-Interest, and the foundations of Liberalism* (New York, 1984), 12, 141-42; James W. Ely, Jr., “Property Rights and Liberty: Allies or Enemies?”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22 (Fall 1992), 703; Sylvia R. Frey, “Liberty, Equality, and Slavery: The Paradox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ts Character and Limits*, ed. Jack P. Greene (New York, 1987), 241-42.

爱国者本杰明·拉什。拉什警告说,奴隶制是种种“民族罪恶”中的一种,有一天终将导致对“全民族的惩罚”。次年,马萨诸塞的牧师约翰·艾伦也悲叹道,因为他们“践踏了非洲人神圣的自然权利和特权”,美国人正在“嘲弄”他们公开宣称的对自由的热爱。这些批评并非只是来自北部,比起马里兰、弗吉尼亚、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等种植园经济为主的区域来说,北部的奴隶制远不如在上述地区那样深入和有影响。杰斐逊至少在私下里曾严厉谴责过奴隶制,说当奴隶制实施的时候,“它在一个时辰中积满的悲痛远远大于迫使殖民者起来反抗的经过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悲痛。”<sup>①</sup>

革命也点燃了一种广为传播的希望,即奴隶制可以从美国生活中得以废除。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奴隶们自己竟然相信,当革命者把自由定义为一种普遍权利时,革命者也就创造了一种可以用来反对人身奴隶制的语言武器。

- 34 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自由的语言在奴隶社会中传播回荡。他们生活在自由之中,却被剥夺了自由的实际内容,奴隶们套用爱国者的意识形态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奴隶们争取解放的第一个实际行动是提出“自由的诉求”——即18世纪70年代早期由被奴役的非洲人向新英格兰地区法院和立法机构提出的要求获得解放的理由陈述。独立战争一开始,英国人曾许诺将给那些为王室而战的奴隶予以自由的回报。有将近10万左右的奴隶,其中包括南卡罗来纳奴隶人口中的四分之一,弃主人而去(尽管逃奴中有些人后来又在西印度群岛被重新投入奴隶制之中)。乔治·华盛顿的奴隶中也有17人也逃奔到英国人一边去了。还有数千黑奴为了摆脱奴役状态而加入了殖民地的军队。

黑人同时认识到了殖民者的自由意识形态中的虚伪性一面和其所包含的潜在的机会。非裔美国人在要求将自由看成是一种普遍权利方面,表现得最为坚决。他们要求独立运动的领袖们兑现他们公开宣示的信念,把自由的概

---

<sup>①</sup> Joyce Appleby, *Liberalism and Republicanism in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MA, 1992), 158; Henry R. Johnston, ed., *The Correspondence and Public Papers of John Jay* (4 vols. New York, 1890-93), III, 342; Robin Blackburn, *The Overthrow of Colonial Slavery 1776-1848* (London, 1988), 51-52; 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1967), 237; Bruns, *Am I Not a Man*, 325; Boyd, ed., *Jefferson Papers*, X, 63.

念延伸至最初并没有被包括在内的领域中去。早在1766年,南卡罗来纳查尔斯顿的白人提出“给我自由,或给我印花税”的口号,来反对英国的。不料这种抗议也导致了一群黑人在市区内的游行,同时他们还喊出了“自由”的口号。这一事件使查尔斯顿的白人社区深为震惊。此事发生九年之后,南卡罗来纳的议会还不得不就因反英斗争而在奴隶中产生的对“自由的高度期望”问题进行调查。<sup>①</sup>

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当时在马萨诸塞民兵队伍中服役、后来成为著名牧师的莱缪尔·海因斯就敦促美国人“扩展”自由的概念。他说,如果自由真的是全人类的“天生原则”,那么“即便是一个非洲人,他也与英国人享有同样的自由权利”。在整个革命时期,大量由黑人写的请愿书、小册子和布道词中都表达出一种“惊异”:即白人爱国者竟然意识不到“美洲所遵循的每一项行动原则”都要求解放黑奴。黑人企图修改当时的政治语言,坚持要求这个新生的国家认识到,奴隶制不是一种抽象的境地或一种隐喻,而是一个具体而残酷的现实。1773年,一群新英格兰的奴隶们在请愿书中宣称:“我们没有财产!我们没有妻室!我们没有孩子!我们没有城市!我们没有国家!”对黑人来说,奴隶制意味着剥夺他们享有自由的一切基本条件,而不仅仅意味着丧失个人自主的能力或缺乏政治自决的权利。<sup>②</sup>

革命时期的大部分奴隶距他们的前辈从非洲被劫持而来不过只有一两代人的时间距离。他们并不需要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来启发他们认识到自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的经历早就说明了这一点。与埃德蒙·伯克和戴维·拉姆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黑人坚持认为:奴隶,而不是 35

---

① Thomas J. Davis, "Emancipation Rhetoric, Natural Rights, and Revolutionary New England: A Note on Four Black Petitions in Massachusetts, 1773-1777," *New England Quarterly*, 62 (June 1989), 255; Sylvia R. Frey, *Water from the Rock: Black Resistance in a Revolutionary Age* (Princeton, 1991), 49-57, 174-94; John C. Fitzpatrick, ed., *The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1745-1799* (39 vols. Washington, DC, 1931-44), XXII, 14n.

② Ruth Bogin, "'Liberty Further Extended': A 1776 Antislavery Manuscript by Lemuel Haynes,"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 ser., 40 (January 1983), 85-105; Davis, "Emancipation Rhetoric," 250-52, 261-62.

主人,才是真正地希求自由的人。黑人诗人菲力斯·惠特利在1783年写到:“我对自由的热爱”来自于“被强行从非洲海岸抢夺过来”的“残酷命运”之中。尽管传统的非洲社会对不愿当奴隶的愿望并不陌生,但关于自由的现代思想却是诞生在西方。当奴隶被从家园中强行掠走时,当个人生活在共同的血缘关系组成的宽广网络之中,当社会身份取决于权势网络的左右时,个人自由不过是一句自相矛盾的说辞而已。可是,当他们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启用了革命中的自由意识形态并将自由界定为一种普遍权利的时候,黑人实际上是在力图重新界定美国自由事实上应该表现的意义,这些行动表明黑人本身已经由此变成真正的美国人了。<sup>①</sup>

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自由的蔓延”看上去对奴隶制的继续存在形成了一定的威胁。在18世纪80年代,南部(尤其是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两地)的一大批奴隶主们自动解放了他们的奴隶。但在弗吉尼亚以南的地区,废除奴隶制的过程并没有真正进行。在北部,从新罕布什尔到宾夕法尼亚之间的各州,都采取了一定的步骤来解放奴隶,这是在文字记载的历史上首次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来铲除奴隶制。但即便是在奴隶制对经济的作用微乎其微的北部,废奴的进程也十分缓慢,充分反映出财产权的神圣性对解放黑奴的抵制力是如何强大。一般来说,废奴法规定,奴隶母亲在该法生效后生下的孩子最终将获得自由,但只能是在该奴隶子女为其母亲的主人工作到成年之后才能享有自由,这样的安排是为了对奴隶主将在未来丧失的财产权提供一种补偿。<sup>②</sup>

在1787年的费城制宪大会上,麦迪逊记录道:在许多的辩论中,“奴隶制及它代表的涵义成为利益划分的界限。”为制定宪法聚集在费城的55名代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奴隶主,但也有不少坚定的废奴主义者。麦迪逊本人,如同杰斐逊一样,也是一个憎恨奴隶制的奴隶主,他对制宪会议说,对于“肤色的区分”已成

---

① Ira Berlin, *Slavery: The First Two Centuries of African American Captivity in Mainland North America* (Cambridge, MA, 1998), ch. 5; *Poems of Phyllis Wheatley, A Native African and a Slave* (Bedford, MA, 1995), 47-48; Orlando Patterson, *Freedom* (New York, 1991), 24.

② Bailyn, *Ideological Origins*, 237; Davis, *Problem of Slavery*, 87-88.

为“有史以来最具压迫性的人压迫人的统治方式”的基础。但是后来,麦迪逊却对弗吉尼亚批准宪法的代表们保证说,宪法实际上为奴隶制提供了“比现在更为可靠的安全保障”。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因为宪法要求国会在20年内不得废除从非洲进口奴隶的贸易;要求各州将摆脱奴隶制的奴隶归还给他们的主人;并规定,在决定各州在国会众议院的席位数和各州总统选举人的人数时,该州奴隶人口的五分之三将被计算在内。当然,原始宪法并没有使用“奴隶”或“奴隶制”这样的字眼儿——这是对一部分非常敏感的代表们的一种让步,因为他们担心使用这些字眼儿将“玷污美国自由的辉煌设计”。正如路德·马丁——一位反对批准宪法的马里兰律师——所写道的,他的制宪会议的同事们“迫切地希望回避承认那些对美国人来说也许是不堪入耳的语言”;但他们却“非常愿意将那些语言所代表的内容接纳到他们设计的制度中去”。<sup>①</sup>

显然,宪法中关于奴隶制的条款都是妥协的产物,是奴隶制的批评者和捍卫者之间努力寻求一种中间地带的结果。总体来说,这些妥协事实上增强了奴隶制的生命力,并使之更深更牢固地贯穿于美国的生活和政治之中。进口奴隶的贸易在独立战争时期遭到禁止,但奴隶贸易条款却允许这项为文明世界所谴责的商业得以继续进行到1808年。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弥补逃亡到英国人一边去的奴隶,另一方面也是为正在向内地扩展的棉花生产业增加劳力;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抓紧奴隶贸易终止前的20年时间,进口了将近九万新的非洲奴隶;占了1700年以后被带入英属北美殖民地中的非洲黑奴总数的四分之一。逃奴条款赋予了奴隶法一种“治外法权”;即便当一个奴隶逃亡到了一个已废除了奴隶制的地区,他或她仍然不能摆脱被奴役的状态。约翰·杰伊在马德里进行一项外交活动的时候,曾写到他是如何地思念美洲的“自由空气”。杰伊也许没有意识到他所使用的这个词包含的反讽意味,因为在

<sup>①</sup> Max Farrand, ed.,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4 vols. New Haven, 1911-37), I, 135; Merrill Jensen, ed., *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Madison, 1976), XIV, 707-08; L. H. Butterfield, ed., *Letters of Benjamin Rush* (2 vols. Philadelphia, 1951), I, 442; Herbert J. Storing, ed., *The Complete Anti-Federalist* (7 vols. Chicago, 1981), II, 60.

1772年的桑门塞特案审理中,那位为从西印度群岛被带入英国的奴隶进行辩护的律师,为了帮助自己的委托人争得自由,曾讲了这样一段令人难忘的话:“英国的空气是如此的纯净,一个奴隶何以有资格呼吸这样的空气?”然而,在美国,宪法中的逃奴条款却强迫所有的州——包括那些已经废除了奴隶制的州——串通起来,维系奴隶制的稳定。对于奴隶们而言,在美国并无任何“自由空气”。

除此之外,整个联邦的结构也为州内的奴隶制不受外界干扰提供了保护。五分之三条款给了南部的白人团体——尤其是那些种植园主阶级——比它们本身的自由人口总数应得的更大的左右国家事务的权力。这样规定的结果之一,是1789至1848年间的16次总统选举中,除4次之外,其余皆以奴隶主人主白宫告终。连最初的宪法未能增加一个权利法案的部分原因,也与奴隶制的事实有关,正如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查尔斯·科茨沃斯·平克尼解释的:“类似的法案通常以宣称所有人生而自由开始”,这样的宣称显得“非常地不合时宜,因为我们财产的相当一部分是由那些事实上生来就是奴隶的人所构成的”。<sup>①</sup>

总的来说,美国革命对美国奴隶制产生了一个充满矛盾的影响,由此也对  
37 美国自由产生了一种类似的影响。尽管是渐进的,北部的废奴运动在新生国家的版图上划了一条地理界限,将自由州和蓄奴州作出了对未来历史有重大意义的划分。北部的废奴运动、上南部的自愿解放黑奴行动以及从奴隶制中逃跑出来的成百上千的黑奴,第一次在美国历史上构成了一个颇为可观的自由黑人群体[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还使用了类似“自由人”(Freemen)或“自由土地”(Freeland)这样的新姓氏]。在独立前,几乎所有在美国的黑人都是奴隶。但在独立后,产生了一个有属于自己的教会、学校和领袖阶层的自由黑人社

<sup>①</sup> Edward Countryman, *Americans: A Collision of Histories* (New York, 1996), 67; Richard B. Morris, et al., eds., *John Jay* (New York, 1975), II, 155-56; Davis, *Problem of Slavery*, 472-73; James W. Ely, Jr., “‘The Good Old Cause’: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Bill of Rights in South Carolina,” In *The South's Role in the Creation of the Bill of Rights*, ed., Robert J. Haws (Jackson, 1991), 116.

区；自由黑人社区的存在对奴隶制的逻辑形成了一个长期而固定的挑战，为新的逃奴提供了天然的避难所，并成为废奴运动积累力量的跳板。<sup>①</sup>

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许多美国人都把奴隶制的存在看成是美国自由的理想必将面对的一个长期而固定的死对头，或者如一群纽约人所说，奴隶制将始终是一个“自由政府的耻辱”。1792年，当费城的塞缪尔·詹宁斯创作他的《自由展现艺术和科学》时，他将一个打碎的奴隶锁链也作为一种自由的象征包括在内，形象而生动地展示了自由已经不再是仅仅与政治独立相等同，而且也包含了奴隶解放的意义。革命之后，继续使用奴隶制的比喻自然不如从前方便，因为这将不得不使人联想到真正的奴隶。但革命并未能使美国摆脱奴隶制却是一种严酷的事实。由于奴隶人口的自然增长，加上即将重新开放的进口奴隶贸易，在革命结束的时候，奴隶人口的数量远远超过了革命开始的时候。1790年进行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奴隶人口从1776年的50万人增长至70万人。<sup>②</sup>

在整个大西洋世界，革命时代的急风暴雨对奴隶制形成了极大的威胁。1794年，法国国民大会宣布废除奴隶制（几年后，奴隶制又在拿破仑统治下得以恢复）。奴隶解放是海地独立运动以及几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解放者们所追求的目标之一。惟独在美国，新的民族国家的诞生反而增强了奴隶制的生命力。英国诗人奥利弗·戈德史密斯在评论人类的习性时说：“当他们自己有了自由的时候，他们就称其为自由。”他的话也许刻画出了美国革命时期那一代人的习性。<sup>③</sup>

---

① Ira Berlin, "The Revolution in Black Life,"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ed. Alfred F. Young (DeKalb, 1976), 363-82.

② Edgar F. Smith, *Priestly in America 1794-1804* (Philadelphia, 1920), 35-37;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2 vols. Washington, DC, 1975), I, 14.

③ Blackburn, *Overthrow of Colonial Slavery*, 224-26, 248, 333-75; Austin Dobson, ed.,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Oliver Goldsmith* (London, 1906), 18.

## 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

如果说美国革命创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它同时也发明了一个新的公共实体：美国人民。殖民地的居民为族裔、宗教、阶级和社会地位等因素分割，仅凭  
38 他们对不列颠的一种忠诚感而松散地联合在一起。美国革命则创立了一个新的集合体，它的成员将以一个新生政治社会公民的身份享有权利和自由。<sup>①</sup>美国自由具有的那种包容性广泛的本质也需迅速确定谁是有权享受自由的“人民”。宪法的第一句话以“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开始，人民被描述成那些将把“自由的恩惠”当成与生俱来的权利并能将这些恩惠传延给“子孙后代”的人。人们也许认为这里提到的“人民”指的是所有生活在美国境内的人，但接下来的文字却清楚地说明，情形并非如此。联邦宪法对当时生活在美国境内的三种人口作了区分：土著印第安人，他们被视作他们部落主权之下的成员，并不是美国政体的一部分；“其他人”——即奴隶；以及“人民”。只有第三种人才能得享自由的恩惠。

谁有权享有美国自由的辩论自从美国革命时期就开始了，并一直延续至今。美国人在我们“想像的共同体”的基础的问题上长期存在着分歧，这反映出西方传统固有的另一个更大的矛盾。如果自由作为一种普遍人权的思想是西方的一种发明（如同我们经常被这样告知的），那么，西方也发明了种族的概念并赋予了这种概念各种各样可想而知的对待人类行为的权力。至少在美国来说，民族主义就是这两种思想的产物。传统上，学者们通常对公民民族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加以区分，前者将国家看成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其基础是共同分享的政治体制和政治价值观，其成员资格对境内的所有人都开放；后者将国家定义为族

---

<sup>①</sup> Edmund S. Morgan, *Inventing the People: The Rise of Popular Sovereignty in England and America* (New York, 1988); John M. Murrin, "A Roof Without Walls, The Dilemma of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in *Beyond Confederation: Origins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ed. Richard Beeman, et al. (Chapel Hill, 1987), 333-39.



裔的共同体,其基础是共同分享的民族和语言传统。乍看上去,美国属于公民民族主义的模式。美国没有一个清楚的族裔认同或长久固定的国家疆界,将美国人联为一体的是革命时期的政治理念。要成为一个美国人,一个人只需毫无保留地接受由自由、平等和民主构成的意识形态就够了。<sup>①</sup>

但事实上,从一开始,美国的民族性就将公民和种族的定义联系在一起了。一位学者写到:美国人习惯于将他们的“特殊性”隐藏在“‘自由’(freedom 和 liberty)的普遍性之中”。在我们大部分的历史中,美国公民的资格是同时通过血缘和政治忠诚来界定的。这两种定义都可追溯到合众国的早期,当时,这个新生的国家立志追求自由,但同时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附于奴隶制。奴隶制帮助界定所有美国人的个人身份和认同感。奴隶制构成了争取公民资格的最难以逾越的障碍,在那些想像美国共同体的人眼中,黑人彻底地消失了。<sup>②</sup>

尽管当时的美国人已在谈论他们的国家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所有不同国 39 家的个人”将在这里转换成一种新的人民,“融汇成了一个新的人类种族”。但这种颇为流行的说法——即逃离旧世界的专制和到新世界追求自由的共同经历使美国人成为了一个团结的整体——本身就自动将非洲人排斥在美国人的行列之外了。这个时代的神话制造大师埃克托尔·圣约翰·克雷维克曾提出了那个非常有名的问题:“美国人这个新人到底是什么人?”他自己回答说,“(美国人)是一个由英国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法国人、荷兰人、德意志人和瑞典人组成的混合体……他是一个欧洲人或一个欧洲人的后裔。”此刻正是足有五分之一的美籍人口是由非洲人和他们的后裔组成的时刻(这是我们历史

① Rogers Brubaker,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Cambridge, MA, 1992); Hans Kohn, *American Nationalism: An Interpretive Essay* (New York, 1957).

② Jon Gjerde, “Tensions Amidst Complementary Identities, Citizenship and Ethnic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nited States,” Unpublished paper,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annual meeting, 1996; Rogers M. Smith, *Civic Ideals: Conflicting Visions of Citizenship in U.S. History* (New Haven, 1997); Judith Shklar, *American Citizenship: The Quest for Inclusion* (Cambridge, MA, 1991), 1-2.

上黑人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时刻)。美国的第一任联邦总检察长埃德蒙·伦道夫写道,奴隶不是“我们社会的成员”,自由和公民的语言并不适用于他们。<sup>①</sup>

黑人是这个新生共和国的“想像的共同体”的一部分吗?原始宪法中找不到任何界定谁应该是美国公民的字句,也没有说明公民应该享有何种特权和豁免权。公民资格和权利的界限将由各州来决定。北方各州的解放黑奴法令普遍认为,前奴隶们将会留在美国,不会被殖民海外;在革命时期,自由黑人至少也享有一部分白人公民拥有的法律权利。相当一部分州的新宪法,包括上南部地区在内,都允许新近获得自由的黑人,在满足了财产资格的前提下,参加投票选举。

但是,联邦宪法授权国会建立统一移民归化制度,而国会通过 1790 年的归化法第一次从立法的角度对美国国籍作了规定。国会在没有任何辩论和异议的情况下,将美国公民的归化程序限定为只有“自由白人”才能享用的特权。所以,从一开始,一个自诩为自由的避难所的国家,将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排斥在享有美国自由的范围之外(这证明了那种坚持早期移民政策是“开放性”的通常说法并不真实)。这个限制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长达 80 年的时期中,只有白人才能成为归化为美国公民。黑人在 1870 年时才被加入到可归化入籍的范围内,而有亚裔血统的人则要等到 20 世纪 40 年代才准允归化入籍。直到进入了 19 世纪的最后 25 年,美国才开始禁止一些白人团体进入美国。被排除的群体开始只包括了妓女、判了罪的重罪犯、精神病人、实行一夫多妻制者以及那些有可能变成“公众负担”的人。到了 20 世纪,这个范围扩展到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同性恋者和文盲在内的白人。但在美国建立后的第一个世纪内,当所有的非白人都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时,全世界惟一不配享

---

<sup>①</sup> 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 1992), 437; J. Hector St. John de Crevecoeur,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ed. Alfred E. Stone (New York, 1981), 69; Duncan J. MacLeod, *Slavery, Race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74), 62; Edmund Randolph, *History of Virginia*, ed. Arthur H. Shaffer (Charlottesville, 1970), 253.

有美国公民资格的白人,是那些不愿依循 1795 年的法律要求、放弃世袭的贵族头衔的人。<sup>①</sup>

这两个从归化资格中被排除的群体——欧洲的贵族和非白人——有着比看上去更多的相同之处。美国人认为两者都缺乏享有自由的一些基本素质,包括自我控制的能力、理性思维和对更大的公共事业的关注和投入。在他那篇著名的《弗吉尼亚州记事》(1785 年)中,杰斐逊曾提到黑人之所以缺少这些素质,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天生的无能,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奴隶制的痛苦经历致使黑人不可能效忠美国(杰斐逊这样的感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杰斐逊同时也认为,奴隶制对白人的道德水平也具有灾难性的影响,因为对其他人类“永久性地行使”暴政已经使奴隶主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但杰斐逊并没有因此得出禁止奴隶主成为公民的结论。)杰斐逊对遗传性与环境、种族和才智之间的联系有着一种近乎于偏执的迷信。他的环境决定论与他坚持所有人都具有一种内在的道德感的信念联系在一起,使他不仅倾向于接受民主的价值观,而且也倾向于相信世上没有任何群体将永远一成不变地处在一种低贱的地位上。但他的种族主义偏见却使他“怀疑”黑人是否真地天生就缺乏那些享有自由的素质。

同时持有这两种明显矛盾的信仰——环境决定论和种族主义,使杰斐逊面临了尴尬的信仰冲突,但杰斐逊的思想反映出他那一代人所体验的精神分裂状态。他笃信,将来有一天,黑人应该享有独立宣言中列举的天赋人权,但黑人享有这些权利,只能在非洲或加勒比海地区,而不是在美国。麦迪逊也总是将奴隶的解放与将黑人移民到美国境外的思想联系起来。美国应该由一个同质性的公民群体所组成,这个群体应该具备同样的历史经验、价值观和天生的能力,从而使公共福利的实现成为可能;公民群体的这种同质性是平等理想

---

<sup>①</sup> James H. Kettner,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Citizenship, 1608-1870* (Chapel Hill, 1978), 235-46; E. P. Hutchinson, *Legislative History of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y 1798-1965* (Philadelphia, 1981), 405-33. Robert A. Divine 在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y, 1924-1952* (New Haven, 1957), 1 中提及 1880 年前的移民政策时称之为“开放的”。

的基础。<sup>①</sup>

美国革命缩小了原本在白人人口中存在的享受自由的等级划分,但却扩大了自由美国人与奴隶之间的分野。在殖民地时期,种族曾经是许多法律和社会不平等机制中的一种,现在,当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宣称自由是一种天赋人权时,种族却被十分便利地用来证明奴隶制继续在美国存在下去的合法性。约翰·洛克曾写到:人的自由来源于“他具有理性”。据此,剥夺那些没有理性思考能力的人的自由,并不对追求自由构成一个矛盾。在杰斐逊时代,黑人生41而低劣的看法,还只是被当作一种“怀疑”,到了19世纪,这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全面成熟的意识形态,并成为界定美国民族性中的许多内容的关键。<sup>②</sup>

性别也同样成为一种决定一个人是否能享有全部的美国自由的界限。自由的女性当然算作美国公民的一部分;她们可以从海外移民到美国,归化成为美国公民,并在计算国会议席的时候被完整地算作自由人口。直到内战结束后,联邦宪法中没有使用过“男性”这个词,宪法中也没有任何明显的以性别为界的对公民权利的区分。宪法中使用了“他”(he)这个代名词来描述政府官员,这种表达方式在当时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一种文法,几乎无需任何解释:政治本身就是男人们驰骋的天地。对于男性来说,政治自由意味着自我管理的权利以及批准那些将统治他们的各种政治设置的权力。但对于妇女来说,婚姻契约的效力要高于社会契约,她们与外部社会的关系必须通过她们与男性

---

① Thomas Jefferson,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New York, 1964), 132-37, 155; Winthrop D. Jordan, *White Over Black: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the Negro, 1550-1812* (Chapel Hill, 1968), 288-89, 455; Merrill D.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New Nation: A Biography* (New York, 1970), 55; Drew R. McCoy, *The Last of the Founders: James Madison and the Republican Legacy* (New York, 1989), 262-77; David F. Ericson,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Liberalism: The Debates Over Ratification and Slavery* (Chicago, 1993), 12-20.

② Uday S. Mehta, "Liberal Strategies of Exclus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18 (December 1990), 427-30; David B. Davis, "Reconsidering the Colonization Movement: Leonard Bacon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sletter* 14 (1992), 4;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ed. Peter Laslett (Cambridge, UK, 1988), 309; Audrey Smedley, *Race in North America: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a Worldview* (Boulder, 1993), 185-205.

之间的关系来协调和界定。对于许多妇女来说,美国革命的确改进了她们的社会地位。独立导致了“共和母亲”思想的诞生;根据这种思想,妇女在培养未来共和国公民方面具有必不可少的作用。“国家道德的基础,”约翰·亚当斯写道,“必须根植于私人家庭之中。”尽管“共和母亲”的思想并不提倡妇女直接参与政治,但它鼓励扩大妇女接受教育的机会,以便帮助她们向她们的子女灌输政治智慧。<sup>①</sup>

但在法律和社会现实中,妇女都缺乏参与政治的资格——政治自治的机会取决于对财产的拥有或对自己人身的绝对控制。既然普通法的传统把妇女划归在她们丈夫的法律地位以内,妇女并不在同等意义上像男人一样拥有自己的财产。她们在家庭中所处的从属地位突出体现了男性自主与女性依附两者之间的鲜明对照。事实上,1774年一群男性黑人在他们的请愿书中列举了他们被奴隶制剥夺的种种权利,其中一种权利是,根据宇宙的自然法则,他们的妻子“(应该)在所有事情上完全从属于她们的丈夫”。剥夺妇女享有完全自由的理由,与剥夺黑人自由的理由一样,都是基于她们不具备天生素质的假说,因为(男人)普遍认为妇女生性懦弱,缺乏理性,好感情用事,不适于成为共和国的公民。但是,自由妇女的依附性问题在独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成为公众辩论的焦点;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92年在英国出版的《女权辩护》中,发出了要求公民权利和政治平等权利的高声呐喊;她的呐喊在年轻 42 的共和国也引起了一些回应,在纽约,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昙花一现的鼓吹妇女权利的杂志。但是,对性别歧视进行全面批判的时间还远未来临。尽管1776年新泽西州的宪法将选举权授予所有达到财产资格要求的“居民”,无意之中使该州的某些妇女得到了选举权(这项规定一直实施至1807年),但严格来

---

<sup>①</sup> Jan Lewis, “‘of every age sex and conditi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the Constitution,”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15 (Fall 1995), 359-60; Joan Hoff, *Law, Gender, and Injustice* (New York, 1991), 81-101; Linda K. Kerber, *Women of the Republic: Intellec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 (Chapel Hill, 1980), 10-12, 204-28; Carole Pateman, *The Sexual Contract* (Cambridge, UK, 1988); Adams in Michael Grossberg, *Governing the Hearth: Law and the Family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Chapel Hill, 1985), 3.

讲,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群体是男性的。<sup>①</sup>

尽管有这些局限性,大多数美国人可能都会同意第一届国会成员庆贺乔治·华盛顿就任美国总统时的祝词,在其中,国会成员称美国人民是“地球上最自由的人民”。但令华盛顿极为失望的是,自由并没有产生期望的公共和谐。他就职后不久,激烈的党派政治便公开爆发了。然而,充斥于18世纪90年代的党派政治激情正好说明了自由的思想已经多么根深蒂固地融入美国政治文化之中了。所有的政党派别和社会运动都启用自由的语言来谴责对手图谋破坏自由。联邦党人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通常代表社会精英派的观点,如同华盛顿所说,他们害怕美国革命释放出来的“自由的精神”会被贬低为一种“无法无天的放纵”。在1794年的“威士忌反叛”中,宾夕法尼亚的山民为了阻止执法官员收取一项新的酒消费税,启用了1776年革命的一些象征物,如自由杆之类,这一事件的发生显然强化了联邦党人对滥用自由的恐惧。联邦党人的领袖鲁弗斯·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那些给美国社会“造成极大损害”的“带有错误导向……的词”,他所列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自由”。联邦党人坚持认为,自由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有权来反对政府,自由的基础是服从政府。<sup>②</sup>

对于杰斐逊式的共和党人来说,他们更倾向于接受新罕布什尔一家报纸的编辑所说的“充满活力的自由海洋”,他们认为这比“暴政下的安定”更为可取。相比而言,共和党人在观念上主张更多的平等,对社会和经济等级制度更

---

① Rogers M. Smith, " 'One United People': Second-Class Female Citizenship and the American Quest for Community," *Yale Journal of Law and the Humanities*, I (1999) 241; Davis, "Emancipation Rhetoric," 258; Genevieve Lloyd, *The Man of Reason, "Male" and "Female" in Western Philosophy* (Minneapolis, 1984); Kerber, *Women of the Republic*, 31-35; Edwin G. Burrows and Michael Wallace, *Gotham: A History of New York City* (2 vols. New York, 1998), I, ch. 25; Countryman, *Americans*, 71.

② James Richardson, ed., *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10 vols. Washington, DC, 1896-99), I, 48, 58; Thomas P. Slaughter, *The Whiskey Rebellion: Frontier Epilogue to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86), 127, 138; King in David H. Fischer, *The Revolu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The Federalist Party in the Era of Jeffersonian Democracy* (New York, 1965), 303, 358.

具有批判精神,更倾向于接受民主式的政治参与是自由的基础这一思想。双方相互指责对方企图破坏由美国革命继承下来的自由传统。杰斐逊派对由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竭力推动的全国经济发展计划始终抱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因为这项计划主张与英国建立亲密的贸易关系,向全国举债,为稳定和管理货币而建立一个国家银行,这一切在杰斐逊派看来,都是政治腐败的前兆,与美国革命前数十年间在英国出现的情形极为相似。对杰斐逊式的共和党人来说,美国自由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于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一个正在出现的商业资本家阶级的联姻,而这正是汉密尔顿所希望发生的。<sup>①</sup>

18世纪90年代的辩论不仅成为了美国历史上党派政治最为激烈的时期之一,而且也对扩展美国自由中的民主内容的运动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这十<sup>43</sup>年间,美国的出版业和关于公共政策的生机勃勃的辩论都得以迅速发展和扩大,成百上千的“无名鼠辈”提笔写作政治小册子和报刊文章,并组成了各种各样的政治组织。华盛顿政府的批评者组成了所谓“民主-共和社团”,这本身就说明,政治自由不光意味着在选举时参加投票,而且意味着应该经常不断地参与公共事务。华盛顿把这些社团斥之为“自创的”和具有分裂国家性质的,迫使这些组织找出理由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了捍卫自己的行动,共和党人启用了后来被学者们称之为“公共领域”的思想——指一个独立于政府以外的、通过公众对政治问题进行辩论而组织起来影响公共政策的领域。对这些社团来说,“自由质询”和“自由交流”的权利——即“人民中的任何一部分人”无论其在生活中处于何种地位都应拥有的表达政治意见的权利——是包括在“自由人所拥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中的。1798年,当面临国内外政治上的挑战时,亚当斯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惩外治乱法,这项举动导致了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惩外治乱法中的第一部法令允许联邦政府将被视为有危险的外国人递解出境;共和党人认为,这样的做法无异于否定了美国是自由的避难所的思想。第二部

---

<sup>①</sup> Fischer, *Revolu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236; Robert E. Shalhope, "Republicanism, Liberalism, and Democracy: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Republic,"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 102, pt. 1 (1992), 132-39;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1987), 23-25.

法令授权联邦政府对几乎所有批评政府的公众集会和出版物进行起诉。<sup>①</sup>

惩外治乱法的实施以及因此而来的对数十名共和派报纸主编的监禁,将言论和新闻自由推向了有关美国自由讨论的中心位置。在他们对这些法令的强烈谴责中,杰斐逊和麦迪逊否定了习惯法中有关联邦政府有权惩罚“煽动性言论”的传统(尽管杰斐逊非常小心地坚持州政府“完全地具备”这种权力)。其他的共和党人走得更远,对在法律上限制思想的自由表达提出了挑战。1801年当惩外治乱法失效后,州一级政府仍在继续对报纸的煽动性诽谤进行起诉。但1790年代后期的“自由危机”却大大强化了这样的观点:“讨论的自由”应该是美国自由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对于惩外治乱法的广泛抵制,有效地帮助了杰斐逊赢得1800年的总统大选。如同当年的竞选口号“杰斐逊与自由”所表明的,共和党人并不把他们的胜利仅仅看作是一种党派的成功,而是看成美国自由的胜利,因为它为美国的后代捍卫了革命的成果。<sup>②</sup>

但以杰斐逊的当选为高潮的发生在18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也突出地显示了奴隶制如何有力地同时界定和扭曲了美国自由。同样一个杰斐逊,44一方面把法国革命歌颂成自由向全球迈进的重要一步,另一方面却对1791年在圣多明各开始的奴隶革命表示出极大的恐惧。圣多明各是法兰西海外帝国的一颗明珠,坐落在离美国不远的地方。奴隶起义印证了革命时代自由信念的普遍性。但美国对这次起义的反应却显示,要把奴隶制划归入革命事业是何等地容易。起义的奴隶并不被看作是1776年传统上的追求自由的男人和女人,反而被当成是对美国体制的一种威胁。他们诉诸暴力常常被用来说明

① Joyce Appleby, *Capitalism and a New Social Order: The Republican Vision of the 1790s* (New York, 1984), 77; Philip S. Foner, ed., *The Democratic-Republican Societies, 1790-1800* (Westport, 1976), 99, 264; Minutes, Democratic Society of Pennsylvania, January 9, 1794, Historical Society of Pennsylvania; Lucas A. Powe, Jr., *The Fourth Estate and the Constitution: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America* (Berkeley, 1991), 58-60.

② John C. Miller, *Crisis in Freedom: The Alien and Sedition Acts* (Boston, 1952), 106-08, 124-25; Leonard W. Levy, *Emergence of a Free Press* (New York, 1985), 297-310; Lester J. Cappon, ed., *The Adams-Jefferson Letters* (Chapel Hill, 1959), 279; Peterson, *Jefferson*, 613, 640, 716-17; Richardson, ed., *Messages and Papers*, I, 369.



他们是多么地不配享有共和自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亚当斯政府鼓励海地黑人起来争取独立,因为它希望美国商人可以借机在这个岛屿非常诱人的糖业贸易中取代法国对手,而杰斐逊则力图隔离和毁灭这个西半球的第二个独立共和国。但是,在当时,没有奴隶制,“杰斐逊和自由”是不可能指望赢得选举的胜利。如果五分之三的南部黑奴不被计算在总统选举人的名额分配之内,约翰·亚当斯则会在1800年再次当选总统。<sup>①</sup>

杰斐逊把他的当选称为“1800年革命”。但这个多事之秋看到的不光只是一个喻义上的革命,同时也看到了一场企图发生的真正的革命,一场由弗吉尼亚的奴隶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图谋。这场预谋是由里士满的一个黑人铁匠加布里埃尔和他的当奴隶牧师的兄弟马丁组织的。他们的计划显然是向从城市进军到周围的种植园,杀死那里大部分的白人居民。在他们集合暴动的那天夜里,一场暴风雨降临,把通向里士满的道路都冲垮了,暴动的预谋被暴露了,领导人也被捕获缉拿。与其他弗吉尼亚人一样,参与加布里埃尔暴动的人都使用了美国革命时期的自由语言。暴动者甚至还准备了一面旗帜,在上面饰写了一句帕特里克·亨利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我们有同等的权利。”一位暴动的预谋者说道,“像其他任何人那样,我们为我们的自由而战。”另一位暴动者则把自己与乔治·华盛顿相比较,称后者也是为了“争取他的同胞的自由”而奋起反抗旧政府权威的。(这个让人听上去非常刺耳的类比显然在暗示,美国的官员现在已取代了英国人而成为自由的敌人了。)<sup>②</sup>

如果加布里埃尔预谋的起义说明了什么的话,弗吉尼亚最为显赫的家族成员乔治·塔克说道,奴隶们具有与其他人一样的、完全的“对自由的热爱”。

---

① Donald R. Hickey, “America’s Response to the Slave Revolt in Haiti, 1791-1806,”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2 (Winter 1982), 361-80; Tim Mattheson, “Jefferson and Haiti,”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61 (May 1995), 209-48; Michael Zuckerman, “The Color of Counterrevolution: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Rebellion in San Domingo,” in *The Languages of Revolution*, ed. Loretta V. Mannucci (Milan, 1988), 83-109.

② Douglas R. Egerton, *Gabriel’s Rebellion: The Virginia Slave Conspiracies of 1800 and 1802* (Chapel Hill, 1993), 26-27, 40; Frey, *Water from the Rock*, 320.

塔克认为,弗吉尼亚人应该解放他们的奴隶,应该把释放的奴隶移居到州以外的地方去。但州议会却作出了相反的决定:它加紧了对黑人人口的控制,严格限制了自愿解放奴隶的活动。1806年后,任何得到释放的奴隶必须移居出弗  
 45 吉尼亚州。关闭自由的大门是否违反了革命时期的理想主义?“不要对我们谈什么原则问题,”一家里士满的报纸宣称说,“那些原则早已因为存在我们生活之中的奴隶制而夭折了。”<sup>①</sup>

1776年3月,在独立的前夕,波士顿的律师皮特·萨切尔指出了新国家面临的一个主要的两难局面:“新生向上的美利坚帝国,”他问道,将“成为奴隶的帝国还是自由人的帝国呢”?<sup>②</sup> 到革命时代接近尾声时,历史对此提供了一个答案:它将同时成为两者。

---

<sup>①</sup> MacLeod, *Slavery, Race and Revolution*, 154-55; Ira Berlin, *Slaves Without Masters: The Free Negro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New York, 1974), 95-101, *Virginia Argus* (Richmond), January 17, 1806.

<sup>②</sup> Jack P. Greene, *Pursuits of Happiness* (Chapel Hill, 1988), 208.

### 第三章 一个自由的帝国

1824年,拉法耶特侯爵访问了美国。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前,当他还只是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人时,这位法国贵族与华盛顿站在一起,参与了美国争取独立的战争。此刻,他在美国13个月的访问变成了一场凯旋式的自由欢庆。美国人有足够的理由来欢庆拉法耶特的访问以及他们自己的自由。自革命以来,国家的人口和土地都翻了一番,政治体制生气勃勃,长盛不衰,维护和实现了民意决定政府的诺言。然而,如果拉法耶特的访问重点突出了沃尔特·惠特曼后来所说的他的同胞们“不顾一切地投身自由”的话,他的访问也引起了对美国在赢得独立半个世纪后其自由所面临的一个中心矛盾的注意。在欢迎拉法耶特的宴会、游行和庆祝活动中,所有的演说都刻意地回避了一个题目——奴隶制的存在。几个南部城市政府的公告警告所有的“有色人种”远离为欢迎远方贵宾而举办的庆祝活动。在俄亥俄州的加利波利斯,拉法耶特主动提到了“奴隶制”,但听众的反应却十分冷淡。<sup>①</sup>

生活在革命至内战期间的美国人倾向于把自由描述成他们新生国家的最重要特征,其国家制度中最独特的灵魂。当美国发行第一批硬币时,出于对一种君主式总统制的恐惧,国会指示所有的硬币上不准刻上国家元首的形象,而代之以“表示自由的象征,并刻上‘自由’这个词”。于是,自由女神的形象原本是18世纪英国肖像作品中为人熟悉的一个画面人物,此刻却风靡美国,频频出现在绘画和雕塑中,也出现在从风标到被面这样的民间工艺和酒店的招牌上。“自由,”当时十分走红的演说家爱德华·埃弗里特宣称道:“是指定我们教给(世界)的一门课程。”1835年,在《论美国民主》一书中,法国贵族和政治

<sup>①</sup> Fred Somkin, *Unquiet Eagle: Memory and Desire in the Idea of American Freedom, 1815-1860* (Ithaca, 1967), 170-72; Walt Whitman, *Leaves of Grass*, ed. Malcolm Cowley (New York, 1959), 6.

哲学家阿历克塞·托克维尔曾描写了他在美国旅行时所遭遇到的“对自由的神圣崇拜”。他晚些时候写道：“不要叫我来分析这种崇高的情感，这种情感只能被感受，它自动地进入那些上帝指定接受它的人的心灵之中，它会侵入和弥漫他们全身，使他们完全地着迷，如痴如狂。”

外来移民也将美国的命运与自由等同看待。“在一个自由的人民中间，我感到了自由和独立，”一位从挪威来的移民在家信中写道：“我为自己属于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而自豪，这个国家的制度必将主导整个文明世界。”类似的自我欣赏和陶醉的语言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论是在报纸的社论版、公共演说词和南北两地的布道词中都能见到，完全成了政治文献的标准用语。1837年，安德鲁·杰克逊在他的离职演说中宣布，从来没有任何其他的人民“享受到了美国人民享有的这样多的自由和幸福”。<sup>①</sup>

革命带来的三个历史进程——领土扩张、政治民主化和市场关系的迅速发展蔓延——有力地影响了内战前美国自由思想的演变。这些进程强化了自由与西进运动、政治参与和获取经济机会的期望之间的相互认同。但是，自由同时也深刻地受到继续生长的奴隶制的影响。奴隶制影响着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奴隶制决定了美国人在什么地方生活，他们如何工作，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他们可以行使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最后，全国政治将集中在西部的未来问题上，将决定究竟是奴隶制还是自由应在那里生根。奴隶制的存在在白人中造成了一种平等的虚幻假象，实际上掩盖了自由男性和女性所遭遇的种种压迫。然而，奴隶制也为判断自由社会提供了一种参照的标准。在“工资奴隶制”和“性别奴隶制”这样的比喻中，奴隶制被用

<sup>①</sup> John Higham, "Indian Princess and Roman Goddess: The First Female Symbols of America,"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 100, pt. 1 (1990), 59-66; Nancy Jo Fox, *Liberties with Liberty* (New York, 1985), 8-13; Rush Welter, *The Mind of America 1820-1860* (New York, 1975), 47; James T. Schleifer, "Tocqueville and Some American Views of Liberty," in *Liberty/Libertié: The American and French Experiences*, ed. Joseph Klaitz and Michael H. Haltzel (Washington, DC, 1991), 51; Hans Kohn, *American Nationalism* (New York, 1957), 141; James Richardson, ed., *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10 vols. Washington, DC, 1896-99), II, 1526.

哲学家阿历克塞·托克维尔曾描写了他在美国旅行时所遭遇到的“对自由的神圣崇拜”。他晚些时候写道：“不要叫我来分析这种崇高的情感，这种情感只能被感受，它自动地进入那些上帝指定接受它的人的心灵之中，它会侵入和弥漫他们全身，使他们完全地着迷，如痴如狂。”

外来移民也将美国的命运与自由等同看待。“在一个自由的人民中间，我感到了自由和独立，”一位从挪威来的移民在家信中写道：“我为自己属于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而自豪，这个国家的制度必将主导整个文明世界。”类似的自我欣赏和陶醉的语言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论是在报纸的社论版、公共演说词和南北两地的布道词中都能见到，完全成了政治文献的标准用语。1837年，安德鲁·杰克逊在他的离职演说中宣布，从来没有任何其他的人民“享受到了美国人民享有的这样多的自由和幸福”。<sup>①</sup>

革命带来的三个历史进程——领土扩张、政治民主化和市场关系的迅速发展蔓延——有力地影响了内战前美国自由思想的演变。这些进程强化了自由与西进运动、政治参与和获取经济机会的期望之间的相互认同。但是，自由同时也深刻地受到继续生长的奴隶制的影响。奴隶制影响着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奴隶制决定了美国人在什么地方生活，他们如何工作，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他们可以行使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最后，全国政治将集中在西部的未来问题上，将决定究竟是奴隶制还是自由应在那里生根。奴隶制的存在在白人中造成了一种平等的虚幻假象，实际上掩盖了自由男性和女性所遭遇的种种压迫。然而，奴隶制也为判断自由社会提供了一种参照的标准。在“工资奴隶制”和“性别奴隶制”这样的比喻中，奴隶制被用

<sup>①</sup> John Higham, "Indian Princess and Roman Goddess: The First Female Symbols of America,"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 100, pt. 1 (1990), 59-66; Nancy Jo Fox, *Liberties with Liberty* (New York, 1985), 8-13; Rush Welter, *The Mind of America 1820-1860* (New York, 1975), 47; James T. Schleifer, "Tocqueville and Some American Views of Liberty," in *Liberty/Libertié: The American and French Experiences*, ed. Joseph Klaitz and Michael H. Haltzel (Washington, DC, 1991), 51; Hans Kohn, *American Nationalism* (New York, 1957), 141; James Richardson, ed., *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10 vols. Washington, DC, 1896-99), II, 1526.

来作为一种抗议性的语言,为担心自己的美国自由被剥夺了的人所组织的社会运动所用。<sup>①</sup>

## 美国民主的成长

50

在这个年轻共和国的经历中发生的最令人惊异的发展是西部的崛起。“天定命运”这句话是由纽约的新闻记者约翰·L. 奥沙利文在 1845 年首先使用的,它的意思是指美国担负着一个上帝赋予的任务,那就是要蔓延整个北美大陆。但这个思想的核心早已为人所熟悉:美国是上帝选择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试验品,是自由的成就,美国的扩张是这种天定命运的一部分内容。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有自己独特的联邦体制、分权机制、民主化程度不断增高的政治制度以及将以平等的方式将领地接纳为州的实践经验,这一切保证美国既能享受庞大的帝国地位,又能享受高度的政治自治。的确,在这个年代,美国自由的中心内容之一便是这种空间上的开放感,当对幸福的追求需要这样做的时候,人们总是不断地有机会打点行装就出发,迁移到新的地方去。在民族的神话与意识形态中,用华莱士·斯特格纳后来讲的话来说,西部将作为“生而自由的美国人的最后家园”长期存在下去。<sup>②</sup>

西部的崛起不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冒险,而是美国生活中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1791 至 1850 年间,有 18 个新州进入了美利坚联邦。19 世纪 30 年代曾访问美国的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切瓦里尔写道,美国的自由既是一种“现实的思想”,又是一种“神秘的思想”——这意味它是“一种行动和运动的自由,美国利用这种自由在上帝赋予它的这片广阔无垠的土地上扩展,将其

<sup>①</sup> Judith N. Shklar, *American Citizenship: The Quest for Inclusion* (Cambridge, MA, 1991), 1-3, 22.

<sup>②</sup> Anders Stephanson, *Manifest Destiny: American Expansion and the Empire of Right* (New York, 1995); Robert W. Tucker and David C. Hendrickson, *Empire of Liberty: The Statecraft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1990), 14-20; Thomas R. Hietala, *Manifest Design: Anxious Aggrandizement in Late Jacksonian America* (Ithaca, 1985), 214-15; Wallace Stegner, *Angle of Repose* (New York, 1971), 133.

征服来为自己所用”。国家的疆界在这个扩展的过程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尽管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和其他地区处在西班牙、法国、墨西哥以及印第安人部落的法律统治权之下,美国的移居者还是无所顾忌地闯进去,占地为先,而且相信美国的主权将很快接踵而至。美国人把“空旷”的北美大陆看成是未来经济机会的保障,他们对于土地的饥渴始终支持着天定命运观的“现实的”一面。的确如此,对西部的进驻和对其经济资源的开发,使得以小农场主、小生产者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不断地得以充实更新,避免了美国重新走上欧洲的老路,成为一个阶级分化严重、拥有庞大的无自主能力的穷人队伍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西部就成了维系美国自由的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1803年,杰斐逊从法国人手中买下路易斯安那领土,使美国的领土面积增加了一倍;杰斐逊把领土扩充后的美国称为“自由的帝国”,他相信他已经把那种因人口过剩和阶级分化严重而致使美国不再是自由的故乡的可怕前景远远地推到了未来。<sup>①</sup>

- 51 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国家是一个自由的帝国,美国人也因此有意漠视了西进扩张中的一些令人极不愉快的事实。事实上,北美大陆从来不是一片空旷无人的土地。长期以来,西部始终是不同群体的人民相互遭遇和打交道的地方,这些人群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相互之间的征服和自由的选择而决定的。与此同时,西部也是相互对立的不同的自由的概念交锋碰撞的地方。“我的人民所期望的生活是一种自由的生活,”那克达苏部落大酋长西廷·布尔后来这样说到。土著美洲人的自由观着眼于保存他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保持他们对故土的控制权,这种自由观与移民西部的人所拥有的自由观是极不相称的。对于后者来说,自由意味着有权向整个大陆扩张,包括在那些印第安人认为是属于他们的土地上修建农场、开辟牧场和矿场。美国通过欺骗、

---

<sup>①</sup> Michel Chevalier, *Society, Manners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1839), 330; Drew R. McCoy, *The Elusive Republic: Political Economy in Jeffersonian America* (Chapel Hill, 1980), 203-07; Major L. Wilson, *Space, Time, and Freedom: The Quest for Nationality and the Irrepressible Conflict 1815-1861* (Westport, 1974), 107-12.

征服来为自己所用”。国家的疆界在这个扩展的过程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尽管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和其他地区处在西班牙、法国、墨西哥以及印第安人部落的法律统治权之下,美国的移居者还是无所顾忌地闯进去,占地为先,而且相信美国的主权将很快接踵而至。美国人把“空旷”的北美大陆看成是未来经济机会的保障,他们对于土地的饥渴始终支持着天定命运观的“现实的”一面。的确如此,对西部的进驻和对其经济资源的开发,使得以小农场主、小生产者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不断地得以充实更新,避免了美国重新走上欧洲的老路,成为一个阶级分化严重、拥有庞大的无自主能力的穷人队伍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西部就成了维系美国自由的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1803年,杰斐逊从法国人手中买下路易斯安那领土,使美国的领土面积增加了一倍;杰斐逊把领土扩充后的美国称为“自由的帝国”,他相信他已经把那种因人口过剩和阶级分化严重而致使美国不再是自由的故乡的可怕前景远远地推到了未来。<sup>①</sup>

- 51 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国家是一个自由的帝国,美国人也因此有意漠视了西进扩张中的一些令人极不愉快的事实。事实上,北美大陆从来不是一片空旷无人的土地。长期以来,西部始终是不同群体的人民相互遭遇和打交道的地方,这些人群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相互之间的征服和自由的选择而决定的。与此同时,西部也是相互对立的不同的自由的概念交锋碰撞的地方。“我的人民所期望的生活是一种自由的生活,”那克达苏部落大酋长西廷·布尔后来这样说到。土著美洲人的自由观着眼于保存他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保持他们对故土的控制权,这种自由观与移民西部的人所拥有的自由观是极不相称的。对于后者来说,自由意味着有权向整个大陆扩张,包括在那些印第安人认为是属于他们的土地上修建农场、开辟牧场和矿场。美国通过欺骗、

---

<sup>①</sup> Michel Chevalier, *Society, Manners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1839), 330; Drew R. McCoy, *The Elusive Republic: Political Economy in Jeffersonian America* (Chapel Hill, 1980), 203-07; Major L. Wilson, *Space, Time, and Freedom: The Quest for Nationality and the Irrepressible Conflict 1815-1861* (Westport, 1974), 107-12.



威胁和暴力等方式对印第安人实施的强制性迁移,为天定命运的最终胜利和完成美国人传播自由的任务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sup>①</sup>

领土扩张与美国自由的第二个中心内容——政治民主化——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对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挑战,早在美国革命时期就开始了,并在 19 世纪早期当西部各州进入联邦时,达到了高潮,因为这些州的法律允许所有的白人成年男子拥有选举权。原来的老州也迅速加以效法。在 19 世纪 20 和 30 年代之间举行的一系列州制宪大会上,代表们对民主与财产的关系作了重新思考。在 1829 年弗吉利亚州的制宪大会上,麦迪逊重述了他的警告:经济变化最终将产生一个无产者的大多数,他们很可能对“有产者的权利”和“正义之权利”造成威胁和损害。40 年前,在联邦制宪会议上,麦迪逊曾暂时性地支持对选举权加以财产资格的限制,以约束公众对政治的参与。但现在,面临时代的民主精神,他认为这样的限制违反了“自由政府的重要原则”,即政府需经人民同意而统治的原则。<sup>②</sup>

尽管各州扩大选举权进程的速度不尽一致,但到 1860 年时,所有州都取消了对选民的财产资格要求。这样一来,有产者的经济独立与在政治共同体中的传统对应关系被切断了。公民资格所必需的自主不再基于对财产的拥有,而是以对自身的拥有为基础。那些主张民主改革的人指出,独立宣言列举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中,甚至连财产都没有提及。他们对财富是智慧和美德的

① Gregory Nobles, *American Frontiers: Cultural Encounter and Continental Conquest* (New York, 1997), 126-30, 209-10; Alan Taylor, "Land and Liberty on the Post-Revolutionary Frontier," in *Devising Liberty: Preserving and Creating Liberty in the New American Republic*, ed. David T. Konig (Stanford, 1995), 82; Thomas P. Slaughter, *The Whiskey Rebellion: Frontier Epilogue to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York, 1986), 142.

② Christopher Collier, "The American People as Christian White Men of Property: Suffrage and Elections in Colonial and Early National America," and Sean Wilentz, "Property and Power: Suffrage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1787-1860," both in *Voting and the Spirit of American Democracy*, ed. Donald W. Rogers (Hartford, 1990), 19-41; Merrill D. Peterson, ed., *Democracy, Liberty, and Property: The Stat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of the 1820's* (Indianapolis, 1966); Drew R. McCoy, *The last of the Founders: James Madison and the Republican Legacy* (New York, 1989), 192-98.

保证这一思想也提出了挑战。美国政治学的创始人弗朗西斯·利伯写道：“成千上万没有财产的人与公共事物的关系，与那些拥有一幢房屋的人或那些有其他收入来源的人与公共事务的关系，是同等重要的。”<sup>①</sup>

到1830年，一个蓬勃兴起的民主体制在美国得以稳固。美国民主充满了活力，党派色彩浓厚，有时还带有暴力性质。但它吸引和运用了众多公民的能量（到19世纪40年代，选民投票人数占了合格选民人数的80%）。民主政治的力量来自实行政治自治的地方社区，而不是来自华盛顿。为了强调政治权力的广泛分散，托克维尔在讨论美国政治文化时，特意在讨论“联邦概观”之前，先写了一章来说明为什么有必要探讨“各州的状况”。<sup>②</sup>在美国这样一个缺乏更为传统的界定民族性的基础——即面临一个强大而且具有威胁性的邻国或拥有一个由历史积累起来的在种族、文化和宗教上的联结体——的国家内，民主式的政治体制便取而代之成为了界定国家整体特征的基础。

如同托克维尔认识到的，民主的意义远不止行使投票权。民主是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社会创造，它强化了同属于一个政治社会的成员之间的相互平等关系，同时也扩大了这些人与那些不属于同一政治社会的人之间存在的鸿沟。“公民自由，”利伯写道，是“一种相互平等的人之间的联合状态。”参与选举以及其他围绕选举的各类庆典——如游行、篝火晚会、群众集会以及政党大会等——都有助于界定谁才是享有平等的美国“人民”。与此同时，选举权迅速变成了美国公民资格的象征——如果不是在法律意义上的话（因为严格地讲，选举权仍然是一种受州政府制约的特权，而不是一种普遍权利），至少在大众语言和公众意识的意义上是这样理解的。诺厄·韦伯斯特编撰的《英语

<sup>①</sup> Robert J. Steinfeld, "Property and Suffrage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Stanford Law Review*, 41 (January 1989), 335-76; Judith Wellman, "Women's Rights, Republicanism, and Revolutionary Rhetoric in Antebellum New York State," *New York History*, 69 (July 1988), 366; Francis Lieber, *On Civil Liberty and Self-Government* (Philadelphia, 1859), 176-77.

<sup>②</sup> Robert H. Wiebe, *Self-Rule: A 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n Democracy* (Chicago, 1995), 71-73; William J. Novak, *The People's Welfare, Law and Regul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Chapel Hill, 1996), 10;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1946), 59.

词典》解释说,“公民”一词在美国与投票权是同义的,尽管在欧洲这种等同关系并不存在。因此,政治民主是美国自由的一个最根本特征。如同一位鼓吹民主改革的人士所说,投票权是“自由的第一标志,是自由人的惟一真实的证章”。<sup>①</sup>

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治自由既是一种个人权利,同时也是自治社会所拥有的一种集体性权利,是对无节制权威的一种限制,是增强公民权势的一种形式。但如果将内战前的美国人统统看成是对政府所有行动都抱有敌意的人,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国家的自由,”田纳西州的一家法院在1827年宣称说,“并非只是局限于对个人权利的运用”,而是一种“在法院和投票站”生长蔓延的公共品质。一个包含了数百万奴隶人口的社会,不可能不熟悉强有力的政府行为。领土的扩张和经济的增长都需依靠公共权威富有活力的运用——从购买路易斯安那领土和转移处置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到对纽约修建伊利运河和为刺激投资和商业而对大公司授以特权等这样的直接经济干预,都是这种权威运用的结果。<sup>②</sup>

“一个软弱的政府,”利伯写道,“是对自由的一种否定。”这种观点在内战前的美国是颇有市场的。在联邦政府一级,类似约翰·昆西·亚当斯和亨利·克莱这样的辉格党人坚持认为政府能够发挥作用,增进自由的空间。亚当斯写道,自由不仅仅意味着不受限制:“个人自由也是一种个人权力”,是一种行动起来争取个人目标的能力。自由要求有一个繁荣昌盛的美国,而政府则可以通过平衡和管理经济发展,为赢得美国的繁荣创造条件,从而能够推进一种所有阶级共享的经济繁荣。辉格党人还进一步否定了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前提:私人生活不受公共行为的干预。为了扮演一种自由的——也就是说自我

---

① Wiebe, *Self-Rule*, 83; Jean H. Baker, *Affairs of Party: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Northern Democrats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Ithaca, 1983), 266-71; Noah Webster,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2 vols. London, 1852); William B. Scott, *In Pursuit of Happiness: American Conceptions of Property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Bloomington, 1977), 76-78.

② Duncan J. MacLeod, *Slavery, Race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74), 119.

主导的和自我约束的——而且有道德的角色，个人需要某些政府可以帮助灌输和培养的特性。通过公共教育、禁酒的立法以及其他类似行动，民主政府可以向人民灌输“道德的原则”。事实上，在杰克逊时代的美国，民选的地方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法规，对商品货物的买卖进行管理，控制流行疾病的传播，并在卖淫和酗酒问题上左右公众的道德观念。宾夕法尼亚在殖民地时代曾以对宗教自由的承诺而著称，但到了19世纪，它竟以拥有最严厉的惩罚渎神罪、辱骂亵渎上帝罪以及破坏礼拜日行为的法律而再度闻名于世。<sup>①</sup>

然而，尽管民主政治在不断扩展，政府的权力却在日渐缩小。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把内战前的美国人称作是“迷恋自由的狂人”，他们对自由是如此的看重，以至于对“一切路桥费、政府税、州际公路、银行、等级、州长，甚至几乎对法律本身”都表示出一种仇视。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政治文化中始终贯穿一种旧的观念，即认为自由与政治权势之间的斗争是历史上永无终结的内容。尽管事实上在许多方面，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并没有真实地存在过。在杰克逊时代，民主党经常不断地将远在天边的联邦政府斥责为“对美国自由的最大威胁”。对于实施奴隶制的南部来说，它们捍卫自己“特殊体制”的首要武器就是州权，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南部成为民主党的大本营之事并非纯属偶然。但民主党人以自由为理由来反对政府权威的意义远不止于为奴隶制提供一种保护。民主党人的理念是以自由放任式经济为基础的，并坚持对政府与社会加以区分，他们把政府授予的特权看作引起社会不公正的根源。如果国家从经济领域中退出，取消关税，取消对银行和公司的特权以及其他形式的特权，普通的美国人就可以在自动调节的市场公平竞争中测试自己的能力，而不致于像在欧洲那样，被终身地围困在特权制度的陷阱之中。

在民主党人看来，一个弱政府对私人自由和公共自由——即“在社会联盟

---

<sup>①</sup> Novak, *People's Welfare*, 35 and *passim*; Adrienne Koch and William Peden, eds., *Selected Writings of John and John Quincy Adams* (New York, 1946), 342; Daniel W. Howe,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American Whigs* (Chicago, 1979), 33-36; Michael J.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n in Search of Public Philosophy* (Cambridge, MA, 1996), 165; J. William Frost, *A Perfect Freedom: Religious Liberty in Pennsylvania* (New York, 1990), 5-8.

中的个人自由和在联邦的联盟中的州自由”——都非常重要。个人的道德观说穿了属于个人私事的领域,不应成为公共事务的内容。民主党人反对通过禁酒的立法以及其他一些将一种道德观强加于整个社会的企图,他们的这种立场受到19世纪30年代前后大批涌入该党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的格外欣赏和欢迎。对禁酒立法的反对通常启用捍卫个人自由的名义。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人自称为“热爱自由的公民”质问道,谁给了一部分公民训导他人如何处理个人生活问题的权利。对“政府各部门的权力进行限制,”一家民主党人的报纸在1842年写道,“是自由的惟一保障。”<sup>①</sup>

这种存在于政府的“积极”和“消极”的定义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这种冲突与自由的关系,是美国政治中一个经久不衰的特征,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但到19世纪中叶,辉格党主张的、由政府协调经济发展的“美国体系”已成为过去,而民主党人鼓吹的有限政府的理念却扶摇直上,如日中天。1848年,纽约的55《商业期刊》在比较美国人与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自由定义时说:“在我们国家,自由的涵义是在所有个人事务中不存在任何来自政府的干预。”衡量公共政策的好坏,不再是以这些政策是否促进了公共福利为准则,而是以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和何种范围里允许“自由能力”的发挥,这种能力指的是,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个人追求他们的利益和培养他们独特的专长和技能。<sup>②</sup>

政治民主化将政治自由重新定义为一种拥有自身的功能而不是一种控制

---

① Carl Bode and Malcolm Cowley, eds., *The Portable Emerson* (New York, 1981), 594-95; “Introduction,” *United States Magazine and Democratic Review*, 1 (October 1837), 1-15; Michael A. Morrison, “Martin Van Buren, the Democracy, and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Texas Annexation,”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61 (November 1995), 712-13; W. J. Rorabaugh, *The Alcoholic Republic: An American Tradition* (New York, 1979), 200-01; Roy Rosenzweig, *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 Workers and Leisure in an Industrial City, 1870-1920* (New York, 1983), 177; L. Ray Gunn, *The Decline of Authority: Public Economic Poli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New York, 1800-1860* (Ithaca, 1988), 1-9, 155.

② Welter, *Mind of America*, 127; Novak, *People's Welfare*, 184-85; Francis Lieber, *Manual of Political Ethics* (Boston, 1838), 167; Lawrence F. Kohl, *The Politics of individualism: Parties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 in the Jacksonian Era* (New York, 1989), 104-09.

财产的功能,同样,经济与宗教生活中的变化也极有力地促进了一种关于自由的自由主义式的思想的广泛传播,这种思想把自由理解成说自主和自导的个人不受任何来自个人之外的限制。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经历了一场被历史学家称为“市场革命”的全国性经济转型运动。在交通和通讯方面发生的技术革命——如蒸汽动力船、运河、铁路、电报等——将农场主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结起来,至少在北部是这样的,使他们成为了工业制造产品的主要消费者。银行和各种联合企业成为经济事业的中心。美国的第一批工厂首先在纺织业和制鞋业中出现。在其他的行业中,商人们将先前分散且独立的工匠们组织起来,形成工场,迫使工匠们遵从前所未有的各种形式的劳动纪律和规则。这些变化,用康涅狄格牧师霍勒斯·布什内尔在1851年的话来说,产生了“一场家庭生活和行为方面的彻头彻尾的革命”。<sup>①</sup>

家庭作为经济生产的中心地位的衰落,加上西进运动和都市化发展,造就了一个巨大的流动人口,这个流动人群不再依附地方社区,而是像雄心勃勃的企业家一样,四处流动,竭力寻求和抓住经济变化带来的一切机会。这种在市场上为进取而竞争的权利逐渐地变成了美国自由的一个试金石。这个时代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的亨利·C. 凯里曾指出,“决定一个人处于自由还是被奴役状态的问题”势必要与市场关系联系在一起。当个人为了购买一种商品而竞争时,商品的主人就变成了自由人。随着市场革命的不断深入,自由女神也被更为官方地用来作为物质进步的一种象征。新泽西州的州印是在1776年开始启用的,上面将自由女神与手中举着一个丰饶角的罗马农业女神刻瑞斯并列。1821年,州印上又加了“自由与繁荣”的格言,使两者的联系更为明显和引人注目。1836年加入联邦的阿肯色州,在州印上也刻有自由女神的图像,并伴之以一条蒸汽机轮船和两只五谷满溢而出的牛角的图像。<sup>②</sup>

<sup>①</sup> Charles Sellers, *The Market Revolution: Jacksonian America 1815-1846* (New York, 1991); Christopher Clark, *The Roots of Rural Capitalism: Western Massachusetts, 1780-1860* (Ithaca, 1990), 4.

<sup>②</sup> Joyce Appleby, et al.,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1994), 121; Steven Watts, *The Public Reborn: War and the Making of Liberal America, 1790-1820* (Baltimore, 1987).

财产的功能,同样,经济与宗教生活中的变化也极有力地促进了一种关于自由的自由主义式的思想的广泛传播,这种思想把自由理解成说自主和自导的个人不受任何来自个人之外的限制。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经历了一场被历史学家称为“市场革命”的全国性经济转型运动。在交通和通讯方面发生的技术革命——如蒸汽动力船、运河、铁路、电报等——将农场主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结起来,至少在北部是这样的,使他们成为了工业制造产品的主要消费者。银行和各种联合企业成为经济事业的中心。美国的第一批工厂首先在纺织业和制鞋业中出现。在其他的行业中,商人们将先前分散且独立的工匠们组织起来,形成工场,迫使工匠们遵从前所未有的各种形式的劳动纪律和规则。这些变化,用康涅狄格牧师霍勒斯·布什内尔在1851年的话来说,产生了“一场家庭生活和行为方面的彻头彻尾的革命”。<sup>①</sup>

家庭作为经济生产的中心地位的衰落,加上西进运动和都市化发展,造就了一个巨大的流动人口,这个流动人群不再依附地方社区,而是像雄心勃勃的企业家一样,四处流动,竭力寻求和抓住经济变化带来的一切机会。这种在市场上为进取而竞争的权利逐渐地变成了美国自由的一个试金石。这个时代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的亨利·C. 凯里曾指出,“决定一个人处于自由还是被奴役状态的问题”势必要与市场关系联系在一起。当个人为了购买一种商品而竞争时,商品的主人就变成了自由人。随着市场革命的不断深入,自由女神也被更为官方地用来作为物质进步的一种象征。新泽西州的州印是在1776年开始启用的,上面将自由女神与手中举着一个丰饶角的罗马农业女神刻瑞斯并列。1821年,州印上又加了“自由与繁荣”的格言,使两者的联系更为明显和引人注目。1836年加入联邦的阿肯色州,在州印上也刻有自由女神的图像,并伴之以一条蒸汽机轮船和两只五谷满溢而出的牛角的图像。<sup>②</sup>

<sup>①</sup> Charles Sellers, *The Market Revolution: Jacksonian America 1815-1846* (New York, 1991); Christopher Clark, *The Roots of Rural Capitalism: Western Massachusetts, 1780-1860* (Ithaca, 1990), 4.

<sup>②</sup> Joyce Appleby, et al.,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1994), 121; Steven Watts, *The Public Reborn: War and the Making of Liberal America, 1790-1820* (Baltimore, 1987).

19世纪20和30年代席卷全国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所带来的宗教复兴为主张个人改良和个人自决的思想赋予了宗教意义上的有力支持。复兴主义者拒绝接受人生而堕落并逃脱不了预先设定的命运的思想,他们大肆宣扬上帝是仁慈的和人类具有自由意志这类颇有争议性的理论。尽管有些卡尔文派分子反对这样的看法,但在这些年里,自由意志“几乎成了一种美国教条”。既然每个人都是一个道德上的自由意志者,所有的原罪者可以选择精神自由,而这种自由,用普世教牧师乔纳森·布兰查德的话来说,指的是“耶稣对那些自由和自愿选择服从他的理性的个人的一种完全的统治”。复兴主义者将宗教向广大的群众开放;他们强调,所有普通的美国人,而绝非一小撮所谓“上帝的选民”,都能决定他们自己的精神归宿,这样的思想可以说与政治上的民主化和迅速蔓延的市场价值观是相辅相成、异曲同工的。福音派的牧师们并非都是市场社会的鼓吹者;事实上,他们经常抨击的原罪类别中就包括了贪婪、自私自利以及对他人的生死祸福的漠视态度。但在对“良心的个人化”的鼓吹和宣传中,他们又把勤奋、持重和自律强调为一种自由选择的行为的典范,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在推行在一种在市场文化中获取成功而必须具备的素质。<sup>①</sup>

基督教的自由基本上是一种内心的状态,与人在尘世中的地位并无直接联系,这种观点在历史上由来已久。但在内战时期的美国,这种观点却同时具备了世俗和宗教的形式。当爱默生在1880年回首这段历史时,他认为内战前时代的特征是,“社会的存在”让位于“个人的扩张与独立……个人被驱动着去追求他所有的资源、期望、回报、社会以及他内心的上帝”。对于爱默生来说,这种自力更生和自我革新的精神是对那种要求强迫人人归一的社会压力的一

68-72; Henry C. Carey, *Principles of Social Science* (3 vols. Philadelphia, 1858-59), III, 234; “The Story of the Great Seal of the State of New Jersey,” Unpublished paper, New Jersey Historical Commission, 1983; J. Franklin Reigart, *The United States Album* (Lancaster, 1844).

① George M. Marsden, *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 The Shaping of Twentieth-Century Evangelicalism 1870-1925* (New York, 1980), 16, 28-30, 99-100; Watts, *Republic Reborn*, 10-14, 119-39; Nathan O. Hatch, *The Democratization of American Christianity* (New Haven, 1989), 3-4, 43-44.



种解毒剂,而在托克维尔看来,这种精神正是民主社会最明显的特征之一。个人成长的机会为杰斐逊的追求幸福的定义加进了一个新的内容;当民主、领土扩张和市场革命这一系列发展正在冲击传统的空间和社会界限,使地域和社会地位的变迁成为美国生活中普遍发生的一种现象时,这个新的自由内容对于美国来说,实在是太适宜不过了。自由意味着一个永无止境的自我实现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每个人都可以重新塑造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生活。<sup>①</sup>

自然,这个时代的“个人主义”(这个词是在19世纪20至30年代才进入美国词汇的)也充满了许多的讽刺意味。如果民主和市场革命推进了政治与商业的相互交往,“主权个人”的思想则宣称美国人不对其他任何人而只对他们自己负责。如果个人的发展——至少对男人们来说——要求在起伏动荡的  
58 市场世界中获取经济成功的话,而此时已经不再是生产场所的家庭则被推崇为自我可以得到最完全的表现的场所,这种表现是通过运用爱情、友谊和相互之间的责任这些明显的非市场性的价值观来实现的。主权自我的界限——后来将被称作“隐私”——不断地被认知为一个无论是其他的个人还是政府都无权予以干涉和侵犯的领域。在这种定义上,自由本身就存在其中了。<sup>②</sup>

## 自由劳动与奴隶劳动

当个人自由的定义越来越多地与争取经济成果的竞争机会和实现个人的自我进步联系在一起时,在这样的环境中,奴隶制也就成为描述个人成功所面临的障碍的一种最有效的比喻。对于禁酒运动的推动者们来说,酗酒也是一种奴役形式,因为它剥夺了一个人进行道德选择和自我实现的能力。有的人还把“酒精过度的锁链”比喻成“比非洲大陆的孩子们所戴的锁链还

① Bode and Cowley, eds., *Portable Emerson*, 594-95; Yehoshua Arieli, *Individu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American Ideology* (Cambridge, MA, 1964), 276-84.

② Thomas L. Haskell, “Capit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Humanitarian Sensibilit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0 (April-June 1985), 339-61, 547-66; Wilfred McClay, *The Masterless, Self and Society in Modern America* (Chapel Hill, 1994), 40-73.

沉重”。那些主张放宽破产法的人也经常使用“债务奴隶制”的词语,以引起人们对暂时的经济失败将如何导致对未来市场经济进步的阻碍的联想。对于那些坚持将自由与宗教改革联系起来的人来说,天主教也是一种与美国自由概念全然不协调的奴隶制形式,因为天主教必须事事依循教会权威的意志,而不能像新教成员那样敢于表现自己的独立自主。尽管自由的语言四处开花,但那些信奉自由的物质条件的人却感到机会不断从手中滑落,他们的不满非常清楚地通过“工资奴隶制”的思想传达出来。<sup>①</sup>

内战前美国生活中存在的一个悖论是,当对财产的拥有不再作为政治自由的一种前提条件之后,当有关个人自主的思想逐渐倾向于包括一种内在的而不是一种社会的涵义之后,独立却仍然作为经济自由的一个流行标准得以留存下来。传统的定义把经济上的独立自主看成是自由的一个条件,而市场革命对这种传统定义的影响则充满了矛盾。无论是在北部还是南部的小农场中,尽管农场主们发现自己愈来愈深地卷入到市场关系之中,那种独立的小生产者的理想仍然具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当然,在市场革命时代,没有一个家庭可以真正地独立存在。但拥有财产的农场主,对于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市场经济以及如何保护自己少受商品市场无端变化的冲击方面,仍然掌握着相当大的选择权。只要农场主家庭继续控制生产资料,并能现实地将这种财产遗传给子女——这种期望因西部大量的领土向移民开放而变得十分现实——小生产者就有理由继续把美国看成小生产者的“天堂”。<sup>②</sup>

在从事商业和制造业的城市里,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却是极为不同的。<sup>59</sup> 市场资本主义为有技术和技能的工人提供了无数的工作机会;在许多行业中,

---

<sup>①</sup> Rorabaugh, *Alcoholic Republic*, 200-01, 214-15; Heman Humphrey, *Parallel Between Intemperance and the Slave Trade: An Address Delivered at Amherst College, July 4, 1828* (Amherst, 1828); Scott A. Sandage, "Deadbeats, Drunkards, and Dreamers: A Cultural History of Failure in America, 1819-1893," Ph. D. dissertation, Rutgers University, 1995; Tyler Anbinder, *Nativism and Slavery: The Northern Know-Nothings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1850s* (New York, 1992), 104-05; Amy Bridges, *A City in the Republic: Antebellum New York and the Origins of Machine Politics* (New York, 1984), 31.

<sup>②</sup> Lacy K. Ford, *Origins of Southern Radicalism: The South Carolina Upcountry 1800-1860* (New York, 1988); Jonathan Prude, "Town-Country Conflicts in Antebellum

要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工场,这并非难事。但机器制造业范围的不断扩大逐渐损害了传统工艺技能的运用和发展,大大减少了工匠学徒争取上升到作一名独立的工场主或师傅的地位的机会。工资劳动制逐渐取代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成为家庭在市场革命的洪流中生存下去的经济基础。1830年后,移民人数的迅速增加,劳工队伍中的底层也相应膨胀。在19世纪中叶,波士顿和纽约市两地劳工总数的三分之二是由拿工资的工人组成的,就整个国家来说,工资劳工的人数第一次超过了奴隶的人数。十年以后,根据一项估计,工资劳工的总数超过了劳工队伍中个体经营者的人数。相应地,法律秩序也愈来愈经常地用来为工资劳动制服务。法官们将所有为他人工作的决定定义为一种自愿性质的契约协议,这种协议允许雇主在工作场所任意发号施令。与此同时,法官还否定了工人是独立自主的个人的定义,并通过对阴谋法的一种反工会性质的解释,禁止工人们为增加工资而组织联合起来。<sup>①</sup>

工资劳动制的兴起及其在法律上的体制化对传统观念提出了深刻的挑战,这种观念认为经济上的依附地位与自由是不相称的。历史学家托马斯·哈斯克尔曾经指出,市场革命,通过推动一种个人掌握自己未来命运的能力和

---

Rural Massachusetts," and John M. Faragher, "Open-Country Community," both in *The Countryside in the Age of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 Essay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Rural America*, ed. Steven Hahn and Jonathan Prude (Chapel Hill, 1985), 75-76, 245-47; Randolph A. Roth, *The Democratic Dilemma: Religion, Reform,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the Connecticut River Valley of Vermont, 1791-1850* (New York, 1987), 297; Wiebe, *Self-Rule*, 24-26.

① Richard Stott, "Artisans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16 (Summer 1996), 267-69; Sean Wilentz,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1776-1877," in *Perspectives on American Labor History*, ed. J. Carroll Moody and Alice Kessler-Harris (DeKalb, 1989), 83-151; Peter Knights, *The Plain People of Boston, 1830-1860* (New York, 1971), 120; Bridges, *A City in the Republic*, 46-58;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2 vols. Washington, DC, 1975), I, 139; Stanley Lebergott, "The Pattern of Employment Since 1800," 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ed. Seymour E. Harris (New York, 1961), 290-91; Christopher L. Tomlins, *Labor, Law, and Ideology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New York, 1993); Robert J. Steinfeld, *The Invention of Free Labor: The Employment Relation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aw and Culture, 1350-1870* (Chapel Hill, 1991), 144-60.

感觉以及个人对他人命运的责任感,鼓励了一种人文主义思想感情的生长。但许多美国人对资本主义扩张体验的结果,并未增加控制自己命运的力量,而是丧失了这种力量。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工人有权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这是洛克时代就出现的流行观念。在杰克逊时代,这种观念重新激发了独立的小生产者的理想,正是他们对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其将自由劳动力变成商品的过程提出了全面的批判。<sup>①</sup>

当然,借用人身奴隶制的语言来批判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劳资关系的自由,并不是什么新的发明,也不是惟有美国人才这样做。在英国,将工资制劳工比喻成受奴隶制压迫的人,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18世纪,即便是杰克逊时代的劳工运动在19世纪30和40年代使用了这种比喻,英国宪章派的报纸几乎仍在使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但是,在美国,奴隶制是一个近在咫尺的现实,而不是一个远在天边的象征。与此同时,小生产者在美国的社会秩序中仍是一个颇有势力的组成部分,而工资制下的工人因为其经济地位上的依附关系而比一般人更缺少自由,这种看法因而具有了特别的影响。工资奴隶制打破了原来存在于奴隶制与自由之间的鲜明对照,暴露了表面上自由的经济体制中隐藏着的不同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使被视为是一种适宜的自由定义的契约市场观念受到了挑战。1828版的诺厄·韦伯斯特《美国词典》宣称说,自由是“一种免于权势或他人控制的状态”。杰克逊时代的劳工运动曾问道,有多少凭工资养家糊口的工人真正地处于这种“被免除”的状态。<sup>②</sup>

---

① Haskell, "Capit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Humanitarian Sensibility," 339-61, 547-66; Sean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New York City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1788-1850* (New York, 1984), 63-103; Ronald Schultz, *The Republic of Labor: Philadelphia Artisans and the Politics of Class, 1720-1830* (New York, 1993), 206-29.

② David Turley, *The Culture of English Antislavery, 1780-1860* (London, 1991), 182-84; Marcus Cunliffe, *Chattel Slavery and Wage Slavery: The Anglo-American Context 1830-1860* (Athens, GA, 1979), 9-14; Noah Webster, *An 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2 vols. New York, 1828);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271-84; Christopher Lasch,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 Progress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1991), 203.

费城劳工运动的发言人兰顿·拜勒斯拜坚持说,工资劳动制正是“奴隶制的核心”。

工资奴隶制(或它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别称“工厂奴隶制”)的比喻立即引发了一系列对早期工厂行为和做法的抱怨,如低工资、不正常且没有担保的雇佣期、繁多而又极为武断的规章制度等等,也包括(法院)使用阴谋定罪手段来阻止工人组织工会的行径。1806年,一群费城的制鞋匠人宣称道:“自由的名字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他们的领导人因从事组织工人举行要求增加工资的活动,而以谋反的名义被判为有罪。30年后,20名纽约的裁缝工人也因同样的罪名被判罪。这项判决引发了一场以“埋葬自由”为题的公开游行。在这一时期,工厂和工场的那种繁多琐细的工作规章制度,也被人看作是一种对自由的剥夺。一位在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阿姆斯格纺织厂工作的操作工,甚至把工厂的铃声比作为“奴隶主手中的鞭子”。<sup>①</sup>

但是,作为一种批判思想,工资奴隶制的核心是指出经济上的依附地位与自由是互不相称的。在当时,这种思想最有影响的鼓动者是新英格兰的社会哲学家奥雷斯蒂斯·A. 布朗森,他在1840年的名为“劳动阶级”的文章中,把工资描述成“魔鬼为了使自己做到问心无愧而设置的一个奸诈的手段,他想占尽奴隶制的所有好处,却又不想承担一个奴隶主的花费、烦恼以及丑恶的名声”。布朗森后来回忆说,他的文章是从那些道貌岸然的观点中引出的“一种普遍的、充满恐惧的呐喊”。但并不是只有激进劳工分子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同盟军才看清了工资奴隶制与奴隶制之间的相似之处的。在他那颇为诡异《女仆的地狱》的故事中,赫尔曼·梅尔维尔笔下的一家新英格兰造纸厂的工人,站在机器旁时,竟然“哑然无声,畏畏缩缩,如同奴隶一般”。在杰克逊时代的民主党内,从善于哗众取宠的迈克·沃尔什(他曾对纽约的工人们讲道:“你们

---

① Barry Goldberg, "Slavery, Race and the Languages of Class: 'Wage Slaves' and White 'Nigger,'" *New Politics*, n.s., 3 (Summer 1991), 64-70; John R. Commons, et al., *History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4 vols. New York, 1918-35), I, 141-42; Tomlins, *Law, Labor, Ideology*, 128-30, 163n.; David A. Zonderman, *Aspirations and Anxieties: New England Workers and the Mechanized Factory System 1815-1850* (New York, 1992), 113-16, 161-62.

费城劳工运动的发言人兰顿·拜勒斯拜坚持说,工资劳动制正是“奴隶制的核心”。

工资奴隶制(或它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别称“工厂奴隶制”)的比喻立即引发了一系列对早期工厂行为和做法的抱怨,如低工资、不正常且没有担保的雇佣期、繁多而又极为武断的规章制度等等,也包括(法院)使用阴谋定罪手段来阻止工人组织工会的行径。1806年,一群费城的制鞋匠人宣称道:“自由的名字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他们的领导人因从事组织工人举行要求增加工资的活动,而以谋反的名义被判为有罪。30年后,20名纽约的裁缝工人也因同样的罪名被判罪。这项判决引发了一场以“埋葬自由”为题的公开游行。在这一时期,工厂和工场的那种繁多琐细的工作规章制度,也被人看作是一种对自由的剥夺。一位在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阿姆斯格纺织厂工作的操作工,甚至把工厂的铃声比作为“奴隶主手中的鞭子”。<sup>①</sup>

但是,作为一种批判思想,工资奴隶制的核心是指出经济上的依附地位与自由是互不相称的。在当时,这种思想最有影响的鼓动者是新英格兰的社会哲学家奥雷斯蒂斯·A. 布朗森,他在1840年的名为“劳动阶级”的文章中,把工资描述成“魔鬼为了使自己做到问心无愧而设置的一个奸诈的手段,他想占尽奴隶制的所有好处,却又不想承担一个奴隶主的花费、烦恼以及丑恶的名声”。布朗森后来回忆说,他的文章是从那些道貌岸然的观点中引出的“一种普遍的、充满恐惧的呐喊”。但并不是只有激进劳工分子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同盟军才看清了工资奴隶制与奴隶制之间的相似之处的。在他那颇为诡异《女仆的地狱》的故事中,赫尔曼·梅尔维尔笔下的一家新英格兰造纸厂的工人,站在机器旁时,竟然“哑然无声,畏畏缩缩,如同奴隶一般”。在杰克逊时代的民主党内,从善于哗众取宠的迈克·沃尔什(他曾对纽约的工人们讲道:“你们

---

① Barry Goldberg, "Slavery, Race and the Languages of Class: 'Wage Slaves' and White 'Nigger,'" *New Politics*, n.s., 3 (Summer 1991), 64-70; John R. Commons, et al., *History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4 vols. New York, 1918-35), I, 141-42; Tomlins, *Law, Labor, Ideology*, 128-30, 163n.; David A. Zonderman, *Aspirations and Anxieties: New England Workers and the Mechanized Factory System 1815-1850* (New York, 1992), 113-16, 161-62.

是奴隶,没有谁比那些把你们叫作自由人的野狗们更清楚这一事实了”)到其他煽动力较次的政治人物,都始终坚信,一个理想的公民应是一个农场主或独立自主的技术工匠;工厂制和受商人摆布的手工工场只是在引进一种与美国自由相冲突的专断制度。<sup>①</sup>

- 62 今天,当工资的水平,而不是为工资而工作的问题,成为劳工运动的起因时,“工资奴隶制”及其由此衍生的工资制下的工人缺乏真正的自由的推论,听上去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而在19世纪,这两者却同时界定着那种包括了经济自立在内的自由的内容。“我们是自由的,”一位名叫彼得·罗德尔的德国移民制鞋工人写道,“但自由得不够,……我们需要生活的自由。”将自由与经济自立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起源于小生产者的传统和公众对美国革命的普遍期望,与市场价值决定一切的观点相比较,这种思想宣示了一种不同的社会观。不仅如此,它对爱默生和其他改良主义者的思想也提出了挑战,后者认为个人自由和社会变革可以简单地通过所谓“自信、自力、自制和自习”来取得。布朗森坚持认为,工人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而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他们的根扎在“社会的结构之中”,而那些反对“改变既存社会秩序”的人是不愿面临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这种对自由的敏感力将激发从杰克逊时代到19世纪90年代的平民党运动在内的一系列抗议运动。<sup>②</sup>

在费城劳工领袖斯蒂芬·辛普森看来,告诉工人他们只享受到了“自由的骨架”很容易,难的是找到可行的办法,来扭转这种经济依附的趋势。这个时代的社群主义者曾提出过一个办法。这些罗伯特·欧文和阿尔伯特·傅立叶的追随者和其他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指出,要想得到真正的自由,必须废除私有财

① Bronson essay in Joseph L. Blau, ed., *Social Theories of Jacksonian Democracy* (Indianapolis, 1954), 306-10; Lasch,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 191n; “The Tartarus of Maids,” *Selected Writings of Herman Melville* (New York, 1952), 195-96;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332; Zonderman, *Aspirations and Anxieties*, 116, 293.

② Bruce Levine, “The Migration of Ideology and the Contested Meaning of Freedom: German Americans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Occasional Paper No. 7,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1992), 11-12; Wilentz, “Rise of the Working Class,” 88; Arieli, *Individualism and Nationalism*, 241; Blau, ed., *Social Theories*, 310.

产,从而消除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差别。内战前,美国建立了十来个实验公社,大部分奉行禁欲式的生活方式,并实施由具有感召力的宗教或世俗领袖制定的极为严格的规章制度,在外人看来,这些公社犹如一种“自愿奴隶制”形式。但对公社成员来说,加入一个像“新和谐”、布鲁克农庄或奥奈达之类的公社,如同在被称之为“自由的坟墓”的市场经济的拒绝之后,重新找到了获取个人自由的出路。<sup>①</sup>

因为大多数美国人把财产看成是自由的基础,而不是威胁,社群主义对于他们的吸引力是极为有限的。劳工运动的目的是争取更容易地获取私有财产,而不是废除私有财产。托马斯·斯基德莫尔是一个机械工和教师,也是纽约市的工人党的早期领袖,他曾对此提出过一个建议。在他看来,财产的拥有权极为重要,他甚至批评杰斐逊没有把这项权利包括在独立宣言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中;但他认为,财产必须平等地分配,真实的自由基础才能建立起来。他建议在每个人(他没有排除妇女和黑人)成年之前,政府应向他们提供一份“宽裕的生计来源”。

1837—1842年的经济萧条是迄至当时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sup>63</sup>在这次危机之后,出现了一种不同的保障工人经济自主权的运动:争取自由土地的运动。毫无疑问,美国人的自由观长期以来就是与对西部的期望联系在一起的。许多年来,民主党一直在鼓吹和提倡建立一项能够帮助民众便利地获取政府土地的政策。如安德鲁·杰克逊所说,“让每个有进取心的美国公民都有机会得到一个独立的家庭住所。”但在19世纪40年代,真正使西部自由宅地思想变得流行起来的却是乔治·亨利·埃文斯和一向超俗脱群、标新立异的霍勒斯·格里利。前者是一个新闻记者,杰克逊时代劳工运动的老将;后者曾经一度是辉格党人,社群主义式的社会主义者和改良派废奴主义者。埃文斯认为:“土地的自由”将给工资奴隶带来“解放”,这是改变永久性依附关系的惟一变通方式。<sup>②</sup>

<sup>①</sup> Blau, ed., *Social Theories*, 141; J. F. C. Harrison, *Quest for the New Moral World: Robert Owen and the Owenite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New York, 1969), 52-58; Christopher Clark, *The Communitarian Moment: The Radical Challenge of the Northampton Association* (Ithaca, 1995), 99-108.

<sup>②</sup> Thomas Skidmore, *The Rights of Man to Property* (New York, 1829); Wilentz,



并非只是北部的劳工和改良主义者才对市场经济中的自由概念持批判的态度。在西进扩张的过程中,南部也与自由州一样,全力以赴地参与了这个过程,但这个过程不但没有推进南部的经济现代化,却使种植园奴隶制更进一步地演变成为南部生活的中心机制。奴隶制的迅速发展和一个鲜明的南部统治阶级的形成与巩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种维护奴隶制的意识形态的兴起;这种意识形态借用奴隶制与自由之间的反差为武器,对北部自诩的“自由社会”展开了猛烈的抨击。类如约翰·卡尔霍恩和乔治·菲茨休这样的奴隶制的卫道士认为,北部的自由劳力与“我们故乡中的奴隶”比起来相差无几,相对于为一个家长式的主人所拥有、免受竞争激烈的市场的剥削的奴隶所处的位置来说,北部劳工实际上的情形更糟。事实上,这些奴隶制的卫道士强调说,自由劳动的思想本身是一种残酷的虚构,它听任有产阶级逃避他们本应承担的对社会中那些天生低贱无能者应担负的责任。对黑人进行奴役,等于为在白人内部争取“完美的平等”提供最可靠的保证,它将白人从北部工资制劳工们不得不从事的工厂劳动和家庭杂务这类“低贱的和体力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为非奴隶主的白人提供了相当从容的空间来争取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自主。一位议员声称,因为有了奴隶制,南部的白人才能“如在天空中任意翱翔的鸟儿一样的独立自由”。<sup>①</sup>

如同在北部,追求平等的精神在南部白人社会中也是根深蒂固的。如同在北部一样,南部各州的宪法也都将自由人之间的权利平等奉为神明,而且南部也全面参与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事实上,在1810年,南卡罗来纳州成为原始13个州中最先实行白人男性普选权的州(尽管它同时保留了许多对担任  
64 公职的人的财产资格要求)。南部白人自称是美国革命的真正后代,与建国之

*Chants Democratic*, 193-95; Jackson in Scott, *In Pursuit of Happiness*, 59-66; Arieli, *Individualism and Nationalism*, 313; Bernard Mandel, *Labor Free and Slave* (New York, 1955), 85.

① Cunliffe, *Chattel Slavery*, 4-7; Eugene D. Genovese, *The Slaveholders Dilemma, Freedom and Progress in Southern Conservative Thought, 1820-1860* (Columbia, SC, 1992), 33-34, 48; James Oakes, *Slavery and Freedom,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Old South* (New York, 1990), 80; *Congressional Globe*, 35th Congress, 2d sess., 1339; *Charleston Mercury*, March 7, 1860.

父们分享“同一种追求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在他们的政治语言中,充满了自由与奴隶制之间的对比,同时也充满了对北部人要把他们贬降为奴隶的企图  
的指责。一群密西西比州的白人称,如果他们向西部推进奴隶制的权利受到  
限制,南方人将变成“被北部所奴役的孩子”。南部思想的代言人时常启用陈  
旧的自由定义,认为自由是一种特权,一个“必须挣来的回报,而不是一种无需  
付出代价、可任意向所有人施舍的恩赐”。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乔治·麦克达菲  
则说,白人“是为自由而生的”,而黑人则“完全不配享有……理性的自由”。<sup>①</sup>

1830年后,随着区域争端的逐渐加剧,一些南部的说教者开始放弃使用  
争取白人内部平等的理论来捍卫奴隶制,而转向使用另外一种理论,即认为奴  
隶制是一个有机的等级社会的基础。他们认为,自由不仅仅指一个人不受压  
迫或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中自我更新的能力;自由的基础是对低等人行使的主  
权,这种主权不仅在家庭中存在(北部人对此并无异见,认为家庭中的依附关  
系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也必须在大社会中存在,因为社会中的各种软弱和  
低贱的群体“要求某种形式的主人”来控制。南卡罗来纳州的名声显赫的种植  
园主詹姆士·亨利·哈蒙德彻底抛弃了杰斐逊的普遍天赋人权的说法,把人  
类平等的思想斥之为“荒谬可笑的”说法。许多南部的牧师,为了从宗教的角  
度维护奴隶制的合法性,也声称不平等以及高等人对低等人的统治是人类生  
存的“一条基本法则”。“人类社会由不同级别和秩序组成的”等级制度,南  
卡罗来纳州的一位长老会牧师约翰·B. 阿尔杰说,是“神意安排”的世界的一  
部分。乔治·菲茨休在这方面的结论最为极端,他不仅否定了杰斐逊的理想,  
同时也否定了美国在世界上具有特殊历史使命的观念。对菲茨休来说,南部

---

① Oakes, *Slavery and Freedom*, 72-77; Chilton Williamson, *American Suffrage: From Property to Democracy 1760-1860* (Princeton, 1960), 156; J. Mills Thornton III, *Politics and Power in a Slave Society: Alabama, 1800-1860* (Baton Rouge, 1978), 216; Bradley G. Bo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South: Mississippi 1830-1900* (Baton Rouge, 1995), 96; Richard K. Crallé, ed., *The Works of John C. Calhoun* (6 vols. New York, 1851-56), I, 55; “Diversity of the Races; Its Bearing upon Negro Slavery,” *Southern Quarterly Review*, n.s., 3 (April 1851), 406; William M. Wiecek, *The Sources of Antislavery Constitutionalism in America, 1760-1848* (Ithaca, 1977), 180-81.

退出联邦的行动是比 1776 年的“普通事件”意义更为重大的事件,因为它不仅反抗一种特殊的政府形式,而且也反对洛克、斯密、杰斐逊和潘恩等作者,他们因强调自由基于“人类平等”和“天赋人权”而使现代自由的观念错误百出。菲茨休写道,“普遍自由”远不是人类世界的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种特殊现象,是一个试验,先“在欧洲的一个角落里”实行了“一小会儿”,然后又转移到北美大陆,但却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纵观世界历史,无论对于哪个民族或肤色的人来说,只有奴役状态才是“文明社会”的“普遍的……正常的和自然的”基础。<sup>①</sup>

埃德蒙·伯克曾说过,“无论怎么说,没有人愿意当奴隶。”可以肯定,没有几个非奴隶主的南部白人会相信他们需要有“主人”来管理他们或处于奴役状态会给他们带来比已经享有的自由更大的自由。维护奴隶制的自由定义中同  
65 时包含了关于种族和阶级的臆想。菲茨休本人有时说,所有的劳工如果都是奴隶的话,会过得更好;在其他场合下,他又讲奴隶制只适用于黑人,他们永远只能是“长不大的孩子”,自由对他们是一种“灾难”。但是,无论这些奴隶制卫道士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大多数南部白人愈来愈相信,如同《里士满绅士报》所说,“没有奴隶制,自由将是不可能的。”<sup>②</sup>

不管是来自于愤怒抗议的北部工人,还是南部的奴隶制卫道士,自由工人与奴隶之间的类比对正在出现的由自由市场界定的经济自由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在这个资本主义急速发展的社会,北部工资劳工阶级的批判不可避免地推出“自由劳动”的思想,以此作为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基础,这种思

---

① Drew G. Faust, ed., *The Ideology of Slavery: Proslavery Thought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1830-1860* (Baton Rouge, 1981), 176, 285, 293; Mitchell Snay, *Gospel of Disunion: Religion and Separatism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Chapel Hill, 1997), 68-71; George Fitzhugh, “Revolutions of ‘76 and ‘61 Contrasted,” *De Bow’s Review*, n.s., 4 (July-August 1867), 36-47; George Fitzhugh, *Sociology for the South* (Richmond, 1854), 238-39.

② *The Speeche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and in Westminster Hall* (4 vols. London, 1816), I, 235; William W. Freehling, *The Reintegr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Slavery and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94), 100; Oakes, *Slavery and Freedom*, 80.

想在认可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坚持捍卫工人的法律自由。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由许多不同的思想汇集而成,这种意识形态将帮助美国大众区分和理解奴隶和自由社会之间的差别。面对对于经济进步的信仰和一个迅速增大的工资工人阶级群体,内战前的经济学家力图找到一种办法,来消除两者间的冲突。他们转向亚当·斯密和其他18世纪自由主义的鼓吹者,因为这些人声称,比起工资制来,奴隶制是一种成本要昂贵许多但效力远为低下的获取劳动力的手段,因为奴隶制阻止了工人自身的利益与公共福利挂钩。而在市场经济中,劳工的参与不断刺激日益扩展的社会需求,从而为生产性劳力提供了一种最为有效的工作动力。<sup>①</sup>

在19世纪50年代,新组成的共和党将把亚当·斯密反对奴隶制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自由意味着繁荣,奴隶制则制约经济增长。但在一代人以前,吸引北部劳工权益捍卫者的不是斯密对奴隶制的敌视,而是他的另外一个论点,即将劳动力转换为商品,并不与自由劳工的自立相矛盾。但斯密的美国信徒们在他的这个理论上加上了一层新的意思,目的是继续保持小生产者理想在美国的活力。斯密认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阶级的分化。美国的经济学家则寻求使工资劳动制与美国作为无阶级的乌托邦世界的理想作到和谐一致;他们坚持认为,在美国,勤奋节俭的工人可以省下钱来,购买自己的房屋,最终购置一个农场或一个工场,并由此而逃脱陷入工资劳工的状况,逐渐融入到财产拥有者的共和社会中去。如同辉格党的领袖们所示,手工行业的雇主和制造业主们对这种小产66业主的前景十分中意和欣赏。辉格党人认为,民主党人对阶级冲突的谈论,都是欧洲的舶来品,对美国这样一个由“自我造就的人”组成的社会来说,并不适用,因为在美国,大多数人或者拥有财产,或者有足够现实而合理的理由获取财产。在美国,工资劳工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地位,“受雇佣的劳工算不上是一个阶级。”的确,正像辉格派经济学家卡尔文·克尔顿所写到的,在美国,“高工资”与“自由

<sup>①</sup> Istvan Hont and Michael Ignatieff, "Needs and Justice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 An Introductory Essay," in *Wealth and Virtue,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ed. Istvan Hont and Michael Ignatieff (Cambridge, UK, 1983), 13-15; Scott, *In Pursuit of Happiness*, 87-93.

是等同的”。<sup>①</sup>

作为一个跨区域的政党,辉格党不愿把自由劳动与奴隶制进行对比,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对比对于作为一个成熟的自由劳动意识形态来说十分关键,这个任务却是由杰克逊时代美国的另一股力量——反对奴隶制的运动来完成的。在废奴运动的理论中,捍卫自由劳动,只是一个小的分支;废奴主义总是把道德而不是经济放在首要位置。尽管如此,废奴主义对将北部的劳动与南部奴隶制等同起来,却十分反感。废奴运动的演说家温德尔·菲利普斯说,北部的劳工会觉得“工资奴隶制”的说法“完全不可思议”。就劳工而论,菲利普斯写道,“马萨诸塞的自由概念”意味着不受限制的工资关系和自愿辞职不干的权利。内战后,菲利普斯会作出一个有关北部劳资关系的不同的结论,甚至还接受了劳工改革党拥举他作为该党竞选马萨诸塞州长候选人的提名。但在内战以前,他和其他废奴主义者坚持指出奴隶制独特的邪恶性,从而强烈突出了奴隶制的非法压迫性与北部劳力的情况之间的鲜明对比。废奴主义者同时也广泛传播了相应的观念,如自由是自身拥有的一种财产,一个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处置自己劳动的成果,自由不是对财产的拥有等。“他不是拥有他的自身吗?”一位废奴主义者在解释为什么不能将北部的劳工看成奴隶时这样问道。<sup>②</sup>

对于黑人废奴主义者来说,工资奴隶制的类比尤其具有欺骗性。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逃离奴隶制后,在马萨诸塞的新贝德福德得到了第一份有

---

①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271-86, 303-04; Sean Wilentz, "Many Democracies: On Tocqueville and Jacksonian America," in *Reconsidering Tocqueville's Democracy in "America"*, ed. Abraham S. Eisenstadt (New Brunswick, 1988), 218-19; John Ashworth, "Agrarians" and "Aristocrats": *Party Political Ide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1837-1846* (London, 1983), 68; Calvin Colton, *The Rights of Labor*, 3d ed. (New York, 1847), 9.

② Eric Foner,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the Age of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80), 65; Jonathan A. Gilckstein, "'Poverty Is Not Slavery': American Abolitionists and the Competitive Labor Market," i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Abolitionists*, ed. Lewis Perry and Michael Fellman (Baton Rouge, 1979), 207-11; Phillips in John R. Commons, et al., ed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ociety* (10 vols. Cleveland, 1910-14), VII, 220-21; Phillips in *Liberator*, February 10, 1845, October 1, 1847.

收入的工作,他把工资看成是一种自由的象征:“我成了自己的主人。”对道格拉斯来说,工资所代表的不是是一种压迫的标记,而是公平交易的象征,表示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可以享受到自己劳动的成果。通过在意识形态上对自由劳动和奴隶劳动所作的鲜明对比,废奴运动有力地促使工资关系得以合法化,尽管这种制度也在受到严厉的批判。工资奴隶制,威廉·洛伊德·加里逊写道,是一种“语言的滥用”。“我们看不出给予和接受工资有什么不对。”<sup>①</sup>

尽管工资奴隶制的说法很有影响,但正在出现的自由劳动意识形态对北部工人来说,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事实上,自由劳动思想的另一个根源来自劳工队伍自己具有的一种分裂的精神状态:一方面劳工为工人的独立与平等<sup>67</sup>权利而欢呼;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他们在出卖劳力时被贬低成为了工资制下的奴隶。将无产者纳入政治民主中来的斗争,又同时强化了自身的拥有是自由的基础这一思想。政治权利的获得非常微妙地与将工人描述成工资奴隶的语言形象发生了冲突。<sup>②</sup>

革命后的数十年内,美国经历了戈登·伍德称之为“劳工的价值转换”的过程。从古代到18世纪的传统一直认为,不劳动的自由要远远地优越于劳动的自由,既然文明进步的基础是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的闲情逸致式的创造。尽管另外一种不同的观点可追溯到新教的宗教革命时期,但直到19世纪的美国(南部除外),游手好闲和无所事事而不是体力劳动,才被看作是名声不好的事,而用作骂人的“不生产者”这个词则刚刚开始流行起来。将所有的劳动当成一种有尊严的而不是低贱的事业来看待和尊重——这是19世纪30年代政治语言中的一个标准内容——自然对工人有吸引力。争取一份诚实的生计可以成为独立和自由的一部分内容,仅这一点就将北部的工人与南部的奴隶和

<sup>①</sup>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an American Slave* (Boston, 1845), 113; *Liberator*, March 26, 1847.

<sup>②</sup> Robert J. Steinfeld, "Property and Suffrage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Stanford Law Review*, 41 (January 1989), 335-76; Rowland Berthoff, "Independence and Attachment, Virtue and Interest: From Republican Citizen to Free Enterpriser, 1787-1837," in *Uprooted Americans*, ed. Richard L. Bushman, et al. (Boston, 1979), 115-16.

贵族不生产者区分开来。<sup>①</sup>

的确,在一个经济波动剧烈的时代,一份好的工资收入可能要比经营一个属于自己的但前景难测的商业得到更为真实的独立(19世纪50年代,在有些工业行业中,十分之八的产业遭到失败)。一个奴隶为他们的主人所拥有,一个自由劳工可随时辞去工作,这种对比不单单是喻义上的,它界定了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现实。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的工人说,“进入工厂的每一个人都不认为他将在那里呆上一辈子。”工人流动的频率非常高,对于许多工人来说,现实而具体的流动能力,“流动的自由”是在劳工市场上取得优势的重要方式,也是在一个市场社会中生存和争取可能的进步时采用的一种基本战略。一位德国移民从加利福尼亚写信回家说:“在美国,没有人是老板,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如果不喜欢一个地方,你可以去另外一个地方,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平等的。”<sup>②</sup>

没有任何别的演说和作品能比阿伯拉罕·林肯的语言更为明确地表现出自由劳动意识形态的广泛感召力和更为集中地反映出这种意识形态本身所包含的内在冲突。尽管他生活在一个正在经历市场革命的社会(同时他还在为全国最大的公司之一的伊利诺斯中央铁路公司担任律师),林肯的美国是一个小生产者的世界。1860年的伊利诺斯州,拥有财产的农场主、工匠和小店主的人数68加起来,远远超过挣工资谋生的人,林肯和成千上万的伊利诺斯人的生活表现了北部社会向自食其力的人提供的机会。林肯对类似于乔治·菲茨休这样的奴隶制卫道士的作品深为吃惊,同时又感到极为愤怒。南部对工资奴隶制的批

① Gordon S. Wood,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92), 33, 136-39, 171, 277; *New York Tribune*, November 11, 1857; Shklar, *American Citizenship*, 64-67.

② Zonderman, *Aspirations and Anxieties*, 288; Charles Stephenson, “‘There’s Plenty Waitin’ at the Gates’: Mobility, Opportunity, and the American Worker,” in *Life and Labor: Dimensions of Working-Class History*, ed. Charles Stephenson and Robert Asher (Albany, 1986), 72-91; Jonathan Prude, *The Coming of Industrial Order: Town and Factory Life in Rural Massachusetts, 1810-1860* (New York, 1983), 114-15; Clark, *Roots of Rural Capitalism*, 305-13; Walter D. Kamphoefner, et al., eds., *News From the Land of Freedom: German Immigrants Write Home* (Ithaca, 1991), 393.

判促使林肯下决心捍卫北部的自由社会。他认为,大多数的北部人口,“既不雇人也不为人所雇佣”,而只是“在他们的农场、房屋和工场里,为自己”而工作,“全盘负责自己的产品,既不要求资本的恩惠,也不要求雇工或奴隶的帮助。”拿工资的人一般为年轻的“初出茅庐的人”,他们的受雇完全是“出于自愿”;与南部的批评相反,他们并没有“不可变更地被终生固定在那样的情形之中”。但即便是林肯的雄辩,也无法回避自由劳动思想内部的矛盾。工资劳动制究竟是一个正常的、可以为北部社会秩序接受的部分,还是一个与缺乏真正的自由联系在一起的、暂时性的社会地位呢?①

尽管有这些涵义模糊的地方,到内战前夕,“自由劳动”成为了北部社会自由定义的一个中心内容。“自由劳动”思想的内涵是根据它与它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面——“奴隶劳动”——的并列而决定的。在自由劳动的旗帜下,不同背景和利益的北部人可以集合起来,捍卫他们社会的优越性,即便此刻批评者仍在质问:与奴隶制的对比是否掩盖了北部自由劳工面临的种种强制性劳动形式。但是,无论他们的经济地位有何差别,所有的北部人在一点上是共同的:他们既不是奴隶,也不拥有奴隶。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竭力宣扬和推崇自由劳动的好处的共和党人,成为了北方的政治多数。对于南部那种奴隶制是自由的基础的说法,共和党人以这样的口号予以了回应:“自由是国家的普遍原则”。奴隶制只是一种终将被时间所埋葬的异常状态。美利坚共和国的“普遍原则”是自由。②

---

① Eric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70), 11-39; James A. Stevenson, "Lincoln vs. Douglas Over the Republican Ideal," *American Studies*, 35 (Spring 1994), 66-67; Roy F. Basler, et al., ed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9 vols. New Brunswick, 1953-55), II, 364, 405, III, 462, 477-79.

② Foner, *Free Soil*, 9, 43, 83; George E. Baker, ed., *The Works of William H. Seward* (5 vols. Boston, 1853-84), I, 74.



## 第四章 年轻共和国中自由的界限

### 想像的共同体

到 19 世纪 30 年代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任职时期,“人民”当家作主的名言已经变成美国政治话语中的一句老生常谈。但美国民主的巨大活力以及民主在界定自由和民族性时所处的中心位置,都使界定政治社会的任务变得更加紧迫。随着一些旧的排他性限制——如对选举权的财产和宗教资格的要求——逐渐被取消,其他的限制却得以保留,与此同时,一些新的限制又被加了进来。内战前,富有活力的美国公共生活既具有开放性和扩展性,同时又具有局限性和排斥性:它的局限性如同它的广泛性一样,对美国民主的本质是同等重要的。美国民主有能力将国内贫穷的白人和从海外来的一波又一波的移民纳入其中,但却设置了种种无法逾越的障碍来阻止妇女和非白人男性参与民主。这些群体同时也被排斥在对市场革命的全面参与之外。<sup>①</sup>

如果说自由的话语掩盖了年轻共和国在经济上对奴隶劳工有相当程度的依赖这一事实的话,奴隶制的存在却对 19 世纪美国人的一系列中心思想,如民族性、阶级和自由等,提出了新的并自相矛盾的内容。奴隶制为美国自由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具有排斥性的维度,强化了白人中存在的一种种族主义化的  
71 世界观。奴隶制的存在支持和保证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扩大了许多美国白人的经济机会,但却严重地限制了自由黑人应享有的权利。与此同时,奴隶制与自由的对比却提供了一种政治话语,通过运用这种话语,那些被排除在美

---

<sup>①</sup> Daniel T. Rodgers and Sean Wilentz, “Languages of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Language, History, and Class*, ed. Penelope J. Corfield (Oxford, 1991), 254; Robert H. Wiebe, *Self-Rule: A 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n Democracy* (Chicago, 1995), 110.



废奴主义者将费城的旧国会钟采用来作为他们事业的象征品,并将其重新命名为自由钟。它最终成为了美国最受尊崇的自由象征物之一。(Massachusetts Anti-Slavery Fair, *The Liberty Bell* [Boston, 1839])

国自由的界限之外的群体能够对他们遭排斥的现实提出挑战,并通过这种挑战来转化美国自由本身的意义。

如果自由是一种普遍的人权,那么,这种信仰如何解释南部的黑人没有自由、北部的黑人享受不到自由人的权利、妇女不能参与政治和被剥夺了自由劳动的机会这种种现实呢?随着民主的胜利,对于民主排他性的理论解释也开始从经济依附转向到自然能力的缺乏方面。但自然本身划定的界限并不能作为一种排斥的理由。当然,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曾反问道的:“对那些掌握了统治权的人来说,世界上的所有统治不都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吗?”尽管如此,穆勒在他的传世之作《论自由》(1859年)中推崇的普遍自由,也只适用于那些智能发育成熟的人类。不成熟的人类则不仅包括了儿童,而且也包括了所有那些还不“文明”的“种族”,因为这些人没有具备足够的成为民主社会公民所必需的素质。在美国,性别与种族也同样被广泛地认为是天赋自然等级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妇女当初是怎么为男人所征服并处于她们今天在上世界上所处的位置的?”《纽约号角报》在1852年问道,“这是因为她的本质和她的性别所致;如同黑人不论在现在,还是将来,直至世界末日都将比白种人低贱,并因此注定要为白人所统治。”极为矛盾的是,男性白人的自由是一个开放的个人转变和发展的过程,允许每个人充分发展自身内部拥有的所有潜力,而对公民资格、种族和性别的讨论,却是以存在主义为前提的,认为非白人和妇女的特性与能力是天生不变的。<sup>①</sup>

因此,人们通常描述的基于“所有男性白人的选举权”之上的美国民主,对于那些享有美国自由的人来说,并不矛盾。除了新泽西在1776至1807年间有过一次堂吉诃德式的例外之外,美国各州的妇女,无论婚否或是否拥有财产,都没有得享选举权。出席弗吉尼亚州1829年州制宪大会的一位代表说,

<sup>①</sup> John Stuart and Harriet Taylor Mill, *Essays on Sex Equality*, ed. Alice S. Rossi (Chicago, 1970), 137; Richard Bellamy, *Liberalism and Modern Society: A Historical Argument* (University Park, 1992), 25-28; *New York Herald* in Elizabeth Cady Stanton, Susan B. Anthony and Matilda J. Gage, eds., *History of Women Suffrage* (6 vols. Rochester, 1881-1922), I, 854.

上帝意定要把妇女“变得比男人软弱胆小,从而将她不仅置于男人的控制之下,也在男人的保护之下”。既然选举权的使用必须要包括自主意志和智识能力,自然本身就决定了妇女“没有行使政治权力的能力”。<sup>①</sup>

早期的“共和母亲”的意识形态实际上认为妇女在培养未来公民方面能够扮演一个公共角色,但这种意识形态在 19 世纪却微妙地转换成为一种“家政崇拜”。如果这种转换肯定了妇女在家庭中所扮演的道德领袖的角色,给予了<sup>72</sup>她们在家庭中较大的权利,但却将她们哪怕对公共政治的非直接性的参与减少到了最低的程度。对于男女两性来说,自由都意味着实现她们各自的天生素质和能力。男人生性理智,富于进取精神,不甘屈就;而妇女总是和风细雨,善于无私奉献,但却为情感左右,因此不适合参与公共生活。屈从他人意志,是一个自由的男人不能接受的做法,对于妇女来说,这样的事则应该是顺理成章和理所当然的。政治领域和竞争激烈的市场是为男人保留的专门领域,而家庭则成为妇女的领域,此刻家庭被明显地与公共生活隔绝,并不再具备经济上的重要性。男性可以自由地从一个“领域”流动到另一个“领域”,而妇女则被禁锢在家庭的私人领域之中。<sup>②</sup>

分离的领域是一种意识形态,现实也因此而分叉。到 19 世纪 30 年代时,通过对禁酒运动、废奴运动和其他改革运动的参与,妇女已经在公共事务中建立起了影响。然而,19 世纪的政治世界,作为一个对美国自由的享有具有如此关键意义的领域,却是部分地以局限于家庭的女性领域作为其对立面而构建的。1776 年时,杰斐逊曾提倡“把选举权(或者说,一个公民的权利)赋予”所有在社会中有永久利益的美国人。这种“永久利益”,他接着说,其中包括了

① Joan R. Gunderson, "Independence, Citizenship,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Signs*, 13 (Autumn 1987), 65-66; Merrill D. Peterson, ed., *Democracy, Liberty, and Property: The Stat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of the 1820's* (Indianapolis, 1966), 293-94.

② Christopher Lasch, *Women and the Common Life: Love, Marriage, and Feminism* (New York, 1997), xxiii; Joan C. Williams, "Domesticity as the Dangerous Supplement of Liberalism,"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2 (Winter 1991), 69-88; Paula Baker, "The Domestication of Politics: Wome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Society, 1780-1920,"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9 (June 1984), 628-31.

“拥有家庭”。如果民主的稳固意味着财产的拥有不再是政治身份的条件,那“拥有家庭”则继续作为政治秩序的中心内容得以保留。实际上,一个自由的人仍然部分地被定义为一家之主。婚姻体制也继续规定男女双方的公民地位,增强前者的权力,削弱后者的权力,甚至对那些选择不婚的人的权力也有影响。妇女在政治世界中由男人来代表,这种思想与那种工人将由雇主来代表的思想是同类的,但在后者消失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前者将继续存在。

“分离的领域”对美国自由的思想有极其深刻的含义,因为它严重地阻碍了这个国家平等和民主理想的实现。公共领域中的自由并不意味着等于私人生活领域中的自由。那些“最狂热的激进分子”,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在1840年的日记中写道:“在谈到婚姻的理论时”很容易变成一个保守派。《纽约号角报》宣称,妇女除了从丈夫那里得到“得体的待遇”的权利和法律上允许她控制的财产之外,可以说“没有任何公共社会所关心的……任何权利”。<sup>①</sup>

家庭生活也将妇女从自由劳动的机会中排斥出来。在市场经济中,劳动的涵义越来越多地被表示为产生货币价值的工作,在这样的形势下,很难想像自由劳力的队伍中仅仅只包括了男人。妇女无法自由地竞争工作机会,因为可供她们选择的低收入的工作实在太少。她们也不能当成可以自由签约的工资制工人。根据普通法,结了婚的妇女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签订合约,也不能起诉;直到内战后,各州才允许妇女有控制自己劳动所得的权利。即便如此,丈夫仍保留了要求妻子为其做家务事的一种“业主权利”。<sup>②</sup>

流行的性别观把妇女视为存在于劳力市场之外的群体,但这种性别观与

① Julian Boyd, ed.,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Princeton, 1950-), I, 503-05; Carole Pateman, *The Sexual Contract* (Cambridge, 1988), 3-4; Jeanne Boydston, *Home and Work: Housework, Wages, and the Ideology of Labor in the Early Republic* (New York, 1990), 44; Anne Philips, *Engendering Democracy* (University Park, 1991), 25; Edward W. Emerson and Wallace E. Forbes, eds., *Journals of Ralph Waldo Emerson* (10 vols. Boston, 1909-14), VI, 72. *New York Herald*, April 4, 1858.

② Stephanie McCurry, "The Politics of Yeoman Households in South Carolina," in *Divided Houses: Gender and the Civil War*, ed. Catherine Clinton and Nina Silber (New York, 1992), 31; Alice Kessler-Harris, *A Woman's Wage: Historical Meaning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Lexington, 1990), 8-10, 36; Norma Basch, *In the Eyes of the Law:*

那些曾经当过工资制工人的妇女的生活经历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即便是对中产阶级来说,家政崇拜也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家庭本身也是一个工作场所。为了帮助妇女面对市场革命的真正世界,莉迪亚·玛丽亚·蔡尔德在1829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勤俭的家庭主妇》的畅销书(书中有一章甚至以“如何度过贫困”为题目)。蔡尔德以自己的写作来维持她的家庭生机,但她的日记透露,在某一年的时间内,她同时还缝制了36件衣服,准备了700顿餐食。正是通过家庭佣人——这是19世纪妇女就职人数最多的行业,同时也是一种中产阶级地位的普遍象征——工资劳动制度进入了家庭,尽管主佣关系一般被理解成为一种道德和管束问题,而不是一种劳工问题。<sup>①</sup>

在城市工匠和工资制工人中,妇女的工作经常表现出自立与依附甚至纯粹的生存之间的差别。这些家庭也同样隐藏着实际上由妇女承担的支付工资的工作——尤其那些在工厂外接受最低的生计工资的工人所付出的血汗劳动。至1850年时,波士顿的女缝衣工人数超过该行业男性劳动力的人数。南部和北部的小农场中的妇女工作——包括在田野里干活、生养孩子、打扫卫生、煮饭、洗衣服、缝制衣物和其他物品以备自用或出售等——终年不断。北部早期的工业化实际上强调了妇女工作的重要性。类似于制鞋、制帽和纺织的行业广泛实行一种“厂外分做”的做法,使妇女可以在家工作,挣钱来添补家用,尽管她们同时还继续执行原来的家务责任。与此同时,早期的工厂还为那些来自农村家庭的未成年女子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形

---

*Women, Marriage, and Property in Nineteenth-Century New York* (Ithaca, 1982), 17-26; Marylynn Salmon, *Women and the Law of Property in Early America* (Chapel Hill, 1986), 41-44.

① Amy D. Stanley, "Home Life and the Morality of the Market," in *The Market Revolution in America: Social,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Expressions, 1800-1880*, ed. Melvyn Stokes and Stephen Conway (Charlottesville, 1996), 76-79; Elizabeth Blackmar, *Manhattan for Rent, 1789-1850* (Ithaca, 1989), 112-21; Carolyn L. Karcher, *The First Woman in the Republic: A Cultural Biography of Lydia Maria Child* (Durham, NC, 1994), 127-28; Reva B. Siegel, "Home as Work: The First Woman's Rights Claims Concerning Wives' Household Labor, 1850-1880," *Yale Law Journal*, 103 (March 1994), 1089-90; Faye E. Dudden, *Serving Women: Household Servic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Middletown, CT, 1983), 1-8, 59.

下,小生产者自夸的独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于妇女工作的结果,不管这种工作是她们在家里所干的那些没有被计算在内的家务事,还是她们在家庭或外面所从事的有工资的劳动。因此,自由劳动表现出一个为所谓“自由”与“奴隶”对比的话语所遮掩的矛盾:某些人的独立是基于另外一些人的依附性劳动之上的。<sup>①</sup>

将工作场所当作家庭以外的世界,这样做等于抹煞了妇女们的实际劳动。

74 在有关自由劳力的讨论中,家庭主妇、家庭佣人和女性厂外工队伍很少被提及,除了在援引她们来说明资本主义的蔓延是如何降低了男人的地位的时候。作为一家之主,男性应该拥有一份“养家工资”,以保证他能养活妻子和儿女,这种思想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时髦和流行的关于社会正义的定义。这种思想在中产阶级地位的美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因为在他们看来,男人有能力来维持一个家庭,使妇女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家庭生活,正是资产阶级地位最具有特别性的特征;这一点,对工人阶级家庭的男人们来说,也是如此。《工人权利倡导者报》说:资本主义硬把妇女从她们“幸福而独立的家庭主妇”的角色中拉下来,强迫她们进入劳力市场,从而破坏了家庭中的自然秩序,也损害了男性家长的权威。为“养家工资”而斗争成为下几代劳工组织和运动的重要动力。事实上,“养家工资”或“男人工资”(这在后来被当成一种荣誉的象征)与“女人工资”(一种表示轻蔑的说法)之间的对比使得这样一种思想更具合法性:即如果工资制工人的劳动得到公平合理的报酬的话,他们所处的位置便是一种合宜的美国男人应占据的地位。<sup>②</sup>

如果将妇女排除在政治和经济自由之外继续保持了一种由来已久的长期

---

① Amy Bridges, *A City in the Republic: Antebellum New York and the Origins of Machine Politics* (New York, 1984), 56-58; Thomas Dublin, "Women and Outwork in a Nine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Town," in *The Countryside in the Age of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 Essay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Rural America*, ed. Steven Hahn and Jonathan Prude (Chapel Hill, 1985), 51-66; Mary H. Blewett, *Men, Women, and Work, Class, Gender, and Protest in the New England Shoe Industry, 1780-1910* (Urbana, 1988), 45-61; Boydston, *Home and Work*, 40, 59, 76-93; McCurry, "Politics," 28, 37.

② Boydston, *Home and Work*, 47-55; Kessler-Harris, *A Woman's Wage*, 3-10, 36-39; Basch, *In the Eyes of the Law*, 125; Martha May, "Bread Before Roses: American

实践,民主与种族间的相互认同便标志着一种新的转折。尽管美国人的话语愈来愈多地强调平等,革命时期的一些短暂存在过的思想却逐渐生长成为一个发育完全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这个过程是经“科学”的支持而完成的。作为对美国国籍范围的限制,“种族”概念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一位参加1857年俄勒冈州制宪大会的代表说,黑人“生来就奴性十足”;这样的思想当时为报纸、平版印刷品以及类似由白人扮黑人的滑稽戏团这样的大众娱乐业广为传播。在革命时期,只有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明确地将选举权限制在白人范围内,尽管在其他地方,地方习俗也给自由黑人使用投票权制造了不少障碍。直到1800年,没有一个北部州以种族为理由来限制公民的选举权。但那年以后加入联邦的各州,除缅因外,无一例外地将选举权限制在白人公民范围之内。在纽约和宾夕法尼亚这样的州内,自由黑人的投票权不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就是被彻底地被取消了。1821年,同一届纽约州制宪大会取消了对白人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但却把对黑人选民的财产资格提高到每人250美元,这个数额超出了该州几乎所有黑人居民的经济能力。16年后,尽管住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黑人,已经组成了一个政治上敢言、经济上成功的社区,但该州却彻底取消了黑人的选举权。到1860年时,只有在五个新英格兰州,黑人才能与白人在同等的条件下行使选举权。<sup>①</sup>

尽管有种族不平等现象存在,许多革命时期的白人仍把黑人视为“黑色的北方佬”,认为他们应至少享有一些公民的和作为政治社会未来成员的权利。但到了19世纪,随着南部各州不断紧缩法律,致使解放奴隶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随着北部的黑人在政治上被剥夺了权利,在社会生活中受到隔离,在经

---

Workingmen, Labor Unions and the Family Wage,” in *Women, Work and Protest: A Century of U.S. Women's Labor History*, ed. Ruth Milkman (Boston, 1985), 3-7.

① Rowland Berthoff, “Conventional Mentality: Free Blacks, Women, and Business Corporations as Unequal Persons, 1820-1870,” *Journals of American History*, 76 (December 1989), 760-73; Robert J. Dinkin, *Voting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 A Study of Elections in the Original Thirteen States, 1776-1789* (Westport, 1982), 41-42; Ira Berlin, *Slaves Without Masters: The Free Negro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New York, 1974), 7, 91; Leon F. Litwack, *North of Slavery: The Negro in the Free States 1790-1860* (Chicago, 1961), 74-93.



济上倍受歧视,这一切使得政治社会的界限变得更加难以突破和逾越。到1837年,一位出席宾夕法尼亚州制宪大会的代表可以公然宣称,美国是“一个白人的政治社会”。黑人是外来者,不是美国人,是“我们中间的侵入者”,明尼苏达的一位政治领袖这样说道。随着围绕奴隶制问题的争论日益激化,美国政治语言中充满了种族排斥的话语。这种话语甚至在内战前夕,也为联邦最高法院所采用。在古代罗马,奴隶解放后,可获得自由和公民身份。但在美国,根据首席大法官罗杰·B. 坦尼1857年的司各特案判决,黑人不能成为公民,也不能享有白人生来就享有的一切权利。坦尼认为,美国人民构成一个仅限于白人的“政治大家庭”。对于来自不同祖先的、缺乏自由的历史传统的黑人来说,他们永远不能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部分。事实上,种族取代了阶级,成为划分那些有权或无权享有政治自由的美国男性的界限。<sup>①</sup>

对自由劳动的推崇,虽然是北部社会最突出的特征,但却没有把北部的非裔美国人包括在内。从本质上讲,自由劳动的思想基于一种普遍意义的理论之上。从本性上讲,人对奖励机制要比对强迫机制的反应更为积极主动,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经济进步中自由劳动优于奴隶劳动的原因所在。但是,如同政治民主一样,自由劳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依据对一些人的排斥来界定的,而这种排斥的理由则来自事物的自然秩序。林肯在提到只有那些“具备依附性本性”的人才不会抓紧机会逃离工资制工人的地位去争取拥有财产的独立时,对这些自然界限作了隐约的提示。<sup>②</sup>

谁是“具有依附性本性”从而被剔除在自由劳工队伍以外的人呢?如同在政治民主问题上的情形一样,回答来自于美国社会的历史经验之中。1860年

① Gary Nash, *Forging Freedom: The Formation of Philadelphia's Black Community 1720-1840* (New York, 1988), 172-73; Litwack, *North of Slavery*, 77; Berthoff, "Conventional Mentality," 780-83; Kenneth L. Karst, *Belonging to America: Equal Citizenship and the Constitution* (New Haven, 1989), 44-45; Priscilla Wald, "Terms of Assimilation," in *Cultures of United States Imperialism*, ed. Amy Kaplan and Donald E. Pease (Durham, NC, 1993), 64.

② Roy F. Basler, et al., ed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9 vols. New Brunswick, 1953-55), II, 405, III, 479.

时,将近400万非裔美国人以奴隶的身份在从事劳作;除此之外,无论是自由黑人还是其他有色种族的成员都很难被同化吸收进那种以非常生硬的“自由”或“奴隶”划分的劳工体制中。在这些人中,学徒和契约佣工的形式长期地实施着,而这种半自由劳工形式的中途站,早在19世纪早期已经在白人中逐渐消失了。<sup>①</sup>

西部提供的经济自主模式并不具有普遍性。在那些由白人所想像的(而且也是经常体验到的)保障经济独立的西部土地上,同时也掩藏着印第安人的76契约佣工、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抵债苦工以及在长期劳工契约束缚下的中国移民的工作。这些劳工形式一直实行到19世纪中叶之后;事实上,由于高度市场化和劳动力密集性企业在采矿业、制造业和商业性农业中的发展,这些劳工形式又得以再生。1850年,加利福尼亚州就在墨西哥人和移居该州的白人移民拥有的庄园上,以“学徒制”的形式安置了一万名印第安人。最令人震惊的是,领土的扩张也推动了奴隶制的扩张。杰斐逊曾认为,欧洲人对美国农作物产品的需求将支撑美国经济的生长和小农场主的经济自主化。但对大批量生产的纺织品的要求比起对美国粮食的要求来得更为持久。当南部向西扩张时,正是棉花这种由奴隶种植园生产的作物,而不是由勤劳的自耕农种出的谷物,变成了南部的经济命脉和整个自由帝国的首要出口商品。<sup>②</sup>

如果美国社会中有什么群体可被认作是工资奴隶的话,那就是北部的自由黑人。他们是最后经历契约佣工形式的群体,因为北部解放黑奴的法律通常要求奴隶母亲所生的子女在获得自由前必须要为母亲的主人工作一段时间(在宾夕法尼亚州是28年,远远长于白人契约佣工的例行时期)。直到1830年大规模移民开始后,非裔美国人才构成北部社会中工资无产阶级成员中的一个相当可观的部分。当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在不断鼓吹社会地位的进步

<sup>①</sup> Gary B. Nash and Jean R. Sonderlund, *Freedom by Degrees: Emancipation in Pennsylvania and Its Aftermath* (New York, 1991), 173-77.

<sup>②</sup> Howard Lamar, "From Bondage to Contract: Ethnic Labor in the American West," in *The Countryside*, ed. Hahn and Prude, 293-326; Alexander Saxton, *The Indispensable Enemy: Labor and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Berkeley, 1971), 3-8; Tomás Almaguer, *Racial Fault Lines: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White Supremacy in California* (Berkeley, 1994), 131-41.

时,黑人在现实上却体验着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下降。在北部废除奴隶制时,由于18世纪的工匠普遍拥有奴隶,所以有相当一部分北方黑人成为了技术熟练的手工业工人。尽管许多白人工匠对南部奴隶制持批评态度,但他们却把自由黑人看成是低工资的竞争者,其中大多数人还竭力阻止黑人进入技术行业。“他们只是为他们自己追求平等权利的排头兵,”一位黑人编辑对19世纪30年代纽约市的激进派工匠这样评论道。但白人技术工人的敌视只是众多将黑人限制在劳力市场底层的原因之一。除了又脏又累的力气活儿,白人雇主拒绝雇佣黑人,白人顾客也不愿让黑人伺候他们。其结果是他们的经济地位迅速下降,到19世纪中叶,北部黑人工资工人中的大多数不是从事无技能的工作就是充当家庭佣人。自由黑人也无法利用西部开放的机会——美国自由的一个中心内容——来改进自己的经济地位。联邦法禁止他们得到公共土地,77 四个州——印第安纳、伊利诺斯、衣阿华和俄勒冈——则完全禁止他们进入。争取经济独立的目标,对自由黑人来说与对白种美国人一样具有一样诱惑力。但由于这个目标是如此难以想像地遥不可及,对绝大部分黑人来说,他们的一生将永远只能是处于经济从属的地位。<sup>①</sup>

当一个国家在其经济发展和领土扩张的过程中,需要重新划分属于一个非白人群体(土著印第安人)的土地、剥削另一个非白人群体(黑奴)的劳动和兼并另一个由非白人(墨西哥人)组成的国家的一大部分领土时,这个国家的民族性和自由不可避免地要获得强有力的种族性特征。在19世纪40年代,当美国从墨西哥夺得大片土地时,天定命运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达到了顶峰,领土扩张被看作是“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天生优越的证明(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概念基本上是依它的对立面——黑人、印第安人、拉丁语裔人、天主教徒等——而界定的)。“种族”,《民主评论》宣称道,是“所有国家的历史以及所有

---

① Nash and Sonderlund, *Freedom by Degrees*, 173-77; Gary B. Nash, *Forging Freedom: The Formation of Philadelphia's Black Community 1720-1840* (Cambridge, MA, 1988), 146; Graham R. Hodges, *New York City Cartmen, 1667-1850* (New York, 1986), 158-59; Leonard P. Curry, *The Free Black in Urban America 1800-1850* (Chicago, 1981), 260; Eric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70), 261.

帝国兴盛和衰落的关键”。19世纪的“种族”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涉及肤色、文化、民族血统和宗教等内容。但美国自由与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天生具有的热爱自由的素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观念为报纸杂志、政治论文以及这一时代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写作广为宣扬。在殖民地时期和共和国早期,美国仍有一个小小的天主教群体,但到了1840年代,由于爱尔兰的白薯大饥荒和美墨战争,大批的天主教徒突然变成了美国人口的一部分。结果,长久以来新教对“天主教教皇”敌意又再度回升,重新复活,并强化了自由与美国社会中假定存在着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之间的联系。在类似爱默生的“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天才”这样的讲演中,公共演说家将盎格鲁-撒克逊的优越性、基于种族主义的民族性定义和天定命运论等糅合成一体,将其奉为一种单一的国家使命。<sup>①</sup>

在为新生共和国提供精神支柱的过程中,沃尔特·H. 普雷斯科特、弗朗西斯·帕克曼和乔治·班克罗夫特等社会地位很高的学者创造了一套爱国主义的历史叙事,其中没有给予印第安部落、黑人或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西班牙和法国传统的文化以任何位置。在他们对于美国自由的长篇叙述中,美国自由的种子,根植于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之中,在美国革命和西进运动中生长开花。1845年对得克萨斯的兼并以及随后不久对墨西哥大部的征服,变成了一种文明、进步和自由战胜天主教会的专断和“杂交种族们”那种天生的无能的胜利。既然领土扩张意味着“扩展自由的地域”,那些阻挡美国扩张的人——欧洲强权、土著印第安人、墨西哥人——统统被定义为自由的障碍。(这种将美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的解放等同起来、将反对美国的人与对自由的仇恨等同起来的话语,直到今天,一直渗透在美国的政治术语之中,时常令其他国家感到困惑或厌烦。)<sup>②</sup>

① *Democratic Review*, 18 (June 1846), 434; Reginald 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Racial Anglo-Saxonism* (Cambridge, MA, 1981), 1-4, 146-53; Anita H. Goldman, *From Emerson to King: Democracy, Race, and the Politics of Protest* (New York, 1997), 131-32.

② Joyce Appleby, et al.,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1994), 104-12; Dorothy Ross, "Grand Narrative in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From Romance to

在整个 19 世纪,西进扩张不可避免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新获取的领土上的居民是否可以被吸纳入美国人民之中,是否能够得以享受美国自由的恩惠?在大多数情形下,欧洲人后裔的居民——法兰西人、西班牙人、俄罗斯人——被允许成为美国公民。杰斐逊和他那一代人曾希望,印第安人能够最终抛弃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学会定居式的农业耕作,皈依基督教,从而被同化为美国人。这种期望从来没有彻底消失过,但彻罗基部落的经验表明,印第安人的惟一命运是被排除在(美国公民)之外,尽管彻罗基人几乎成为了标准的共和国人民(他们采用了一部成文宪法,从事农业生产,拥有奴隶,而且按照美国传统,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到法院打官司)。虽然它们顽强地予以抵抗,但在 19 世纪 30 年代,彻罗基和其他“文明化了的部落”被从东南部强行迁移。当佐治亚州企图将自己的司法权扩及到彻罗基人的土地上并夺走了后者大片土地时,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对印第安人的特殊地位作了定义。但他最终也只是把印第安人描述成为受联邦政府保护的“被监护者”,需要父亲般的重视和保护。但法律上讲,印第安人缺乏公民的地位,最高法院不能保护它们的自然权利和条约权利。事实上,1831 的彻罗基部落诉佐治亚案判决接受了在美国存在的“自由的偶然性”,即自由依据群体成员资格而定。<sup>①</sup>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部非白人的权利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某一外国势力从前赋予这些人的权利以及这个外国势力是否坚持要求美国政府对这些先前赋予的权利予以继续的承认。1803 年将路易斯安那转让给美国的条约承诺,所有自由的居民都将享有“公民的权利、特权和豁免权”。尽管美国的统治造成了路易斯安那州自由黑人地位的直线下降,但他们能够继续享有那些生

---

Uncertaint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0 (June 1995), 652; Thomas Hietala, *Manifest Design: Anxious Aggrandizement in Late Jacksonian America* (Ithaca, 1985), 164-65; Major L. Wilson, *Space, Time, and Freedom: The Quest for Nationality and the Irrepressible Conflict 1815-1861* (Westport, 1974), 32.

① Daniel W. Howe,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American Whigs* (Chicago, 1979), 38-42; 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190; Priscilla Wald, *Constituting Americans: Cultural Anxiety and Narrative Form* (Durham, NC, 1995), 24-39.

活在美国其他地方的黑人从未听说过的特权——比如说,组成民兵的权利——这是西班牙和法国人的统治留下来的遗产之一。1848年的瓜达卢普—希达尔戈条约允许那些居住在被美国兼并的领土上的墨西哥人享有美国公民的“所有权利”,这一条是为了保护加利福尼亚的大土地主的财产而设计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的例子说明种族划分界限有时可以变得非常地难以确定,而且会为地方的情势所影响。当加利福尼亚在1850年加入联邦后,它却剥夺了所有非白人公民的选举权。与黑人、印第安人和亚洲人不同的是,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许多墨西哥人自称是西班牙人的后裔,或者他们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爱尔兰移民通婚,所以,他们被认作是白人。而新墨西哥的人口却被认为“太墨西哥化”(也就是说,太印第安人化了)而不配享有民主的自治政府,因此,新墨西哥的州地位要推迟到1912年才正式予以确立,尽管它早就满足了加入联邦所必须拥有的人口总数的要求。<sup>①</sup>

尽管对于种族的关注给美国的“想像的共同体”划定了许多排斥性更强的维度,但这样做却在由英国和不同的欧洲血统的人组成的自由人口中促成了一种民族认同感的生长和牢固化。在1830年以前,海外移民对美国人口增长的贡献微不足道。但在那年至1860年间,将近500万人(比1790年全国人口总数还多)进入了美国,其中大部分来自英国和爱尔兰。从英国来的移民不需费什么周折便为美国生活所接纳,但爱尔兰人却面临了相当大的敌意。土生居民保护主义者认为爱尔兰人明显不懂美国自由的概念,笃信和屈从罗马天主教,构成了对美国民主体制的一种威胁。那些用来形容黑人的歧视模式也大量地被用来形容爱尔兰人,说他们像孩子般的不成熟、好逸恶劳、爱感情用事等,总之,他们不配享有共和自由。尽管现实生活中在求职、住房和教育方面对爱尔兰人的歧视甚为严重,但令人吃惊的是,几乎没有人提出要禁止爱尔兰

---

<sup>①</sup> Berlin, *Slaves Without Masters*, 117-20; Ronald Takaki, *A Different Mirror: A History of Multicultural America* (Boston, 1993), 177-80; Almaguer, *Racial Fault Lines*, 4-9; Robert W. Larson, *New Mexico's Quest for Statehood 1846-1912* (Albuquerque, 1968), 124-28; Roger Daniels, *Coming to America: A History of Im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1990), 308.

兰人移民进入政治社会的范围。大量的爱尔兰人是在男性白人选举已经常规化后到达美国的,他们因此非常幸运地自动得到了政治自由权。即便新英格兰各州竭力寻求减少移民投票权力影响的措施(其中最为极端的是马萨诸塞州 1859 年的规定,要求移民在归化后需等待两年的时间,才能行使投票权),但急需劳动力的西部各州却在白人移民还没有变成公民之前就允许他们参加投票。当投票权与对自由的理解有一种本质上的必然联系时,如何评论和强调这样一个事实的重要性都不为过;那就是,白人男性移民在他们启程来美国的那一刻起就能参加选举,而黑人却不能,尽管他们的祖先在这个国家生活了数世纪之久。(还有印第安人也不能参加选举,尽管他们在这里生活的时间更为长久。)<sup>①</sup>

### 围绕自由界限的斗争

因为自由语言在美国的传播和运用是如此地普遍,所以那些被美国自由排斥在外的人要利用这种语言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样的做法实在不值得  
80 大惊小怪。人们通常认为,非白人和妇女提出的参与民主政治、拥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和拥有自由劳动的权利等要求,只会扩展自由的界限,而不会改变自由的定义。然而,由于种族和性别是美国人理解和体验自由中的组成要素,重新界定自由的范围,不可避免地要重新考虑自由的内容。如果废奴运动和女权运动所用的语言是纯粹的美国式语言,那它们就是在力图使用这种语言来转换美国自由的内容。

性别不应该成为限定经济自由的理由,要认识这一点,无需参加任何女权运动的组织。妇女在家庭以外的地方工作这一事实,本身就对当时流行的性别观念提出了挑战。杰克逊时代的女工就使用了男性工会组织者最常用的自

---

①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2 vols. Washington, DC, 1975), 1, 106; Almaguer, *Racial Fault Lines*, 11; Judith N. Shklar, *American Citizenship: The Quest for Inclusion* (Cambridge, MA, 1991), 3-4; Foner, *Free Soil*, 250-53.

由语言。“平等权利应被赋予所有的人，”一群罢工的女缝鞋工人宣称说，“无论是较弱的性别还是较强的性别。”一些女工(尤其是那些未婚的)也对所谓男性家庭工资的概念提出了挑战，她们认为，妇女同样有权要求从她们的劳动中得到“一份可观的收入”。<sup>①</sup>

虽然这一时代的大多数美国妇女并不怀疑她们的首要职责是照顾她们的家庭，但并非所有的妇女都认为，挣一份生计工资与坚持妇女的尊严是相冲突的。如果黑人把工资劳动制看作是优于奴隶制的一种进步，许多19世纪的妇女也把为工资而工作看成是一种逃离家庭中的家长统治制和经济依附地位的机会。哈里雅特·汉森·鲁宾逊在后来回忆她在洛厄尔纺织厂的生活时说，离家外出工作，给予了妇女一种自立的机会；她们在生活中第一次“可以挣钱，随心所欲地花钱……在这个国家里，妇女的劳动第一次具有了钱的价值。”早期的女权运动坚决反对家庭意识形态竭力鼓吹的所谓“闲适”家庭主妇的形象，不断要求给予妇女平等地进入劳力市场的机会。从苏珊·B. 安东尼到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一批19世纪的女权主义者都指出，那些被禁闭在家里、得不到挣取收入的机会、在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的妇女对社会做不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波林·戴维斯在1853年写道，妇女为了把自己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必须走出去工作。”<sup>②</sup>

早期女权主义者声称，无论婚否，妇女都应享有自治和一系列个人选择的权利以及实现自我的机会，因为这些都是自由的基本内容。弗朗西丝·赖特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成为第一位在公共演讲中讨论政治题目的女性，她曾宣称说，“在扩展了的自由的羽翼下”，妇女将能够如同男人那样，尽情而完全地发展

① Mary H. Blewett, *Men, Women, and Work: Class, Gender, and Protest in the New England Shoe Industry, 1780-1910* (Urbana, 1988), 36-39, 123-40.

② Kessler-Harris, *A Woman's Wage*, 27-28; Harriet H. Robinson, *Loom and Spindle, or Life Among the Early Mill Girls* (New York, 1898), 69; Ellen C. DuBois, "Outgrowing the Compact of the Fathers: Equal Rights, Woman Suffrage,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1820-1878,"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4 (December 1987), 847; Davis in Jean Matthews, "Race, Sex, and the Dimensions of Liberty in Antebellum America,"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6 (Fall 1986), 282.



81 她们的才能。20年后,玛格丽特·富勒写道:妇女有着与男人同样的权利“去自由地,不受阻碍地生活”。伊莉莎白·卡迪·斯坦顿在她漫长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坚持认为,妇女与男人一样是“她自己命运的仲裁者”,她必须依靠自己内在的资源来实现自我和“全面发展自身的能力”。在她1892年的名为“自我的孤独”的演讲中,斯坦顿(她曾生育过七个子女)描绘了一个由主权个人组成的生活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景象:每个人都“如同居住在孤岛上的……鲁宾逊·克鲁索”,而“母亲、妻子、姐妹、女儿”的角色仅仅成为“生活中偶然存在的关系而已”。斯坦顿的演说呼吁,美国自由必须完全彻底地把妇女包括进去。她的要求预示了将在20世纪兴起的、强调自我实现和发挥的女权主义思想。

到19世纪40年代,女权倡导者认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没有选举权,争取自由是不可能的。于是,她们把得到“自由公民的主权”的要求作为了妇女运动的中心内容。这个要求的理由不仅简单,而且是不可拒绝的:如莉迪娅·玛丽亚·蔡尔德所说,“要么我们的政府理论是虚假的,要么我们妇女就该拥有选举权。”妇女从未接受过她们在法律上所处的次等地位,次等公民的地位是强加于她们头上的。如同斯坦顿在1848年塞尼卡·福尔斯大会上——这是第一次要求给予妇女平等政治权利的公开会议——所说,“只有选举权才能使妇女获得与男人同等的自由。”<sup>①</sup>

因此,女权主义是19世纪的市场、个人主义和民主原则的延伸,用弗朗西丝·D. 盖奇的话来说,女权主义要求妇女能够享有“那些每个‘自由的白人公民’所享有的上帝赋予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但女权主义的意义远不止如此。在包括家庭在内的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中,斯坦顿说,“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尽管女权运动要求使用当时流行的自由观念来争取妇女的权利,它实

<sup>①</sup> *Course of Popular Lectures as Delivered by Frances Wright* (New York, 1829), 52-53; Anne C. Rose, *Transcendentalism as a Social Movement, 1830-1850* (New Haven, 1981), 59-60; Stanton, *History of Woman Suffrage*, 189-90; Lydia Maria Child to Charles Sumner, July 9, 1872, Charles Sumner Paper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oceedings of the Woman's Rights Convention, Held at the Broadway Tabernacle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New York, 1853), 29; Ellen C. DuBois, ed., *Elizabeth Cady Stanton Susan B. Anthony; Correspondence, Writings, Speeches* (New York, 1981), 31.

际上对这些自由观的许多原则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如独立自主和理性思维的能力是男性的特征,世界自动地划分成公共和私人领域,以及家庭内部的关系不应由正义和自由的原则来审查等等。“妇女的权利,”1859年在波士顿举行的一个集会宣称道,并不意味着取消“神圣”的家庭体制,但要求给予“妇女在家庭中的自由和平等权利”。但这样的要求预示着自由本身定义必须作出根本的改变。<sup>①</sup>

自由与奴隶制的对立对早期女权主义者的政治语言有极大的影响。如同北部的工人借用“工资奴隶制”的比喻揭露了市场自由中隐藏的不平等现实,“性别奴隶制”的概念给予了妇女运动强大的力量,使其发展出一整套全面批判男性统治和女性受压迫现象的思想。尽管当时流行的观念把政治视为男人的天下,但北部妇女却充当起废奴运动马前卒的角色。成千上万的妇女通过散发请愿信、募捐以及其他方式来推进这项运动。这些活动自然使其中的一些人联想到她们自己生活中受到的种种限制。“在为解脱‘黑奴’手脚的镣铐的斗争中,”废奴主义演说家阿比·凯利写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也处在锁链之中。”女权主义者把女奴也纳入了妇女的行列之中,这样做使她们能够将社会差别重新定义为一种性别不平等。将妇女地位与奴隶制进行类比,使女权主义者认识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解放妇女,但解放不仅包括了在政治上获得选举权,而且也包括获得与男人同样的教育和经济机会、放宽离婚法的限制以及改变现有的对家庭体制等要求。乔治·埃利奥特在1866年出版的《激进者费利克斯·霍尔特》中写道,“世上不存在任何不是由更广大的公共生活所决定的私生活。”内战前的女权主义者也指出,婚姻法的存在,本身就使所谓家庭是独立于公共权威之外的“私有性”体制的说法显得荒唐可笑。当露西·斯通和亨利·布莱克威尔结婚时,他们决定拒

<sup>①</sup> Stanton, *History of Woman Suffrage*, I, 842-43; DuBois, *Stanton Anthony*, 34; Joan Hoff, *Law, Gender, and Injustice* (New York, 1991), 18, 36; Nancy J. Hirschmann, "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Freedom," *Political Theory*, 24 (February 1996), 46-48, 61-63; *Report of the Woman's Rights Meeting, at Mercantile Hall* (Boston, 1859), 8.

绝接受纽约州的有关（婚姻）法律，因为这些法律给予了丈夫“没有人应享有的……法律权利”。<sup>①</sup>

女权主义者并不是婚姻与奴隶制类比的发明者。这个类比是由玛丽·沃斯托克拉夫特在18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而且一直在弗朗西丝·赖特的写作和演说中占据显著的位置。但随着围绕人身奴隶制的辩论不断加剧，自由妇女与黑奴的类比也就迅速地变得更为引人注目。甚至对女权运动持强烈反对态度的《戈蒂的妇女必读》的编辑塞拉·J. 海尔也谈到普通法如何“把妇女降低到了一个奴隶的状态”。欧内斯廷·罗斯则指出，“女人的一生中，从摇篮到坟墓，都是一个奴隶，主人们——父亲、监护人、丈夫——把她像一件财产一样，从一个人手中传递给另外一个人。”南部的思想家也沿用同样的推论，但却是为了达到捍卫奴隶制这个极为不同的目的。乔治·非茨休写道，奴隶制和婚姻是相同的体制，都是根据人在争取自由时所拥有的自然能力的差别将那些缺乏自由能力的人置于服从的地位的制度。“婚姻，”他宣称道，“与奴隶制太相似了，只是没有后者注定的结局而已。”<sup>②</sup>

但在人身奴隶制与婚姻之间的确存在着真正的和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婚姻是“自愿的”结合，但普通法把妻子降低至她丈夫的附属品，她不能享有自己劳动的成果或不能拥有她的自身——而这两者正是自由的核心内容。杰斐逊认为奴隶制每日都在给人灌输一种控制他人的精神；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把家庭称作“一个专制的学校”。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对此的批评更为激烈，坚持认为只有在废除了私有财产的时候，性别之间的关系才可能得到改变。

① John L. Brooke, *The Heart of the Commonwealth: Socie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Worcester County, Massachusetts, 1713-1861* (New York, 1989), 360; Blanche G. Hersh, *The Slavery of Sex: Feminist-Abolitionists in America* (Urbana, 1978), 9, 34, 89-90, 190; George Eliot, *Felix Holt, The Radical*, ed. Fred C. Thomson (Oxford, 1980), 45; Frances E. Olson, "The Family and the Market: A Study of Ideology and Legal Reform," *Harvard Law Review*, 96 (May 1983), 1511.

② Clare Midgley, *Woman Against Slavery: The British Campaigns 1780-1870* (London, 1992), 27; Basch, *In the Eyes of the Law*, 120, 162; Stephanie McCurry, "The Two Faces of Republicanism: Gender and Proslavery Politics in Antebellum South Carolina,"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8 (March 1992), 1251-55.

在“新和谐”公社，罗伯特·欧文许诺说，妇女将不再受到她们丈夫的“奴役”，一切有关性别之间的内在差别的所有“虚假概念”都将被抛弃。从奥奈达的“复杂婚姻”到摩门教的一夫多妻制，到震颤派教徒的独身生活，到摩登时代的“自由恋爱”，这一时代的公社制实验，为了回应传统家庭结构中存在的紧张对立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来创造一些不同的方式，使妇女获得解放。（但在这些公社中，妇女所处的真正环境远不如这样理想。一般来说，男人继续执掌有权的位置，尽管妇女被给予了享有平等的崇高承诺，但煮饭、带孩子和做其他家庭杂务仍旧是妇女的责任。）<sup>①</sup>

“个人自由”，一份在19世纪20年代极有影响的政治论文宣称说：是自由的核心：“更为严格地讲，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能比我们个人更应定义为我们自己的财产。”女权的倡导者赋予了这种流行的拥有自身的自由思想一种全新的意义。美国废奴协会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恢复奴隶“拥有自己身体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废奴主义宣传品中对女奴所遭受的身体受到侵犯的强调，为拥有自身的思想提供了一种极为具体的现实，这个现实也可以直截了当地用来描述自由妇女所处的境地。处理家庭关系的法律总是预先假定在性关系上丈夫对他的妻子拥有享用权，而地方法院在涉及女性身体受到侵犯和惩罚的案件中，只要对妇女身体的伤害不是“太过分”或“太不能容忍”的话，一般不情愿去加以干涉。当女权主义者提出，妇女应该享有规划她们自己性活动和生育活动的权利，而且这些权利应该受到政府的保护，使之免受丈夫暴力的伤害，这样的思想从根本上向那种认为对正义、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要求不能用于家庭生活的观念提出了挑战。既是废奴主义者又是女权主义者、同时也是后来

---

<sup>①</sup> Basch, *In the Eyes of the Law*, 162; Amy D. Stanley, "Conjugal Bonds and Wage Labor: Rights of Contract in the Age of Emancipation," *Journals of American History*, 75 (September 1988), 477-82; Elizabeth B. Clark, "Matrimonial Bonds, Slavery and Divorc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Law and History Review*, 8 (Spring 1990), 34-35, 48-49; Mill and Mill, *Essays*, 174; Carol A. Kolmerten, *Women in Utopia: The Ideology of Gender in American Owenite Communities* (Bloomington, 1990), 8-11, 79-94; Raymond L. Muncy, *Sex and Marriage in Utopian Communities* (Bloomington, 1973), 204; Jeanette C. and Robert H. Lauer, "Sex Roles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Utopian Societies," *Communal Societies*, 3 (Fall 1983), 17-25.

在20世纪里被称为“计划生育”的提倡者的亨利·C. 赖特写道, 当一个女人被迫屈从丈夫的意志时, 她没有享受到自由; 她是一个“活着的和彻底的奴隶”。当然, 没有多少美国人, 无论男女, 愿意在公共场合下讨论这类问题。但出生率的骤然下跌(在19世纪时期, 育龄白人妇女的生育率从每千人生育278人下降至130人)说明许多妇女在她们最为隐私的关系中运用着“人身自由”的权利。<sup>①</sup>

如同工资奴隶制的比喻, 把自由妇女描绘成生活在“法律化的奴隶制中”的说法同时暴露和掩藏了社会现实。正如许多废奴主义者否定了工资奴隶制的比喻, 一些黑人妇女, 如塞拉·帕克·雷蒙德, 也拒绝接受婚姻与奴隶制之间的类比, 因为她们认为, 一个稳定的家庭对那些处于奴役中的人具有异同寻常的意义。自由妇女当然应享有更多的权利, 雷蒙特说, 但作为奴隶制的“最深重的受害者”的女奴更迫切地需要“白人所享受到的……保护”。事实上, 许多废奴主义者也承认, 奴隶制造成的最严重的伤害在于它彻底毁灭了男性的权威和完全阻止了妇女履行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责任。<sup>②</sup>

许多女权主义深知, 斯坦顿或斯通那样的高度个人主义的生活, 与大多数妇女实际经历的家庭生活相去甚远, 而斯坦顿和斯通的女权理论也没有考虑到伴随婚姻和为人父母而来的感情依附因素。即便那些认识到家庭中男人与

① Goldman, *From Emerson to King*, 128; William H. and Jane H. Pease, eds., *The Antislavery Argument* (Indianapolis, 1965), 68; Linda K. Kerber, “A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Be Treated Like American Ladies: Women and the Obligations of Citizenship,” in *U.S. History as Women’s History: New Feminist Essays*, ed. Linda K. Kerber, et al. (Chapel Hill, 1995), 22; Reva B. Siegel, “‘The Rule of Love,’ Wife Beating as Prerogative and Privacy,” *Yale Law Journal*, 105 (June 1996), 2118-20; Henry C. Wright, *The Unwelcome Child; or, The Crime of an Undesigned and Undesired Maternity* (Boston, 1858), 86;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Historical Statistics*, 1, 49.

② Myra C. Glenn, *Campaigns Against Corporal Punishment: Prisoners, Sailors, Women, and Children in Antebellum America* (Albany, 1984), 70-71; Remond in Clare Midgley, “Anti-Slavery and Femin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Gender and History*, 5 (Autumn 1993), 352; Remond in C. Peter Ripley, et al., eds., *The Black Abolitionist Papers* (5 vols. Chapel Hill, 1985-93), 1, 23, 445; Kristin Hoganson, “Garrisonian Abolitionists and the Rhetoric of Gender, 1850-1860,” *American Quarterly*, 45 (December 1993), 558-70.

女人的兴趣并不一定完全一致的人,也始终希望并期盼与她们的配偶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许多女权主义者深受 19 世纪 20 和 30 年代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影响,它不仅为个人的拯救带来了希望,也将“同伴式的婚姻”作为基督教家庭最理想的关系模式加以推崇,同时还对妇女天生的道德优势和母亲的直觉感赞赏不已。这些妇女把节欲当成通向性关系中的自决的途径,她们不选择控制生育或更为便利的离婚,因为她们害怕这样做会为男性的性欲提供更大的空间范围。如同今天一样,内战前的女权主义思想中同时存在着对两性平等的要求和对两性之间存在着自然差别的承认。<sup>①</sup>

露西·斯通坚信一个女人必须对她的“身体及其使用”拥有“绝对的权利”,但她也承认,当前的女权运动还不能面对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中的任何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都不一致”。许多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的隐私自由问题太具有爆炸性,所以在内战以前,她们绝少在公共场合提及它。1860 年,全国妇女权利大会针对是否应当修改婚姻法的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平常一贯大胆直言的温德尔·菲利普斯提议,将这场讨论全部从会议的记录中删除。但在女权主义领袖们的私人信函中,这类问题却经常被谈论到。“社会自由,”苏珊·B. 安东尼给斯通写道,“……处于一切(事物)的最底层——在妇女得到它之前,她必须在所有其他的事情中继续充当男人的奴隶。”直到 20 世纪,这种要求将自由延伸到生活中最隐私方面的呼声才最终激起一场群众运动。但这场运动的基础却是在内战前的美国奠定的。<sup>②</sup>

① Elizabeth B. Clark, "Religion, Rights, and Difference in the Early Women's Rights Movements," *Wisconsin Women's Law Journal*, 3 (1987), 29-58; Debra G. Hansen, *Strained Sisterhood: Gender and Class in the Boston Female Anti-Slavery Society* (Amherst, 1993), 143-53; Jean V. Matthews, "Consciousness of Self and Consciousness of Sex in Antebellum Feminism,"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5 (Spring 1993), 62-67; Basch, *In the Eyes of the Law*, 180.

② "Social freedom" in Hersh, *Slavery of Sex*, 66; Luisa Cetti, "The Radicals and the Wrongs of Marriage: The Rutland Free Convention of 1858," in *Making, Unmaking and Remaking America: Popular Ideology Before the Civil War*, ed. Loretta V. Mannucci (Milan, 1986), 94.

如同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也对内战前美国人所理解和体验的自由的关键内容提出了挑战。反对奴隶制运动对重新定义美国自由<sup>85</sup>的贡献既深刻又复杂。与反对奴隶制有关的废奴主义者否定了将北方劳工等同于南方奴隶的说法,不管这种说法出自南部的奴隶制卫道士还是自由州的劳工运动领袖。在说明奴隶制邪恶的独特性时,废奴主义者尤其普及了奴隶制的非法压迫与北部劳工状况之间的对比,同时也广泛传播了与之相关的、由市场革命肯定了的观念,如个人自主不是来自对生产资料的掌握而是对自身的拥有以及享有自己劳动成果的能力。诗人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写道,只有奴隶制“才夺走了拥有自身的权利——而一旦这个根本的权利被夺走,人将不成其为人。”

加里逊派的废奴主义者回避在一个庇护奴隶制的宪法下行使自己的投票权。他们把自由定义为自我主导,并据此把对奴隶制的批判扩大到对包括政府、教会、有时甚至也包括家庭在内的所有具有压迫性的体制的批判。其他的废奴主义者,尤其是那些将废奴运动在19世纪40年代带入到政治领域中的人,却反对这种将奴隶制“等同于”“在现实和本质上与之完全不同的其他关系和体制”的做法。自由事业的目的是解放奴隶,而不是改变北方社会。如果废奴主义者将自己当成那些体制的敌人——而这些包括家庭权威和我们共和政府在内的体制是受到它们的成员深深珍爱和重视的——其结果将是适得其反的。这些政治废奴主义者撇开了许多奴隶制的比喻用法,将关于自由的辩论牢牢地锁定在实际存在的人身奴隶制的问题上。<sup>①</sup>

围绕奴隶制问题的长期斗争给个人自由、政治共同体和美国公民资格所拥有的权利等概念带来了新的内容。最初,国家以镇压的方式来回应反对奴

① Jonathan A. Glickstein, “‘Poverty Is Not Slavery’: American Abolitionists and the Competitive Labor Market,” in *Antislavery Reconsidere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Abolitionists*, ed. Lewis Perry and Michael Fellman (Baton Rouge, 1979), 207-11; Lewis Perry, “The Panorama and the Mills: A Review of ‘The Letters of John Greenleaf Whittier’,” *Civil War History*, 22 (September 1976), 247; Lewis Perry, *Radical Abolitionism: Anarchy and the Government of God in Antislavery Thought* (Ithaca, 1973), 24, 51-59; *The Emancipator*, March 26, 1840.

隶制的事业。在华盛顿,1836年众议院通过了臭名昭著的“钳口律”,禁止国会考虑和讨论由废奴主义者递交的请愿书。安德鲁·杰克逊的邮政总监阿莫斯·肯德尔甚至允许南部从联邦邮件中撤出那些抨击奴隶制的材料。在整个19世纪30年代,北方的暴民骚乱(据估计,大约有100多起)冲击了废奴主义者的集会,并捣毁了他们的印刷设备。1838年,由费城反对奴隶制运动出巨资建造的宾夕法尼亚大厅被暴民们付之一炬,尽管后来有的暴民将一幅乔治·华盛顿的画像拯救出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围绕究竟什么问题刻意被纳入公共讨论的议程的斗争,”学者塞拉·本哈比写道,“本身就是一场争取……自由的斗争。”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美国的公共领域将关于奴隶制的讨论排斥在外。在争取对奴隶制问题进行公开而且不会受报复的辩论的权利的斗争中,废奴主义者把“自由意见”——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请愿的权<sup>86</sup>利——提高到加里逊称之为“自由的福音”的一个中心位置上。这场关于言论自由的斗争同时强化了另外一种认识,即奴隶制不仅对黑人的自由同时也对白种美国人的自由造成了威胁。废奴主义者声称,自由地表达意见应该是一个全国性的标准,不应受制于那些执掌了地方性权力的人的限制。可以说,废奴主义运动使权利法案的生命力重新复苏,成为了美国自由的一个根本的定义,它同时力图找到有效的途径——通过扩展自然法或“更高级”法的理论——将权利法案变成对联邦和州政府同时具有约束力的限制。奴隶制违反了权利法案中的每一条修正案,而通过捍卫权利法案,反对奴隶制运动自称成为了一场保卫“每个自由人的权利”的斗争。<sup>①</sup>

反对奴隶制运动也力图重新使另一种思想重新焕发活力,即自由是一种真正的普遍权利的思想。废奴主义者认为,无论种族有何不同,所有人都是—

<sup>①</sup> Russell B. Nye, *Fettered Freedom: Civil Liberties and the Slavery Controversy 1830-1860* (East Lansing, 1949), 36-65, 98-104; Seyla Benhabib, "Models of Public Space: Hannah Arendt, the Liberal Tradition, and Jurgen Habermas," i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ed. Craig Calhoun (Cambridge, MA, 1992), 79; Karcher, *The First Woman*, 267; Walter M. Merrill, ed., *The Letters of William Lloyd Garrison* (6 vols. Cambridge, MA, 1971-1981), IV, 160; William E. Nelson, *The Roots of American Bureaucracy, 1830-1900* (Cambridge, MA, 1982), 42-50.



个“自由的道德意志遵循者”。他们从18世纪有关自然权利的论述、独立宣言和福音新教的至善教义等文献中引经据典,坚持认为人身自由的权利是内在的、自然的和绝对的,认为这种人身自由先于其他任何形式的自由,包括积累和拥有财富的公民权利以及某个地方的政治社区实施政治自治的权利。奴隶主凌驾于奴隶之上的权力是一种倒退到等级社会和不平等时代的表现,而这些旧传统早已应该为19世纪的美国所唾弃。<sup>①</sup>

奴隶制为美国自由作了一个带有种族限制的定义,但废奴斗争却给这个定义带来了一个对立面,一种对国家性质的纯粹的公民性理解。最先提出美国人民是一个不受种族限制的人民这种思想的人,是废奴主义者,并不是建国之父们,因为他们多少是赞同或允许奴隶制存在的。废奴运动坚持强调奴隶和自由黑人身上所具备的“美国性”(Americanness),这个观点是在莉迪娅·玛丽亚·蔡尔德在1833年出版的极有影响的《为被称为非洲人的那个美国阶级而呼吁》论文中总结而来的。蔡尔德的论文坚持认为,黑人是同胞,不是外国人,他们不再是非洲人,如同白人不再是英国人一样。当时决定公民权利的权威几乎全由州政府掌握,废奴主义者却认为,“出生地”应该用来作为决定谁应为美国人的标准。出生地公民权的思想,后来被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纳入进宪法,是一个与美国生活传统的真正彻底决裂。1832年《新英格兰杂志》宣称说,“我们并不认为,美国对于被奴役和自由的黑人来说,与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是一个同样的国家。”<sup>②</sup>

安杰利娜·格里姆克曾是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奴隶主的女儿,后来成为了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她写道,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是美国社会最重

① Gilbert H. Barnes and Dwight L. Dumond, eds., *Letters of Theodore Dwight Weld, Angelina Grimké, and Sarah Grimké, 1882-1844* (2 vols. New York, 1934), I, 98; Nelson, *Roots*, 42-56.

② Stanley N. Katz, "The Strange Birth and Unlikely History of Constitutional Equalit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5 (December 1988), 753; Lydia Maria Child, *An Appeal in Favor of That Class of Americans Called Africans* (Boston, 1833); Celeste M. Condit and John L. Lucaites, *Crafting Equality: America's Anglo-African Word* (Chicago, 1993), 6, 61, 84-97.

要的“调查……人权情况的学堂”。尽管他们在内部对宪法与奴隶制关系有意见分歧(威廉·洛伊德·加里逊将宪法付之一炬,斥之为一份与魔鬼签定的契约,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则认为宪法并没有从联邦的角度为奴隶制提供保护),废奴主义者发展出了一种不同的、权利取向的宪政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基础是将自由看成是一种普遍性权利。为了寻求一种对所有美国人都应该享有的核心权利进行定义的方式——即自由在具体的法律意义上的内容——废奴主义者创造发明了一种新的概念:不分种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内战前美国司法理论和实践中一个前所未闻的概念。废奴主义者同时对南部奴隶制和遍及全国的将自由黑人锁定在次等公民地位上的种族歧视规定提出了挑战。在内战前,废奴运动为一连串的联邦政府所孤立和打击,这些政府看上去为“奴隶主势力”(这是北方反奴主义者对南部种植园主阶级的称呼)所控制。因此,废奴主义者就借用他们南部敌人的手段,鼓动北部使用州主权理论,宣布联邦逃奴法的无效;而对逃奴法的实施是内战前联邦政府权威最着力的一种运用。但通过传播全国性公民整体和所有美国人应该在权利上平等的思想,废奴主义者发展出一套“自由的词汇”,这种思想将在内战后的美国开花结果。废奴主义者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即全国性政府有可能成为自由的保护者,而不是自由的敌人。<sup>①</sup>

反对奴隶制必须重新定义自由和美国性这两个内容,对这种思想持最坚定的支持态度的是废奴事业中的黑人成员。“那些经历了奴隶制的种种残酷折磨后的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1847年写道,“才是真正会鼓吹和倡导自由的人。”黑人废奴主义者所发展出的一套自己对自由的理解,远远超出大多数同时代的白人对自由的理解。那些真正地经历了奴隶制的人,对维护奴隶制的思想的批判也最为深刻和透彻(道格拉斯把这些理论斥之为“不值一

<sup>①</sup> Larry Ceplair, ed., *The Public Years of Sarah and Angelina Grimké, Selected Writings 1835-1839* (New York, 1989), 194-95; Nelson, *Roots*, 51-52; William M. Wiecek, *The Sources of Antislavery Constitutionalism in America, 1760-1848* (Ithaca, 1977), 248-60; Harold M. Hyman and William M. Wiecek, *Equal Justice Under Law,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1835-1875* (New York, 1982), 490.

驳的胡言乱语”，是一些在奴隶制被废除后人们将羞于记忆的东西）。黑人废奴主义者同时也不放过任何机会，批判那种把美国看成是自由的土地的荒谬说法。事实上，自由黑人的经历正好驳斥了那种把美国与自由的进步联系在一起流行的看法。北方的黑人社区设计出了自己的“自由日历”，把1月1日（1808年的这一天奴隶贸易被宣布为非法）和8月1日（西印度群岛奴隶解放的纪念日）而不是7月4日（在许多地方他们被禁止参加那一天的庆祝活动）作为自由的庆祝日，这种做法是对白种美国人自诩的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的说法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一群费城的黑人废奴主义者宣称说，因为英国在19世纪30年代废除了奴隶制，她变成了一个自由和正义的榜样，而从英国手中“夺回自己的自由”的美国，却仍旧以一个专制国家的姿态而存在。与此同时，黑人废奴主义者还挑战了把自由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天才联系起来的说法。（道格拉斯不无讽刺意味地指出，许多古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自己就是奴隶。）<sup>①</sup>

尽管没有完全摆脱盛行于他们时代的那些种族偏见，白人废奴主义者仍坚持认为，真实的自由意味着公民权利和地位的平等。“只要‘白人’这个词留在马萨诸塞州的法律上，”威廉·洛伊德·加里逊的亲密同事埃德蒙·昆西说：“马萨诸塞州就是一个蓄奴州。”面对重重困难，废奴主义者在北部发动了许多反对种族歧视的法律和政治斗争，但这些斗争只是取得一些偶尔的胜利，

---

① Philip S. Foner, ed.,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Frederick Douglass* (4 vols. New York, 1950-55), I, 191, 281, III, 191; Ripley, et al., eds., *Black Abolitionist Papers*, I, 45, 54; IV, 74, 256-57; Geneviève Fabre, "African American Commemorative Celebratio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History and Memory in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ed. Geneviève Fabre and Robert O'Meally (New York, 1994), 72-87; John R. McKivigan and Jason H. Silverman, "Monarchical Liberty and Republican Slavery: West Indian Emancipation Celebrations in Upstate New York and Canada," *Afro-Americans in New York Life and History*, 10 (January 1986), 10-12; Len Travers, *Celebrating the Fourth: Independence Day and the Rites of Nationalism in the Early Republic* (Amherst, 1997), 143-44; James Forten, et al., *To the Honourable the Senate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monwealth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1832), I; Paul E. Teed, "Racial Nationalism and Its Challengers: Theodore Parker, John Rock, and the Anti-slavery Movement," *Civil War History*, 41 (June 1995), 152-54.

如 1855 年在马萨诸塞州终止了隔离教育的做法。黑人废奴主义者比他们的白人战友则更为坚定；他们提出了平等主义的宪政和不承认种族差异的公民资格的理想。“自由与奴隶制的真正战场，”塞缪尔·科尼什写道：“是对肤色的歧视。”（科尼什 1827 年在纽约市创办了美国的第一份黑人报纸，并为之选择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称：《自由日报》。）黑人废奴主义者也比白人废奴主义者更多地关注自由黑人中存在的普遍贫困状况，并将此看作是奴隶制的后果之一。他们坚持，自由必须要包括经济方面的内容。查理·L·里森认为，作为反对奴隶制斗争的“伟大工作”的一部分，人们必须不仅要废除人身奴隶制，而且也要废除其他形式的奴隶制，正是后者将受压迫的人民世代地锁定在依附和贫困的状态之中。<sup>①</sup>

对于非裔美国人来说，奴隶制与自由的对比没有将自由黑人的历史经历包括在内。在南部，自由黑人与真正的奴隶在一起生活、工作和信教，他们在行动自由、经济机会和到法庭打官司方面受到与奴隶同样的限制；而北部的黑人则处在一种充满不平等的半自由之中。当“自由”这个词后面跟着“黑人”之类的名词时，它便具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涵义。白人对自由的定义部分地受到他们与奴隶制之间的距离的影响。在黑人中，道格拉斯写道：“奴隶与自由人之间的差别并不很大。”自由黑人的经历表明，真正的自由远不只是一个司法意义上的地位定义问题。黑人废奴主义者马丁·德莱尼写道：“如果人民不能成为他们所生活的国家的统治力量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是得不到自由的。”德莱尼认为，黑人在美国永远得不到平等的待遇，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把争取美国黑人自由的目光投向海外的黑人。在经历了“南部的法律奴隶制和北部的社会奴隶制后”，一位离开美国前往利比里亚的黑人移民在启<sup>89</sup>

<sup>①</sup> Foner, ed., *Douglass*, IV, 167-68; J. Morgan Kousser, “‘The Supremacy of Equal Rights’: The Struggle Against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Antebellum Massachusett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82 (Summer 1988), 941-1010; Ripley, et al., eds., *Black Abolitionist Papers*, III, 6, 365-66; Jane H. and William H. Pease, *They Who Would Be Free: Black's Search for Freedom, 1830-1861* (New York, 1974), 3-9; Julia Griffiths, ed., *Autographs for Freedom*, ser 2 (Auburn, 1854), II.

程时写道,他知道他“在这个国家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自由人”。<sup>①</sup>

1850年的逃奴法通过后,黑人移居境外成为一种大规模的运动,有几名北方的黑人逃离到加拿大。逃奴法第一次赋予了联邦政府捉拿逃奴的权力,但对于那些有可能被投入奴隶制中的生为自由人的北方黑人却没有提供任何保护。出生在美国的男人和女人,为了保存自己的自由,不得不逃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寻求避难所,这样的景象显然给在众人熟悉的美国自由的故事中加入了一个极不和谐的声音。事实上,废奴主义者创作了一个不同的自由故事,一种反叙述体,将美国的发展描述成一部倒退的、而不是进步的编年史。道格拉斯宣称说,美国“不配享有伟大或自由的称号”。在他那篇可能是最有影响的演说中,道格拉斯称,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称崇尚自由而实际上每天都在进行着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令人震惊和血腥的实践”的国家中,庆祝7月4日的独立日,对于黑人来说,只是对她的“虚伪”的一种暴露。“这个7月4日,”道格拉斯说,“是你们的,而不是我的。”

但与此同时,道格拉斯又对开国元勋的传统表示了认可。革命给美国留下了一笔“关于正义、自由、繁荣和独立的非常丰富的遗产”,但不幸的是后来的数代人偏离了这个方向。只有废除奴隶制和将独立宣言的“伟大原则”从“狭隘的种族或民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时,美国才能够重新驾驭自己的历史重任。在他的自传性叙事体《我的奴役和我的自由》(1855年)中,道格拉斯创造了一大批新的为美国自由而战的历史英雄,明确地把自己与建国之父们和一批反叛的奴隶,如加布里埃尔,登马克·维西和纳特·特纳等,相提并论。事实上,道格拉斯声称,在他们对自由的渴望中,奴隶们比那些每年庆祝7月4日的美国白人更加忠诚地相信美国的立国原则。<sup>②</sup>

---

① Barbara J. Fields, *Slavery and Freedom on the Middle Ground: Maryland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1985), 30-35; Ripley, et al., eds., *Black Abolitionist Papers*, II, 246; John H. Bracey, Jr., et al., eds., *Black Nationalism in America* (Indianapolis, 1970), 87-90; Berlin, *Slaves Without Masters*, 168, 269-71.

② Foner, ed., *Douglass*, I, 210-211, II, 189-92; Philip S. Foner and George Walker, eds., *Proceedings of the Black State Conventions, 1840-1865* (2 vols. Philadelphia,

程时写道,他知道他“在这个国家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自由人”。<sup>①</sup>

1850年的逃奴法通过后,黑人移居境外成为一种大规模的运动,有几名北方的黑人逃离到加拿大。逃奴法第一次赋予了联邦政府捉拿逃奴的权力,但对于那些有可能被投入奴隶制中的生为自由人的北方黑人却没有提供任何保护。出生在美国的男人和女人,为了保存自己的自由,不得不逃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寻求避难所,这样的景象显然给在众人熟悉的美国自由的故事中加入了一个极不和谐的声音。事实上,废奴主义者创作了一个不同的自由故事,一种反叙述体,将美国的发展描述成一部倒退的、而不是进步的编年史。道格拉斯宣称说,美国“不配享有伟大或自由的称号”。在他那篇可能是最有影响的演说中,道格拉斯称,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称崇尚自由而实际上每天都在进行着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令人震惊和血腥的实践”的国家中,庆祝7月4日的独立日,对于黑人来说,只是对她的“虚伪”的一种暴露。“这个7月4日,”道格拉斯说,“是你们的,而不是我的。”

但与此同时,道格拉斯又对开国元勋的传统表示了认可。革命给美国留下了一笔“关于正义、自由、繁荣和独立的非常丰富的遗产”,但不幸的是后来的数代人偏离了这个方向。只有废除奴隶制和将独立宣言的“伟大原则”从“狭隘的种族或民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时,美国才能够重新驾驭自己的历史重任。在他的自传性叙事体《我的奴役和我的自由》(1855年)中,道格拉斯创造了一大批新的为美国自由而战的历史英雄,明确地把自己与建国之父们和一批反叛的奴隶,如加布里埃尔,登马克·维西和纳特·特纳等,相提并论。事实上,道格拉斯声称,在他们对自由的渴望中,奴隶们比那些每年庆祝7月4日的美国白人更加忠诚地相信美国的立国原则。<sup>②</sup>

---

① Barbara J. Fields, *Slavery and Freedom on the Middle Ground: Maryland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1985), 30-35; Ripley, et al., eds., *Black Abolitionist Papers*, II, 246; John H. Bracey, Jr., et al., eds., *Black Nationalism in America* (Indianapolis, 1970), 87-90; Berlin, *Slaves Without Masters*, 168, 269-71.

② Foner, ed., *Douglass*, I, 210-211, II, 189-92; Philip S. Foner and George Walker, eds., *Proceedings of the Black State Conventions, 1840-1865* (2 vols. Philadelphia,

道格拉斯并不是惟一的把自己与革命时期的传统联系起来的废奴主义者。在共和国早期的公众演说中,独立宣言远不像后来那样显赫与重要。正是废奴主义者紧紧地抓住宣言,把它解释成为对奴隶制的一种谴责。为了把他们的原则与开国元勋的原则联系在一起,废奴主义者把自由钟用来作为一种象征,并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在这之后,自由钟逐渐成为了美国最庄严珍贵的自由象征之一。(在1830年代以前,它只是被称作“州议会古钟”,用来宣布显赫公民的逝世、召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回到教室或庆祝爱国活动的节日等。)当然,所有不同宗教和政治信仰的美国人都声称自己拥有美国革命的传统。那些冲击废奴主义集会活动的暴民骚乱分子也启用1776年的精神为名,南部奴隶制的卫道士也是如此。但随着奴隶制的争论日益激烈,越来越多的废奴主义者圈子以外的人开始认识到,人身奴隶制与这个国家自由传统是根本抵触的。<sup>①</sup>

到19世纪50年代时,“自由社会”与“奴隶社会”之间的对立逐渐混合,演变成一种整体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把北部美化成为进步、机会和自由的家乡。没有谁比亚伯拉罕·林肯更为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种观点。林肯并不主张立即废除奴隶制。但在他的反对奴隶制蔓延的演说中,他反复不断地强调,奴隶制与建国之父们的理想和美国所肩负的世界性历史重任是不相符合的。奴隶制违背了美国自由的所有的根本前提条件——人身自由、政治民主、改善个人生活状况的机会。简单地说,奴隶是一个被非法剥夺了自由和劳动成果、被剥夺了社会机会的人,而对这种机会的享有,是所有美国人的权利。

19世纪50年代中,美国奴隶制与美国自由的关系是政治辩论的焦点所在。既是林肯的强有力对手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政治人物的伊利诺斯州参议

1979), I, 310; Eric J. Sundquist, *To Wake the Nations: Race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Literature* (Cambridge, MA, 1993), 85; Wald, *Constituting Americans*, 92.

① Pauline Maier, *American Scripture: Making the Declarations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97), 190; David Kimball, *Venerable Relic: The Story of the Liberty Bell* (Philadelphia, 1989), 38, 44, 55-60; James B. Stewart, "Boston, Abolition, and the Atlantic World, 1820-1861," in *Courage and Conscience: Black and White Abolitionists in Boston*, ed. Donald M. Jacobs (Bloomington, 1993), 102-05.

员斯蒂芬·道格拉斯认为,自由的基础来自地方的自决能力。因此,拥有奴隶<sup>92</sup>的权利对美国自由来说至关重要;被剥夺了这种权利的人民,一位道格拉斯的同盟者说,等于“自己被出卖进了奴隶制中”。但对林肯来说,事实正好相反,没有自由,民主是无法想像的。林肯在1858年时说,“正如我不愿当一名奴隶一样,我也不愿成为一个主人。”林肯说,这就是他的“民主思想”。但他注意到,南方人称自由就是“把其他人民变成奴隶的自由”;如果这样的定义为人接受的话,那么,“对自由的热爱”将消失殆尽,美国民族的“特征”也将随之而去。<sup>①</sup>

如同废奴主义者一样,林肯也阐述了他的美国史观,有效地驳斥了南部那种反对美国传统的思想。“我们”美国人,通过独立宣言,创立了一个致力于建立普遍自由的国家,“我们”“为了建立自己的宪法”不得不与奴隶制妥协。但立国者建立了“一个自由人的标准真理”,他们相信奴隶制最终会消亡。通过把美国的未来更紧密地与“自由土地”——即免费的和没有奴隶制的土地——联系在一起,类似林肯的共和党人强有力地运用了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帝国的形象以及对西部土地的占有将保障经济自主和随之而来的自由的思想。南部人和他们的北方同盟军想要恢复和振兴奴隶制并将其推进到西部,等于否定美国的目的,为世界范围内的“自由体制的敌人”提供了援助和慰藉。<sup>②</sup>

林肯不是一个主张种族平等的人,他不加反对地接受他那个时代流行的许多(对黑人的)排斥行为和观念。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几乎一直在反对黑人选举权,而且他偶尔也谈到将黑人移民到美国以外的地方。但与废奴主义者一样,他坚持认为美国宣示的理念应该宽广得可以包容所有的人类。

① Yehoshua Arieli, *Individu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American Ideology* (Cambridge, MA, 1964), 308-09; Basler, et al., eds., *Lincoln Works*, II, 250, 255, 405, 532, III, 95, 375-76; David F. Ericson,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Liberalism: The Debates Over Ratification and Slavery* (Chicago, 1993), 70-71, 133; *Congressional Globe*, 31<sup>st</sup> Congress, 1<sup>st</sup> sess., 73.

② Wald, *Constituting Americans*, 60; Basler, et al., *Lincoln Works*, II, 255, 406, III, 374-75; Foner, *Free Soil*, 27-29.



林肯否定了斯蒂芬·道格拉斯那种以种族为基础的自由定义。道格拉斯说，“我相信这个政府是由白人建立的，是为了白人和他们的后代的永久利益而建立的；我赞成将公民资格赋予白人，而不是黑人、印第安人和其他次等种族。”林肯回答说，独立宣言中列举的权利适用于“所有地方、所有土地上的所有人，”而不仅仅是欧洲人和他们的后代。当林肯强调享有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是一种自然权利，而不是只为一部分特殊的人所享有的权利时，他选择了一个黑人妇女作为例子来淋漓尽致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在某些方面，她当然不能与我平等，但她在享有吃用她自己的手挣来的面包的天赋人权时，她与我是平等的，她与所有的其他人是平等的。”对欧洲移民来说，他们在美国社会的成员资格既不是来自于与美国革命的“血缘”关系，也不是来自他们与革命的祖先联系。而是由独立宣言所表现的“道义感”和它追求的普遍自由的理想，把他们变成了一个统一的美国的一部分。<sup>①</sup>

1855年，当南北区域争端进入最后的危机时期，雕塑家托马斯·克劳福特被请来设计一个雕塑品，放在国会大厦的圆顶上。他提议设计一个“自由的塑像”，一个女性塑像，戴有一顶自由的帽子。但陆军部长杰斐逊·戴维斯——南部最大的奴隶主之一——对此表示反对。自由帽在殖民地时期和早期共和国时期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象征，但因与法国大革命的联系很紧密，曾在英国被禁止使用。但戴维斯的反对是出于另外的理由。戴维斯说，在罗马时代，自由帽是赐给解放的奴隶的，所以，它是“一个获得自由的奴隶的标志”。他认为，这个象征将非常不合时宜，因为它隐涵了奴隶对自由的渴望和生而自由的美国人的自由之间的类比。为了迁就和照顾戴维斯的敏感，克劳福特将自由帽改换成了一个带羽毛的头盔。<sup>②</sup>

① Paul M. Angle, ed., *Created Equal?: The Complete Lincoln-Douglas Debates* (Chicago, 1958), 111-12; Basler, et al., eds., *Lincoln Works*, II, 405, 499-500, III, 95.

② Vivien G. Fyrd, *Art and Empire: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Capitol, 1815-1860* (New Haven, 1992), 177-93; Lynda L. Crist and Mary S. Dix, eds., *The Papers of Jefferson Davis* (6 vols. Baton Rouge, 1971-89), VI, 6-7; James Epstein, "Understanding the Cap of Liberty: Symbolic Practice and Social Conflict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Past and Present*, 122 (February 1989), 76-88.

林肯否定了斯蒂芬·道格拉斯那种以种族为基础的自由定义。道格拉斯说，“我相信这个政府是由白人建立的，是为了白人和他们的后代的永久利益而建立的；我赞成将公民资格赋予白人，而不是黑人、印第安人和其他次等种族。”林肯回答说，独立宣言中列举的权利适用于“所有地方、所有土地上的所有人，”而不仅仅是欧洲人和他们的后代。当林肯强调享有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是一种自然权利，而不是只为一部分特殊的人所享有的权利时，他选择了一个黑人妇女作为例子来淋漓尽致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在某些方面，她当然不能与我平等，但她在享有吃用她自己的手挣来的面包的天赋人权时，她与我是平等的，她与所有的其他人是平等的。”对欧洲移民来说，他们在美国社会的成员资格既不是来自于与美国革命的“血缘”关系，也不是来自他们与革命的祖先联系。而是由独立宣言所表现的“道义感”和它追求的普遍自由的理想，把他们变成了一个统一的美国的一部分。<sup>①</sup>

1855年，当南北区域争端进入最后的危机时期，雕塑家托马斯·克劳福特被请来设计一个雕塑品，放在国会大厦的圆顶上。他提议设计一个“自由的塑像”，一个女性塑像，戴有一顶自由的帽子。但陆军部长杰斐逊·戴维斯——南部最大的奴隶主之一——对此表示反对。自由帽在殖民地时期和早期共和国时期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象征，但因与法国大革命的联系很紧密，曾在英国被禁止使用。但戴维斯的反对是出于另外的理由。戴维斯说，在罗马时代，自由帽是赐给解放的奴隶的，所以，它是“一个获得自由的奴隶的标志”。他认为，这个象征将非常不合时宜，因为它隐涵了奴隶对自由的渴望和生而自由的美国人的自由之间的类比。为了迁就和照顾戴维斯的敏感，克劳福特将自由帽改换成了一个带羽毛的头盔。<sup>②</sup>

① Paul M. Angle, ed., *Created Equal?: The Complete Lincoln-Douglas Debates* (Chicago, 1958), 111-12; Basler, et al., eds., *Lincoln Works*, II, 405, 499-500, III, 95.

② Vivien G. Fyrd, *Art and Empire: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Capitol, 1815-1860* (New Haven, 1992), 177-93; Lynda L. Crist and Mary S. Dix, eds., *The Papers of Jefferson Davis* (6 vols. Baton Rouge, 1971-89), VI, 6-7; James Epstein, "Understanding the Cap of Liberty: Symbolic Practice and Social Conflict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Past and Present*, 122 (February 1989), 76-88.

那个巨大的自由雕像是在罗马分成几部分灌制而成的，然后在 1859 年运到美国，在一位名叫菲利普·里德的奴隶匠人的指挥下，在马里兰的一个铸造厂拼装而成的。但直到 1863 年才装到国会大厦顶上去。到那个时候，戴维斯已经是美利坚邦联的总统了，林肯也已经宣布了奴隶的解放，一个“新生的自由”正以千军之势横扫这个自由的帝国。

## 第五章 自由的新生

95

### “我们都宣称为自由而战”

南北双方都称进行内战是为了保护自由。诚然,1861年战争打响后不久,南部邦联的副总统亚历山大·H. 斯蒂芬斯将奴隶制视为南部邦联的“奠基石”。但那些拿起武器为南部的独立而战的人却把内战看成一场“争取自由的斗争”。南部白人从战前时期继承了这样一种自由的定义,其核心内容包括地方政府自治、自给自足的经济机会、财产——包括奴隶财产在内——不受侵犯以及抵制北部“奴役”南部的企图。要维系这种传统,南部邦联必须赢得战争。“我正在从事一桩为自由和正义而战的光荣事业,”一位来自阿拉巴马州的陆军下士在1862年毫不犹豫地宣称道。<sup>①</sup>

“自由这个具有魔力的词”,用一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新兵的话来说,也影响着联邦士兵对内战的理解。这场内战的目的,来自印第安纳州的陆军中士塞缪尔·麦基尔文写道,就是保存“照亮全人类的自由的灯塔”。但随着战争的展开,战前对自由的理解逐渐让位于一个新的自由的定义。成千上万的北方士兵在战前并不是废奴主义者,但战争使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为了保证联邦作为自由的象征,必须摧毁奴隶制。“为了保持我们自由的体制,”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士兵在1863年写道,“必须要使每个人都获得自由,让星条旗在他们头上飘扬。”对林肯来说,内战具有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美国因为废除了奴隶制而获得了“自由的新生”。<sup>97</sup>“当我们把自由赋予奴隶们时,”他在1862年

---

<sup>①</sup> Frank Moore, ed., *The Rebellion Record* (12 vols. New York, 1861-68), I, 44-49; James M. McPherson, *What They Fought For 1861-1865* (Baton Rouge, 1994), 9-11, 48; James M. McPherson, *For Cause and Comrades: Why Men Fought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97), 19-21, 105-06.

12月解放黑奴宣言生效前对国会说,“我们确保了自由人拥有的自由——对于我们给予的自由和我们得以保存的自由来说,两者都具有同样崇高的意义。”<sup>①</sup>

自由所包含的多变的和富于争议性的本质在内战时期最为明显地得到了表现。“我们都宣称是为了自由而战,”林肯在1864年说,“但在使用同一个词时,我们所指的却不是一件事。”对于北部来说,自由指的是“每个人”能够享有“他的劳动成果”;对于南部白人来说,自由意味着做主人的权威和地位——即拥有“任意处置其他人及其劳动成果”的权力。<sup>②</sup> 联邦的胜利将北方对自由的理解转化成为一种正常的国家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自由的内容以及对有权享有自由的人的定义两者本身也随之而改变了。

在整个美国历史进程中,战争在扩展美国的“想像的共同体”的界限时,始终是一种十分有力的力量。独立战争促进北方废除了奴隶制;美国妇女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投票权;越战期间18岁的年轻人也将获得选举权。随着联邦在1865年的胜利,废奴主义者的美国观也得到了承认和胜利。自由变成了普遍性的原则;公民资格被宣称为所有美国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温德尔·菲利普斯在1866年写道,“与其他所有国家不同的是,这个国家还须决定公民由什么来构成,这是美国独有的问题。”联邦公民资格的原则就是从内战中发展而来的;国家公民整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不论其属于什么种族,都将得到平等的法律保护。

1865年早期,曾在八年前宣布将黑人永久地排除在美国“大家庭”之外的联邦最高法院,赋予了来自波士顿的黑人律师约翰·S. 罗克在最高法院进行诉讼和辩护工作的资格。弗朗西斯·利伯写道,黑人是公民,应该得到联邦政府的保护,这一点已经不再有“哪怕是一丝值得怀疑的可能”。不光是自由的

① Earl J. Hess, *Liberty, Virtue, and Progress: Northerners and Their War for the Union* (New York, 1988), 29; McPherson, *What They Fought For*, 30, 57-67; McPherson, *For Cause and Comrades*, 90-112, 128; Roy F. Basler, et al., ed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 (9 vols. New Brunswick, 1953-55), V, 537.

② Basler, et al., eds., *Lincoln Works*, VI, 301-02.

逻辑,内战第二阶段中约 20 万黑人参加联邦军队这一事实,已将黑人公民权问题提到了战后的议事日程上了。黑人参加联邦军队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一位参议员在 1864 年观察说:即是“黑人从此在我们中间占有了一个新的地位”。同年,林肯敦促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迈克·哈恩力争将选举权赋予给一部分黑人,尤其是黑人士兵。林肯认为,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他们也许会被再度召集起来,“保卫自由大家庭中的自由这种珍宝。”种族主义思想并没有从国家生活中被消除。但是,在 1864 年,《哈泼周刊》主编乔治·威廉·柯蒂斯 98 宣称说:内战和对奴隶的解放已经将一个“白人的”政府转化成为一个“所有人的”政府。<sup>①</sup>

然而,除了重新划分自由的界限之外,内战也将自由的进步直接与联邦国家的权力联系起来。“是战争,”19 世纪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雷切克说,“将人民转换成为一个国家。”内战以保存旧的联邦开始,却产生了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为打赢现代战争而对联邦资源进行的总动员,创造了一个被后来的一位共和党人所称的“新的政府”,它的权力和责任都极大地扩展了。同样重要的是,内战也孕育了一种新的国家自我意识。“自由……真正的自由,”利伯宣称道,“需要一个国家。”这也正是埃德华·埃弗里特·海尔在 1863 年出版的短篇小说《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中所讲的道理。这部当时最受人喜爱的小说中的主人公菲利普·诺兰,在一阵愤怒之下,诅咒了自己出生的地方,他因而得到惩罚,被发配到一艘船上去生活,不准再踏上美国的土地,也听不到人们提及“美国”的名字。他后来知道,当一个人被剥夺了国籍身份时,他就失去了对自身的自我意识。<sup>②</sup>

① *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 June 3, 1865; George A. Levesque, “Boston’s Black Brahmin: Dr. John S. Rock,” *Civil War History*, 26 (December 1980), 336; Francis Lieber to Edward Bates, November 25, 1862, Francis Lieber Papers, Huntington Library; Herman Belz, *A New Birth of Freedom: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Freedmen’s Rights 1861-1866* (Westport, 1976), 24; Basler, et al., eds., *Lincoln Works*, VII, 243; Charles E. Norton, ed., *Orations and Addresses of George William Curtis* (3 vols. New York, 1894), I, 172.

② Melinda Lawson, “Patriot Fires: Loyal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ivil War North,”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8; David Potter, *The South and the*

这种强烈的新的民族主义思潮,由于受到国家与自由等同观念的强化,自动地将一切对于内战及其政策的批评——或者在共和党人眼中,一切对林肯政府政策的反对——与叛国罪相提并论。尽管在美墨战争时期,曾出现过一些对反战分子的零星处理和起诉,但自革命以来,内战第一次提出了战争时期表达反对意见所面临的局限性的问题。“战争,”纽约州的民主党州长霍雷肖·西摩坚持道,“不能窒息自由。”共和党的《纽约时报》则在战争中回应道,“国家的安全就是最高法。”林肯并算不上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暴君,但根据他的传记作者之一戴维·唐纳德的观察,保障公民自由却也不是他“首要关心的问题”。南部邦联的官员在这方面的作为也是大同小异,他们听任军事法庭将数千名拥护联邦的南方人关进监狱,更多的人却被强行赶出家园,还有一小部分人遭到军队或平民政府的集体处死。但因为北方是胜利者,所以林肯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也就为未来创造了先例。

尽管最近的研究成果大大降低了在北部由军事政府实施的任意性逮捕的估计数字,但这样的逮捕仍在千次以上,逮捕的范围从反对派报纸的主编们到民主党的政治人物,甚至也包括了一些平民,如一个芝加哥人因为骂总统是一个“混帐的蠢蛋”,而被短暂地拘留监禁。宪法在谁有权终止人身保护令(也就99是,不得在没有正式法律指控的情况下将一个公民投入监狱的保护令)这一问题上并没有作出清楚的规定,但林肯将这种权力宣布为属于总统的战争权范围内,并且两次宣布,在整个北部地区对那些被指控为从事“不忠诚的行动”的人,停止其拥有的人身保护状权利。当然,民主党报纸照常出版,没有表现任何被威慑住的迹象;而且联邦和南部邦联在战争期间也继续进行了选举。但内战的事件表现出自由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在要求国家团结一致的情形下,公民自由的原则将是非常脆弱的,这一点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充分地得到强调和展现。<sup>①</sup>

Sectional Conflict (Baton Rouge, 1968), 56; *Congressional Record*, 43<sup>rd</sup> Congress, 1<sup>st</sup> sess., 4116; Frank Friedel, *Francis Lieber: Nineteenth-Century Liberal* (Baton Rouge, 1947), 302; Edward E. Hale, *The Man Without a Country and Other Stories* (Boston, 1898).

① Mark E. Neely, *The Fate of Liberty: Abraham Lincoln and Civil Liberties* (New

许多北方的共和党人把这种新的民族主义解释成为保证国家稳定和政治秩序的力量，从而将爱国主义与对当权政府的无条件忠诚等同起来；与此同时，奴隶解放这一事件却表明新近获得权威的联邦政府，也可废除已经存在的旧体制，扩展自由的领域。对于改革者来说，内战促成和激发了从内战前的反体制主义向以政府为改革中心的思想的转变，前者将个人的净化看成是社会变革的惟一道路，而后者则认为政治权力可用来驾驭社会进步的事业。奴隶解放将长期成为社会改革的一种模式，成为检验其他自由运动的试金石。<sup>①</sup>

在北方人眼中，南部对桑姆特要塞的攻击将自由与奴隶制之间的正面交锋明朗化了，这种交锋是废奴主义者强调了数十年的观点。内战以前，南部和北部的许多美国人把他们带有奴隶制的国家称为“自由的帝国”时，不会感到有什么特别的讽刺意味。但如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早在1862年就意识到的，战争将“奴隶的事业和这个国家的事业”合为一体了。自然，整整一代北部的小学生早在内战前就学会背诵丹尼尔·韦伯斯特1830年在参议院所作的充满激情的演讲：“自由与联邦，现在和永远，终为一体，不可分离。”但韦伯斯特当时谴责的是州权的原则，而不是“特殊体制”。当道格拉斯宣布“自由与联邦变成一体时”，他的目标是人身奴隶制——这个体制现在不仅被看作是一种道德罪恶，而且也是对联邦权力的一种侮辱。主人对他的奴隶拥有的绝对主权，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反奴隶制的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坚持道，与“国家政府的最重要的权利”是不相称的。与此同时，摧毁奴隶制——通过总统宣言、国会立法和宪法修正案等行动来实现的——是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行动。这个行动宣布了一个新的联邦国家政府的出现，这个政府有足够的权力来铲除南部社会的中心体制以及美国社会中最大的财富

---

York, 1991), 52-67, 116-30, 176-77, 206; *New York Times*, May 28, 1863; David H. Donald, *Lincoln* (New York, 1995), 303-04; Eric Foner, *Reconstruction: 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1863-1877* (New York, 1988), 15-17.

① George M. Fredrickson, *The Inner Civil War: Northern Intellectuals and the Crisis of the Union* (New York, 1965); William J. Novak, *The People's Welfare: Law and Regul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Chapel Hill, 1996), 241.



积累(指奴隶制。——译者)。<sup>①</sup>

联邦胜利的规模与无可争辩的奴隶解放的事实将民族主义、道德原则和自由的语言融合成为一个崭新的联合体。如同在美国革命时期,宗教与世俗 100 意义上的自由理解通过一种国家命定论的语言结合起来了。“如同耶稣为了使人变得神圣而牺牲,让我们为了使人获得自由而献身,”《共和国战斗曲》这样唱道。那些鼓吹和信仰美国承担着创世重任的人把内战解释成上苍对这个巨大的民族罪恶的一种惩罚和责难(这样的语言也为不上教堂的林肯在他的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予以采用)。但是,随着奴隶的解放,战争也带来了国家复兴和再生的机会,同时也为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进步性质和全球意义提供了不可否认的有力证据。在内战停止后许久的时期内,林肯和被解放的奴隶将始终作为自由和美国式爱国主义的象征而久留人间。<sup>②</sup>

### “何谓自由?”

随着联邦的胜利,自由真正界定了美国存在的目的。一个“新国家”从内战中得以诞生,伊利诺斯州的众议员艾萨克·N. 阿诺德宣称说:这个国家之“新”是因为它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国家。这个新美国观的中心思想是内战前的自由劳动的原则,现在这个原则因北部的胜利而被进一步认定为是一个好社会的标准。根据自由劳动的原则,在重建的南部,解放了的奴隶将与北部的劳工一样,享有同样的争取改善的机会,并会抱有同样的谋求自我完善和自我改进的动机,比他们在当奴隶时发挥更大的劳动热情,更富有成效地工作。与

<sup>①</sup> Hess, *Liberty, Virtue, Progress*, 26; Philip S. Foner, ed.,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Frederick Douglass* (4 vols. New York, 1950-55), III, 214; *Congressional Globe*, 38<sup>th</sup> Congress, 1<sup>st</sup> sess., 523.

<sup>②</sup> Wilfred M. McClay, *The Masterless: Self and Society in Modern America* (Chapel Hill, 1994), 19; George S. Philips, *American Republic and Human Liberty Foreshadowed in Scripture* (Cincinnati, 1864); Basler, et al., eds., *Lincoln Works*, VIII, 333; Paul C. Nagel, *This Sacred Trust: American Nationality 1798-1898* (New York, 1971), 166-67; Eric Foner and Olivia Mahoney, *America's Reconstruction: People and Politics After the Civil War* (New York, 1996), 33.

此同时,北部的资本和移民将不断流入南部,为其经济发展打气补血,带来了动力。最终南部将逐步发展成为像北部一样的“自由社会”,拥有自己的州立学校、小城镇和自食其力的小生产者。1848年德国革命失败后移居美国、后来成为共和党的领袖人物之一的卡尔·舒尔茨宣称说,当南北社会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时候,美国将变成历史上“一个比任何国家都更伟大、更繁荣、更强大的共和国”。<sup>①</sup>

黑人解放的具体现实使自由成为一个有历史意义和实质意义的问题,而不再是一个哲学意义上或喻义上的问题。它以最为直截了当的形式提出了财产权利与人身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人身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什么是自由?”国会议员詹姆斯·加菲尔德在1865年时问道,“自由难道仅仅是一种不被带上镣铐的特权吗?如果这就是自由的全部内容的话,那么,自由无非是一种令人难堪的嘲讽,一种残酷的欺骗。”自由仅仅意味着废除奴隶制,还是包含了解放的奴隶应该拥有其他一些权利的内容?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这些前奴隶应该拥有哪些权利:公民平等权、选举权,还是财产拥有权?如果奴隶制的废除加强了自由在政治话语中的关键词的地位,这种情形也使得对自由的界定比以前更为重要。自由不再是一个事先决定的或处于静态的概念,它变成了一个充满冲突的地带,它的内容可以通过完全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观点来解释。<sup>②</sup>

“自由,”一位黑人牧师说道,“早在自由诞生之前就存在于黑人的心中。”一位逃到北方的黑奴后来回忆说,在奴隶屋中,奴隶们最常谈论的话题就是“对自由的渴望”。对于美国革命带来的思想潮流和内战前在南北社会回荡传播的自由和民主的语言,奴隶们不可能是无动于衷或漠不关心的。他们对围绕奴隶制的未来而展开的全国性冲突,不可能是毫无意识的。事实上,在内战

① V. Jacque Voegeli, *Free But Not Equal: The Midwest and the Negro During the Civil War* (Chicago, 1967), 162-63; Carl Schurz, *For the Great Empire of Liberty, Forward!* (New York, 1864).

② Burke A. Hinsdale, ed., *The Works of James Abram Garfield* (2 vols. Boston, 1882-83), I, 86.

前夕,詹姆斯·布坎南总统曾警告说,“在奴隶制问题上引起的争论”已经引起了奴隶们“对自由问题的朦胧认识”。<sup>①</sup>

但奴隶们的认识绝非是朦胧不清的。在奴隶制中,非裔美国人通过他们自己本身作为奴隶的经历和对他们周围的自由社会的观察,形成了自己对自由的独到理解。奴隶们将美国人的民主和平等的话语作为自己的政治语言,利用圣经中那个非常令人信服的出埃及记的故事来解释自由。在这个故事中,一群上帝的选民在被长期的奴役之后,经过上帝的帮助,最后获得了解放。奴隶们把自己同时看成是被剥夺了权利的个人和缺乏自决能力的人民。所以,自由也因此同时意味着两个内容:逃离奴隶制中的各种非正义的磨难——如鞭笞的惩罚、家庭的分离、教育机会的被剥夺以及奴隶主对女奴的性剥削等等——和建立起一种集体性的权力基础,从而争取对美国公民应有权利和特权的分享。<sup>②</sup>

如果奴隶制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的话,内战的爆发就预示了一条上帝为黑人准备的、通向美国自由的“应许之地”的即将来临的通道。随着南部的400万奴隶不请自到地进入了19世纪美国的“公共领域”,长期以来不为外部世界所知的黑人的态度和理想突如其来地爆发出来了。黑人牧师和黑人政治领袖们(这两个角色通常是由一个人来担任的)宣称,一个自由的福音即将到来了。上帝终于对他的人民的祈祷作出了回应,大赦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早在林肯将奴隶解放作为内战的目标之一之前,北部和南部的黑人们已经把内战称之为“争取自由的战争”了。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1861和1862年间,成千上万的奴隶逃离种植园,逃奔到联邦军队的防线内,将奴隶制的未来不由分

---

① Foner, *Reconstruction*, 77-78; John W. Blassingame, ed., *Slave testimony: Two Centuries of Letters, Speeches, Interviews, and Autobiographies* (Baton Rouge, 1977), 135; James Richardson, ed., *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10 vols. Washington, DC, 1896-99), V, 3157-58.

② Richard H. King, *Civil Rights and the Idea of Freedom* (New York, 1992), 16, 29-31; Derek Q. Reeves, “Beyond the River Jordan: An Essay on the Continuity of the Black Prophetic Tradition,” *Journal of Religious Thoughts*, 47 (Winter-Spring 1900-91), 42-54.

说地推置到联邦政府的政治议程上,促使并不情愿的北部踏了解放奴隶的道路。<sup>①</sup>

当政治参与成为自由的一个核心内容时,投票权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前奴隶  
 102 们对享有权力和独立自主的期望中最为关键的内容。如同 1865 年南部投降后不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说,“只有在黑人得到选举权之后,奴隶制才会被彻底废除。”这是由民主制度本身决定的逻辑。在一个“君主制政府中”,道格拉斯解释说,哪些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并不会感到一种“特别的”耻辱。但是,在一个“奉行全民选举权”的地方,将黑人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等于给他们打上一道“低等下贱的烙印”。内战一结束,在南部的一些地方甚至更早一些,自由黑人与解放了的奴隶便聚集起来,以群众集会、游行活动、递交请愿书等方式来要求获得选举权,并在有的时候还组织了他们自己的“自由投票运动”。他们声称,如果新生的美国不能赋予他们完全的公民资格和权利,将是对其承诺的民主理念和内战意义的背叛,而且会将前奴隶打入到自由黑人先前经历过的半自由状态之中。

在整个重建过程中,黑人始终扮演了“不可压制的民主派”的角色。即便在他们的选举权被再度剥夺后许久,他们仍将投票的行动看成对白人至上政治模式的一种挑战,并把“选举权的丧失”看成是“自由的丧失”。黑人获得自由是联邦政府前所未有地运用自己权力的结果,非裔美国人因此全面彻底地与联邦政府站在一起。1865 年 7 月 4 日那一天,一位年轻的白人妇女在她的日记中写道,查尔斯顿城的黑人举行“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而“白人却把他们自己关在屋里”。内战结束后的许多年里,南方白人会有意地回避对独立日的庆祝活动,而前奴隶们却非常欣赏这一天的节日。到今天为止,虽然许多白人本能地感到,自由的享有必须限制联邦权威,但几乎没有什么黑人同意这样

---

<sup>①</sup> Reginald F. Hildebrand, *The Times Were Strange and Stirring: Methodist Preachers and the Crisis of Emancipation* (Durham, NC, 1995), 32-39, 53-65; Vincent G. Harding, "Wrestling Toward the Dawn: The Afro-American Freedom Movement and the Changing Constitution," *Journals of American History*, 74 (December 1987), 723; Foner, *Reconstruction*, 3-4.

的看法。<sup>①</sup>

前奴隶对自由的定义中的另外一个关键内容是经济自主。1865年1月,在完成了那次几乎把佐治亚州夷为平地的向大海进军行动后,威廉·T. 谢尔曼会见了一群黑人牧师。这群黑人的发言人加里逊·弗雷日尔表达了那些刚刚获得自由的黑人对奴隶制和自由所作的简洁的定义。弗雷日尔说,奴隶制意味着一个人“不经另一个人的同意就得到后者的劳动成果”,自由则意味着“使我们能够收获我们自己劳动的成果”。弗雷日尔强调,真正的经济自由只能通过拥有土地才能实现,没有土地,黑人劳动力将继续为他们先前的主人所剥削和占有。在自己的土地上,黑人可以建设自己的社区,享受一些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建立自己的教会、学校以及新的稳定家庭等。只有土地,一位名叫梅里蒙·霍华德的前奴隶写道,才将使“穷苦阶级享受到自由的甜蜜”。<sup>②</sup>

通过他们对具体的内容的界定和对自由语言的使用,前奴隶们力图将一些实质性内容注入到奴隶解放的实践中去,这种努力使人联想到那些为众多 103 美国白人认可的自由的内容:拥有自身、家庭稳定、宗教自由、市场上的平等、政治参与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但这些自由的内容汇集成了一种他们自己的自由观。对于那些从未享有过自由的人和那些总是享有自由的人来说,自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对于白人来说,无论如何定义,自由是一种应该得到保障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对非裔美国人来说,自由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是一个宽广多面的概念,是一个改变他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和改变那个从一开始就支持奴隶制存在的社会和文化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于前奴隶来说,奴隶制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种痛苦的经历,这种经历将长期地影响他们对自己的认

① Foner, ed., *Douglass*, IV, 159, 167; Foner, *Reconstruction*, 110-12, 291; Earl S. Miers, ed., *When the World Ended: The Diary of Emma LeConte* (New York, 1957), 113-15; Elsa Barkley Brown, "Negotiat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Public Sphere: African American Political Life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lavery to Freedom," *Public Culture*, 7 (Fall 1994), 115.

② "Colloquy with Colored Ministers,"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16 (January 1931), 88-94, Merrimon Howard to Adelbert Ames, November 28, 1873, Ames Family Papers, Sophia Smith Collection, Smith College.

识,影响他们对自己在美国社会中的位置的认识。尽管获得了自由的黑人没有争取到他们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自由,但他们对自由的广泛定义和理解极有效地影响了内战后波澜起伏的重建时期中政治议程的形成。<sup>①</sup>

当然,在探索从奴隶制到自由之路的过程中,黑人并不是在孤军奋战。南部的白人,尤其是那个为战时所遭受的损失和丧失奴隶这种财产而逼入窘境的种植园主阶级,也在力求把他们对奴隶解放的后果的理解贯穿到实践之中。1865年早些时候,一位亚特兰大的白人居民给当地的报纸写信,提到内战点燃了“奴隶胸中的自由精神”。这位作者写道,南部的白人没有意识到,如同他们自己一样,黑人也充满了“对自由的热爱”。尽管如此,在紧随着战争结束的一段时间内,南部的白人领袖却以最狭窄的、限制性最强的方式来界定黑人自由。如同北部的新闻记者悉尼·安德鲁斯在1865年底所注意到的:“白人似乎完全不能理解,自由对于黑人来说,与对于他们自己来说是一种完全相同的东西。他们毫不犹豫地承认并接受联邦政府给予黑人自由这样的结果,但好像又在坚持他们仍然有权行使过去那种对黑人的控制。”南部白人领袖坚信,种植园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是维持南部经济稳定和种族优越地位的关键,他们力图恢复战前那种自由的定义,好像一切照旧,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对他们来说,自由仍旧代表了等级和主人的为所欲为;自由仍是一种特权,不是一种权利,是一种法律地位,而不是一种毫无限制的人人应得的权利。自由当然不包括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也不包括政治和公民地位的平等。“一个人可以是自由的,但并不一定是独立的,”来自密西西比州的种植园主塞缪尔·阿格纽1865年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一个人可以有自由,但他不一定能投票。”两年后,一位参加弗吉尼亚州制宪大会的代表附和说,南部白人的总立场可由肯塔基州的一家报纸的话来总结:前奴隶是得到了“自由,但只是劳动的自由”。

南部白人反对认为奴隶解放本身包含有给予黑人政治与公民平等的内

---

<sup>①</sup> James O. Robertson, *American Myth, American Reality* (New York, 1980), 98-99; Gyora Binder, “Did the Slaves Author the Thirteenth Amendment? An Essay in Redemptive History,” *Yale Journal of Law and the Humanities*, 5 (Summer 1993), 471-505.

容,也不认为解放赋予了黑人获取财产或争取经济改善的机会。然而,在北部<sup>104</sup>看来,这些权利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关键,南部白人坚持认为,黑人必须只能在条件与奴隶制相差不大的情况下继续成为依附性种植园经济的劳动力队伍。在总统重建期间——也就是1865至1867年间,当林肯的继任者安德鲁·约翰逊放手让南部白人决定重建的规模的时期——南部各州颁布实施了臭名昭著的黑人法典,来推行这种对于黑人自由的定义。黑人法典剥夺了黑人享受平等的法律保护的权利和政治权利,强制性要求黑人劳工接受以年为期的劳工契约和具有压迫性的学徒工规定,并对违反合同的黑人以刑事犯罪的名义进行惩罚。通过这些法律,南部的白人领袖希望保证种植园农业经济能抵消和战胜奴隶解放的影响。<sup>①</sup>

因此,奴隶制的灭亡并不自动地意味着自由的降生。但因为黑人法典如此公然地践踏了自由劳动的原则,北部的共和党人不得不对此发出愤怒的谴责。南部对奴隶解放的结果的拒绝,引发了约翰逊总统与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之间就内战的影响和后果问题展开了一场场面巨大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一些有关的联邦法律和宪法修正案得以颁布和实施,这些法律和修正案重新划分了美国公民的界限,大大扩展了所有的美国人所享有的自由的定义范围。

“美国将给他们自由,还是自由的影子?”一位北卡罗来纳州的教育工作者在1865年间问道。随着战争接近尾声,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力图决定如何准确地应对奴隶制灭亡后的后果。即便是对奴隶解放并不热心的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民主党议员威廉·霍尔曼也说,“只是被免除奴役的自由,是一种令人悲哀的自由的观念”。到1865年,几乎所有的北部人都认为,拥有他人的财产权必须废除,用鞭罚构成的劳工压迫必须由契约关系来取代,奴隶主对前奴隶的家长式控制必须予以废除。在这些辩论中用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享受自己劳动

---

① J. William Harris, *Plain Folk and Gentry in a Slave Society: White Liberty and Black Slavery in Augusta's Hinterlands* (Middletown, CT, 1985), 184; Sidney Andrews, "Three Months Among the Reconstructionists," *Atlantic Monthly*, 16 (February 1866), 243-44; Foner, *Reconstruction*, 129, 134, 198-201; Brown, "Public Sphere," 117.

成果的权利”。这句话被认为表达了奴隶制与自由之间最根本的区别。<sup>①</sup>

接下来的围绕重建的斗争大部分是针对这样一个问题,如同来自伊利诺斯州的参议员莱曼·特朗布尔所形容的,即“什么是奴隶制和什么是自由”的问题。1865年批准的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不可逆转地废除了奴隶制;“这在我看来,”一位民主党参议员说道,“应该使这个国家中的那些自由的恋人们感到心满意足了吧。”但这远远不够。“我们必须保证做到,”来自内华达州的参议员威廉·斯图亚特在1865年12月国会开幕时宣布说,“那些由美国宪法给予了自由的人……将真正成为一个自由人。”但在要求和界定给予自由人必须拥有的基本权利方面最为坚定的人是激进派共和党人。作为奴隶制的老对手,他们坚持认为,用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威尔逊的话说,自由是一个“既不只限于黑人也不只限于白人”的原则。另一位激进共和党人,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廉·D. 凯利说道,自由“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权利……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证最穷的孩子也能呼吸我们国家的空气”。在奴隶解放之后,法律上的和爱国主义式的“自由空气”最终来到了美国。

到1866年时,共和党内达成了一种共识:公民地位和权利的平等是自由的一个基本要素。内战把自由语言中“平等”一词提高到自革命以来最为显赫的地位。在葛底斯堡,林肯提到,美国是一个“孕育在自由之中并致力于所有人生而平等的理想”的国家——这是对独立宣言的援引,也是对奴隶解放的内在逻辑的认可。通过这个对美国政治传统的伟大的(如果同时也是短暂的)逆转,新近获得权威的联邦国家力图确立和保护所有美国人的权利。1866年的公民权利法案是第一部界定美国公民资格的法律,它宣布所有出生在美国的人(除印第安人外)均为美国联邦公民,并列举了所有公民——无论其种族为何——应该享有的权利。如同自由劳动的价值观一样,平等的法律保护是这

---

<sup>①</sup> H. S. Beals to Samuel Hunt, December 30, 1865, American Missionary Association Archives, Amistad Research Center, Tulane University; Leas S. Vander Velde, “The Labor Vision of the Thirteenth Amendmen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38 (December 1989), 437-504; *Congressional Globe*, 38<sup>th</sup> Congress, 1<sup>st</sup> sess., 1862, 2<sup>nd</sup> sess., 19, 215.



条法律的核心,任何州都不得剥夺公民的签约权、诉讼权或要求对人身和财产进行平等保护的权利。<sup>①</sup>

然而,真正第一次将出生地公民资格的观念和所有美国人权利平等的原则变为宪法原则的是1866年由国会通过、1868年由各州批准的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这条宪法修正案禁止剥夺“公民的特权和豁免权”或拒绝向他们提供“平等的法律保护”。这种非常广泛的语言为后来的国会和联邦法院书写法律平等保障的具体内容开了方便之门,这个过程将成为20世纪联邦法院的主要工作内容。尽管第十四条修正案的紧要目的是将前奴隶提高到平等公民的地位,它的语言却不是只适用于黑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适用于所有的美国人,如一位国会议员指出的,包括“成千上万的出生在国外的、将涌到我们的海岸线……到这里来寻找一个自由的国土的人”。此后不久,1870年批准的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禁止各州以种族为理由阻止公民行使选举权。“当你不准一个碰巧有黑皮肤的人投票时,”一位纽约人写道,“你凭什么称这是一个自由的政府”?严格地讲,选举权仍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普遍权利,各州对此仍有诸多的限制。但当重建临近结束时,联邦政府已经重新定义了自由<sup>106</sup>的内容,使其包含了不分种族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平等的内容。<sup>②</sup>

这些宪法修正案和民权法反映了内战的两种产物的混合——一个新的具有权威的联邦政府和一个推崇建立享有法律平等的联邦公民实体的理想。这两种结果不仅建立了新的自由定义,而且也为此种自由的实施带来新的方式。查尔斯·萨姆纳宣称道,联邦政府不再是一种对自由的威胁,而是变成“自由的监护人”。这场被卡尔·舒尔茨称之为“伟大的宪法革命”的重建,超越了种族和区域的局限,改造了联邦制,并通过这种改造,改变了对美国自由至关重要的关于权利的话语。内战以前,被剥夺了选举权的群体时常从独立<sup>107</sup>

① *Congressional Globe*, 38<sup>th</sup> Congress, 1<sup>st</sup> sess., 343; 39<sup>th</sup> Congress, 1<sup>st</sup> sess., 42, 111, 343, 473, Celeste M. Condit and John L. Lucaites, *Crafting Equality: America's Anglo-African Word* (Chicago, 1993), 8; Foner, *Reconstruction*, 243-45.

② *Congressional Globe*, 39<sup>th</sup> Congress, 1<sup>st</sup> sess., 1833; William Burns to Henry M. Haight, October 28, 1867, Henry M. Haight Papers, Huntington Library; Foner, *Reconstruction*, 256-59, 446.

条法律的核心,任何州都不得剥夺公民的签约权、诉讼权或要求对人身和财产进行平等保护的权利。<sup>①</sup>

然而,真正第一次将出生地公民资格的观念和所有美国人权利平等的原则变为宪法原则的是1866年由国会通过、1868年由各州批准的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这条宪法修正案禁止剥夺“公民的特权和豁免权”或拒绝向他们提供“平等的法律保护”。这种非常广泛的语言为后来的国会和联邦法院书写法律平等保障的具体内容开了方便之门,这个过程将成为20世纪联邦法院的主要工作内容。尽管第十四条修正案的紧要目的是将前奴隶提高到平等公民的地位,它的语言却不是只适用于黑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适用于所有的美国人,如一位国会议员指出的,包括“成千上万的出生在国外的、将涌到我们的海岸线……到这里来寻找一个自由的国土的人”。此后不久,1870年批准的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禁止各州以种族为理由阻止公民行使选举权。“当你不准一个碰巧有黑皮肤的人投票时,”一位纽约人写道,“你凭什么称这是一个自由的政府”?严格地讲,选举权仍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普遍权利,各州对此仍有诸多的限制。但当重建临近结束时,联邦政府已经重新定义了自由<sup>106</sup>的内容,使其包含了不分种族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平等的内容。<sup>②</sup>

这些宪法修正案和民权法反映了内战的两种产物的混合——一个新的具有权威的联邦政府和一个推崇建立享有法律平等的联邦公民实体的理想。这两种结果不仅建立了新的自由定义,而且也为此种自由的实施带来新的方式。查尔斯·萨姆纳宣称道,联邦政府不再是一种对自由的威胁,而是变成“自由的监护人”。这场被卡尔·舒尔茨称之为“伟大的宪法革命”的重建,超越了种族和区域的局限,改造了联邦制,并通过这种改造,改变了对美国自由至关重要的关于权利的话语。内战以前,被剥夺了选举权的群体时常从独立<sup>107</sup>

① *Congressional Globe*, 38<sup>th</sup> Congress, 1<sup>st</sup> sess., 343; 39<sup>th</sup> Congress, 1<sup>st</sup> sess., 42, 111, 343, 473, Celeste M. Condit and John L. Lucaites, *Crafting Equality: America's Anglo-African Word* (Chicago, 1993), 8; Foner, *Reconstruction*, 243-45.

② *Congressional Globe*, 39<sup>th</sup> Congress, 1<sup>st</sup> sess., 1833; William Burns to Henry M. Haight, October 28, 1867, Henry M. Haight Papers, Huntington Library; Foner, *Reconstruction*, 256-59, 446.

宣言而不是从宪法中,寻求支持他们的权利要求的根据。(原始宪法中惟一对平等的提及,是在授予各州平等数量的参议员议席的条款从句中。)但重建中对宪法的修订,不仅增加了宪法具有的延展性,同时也表明了公民权利与联邦政府的权力是十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权利法案将所有的公民自由与州的自主权联系在一起。它所使用的语言——“国会不能通过任何法律”——反映了当时那种认为集权对自由是一种威胁的观点。但重建时期的宪法修正案却认为权利必须要由政治权力来贯彻执行。这些修正案授权联邦政府否定各州的剥夺公民权利的法律,每一条修正案都在结尾时附有一项条款,授权国会采用“适当的立法”来“实施”修正案。这样就开始了一种新的程序:各州被要求遵从权利法案规定的对公民自由的保护。重建时期的宪法修正案转换了宪法的功能,将其从一个基本上关于联邦-州之间的关系和财产权的文件转换成为一种工具,受迫害的少数民族成员可以借用它来要求具有实质意义的自由,并用它来反对各级政府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sup>①</sup>

人们可能会不由自主地把重建时期公民权利的扩展看成是建国之父们描绘的政治远景的一种顺理成章的成果,这种远景在制宪时期因种种现实原因未能得以实现。但事实上,美国自由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排斥性的界限。重建与其说体现了革命时期原则的结果,不如说是对美国过去70年来的实践所作出的一种革命性的否定。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的法律和宪法修正案引起了非常激烈的反对。这些法律和修正案包含的基本原则——包括联邦政府有权界定和保护公民权利,黑人是美国政体中的平等成员等——是对美国法律传

---

<sup>①</sup> Foner, *Reconstruction*, 24; Frederic Bancroft, ed., *Speeches, Correspondence and Political Papers of Carl Schurz* (6 vols. New York, 1913), I, 487-88; Akhil R. Amar, *The Bill of Rights: Cre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New Haven, 1998); Robert J. Kaczorowski, "To Begin the Nation Anew: Congress, Citizenship, and Civil Rights After the Civil Wa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2 (February 1987) 47-49; Donald G. Nieman, "The Language of Liberation: African Americans and Equalitarian Constitutionalism, 1830-1950," in *The Constitution, Law, and American Life: Critical Aspects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Experience*, ed. Donald G. Nieman (Athens, GA, 1992), 67-90.

统的最明显的背离。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否决了一个又一个类似的法律,但结果是,国会又重新通过它们;他不无道理地声称,联邦政府对黑人权利的保护以及支持这种行动的对联邦权的广义性定义,完全违背了“我们作为一个人民的全部历史经验”。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托马斯·亨德里克斯也附和说:“我们不同属一个种族。我们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太,而不应该组成一个共同的政治社会。”<sup>①</sup>

重建时期的共和党人否认了这种理论,但他们自己的权利普遍性理论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在他那篇名为“混合的民族”(1869年)的精彩演说中,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谴责了对中国移民的偏见和歧视,坚持认为美国的命运就是为“来自全球每一个角落的、为一个共同的追求民族自由的理想所激励而来到这里”的人提供一个避难所。他认为,任何形式的排斥都是与民主的精神和原则相抵触的。一年之后,查尔斯·萨姆纳提出,将“白人”一词从美国归化法律中取消。但从西部州来的参议员们竭力反对。他们愿意接受黑人为公民,但拒绝接受来自亚洲的人。在他们的坚持下,联邦归化法作了这样的修改,将非洲人加在已经可以归化入籍的“白人”之后。移民法没有改动对亚洲人的限制;国籍的种族界限被重新划分,但并没有被取消。亚洲移民仍不能归化成为美国公民,虽然他们出生在美国的子女可以自动地成为美国公民。<sup>②</sup>

妇女权利的倡导者也同样遭遇了重建时期的平等思想中的局限性。如同革命一样,内战也带来了“自由的传播”。在内战期间,妇女选举权运动加入了保卫联邦和废除奴隶制的斗争,而对自身诉求的争取则基本上停止了。重建时期对平等问题的极度重视,使女权运动把重建看成是争取妇女解放的一个黄金时机。内战前那种将妇女的地位与奴隶制等同的说法,此刻又有了新的价值,被用来作为一种新的抗议语言。20年前组织和发动塞尼卡·福尔斯大

<sup>①</sup>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1993), 238-39; Foner, *Reconstruction*, 250, 278-79.

<sup>②</sup> Douglass in Philip S. Foner and Daniel Rosenberg, eds., *Racism, Dissent, and Asian Americans from 1850 to the Present* (Westport, 1993), 223-24; Lucilla Gettys, *The Law of Citizen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1934), 62-69.

会的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宣布说,妇女也与黑人一样,已经进入了一个“从奴隶制走向自由的转折时期”。许多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也应遵循一条相同于奴隶们获取自由时走出来的道路。妇女选举权运动领袖奥林皮亚·布朗宣称道,对宪法的修订为把种族和性别——这两种不值得法律承认的“身体上的特征”——与自由的恩惠分离开来提供了机会,也为将“黑人和妇女埋没于公民群体之中”提供了机会。多产的女权作者简·克罗利也说,“当代的个人权利的理论,”在内战和重建的强力推动和肯定下,“要求一个妇女有权按她自己独自一个人的决定自由地过她的生活。”第三个女权主义作家坚持说,选举权将保障妇女“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的自由”,并将她从“政治奴役”之中解救出来。<sup>①</sup>

所以,妇女现在也应该享有自由劳动的经济机会。内战前女权主义者就认为,出外工作的权利对一个妇女的自由非常重要,现在内战把许多妇女推到工资劳动的队伍中,也夺走了许多妇女的男性供应者,这种情形使战前的工作权说法显得更为紧迫。苏珊·B. 安东尼写道,妇女希望得到一种不少于男人的“崇高的独立”,希望为一份无性别“歧视”的工资而工作。自然,以种族和性 109 别界限划分的市场从根本上与那种主张通过工资劳动来争取女性独立的思想是相矛盾的。到 19 世纪末,向妇女开放的最大的就业种类仍然是家庭服务和低收入的工厂工作。女权主义者一直寻求能使妇女真正享受到自由劳动好处的途径。玛丽·利弗莫尔的新女权杂志《鼓动者》的每一期都发布报道,批评妇女在进入劳工市场时所面临的有限的机会和不平等的收入等问题。《新西北》杂志的编辑阿比盖尔·司各特·达尼韦(在她丈夫的生意失败之后,她用自己的写作来维持六个孩子和她丈夫的生活)则走得更远。她坚持认为,“已

---

<sup>①</sup> Ellen C. DuBois, ed., *Elizabeth Cady Stanton Susan B. Anthony, Correspondence, Writings, Speeches* (New York, 1981), 132; Ellen C. DuBois, “Outgrowing the Compact of the Fathers: Equal Rights, Woman Suffrage,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1820-1878,”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4 (December 1987), 846; Jane C. Croly, *For Better or Worse* (Boston, 1875), 191; Virginia Penny, *Think and Act: A Series of Articles Pertaining to Men and Women, Work and Wages* (Philadelphia, 1869), 183.

婚妇女的自由”要求对她们的家庭劳动给予报酬和对家庭财产能够平等分享。<sup>①</sup>

对那些最为激进的女权主义活动家来说,奴隶解放激发了她们发出的妇女从婚姻“奴隶制”中解放出来的呼喊。“那个使整个国家经历了一场革命的同一个主张平等的法律,”斯坦顿宣称道,“正在敲响我们的家门。”奴隶这种财产被废除了,但是“对妇女这种财产的拥有权”并没有被触动。如果“不付酬劳”的劳动在南部的种植园中已不再合法的话,还有什么理由能证明它在自由家庭中的继续存在是合法的呢?斯坦顿在演说和写作中,提出了一系列女权主义者关心的重点问题:包括放宽离婚法的限制(这些法律通常要求出具通奸、丈夫抛弃家庭或妻子受到极度残酷的虐待的证据,才能终止婚姻),承认“妇女有权控制她自己的身体”(包括保护自己不受家庭暴力的伤害和为后代称为“节制生育”的权利)。她发现,比起选举权来,这些问题给她的女性听众带来一种“更深的震动”。“妇女们对我关于离婚的演说的反响与关于选举权的演说的反响完全不同,”斯坦顿提到,“呵!她们是带着多大的哀怨来听我的演说呀。”“我们这个腐朽不堪的婚姻制度,”一位俄亥俄州的妇女写道,“是妇女自由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苏珊·B. 安东尼终身未嫁,她相信“单身女性的时代”正在快速来临,“不愿被统治的妇女必须以不结婚的方式生活。”<sup>②</sup>

在将自由的逻辑适用于个人生活方面做得更为极端的是维多利亚·伍德霍尔。伍德霍尔是一个具有磁性般的个性和能使人着迷的演说家。“我们称为

① DuBois, ed., *Stanton Anthony*, 98, 141; David Montgomery,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Labor: The Workplace, the State, and American Labor Activism, 1865-1925* (New York, 1987), 136-37; Steven M. Buechl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The Case of Illinois, 1850-1920* (New Brunswick, 1986), 72-78; Ruth B. Moynihan, *Rebel for Rights: Abigail Scott Duniway* (New Haven, 1983), 88; Reva B. Siegel, “Home as Work: The First Woman’s Rights Claims Concerning Wives’ Household Labor, 1850-1880,” *Yale Law Journal*, 103 (March 1994), 1156-57.

② DuBois, ed., *Stanton Anthony*, x-xi, 100, 132, 148, 207; Amy D. Stanley, “Conjugal Bonds and Wage Labor: Rights of Contract in the Age of Emancipatio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5 (September 1988), 478-81; Siegel, “Home as Work,” 1112.

自由的东西，”她说，“是一个含量很大的词，包含着许许多多人们还未能认识和承认的内容。”伍德霍尔认为，自由不是“一堆互不相关的不同原则”，而是一种不可分割的思想，它的基础是个人控制生活中所有领域的主权。对于妇女来说，自由不仅含有选举权和完全的经济机会方面的内容，也包括了“爱情的自由”。“我<sup>110</sup>是一个自由的恋人，”不可制服的伍德霍尔宣称说，“我有不可剥夺的、宪法意义和自然意义上的权利去爱我愿意爱的人，爱多长或多短时间，由我来决定；如果我愿意，我可以每天都变换这种爱情。”<sup>①</sup>

这一时代里的一小撮自称为自由恋人的人虽然被痛斥为文明社会的敌人，但他们却不是真正的我行我素的浪荡子；尽管他们鼓吹“社会自由”，对既存的“奴役”妇女的法律和没有爱情的婚姻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但她们大都仍旧过着一种传统的家庭生活。但斯坦顿、伍德霍尔和其他人对婚姻制度的攻击却彻底得罪了那些公共道德的卫道士。当伍德霍尔将比彻－蒂尔顿的婚外情丑闻公诸于众时，至少在当时来说，她的做法对女权运动造成的伤害最大。这桩丑闻涉及到亨利·沃德·比彻和伊丽莎白·蒂尔顿之间的一场情爱关系。前者是当时美国最负盛名的牧师，后者是一位有名的改革派主编的妻子。伍德霍尔的“罪行”在于将本来被广泛认为纯属是私人性质的事情抖到公开的场合中，使其变成一种公共问题。同时，一个自称提倡“自由恋爱”的人做出这种道德上的大忌，使人感到尤为愤慨。社会上有名望有身份的人纷纷站出来，为比彻讲话，洗刷名声，由此引起的公众愤怒迫使女权主义者将离婚的议题从公共辩论中撤除。这桩丑闻对1873年科姆斯托克法的通过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部法律禁止通过邮局寄送“淫秽”材料，包括节制生育的信息。<sup>②</sup>

但是这桩桃色事件并不是致使对“社会自由”的大胆呼唤销声匿迹的惟一原因。即便斯坦顿和她的跟随者在大谈放宽离婚的限制时，年轻的和年老的

① Victoria Woodhull, "And 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 (New York, 1871).

② Luisa Cetti, "The Radicals and the Wrongs of Marriage: The Rutland Free Convention of 1858," in *Making, Unmaking and Remaking America: Popular Ideology Before the Civil War*, ed. Loretta V. Mannucci (Milan, 1986), 77-94; Foner, *Reconstruction*, 520-21.

前奴隶们却大批地涌向自由民局和地方政府,第一次取得了合法的婚姻地位。对黑人来说,剥夺他们拥有家庭的权利,正是奴隶制的最根本的邪恶之一;而拥有组成稳定家庭的权利,则是自由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对大多数白人妇女来说,包括许多女权主义者在内,婚姻仍然是一种具有神圣意义的结合和一种人生的联结,而不是一种可以任意解除的契约安排。在《妇女日报》上,露西·斯通斥责了“那种不负责任的、伤风败俗的支持便捷离婚的言谈”,这类言论只能破坏向妇女提供亲密感情和经济支持的体制,在世界上,没有什么人能够真正地独立地生活。斯通认为,解决迫害妇女的家庭暴力的途径不是离婚,而是国家对受害的妇女提供保护和惩罚那些虐待妻子的男人。<sup>①</sup>

19世纪末,最大的妇女组织是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WCTU)。1892年时,它拥有15万成员。它吸引和聚集盟员的口号是“保护家庭”。尽管这个组织的主席弗朗西丝·威拉德坚持认为,“妇女的更大自由”在于有个人发展的自由和向社会福利作贡献的自由,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对数以百万计的那些只把自己看成是妻子和母亲的妇女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决心要在美国生活中彻底禁止烈性酒,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最终支持了妇女选举权的斗争,但它始终没有同意支持便捷离婚的口号。对于劳工领袖塞缪尔·冈波斯所称的伍德霍尔“极端原则”,其他的改革者也不赞成。当第一国际的纽约支部受到伍德霍尔的影响时,当时住在英国的马克思,命令将这个支部开除出第一国际。冈波斯称,劳工运动永远不会支持一个“把家庭体制扔到船外去”的计划。事实上,正如一个反对妇女选举权的女性所说,这个运动的最大阻碍来自于一种“本能感觉”,无论男女,都本能地感到“妇女的政治独立将毁灭我们目前家庭体制”。<sup>②</sup>

① Foner, *Reconstruction*, 82-88; Andrew M. Kerr, *Lucy Stone, Speaking Out for Equality* (New Brunswick, 1992), 156; Elizabeth Pleck, “Feminist Responses to ‘Crimes Against Women’, 1868-1896,” *Signs*, 8 (Spring 1983), 456-60.

② Barbara Epstein, *The Politics of Domesticity: Women, Evangelicism, and Tempera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Middletown, CT, 1981), 125-27; Ross E. Paulson, *Liberty, Equality, and Justice: Civil Right's, Women's Rights, and the Regulation of Business, 1865-1932* (Durham, NC, 1997), 88; Samuel Gompers, *Seventy Years of Life and Labor* (2 vols. New York, 1925), I, 54-56; Mari Jo Buhle, *Women and American Socialism, 1870-1920* (Urbana, 1981), xiv-xv; Linda K. Kerber, “A Constitutional



除此之外,那些继续提出节制生育问题的人,也面临着法律制裁的威胁。在科姆斯托克法的影响下,许多人遭到逮捕,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恋爱者埃兹拉·海伍德,她因散发一份名为《丘比特的枷锁》的鼓吹婚姻内外的性自由的杂志被判了两年的监禁。与此同时,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建立了一个禁止非纯洁文学的部门。因为这些原因,婚姻改革和妇女控制性生活问题的讨论从公共生活中退了出去。一直要到20世纪后,“社会自由”及其相关的在性问题上的言论自由权等问题,才会再度复苏,成为女权运动内外的极具影响力的公共话题。<sup>①</sup>

总体来说,重建在扩展妇女自由的定义方面所起的作用实在微不足道。重建时期的共和党人把解放看成是一种重新恢复黑人拥有家庭生活的权利,在恢复的家庭生活中,男人应该拥有他们在家庭中的一家之主的位置,而女人也应该担负起她们在家庭领域中的位置,而这种位置曾被奴隶制以违背自然规律的方式加以剥夺。恢复自由人的“男性特征”和妇女生养孩子的权利,是(黑人)自由的中心内容之一。好几名国会议员明确指出,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对“强制性奴役”的禁止绝不适用于家庭内部的关系。“丈夫对他妻子的服务拥有一种财产权,”一位议员说道,废除奴隶制并不意味着要废除这种权利。来自衣阿华州的共和党议员约翰·卡森宣称道,除了对“人身自由”权利的恢复,由男性当家做主的家庭也同时象征着“丈夫对妻子的权利”和“父亲对子女的权利”的恢复,这三种权利构成了“人类社会最伟大的三项基本权利”。在选举权的问题上,国会中没有什么人(包括激进共和党人在内)对女权主义者的要求持同情态度。他们认为,重建是“属于黑人的时刻”(准确地说,是男性黑人的时刻)。即便是参议院中最坚定的提倡平等的议员查尔斯·萨姆纳,也如 112 同女权主义者弗朗西丝·盖奇一样不无悲哀地说,在妇女权利的问题上也“远

---

Right to Be Treated Like American Ladies: Women and the Obligations of Citizenship,” in *U.S. History as Women's History: New Feminist Essays*, ed. Linda K. Kerber, et al. (Chapel Hill, 1995), 26.

① Martin H. Blatt, *Free Love and Anarchism: The Biography of Ezra Heywood* (Urbana, 1989), 100-18; John D'Emilio and Estelle B.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s: A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1988), 159.

远未能坚持自由的伟大原则”。<sup>①</sup>

因此,尽管重建否定了19世纪上半叶以来出现的对自由的种族性定义,但它没有触动婚姻法和传统的性别关系。当妇女们企图利用改写的法律和宪法来要求自己的权利时,联邦法院对她们的要求断然地加以否定。迈拉·布拉德韦尔曾运用自由劳动的权利理论(包括选择个人职业的权利),来挑战伊利诺斯州一项只准男性从事法律行业工作的法律,但联邦最高法院在1873年驳回了她的要求。大法官们声称,自由劳动的原则并不适用于妇女,因为“上帝的法律”指定妇女只能呆在“家庭领域”。此后不久,弗吉尼亚·迈纳以剥夺公民的选举权违反了所有公民应享有的“完美的自由”为理由,向只准男性公民投票的法律提出挑战。首席大法官莫里森·韦特回应道,公民资格与缺乏选举权之间并不矛盾,因为公民资格只是表明“一个国家成员的身份,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内容”。<sup>②</sup>

最高法院对妇女权利的态度实际上是它对公民资格的涵义进行更为普遍的狭隘解释的一种前兆。这种狭义的解释很快将剥夺由重建时期的国会赋予黑人的许多保护措施。女权主义者对男性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深感失望,认定后者出卖了她们的利益;她们的斗争方向开始脱离那种以废奴运动的“平等公民”普遍原则为基础的“平权女权主义”,而转向到一种“差别”女权主义,这种女权主义强调妇女们因她们特殊的本质能够为美国社会提供一种独特的道德贡献。这种转向也分化了妇女权利运动,一部分人相信第十四和十

---

① David W. Blight, *Frederick Douglass' Civil War, Keeping in Jubilee* (Baton Rouge, 1989), 192; *Congressional Globe*, 38<sup>th</sup> Congress, 2<sup>nd</sup> sess., 193, 528; Foner, *Reconstruction*, 255; Gage in Stanley, "Conjugal Bonds," 471.

② Norma Basch, "The Emerging Legal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Property, Divorce, and the Constitution," *Signs*, 12 (Autumn 1986), 111; Ellen C. DuBois, "Taking the Law into Our Own Hands: *Brandwell*, *Minor*, and Suffrage Militance in the 1870s," in *Visible Women, New Essays on American Activism*, ed. Nancy A. Hewitt and Suzanne Lebsock (Urbana, 1993), 19-26; Norma Basch, "Reconstructing Female Citizenship: *Minor v. Happersett*," in *The Constitution, Law, and American Life*, ed. Nieman, 60-61; Rogers M. Smith, *Civic Ideals, Conflicting Visions of Citizenship in U. S. History* (New Haven, 1997), 341.

五条宪法修正案是争取真正普选权的重要进步,另一部分人则认为黑人之获得选举权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增加了新的障碍。后一种人呼吁,女权主义者必须摆脱对废奴主义传统的依赖,组成完全独立的组织,在一切领域中寻求和联合新的同盟军。<sup>①</sup>

尽管带有这些明显的局限性,重建书写了美国自由历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篇章。其中最为辉煌的是 1867 至 1877 年南部激进重建时期的短暂历史。在那段时期,如同一位前奴隶后来写道的,“自由的警钟响了,”黑人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地分享到了政治权力。在南部进行的这场跨种族的民主实验,因为三 K 党的暴力反抗和北部从平等理想领域中的退却等原因,在 19 世纪 70 年代夭折了。南部的黑人社会从来没有忘记这段极为不公正的历史。“北方人说,他们帮助我们获得了自由,”前奴隶托马斯·霍尔在 1930 年的采访中说,“但他们又把我们送回到奴隶制中去了。”但是,沉睡的巨人将为后来的几代人唤醒,用来为奴隶制的后代争取实现自由的梦想和承诺。重建所取得的成果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对 19 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对民主的种族性定义的否定,是推动自由思想重新成为一种普遍权利过程中的重要一步。<sup>②</sup>

即便在它的进程中,重建也反映出 19 世纪不同的自由定义之间存在的冲突。那种企图为前奴隶提供土地的努力遭到国会的否定。如同道格拉斯指出的,如果奴隶解放代表着奴隶们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的汇合,最终这些利益以及它们各自对自由的定义,注定要分道扬镳,只有极少一部分共和党人立法者,尤其著名的是激进国会议员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想在重建中恢复贯彻一种旧的思想——一种由前奴隶提出的思想——即不拥有生产资料,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在这个方面,由解放带来的崇高期望远未实现。

内战结束后不久,一群居住在南卡罗来纳州埃迪斯托岛的前奴隶抗议将

① DuBois, “Outgrowing the Compact,” 848-51; Buechler, *Transformation*, 110-17; Ellen C. DuBois, *Feminism and Suffrage: The Emergence of an Independent Women's Movement in America, 1848-1869* (Ithaca, 1978), 162-202.

②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Senate Up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and Testimony Taken by the Committee* (5 vols. Washington, DC, 1885), IV, 450-51; Foner, *Reconstruction*, 346-459, 564-601, 610.

他们赶出土地的强制性做法,这些土地是谢尔曼将军在会见萨瓦那的牧师之后,分配给他们耕种的。他们抗议说,一无土地,二无家园,他们将在经济上继续依赖他们的前主人:“这不是真正的自由人所处的状态。”在重建结束后许久的一段时间里,黑人对重建未能解决土地分配问题的失望始终没有消失。“我知道我期望从自由中获得的東西与我所得到的东西完全不同,”一位名叫威廉·科尔曼的年迈的前奴隶在20世纪30年代回忆说,“是的,先生,他们应该把主人的土地分一部分给我们,因为是我们这些穷苦的奴隶们创造了我们主人所拥有的一切。”<sup>①</sup>

回想起来,重建时期实际上是决定经济自由概念主要内容的一个关键时刻:这个内容指的是对自身的拥有和拥有在市场上竞争的自由,而不是财产基础上的独立。在政治社会中赋予黑人一个位置,但却拒绝让他们享有土地改革的利益,这样做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一个自由的公民也可以是一个依附他人的劳工。由此可见,重建显然巩固了政治与经济领域分离、政治平等与经济不平等并列的美国式生活方式。这样,重新复活将经济自立作为自由的基础这种更为古老思想的任务,就留给了后来的异见者们——包括劳工运动的激进分子、平民党人、社会主义者及其他一些类似的人。

---

<sup>①</sup> Foner, *Reconstruction*, 160, 245-46; George P. Rawick, ed., *The American Slave: A Composite Autobiography* (39 vols. Westport, 1972-79), Sepp. 2, III, 877.

## 第六章 契约自由及其反对者

1886年10月28日,纽约港湾聚集了一个庞大的人群,参加“照亮全世界的自由”雕像的揭幕仪式。这对于此刻已经废除了奴隶制、获得完全自由的美国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象征了。雕像的主意是在1865年夏天在法国的一个晚餐会上产生的。最先想到这个主意的是爱德华·德·拉布莱,他是一位教育家,写过好几本关于美国的书。他的初衷是用这个雕像对林肯的遇刺身亡作出一种反映。拉布莱希望这个雕像能展示法国与美国之间的友谊(在内战期间,这种友谊因法国在墨西哥的阴谋诡计多少受到一些玷污),同时也对因联邦战胜南部邦联而带来的美国自由的胜利表示庆祝。这座雕像从火炬到女神的脚趾,一共有150英尺高,矗立在一个巨型底座上;当地报纸不无自豪地报道说,这座雕像是西半球最高的人造建筑,在高度上超过被誉为古代奇迹之一的希腊罗得岛的太阳神雕像。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后来被称为自由女神的雕像将成为美国人最崇敬的国家象征,如同铭刻在它的底座上的埃玛·拉扎勒斯的诗句所示,它是一座向那些“渴望呼吸自由”的移民表示欢迎的象征,同时在广义上更是一种自由和国家特性的象征。自从它的竖立之日起,雕像那个为人十分熟悉的形象被民间艺术家们想尽各种方式来加以复制,而且也为广告商们用来推销从香烟到剪草机和战争债券在内的一系列商品。政治漫画家们也乐此不疲地采用女神像来评论政治时事和运动,从总统选举到麦卡锡主义、女权主义和族裔与种族间的不容忍等。同时,自由女神像也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象征。

1886年是“大动荡”的一年——强大的罢工浪潮席卷着全国各地——那些由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所带领参加女神像揭幕仪式的人声称,女神像是美国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象征。但这种说法并非为所有的美国人所接受。在那些为庆祝女神像落成典礼而遨游在纽约港湾的许多船只中,有一艘是由

纽约州争取妇女选举权协会租用的,这艘船一方面抗议妇女被排斥在“政治自由”之外,另一方面也对应邀到贝德罗岛(现称为自由岛)上参加揭幕仪式的600名贵宾中有598人是男人的现实提出抗议。女神像落成仪式几天之后,纽约人纷纷前往投票站,选举市长。将近七万人把票投给了联合劳工党的候选人亨利·乔治。乔治在选举中名列第二,大大超过了共和党的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险些战胜民主党候选人阿伯拉姆·休伊特。乔治所赢得的支持揭示了壮丽辉煌的自由女神像无法掩盖的深刻的社会分歧。<sup>①</sup>

## 镀金时代的自由

从内战到19世纪末,美国经历了一场其他国家从未经历过的最深刻的经济革命,见证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发生于劳资双方之间的最剧烈的斗争。生活在那一时代的人们曾对以煤、铁和蒸汽构成的新型经济在一个以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世界中取得的胜利赞叹不已。当时还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约翰·杜威在1899年写道,“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场如此迅速、如此广泛、如此彻底的革命,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到20世纪初,美国的制造业生产总量超过了英国、德国和法国的总和。1860至1880年间,美国的铁路里程增加了三倍,并在1920年再增加三倍;铁路的发展为商业性农业生产开辟了极为广阔的新天地,建立了全国性的制造品市场,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采矿和钢铁工业的繁荣发展。与此同时,大铁路动脉对资本的巨大需求,推动了座落在华尔街的全国金融市场的集中化。到1900年,经济集中化的过程进入到了几乎所有的工业领域之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公司控制着钢铁、石油、糖业加工、肉类包装和农业机械制造等行业。这些商业和企业对政治的影响力与它们的经 117

<sup>①</sup>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9, 1886; Neil G. Kitler, “The Statue of Liberty as Idea, Symbol, and Historical Presence,” and Christian Blanchet, “The Universal Appeal of the Statue of Liberty,” both in *The Statue of Liberty Revised*, ed. Wilton S. Dillon and Neil G. Kotler (Washington, DC, 1994), 1-7, 34-35; Roger A. Fischer, *Them Damned Pictures: Explorations in American Political Cartoons* (North Haven, CT, 1996), 150-62; Nancy Jo Fox, *Liberties with Liberty* (New York, 1985), 14-16.

济生产能力不相上下。在内战后的时代,或马克·吐温所称的“镀金时代”中,巨型公司强有力地影响着主要政党的活动,并左右着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决策过程。

在纽约和费城这样的城市,许多行业仍然继续保留了手工业生产;大批的工人,不分男女,仍旧在自己的家里工作,或作为帮工在别人家里工作。但工厂制却无可辩驳地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制造业中一半工人是在拥有250名雇员以上的公司或工厂工作。新工厂的劳力来自于丢掉饭碗的手工匠人、成千上万的从农村移居到城市的美国人以及数量更大的从海外来到美国的新移民。由于大企业坚持要对新的工业劳动大军行使所谓的管理特权,劳资双方爆发了充满仇恨并经常充满暴力性的冲突,这些冲突在美国劳工史的史书上都留下了永久的记忆——包括大铁路罢工、霍姆斯特德大罢工、普尔曼大罢工以及科达伦大罢工等在内。<sup>①</sup>

尽管在这些年间,实际工资一直在持续增长,但货币贬值和价格衰落、持续于19世纪70到90年代的经济萧条,加上极为普遍的、即便在繁荣时期也没有保障的就业危机,使得劳工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仍旧处于极为贫困的状态。而在经济光谱的另一端,镀金时代则见证了史无前例的财富积累。到1890年,占美国人口百分之一的最富有的美国人的收入总和相当于美国底层一半人口的收入总和。这百分之一人口所拥有的财产超过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共同拥有的财产。一个富有的、影响巨大的工业资本阶级和一个生活在贫困边缘的无产阶级的同时出现,加上美国边疆的关闭(这是联邦人口统计局在1890年宣布的),传统的自由定义面临了严峻的挑战。继续将工资劳动看成是通往经济自立的一个暂时栖息点,继续把西部看成是能够安置所有的东部小产业者的天堂,显然已经越来越不现实了。新巨型企业中掌握的权

---

① Jo Ann Boydston, ed., *John Dewey: The Middle Works, 1899-1924* (15 vols. Carbondale, 1976-83), I, 6; Eric Foner, *Reconstruction: 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1863-1877* (New York, 1988), 461-62; David Montgomery,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Labor: The Workplace, the State, and American Labor Activism, 1865-1925* (New York, 1987), 44-57, 112-70; John A. Garraty, *The New Commonwealth 1877-1890* (New York, 1968), 78-127.

力,看上去并不受制于民主的管理,也对自由是一种民选自治政府的概念提出了一连串同样令人深感不安的问题。集聚的财富使政治过程贬值,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在《财富挑战国家》一书中这样指出。1894年出版的这本书展示了标准石油公司如何操纵市场,把自己的对手挤出竞争行列,同时也描述了它如何向立法者行贿,并通过其他方式将政治民主嘲弄得一钱不值。“自由与垄断,”劳埃德的结论是,“不能共同生活在一起。”<sup>①</sup>

对一小部分工人来说,新兴工业体系创造了自由的新形式。在有些工业 118 领域中,手工业匠人对生产过程掌握着相当大的控制权,他们自立的基础不是原先那种对财产的拥有权,而是他们的技能和集体的自治能力。“矿工的自由”包含了一系列宽松的工作规则,这些规则允许技术熟练的井下矿工在工作时,可以不受管理人员的监督。同样,技术熟练的钢铁工人也可以在“工匠王国”中发号施令,他们通过自己的工会,决定产品的定额,并在翻砂技术方面负责对学徒工的训练工作。然而,这种所谓的“自由”只为整个工业劳动大军中的极少数人所享有,它对工厂中大量无技能的新操作工的生活毫无影响。从内战前继承而来的政治文化认为:自由的基础在于广泛分布的对生产资料的拥有,新世界的吸引力在于为所有平凡普通的人争取经济上的独立提供机会;但是,被马萨诸塞州棉花制造厂主埃德华·阿特金森称之为“一个永久性的工厂人口”的出现,对这些观点提出了挑战。“旧世界的最大邪恶——将社会分割成为不同的阶级,”《民族》杂志在内战结束两年后宣称道,已经来到了美国。<sup>②</sup>

① Montgomery, *Fall of the House of Labor*, 46-48, 138-40; Garraty, *New Commonwealth*, 128-40; Alan Trachtenberg, *The Incorporation of America: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Gilded Age* (New York, 1982), 99; Henry Demarest Lloyd, *Wealthy Against Commonwealth* (New York, 1899), 517-19.

② David Montgomery, “Workers Control of Machine Production in the 19<sup>th</sup> Century,” *Labor History*, 17 (Fall 1976), 485-509; Carter Goodrich, *The Miner's Freedom* (Boston, 1925), 15-18, 39-42; Frances G. Couvares, *The Remaking of Pittsburgh: Class and Culture in an Industrializing City, 1877-1919* (Albany, 1984), 9-30; Edward Atkinson to Charles Eliot Norton, March 7, 1864, Charles Eliot Norton Paper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The Nation*, June 27, 1867.



随着美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成熟的工业经济阶段,“劳工问题”取代奴隶制成为公共生活中的最有影响的问题。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力图搞清楚正在出现的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力图确定这种新秩序对美国自由的影响。围绕政治经济学的辩论吸引了成千上万美国人的注意,其范围和影响远远超出了狭窄的学术圈子,传播到由自学自教的工人和农民、各式各样的改革者、报纸主编和政客们组成的“公共领域”之中。这种影响和范围颇为宽广的公共讨论导致了数千种书籍、小册子和论文的出版,这些出版物讨论的问题不仅包括一系列具体的技术性问题,如土地税、货币改革以及国库的分库计划等,同时也包括了对经济变化带来的社会和道德影响问题的广泛辩论。

由于国民经济生产能力的极大发展,许多美国人认为,资本的集中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的、合理的进步结局。许多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工业界的大亨们也倾向于认为,过去那种工人有得到劳动成果的权力的观念已经愈来愈不合时宜;当现代的企业已经取代独立的生产者成为经济变革的推动力时,这种看法显然已经过时了。那种对劳工尊严的强调逐渐地开始让位于对工厂管理者、企业家和技术本身对经济进步所作出的贡献的重视。在20世纪初,高级经济学课程已经开始讲授这样的观点:工资是由供需关系的铁定规律决定的;财富并不流向那些工作最努力的人,而是流向那些最拥有企业家的能力的人,尤其是那些知道如何在市场上满足消费者需求能力的人。革命时期产生的并由内战巩固了的那种自由与平等紧密相连的观念,逐渐地成为老皇历。社会科学的任务,铁厂主阿布拉姆·休伊特说,就是找到办法说服那些“在自由上平等的人”接受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在(财富)分配上……不平等”的现实。<sup>①</sup>

在这方面第一个出来应战的是自称为“自由派”的改革家们,这是一个由

---

<sup>①</sup> Nancy Cohen, "The Problem of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Capital: Reconstructing American Liberalism, 1865-1890,"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6; James L. Hutson, *To Secure the Fruits of Labor: The American Concept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1765-1900* (Baton Rouge, 1998), ch. 10; Sarah L. Watts, *Order Against Chaos: Business Culture and Labor Ideology in America, 1880-1915* (New York, 1991), 4; Allan Nevins, ed., *Selected Writings of Abram Hewitt* (New York, 1937), 277.

报刊主编、学术界和专业人士组成的颇有影响的群体。他们抛弃了内战时期那种把自由与民主政府的能动性等同起来的观点,在原来的自由定义上,给自由下了一个“消极”的定义,即自由意味着免除对自主的个人的限制,并把这种消极的自由定义奉为一种道德和政治教条。在内战和重建初期,以《民族》主编 E. L. 戈德金、《芝加哥论坛报》主编霍勒斯·怀特和共和党的政治活动家卡尔·舒尔茨等为代表的自由派头面人物曾经毫无保留地支持过联邦政府有责任保证所有种族的公民享有平等权利的原则,但是,一旦法律平等的框架搭成,他们就开始强调,自由的再进步必须只能是在社会和经济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中进行。当共和党逐渐蜕化成为一群由腐败的州政党组织组成的集合体时,当妇女、农民和劳工要求政府使用权威解决他们面临的种种困难和压迫时,这些自称为美国社会“精英”的出版者和写作者们不但从内战时期的那种民族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理想中退却,甚至也从民主原则的本身退缩回来。南部白人抱怨说,重建把有产者赶出了政治权力的中心,严重地违反了良治政府的原则;自由派人士接受了这种说法,认为在全国范围内分肥制的受益者和政治煽动家正在操纵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低收入阶级的选民,其结果是产生了像纽约市的“特威德伙帮”这样的处处违背良治政府原则的腐败政治。民主政府变成了一种对自由的威胁,而不再是自由的仆人。因此,惟一的解决办法是回归到那个被长期抛弃了的原则中去;将选举权局限在那些拥有财产的人的范围内。<sup>①</sup>

对于这些思想精英们来说,从先前的普遍选举权的原则中后撤,是 19 世纪末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在我们社会的高层……到处听得见对于普选权的怀疑和不信任,”一位观察家在 1879 年写道。但是,除了黑人选举权的问题之外,全面限制投票权的提议要想得到批准,机会也很小,因为“人们不会投票赞成剥夺自己的选举权的,”一位改良者说。尽管他们无法将他们的精英政府观贯穿到实际政治中去,自由派人士却在广泛传播和普及一种新自由观的过程

120

<sup>①</sup> John G. Sproat, *"The Best Men": Liberal Reformers in the Gilded Age* (New York, 1968); Foner, *Reconstruction*, 488-93; Michael E. McGerr, *The Decline of Popular Politics: The American North, 1865-1928* (New York, 1986), 43-54.

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种新自由观——即将自由与有限政府和自由放任经济学等同起来——将在 19 世纪的最后 25 年中在商业和职业人士阶层中取得支配性的地位。<sup>①</sup>

因为他们掌握了美国最重要的报纸和期刊,自由派改良者把教育大众懂得(新的)自由原则之事视为己任。他们社会观的核心是契约思想,这种思想既是一种表面上的自由意志和自愿行为的体现,也是一个描述正常的社会关系的全能性比喻。“契约的法律,”一位改良者写道,“是文明的基础。”1861 年,英国法律史学家亨利·梅因爵士曾讲过一句经常被引用的话,他认为,“进步社会”的历史可被描述成为“一个从等级走向契约的运动”。奴隶的解放以及正在出现的作为工人的自由黑人与他们前主人的关系(界定这种关系的是劳工契约,而不是由主人的主权)都为梅因的格言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注释。只要经济进步和劳资关系是由独立自主的个人们自由签定的契约所主导的,那么美国人就没有理由抱怨说他们失去了自由。<sup>②</sup>

一个生来是劳工的人,经济学家戴维·A. 韦尔斯在 1877 年写道:将“永远只能是一个工人”,政府没有任何办法来改变这种现实。事实上,当工人们提出要政府强制实施八小时工作制和用其他手段干预经济时,自由派人士会以此为例来说明政治权力的滥用将会如何威胁到自由本身。“每个人按自己的意愿决定他应该工作多少的权利以及他享有自己收入的权利,是自由的……真正的基础,”霍勒斯·怀特写道。戈德金回应说,市场,而并非民主政治,才是自由的真正领域:自由意味着“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以我们自己乐意的方式,有权自由地买卖、修理和创造,”完全不受政府的干涉。在镀金时代,奴隶制仍然影响着对自由的讨论,但却是以不同的方式。自由派利用了奴

① Jonathan B. Harrison, “Limited Sovereign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tlantic Monthly*, 43 (February 1879), 186; Dorman B. Eaton, “Municipal Government,” *Journals of Social Science*, 5 (1873), 7; Michael Les Benedict, “Laissez-Faire and Liberty: A Re-Evaluation of the Meaning and Origins of Laissez Faire Constitutionalism,” *Law and History Review*, 3 (Fall 1985), 293-331.

② George W. Welch to Benjamin F. Butler, May 19, 1874, Benjamin F. Butler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Henry S. Maine, *Ancient Law*, 10<sup>th</sup> ed. (London, 1881), 165.

隶制幽灵的说法来否定一切影响市场运作的行为。管制劳工工作条件的法律是一种奴隶制,因为这些法律剥夺了自由意志的人按自己意愿处置他们的财产(包括他们自己的劳动)的权利。因此,自由劳动的思想,原本是主张在一个广泛平等的社会中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小生产者社会,现在却嬗变为一种维护资本主义市场不受限制地运作的理论。<sup>①</sup>

正如在早些时候,某些种族具有天生优越性的观点曾被用来证明自由社会中奴隶制的合法性,镀金时代的社会理论家们也借助科学来解释不同的个人和社会阶级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将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二者进行的类比深深121地渗透在这一时代的思想模式之中。从查尔斯·达尔文那里借来的语言(通常是经过英国社会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著作的途径),如“自然选择”、“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等,大量地得以使用,并成为这一时代的自由放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斯宾塞和他的美国信徒手中掌握着后来被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对各种形式的政府对社会的“自然”运作进行的干预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早期的保守主义者往往将其政治建立在对传统的崇敬之上,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则不然,他们力主永久性社会变化的理论。他们相信,历史是一个进步的故事,其演变过程如同一个在自然界发生的过程一样,总是从简单演进到更为复杂的形式。大公司则代表了这样一种较为先进和复杂的形式,它比从前的生产方式更好更有效,这是因为它更好地适应了存在的环境。如果政府通过立法来限制大公司的运作,无异于将社会重新降低到早先那种更为原始的生产和发展水平中去。<sup>②</sup>

即便是发生在19世纪70和90年代的两次经济萧条——每一次都延续了将近五年左右,并使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失业——也没有动摇中产阶级的普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穷人们应该为他们所处的不幸境地而负责。救济赈灾的工

<sup>①</sup> Wells in Daniel T. Rodgers, *The Work Ethic in Industrial America 1850-1920* (Chicago, 1978), 35; White in Cohen, "Problem of Democracy," 86; *The Nation*, June 22, 1871; Foner, *Reconstruction*, 482, 490.

<sup>②</sup> 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Philadelphia, 1944), 33-59.

作人员和地方政府时常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区分那些值得救济的人(即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过失或错误而陷入贫困的人)和不值得救济的人,但前者始终被看作是普遍规律的例外情况。一个人在社会中不能进取成功,只能证明他在道德上的无能,缺乏“性格”(这是当时在大西洋两岸社会科学话语中使用的一个关键词),在面对恶劣和不利的境况时,缺乏自立精神、意志力和勇气。迟至1900年,除了那些住在贫民院的人以外,美国大城市中的穷人将近有一半人口得不到任何形式的社会救济。工人们改善自己情况的方式不是通过组织工会——一些工厂主把工会称为对自己成员进行“绝对控制”的压迫性组织——而是靠自己精打细算,避免欠债,并用市场经济的原则来教育自己的子女。<sup>①</sup>

斯宾塞的美国门徒中最显赫有名的、同时也是这一时代最具影响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是耶鲁大学教授威廉·格莱姆·萨姆纳。他竭尽全力,要消除美国人对自由的误解和糊涂认识。萨姆纳认为,所谓“工资奴隶制”的说法以及将自由与分享政治权力错误地等同起来的做法反映出这样一种想法,即所有个人在必要时都有权享有某种由政府提供的生活标准,这种思想在萨姆纳看来是极端危险的。他认为,自由的正当涵义应该是“对政府权力的彻底否定”和对不平等现象的坦然接受。社会面临两种而且也只有两种选择:“自由, 122 不平等,适者生存;不自由,平等,不适者生存。”萨姆纳的观点是19世纪产生的一种对自由放任式个人主义理论的最赤裸裸的辩护。对他来说,政治决不是一种用来扩展自由的工具,而是个人用来反对他人侵犯自己已经享有的自由的一种方式。1883年,萨姆纳出版一本颇有影响的名为《社会各阶级之间究竟谁欠谁》的书。他对书名中提出的问题的回答是:一般来说,各阶级之间

<sup>①</sup> Olivier Zunz, *The Changing Face of Inequality: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mmigrants in Detroit, 1880-1920* (Chicago, 1982), 261-62; Michael Les Benedict, "Victorian Moralism and Civil Liberty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in *The Constitution, Law, and American Life: Critical Aspects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Experience*, ed. Donald G. Nieman (Athens, GA, 1992), 93-95; Stefan Collini, "The Idea of 'Character' in Victorian Political Thought,"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 ser., 35 (1985), 39-43; Eileen Boris, "'A Man's Dwelling House Is His Castle': Tenement House Cigarmaking and the Judicial Imperative," in *Work Engendered: Toward a New History of American Labor*, ed. Ava Baron (Ithaca, 1991), 134-35.

谁也不欠谁什么。“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无人有权“要求他人予以帮助，也无人可以被要求来帮助他人。”萨姆纳相信，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保护“男人的财产和女人的名誉”，而不是颠倒和破坏由自然决定了的社会秩序。<sup>①</sup>

自由放任保守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逆喻，因为不受钳制的市场不仅在持续不停地推动社会变化，而且也日益分离和瓦解着旧的传统和体制。这种思想在大公司的董事会上和在像哈佛和耶鲁这种最拔尖的大学中备受青睐，为人深信不疑。然而，在将不受限制的契约自由从自由所包含的一个分支部分上升至自由的核心地位的过程中，法院扮演了最为关键的角色。在司法语言中，奴隶制的记忆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是，法院不是把奴隶制理解成为一种包含了经济、政治、社会和种族权力等关系在内的复杂制度，而至多将其看成一种对劳动者的择业自由和对劳动报酬进行讨价还价的权利的剥夺。州和联邦法院在一系列的判决中，都牢牢地将劳动自由与契约自由联系起来，否定了那些管制经济活动的州法，将其斥为对劳工选择工作机会和工作条件的自由的干涉以及对企业主以自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自己财产的自由的干预。

这种思想方式是由大法官斯蒂芬·J. 菲尔德在 1873 年屠宰场案中提出的异议中首先提出的。在那个十分著名的异次中，菲尔德坚持认为，路易斯安那州关于建立垄断性屠宰场业的规定违反了“自由劳动的权利”。他的理论是，“美国人所理解的自由……的一个基本内容”是拥有在不受政府的干预下追求合法谋生的机会和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意见否定了菲尔德的反对意见，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却严重地限制了受联邦政府保护的公民权利的范围，这种限制在现实政治中成为联邦最高法院最终抛弃重建的重要一步。然而，菲尔德却为后来的一系列决定指出了方向，这些决定将为企业主（如果不是

---

① Jeffrey P. Sklansky, "The Fall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Rise of Social Psych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1830-1930,"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6, ch. 4;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51, 63; Robert G. McCloskey, *American Conservatism in the Age of Enterprise 1865-1910* (Cambridge, MA, 1951), 64-67; William Graham Sumner, *What Social Classes Owe to Each Other* (New York, 1883), 24; Mark A. Graber, *Transforming Free Speech: The Ambiguous Legacy of Civil Libertarianism* (Berkeley, 1991), 53.

前奴隶的话)提供对公民权利的联邦保护,而这些权利则是通过内战而建立起来的。这样,“契约自由”,而不是对黑人实行平等的法律保护,变成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的内容。<sup>①</sup>

19世纪80年代以及以后的数十年内,法院总是将州对商业企业的管制——  
123 尤其是那些对劳资关系合同的管制,如要求建立最多工作时间和安全工作条件的法律——看成是对自由劳动的一种家长式的限制和侵犯,一种向奴隶制思维方式的倒退。(菲尔德的观点中曾强调自由也包括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此刻这部分内容已经被最高法院抛弃了。)1885年,纽约州巡回上诉法院宣布本州一项禁止在居民住宅楼里生产香烟的法律无效,理由是这项法律剥夺了工人的“自由”——即“他在任何他愿意工作的地方”工作的权利。1889年西弗吉利亚州最高法院宣布,自由劳动的意思“不是免除奴役的自由,……而是……追求任何合适的行业和职业的权利”,而州不能立法限制这种权利。法院还通过对性别平等的一种扭曲的推论,把妇女也看成是与男人一样拥有如此定义的平等的经济“自由”。1895年,伊利诺斯州最高法院宣布一项州法无效,理由是它违反了妇女的契约自由权,这项法律由女权主义者和劳工改良者弗罗伦斯·凯利起草,禁止在缝纫行业中实行“血汗工厂”制,要求对妇女和儿童工人实行每周48小时工作制。对于企业主利用法院来破坏劳工组织的建设与活动的行为,崇尚契约自由的司法主义并没有加以阻止。根据一项统计,在1880到1931年间,各级法院大约发出了约200多项法院命令,禁止工人的罢工和抵制活动。<sup>②</sup>

① William E. Forbath, "The Ambiguities of Free Labor, Labor and the Law in the Gilded Age," *Wisconsin Law Review*, 1985, 768; Charles W. McCurdy, "Justice Field and the Jurisprudence of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 Some Parameters of Laissez-Faire Constitutionalism, 1863-1897,"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1 (March 1975), 970-81; Rogers M. Smith, *Civic Ideals: Conflicting Visions of Citizenship in U.S. History* (New Haven, 1997), 333.

② Eileen Boris, *Home to Work: Motherhood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Homewood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94), 42-43; Forbath, "Ambiguities," 795-98; Kathryn K. Sklar, *Florence Kelley and the Nation's Work: The Rise of Women's Public Culture, 1830-1900* (New Haven, 1995), 234-83; Leon Fink, "Labor, Liberty, and the Law: Trade Unionism and the Problem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Order,"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4 (December 1987), 909-11.

有时因为对健康和安全原因的合法考虑而必须对工作条件进行管制时，联邦最高法院也会对不阻挠契约自由的立法干预表示支持，譬如犹他州的矿工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或者是要求商业机构在星期日停止营业的法律等。但是大部分涉及到劳资关系的判决都是与工人的利益唱反调的。1905年的洛克纳诉纽约州案几乎变得与司各特案一样地臭名昭著并给所有涉及契约自由的案件的判决都加上了“洛克纳主义”的代号，这项判决否定了纽约州的一项规定面包坊工人最长工作时间的法律。此时，法官们对“自由”的运用实在过于荒谬。在一桩案例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否定了堪萨斯州的一项禁止“黄狗”合同的州法（黄狗合同要求工人以不参加工会为受雇的前提条件），认为这项法律侵犯了“人身自由的权利”。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又否决了许多州要求付给矿工现金而不是购物券的法律。工会领袖约翰·L. 米切尔一语双关地说：最高法院看上去将“工人的自由”定义为“接受代替金钱的商品”的权利。米切尔观察到，工人不能不感觉到“他们并不想要的一些自由得到了保障，而那种对他们真正具有价值的自由却被剥夺了”。<sup>①</sup>

## 劳工与共和国

124

如同米切尔的评论所揭示的，19世纪后半期的公共话语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明显地以阶级为界限来划分。对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契约自由之上的自由理论，劳工运动发起了猛烈的连续攻击和批判。镀金时代的劳工改革者一方面对小生产时代充满怀旧的感情，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坦率地承认工厂制和工资劳动制的胜利；他们为一系列社会改革计划所吸引，包括八小时工资制、困难时期的公共雇佣制、货币改革、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创建一

<sup>①</sup> Melvyn Urofsky, "State Courts and Protective Legislation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A Reevaluatio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2 (June 1985), 63-66; Philippa Strum, *Louis D. Brandeis: Justice for the People* (Cambridge, MA, 1984), 116-17; Rudolph J. R. Peritz, *Competition Policy in America 1888-1992* (New York, 1996), 45-46; John Mitchell, "The Workingman's Conception of Industrial Liberty," *American Federationist*, 17 (May 1910), 406-07.



个定义模糊的“合作共和国”。但是将所有这些信仰和改良计划联结起来的，却是一种被称为“权利丧失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想认为，自由原为美国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权利，但新的社会条件却导致了这种权利的丧失。在劳工运动过程中，劳工们发展出一套全面地对流行自由观进行批判的理论。特伦斯·V. 鲍德利是这一时代最大的劳工组织劳工骑士团的领袖，他宣称道：美国人并不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是享有自由的人民”。<sup>①</sup>

奴隶解放在镀金时代的劳工改革的话语中颇有影响。如同法院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劳工们也使用了自由劳动的语言，声称他们进行的是反对奴隶制的斗争，这样做一方面是在延续内战前的语言，另一方面则因为奴隶制的比喻能够更有效地吸引具有改革愿望的中产阶级。八小时工作制改革家艾拉·斯图尔特写道：“劳工们凭直觉感到奴隶制的某些内容仍然存在，或者说，自由的某些内容还未到来。”尽管从总体来说，劳工运动没有关心前奴隶们面临的问题或者把他们也看成是被剥夺了权利的工人，它却采用了重建时期那种追求平等公民资格和权利的语言。“在共和自由的伪装之下，”弗罗伦斯·凯利在1889年写道，“我们已经蜕变成一个由受愚弄的公民组成的国家。”只有当“社会结构”做到与杰斐逊的独立宣言所代表的平等理想相一致时，一家波士顿的劳工报纸宣称说，真正的自由才能有保障。劳工领袖们称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是一部“辉煌的、劳工的宪法修正案”，它将劳工的尊严写进了宪法，它禁止非自愿性的奴役制，而法院禁止罢工的命令则违反了这一条修正案。劳工还使用内战前国家分裂的隐喻，将雇主称为新的“奴隶主势力”，他们要求“对所有劳动者予以解放和投票权”，他们宣布在“劳工的工资制度与共和政府制度  
125 之间存在着一场不可压制的冲突”。乔治·E. 麦克尼尔原为波士顿的一个制鞋工人，后来将成为劳工运动最有雄辩力的作者，他警告说，集中化的资本势

① Carlos A. Schwantes, "Protest in a Promised Land: Unemployment, Disinheritance, and the Origin of Labor Militancy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 1885-1896,"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13 (October 1982), 373-75; Leon Fink, "The New Labor History and the Powers of Historical Pessimism: Consensus, Hegemony, and the Case of the Knights of Labor,"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5 (June 1988), 115.

力已经变成了“比国家还要强大的权力”。抑制服这种势的办法不是回到小规模工匠时代,而是通过保证所有美国人都享有一套基本的经济权利,从而将“共和的原则嫁接到工业体系中去”。<sup>①</sup>

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废除工资制”一直是劳工运动宣称的目标。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国会指派的委员会到各地去调查“劳资关系”时,委员会的人听到了来自劳工领袖和普通工人群众的大量的抱怨和控告——低工资、垄断权力、极度贫困等——这一切都被总结在被重新复活使用的“工资奴隶制”的语言中了。一家劳工报纸把美国的发展描述成是一个由不同形式的奴隶制形式组成的历史,从封建主义到人身奴隶制,再到工资劳动制,都是同一“种类”的成员。

与此同时,愈来愈多的妇女工资劳力的队伍,在条件恶劣的环境下工作,这种情形被一些报纸称为新的奴役形式。1888年,《芝加哥时报》发表了一组由记者内尔·丘萨克采写的文章。这组标题为“都市奴隶女”的文章揭露了芝加哥的工厂和血汗工厂中存在的极度恶劣的工作环境。文章刊登后,报纸编辑收到了大量女工的来信,许多女工在信中使用了自由的语言。家庭佣人的工作被当作“一种奴隶的生活”被特别地列举出来,如一位女工所写道的,佣人的“工作时间长,不分早晚,每周七天,被人吆喝过来,吆喝过去,就像战前的黑鬼一样”。许多女工还提到了在工作中受到性虐待和性骚扰——这是奴隶制的另一个类比——但她们否认那种妇女出外工作势必有害其品德的流行说法。“一位工作女性”认为,问题不在于道德方面,而是在于女工得不到足够的劳动报酬和工作机会。她问道,为什么“在这个自

---

<sup>①</sup> Ira Steward, *Poverty* (Boston, 1873), 4; Barry Goldberg, "Slavery, Race, and Languages of Class, 'Wage Slaves' and 'White Niggers'," *New Politics*, n. s., 3 (Summer 1991), 71-77; Florence Kelley Wischnewetsy, *The Labour Question, Is Slavery yet Abolished? A Social Democratic Address in Memory of Thomas Paine* (London, n. d.), 5; *Boston Daily Evening Voice*, December 13, 1865; William E. Forbath, *Law and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Cambridge, MA, 1991), 136-39; Fink, "Labor, Liberty, and the Law," 912; George E. McNeill, *The Labor Movement: The Problem of Today* (Boston, 1887), 161, 456, 462.

由国家中，妇女无权选择她们自己的职业”？工资奴隶制语言在大西洋两岸如此广泛的运用，以至于英国经济史学家约翰·K. 英格拉姆在1895年出版《奴隶制与农奴制的历史》一书时，也感到有必要在书中加上一个附录，来澄清那些对“奴隶制”一词的“不负责任的”用法，尤其是那些将其用来描写工资劳力的处境的做法。<sup>①</sup>

但是，劳工运动并不只是在重复那种陈旧的观点：即工资劳动与自由是相矛盾的；它同时也对契约至上的意识形态——即那种以自由的名义来证明日益加深的社会不平等是合法合理的思想——提出了有力的批判。卡尔·马克思的著作此刻刚刚开始在美国传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契约思想中的自由概念——即认为在劳工市场存在平等的说法——进行了无情的嘲笑。“劳动力的买卖，”他不无讽刺地怒斥道，早在“人的先天性权利形成的那座伊甸园中”就出现了，那是一个“充满自由”的世界，“因为买卖双方……仅仅只为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所限制”。马克思的主题是，劳工市场本身就象征着不加掩饰的压迫，而极端的经济不平等使雇工和雇主之间那种表面上的平等显得十分荒唐可笑。马克思的思想在所有的劳工报纸中都引起了巨大的回响。“竞争的自由，在一个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你争我夺的社会中，”一位作者写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美国的”自由定义，但“这个自由却居然可以如此堂而皇之、不受置疑地通行无阻”。劳工领袖也对镀金时代的社会思想提出了挑战。劳工骑士团的口号是：所有的为了生存而劳作的人团结起来。这个运动波澜壮阔，同时吸收了有技能和无技能的工人、移民工人和美国出生的工人、男工和女工（他们的口号是“男女同工同酬”）甚至黑人工人（但没有包括遭人痛恨的华人）。乔治·麦克尼尔写道，劳工运动代表了一种新的原则：“互利互惠比个

① Leon Fink, *Workingman's Democracy: The Knights of Labor and American Politics* (Urbana, 1983), 6;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Senate Upon the Relations of Capital and Labor, and Testimony Taken by the Committee* (5 vols. Washington, DC, 1885), I, 49, 91, 217; Barry Goldbert, "Beyond Free Labor: Labor, Socialism, and the Idea of Wage Slavery, 1890-1920,"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79, ch. 1; *Chicago Times*, July 31, August 10, 11, 12, 1888; John K. Ingram, *A History of Slavery and Serfdom* (London, 1895), 261.

人主义更为可取”；在要求个人权利和把自由视为一个阶级的集体特征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矛盾。<sup>①</sup>

但劳工运动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有真实意义的自由是否能够在经济极端不平等的现实存在？1886年7月4日，太平洋海岸联合行业改写了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将不可剥夺的权利重新列为“生命和生活来源、自由与享受自由的必要条件”。自由需要某种社会安排才能享有，并非仅凭契约自由就可得到。没有人能比尤金·V. 德布斯更为有效地将自由的语言运用于劳工运动事业中。德布斯是美国铁路工会的领袖，1894年因领导抗议普尔曼公司的大罢工而被投入监狱。他的监禁显示了垄断经济资本势力如何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彻底破坏了传统的自由观。当他被释放时，有十万工人涌到芝加哥火车站去迎接他。德布斯把欢迎他的人群称为“热爱自由的人们”，他接着向人群发表演讲，阐述了大公司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如何直接危害了“美国的自由”。<sup>②</sup>

就在劳工抗议运动达到高潮之时，另一种不同的暴动正在南部和中西部大平原上酝酿，这是一场对直线下跌的农产品价格和农村地区出现的经济依附形势的反响。深陷于分租式经济制中的南部农民和肩负土地债务重担的西部农民，不仅在经济上陷入了极端困境，而且也丧失了自由。农民们组织起来，通过农场主协会，推动合作性的资助和销售农产品的计划，企图恢复他们处于困境中的经济自主。他们面临的选择是，一位来自得克萨斯的协会领袖J. D. 菲尔兹说，“或成功与自由，或失败与被奴役。”19世纪90年代初，农场主协会将发展演变成人民党或“平民党”，后者将是这一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反叛运动。尽管它的最强大的力量来自棉花和小麦产区，但平民党力图表白

① Marx in Ian Shapiro, *The Evolution of Rights in Liberal Theory* (New York, 1986), 141n.; Christopher L. Tomlins, *The State and the Unions: Labor Relations, Law, and the Organized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 1880-1960* (New York, 1985), 49-51; *Haverhill Laborer*, May 15, 1886; Edward T. O'Donnell, "Henry George and the 'New Political Forces': Ethnic Nationalism, Labor Radicalism, and Politics in Gilded Age New York City,"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5, 183; Montgomery, *Fall of the House of Labor*, 4.

② Philip S. Foner, ed., *We, The Other People* (Urbana, 1976), 131; Nick Salvatore, *Eugene V. Debs: Citizen and Socialist* (Urbana, 1982), 153-54.

它是所有“生产阶级”的代言人，它在科罗拉多和爱达荷这样的州里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就连当地矿工和产业工人也都利用它作为斗争的工具。<sup>①</sup>

平民党人启用了 19 世纪熟悉的激进主义语言，痛斥“新的奴隶制”不仅把农场主、同时也把“缝织女工、煤矿工人和制铁工人”统统变成了“百万富翁的奴隶主”束缚下的奴隶。该党在 1892 年奥马哈大会上通过的党纲列举了一长串的怨恨对象——从政府的腐败、组织工会权利的剥夺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财产”的兴起——所有这一切都“对自由造成了威胁”。平民党人的具体要求包括：由政府接管和拥有所有的铁路，发行全国性的货币来结束银行家对金融业的控制，实施递增收入税收制，实行低消耗的公共财政以资助农场主销售他们的产品。奥马哈党纲宣称说，“政府的力量”必须用来消灭美国生活中的“压迫、非正义和贫穷”并因此来创造自由的社会条件。<sup>②</sup>

这是 19 世纪的最后一步继续把美国看成是一个小生产者社会的伟大政治宣言。“两个巨大的阶级——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和百万富翁”，平民党人的党纲宣称，出现在美国的地平线上，威胁着共和国的安全与稳定。在这两者之间是生产者阶级存在的广大空间，这些劳动阶级的成员是传统的自由和公民观念的继承者，他们对自由和公民的理解与对生产资料的拥有和劳工的尊严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平民党人一方面借助传统的经济自立和地方自治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只有联邦政府才能遏制大公司大企业的权力，才能使美国成为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同盟会”。平民党人力图找到一种新的自由定义，来应对 19 世纪 90 年代出现的紧急情况。一家内布拉斯加平民党人的报纸写道，美国人需要在曾经“使我们体制骄傲”的“个人自由”的传统后面加上“工业自由”，因为如果成千上万的人被剥夺了“生活来源”，“生命和所谓的自由还有什么用？”如劳工运动一样，平民党人彻底否定这一时代的自由放任主

① Lawrence Goodwyn, *Democratic Promise: The Populist Mo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1976), 138; Robert W. Larson, *Populism in the Mountain West* (Albuquerque, 1986).

② Gene Clanton, *Populism: The Humane Preference in America, 1890-1900* (Boston, 1991), 46-47; George McKenna, ed., *American Populism* (New York, 1974), 89-93.

义的信条(科罗拉多州州长洛伦佐·卢埃林说,“适者生存”是野蛮人的哲学。)平民党人远未设想到由政府支持和资助的大规模的社会辅助计划,这些计划在后来的进步时期和新政时代作为对抗经济不平等的手段而得以采用。像奥 128 马哈纲领所呼吁的那样,由一个主要政党从经济自由的立场出发,提出一整套的政府行动计划,这种事情还要等到整整一代人之后才会发生。<sup>①</sup>

对镀金时代社会条件表示的不满情绪并不仅限于工人和农民。一些社会思想家也为阶级冲突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垄断资本日益增长的权力深感不安,他们为美国回归正宗的自由传统开出了不少药方。在所有的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的建议中,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1879年)和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1888年)是最受欢迎的。这两本书均被列为19世纪的最伟大的著作。它们不同寻常的成功证实了乔治所称的,在美国存在“一种普遍意识……即目前的社会组织有极为严重的缺失和错误”。两位作者都力图恢复想像中的一个自由与社会和谐交融的黄金时代。但他们提供的改革方案却正好相反:乔治提出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具有自主意识的个人能够在自由放任的市场之内主宰自己的命运;贝拉米则指望建立一个集体主义式的未来社会,在其中个人的独立自主必须服从一个由社会决定的共同福利。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乔治的读者真正相信土地单税制——这是乔治提供的医治国家疾病的万能药方——会将美国带入一个平等主义的未来,或者说“地球上的上帝之城”;但是,他对经济关系所作的通俗易懂的说明以及他对曾经被美国人长期当作旧世界独有的“社会病”如何来到了新大陆的过程所作的一针见血的解释,却赢得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的强烈反响。自由问题正是乔治所作的分析中的核心问题。他的书所激发的政治运动的“恰当的名字”,他曾经写道,应该是“自由的追求者”,这批人“对于工业奴隶制问题的处理”将如同共和党人近来对黑人奴隶制问题的处理一样。在《进步与贫困》的结尾,乔治

<sup>①</sup> McKenna, ed., *American Populism*, 89-91; Norman Pollack, ed., *The Populist Mind* (Indianapolis, 1967), 18-20, 51; Steven Hahn, *The Roots of Southern Populism, Yeoman Farme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eorgia Upcountry, 1850-1890* (New York, 1983), 285.

写道,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乔治否定了将自由与财产的拥有相等同的传统观念(既然单税制事实上将土地变成了全社会的“共同财产”),在其他方面,他的自由观却与主流思潮步调一致。乔治对自由市场的正义性坚信不疑,他认为,非生产者对土地的垄断使他们能够在同时牺牲劳工和制造业主利益的基础上使自己发财致富。尽管他呼吁一个对经济的大规模的公共干预,但他仍将政府视为是一种“具有压迫性的权力”,在未来的“合作社会”中,政府的功能将被限制在增进生活质量方面,如修建“公共浴室、博物馆、图书馆、公园”之类。乔治认为,真正的自由放任主义应该能够解决社会不公正的问题,因为“‘自由’是‘平等’的同义词”。<sup>①</sup>

如果乔治的自由观的基础是人们甚为熟悉的主权个人,贝拉米则提出,自由最终是一个以相互依赖、而不是独立自主为基础的社会条件。在《回顾,2000-1887年》中,贝拉米的主人公,在19世纪末期沉睡不醒,到醒来时已是2000年,此刻世界上所有的不平等已被抛弃,随之而去的是那种不受政府约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争取享有自由的条件的思想。从20世纪末的观点来看,贝拉米的乌托邦——在其中,公民有义务工作若干年,工业大军由一个单独的大托拉斯控制,一支警察部队随时准备惩罚那些偷奸耍滑和标新立异之人——看上去简直是一幅充满强制性认同的社会蓝图,令人不寒而栗。但这本书却激发了数百个国家主义俱乐部的诞生,这些俱乐部决心要将2000年的世界变成现实。这本书也给从德布斯到约翰·杜威整整一代改革家和知识分子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因为贝拉米提供了一种希望:未来社会可以在保持工业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物质丰富的同时,消灭社会的不平等,恢复国家与社会的和谐。

在要求国家保证为所有人提供足够的年收入的建议中,贝拉米提出对公民资格和公民权的内容进行广泛的扩展。他的乌托邦也为妇女提供了经济自立

---

<sup>①</sup> Henry George to Terence V. Powderly, April 19, 1883, Terrence V. Powderly Papers, Catholic University; John L. Thomas, *Alternative America: Henry George, Edward Bellamy, Henry Demarest Lloyd and the Adversary Tradition* (Cambridge, MA, 1983), 118-22; Charles Barker, *Henry George* (New York, 1955), 509, 519; O'Donnell, "George," 46, 324; Sklansky, "Fall of Political Economy," ch. 4; Henry George, *Progress and Poverty* (New York, 1884), 489-93.

和政治权利,并由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取代私人性的家务工作和抚养孩子的安排。这种乌托邦的想法广泛传播了在当时还算是一种比较过激的观点:结了婚的妇女应把外出工作看成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正常内容。贝拉米认为,在现代社会的复杂体系中,那种单枪匹马地自我奋斗的个人的旧观念,实在已经太过时了;他的著作表达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意识,即真正的自由只有通过社会的集体行动才能得到保障。“我知道你在19世纪时把你自己称作自由的人,”一位生活在2000年的人对贝拉米的大伯李乐说道。但是“这个词的意思在当时不可能具备它目前所含有的同样的意义,”或者说,现代自由的意义不可能适用于这样一个社会:许多人生活在一种“为了维持基本生命而不得不痛苦地依附他人”的境地之中。对于贝拉米来说,不受约束的市场未能保障自由;惟一的改革出路是要求国家的参与。<sup>①</sup>

1888年当《回顾》出版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由放任式的自由定义已经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攻击,批评者不光包括了劳工和平民党人,也包括了教士,他们为正在出现的工业秩序中的不平等现象而震惊;同时还包括了新一代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他们建议为了建立社会平等,采用国家能动主义的政策。如果这一时期大多数的新教牧师专注于批评和谴责个人的罪恶,如酗酒和不作礼拜日等,而且并不把对财富的追求视为不道德之事的话,在沃尔德·劳申布什——纽约市的一位长老会牧师——和其他人的写作中,一种社会福音的轮廓开始出现。他们强调自由与精神上的自我发展需要权力与财富的等同为基础,而不受约束的竞争已经将建立基督教兄弟情谊的理想愚弄得毫无价值。<sup>②</sup>

① John A. Kasson, *Civilizing the Machine* (New York, 1976), 169-99; Mari Jo Buhle, *Women and American Socialism, 1870-1920* (Urbana, 1981), 76-77; Edward Bellamy, *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 (New York, 1986), 188.

② George M. Marsden, *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 The Shaping of Twentieth-Century Evangelicalism 1870-1925* (New York, 1980), 13-14, 36-37; Susan Curtis, *A Consuming Faith: The Social Gospel and Modern American Culture* (Baltimore, 1991), 2-9; James T. Kloppenberg, *Uncertain Victory: Social Democracy and Progressiv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70-1920* (New York, 1986), 284.



在学术界也出现了对流行自由观的批判,1885 年美国经济学会(AEA)的成立就反映出这一点。该学会明确宣称,其目的就是要抗击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的教条”。美国经济学会的创始人理查德·T. 伊莱写道:“我们把国家看成是一个教育和道德机构,它提供的积极辅助是人类进步中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相信,曾经作为自由基础的私有财产,现在已经成为剥夺他人自由的工具,贫困给共和国带来的威胁远远超过了一个有为政府。现代世界中自由的悖论,社会学家莱斯特·沃德写道,恰恰在于“个人自由只能通过社会规则才能得到”。沃德的话无疑是在提醒人们:由内战带来的民主政府的权力同样可以用来处理奴隶制以外的其他问题,这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将在即将来临的进步时代再次转换自由思想的前兆。但在这种转换到来之前,美国仍必须面对自内战以来的最严重危机,自由的界限也将再一次被重新划分。<sup>①</sup>

### 重新划分自由的界限

19 世纪 90 年代是一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它经历了这一世纪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人民党的兴衰以及继续高涨的劳工罢工活动。劳工运动的两次高潮分别是 1892 年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霍姆斯德特的大罢工,罢工的工人与卡内公司的私人警察队伍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另一个高潮是 1894 年反对普尔曼公司的铁路大罢工。在这次罢工中,联邦政府调动军队占领了芝加哥。与此同时,移民的来源从北欧和西欧转移到了南欧和东欧地区。这十年进入美国的 350 万  
131 移民中,有一半以上来自意大利和俄罗斯以及奥匈帝国。这些事件在土生的中产阶级美国人中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应,由内战奠定的平等公民资格的思想被抛弃,以种族为基础的自由定义得以死灰复燃。

---

<sup>①</sup> David Green, *Shaping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America from McKinley to Reagan* (Ithaca, 1987), 30-31; Carl Resek, ed., *The Progressives* (Indianapolis, 1967), 21; Henry S. Commager, ed., *Lester War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dianapolis, 1967), xxi-xxxiv, 159-60.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种族”语言——种族冲突、种族感情、种族问题——在美国公共话语中占据了中心位置。那种假定存在的某种或某些“种族”的天生能力经常被引用来解释社会中的一切现象,从不同群体的工人的生活的方式到不同群体的美国人对美国政治参与的能力在内。正如用个人特性来解释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的成功与失败一样,“民族性格”的观念也在解释历史后果和结局时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尽管正统的经济学和法学理论继续把社会看成一个由自主个人组成的集合体,土生居民保护主义者却重新拣起一种旧观点,认为世界上相互竞争的种族与国家各自在世界范围的等级制上占据了一个位置。这种观点认为,在美国国内和世界范围的霸权体系中,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最适合的主导者,但允许那些“低劣的”种族移民美国并允许他们在人口总数上超过盎格鲁-撒克逊人,将削弱美国社会的基础和结构。经济学家弗朗西丝·阿玛撒·沃克尔在1890年写道,新移民是“从失败的种族中来的失败者,代表了生存斗争中最糟糕透顶的失败者”。一家俄亥俄报纸也附和道:美国的城市完全为外国人占领,他们“对自由的内容完全不具备真正的欣赏能力”。<sup>①</sup>

这种新的情形在美国黑人所处的环境中最为明显。到20世纪初,一种新的种族压迫制度已在南部出现。用历史学家雷福德·洛根的话说,在“民族团结的大厦中”,黑人呆在“一个被隔离的偏房”,在“门廊上刻着剥削、无选举权、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私刑、蔑视”的字样。取消黑人选举权的运动(许多贫穷白人的选举权也一同遭到剥夺)从1890年自密西西比州开始,不仅致使长期以来扩大政治自由的趋势停止并后退,而且也将南方腹地各州转变成为腐败政治盛行的地方,从那些地区选出的国会议员在国家政治上长期行使着远远超出他们小小的选民总数应该分得的权力。但南部的新白人种族至上制度并

<sup>①</sup> Thomas G. Dyer,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Idea of Race* (Baton Rouge, 1980), 23-28; Collini, "Idea of 'Character'," 31-35; 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1925* (New Brunswick, 1955), 131-47; Linda R. Monk, ed., *Ordinary Americans: U.S. History Through the Eyes of Everyday People* (Alexandria, 1994), 137.

不是由南方白人一手炮制而成的。当第十四和十五条宪法修正案在实际上被宣布无效时,北方对此予以默认。到1900年,不承认种族差异的公民资格和作为一种普遍权利的自由已经被取消了。

从重建理想中的撤退与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卷土重来是同时进行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将爱国主义、仇外意识和以种族文化为基准的民族性揉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新的种族排斥语言。流行杂志中充斥着把黑人和其他的“次等的”的民族丑化成野蛮人和罪犯的图画,以此来证明新的政治和经济不平等不仅是合法的,而且也合乎“自然法则”。类似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伯吉斯这样的学者(他也是美国政治学的奠基人之一),大讲“黑皮肤人所来自的种族,从来不能用理智战胜感情,从来没有创造过任何形式的文明”。赋予黑人选举权是一个可怕的错误,重建的“失败”被学者们反复用来证明前奴隶和他们的后代完全不配享有白人理解中的自由。当时还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的伍德罗·威尔逊坚持认为,前奴隶和他们的后代“完全没有实践过自由……但却被他们完全不懂的自由刺激起来”,这样的人远未做好参与美国公共生活的准备。<sup>①</sup>

如道格拉斯所写,美国的许多黑人领袖显然感到奴隶解放的承诺完全被出卖了。道格拉斯悲哀地叹息道,黑人在“美国自由的曙光中”只得到了“一半的自由”。孟菲斯市的黑人报纸《自由言论》的主编艾达·B. 韦尔斯因为揭露了当地黑人学校的糟糕情况和私刑的恐怖,就被赶出了曼菲斯。她直截了当地认为,此刻的美国已经无权把自己称作“自由的土地”了。“自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嘲弄,是一种谎言,”杜波伊斯1903年在他的《黑人的灵魂》中写道。黑人此时的自由观的核心仍是重建时期的平等公民权的原则。当新奥尔良市的黑人组织起来,向路易斯安那州1890年颁布的、要求火车隔离不同种族乘客的法律进行挑战时,他们把自己的组织称为公民委员会。荷马·普莱西因进入只准白人乘坐的

<sup>①</sup> Rayford Logan, *The Betrayal of the Negro: From Rutherford Hayes to Woodrow Wilson* (New York, 1965); John W. Burgess,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1866-1876* (New York, 1902), 44-45, 133, 244-46; Woodrow Wils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uthern States," *Atlantic Monthly*, 87 (January 1901), 6.

车厢而被强行赶出来,公民委员会一直把这件案子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他们坚持认为,在美国“公民资格是全国性的,而不是以肤色来划分的”。但在1896年对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的宣判中(这件案子是一系列涉及限制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权力范围的相关案件中最为著名的案件),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州要求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没有违反宪法中平等的法律保护原则。约翰·马歇尔·哈伦是这项判决中惟一的持异见者,他向多数派猛烈地抗议道:“我们宪法是色盲的宪法”。这句话后来成了人们经常引用的一句名言。<sup>①</sup>

哈伦的异见不只是对宪法平等保护原则的一种解释,也是对一个针对民主社会中自由的意义的专题讨论。他攻击的目标不是种族隔离,而是种族霸权。他认为,白人所称的天生的“种族直觉”和他们自诩的“主导种族”(这是法院八人组成的多数派的用语)的地位与内战以后建立的平等自由的原则是相违背的。在他看来,自由对于前奴隶来说,应该是一种全面而平等地参与美国社会生活的权利。如同他预期的,普莱西案判决之后,南部各州迅速制定了法律,133  
强制性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学校到医院、候车室到厕所、领取工资的窗口到墓地——实行种族隔离。尽管最高法院要求的“隔离但平等”原则中带有对平等的强制性要求,但这不过是一种“浅薄的伪装”(哈伦大法官的用语),黑人使用的一切设施永远是次于白人的。一个世纪后,当美国人回首往事时,他们会将种族隔离看作是一个充满残酷偏见的时代的残迹。但当这种制度实施的时候,它却得到政界、宗教界和科学界头面人物的支持,被当成是一种具有前瞻眼光的做法,可以解决十分棘手的问题,即如何处置一个对白种美国人和他们的民主体制具有威胁的种族的问题。<sup>②</sup>

这样,原来曾经在内战后非常迅速扩展的公民群体的界限,又渐渐地收缩了。尽管最高法院强调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准允出生在美国土地上的中国移

① Philip S. Foner, ed.,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Frederick Douglass* (4 vols. New York, 1950-55), IV, 430; David Howard-Pitney, *The Afro-American Jeremiad: Appeals for Justice in America* (Philadelphia, 1990), 73-83; W. E. B. Du Bois,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New York, 1903), 219; Lofgren, *The Plessy Case* (New York, 1987), 28, 193.

② T. Alexander Aleinikoff, “Re-Reading Justice Harlan’s Dissent in *Plessy v. Ferguson*: Freedom, Antiracism, and Citizenship,”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1992,

民的后代获得公民资格,但当国会以种族为界来立法限制移民并在不经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将未能归化的外国人(如中国人)驱逐出境时,最高法院却对这种权力表示认可。从1882年开始,国会全面禁止中国人移民美国。这种对华裔美国人的全面排斥使他们蒙受了长期的耻辱,他们被看作是被抛弃的和不能融入美国社会的种族,这一切都在他们的美国经历中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一位华裔作者写道,美国能否真正得到“自由和伟大”,在未来将取决于“排华法律和主张自由的法律到底谁的生命力更长”。)在此之间,国会也第一次将一些白种外国人排除在归化之外,1875年开始,妓女和重罪犯首先被排除,1882年,又加入了“精神病人”和其他一些有可能成为“公众负担”的人。“我们还是一个全世界所有受压迫人民的避难所吗?”1892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詹姆斯·B. 韦弗这样问道。<sup>①</sup>

正如经济学家西蒙·巴顿在1896年指出的,美国社会似乎已被阶级和种族的界限所分离,一种执意要严格划定“想像的共同体”的思想已经取代了原来那种对自由和公民资格的普通信仰:

我们国家中的每一个阶级或区域正在意识到自己标准的对立面是某些次发达阶级的行为和欲望。南部有自己的黑人,城市有自己的贫民窟……美国体制的朋友们害怕愚昧无知的移民,劳工讨厌中国人。每个人都在开始将那些具有适当的公民资格的人从那些他希望从社会中排斥出

4), 961-78; Donald G. Nieman, *Promises to Keep: African Americans and the Constitutional Order, 1776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1991), 359-61; George M. Fredrickson, *The Black Image in the White Mind: The Debate on Afro-American Character and Destiny, 1817-1914* (New York, 1971), 255.

<sup>①</sup> Harold H. Koh, “Bitter Fruit of the Asian Immigration Cases,” *Constitution*, 6 (Fall 1994), 69-77; Charles J. McClain, *In Search of Equality: The Chinese Struggle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Berkeley, 1994), 1-4; Rudolph J. Vecoli, “The Lady and the Huddled Masses: The Statue of Liberty as a Symbol of Immigration,” in *Statue of Liberty*, ed. Dillon and Kotler, 45; E. P. Hutchinson, *Legislative History of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y 1798-1965* (Philadelphia, 1981), 405-15; Pollack, ed., *Populist Mind*, 153.

去的其他阶级中的人区别出来。<sup>①</sup>

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笼罩在一片恐惧之中,人们担心美国社会中的那种经济和民族大团结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恐惧的折磨下,政府和一些私人组织竭力推行起一种意在统一的强制性爱国主义。也就是在这些年里,学校中的忠诚宣誓和在演奏《星条旗永不落》时起立的惯例开始出现。美国人早就开始把星条旗当作荣誉和光荣的象征,但是“国旗崇拜”的做法,包括设定专门的官方国旗日是19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sup>②</sup>

在20世纪来临的前夜,美国通过美西战争,以强权身份风光地进入了世界舞台,这使得美国民族主义和自由的概念更紧密地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优越崇高感联系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它取代了先前那种以民主制度来界定美国的民族性的做法(或者说,用更为显露的种族主义的方式来界定政治体制)。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北美大陆的实践充分展示了他们对实践自由和自治政府的特别才能,现在是将这些体制和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那些不幸的人民中去的时候了。如同在南部发生的情形一样,白种人对非白人民族的控制和主导是文明进步过程中的一步,是美国自由的一种成熟的表现,而不是对自由原则的违背。许多反帝国主义者曾经是当年反奴隶制的老将,他们此刻发出质问,民主与帝国是否真的相称?反帝国主义同盟宣称道,当美国通过战争夺取了波多黎各和菲律宾之后,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共和国”应该帮助那里的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而不应将他们置于自己的殖民统治之下。<sup>③</sup>

<sup>①</sup> Simon Patten, "The Theory of Social Forc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7 Supp. (January 1896), 143.

<sup>②</sup> Stuart McConnell, "Reading the Flag: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Patriotic Cults of the 1890s," in *Bonds of Affection: Americans Define Their Patriotism*, ed. John Bodnar (Princeton, 1996), 102-11; Nina Silber, *The Romance of Reunion: Northerners and the South, 1865-1900* (Chapel Hill, 1993), 161; Cecelia E. O'Leary, "To Die For: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American Patriotism, 1865-1918,"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6.

<sup>③</sup> Silber, *Romance of Reunion*, 137-41, 178-81;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76-77; E. Berkeley Tompkins, *Anti-Imper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Great Debate, 1890-1920* (Philadelphia, 1970), 129, 141-44.

但是,支持扩张性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人也采用了一种自由的语言,而丝毫不觉得有任何矛盾或难堪之处。反帝国主义者才是真正的“自由福音的高经叛道者”,外交官和历史学家阿尔伯特·贝弗利奇强辩说,美国之所以向海外扩张,并不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或国家霸权,而是为了把“自由的新天地”带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当然,要把菲律宾人提高到能够欣赏“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到底是什么”的水平,至少需要一个世纪的时间,美国驻菲律宾群岛的第一任总督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这样说道。但是除了美国的统治,剩下的只有“无政府主义和野蛮主义”——尽管为平息岛上的动乱和镇压当地争取独立的运动,美国发起的漫长而严酷的战争本身也充满了野蛮性。事实上,后来的美国殖民政府官员的确意图推动菲律宾政治的民主化,也力图使它获得独立的国家地位(这个地位1946年终于得到,比塔夫脱预计的要早许多),但如同内战后取胜的北方一样,殖民地政府的政策并没有触动拥有大地产的地方寡头权势集团的利益,却把长期贫困留给了广大的农村人。<sup>①</sup>

135 当20世纪的曙光降临时,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中国人被禁止进入美国,印第安人的反抗被最终镇压下去,劳工市场被生硬的种族和民族的界限而划分,一个针对海外非白人的帝国主义政策逐渐形成,这一切都使美国的政治与经济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彻底地种族化了。面对不可一世的大公司势力的嚣张气焰和对广义上的美国公民群体定义的否定,一些原来曾经在19世纪帮助扩展自由界限的社会运动,此刻也重新界定了自己的目标,以求在新的体制和思想框架下实现这些目标。一些有影响的黑人领袖开始强调经济上的自救,强调靠个人奋斗的途径进入中产阶级;他们认为这比发动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更为有效。1895年同时发生的两件事象征着这种转变的开始。那一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去世,而布克尔·T. 华盛顿在亚特

<sup>①</sup>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1987), 17-18, 39-40; James Richardson, ed., *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10 vols. Washington, DC, 1896-99), IX, 6398, 6467; Tony Smith, *America's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1994), 43-45, 51-55.

兰大州棉花博览会上发表了备受赞赏的演讲。华盛顿在演讲中,敦促黑人调整自己,适应种族隔离,暂时放弃争取民权和选举权的斗争。争取种族进步的道路,华盛顿说,在于首先取得技能和财产。有了经济自由之后,政治自由自然会随之而来,他的这种思想不仅与当时的商业文化极为吻合,而且也十分符合南部已经制度化的限制自由的现实。在19世纪90年代,一些白人教育家和改良者聚会于纽约州的莫洪克湖,专门讨论所谓的“黑人问题”。他们的结论是,黑人问题的根源在于“个人行为 and 品性中”的缺陷,所以,黑人民族争取进步的最佳途径不是依赖国家的辅助,也不是通过政治抗议,而是靠自力更生。<sup>①</sup>

19世纪90年代里,随着劳工骑士团的消失和美国劳联(AFL)的兴起,劳工运动的方向也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新的方向要求工人必须坦率地接受他们的工资劳动者的地位,工会把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作为自己的目标,而不是追求经济自主或者“废除工资制”的乌托邦梦想。对美国苏联的创建者和主席塞缪尔·冈波斯来说,自由劳力就是工资劳力,劳工的组织也按照这种地位来进行。劳联公开承认,基于拥有生产资料上的自由是绝大多数工人不可企及的现实,这种承认,既是一种现实的认识,也是一种战略上的撤退,是为适应当时的经济现实和政治语言作出的妥协。冈波斯追求的不是否定自由与市场自由之间的等同关系,而是将“契约自由”当成是劳工运动的一个“全面福音”,并老练地将其转化为一种用来反对法院和立法机关干预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力的理论。劳联放弃了劳工骑士团曾经提出的工人阶级大团结的说法,而将自己的会员资格限制在那些有技能的工人中——这些人只是劳  
136  
工队伍的一小部分——从而将包括黑人、妇女和新近来自欧洲的移民在内的大多数劳工排斥在外。劳联领袖们认为,只有出生于美国的白人男性工人才

<sup>①</sup> Hunt, *Ideology*, 80-81; Tomas Almaguer, *Racial Fault Lines: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White Supremacy in California* (Berkeley, 1994), 100-02; Christopher Lasch, *The Agony of the American Left* (New York, 1969), 19-22; Howard-Pitney, *Afro-American Jeremiad*, 54-64; Leslie H. Fishel, Jr., "The 'Negro Question' at Mohonk, Microcosm, Mirage, and Message," *New York History*, 74 (July 1993), 227-314; Robert H. Wiebe, *Self-Rule: A 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n Democracy* (Chicago, 1995), 150-54.



拥有与雇主进行较量所必须的技能、品格和男人气概；而非技术工人、非白人、妇女以及新移民因为“对工作和生活水平要求之低，”只配接受那种低于正在被称为“美国生活标准”的工资。<sup>①</sup>

与此同时，妇女运动也逐渐只注重选举权而不再关注广泛的社会问题，相对于过去来说，对家庭和工作场所中的不平等现象的批评也越来越少。妇女运动也与种族主义和土生居民保护主义握手言和。早期的“平等权利女权主义”声称选举权是妇女在公共和私人生活领域中一个重大转变的一部分；这种观点从来没有被抛弃过。妇女运动一方面继续为争取妇女就业、教育和政治领域中的平等而疾呼，另一方面也继续承认妇女对家庭负有特殊的责任，而且她们应为公共生活灌输她们独有的道德精神和品质。但是妇女运动的重心却滑向了一种与当时流行的种族和族裔成见保持一致的女权主义一边。像卡丽·查普曼·凯特这样的新一代选举权运动领袖，竟然经常提到，只要对男女一视同仁，教育水平和其他的选举权资格与女权运动的目标并不冲突。凯特认为，移民和前奴隶得到选举权显然是“匆忙之下不合时宜地”作出的决定，授予本土出生的白人妇女选举权可以抵销北部日益增长的“愚昧的外来人拥有的选票”的力量以及在南部进行第二次重建的潜在危险。<sup>②</sup>

除了对移民的投票选举抱有愈来愈大的敌意之外，妇女运动对“南部问题”的立场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标志着平等女权主义思想的消失。南部解除黑人选举权的运动实际上同时也损害了女权运动，因为它说明选举权可为

---

① Lasch, *Agony* 17-19; Andrew Neather, "Labor Republicanism, Race and Popular Patriotism in the Era of Empire, 1890-1914," in *Bonds of Affection*, ed. Bodnar, 88-89; Forbath, *Law and the Shaping*, 130; Eric Arnesen, "'Like Banquo's Ghost, It Will Not Down', The Race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Railroad Brotherhoods, 1880-1920,"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9 (December 1994), 1612, 1632-33; Michael Kazin, *The Populist Persuasion* (New York, 1995), 59-60.

② Suzanne M. Marilley, *Woman Suffrage and the Origins of Liberal Femi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1820-1920* (Cambridge, MA, 1996), 6-14, 159-64; Nancy F. Cott, *The Grounding of Modern Feminism* (New Haven, 1987), 19-20; Catt in Aileen S. Kraditor, *The Ideas of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1890-1920* (New York, 1965), 125-42, 197.

社会的权势阶级任意解除,尽管如此,全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却几乎对此一言不发。1895年,也就是华盛顿发表著名演讲那一年,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在亚特兰大举行年会,象征着妇女选举权运动与国家的新种族秩序之间可以和平共处。事实上,一位来自密西西比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说,北部文明正在受到潮水般涌来的移民的威胁,北方将被迫“转向南方寻求拯救”,因为南方具有纯净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血统”。在当时,政治自由与政治能力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但这些本土出生的中产阶级妇女主导着妇女选举权运动,坚持认为选举权只能为“高等种族”中的受过教育的成员拥有。即便是像阿比盖尔·司各特·达尼韦这样力主平等的女权主义者,有时也下意识地流露出种族和阶级偏见。在这些年中,达尼韦努力保持平等权利传统的活力,坚持妇女有权在婚姻中控制自己的生育和性生活,并直到生命的末日还坚持认为妇女选举权的斗争是“自由与奴隶制之间不可压制的斗争中”的一章。但达尼韦同时也设计了一个计划,主张增加亚洲移民人数,这样白人妇女可“雇上一个中国佬”,使自己从家庭杂务的负担下解放出来。<sup>①</sup>

1893年,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他著名的演讲中,讨论了边疆如何影响了美国的发展。他提到美国历史的“第一阶段”——一个培育了个人主义、民主和广泛散布的经济自主机会的时代——已经终结了。他也许应该加上一句,随着美国自由的重新种族化,内战的漫长时代——在其中政治辩论的中心是奴隶制的未来和前奴隶的命运——也已经成为历史。但19世纪关于自由的辩论所涉及的关键问题——人身自由、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之间的关系。国家在创造自由的条件中应扮演的角色,“想像的共同体”的界限等——却没有得到永久性的答案。这一时代的“充满暴力的动荡”,小说家威廉·迪安·豪厄尔斯在1895年观察到,说明一个新的关于自由的定义正在来临,这个新的定义将给美国人的大多数带来“更多的权力、更多的方便和更

<sup>①</sup> Kraditor, *Ideas*, 52-55, 163-203; Marilley, *Woman Suffrage*, 168-73; *The Pacific Empire* (Portland), December 9, 1897; Ruth B. Moynihan, *Rebel for Rights: Abigail Scott Duniway* (New Haven, 1983), 111-13, 149, 151-52, 159-60.

多的自由”。这正是 19 世纪留给 20 世纪第一代人的遗产。<sup>①</sup>

---

<sup>①</sup> George R. Taylor, ed., *The Turner Thesis* (Boston, 1956), 18; William Dean Howells, "The Nature of Liberty," *Forum*, 20 (December 1895), 408.

## 第七章 进步时代的自由

1902年《独立》月刊杂志组织了一场关于经济不平等的专题讨论。参加讨论的一方是自由放任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他们坚信美国社会中存在的巨大财富差别是个人自由的自然结果。华尔街金融家拉塞尔·塞奇(据说他的个人资产超过7000万美元)说,富有是对高智商、诚实和节俭的回报;“指责对财富的积累也就等于指责正义的法则。”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此时已接近结束他在耶鲁大学的漫长生涯,他坚持认为,经济不平等不但不可避免,而且也并不违背“任何自然的、宗教的、道德的和国家的法律”。对于这些言论和辩护,劳工经济学家约翰·R. 康芒斯反驳说,工业垄断阻碍了竞争,而竞争是经济进步的血液。曾长期支持亨利·乔治的单税制思想的欧内斯特·H. 克罗斯比则宣称,一个经济贵族阶级已在美国出现,并已对共和政府形成了威胁。《财富挑战国家》一书的作者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更是大胆地提出建设“一种新型的工业民主”,这个民主将要求创造工会和互助组,甚至还要求实践社会主义。<sup>①</sup>

显然,人们在认识经济变化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后果的问题上的深刻分歧已经从19世纪延续至20世纪。如果塞奇和萨姆纳代表了新世纪之初的备受推崇的主流观点的话,那么康芒斯、克罗斯比和劳埃德则是未来20年内社会思潮彻底转向的先锋,这个时期在后来将被称作“进步时代”。

在镀金时代,对集中化的经济势力威胁自由的行动进行最强烈谴责的是组织起来的劳工和浴血奋战的农场主。在进步时代时期,严重的经济不平等是都市生活的最明显特征,这种情形使更多的人深感恐惧和忧虑,也激发了范围更为广泛的社会运动。当英国作家H. G. 韦尔斯在新世纪初到美国访问

---

<sup>①</sup> *The Independent*, 54 (May 1, 1902), 1027, 1036-44, 1055, 1072.

时,他发现“持续不断的垄断趋势”成为“美国人思想和讨论的首要话题”。到处都可以见到体现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化和固定化的现象——无论是华尔街银行家们的小型董事会和公司主管们手中的权力,还是由政治机器操纵的民主制度,还是刚刚在工作场所出现的等级控制,甚至包括像《独立》这样面向全国发行的周刊本身所具有的左右民意的能力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权力集中化的表现。在这样的形势下,本杰明·P. 德威特在《进步运动》(1915年)一书中写道,“个人已经不能寄希望于继续参与竞争……慢慢地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并不是自由的。”<sup>①</sup>

“自由”并不是进步主义词汇中最响亮的词。因为它曾经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契约自由法学联系在一起,使自由一词受到了玷污,所以许多改革者更愿意用“民主”的概念来表达他们的不满。进步时代的评论家们对寻求能够恢复民主公民政治活力的具体办法更为关切,其迫切程度远远超过了对自由作抽象意义上的讨论。但公众讨论的大部分内容还是围绕这样的问题,即传统的自由定义是否仍然有效。“现代自由的兴起,”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1906年写道,“设定了决不会自我重复的独特格局。”许多美国人分享了韦伯的恐惧:即生活中日益增加的官僚组织化,腐蚀了个人主义的基础和19世纪自由理想。有些进步主义者提出回归到由小生产者组成的竞争市场时期,以恢复个人的机会;其他人则接受大公司将永远存在的现实,而转向从政府中去寻求对工人和消费者利益的保护。还有另外一些人则在思考如何把自由从经济和政治领域中转移出来,重新置放在消费的私人世界或一种个人成就的心理状态之中。但所有的进步主义者都同意,自由必须注入新的内容。然而,这样做要求找到一种相应的道德和社会意义上的内容来取代曾被视为自由的基础的普遍性的财产拥有。《新共和国》是进步时代知识分子的圣经,它的主

---

<sup>①</sup> Otis Pease, ed., *The Progressive Years: The Spirit and Achievement of American Reform* (New York, 1962), 3-5; H. G. Wells, *The Future in America* (New York, 1906), 82-83; Steven J. Diner, *A Very Different Age: Americans of the Progressive Era* (New York, 1998), 30-49; Eldon J. Eisenbach, *The Lost Promise of Progressivism* (Lawrence, 1994), 14-15; Benjamin P. DeWitt,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New York, 1915), 14.

编赫伯特·克罗利曾问道：在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中，美国人能够成为“自由的人”吗？<sup>①</sup>

141

## 经济自由的种类

随着传统的民主观和自由观在新世纪变得陈旧过时，进步时代涌现出一大批社会评论和一系列复杂的社会运动，这些评论和运动的目标都是针对经济不平等的问题，并力图在美国社会面临劳工冲突和接受大量海外移民的情况下寻求一种共同的基础。这种探索推动进步主义者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实验。这一时代出现的改革包括运用政治权力来扩大经济自由，对其他种类的自由进行严格限制，如巩固在南部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和获得禁酒立法的胜利等。进步主义包含了一套流动而复杂的信仰，代表了一个跨度非常宽泛的政治群体，从主张国家控制经济的社会主义者到赞成工人应在经济决策中有发言权的具有前瞻眼光的企业家，都包括在其中。但它的核心却是一个由中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组成的（同时为男性和女性参加的）的联盟，他们中许多人与工会组织经常有联系；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增加平等的内容而使资本主义人性化，通过把政治权力归还给全体公民、把公民和谐归还给分裂的社会，从而使民主重新焕发活力。《新共和国》杂志的副主编沃尔特·E. 韦尔写道：“旧式民主”并没有为新世界的问题提供答案，因为新世界中“对自由的主要限制”是“经济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sup>②</sup>

两个曾在镀金时代出现的词语：“工业自由”和“工业民主”，在进步时代美国的政治话语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因为这两个词语包含着一种并不确定的内容，所以，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反社会主义者、具有前瞻眼光的企业家还是

<sup>①</sup> Edward A. Stettner, *Shaping Modern Liberalism: Herbert Croly and Progressive Thought* (Lawrence, 1993), 48-52; Gunther Roth and Wolfgang Schluchter, *Max Weber's Vision of History* (Berkeley, 1979), 201-02; Herbert Croly, *Progressive Democracy* (New York, 1914), 384.

<sup>②</sup> Robert Westbrook,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Ithaca, 1991), 183; Walter E. Weyl, *The New Democracy* (New York, 1912), 3, 164.

反托拉斯的改革家、寻求集体谈判权的劳工领袖还是希望促进劳资和谐的劳资关系专家,都可以使用它们。所有人都同意被广泛讨论的所谓“劳工问题”的核心是“工业自由”的缺乏。问题的要害并不只是工人的生活状况问题,而是美国民主的基础。1912年,国会建立了工业关系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研究部主任巴兹尔·曼利写道,“政治自由只能在有工业自由存在的时候才能存在。”<sup>①</sup>

对于许多进步主义者来说,工业自由的关键在于赋予工人参加经济决策的权力,但这种参与必须在不受管理部门的敌视和不为法院禁令所干涉的情况下通过工会来实现。这一时代出现的许多规模巨大的移民工人举行的罢工活动都造成了全国性的影响,其中较为著名的罢工包括:1919年在纽约纺织工业发生的“20万人暴动”,1912年发生在马萨诸塞劳伦斯的纺织工人大罢工,以及次年在新泽西帕特森发生的丝绸纺织工人大罢工,这些大罢工把工人<sup>142</sup>对集体谈判工资权的要求推到改革者议事日程的首位。克劳利写到,“工会”将“自由的条件”带入到“工资制本身之中”。但是,企业家、法院和保守的中产阶级却对工人的这种要求进行了最坚决的抵制。路易斯·D. 布兰代斯曾是劳工运动的一个积极的同盟者,1916年被威尔逊总统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他坚持认为工会代表了自由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人民管理自己的权利。“政治自由”与“工业奴隶制”之间的矛盾,布兰代斯说,是美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工人不仅在关于工资和工资条件等问题中有发言权,而且在有关工厂迁移、解雇和利润分配等管理政策方面也应该有发言权。布兰代斯强调,恢复经济自由可以帮助劳工转变成为完整和积极的公民——“一个民主政体中的有自尊的成员”。没有“工业事务中的自由”,美国将成为“一个奴隶的国家”。<sup>②</sup>

<sup>①</sup> Milton Derber, *The American Idea of Industrial Democracy 1865-1965* (Urbana, 1970), 6-11; Nelson Lichtenstein and Howell J. Harris, eds., *Industrial Democracy in America: The Ambiguous Promise* (New York, 1993), 2-5, 28; Manly in Pease, ed., *Progressive Years*, 157-60.

<sup>②</sup> Diner, *A Very Different Age*, 61-68; Croly, *Progressive Democracy*, 384; Walter Lippman, *Drift and Mastery* (Madison, 1985), 59; Louis D. Brandeis, *Business — A Pro-*

如布兰代斯一样,许多进步时代的美国人仍然启用自由与奴隶制的对比来描述工人的状况和雇主对工人谈判权的仇视。譬如,通过他们的刊物和他们争取工会组织权的斗争,矿工们坚持用美国自由的传统来抗议煤矿公司,这些公司控制着地方和州政府,并利用私设的警察队伍来镇压工人们组织工会的活动。西弗吉尼亚议会大厦上刻着“山里人是自由的”的铭文;但正如充满激情的工会组织者玛丽·琼斯所呼吁的,矿工们需要像奴隶那样被解放出来。琼斯出生于1830年,她将当时的时代与不可压制的冲突(指内战。——译者)的语言之间活生生地联系起来了。“我们永远地消灭了人身奴隶制,”她对一群罢工的矿工们说,“现在,你们进行的是反对工业奴隶制的战斗。”(事实上,琼斯敦促白人矿工去争取黑人的支持,她比别的劳工领袖在这方面更为迫切,因为她知道,由于曾经处于奴隶制中,“黑人……知道自由是什么。”)①

但并非只有生活在大公司势力暴政下的矿工才意识到他们的自由遭到了剥夺。白领工人——那些由会计、推销员、拿工资的专业人员和随新官僚管理体制而生的公司管理人员组成的大军——的大量出现和增加也损害了个人自主。尽管这些人在社会地位和工资收入方面远远高于体力劳动工人,一位评论家写道,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从前的条件下是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  
143 同样,工厂中的技术工人也感到科学管理制度的传播导致他们丧失了自由。这种管理制度是由效率专家弗雷德里克·W. 泰勒发明的,它以提高生产率为名,对工作过程进行分割得非常仔细的控制。在监工和秒表的经常性监督下工作,一位技术工人说,如同“下降到了奴隶制中一样”。塞缪尔·冈波斯宣称说,科学管理与民主是不相符合的;“男人和妇女不能在上班的时候是生活在暴政的条件下,而只有在他们迈出工场大门的一刹那,才又重新变成自由

---

fession (Boston, 1914), 18-19; Philippa Strum, *Brandeis: Beyond Progressivism* (Lawrence, 1993), 144-45; Melvin I. Urofsky and David W. Levy, eds., *Letters of Louis Brandeis* (5 vols. Albany, 1971-78), V, 45-46; Philip Strum, *Louis D. Brandeis: Justice for the People* (Cambridge, MA, 1984), 151, 184-95.

① Rogert Fagge, “‘A Citizen to This Great Republic’: Politics and the West Virginia Miners, 1900-1922,”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40 (April 1995), 46-47; Philip S. Foner, ed., *Mother Jones Speaks: Collected Writings and Speeches* (New York, 1983), 87-89, 165.



的儿女。”<sup>①</sup>

经济自由也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这个运动的影响在进步时代达到它的顶峰。处于社会主义思想核心位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而自由是这种历史观的中心内容。经常被引用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一句话是,社会主义将推动人类从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遭到压迫和控制的“必需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19世纪在美国提倡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多为来自欧洲的移民。但到世纪之交时,在曾激发了进步运动的同一种对经济不平等不满的情绪的推动下,社会主义美国化的进程迅速加快。

1912年,美国社会主义党有15万名交纳党费的党员,出版了上百种报纸,也得到美国劳联的大力支持,并有几十名党员当选地方官员。社会主义运动在纽约市的下东城区非常盛行,移民工人所遭受的经济剥削和犹太教的改革传统都大大助长了它的生长。同样,在中西部的原来为平民党控制的地区,社会主义思想也倍受欢迎,因为它用一种传统的语言来强调自由的基础是对土地的拥有。在传播社会主义福音或将其与平等、自治政府以及自由的理想联系起来的过程中,没有谁能比尤金·V. 德布斯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德布斯在全国来回奔波,反复宣讲资本主义如何将工人降低到“奴役状态”,而由民主政府掌握经济将如何给人带来“政治平等和经济自由的希望”。西部劳工领袖约翰·奥尼尔说,将那些被一个由百万富翁资本家控制的政府所打碎的“自由的碎片收拢起来”,正是社会主义的任务。<sup>②</sup>

<sup>①</sup> Diner, *A Different Age*, 155-75; Cindy S. Aron, *Ladies and Gentlemen of the Civil Service* (New York, 1987), 38; Daniel T. Rodgers, *The Work Ethic in Industrial America 1850-1920* (Chicago, 1978), 55-56, 166-67; David Montgomery, "The 'New Union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ers' Consciousness in America, 1909-22,"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7 (Summer 1974), 515; Samuel Gompers, "Fundamental Universal Service," *American Federationist* (November 1916), 1037-1041.

<sup>②</sup> Andrzej Walicki, *Marxism and the Leap to the Kingdom of Freedom: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munist Utopia* (Stanford, 1995), 1-6, 14-15; James Weinstein, *The Decline of Socialism in America 1912-1925* (New York, 1967), 16-27; Irving Howe, *World of Our Fathers* (New York, 1976), 311-24; Nick Salvatore, *Eugene V. Debs: Citizens and Socialist* (Urbana, 1982), 191; Jean Y. Tussey, ed., *Eugene V. Debs Speaks*

如果经济自由的思想使人回忆起镀金时代的那些伟大的劳工战斗,进步时代美国的经济自由在具体的内容却相应一个已经成熟的工业经济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直到1919年,一篇发表在《木匠》杂志上的文章还在认为,用“工资奴隶制”的比喻来描绘工人被迫“在他们并不同意的条件下”工作的情形是  
 144 准确生动的。但在受雇佣人口的绝大多数将终身为工资而劳作的现实面前,这种曾经极为有用的比喻已经黯然失色,必须为另外一种与现实更为贴近的语言所取代。对进步主义者的社会评论家戴维·菲利普斯来说,“自由的基础”现在需要扩展公民概念的内容,以保证“每个美国人”能找到一份收入还说得过去的工作,如同保证“他拥有这样一种权利”一样。这些新的概念——一份“生计工资”和一种“美国式的生活标准”——不仅为进步时代的美国提供了一种批评财富和权力不均等的语言,同时也承认工资制将存留下去。天主教教父约翰·A. 瑞安在他那本颇有影响的《一份生计工资》(*A Living Wage*)书中,将美国生活标准描述成一种“自然的和绝对的”公民权,这种思想受到基督教教义的支持,因为经济关系应由道德标准来控制。瑞安是在明尼苏达的一个对亨利·乔治、劳工骑士团和平民党运动充满同情的家庭中长大的。他力图把教皇利奥十三世在1894年发布的非常有影响的通谕中对经济生活与道德价值的分离所进行的谴责转换成适用的语言,以支持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否定自由放任式的个人主义,推崇一种自然有机的美好社会的理想。<sup>①</sup>

工资的高低不应只是由市场供需法则来决定,而应考虑社会和道德因素,这种观点成为进步时代思想的主要内容。在1914年的莱顿法中,国会本身也宣布“人的劳动不是一种商品”。生计工资是一个有可塑性的、能伸能缩的概念,用当时最有名的社会改革家珍妮·亚当斯的话来说,它“总是不停地

(New York, 1972), 99, 122; Albert Fried, ed., *Socialism in America* (New York, 1970), 404; John Laslett, *Labor and the Left* (New York, 1970), 253.

① *The Carpenter*, September 11, 1919; David G. Phillips, "Economic Independence the Basis of Freedom," *Arena*, 41 (March-June 1909), 17-19; Lawrence B. Glickman, *A Living Wage: Workers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Consumer Society* (Ithaca, 1997); John A. Ryan, *A Living Wage*, 2<sup>nd</sup> ed. (New York, 1912), 44, 68-69; Francis L. Broderick, *Right Reverend New Dealer: John A. Ryan* (New York, 1963), 2-24.

侵入到新的领域中”。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生计工资”的概念已经发展到包括购买节省劳力的家用电器和批量生产的消费品的能力,甚至也包括了享受进电影院这类新式娱乐文化的能力。尽管生计工资这个概念不赞成市场对工资的定义,但它指出工资制度应该基于一种正义的社会法则之上。工资的水平而不是经济自主的地位,变成了经济自由的指数;“奴隶的工资”也取代“工资奴隶制”成为了描述经济上奴役地位的语言。(与此同时,“白人奴隶制”——这个在 19 世纪曾经用来形容工资制工人的词——此刻被那些呼吁社会纯洁的人用来形容卖淫行业。)<sup>①</sup>

在 19 世纪,当男性工人把为工资而工作看成一种耻辱时,许多女权主义者却将外出工作视为获得独立自主的一种途径。在进步时代,提倡和鼓吹生计工资的人大都把这种事看成是一项男性特权。劳工运动曾就组织妇女工人作过一些努力,但它基本上仍旧抱着 19 世纪家庭工资的观念。一位劳联发言人曾说,生计工资是男性力量的一种象征,是“作一个男人的权利,一种自由的男人自由而完整地行使他的其他权利的权利”,包括保证他的妻子和子女不得因为生计而外出受雇工作的权利。如果一个男人不得不为了家庭生活的需要,让妻子和孩子到工厂里去工作,美国煤矿工人联合工会主席约翰·米切尔说,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获得了自由的人”。约安神父坚持认为那些“被迫”为维持自己生计而工作的妇女应该与男性同工同酬。但许多生计工资的提倡者并不认为男女工人有差别是一种不公正,因为他们认为妇女并不需要养家糊口,而且也习惯于一种较为低下的“生活标准”。<sup>②</sup>

然而,无论家政意识形态如何盛行,到 20 世纪初时,愈来愈多的妇女在为

① James B. Atleson, *Values and Assumptions in American Labor Law* (Amherst, 1983), 12; Glickman, *A Living Wage*, Philip Davis, ed.,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ization* (Boston, 1920), 17; Nancy F. Cott, *The Grounding of Modern Feminism* (New Haven, 1987), 146; Mark T. Connelly, *The Response to Prostitution in the Progressive Era* (Chapel Hill, 1980), 114-18.

② Martha May, "The Historical Problem of the Family Wage: The Ford Motor Company and the Five Dollar Day," *Feminist Studies*, 8 (Summer 1982), 404-07; Martha May, "Bread Before Roses: American Workingmen, Labor Unions and the Family Wage," in *Women, Work and Protest: A Century of U.S. Women's Labor History*, ed. Ruth Milk-

工资而工作,而且与过去不同的是,外出工作的妇女不再局限于那些年轻和未婚的人(至少在白人人口中过去是这样的)。对于本土出生的白人妇女,适合她们的工作种类随着文秘、销售、教育和社区服务等行业职位的开放而大为增加。19世纪中,妇女工作人数最多的行业是家庭佣人,但是到1920年,仅有20%的工作妇女还继续从事这项工作。如果对于19世纪的女权主义者来说,女奴是妇女所受的一切压迫的象征的话,对新一代女权主义者而言,工作妇女——包括工人和专业技术阶层在内——则成为妇女解放的象征。当越来越多的年轻妇女希望有一个终身职业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写道,表明了一种“个人独立自主精神”的存在,预示了家庭与经济生活将发生重大转化。吉尔曼在19和20世纪之交的写作中重申,妇女解放只有通过走出家庭、进入工作场所才能实现。她对家政意识形态进行了女权主义思想史上最不妥协的批判。她认为,家庭不是妇女争取成就的地方,而是妇女受压迫的场所,家庭妇女既不是共和国的卫士,也不是社会美德的保护人,她们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流行的性别思维模式把妇女局限在一种百无聊赖、单调乏味的家庭生活之中,把她们变成了“一种社会蠹虫”,她们既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也不能真实而有意义地享受自由。<sup>①</sup>

在欧文式的公社制和贝拉米的乌托邦思想影响下,吉尔曼设计了一系列计划,要建立起社区托儿所、食堂和洗衣房等。她认为,只有彻底废除个人家庭领域,妇女才能获得“家庭自由”,才能作为“经济个人”而“自由存在”。吉尔曼的思想在这一时代那个数量极小但日益增长的职业妇女中引起了特别反响。1907年,哈里奥特·斯坦顿·布拉奇创建了“自立妇女平等联盟”。布拉奇是19世纪伟大的女权运动领袖伊莉莎白·卡迪·斯坦顿的女儿。如同弗

man (Boston, 1985), 9-10; John Mitchell, "The Workingman's Conception of Industrial Liberty," *American Federationist*, 17 (May 1910), 405-06; Ryan, *Living Wage*, 108; Alice Kessler-Harris, *A Woman's Wage: Historical Meaning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Lexington, 1990), 11.

① Alice Kessler-Harris, *Out to Work: A History of Wage-Earning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82), 109-26, 237; Ellen C. DuBois, *Harriot Stanton Blatch and the Winning of Women Suffrage* (New Haven, 1997), 93-94;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Women and Economics* (Boston, 1898), 10-20, 152.

洛伦斯·凯利一样,她也曾在欧洲居住过,受到过社会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从意识形态上讲,这个联盟的目标是想将19世纪妇女运动对追求自由权力的传统与进步时代对经济自由的追求结合起来。从现实的角度讲,该联盟希望联合所有的受过教育和新近成为工资制工人的妇女,开展一场斗争,既争取选举权,又争取所有妇女将婚姻、母亲职责和工资劳动联合起来的权利。另外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组织是“女权主义同盟”,它力图贯彻吉尔曼提出的思想,努力争取已婚妇女休产假的权利。<sup>①</sup>

根据市场的现实,如同埃玛·戈德曼指出的,为工资而工作给大部分妇女提供的是“最起码的生计”,而不是真正的自由。“如果家庭自由的狭窄和贫乏只是与工厂、血汗车间、百货公司或者办公室自由的狭窄和贫乏进行了交换的话,”她问道,“妇女们到底得了多少自由?”这些年里,许多年轻的移民妇女进入了城市的劳工市场,对于她们来说,争取一份有工资的工作,最首要和重要的目的是为家庭的生存作一份贡献,而不是追求个人的独立自主。即便如此,当她们把得来的工资交给家庭时,她们的工资仍然象征着一种自立。尽管她们自己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工会领袖亚伯拉罕·比斯诺说,来自移民家庭中的年轻的女工们都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意识:“她们得到了一种发展个性的权利。”这对于旧世界中那种极为严重的父权家庭结构来说是一种十分陌生的意识。“单身姑娘社交俱乐部”是一个由纽约的女邮购职员组成的组织,它自信地宣称:“我们享受着我们的独立与自由。”<sup>②</sup>

在新移民和他们的具有自我意识感的“自由”的子女(尤其是女儿)之间,围绕就业、业余消遣以及性方面的道德观念等问题,存在着痛苦的家庭内部冲

---

① Polly W. Allen, *Building Domestic Liberty*;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s *Architectural Feminism* (Amherst, 1988), 5-6, 20-24, 63-75; Gilman, *Women and Economics*, 241, 270; DuBois, *Blatch*, 94-95; June Sochen, *The New Woman: Feminism in Greenwich Village, 1910-1920* (New York, 1972), 47-59.

② Emma Goldman,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1917), 216-17; Louis Odencranz, *Italian Women in Industry: A Study of Conditions in New York City* (New York, 1919), 176; Abraham Bisno, *Union Pioneer* (Madison, 1967), 212; Kathy Peiss, *Cheap Amusements: Working Women and Leisure in Turn-of-the-Century New York* (Philadelphia, 1986), 34-47, 62.

突。这些冲突几乎在每一个移民群体中都有记载,从犹太人到墨西哥人,无一例外,而且惊人的相似。无论是本土出生的人还是移民,当时的记录者都注意到,年轻工作妇女对“那些标新立异和华而不实的时尚”有着格外的偏好,她们中间越来越多的人把微薄收入的一部分花在舞厅和其他娱乐场所,对此,这些记录者经常不以为然,表示反对。罗伯特和海伦·林德夫妇曾对印第安纳州的曼西进行过一次社会学的调查,调查结果成为了20世纪20和30年代的两部著名著作:《中镇》和《转型中的中镇》。林德夫妇认为妇女就业人数上升的原因之一是,妇女们希望抓住“正在飞速行进的美国生活标准之车的尾部”。<sup>①</sup>

林德夫妇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证明了进步时代成型的美国生活标准的广泛传播和受人欢迎。这种发展也反映出经济自由思想中的一个微妙变化。在这个时代,一种从消费者角度来描述的自由定义——即顾客有权接触由现代化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形色色的丰富商品——开始取代过去那种以经济和政治主权为核心的自由概念。美国生活承诺的一部分是消费的民主化,即大量的公民都能享有那些在欧洲只有贵族才能得到的商品。这种思想自然算不上新颖。19世纪的经济学家亨利·C. 凯里和八小时工作制鼓吹者都曾指出,广大公民的物质幸福和保障是保证国家伟大业绩的最可靠措施;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工作时间,将给工人带来更多的闲暇时间、更多的消费和更大的繁荣。

学者们把消费社会在美国出现的时间定在19世纪早期,甚至更早,因为从那时起,类似瓷器、玻璃器皿、时髦的布匹等成为了大众消费的物品。但是,一直要到进步时代,全国性的市场体制才真正得以形成和巩固,中心城市出现了巨型百货公司,市郊有连锁店,专为农村和小城镇居民服务的邮购转销店也得以建立,这样,全国的消费者都能买到从各地工厂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选

---

① Donna Gabaccia, *From the Other Side: Women, Gender, and Immigrant Life in the U.S., 1820-1990* (Bloomington, 1994), 68-69; Howe, *World of Our Fathers*, 128, 183, 253; George J. Sánchez, *Becoming Mexican American: Ethnicity,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Chicano Los Angeles, 1900-1945* (New York, 1993), 3-5, 137-47; Gary Cross and Peter Shergold, "'We Think We are of the Oppressed': Labor History, 28 (Winter 1987), 38-42; Robert S. and Helen M. Lynd, *Middletown in Transition: A Study in Cultural Conflicts* (New York, 1937), 181.

择范围广大的商品。到1910年,美国人可以买到电动缝纫机、洗衣机、除尘器和电唱机;到1920年,美国的公路上奔驰着800万辆汽车。低工资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显然限制了消费经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消费经济才得到全面发展并自成一体。但正是在进步时代,大众消费的诱人前景成为了新的自由定义的基础,取代了已经过时的经济自立的概念。<sup>①</sup>

随着经济生产从资本商品向消费商品转移,新生的广告产业为成倍地提高人类的“需要”铺平了道路。它同时也将这样一种信息推进到美国人的思想深处:现在,人们将在市场而不是在工场里享受到自由。无数的产品采用了“自由”作为产品牌子或用自由女神像的画像作为一种推销策略。消费是自由的一个中心内容,是公民权的一种——“每个生而自由的人,”广告业经理肯尼思·古德说,都“有权命名自己的必需品”。用百货公司大亨埃德华·法林的话来说,消费主义也是“自由思想”的一种,既然它要求个人在生活的基本问题上作出选择。这个定义与原先那个以经济自主和政治主权为核心的自由定义是相对的,根据这个定义,自由对女人如同对男人一样,是完全可以得到的。1928年,皮格利·威格利超市的一幅广告宣称道,“今日的妇女”可以在它的 148 商场出售的各式产品中“自由地选择”。<sup>②</sup>

最终,一种新的“富裕的文化”将界定“美国生活标准”的涵义,早期“品格”概念中的勤俭和自我压抑的价值观将为一种通过获取物质商品而产生的个人成就感所取代。后来,社会批评家们将把大众消费看成是一种缩小的、丧失了

① Daniel Horowitz, *The Morality of Spending: Attitudes Toward the Consumer Society in America, 1875-1940* (Baltimore, 1985), xxiv-xxv, 30-41; Richard L. Bushman, *The Refinement of America: Persons, Houses, Cities* (New York, 1992); William Leach, *Land of Desire: Merchants, Power, and the Rise of a New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1993), 11, 30-35, 147-48; Diner, *A Very Different Age*, 3-4; Richard W. Fox and T. Jackson Lears, eds., *The Culture of Consumption: Critical Essays in American History, 1880-1980* (New York, 1983), xi-xii.

② Roland Marchand, *Advertising the America Dream: Making Way for Modernity, 1920-1940* (Berkeley, 1985), 160, 294-95; Stuart Ewen, *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 Advertising and the Social Roots of Consumer Culture* (New York, 1976), 28-30; Dana Frank, *Purchasing Power: Consumer Organizing, Gender, and the Seattle Labor Movement, 1919-1929* (New York, 1994), 3; *Saturday Evening Post*, September 8, 1928.

政治性的乌托邦,它抛弃了早先自由概念的一些基础,如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之类,却提倡一种被动的公民行为和私有化了的欲望。但物质丰富的许诺也可以导致激烈的政治斗争,推动公民对自己权利的关注。当一个人被排斥在大众消费世界之外时(或他进入商店、餐厅以及其他消费场所的平等权利遭到拒绝时),这种排斥和拒绝将被视作对他的公民权利的否定,其严重程度可能并不亚于从前将一个人排斥在选民范围之外。工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激发了他们争取一份“生计工资”的斗争,与此同时,对消费品的需求和渴望使更多的工人加入工会。“我们发现自己完全为自我的欲望所鼓动起来,”一位工人的妻子写道。她的这句表白无疑是对一个市场社会拥有的两难局面所作的一种经典性的说明。“没有工会(给我们的)购买权,我们将没有钱买收音机和其他无数的东西。”在后来反对托拉斯的斗争中,其中的一个武器便是指责垄断资本人为地提高物价,牺牲了消费者的利益。沃尔特·李普曼是这些年里最有影响的社会评论家之一,他写道:“消费者意识”比阶级意识增长更快,“高昂的生活费用”成了这种意识的集合性口号。<sup>①</sup>

这样,“消费者”作为一个新的集体角色进入了社会改革的舞台。在镀金时代,当海伦·坎贝尔叙述一位时髦女郎身上穿着一件由一位在环境恶劣的血汗工厂中工作的贫穷妇女生产出来的衣服时,她将市场经济的矛盾绝妙地暴露出来。她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一些人的解放并不意味另一些人的相应的解放。”一代人之后,在弗洛伦斯·凯利领导下,全国消费者联盟成为呼吁制定治理妇女和儿童工作条件的法律的最重要的组织。凯利指出,当有社会良知的消费者意识到了商品生产条件中存在的剥削性时,他们手中掌握的在市场上进行选择的自由,将帮助他们与“工资制下的工人们联合起来”。<sup>②</sup>

151 因此,在美国历史上,大众消费第一次在对美国社会及其未来的描述中

① Warren I. Susman, *Culture as Histo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84), xx; T. Jackson Lears, "From Salvation to Self-Realization," in *Culture of Consumption*, ed. Fox and Lears, 3-9; Susan Levine, "Workers' Wives: Gender, Class, and Consumerism in the 1920s United States," *Gender and History*, 3 (Spring 1991), 53-54; Lippman, *Drift and Mastery*, 53-55.

② Helen Campbell, *Prisoners of Poverty* (Boston, 1889), 31; Kathryn K. Sklar,



政治性的乌托邦,它抛弃了早先自由概念的一些基础,如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之类,却提倡一种被动的公民行为和私有化了的欲望。但物质丰富的许诺也可以导致激烈的政治斗争,推动公民对自己权利的关注。当一个人被排斥在大众消费世界之外时(或他进入商店、餐厅以及其他消费场所的平等权利遭到拒绝时),这种排斥和拒绝将被视作对他的公民权利的否定,其严重程度可能并不亚于从前将一个人排斥在选民范围之外。工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激发了他们争取一份“生计工资”的斗争,与此同时,对消费品的需求和渴望使更多的工人加入工会。“我们发现自己完全为自我的欲望所鼓动起来,”一位工人的妻子写道。她的这句表白无疑是对一个市场社会拥有的两难局面所作的一种经典性的说明。“没有工会(给我们的)购买权,我们将没有钱买收音机和其他无数的东西。”在后来反对托拉斯的斗争中,其中的一个武器便是指责垄断资本人为地提高物价,牺牲了消费者的利益。沃尔特·李普曼是这些年里最有影响的社会评论家之一,他写道:“消费者意识”比阶级意识增长更快,“高昂的生活费用”成了这种意识的集合性口号。<sup>①</sup>

这样,“消费者”作为一个新的集体角色进入了社会改革的舞台。在镀金时代,当海伦·坎贝尔叙述一位时髦女郎身上穿着一件由一位在环境恶劣的血汗工厂中工作的贫穷妇女生产出来的衣服时,她将市场经济的矛盾绝妙地暴露出来。她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一些人的解放并不意味另一些人的相应的解放。”一代人之后,在弗洛伦斯·凯利领导下,全国消费者联盟成为呼吁制定治理妇女和儿童工作条件的法律的最重要的组织。凯利指出,当有社会良知的消费者意识到了商品生产条件中存在的剥削性时,他们手中掌握的在市场上进行选择的自由,将帮助他们与“工资制下的工人们联合起来”。<sup>②</sup>

151 因此,在美国历史上,大众消费第一次在对美国社会及其未来的描述中

<sup>①</sup> Warren I. Susman, *Culture as Histo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84), xx; T. Jackson Lears, "From Salvation to Self-Realization," in *Culture of Consumption*, ed. Fox and Lears, 3-9; Susan Levine, "Workers' Wives: Genders, Class, and Consumerism in the 1920s United States," *Gender and History*, 3 (Spring 1991), 53-54; Lippman, *Drift and Mastery*, 53-55.

<sup>②</sup> Helen Campbell, *Prisoners of Poverty* (Boston, 1889), 31; Kathryn K. Sklar,

政治性的乌托邦,它抛弃了早先自由概念的一些基础,如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之类,却提倡一种被动的公民行为和私有化了的欲望。但物质丰富的许诺也可以导致激烈的政治斗争,推动公民对自己权利的关注。当一个人被排斥在大众消费世界之外时(或他进入商店、餐厅以及其他消费场所的平等权利遭到拒绝时),这种排斥和拒绝将被视作对他的公民权利的否定,其严重程度可能并不亚于从前将一个人排斥在选民范围之外。工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激发了他们争取一份“生计工资”的斗争,与此同时,对消费品的需求和渴望使更多的工人加入工会。“我们发现自己完全为自我的欲望所鼓动起来,”一位工人的妻子写道。她的这句表白无疑是对一个市场社会拥有的两难局面所作的一种经典性的说明。“没有工会(给我们的)购买权,我们将没有钱买收音机和其他无数的东西。”在后来反对托拉斯的斗争中,其中的一个武器便是指责垄断资本人为地提高物价,牺牲了消费者的利益。沃尔特·李普曼是这些年里最有影响的社会评论家之一,他写道:“消费者意识”比阶级意识增长更快,“高昂的生活费用”成了这种意识的集合性口号。<sup>①</sup>

这样,“消费者”作为一个新的集体角色进入了社会改革的舞台。在镀金时代,当海伦·坎贝尔叙述一位时髦女郎身上穿着一件由一位在环境恶劣的血汗工厂中工作的贫穷妇女生产出来的衣服时,她将市场经济的矛盾绝妙地暴露出来。她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一些人的解放并不意味另一些人的相应的解放。”一代人之后,在弗洛伦斯·凯利领导下,全国消费者联盟成为呼吁制定治理妇女和儿童工作条件的法律的最重要的组织。凯利指出,当有社会良知的消费者意识到了商品生产条件中存在的剥削性时,他们手中掌握的在市场上进行选择的自由,将帮助他们与“工资制下的工人们联合起来”。<sup>②</sup>

151 因此,在美国历史上,大众消费第一次在对美国社会及其未来的描述中

① Warren I. Susman, *Culture as Histo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84), xx; T. Jackson Lears, "From Salvation to Self-Realization," in *Culture of Consumption*, ed. Fox and Lears, 3-9; Susan Levine, "Workers' Wives: Genders, Class, and Consumerism in the 1920s United States," *Gender and History*, 3 (Spring 1991), 53-54; Lippman, *Drift and Mastery*, 53-55.

② Helen Campbell, *Prisoners of Poverty* (Boston, 1889), 31; Kathryn K. Sklar,

占据了一个中心位置。在镀金时代，社会理论家们曾弄不明白，为什么经济进步会同时产生财富的增长和绝对的悲惨。但进步时代的一代人却受到西蒙·W. 巴顿更为乐观的作品的的影响。巴顿后来被经济学家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称作“繁荣与进步的预言家”。他认为，大众消费为阶级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一种抗体，同时也为改善穷人的状况提供了希望。他认为，穷人之所以堕落和低贱不是因为他们道德上的失败，而是因为他们低下的生活条件所致。巴顿使用了一种让人记忆起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的语言，宣称了一个“匮乏时代”的结束和一个富足悠闲社会的开始，而后者是因广大公民对物质产品不断增长的希望推动而出现的。用不着抛弃资本主义，美国已经看到了“新文明”的曙光，美国人将同时享受到市场自由和社会主义者承诺的种种好处——个人成就感、经济平等和一个“人人独立而自由”的社会。<sup>①</sup>

1928年，法国人安德烈·西格弗里德——他在20世纪开始后曾四次访问美国——评论说，一个“新社会”已经诞生，在这个社会中，美国人把他们的“生活标准”当成一种“神圣的财产，为此他们将不惜任何代价来捍卫”。新闻记者塞缪尔·斯特劳斯在《大西洋月刊》中把这个新社会称作“消费主义”，并把广告业和电影认定为这一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交流形式。在莫西，林德夫妇发现新的休闲活动和对消费新的重视已经取代政治，成为了新的政治热点。选举已不再像在19世纪那样是公共注意力的“活跃中心”，参加投票的选民人数也大大降低。全国性的统计数字证实了他们的观点，1896年，合格选民中的80%参加了投票；但到了1924年，登记选民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参加了投票。当然，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有多种，包括南部一党制的形成和巩固、妇女获得了选举权（在许多年内，妇女参加投票的人数始终低于男性公民）以及共和党对联邦选举的长期控制。但是，消费者的兴趣从公共事务向私人事务的

---

*Florence Kelley and the Nation's Work: The Rise of Women's Public Culture, 1830-1900* (New Haven, 1995), 142-51.

<sup>①</sup> Tugwell in Horowitz, *Morality of Spending*, 30-34. Simon W. Patten, *The New Basis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07), 10-15, 90-91, 220; Christopher Lasch,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 Progress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1991), 69-70.

转移无疑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对他的国家来说,美国公民的首要重要性已不在于他是一个公民,”莫西的一家报纸宣称道,“而在于他是一个消费者。”<sup>①</sup>

## 自由与进步时代的国家

然而,公民权始终是进步时代自由观的中心。延续内战时期的传统和镀金时代的改革计划,一个由具有改革思想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兴起的妇女运动、工会活动家和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广泛联盟开始出现。他们立志重新复活能动主义式的国家政府的思想,并希望争取到都市中产阶级和劳工选民的支持。那种认为“政府管制的最小化”意味着“自由……的最大化”的陈旧思想,约翰·R. 瑞安神父写道,已经不再拥有“大量的支持者了”。无论他们的目的是管制或消灭托拉斯的权力,保护消费者,通过废除残酷无情的竞争来推进市场的文明化,还是保障在合作工场的“个人自由”,进步主义者都认为,现行时代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政府的功能。一位进步主义评论家指出,国家政府是“一个道德的代理人”,它应该为社会的运作建立起规章制度。<sup>②</sup>

这一时代大部分的改革性立法都是由县和州一级政府通过实施的。这些立法包括改革现有的选举资格要求、对大公司进行管制、对工厂的安全与健康条件进行政府监督等。但是 20 世纪早期最醒目发展却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随之出现的是行政专职机构、独立的委员会以及规范劳资关系、商业行为和金融政策的法律;这个国家政府在相互争吵不休的各个群体中扮演了一个“经纪人”的角色,这些群体之间的冲突已经威胁社会和谐的存在。正是在这个时期,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得以产生;与此同时,通过类似于纯净食品和药物法(1906 年)的法律,联邦政府开始建立规范市场

① Siegfried and Straus in Leach, *Land of Desire*, 266; Robert S. and Helen M. Lynd, *Middletown: A Study i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1929), 88, 416-20; Robert H. Wiebe, *Self-Rule: A 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n Democracy* (Chicago, 1995), 134-37.

② Ryan, *Living Wage*, 297-98; Harold E. Stearns, ed., *Civ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22), 283.

行为的制度,保护公民免受市场的肆虐。

对大多数进步主义者来说,地方主义和强调州权的传统不过是一种目光短浅的借口,是对实现一个崭新的国家目的的阻挠。贫困、经济上的无保障以及缺乏工业民主等都是全国性的问题,需要全国性的措施来解决。至于自由放任的原则,进步时代的社会科学家霍勒斯·卡伦评论道,它已经变成了“为自由的热爱者们所诅咒的对象”。许多进步主义者认为,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大公司的产生,是通过经济演变而成,而不是靠资本家的违规行为。他们认为,这个同样的过程使得全国性政府成为政治行动的当然主体。只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政府才能创造自由的社会条件。赫伯特·克罗利写道,当美国人的生活 153 为那些操纵政治的狭隘利益集团或那些无所不能的公司企业所控制时,民主国家代表了一条可供选择的出路。为了取得民主自决和个人自由这样的“杰斐逊式的目标”,他认为,美国必须采用一个由国家指导经济这样的“汉密尔顿式的方法”。<sup>①</sup>

传统观念认为,一个强大的政府必然对自由造成威胁,进步主义者对此予以否定,因为他们对自由的理解本身处于一个流动的过程之中。1880年,英国哲学家 T. H. 格林曾作过一次将对进步时代社会思想极有影响的演讲。格林提出,自由是一个积极性的概念,说到底是一个“权力”的问题。格林对自由新定义的呼唤响彻整个进步时代的美国。约翰·杜威从 19 世纪 90 年代直至他在 1952 年去世,一直在思考“有效自由”的问题。他写道,“有效自由”与“那种高度形式化的有限自由概念”是不同的,后者指的是一种独立自主的个人先天性拥有的事物,需要得到免受外部限制的保护。而“有效自由”意味着“用来做某些具体事情的有效权力”,包括“在某个特定时间对既存在权力的分配”的功能等。因此,自由“始终是一个社会问题”,也不可避免地是一个政治问题。自由——以及它所代表的个人天赋、权力和欲望——是通过社会机制

<sup>①</sup> Stephen Skowronek,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New York, 1982), 42-43; Leach, *Land of Desire*, 177; Horace Kallen, “Why Freedom Is a Problem,” in *Freedom in the Modern World*, ed. Horace Kallen (New York, 1928), 13-15; Herbert Croly, *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 (New York), 1914, 44-45.

和民主的公民参与来构造和享受的。“自由，”杜威的极富才华的崇拜者伦道夫·伯恩尼写道，“意味着通过一种民主的合作方式来决定一个国家的理想、目的及工业和社会体制。”<sup>①</sup>

对杜威和克罗利这样的进步主义者来说，19世纪那种所谓的“独立自主”不过是一种与世隔绝的孤立主义；他们相信，真正的自由涉及一个持续不断的生长过程，需要有一种终身与他人发生交往的活动的支持。当进步主义者将自由看成是一种连续的自我实现的过程时，他们自然又转回到爱默生提出的个人成就的概念，甚至回到了杰斐逊提出的“追求幸福”的自然权利的观念。但是，进步主义者将一种新的思想嫁接到传统的个人主义和自主概念之中，这种新思想就是，这样的自由要求为人的全面发展有意识地创造社会条件。对克罗利来说，这意味着政府必须承担起“一种符合道德和社会要求的分配财富”的责任。对杜威来说，这意味着用知识资源武装美国人，使他们了解现代世界；同时意味着赋予政府足够的权力，来对抗那种对人们经济利益的掠夺和对他们原有权力的解除。社会科学家威廉·F. 威洛比说，进步主义“将政府行动看成目前看得见的、惟一现实可行的方法，来赋予个人——不只是那个小小的、在经济上拥有强权的阶级，而是所有人——真正的自由”。<sup>②</sup>

154 尽管进步时代的知识分子发展出一个关于国家政府的新概念，但他们提出的“新民主”（语出沃尔德·维尔那本极有影响的书的书名）概念却与传统的

① James T. Kloppenberg, *Uncertain Victory: Social Democracy and Progressiv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70-1920* (New York, 1986), 182; John Dewey and James Tufts, *Ethics* (New York, 1908), 439; Daniel F. Rice, *Reinhold Niebuhr and John Dewey: An American Odyssey* (Albany, 1993), 243-44; Westbrook, *John Dewey*, 37-49, 165-66; Randolph Bourne, *The Radical Will: Selected Writings 1911-1918*, ed. Olaf Hansen (New York, 1977), 252.

② Croly, *Promise*, 23; R. Jeffrey Lustig, *Corporate Liberalism: The Origins of Modern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y, 1890-1920* (Berkeley, 1982), 129-30; John Dewey, "Philosophies of Freedom," in *Freedom and the Modern World*, ed. Kallen, 245-54; Allan Ryan, *John Dewey and High Tide of American Liberalism* (New York, 1995), 234; John L. Recchiuti,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rogressivism: New York's Social Science Community 1880-1917,"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1, 100.

政治自由的定义混淆不清。传统政治自由的内涵指的是对政府管理的民主参与。强化国家的权力,则使界定政治参与的界限问题变得格外重要。在进步时代,选举程序和政治领域中实施一系列的变革,许多变革在目的上看上去是自相矛盾的。选民队伍既得到了扩大,同时又被缩小了;选民对政府许多功能的直接影响既增强了,同时又被取消了。在这个时代里,南部实施了大规模的剥夺黑人选举权的运动(这个过程从1890年自密西西比州开始,到1908年至佐治亚州结束),与此同时,一条宪法修正案又将选举权授予妇女——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民主扩展。在同一时代里,类似于公民立法提案权、公民复决制以及罢免议员制等措施得以采用,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允许选民直接提出立法议案、行使直接表决权以及罢免政府官员。但与此同时,各地也出现了由任命的城市官员取代民选市长的做法。这一时代也目睹了文化测试要求的扩大化(这种要求在南部和北部都变得普遍和正常),为了限制穷人的投票,各地还实行了新的选民居住和登记规定。<sup>①</sup>

总体来说,进步时代在选举方面作出的变更与19世纪那种推动全民选举权的趋势相比,是一种极有影响和充满讽刺意味的逆转,也是对选举是美国公民权不可剥夺的一部分这一神圣思想的否定。对大多数进步主义者来说,选民的“合适性”而不是选民人数的绝对数字,决定一个民主体制运作的质量。这样,在改进民主质量的名义下,数百万人——大多数为黑人、移民和其他工人——被排斥在投票站以外,尽管同时数百万白人妇女加入了选民队伍。对于杜威这样更讲求平等理想的进步主义者来说,他们认为,只要给予必要的机会和资源,所有的公民都能拥有一种不带私心的探索精神,并会竭力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现实的“科学的”办法。因此,政府可以安全地从托拉斯和政治机器的控制中转移出来,交到“人民”的手中,由人民来掌握。但大多数的进步主

---

<sup>①</sup> Sarah Henry, "Progressivism and Democracy: Electoral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8-1919,"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5; James A. Henretta,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Democratic-Republicanism': Political Rights in New York and the Several States, 1880-1915," in *Toward a Usable Past: Liberty Under State Constitutions*, ed. Paul Finkelman and Stephen E. Gottlieb (Athens, GA, 1991), 51.

义者对真正的政治世界并不放心,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始终在围绕狭隘的阶级、经济和宗教利益旋转。事实上,许多进步主义者支持赋予妇女选举权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相信了女权主义者鼓吹的一种观点,即妇女作为一个独立的、非党派的力量能将政治从政客和党派偏见中挽救过来,并能重新将其引导至追求共同利益的方向。<sup>①</sup>

“他并不相信民主;他只是相信政府,”这句 H. L. 门肯对西奥多·罗斯福的批评,在某种令人感到难堪的意义上也相当于是对许多提倡具有强大权威的国家的进步主义者一种批评。通过一个由公正无私的专家掌握的“民主政体”,政府可以对社会进行最明智的管理,并在许多方面不受公民整体的制约。这种立志以技术官僚的方式建立起秩序、效率和集中化管理的冲动——所有这一切在名义上都宣称是为社会正义服务的——是进步时代改革的一个重要主题。沃尔特·李普曼在 1914 年出版的、颇具影响的评论文集的书名《漂流与制服》中提出了美国面对的严峻的现实选择。“漂流”意味着国家和社会将继续顺着已经过时的个人自主的陈词滥调运转;“制服”则表明承认要对社会问题和冲突进行理性的探索,并利用这种理性探索的精神来重塑社会。李普曼写道:“科学的精神”应该是“一个自由人的世界观”。但李普曼又担心,普通的公民会因为习惯于旧的思想观念和偏狭的利益而无法拥护“科学的精神”(这种担心和恐惧成为了他在 20 世纪 20 年代对大众民主思想进行否定的前兆)。李普曼认为,新一代的公司主管们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可以委以重任,由他们创造性地和高效率地来解决美国面临的深刻社会问题。对他来说,政治自由与其说是对政府管理的直接参与,不如说是力争正确的政策结果。<sup>②</sup>

但是,与这种精英行政管理政治观平行的是一种更具有民主性的有为政府的观点。如同其他的群体一样,组织起来的妇女改革家们是这种政府观的

<sup>①</sup> Wiebe, *Self-Rule*, 162-64; Westbrook, *John Dewey*, xiv-xvi, 179-89; Eisenach, *Lost Promise*, 7; Lustig, *Corporate Liberalism*, 172-89.

<sup>②</sup> Stettner, *Shaping Modern Liberalism*, 63; Lippmann, *Drift and Mastery*, 6, 45-52; Lustig, *Corporate Liberalism*, 152-54.



接生婆。在 20 世纪的头 20 年内,妇女选举权运动第一次变成了一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摆脱了 19 世纪 90 年代那种精英政治的模式,组织起一个范围广泛的联盟,其成员包括有中产阶级俱乐部的妇女、工会活动家、社会主义者以及贫民救济社工作者;妇女运动的语言口号也开始变得比较民主化,而不像过去那样带有强烈的土生居民保护主义色彩。妇女运动的基础得以扩展的原因之一,在于运动本身与一种广泛的、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来保障经济的诉求结合起来了。这种扩展的直接导火索是那些从事移民安置工作的妇女对贫困移民所遭遇的痛苦的与日俱增的意识,以及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条件日渐成为公众关心的问题的现实。

尽管她们在许多州仍不能参加选举,但妇女还是处于这一时代的政治中心。中产阶级妇女希望通过各种俱乐部、贫民救济社和其他一些机构来帮助穷人摆脱贫困,以及帮助劳动妇女进行自救,这种做法将政治语言的重心转移到有为政府的话题上。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不仅认为,为穷人家庭提供社会服务和教育是她们的一种神圣职责,而且发现了自由放任教条主义在解释都市贫困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她们同时发现即便是组织良好的社会救济工作也不能减轻住房、收入和医疗卫生条件不足的问题。贫民救济社的活动不仅产生了珍妮·亚当斯和佛罗伦斯·凯利这样的领袖人物,而且也产生了朱莉亚·莱思罗普和弗朗西丝·珀金斯;莱思罗普是第一位主持一个联邦机构的女性(她曾担任联邦儿童福利局局长;这个局于 1912 年建立,其职能是调查母亲与儿童的生活条件,并为他们的利益说话);珀金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担任过劳工部长。进步时代的妇女在向政府寻求支持的时候,实际上协助发动了一场要求政府管制工人的工作环境以及要求政府为改进穷人的生活状况而为他们提供直接帮助的群众运动。<sup>①</sup>

“我们需要投票权,”莉奥诺拉·奥赖利说道,“来为我们作为家庭妇女所

① Aileen S. Kraditor, *The Ideas of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1890-1920* (New York, 1965), 66-71; Suzanne M. Marilley, *Women Suffrage Movement and the Origins of Liberal Femi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1820-1920* (Cambridge, MA, 1996), 188-92; Diner, *A Very Different Age*, 209-12.

接生婆。在 20 世纪的头 20 年内,妇女选举权运动第一次变成了一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摆脱了 19 世纪 90 年代那种精英政治的模式,组织起一个范围广泛的联盟,其成员包括有中产阶级俱乐部的妇女、工会活动家、社会主义者以及贫民救济社工作者;妇女运动的语言口号也开始变得比较民主化,而不像过去那样带有强烈的土生居民保护主义色彩。妇女运动的基础得以扩展的原因之一,在于运动本身与一种广泛的、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来保障经济的诉求结合起来了。这种扩展的直接导火索是那些从事移民安置工作的妇女对贫困移民所遭遇的痛苦的与日俱增的意识,以及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条件日渐成为公众关心的问题的现实。

尽管她们在许多州仍不能参加选举,但妇女还是处于这一时代的政治中心。中产阶级妇女希望通过各种俱乐部、贫民救济社和其他一些机构来帮助穷人摆脱贫困,以及帮助劳动妇女进行自救,这种做法将政治语言的重心转移到有为政府的话题上。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不仅认为,为穷人家庭提供社会服务和教育是她们的一种神圣职责,而且发现了自由放任教条主义在解释都市贫困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她们同时发现即便是组织良好的<sup>156</sup>社会救济工作也不能减轻住房、收入和医疗卫生条件不足的问题。贫民救济社的活动不仅产生了珍妮·亚当斯和佛罗伦斯·凯利这样的领袖人物,而且也产生了朱莉亚·莱思罗普和弗朗西丝·珀金斯;莱思罗普是第一位主持一个联邦机构的女性(她曾担任联邦儿童福利局局长;这个局于 1912 年建立,其职能是调查母亲与儿童的生活条件,并为他们的利益说话);珀金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担任过劳工部长。进步时代的妇女在向政府寻求支持的时候,实际上协助发动了一场要求政府管制工人的工作环境以及要求政府为改进穷人的生活状况而为他们提供直接帮助的群众运动。<sup>①</sup>

“我们需要投票权,”莉奥诺拉·奥赖利说道,“来为我们作为家庭妇女所

① Aileen S. Kraditor, *The Ideas of the Woman Suffrage Movement, 1890-1920* (New York, 1965), 66-71; Suzanne M. Marilley, *Women Suffrage Movement and the Origins of Liberal Femi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1820-1920* (Cambridge, MA, 1996), 188-92; Dincer, *A Very Different Age*, 209-12.

人反而激发了进步时代国家机制的建设过程。<sup>①</sup>

到1917年美国参加一战时,在利用政府权力来增强妇女在家庭和工作场所中享有自由的条件方面,进步主义者已经获得了成功。1910年后,各州迅速通过法律,保证向母亲们提供保障金(这是州一级向没有男性支持的、有孩子的母亲提供的一种资助)。尽管这些资助微薄有限,而且地方政府对申请所设的资格限制往往带有歧视性(白人寡妇往往是资助的主要接受者,单身母亲广受歧视,全国接受资助人数中只有3%是黑人),但这些法律却表明,帮助妇女全心全意照顾好子女同时争取经济上的独立是政府的责任。“主张平等的”和“承认差别的”女权主义者都支持母亲保障金的计划——前者希望借此来削减妇女对男人传统的经济依附性,后者则希望借此加强传统的家庭结构和母子之间的感情联结。女权主义者克里斯特尔·伊斯门说,“我们保证母亲处于自由状态的惟一办法”是对她们抚养孩子的工作当作“对社会的一项服务”那样来给予补偿。禁用童工的法律代表了另外一项“母亲权益”改革,因为据估计当时大约200万15岁以下的孩子受到剥削性的雇佣,所以使用童工是一个重大的时代问题(但这类法律经常受到来自贫穷家庭的抵制,因为对这些家庭来说,孩子挣来的收入对家庭生存至关重要)。<sup>②</sup>

进步时代的其他立法承认大批妇女在家庭以外的场所工作的事实,但将她们定义为一个依附性群体(类似于孩子),需要在一些相对男子来说并不必要的方面接受政府的保护。1908年,在马勒诉俄勒冈案的著名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一致支持了妇女最长工时限制法的合宪性。在那份著名的支持俄勒冈州法律的法院诉讼陈述中,路易斯·布兰代斯运用了大量的科学和社会学调查,说明妇女们因为体力和耐力方面都不如男子,长时间的工作对她们来说是相当危险的,与此同时,妇女具有的生育能力赋予州政府正当的理

① Rosalind Rosenberg, *Divided Lives: American Wome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92), 58; Molly Ladd-Taylor, *Mother-Work: Women, Child Welfare, and the State, 1890-1930* (Urbana, 1994), 3, 43-75.

② Ladd-Taylor, *Mother-Work*, 135-49; Gwendolyn Mink, *The Wages of Motherhood: Inequality in Welfare State, 1917-1942* (Ithaca, 1995), 31-51; Linda Gordon, *Pitied But Not Entitled: Single Mothers and the History of Welfare* (New York, 1994), 58.

由来干预和管制她们的工作条件。这样，在臭名昭著的洛克纳案否定了一项限制面包坊工人工作时间的州法三年之后，最高法院在契约自由的教条上打开了第一个重要的缺口。但妇女们为之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昂贵：因为在当时，妇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劳工市场和获取大学学位，布兰代斯的陈述和法院的判决加强了原有的偏见，即妇女工人是虚弱的、依附性的，不具备与男人同等的享有经济自由的能力。到1914年，全国有27个州通过了限制女工工时的法律。<sup>①</sup>

尽管这些涉及母亲权益的改革将性别不平等的内容加入到福利国家的早期基础之中，但使用政府力量来管制工作条件本身就对与自由放任相关的一些思想和推断提出了疑问，也对劳工契约的神圣性提出了挑战。州对劳工市场的管制从家庭开始，但那些基于妇女和儿童需要之上的政府项目与其他的基于所有工人权利之上的项目是同时存在的。尽管并不是所有的改革者都愿意迈出这一步，但将保护妇女的思想扩展开来，推及到要求政府改善男性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保护他们不受失业、老年、健康恶化和工伤引起的残废等变故的影响，应该是不难做到的。布兰代斯自己曾坚持认为，一个定义广泛的社会福利概念构成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保护下的“自由”的一个部分，政府应该将自己与所有公民的健康状况、收入和未来发展的前景联系起来。约翰·A. 瑞安曾经开出的通过政府行动来建立经济自由的药方，是以保护妇女和儿童为起点的，后来发展到包括争取法律对工会活动的支持、八小时工作制、市政住房工程、公用事业的公有化以及建立一个递增性的所得税等内容。所有这些措施，他认为，对于在一个工业化社会中“保护个人自由”都是必须的。<sup>②</sup>

① Nancy S. Erickson, "Muller v. Oregon Reconsidered: The Origin of a Sex-Based Doctrine of Liberty of Contract," *Labor History*, 30 (Spring 1989), 228-50; Strum, *Louis D. Brandeis*, 114; Susan Lehrer, *Origins of Protective Legislation for Women 1905-1925* (Albany, 1987), 1-3.

② Gordon, *Pitied But Not Entitled*, 147-81; Mark A. Graber, *Transforming Free Speech: The Ambiguous Legacy of Civil Libertarianism* (Berkeley, 1991), 120; Broderick, *Right Reverend New Dealer*, 57-60.

布兰代斯与瑞安描绘了一幅不同的福利国家前景，这种前景与“母亲权益”改革者想像中的福利国家不同，它的根源不是来自社会工作传统和对健康母亲的期望，而是基于一种主张普遍享有经济权利的思想，这些经济权利包括有权获取一份小康收入以在被解雇和遭遇工伤时得到一定的保护。这种思想在进步时代也得到了相当有力的支持。到1920年时，几乎所有的州都制定和实施了有关工伤事故赔偿的法律。这项法律成为建立一种更加广泛的社会安全保障计划的楔子。但各州制定的最低工资法和工时限制法却只适用于女工。那种适用于所有人的基本生活标准和工作条件的规定，还得要等到新政到来之后才能实现。<sup>①</sup>

进步时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冲撞都集中在被《麦克卢尔杂志》称为“政府与大公司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上，这些思想的交锋在1912年总统竞选中集中表现出来了。这个尤金·V·德布斯称为“孕育着最崇高的可能性的一年”目睹了一场四雄相争的总统竞选，竞选者包括共和党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前总统但现为进步党候选人的西奥多·罗斯福、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和代表正处于顶峰期的社会主义党的德布斯本人。竞选的辩论变成了围绕大公司时代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关系的一场深入的全国性大辩论。在政治光谱的一端是塔夫脱总统。他是一个诚信的进步主义者，尽管他在1912年开始强调，只要政府与私人企业家联合起来治理社会问题，经济个人主义仍可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存在下去。处在光谱另一端的是德布斯，他要求彻底改革整个经济结构，以此来推动美国“从工资奴隶制向自由合作制迈进，从资本主义寡头政体向产业民主制迈进”。他是所有候选人中惟一提出这种主张的人。相对来说，支持社会主义党全面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主张的美国人并不是很多，但该党提出的一些近期要求——包括铁路和银行业的公有化、政府对失业者提供救济和帮助、建立短工时和最低工资制的立法以及递增制

<sup>①</sup> Kathryn K. Sklar, "Two Political Cultures in the Progressive Era: The National Consumers' League and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Labor Legislation," in *U. S. History as - Women's History: New Feminist Essays*, ed. , Linda K. Kerber, et al. (Chapel Hill, 1995), 36-62.

式的所得税——却集中表现了进步时代具有前瞻性的先锋思想。<sup>①</sup>

但在1912年真正引起公众注意的是威尔逊与罗斯福之间关于自由的内容和政府保障自由时的作用的辩论。他们两人在许多问题存有分歧，尤其是在政府权力的危险和经济集中化的不可避免性等问题上；但两人都相信，为了保存个人自由，必须加强政府的功能。尽管他所代表的党对州权和自由放任意识形态坚信不疑，威尔逊本人却对进步主义的思想深信不疑。“当然，我们需要自由，”他在1911年宣称道，“但是，什么是自由呢？”他认为，“那种被许多代人重复进而变得神圣……的旧词语”需要“转换到现实经历中去”。作为新泽西州的州长，他曾经领导了贯彻工人赔偿法和对公用事业和铁路进行管制的活动。但威尔逊在1912年提出的“自由计划”或后来他称之为“新自由”的政策却深深地根植于传统的民主党意识形态之中。他认为，政府是自由的敌人，“自由的历史就是限制政府权力而不是增加其权力的历史。”但威尔逊又说，自由的内涵要比杰斐逊时代更丰富，政府有责任推进自由，“今天的自由决不只意味着个人不受侵犯和干扰。在当代，一个政府的自由计划必须同时也是积极的，而不仅仅是消极的。”威尔逊在竞选中经常向布兰代斯请教，因而受后者的影响极深。威尔逊坚持认为，自由既是“一个经济思想”，也是一种政治思想，惟一能使民主党重新焕发活力的途径是将政府从大商业的阴谋下解救出来。只有在非集中化的经济中，自由才会振兴，这样的经济会培育出真正独立的公民，并将政治自治重新交回到160 地方社区手中——联邦政府则可以通过加强反托拉斯法、保障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以及积极鼓励小企业家的发展等行动来争取实现这些目标。<sup>②</sup>

① James Gilbert, *Designing the Industrial State: The Intellectual Pursuit of Collectivism in America, 1880-1940* (Chicago, 1972), 48-49; Thomas J. Knock, *To End All Wars: Woodrow Wilson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1992), 15; Fried, *Socialism*, 391-94.

② John W. Davidson, ed., *A Crossroads of Freedom: The 1912 Campaign Speeches of Woodrow Wilson* (New Haven, 1956), ix-x, 3-9; Woodrow Wilson, *The New Freedom* (New York, 1913), 284; Arthur S. Link, ed.,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Princeton, 1966-), XX, 443, XXV, 99, 124, 228; Urofsky and Levy, eds., *Brandeis Letters*, II, 635n.

回过头看，威尔逊当年并没有看清现代经济中大公司霸权形式的各种因素。但他看到了集中化经济势力可能与集权化的政治权势联合起来，损害普通公民的利益，他的这种警告无疑是极有先见之明的，尤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即许多进步主义者对政府充满了信赖，认为政府能够在决定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目的的时候扮演一个公正无私的仲裁者的角色。对于罗斯福的支持者来说，威尔逊代表了一个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时代的残余势力，他的计划只是为了满足小商人的需要，但却忽视了专业技术人员、顾客和劳工的利益。李普曼写道，威尔逊的“新自由”意味着“奸商们将没有什么自由，但却没有将国家从狭隘利益之中解放出来，表现了……小竞争者的局限性的眼光。”尽管威尔逊和布兰代斯的言论充满了“对大企业的诅咒”，李普曼却认为，美国真正需要的是坦率地接受大企业的不可避免性及其带来的好处，并辅之以政府对大企业违法行为的积极干预和打击，同时引导社会向追求共同目标的方向发展。李普曼所宣示的正是“新国家主义”的核心思想，这正是罗斯福在1912年提出的区别于威尔逊思想的美国前景。威尔逊认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构成了自由的基础，罗斯福针锋相对地指出，这种观点“在今天的事实中找不到任何一丁点可以支持其成立的内容”。这是一付“把人民拱手送交给大公司任其奴役”的处方，而“大公司的权力只有通过政府权力的扩展和延伸受到钳制”，只有“政府的管制权、控制权和指导权”才能代表“受压迫者的自由”。<sup>①</sup>

当威尔逊竭力反对大面积社会福利项目、害怕这些项目会将公民变成国家的包袱的时候，进步党的党纲却为了推动社会正义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建议。在一群贫民救济社工作者、劳工改革家、具有进步主义信仰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推动下，进步党的党纲描绘了一幅现代民主制福利国家的蓝图，内容包括妇女选举权，政府对公司企业的监管，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全国性的劳工法和健康法，八小时工作制，适用于所有工人的“一份生计工资”，

---

<sup>①</sup> Davidson, ed., *Crossroads of Freedom*, 72-79, 130; Lippman, *Drift and Mastery*, 81-84; *The Works of Theodore Roosevelt, Memorial Edition* (24 vols. New York, 1923-26), XIX, 170-76, 419-29, 519.

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一项全国性的覆盖失业、医疗保健和老年的保障机制，等等。罗斯福把这份党纲称为自内战以来的“最重要的文件”。这份党纲集中了汇入进步运动中的许多不同流派的思想 and 不同的政治经验。罗斯福当然没有能够赢得选举（尽管当上总统后的威尔逊有时的行动与一个“新国家主义者”别无二致），但他在 1912 年的竞选却给了自由一种现代的社会和经济内容，同时也建立起一个政治议程，这个议程将一直成为界定 20 世纪 161 剩余时期内的政治自由主义的尺度。<sup>①</sup>

事实上，到 1916 年时，类似赫伯特·克罗利这样的作者正在有意识地重新界定“自由主义”这个颇具神圣意味的词，在过去，它是有限政府和自由放任经济学的简写语，现在被用来描述一种对一个具有社会意识的有为政府的信仰。<sup>②</sup> 这种定义将在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成为“自由主义”这个词的内容。但是，现代自由主义还包含了其他特征，这些特征显然并没有出现在进步时代的政治议程上，如对公民自由的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重视，包括对个人隐私权和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的重视以及对关心少数种族和族裔权利的多元思想等。主流进步主义者急切地想推进社会的团结一致，鼓吹国家政府是民主的象征和代表，他们并没有对这些自由的含义予以重视。这些自由的涵义将起源于另外的地方——即进步时代美国的激进分子和文化反叛者。

① *Works of Roosevelt*, XIX, 372-76; Recchiuti, "Origin of American Progressivism," 278-95; Knock, *To End All Wars*, 23.

② Stettner, *Shaping Modern Liberalism*, 1-3; Ronald D. Rotunda,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Liberalism as Word and Symbol* (Iowa City, 1986), 31-40.



## 第八章 公民自由的诞生

表达自由在当今美国人对自由的理解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以致我们很难记得在 20 世纪初对它的法律保护竟是如此地脆弱。作为一种实践,一位学者曾写道,“真实有效的、法律上可实施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的美国是不存在的。法院很少审理有关言论自由权的案件,即便审理,法官们通常也是赋予各级政府极大的空间来决定什么样的言论具有“坏的倾向”,从而必须予以压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惟一投身于捍卫言论自由权的组织是“自由言论联盟”,它是在 1902 年由这一时代对言论自由最有影响的学术评论家西奥多·施罗德创建的。施罗德坚信,绝对的言论自由对个人在生活各个领域的自主来说,都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尽管他满怀激情捍卫所有政治内容的言论自由,但在法律上却没有打几场胜仗。当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小泽卡赖亚·查菲动手写作他那部里程碑式的研究著作《言论自由》(1920 年)时,他翻遍了所有的法院文献,但是找不到有关言论自由的法理学传统。

活泼有力的公共辩论自然是民主政治的一个传统特征。但与这种辩论同时存在的却是对那些所谓过激或淫秽下流的言论的严厉限制。第一条宪法修正案当时并不被看作是美国自由的基石。权利法案 50 周年和 100 周年纪念 164 日(分别在 1841 和 1891 年)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直到 20 世纪,在最高法院开始将权利法案“纳入”(即要求各州遵循它的规定)之前,权利法案对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没有留下什么影响或痕迹。<sup>①</sup>

---

<sup>①</sup> Geoffrey R. Stone, "Reflections on the First Amendment: 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Jurisprudence of Free Expressio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31 (September 1987), 251-52; Samuel Walker, *In Defense of American Liberties: A History of the ACLU* (New York, 1990), 22-29; Paul L. Murphy, *World War I*

1900至1915年间,相对上一个世纪来说,更多的言论自由案件被递交到法院审理。诉讼者包括那些想躲避政府有关规定的广告制作者和要求取消地方审查制度的初出茅庐的电影制作者。<sup>①</sup>但真正使言论自由成为有影响的公共问题的却是工人们争取罢工权的斗争、社会主义者和激进劳工领袖对禁止露天公开演讲规定的反对以及由文化现代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发动和参加的要求终止对“淫秽下流”品进行大范围管制的斗争。一般来说,法院对这些要求持否定的态度。但这些斗争却为在公民自由作为20世纪美国自由的一个中心内容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进步时代的州法院通常在劳资冲突时发出禁令,禁止罢工者发表演讲、组织纠察线或散发有关文字材料。如同当年的废奴主义者,劳工运动也发展出一部“自由的宪法”。这是一种不同的法律观,它以自由的名义,要求得到集会、组织和罢工的权利。事实上,也有许多州颁布法律,对反劳工的强制令的范围加以限制,但它们大部分都被法院宣布为非法。1912年国会工业关系委员会的调查显示,在许多工业社区,公民自由处于一种极为糟糕的状态;在工厂私人警察队伍使用武力的威胁下或地方官员的压制下,工会组织者往往被禁止进行公开、自由的演讲。“我不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或享受到了公民自由,”劳工运动的律师克莱伦斯·达罗这样告诉国会工业关系委员会说。<sup>②</sup>

除了反对罢工禁令之外,世界产业工人协会(IWW)争取公共场合表达意

---

*and the Origin of Civil Libe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79), 17, 32-36; David M. Rabban, *Free Speech in Its Forgotten Years 1870-1920* (New York, 1997); Linda C. Reilly, "The Meaning of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Press in the Progressive Era: Historical Roots of Modern First Amendment Theor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Utah, 1986, 268-83, 344-45; Zechariah Chaffee, *Freedom of Speech* (New York, 1920).

① John W. Wertheimer, "Free-Speech Fights: The Roots of Modern Free-Expression Litig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2, 3-13, 112.

② James G. Pope, "Labor's Constitution of Freedom," *Yale Law Journal*, 106 (January 1997), 942-44, 967; Rudolph J. R. Peritz, *Competition Policy in America 1888-1992* (New York, 1996), 101; Jerold S. Auerback, *Labor and Liberty: The La Follette Committee and the New Deal* (Indianapolis, 1966), 14-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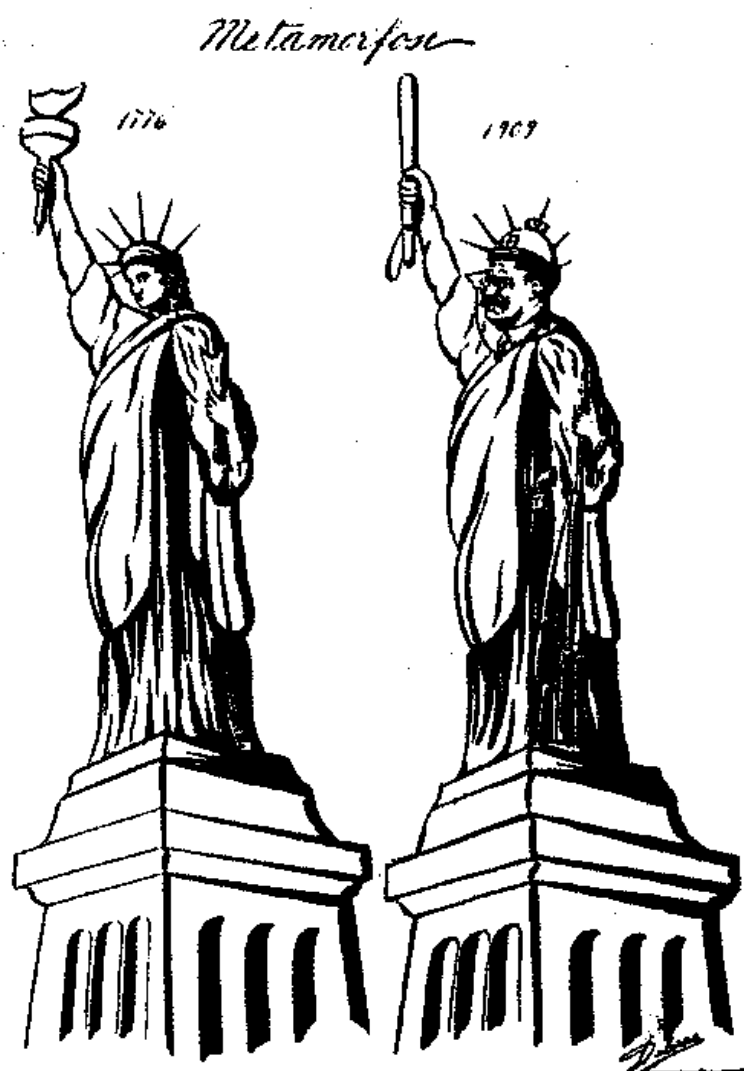
见的权利的斗争,也为言论自由的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一方面是一个工会组织,另一方面也是工人革命运动的鼓吹者;它提倡工人们行动起来,夺取生产资料,废除国家机器。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希望把那些流动工人、新移民以及那些被现存工会组织排斥在外的少数民族工人组织动员起来。世界产业工人协会没有会议厅,它的组织者只能利用街头巷尾的集会来传播信息,争取支持者。针对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行动,洛杉矶、斯波坎、丹佛以及其他一连串城市的官员下令禁止或限制露天集会。激进劳工领袖伊莉莎白·格利·弗林的讲话表达了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反应。她说,在“自由的美国”政府官员不能要求那些在公共场合演讲的人“交出一份我们思想的时间表,来由官方批准”。

为了唤起公共的支持,世界产业工人协会有意公开违背禁止公开演讲的地方法律,他们的成员使地方监狱人满为患。有的时候,遭到监禁的人还会遇到赤裸裸的暴力迫害;在斯波坎,受到监禁的有三人死亡,数百人不得不送到  
165 医院治疗,他们都是因为违反了一项要求演讲内容得到事先批准的法律而遭到监禁的。但是时间最长、最血腥同时也是报道最多的一场战斗是1911年发生在圣地亚哥的斗争,当时当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成员因违反一项在市中心禁止公开演讲的法律而遭逮捕后,官方把世界产业工人协会成员交给一个私人治安组织去处置和惩罚。如同80年前的废奴主义者一样,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行动和斗争成功地引发了一场围绕公共演讲的界限问题而展开的广泛公共辩论。在所有的有关言论自由的战斗中,世界产业工人协会最终迫使地方官员缴械投降。“不管人们是否赞同或反对它的方法和目标,”一位新闻记者写道,“所有的热爱自由的人们都应感激这个组织(指世界产业工人协会。——译者),是它保持了自由的火焰永远不熄灭。”<sup>①</sup>

劳工运动对表达自由和使用公共空间的要求充分暴露了进步时代美国在

---

① Philip S. Foner, ed., *Fellow Workers and Friends, I. W. W. Free-Speech Fights as Told by Participants* (Westport, 1981), 12-14, 20, 53 (Flynn), 134, 198; Reilly, "Meaning of Freedom of Speech," 167-82; Melvyn Dubofsky, *We Shall Be All: A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New York, 1969).



“Metamorfosi”，取自 1909 年 1 月 25 日的一个名为《国际》的意大利裔美国人杂志。这幅漫画有鉴于美国政府镇压无政府主义者运动，将自由女神像转变成一个气势汹汹的西奥多·罗斯福。（Immigration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Collection of Rudolph J. Vecoli）

言论自由方面的局限性，在这方面，在影响上仅次于劳工运动的，是对反对管 166  
制淫秽材料——尤其是争取传播和散发有关计划生育的信息的权利——的战

斗。对性问题的公开讨论,与一个自我意识感强烈的激进反叛群体的兴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通过对传统道德观的挑战而提出的言论自由问题,却远远地超出这种挑战本身的范围,为个人自由的内容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

人们经常讲述一战前格林威治村和旧金山、芝加哥以及其他城市的类似地方的故事。在蓬勃兴起的实验剧场、讨论俱乐部、艺术展廊及小型杂志的活动中,一个“诗意左派”得以降生,它充满自信地声称,它要将人类精神从19世纪的传统和偏见中解放出来。这个时代的象征之一是伊莎多拉·邓肯,她从加利福尼亚带来了一种极富表现力的新的舞蹈形式,这种舞蹈动作的基础是身体的一种自由运动,完全摆脱了传统的舞蹈技巧和服饰的限制。在女继承人梅布尔·道奇的纽约客厅中举行的著名沙龙中,一群非常出色的激进派人士——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进步改革家、女权主义者和艺术家——聚在一起,情绪激烈而冲动地讨论着劳工冲突、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和性革命等话题。看上去,杜威所称的“自由探索的社区”在这里最终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尽管进步主义者经常光顾道奇沙龙,但在诗意左派竭力推崇的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与进步主义者坚信的秩序和效率之间,显然存在巨大的沟壑。“我们住在华盛顿广场,我们是自由的,”约翰·里德的一首诗这样宣称道。诗意左派把自由看成是他们的社会观的关键。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把言论自由提高到自由语言的中心位置,并将其从一种不受阻挠地进行政治辩论的权利扩展为一种不受政府限制的、对经济、艺术和性等问题自由地表达意见的权利要求。<sup>①</sup>

在进步时代,如同新闻记者威廉·M. 里迪的谐语所称,“性的钟声”在美国敲响了。那些从前仅限于私下交谈的、涉及隐秘的私人关系的话题突然在

① Edward Abrahams, *The Lyrical Left: Randolph Bourne, Alfred Stieglitz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Radicalism in America* (Charlottesville, 1986), ix-xii, 2-8; Ann Dally, *Done into Dance: Isadora Duncan in America* (Bloomington, 1995); Ronald Steel, *Walter Lippman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Boston, 1980), 51; Casey Blake, *Beloved Community: The Cultural Criticism of Randolph Bourne, Van Wyck Brooks, Waldo Frank, and Lewis Mumford* (Chapel Hill, 1990), 2-5, 51-52, 87; Christine Stansell, *American Moderns: Sex, Art and Radicalism, 1890-1919* (New York, 1999).

大众读物上和公共辩论中暴露出来。新一代妇女采用了刚刚形成的“女权主义”的名称,以表达她们对更大范围的自主的要求;对她们来说,自由的性表现和在生育问题的自由选择,是妇女解放的关键内容。女权主义,一位年青的妇女写道,有两个“主导性的思想:那就是既要解放作为人的妇女,也要解放作为性的妇女”。克利斯特尔·伊斯门解释说,“妇女们真正追求的东西”是“自由”。对伊斯门来说,自由的内容远远超出投票权,超出“工业自由”,它包括“感情上的自由”和性方面的自决权。<sup>①</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格林威治村成为了性自由实验的一个中心。它那种极为宽容的气氛吸引了许多人,其中也包括许多同性恋者。有组织的争取同 167 性恋权利的事还要等到遥远的将来才会发生,但在 20 世纪 20 年代里,由于同性恋者的茶馆、地下酒吧和舞厅的存在,同性恋社区成为格林威治村名声和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新的性道德规范远远流传到文化反叛者的圈子之外,在这个时代里受到广泛报道的、自食其力的年轻未婚女性中也十分流行,这些年轻女性把性自由当成她们经常宣称的个人独立的标志。但是没有其他任何因素比大量妇女进入劳工市场这一现实更为坚决彻底地推动了对传统的性观念和性规范的挑战。这些劳动妇女的出现,强化了妇女要求拥有生育控制权的重要性,这种要求对战前女权主义和不断增长的对言论自由受到限制的认识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sup>②</sup>

事实上,生育控制权的问题赋予新的性道德规范一种政治表述,将那些公开的妇女权利提倡者与那些被克利斯特尔·伊斯门称为“数百万无意识的女

① Leslie Fishbein, *Rebels in Bohemia: The Radicals of "The Masses"* (Chapel Hill, 1982), 74-81; Nancy F. Cott, *The Grounding of Modern Feminism* (New Haven, 1987), 3-8, 35-49, 186-93; Blanche W. Cook, ed., *Crystal Eastman on Women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1978), 53.

② George Chauncey, "Long-Haired Men and Short-Haired Women: Building a Gay World in the Heart of Bohemia," in *Greenwich Village: Culture and Counterculture*, ed. Rick Beard and Leslie C. Berlowitz (New Brunswick, 1993), 151-58; Caroline F. Ware, *Greenwich Village 1920-1930* (Boston, 1935), 235-40; Linda Gordon, *Woman's Body, Woman's Right* (New York, 1976), 203; John D'Emilio and Estelle B.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 A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1988), 194-97, 226-29.

权主义者”的女性联合起来了,后者时常企图把性与生育问题分开对待。在19世纪,“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通常指一个人拒绝性要求和侵犯的能力,拒绝的内容包括来自丈夫方面的类似举止。此刻,这个概念意味着妇女有权享受积极的性生活,而不用担心必须要承担生儿育女的后果。对新女权主义者来说,如伊斯门写道的,除非妇女们“知道如何控制她们家庭规模的大小”,“任何其他种类的妇女自由,都是不可企及和不可实现的。”埃玛·戈德曼是这个时代最不知疲倦的演说家(她曾周游全国进行演说,从主张无政府主义到呼吁人们对同性恋采取更为理解和宽容的态度等)。她在关于妇女权利的演说中,经常谈到生育控制权,她同时还散发详细介绍各种避孕方法的材料。戈德曼毫不妥协地坚持“不受限制的表达自由”以及“爱情自由和做母亲的自由”的观点,为此她经常遭遇到法律上的麻烦。据一个统计,她曾因发表煽动性的或“淫秽性”的言论或纯粹为了阻止她发表演说的原因,而被逮捕过40多次。<sup>①</sup>

但是,在将生育控制问题变为新女权主义中心方面做得最多的是玛格丽特·桑格。桑格出生在一个爱尔兰裔美国家庭,是家中11个孩子中的一个。她对那种将避孕方法和信息视为“淫秽”品而加以禁止的法律提出了直接的挑战。在外表上,桑格属于纽约文化反叛群体的左翼,她的斗争与激进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1911年,她在纽约一家社会主义者的报纸《呼唤》上开辟了一个性教育专栏,取名为“姑娘须知”。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的公共检查官安东尼·科姆斯托克有一次下令,禁止一期《召唤》不能从邮局寄送,因为这期报纸中包  
168 含了一个讨论性病的专栏。随后一个星期,《召唤》刊登了一个空白的专栏,只是留下了标题:“姑娘应该知道什么?——根据美国邮政总局的命令:什么也不必知道”。

到1914年,无畏的桑格在她自己的期刊《妇女叛逆者》上公开刊登节制生

<sup>①</sup> D' Emilio and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 231, Cook, ed., *Crystal Eastman*, 47, 56; Gordon, *Woman's Body*, 95-106; Richard Drinnon, *Rebel in Paradise: A Biography of Emma Goldman* (Boston, 1961), 121-40; Alice Wexler, *Emma Goldman: An Intimate Life* (New York, 1984), 209-15; Mark A. Graber, *Transforming Free Speech: The Ambiguous Legacy of Civil Libertarianism* (Berkeley, 1991), 53-54.

育方法的广告。“自由”是桑格的关键词。“一个不能拥有和控制自己身体的女人，”她宣称说，“不能称自己是自由的……只有当一个女人能够有意识地选择她是否要做母亲时，她才能把自己称为是自由的人。”因为她通过邮局寄送所谓的淫秽材料（这项罪名最高可被处罚 45 年的监禁），桑格被控触犯了科姆斯托克法而被定罪，她后来逃奔去了英国。当她于 1915 年返回美国时，对她的指控被取消了，桑格随即开始了一次遍及全国的巡回演讲，这场演讲使她的名字成了早期控制生育运动的同义词。1916 年，她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工人阶级居住区里开了一个诊所，在那里向贫穷的意大利和犹太妇女们散发有关避孕知识的材料，为此她被监禁了一个月。进步主义者都不出来为她辩护，但桑格却在激进知识分子中成了英雄。一时间，控制生育和言论自由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使激进劳工领袖、文化现代派分子和女权主义者之间的力量交汇一处。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党散发了桑格的作品。尤金·V·德布斯对她的行动也表示了坚决的支持。<sup>①</sup>

如同世界产业工人协会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和戈德曼持续不断的争取演讲权的斗争一样，桑格的事业是进步时代非常丰富的不同政见历史的一部分，这部历史帮助公众舆论意识到，地方和联邦有关淫秽物的立法如何使言论表达的自由变得一钱不值了。但是，真正使公民自由成为一个主要的公共问题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产生了进步主义者长期希望的一个具有强大权威的、有目的的联邦政府。这个政府的行动及其政策所释放出来的大众性狂热，不仅毁掉了进步主义时代的改革激情，也将公民自由推到关于美国自由问题讨论的前沿。

---

<sup>①</sup> Ellen Chesler, *Woman of Valor: Margaret Sanger and the Birth Control Move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1992), 56-58, 97-150; Gordon, *Woman's Body*, 207-11, 229-30; Linda R. Monk, ed., *Ordinary Americans: U.S. History Through the Eyes of Everyday People* (Alexandria, 1994), 76-77.



##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自由的危机

在回顾美国对欧洲战争的参与时,伦道夫·伯恩尼总结出这场卷入的教训:“战争是国家的健康。”美国卷入战争在伯恩尼看来是一种危险,但对大多数进步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黄金机会。他们认为,战争给美国带来了一种机会,美国可借此对社会做一次理性的整顿,向全民灌输一种国家团结和公民自我奉献的精神,赋予劳资关系以正义的内容。与此同时,美国可通过战争向全

169 球范围传播进步主义价值观的可能性更增加了战争的吸引力。几乎所有的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和改革家们,与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劳工领袖们一起,加入了支持这场被威尔逊总统在1917年称为“使民主生活在更为安全的世界上的”战争。战争支持者的名单上包括了约翰·杜威这样的知识分子、沃尔特·李普曼和赫伯特·克罗利这样的新闻记者、劳联领袖塞缪尔·冈波斯以及重要的女权主义社会改革家珍妮·亚当斯、佛罗伦斯·凯利和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等。杜威在《新共和国》杂志撰文,要求进步主义者要看到“战争的社会可能性”。他写道,战争的危机为“将科学更有意识地 and 更广泛地运用于共同的目的”,为打击美国国内存在的“权力分配上的极大的不平等”现象,带来了希望,所以,战争是“有效自由”的基础。<sup>①</sup>

如同在内战时期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创造了一个生命虽然短暂但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和行政能力的国家政府。战时工业委员会主持国家的制造业,同时负责满足大众的“合理消费模式”的口味。战时劳工委员会调解劳资纠纷。食品服务管理局对农场主给予现代农业技术的指导,推广了高效率

---

<sup>①</sup> Randolph Bourne, *The Radical Will: Selected Writings 1911-1918*, ed. Olaf Hansen (New York, 1977), 359; Thomas J. Knock, *To End All Wars: Woodrow Wilson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1992), viii-x; Steel, *Walter Lippmann*, 114-15; Eldon J. Eisenach, *The Lost Promise of Progressivism* (Lawrence, 1994), 249-52; Blake, *Beloved Community*, 159; Robert Westbrook,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Ithaca, 1991), 236-37; David M. Kennedy, *Over Here: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American Society* (New York, 1980), 50.

的准备餐食的方法。但是,一旦战争结束,战时国家的威力迅速减弱。但是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联邦政府好像已经准备全力以赴,去完成那些由进步主义者制定的、促进社会重建和经济正义的任务。<sup>①</sup>

在内战期间,动员公众舆论支持战争的任务是由私人团体和组织——如联邦同盟、忠诚出版协会等——来担当的。但威尔逊政府却认为,爱国主义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不能交由私人事业去承办。美国参战受到了来自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党的反对(社会主义党1917年的党代表大会谴责美国参战宣言是“反对美国人民的一种犯罪”),同时也遭到许多爱尔兰裔和德国裔美国人的反对。在这些群体之外,许多人也对民主的美国是否应卷入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持有怀疑态度。1917年4月,在美国对德国宣战之后不久,威尔逊政府建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CPI),其功能是,如委员会主持人乔治·克里尔所说,向美国人民和世界解释“美国为何被迫拿起枪来保卫自己的自由和自由体制”的原因。

在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召唤下,大批的学者、新闻记者、艺术家和广告制作者制作了一大批支持战争的宣传品,他们使用了从小册子(一共印制了7500万份)到宣传画、报纸广告和电影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介。公共信息委员会还培训七万五千多名“四分钟人”,并将他们送到全国各地,在各地的电影院、学校和其他公共场所为听众作标准统一的演讲(有些时候这些演讲是用意大利语、意第绪语或其他移民语言进行的)。美国一些最杰出优秀的历史学家按照 170 政府规定的具体要求,写出宣传册子,向公众解释卢梭、奥利弗·克伦威尔和托马斯·杰斐逊共同拥有的“共同原则”是什么,以此来说明法-英-美同盟的历史基础。用年轻的埃德华·伯奈斯的话来说,从未有过任何联邦政府机构像公共信息委员会这样“有意识地同时又极为聪明地操纵组织化了的大众习惯和民意”。伯奈斯当时是克里尔班子中的成员,他后来开创了现代公共关

---

<sup>①</sup> Kennedy, *Over Here*, 126-38, 267-74; Alan Dawley, *Struggles for Justic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Liberal State* (Cambridge, MA, 1991), 194-207; Steven J. Diner, *A Very Different Age: Americans of the Progressive Era* (New York, 1998), 234-46.

系的专业领域。<sup>①</sup>

自由的理想看上去是需要一个对立面的,所以公共信息委员会就把德国皇帝,或更笼统一点说,把整个德国民族和人民当成了对立面。政府宣传极力煽动对战争对手的仇恨,将德国描绘成一个由野蛮的德国佬组成的国家。但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还是由一种比较正面的进步主义语言来包装的,这种语言强调社会合作和扩大民主。在海外,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强调基于民族自决原则之上的和平;在国内,则强调保卫和推动民主。作为一个进步时期的新闻记者,克里尔相信战争将加速推进进步运动,解决“贫困、不平等、压迫和不幸福等古老的问题”。公共信息委员会的相当一部分工作在于说服劳工和新移民接受“我们对民主和正义的追求首先从国内开始”的说辞。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曾警告说,只是简单地将德国的独裁体制和美国的民主体制进行对比并不一定能打动听众。克里尔对此深有体会,因为“当你给他讲我们的自由理想,他却想到美国对劳工赤裸裸的剥削……和贫富之间存在的那种令人感到极为荒唐可笑的差距”。公共信息委员会散发的宣传小册子勾画了一幅和平时期的社会秩序的图画,这个秩序的基础是“工业民主”,实行“一视同仁的八小时工作制”,并保证所有人的生计工资。至战争结束时,美国人普遍认为,赫伯特·胡佛所称的“一个新的工业秩序”即将在美国出现。<sup>②</sup>

---

① Alfred Fried, ed., *Socialism in America* (Garden City, NY, 1970), 521-27; *Complete Report of the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Washington, DC, 1920), 2; James R. Mock and Cedric Larson, *Words That Won the War: The Story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1917-1919* (Princeton, 1939), 5-7, 113-25, 158-66, 183; George T. Blakey, *Historians on the Homefront: American Propagandists for the Great War* (Lexington, 1970), 3-4, 16-35; Bernays in Michael Kazin, *The Populist Persuasion* (New York, 1995), 69-70.

② Mock and Larson, *Words That Won the War*, 6-7, 190-98, 211; Stephen Vaughan, *Holding Fast the Inner Lines: Democracy, Nationalism, and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hapel Hill, 1980), 5-6, 24-35, 56;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New York, 1988), 129; David Montgomery,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Labor: The Workplace, the State, and American Labor Activism, 1865-1925* (New York, 1987), 417-18; Steven Fraser, *Labor Will Rule: Sidney Hillman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Labor* (New York, 1991), 123-28.

当民主成为战时动员的关键词时,作为进步时代思想主流中一个相对次要主题的自由突然具有了新的意义。一份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广告宣称道:这场战争是“为了自由的伟大事业”而打的。战时宣传最常见的视觉主题是自由女神像,它被用来呼吁美国人购买自由债券,尤其被用来号召移民对战争给予支持。“你到这里来寻求自由,”一幅自由女神像宣传画的文字说明写道,“你现在必须帮助保卫自由。”购买自由债券成为了一种爱国主义行为的表现。威尔逊的演说把美国塑造成一块自由的土地,遵循“自由人民的一致要求”而奋斗,为世界上受压迫的人民争取民族自决权。<sup>①</sup>

将“民主”和“自由”当成战时的意识形态武器,并以此作为区分美国与德国专制主义的特征,这样做势必激发国内要求扩展自由与民主的呼声。1916年,威尔逊对妇女选举权的要求给予了小心谨慎的支持,从而赢得了12个给予妇女选举权的州中的10个。当美国进入一战后,卡丽·凯特和传统的妇女选举权组织充满热情地参加支持战争的活动。与此同时,一代受过大学教育的新的妇女活动家,在爱丽斯·保罗的带领下,组织了全国妇女党,采用了许多老一代选举权运动者很不以为然的激进对抗战术,要求获得选举权。保罗将威尔逊与德国皇帝比较,焚烧了总统的演讲稿,并在一群跟随者的支持下,把自己用镣铐锁在白宫周围的栏杆上。最后,她为此被判了七个月的监禁。妇女在战时的爱国主义行动,加上公众舆论对保罗及其同志在监狱中受到的迫害的普遍谴责,迫使政府全面地支持妇女获得投票权。1920年,数十年的斗争终于以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得到批准而结束(这条修正案使美国成为第27个准许妇女投票的国家)。<sup>②</sup>

<sup>①</sup> David Green, *Shaping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America from McKinley to Reagan* (Ithaca, 1987), 79-91; Vaughan, *Holding Fast*, 186; Rudolph J. Vecoli, "The Lady and the Huddled Masses: The Statue of Liberty as a Symbol of Immigration," in *The Statue of Liberty Revisited: Making a Universal Symbol*, ed. Wilton S. Dillon and Neil G. Kotler (Washington, DC, 1994), 53; Shawn Aubitz and Gail E. Stern, "Americans All! Ethnic Images in World War I Posters," *Prologue*, 19 (Spring 1987), 41-45; Murphy, *World War I*, 15.

<sup>②</sup> Robert B. Fowler, *Carrie Catt: Feminist Politician* (Boston, 1986), 139-49; Christine Lunardini, *From Equal Suffering to Equal Rights: Alice Paul and the National*

当民主成为战时动员的关键词时,作为进步时代思想主流中一个相对次要主题的自由突然具有了新的意义。一份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广告宣称道:这场战争是“为了自由的伟大事业”而打的。战时宣传最常见的视觉主题是自由女神像,它被用来呼吁美国人购买自由债券,尤其被用来号召移民对战争给予支持。“你到这里来寻求自由,”一幅自由女神像宣传画的文字说明写道,“你现在必须帮助保卫自由。”购买自由债券成为了一种爱国主义行为的表现。威尔逊的演说把美国塑造成一块自由的土地,遵循“自由人民的一致要求”而奋斗,为世界上受压迫的人民争取民族自决权。<sup>①</sup>

将“民主”和“自由”当成战时的意识形态武器,并以此作为区分美国与德国专制主义的特征,这样做势必激发国内要求扩展自由与民主的呼声。1916年,威尔逊对妇女选举权的要求给予了小心谨慎的支持,从而赢得了12个给予妇女选举权的州中的10个。当美国进入一战后,卡丽·凯特和传统的妇女选举权组织充满热情地参加支持战争的活动。与此同时,一代受过大学教育的新的妇女活动家,在爱丽斯·保罗的带领下,组织了全国妇女党,采用了许多老一代选举权运动者很不以为然的激进对抗战术,要求获得选举权。保罗将威尔逊与德国皇帝比较,焚烧了总统的演讲稿,并在一群跟随者的支持下,把自己用镣铐锁在白宫周围的栏杆上。最后,她为此被判了七个月的监禁。妇女在战时的爱国主义行动,加上公众舆论对保罗及其同志在监狱中受到的迫害的普遍谴责,迫使政府全面地支持妇女获得投票权。1920年,数十年的斗争终于以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得到批准而结束(这条修正案使美国成为第27个准许妇女投票的国家)。<sup>②</sup>

<sup>①</sup> David Green, *Shaping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America from McKinley to Reagan* (Ithaca, 1987), 79-91; Vaughan, *Holding Fast*, 186; Rudolph J. Vecoli, "The Lady and the Huddled Masses: The Statue of Liberty as a Symbol of Immigration," in *The Statue of Liberty Revisited: Making a Universal Symbol*, ed. Wilton S. Dillon and Neil G. Kotler (Washington, DC, 1994), 53; Shawn Aubitz and Gail E. Stern, "Americans All! Ethnic Images in World War I Posters," *Prologue*, 19 (Spring 1987), 41-45; Murphy, *World War I*, 15.

<sup>②</sup> Robert B. Fowler, *Carrie Catt: Feminist Politician* (Boston, 1986), 139-49; Christine Lunardini, *From Equal Suffering to Equal Rights: Alice Paul and the National*

然而,正是在广大的黑人中,战时的自由语言点燃了最高的希望之火。被剥夺了选举权同时又面临种族隔离的黑人,面对美国对自由的表白,充满了怀疑;他们深知自由的象征可以与残酷的种族暴力同时存在。这些年间发生了数以百计的私刑,其中一桩发生在1906年的密苏里州的斯普林菲尔德。三个黑人被诬陷为犯了强奸罪,他们被一群白人暴民吊在电灯杆上,在一场公开的暴力庆典中被活活烧死。而在这个电灯杆的顶端,却耸立着一个自由女神像的复制品。<sup>①</sup>

黑人领袖们一直在寻求一种重新点燃美国人追求平等的热情的策略,这种追求在重建时期曾经短暂但极其明亮地燃烧过。但没有人像学者和社会活动家 W. E. B. 杜波依斯那样,对黑人的自由问题和美国民主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如此深刻、如此长久的思考。“在我的一生中,”杜波依斯后来写道,“我始终痛苦地意识到为白人所享有的美国自由与连续不断的对黑人的压迫之间的对立。”1906年,杜波依斯协助组织了尼亚加拉运动,这项运动的目的是希望恢复废奴运动和重建时期的传统。杜波依斯在这个运动的宣言中写道:“我们要为自己争取每一项属于一个生而自由的美国人的权利,无论是政治权利、公民权利还是社会权利,在我们得到这些权利之前,我们将不会停止我们的抗议,不会停止在美国的耳朵旁边制造噪音。”五年后,他与一群白人改革者们联合起来,创立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协进会发起了为争取实施第十四和十五条宪法修正案的长期斗争。<sup>②</sup>

除了激进的波士顿编辑威廉·门罗·特罗特之外,大多数黑人领袖都把美国参加一战看成是实现真正自由承诺的机会。对特罗特来说,广为报道的德国暴行与发生在美国本身的私刑不相上下,与其说要把世界变成民主的

*Woman's Party, 1910-1928* (New York, 1986), 1-17, 132-45; Cott, *Feminism*, 59-69; Robert H. Wiebe, *Self-Rule: A 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n Democracy* (Chicago, 1995), 168.

① Ralph E. Luker, *The Social Gospel in Black and White: American Racial Reform, 1885-1912* (Chapel Hill, 1991), 1.

② W. E. B. Du Bois, "This Freedom," manuscript speech, March 1950, W. E. B. Du Bois Paper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David L. Lewis, ed., *W. E. B. Du Bois A Reader* (New York, 1995), 367.

然而,正是在广大的黑人中,战时的自由语言点燃了最高的希望之火。被剥夺了选举权同时又面临种族隔离的黑人,面对美国对自由的表白,充满了怀疑;他们深知自由的象征可以与残酷的种族暴力同时存在。这些年间发生了数以百计的私刑,其中一桩发生在1906年的密苏里州的斯普林菲尔德。三个黑人被诬陷为犯了强奸罪,他们被一群白人暴民吊在电灯杆上,在一场公开的暴力庆典中被活活烧死。而在这个电灯杆的顶端,却耸立着一个自由女神像的复制品。<sup>①</sup>

黑人领袖们一直在寻求一种重新点燃美国人追求平等的热情的策略,这种追求在重建时期曾经短暂但极其明亮地燃烧过。但没有人像学者和社会活动家 W. E. B. 杜波依斯那样,对黑人的自由问题和美国民主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如此深刻、如此长久的思考。“在我的一生中,”杜波依斯后来写道,“我始终痛苦地意识到为白人所享有的美国自由与连续不断的对黑人的压迫之间的对立。”1906年,杜波依斯协助组织了尼亚加拉运动,这项运动的目的是希望恢复废奴运动和重建时期的传统。杜波依斯在这个运动的宣言中写道:“我们要为自己争取每一项属于一个生而自由的美国人的权利,无论是政治权利、公民权利还是社会权利,在我们得到这些权利之前,我们将不会停止我们的抗议,不会停止在美国的耳朵旁边制造噪音。”五年后,他与一群白人改革者们联合起来,创立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协进会发起了为争取实施第十四和十五条宪法修正案的长期斗争。<sup>②</sup>

除了激进的波士顿编辑威廉·门罗·特罗特之外,大多数黑人领袖都把美国参加一战看成是实现真正自由承诺的机会。对特罗特来说,广为报道的德国暴行与发生在美国本身的私刑不相上下,与其说要把世界变成民主的

*Woman's Party, 1910-1928* (New York, 1986), 1-17, 132-45; Cott, *Feminism*, 59-69; Robert H. Wiebe, *Self-Rule: A 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n Democracy* (Chicago, 1995), 168.

① Ralph E. Luker, *The Social Gospel in Black and White: American Racial Reform, 1885-1912* (Chapel Hill, 1991), 1.

② W. E. B. Du Bois, "This Freedom," manuscript speech, March 1950, W. E. B. Du Bois Paper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David L. Lewis, ed., *W. E. B. Du Bois A Reader* (New York, 1995), 367.

安全之地,美国政府不如应该首先“把南方变成黑人能够安身立命之地”。但黑人报纸都表示支持战争,坚信黑人士兵的参战会帮助瓦解种族不平等的制度(尽管当时在全国各地影院放映的电影《一个民族的诞生》将内战时期的黑人士兵丑化诬蔑到了极点)。杜波依斯本人也在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月刊《危机》中的社论(后来被复印广为传播)中呼吁美国黑人“捐弃前嫌,团结起来”,报名参加实行种族隔离的美国军队,帮助把我们自己的美国变成一块真正的自由人的土地。这样的希望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部也激起了强烈的回应,战争的来到也引发了要求民主的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出现的更大的、组织得更好的“双重胜利”运动开了先例。如果黑人能紧密团结起来,一位得克萨斯州基尔德尔小村庄的牧师说,他们必须要“打一场就在家门口旁边争取民主的战争”。<sup>①</sup>

战争引发的社会变革也改变了美国种族关系的结构。由于战时生产量的提高和欧洲移民的中断,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作开始向黑人工人开放,从而导致了一场从南部向北部的黑人大移民运动。到1920年时,大约有50万黑人离开了南部。大移民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北部城市高工资的吸引(尽管黑人干的是体力和非技术工种)、让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逃离南部暴力的威胁、分租制令人难以忍受的负担和劳累以及对投票权的期望等。所有这一切和更多的动机都被黑人们理解成为是自由的要素,这是从他们独特历史经验的镜片中所折射出来的对自由的解释。詹姆斯·里日是在1917年从佛罗里达移居到芝加哥的,他当时想的是“找一个自由的州去居住”。圣经中的出埃及记故事深深地根植于黑人的意识之中。移居的黑人用一种启示录式语言来讲述第二次解放,跨过约旦或离开法老的领土,奔向圣地。一群从密西西比州来的黑人,在火车越过俄亥俄河的时候,竟然唱起:“我就要去迦南之地。”<sup>②</sup>

① William Jordan, “‘The Damnable Dilemma’: African-American Accommodation and Protest during World War I,”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1 (March 1995), 1562-83; *The Crisis*, September 1917; Steven A. Reich, “Soldiers of Democracy, Black Texans and the Fight for Citizenship, 1917-1921,”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2 (March 1996), 1478-80.

② Gilbert Osofsky, *Harlem: The Making of a Ghetto* (New York, 1965), 22-23,



大多数黑人移民是年轻的男女,如阿兰·洛克在他那本很有影响的《新黑人》(1925年)的前言中指出的,他们都抱着“一种对机会的新期望,对社会和经济自由的期望”。即便是在1919年芝加哥那场血腥的种族骚乱之后,当该市种族关系委员会询问黑人他们在北方生活最为珍贵的东西是什么时,几乎所有被问到的黑人都回答说:“自由。”但是,这场骚乱也是这一时期肆虐全国各地城市的暴力冲突中最恶劣的一桩,它充分暴露了黑人移民所遭遇的巨大失望、受到严格限制的就业机会、工会的排斥、强行实施的住宅隔离模式以及由于政治机器对城市政治的操纵而引起的对投票权的限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暴力的施用更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仅1918年5月在佐治亚州一地就有11起私刑发生),南部各地兴起了一场将有色人种协进会组织从当地驱赶出去的镇压浪潮。与此同时,就全世界非白人人民的利益而言,1919年的巴黎和会将民族自决的原则——这个同盟国公开宣称的战争目标——祭献在帝国主义的圣坛上。和会为东欧人民建立了民族国家,但对那些被威尔逊的顾问埃德华·豪斯上校称之为亚洲和非洲的“落后国家”,和会却没有类似的行动。最后,同盟国对大英帝国的利益一点也没有触动,与此同时,却将德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殖民地在获胜的英法之间进行划分。<sup>①</sup>

巴黎和会使黑人深深感到被出卖了,这种情感影响到从杜波依斯到普通

---

Peter Gottlieb, "Rethinking the Great Migration: A Perspective From Pittsburgh," in *The Great Migr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Dimensions of Race, Class, and Gender*, ed. Joe M. Trotter, Jr. (Bloomington, 1991), 70-72; James R. Grossman, *Land of Hope: Chicago, Black Southerners, and the Great Migration* (Chicago, 1989), 13; Milton C. Sernett, *Bound for the Promised Land: African American Religion and the Great Migration* (Durham, NC, 1997), 3, 57-60; Neil McMillen, *Dark Journey: Black Mississippians in the Age of Jim Crow* (Urbana, 1989), 263-65.

① Alain Locke, *The New Negro: A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1925), 6; Grossman, *Land of Hope*, 259-60; Neil Betten and Raymond Mohl, "The Evolution of Racism in an Industrial City, 1906-1940, A Case Study of Gary, Indiana,"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59 (January 1974), 60; John Bodnar, et al., *Lives of Their Own: Blacks, Italians, and Poles in Pittsburgh, 1900-1960* (Urbana, 1982), 242-48; Kevin K. Gaines, *Uplifting the Race: Black Leadership,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apel Hill, 1996), 235; Reich, "Soldiers of Democracy," 1502; N. Gordon Levin, Jr.,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s Response to War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1968), 242-47.

黑人在内的所有黑人。杜波依斯本人曾跑到巴黎,为殖民地独立事业奔走呼吁。杜波依斯在失望之下,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威尔逊“从来就没有想要把”美国黑人和世界上的非白人“包括在他的民主之中”。在北部的黑人居住区里,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极度失望迅速激发了对由马尔库斯·加维发动的分离主义运动的广泛支持,加维本人是新近从牙买加移民到美国的。对于加维派来说,自由意味着民族自决;他们要求黑人应该像波兰人、捷克人和爱尔兰人一样,得到一种国际上认可的民族身份。“我们在全世界各地都听到了要求自由的呼声,”加维在1921年宣称说,“我们渴望得到一种能把我们提高到与所有人处于同等位置的自由……这种自由将给我们带来最完全的实现我们理想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在由其他人统治和控制的国家里是得不到的。”对于杜波依斯和其他公认的黑人领袖来说,加维不过是一个哗众取宠的煽动家而已。但是,加维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能吸引如此众多的支持者,充分证明了黑人社区中存在的那种被一战及其结果出卖了的感觉。萨瓦那的一位叫阿诺德·E. 格雷戈里的牧师说,“没有谁比黑人更全心全意地相信民主,”但他怀疑,美国会满足黑人“对美国自由的渴望吗”?<sup>①</sup>

对于充满怨恨的劳工们来说,因为官方的宣传将爱国主义与自由民主的理想联系起来,使他们感到一个崇尚社会正义和给予劳工经济权力的社会就在眼前。1917年,威尔逊告诉劳联说:“当我们在为自由而战时,我们必须保证除了其他事情外,劳工是自由的。”劳工对威尔逊的话非常看重——甚至比威尔逊本人料想的还要认真。如一位机械师指出的,政府自己“对世界宣称说,我们为之奋斗的自由与民主将在美国的工业中实施”。在一战期间,工会会员的人数增加了一倍,达到500万人以上。还有更多的人集合在要求终止“工业奴隶制”的旗帜下。“人们可以听到解放者的脚步声,”缝纫工会领袖悉尼·希尔曼写道。希尔曼与许多人一样,深深地沉浸在一战所带来的对乌托

<sup>①</sup> *The Crisis*, February 1920; Amy Jacques-Garvey, ed., *Philosophy and Opinions of Marcus Garvey* (2 vols. New York, 1923-25), I, 94-96; Adele Oltman, "Sacred Mission, Worldly Ambition: A Social History of Black Baptists in Savannah, Georgia, 1918-1939,"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8, ch. 1.

邦的憧憬之中,他们的这种憧憬又为1917年发生的俄国革命进一步强化。“劳工将当家作主,全世界将自由解放。”<sup>①</sup>

在美国卷入战争的第一个月里,沃尔特·李普曼宣称,为民主之战只有在“推翻普鲁士专制政府”之后才会结束。美国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自己内部的暴君们——我们那些科罗拉多州的矿场主们、我们那些专制的钢铁工业、我们的血汗工厂以及我们的贫民窟”。停战之后,在1919和1920年里,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劳工抗议风暴接踵而至,风靡美国。在全国各地,工人们使用了战时的形象和语言,穿着缀有自由纽扣的军装游行,把他们的雇主和工头称为“(德国)皇帝”,强烈要求得到“在工作场所中的自由”。在北卡罗来纳州皮德蒙特控制严密的纺织区内,工人们涌向小小的联合纺织工人工会,从1919年起开始举行了一系列的罢工,要求“获得在家门口的工业解放”。一家工会报纸写道,美国工人对“自由如饥似渴”,雇主们“却把‘自由’这个辉煌的字眼从我们的语言中涂抹掉”,然而自由正是美国在欧洲浴血奋战所力图保卫的“精髓”。

在西弗吉尼亚州的煤矿里,一位公司主管在1918年警告说,战时的宣传将工人们不现实的期望提高了,他们把“一个真正解放”的承诺太“当真”了。  
176 当战争结束后,矿工们提出了结束公司绝对统治权的要求。争取组织工会的斗争,一位矿工写道,是一场“为自由的斗争”。在堪萨斯州,1920年的一条法律曾禁止在关键行业进行罢工,以此来取代过去由一个“工业法庭”来解决的劳资纠纷的决议,成千上万的工人因此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罢工。19世纪50年代,这里曾经是亲奴隶制和反奴隶制势力较量过的地方。罢工者使用的语言——“强制性的奴役”、“半自由和半奴役制”——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理想与内战时期的理想联系起来了。<sup>②</sup>

① Samuel Gompers, *Seventy Years of Life and Labor* (2 vols. New York, 1925), II, 385; Joseph A. McCartin, “‘An American Feeling’: Workers, Managers, and the Struggle Over Industrial Democracy in the World War I Era,” in *Industrial Democracy in America: The Ambiguous Promise*, ed. Nelson Lichtensein and Howell J. Harris (New York, 1993), 69-73; Montgomery, *Fall of the House of Labor*, 332; Fraser, *Labor Will Rule*, 144.

② Carl H. Chrislock, *Watchdog of Loyalty: The Minnesota Commission of Public*

战时民族主义、经济民主和自由的语言激发了这一时代最大规模的劳工暴动,即1919-1920年间的钢铁工人大罢工。在罢工的顶峰时期,约有36万5千工人参加,其中大部分是新移民工人。如同他们19世纪的先行者一样,新移民到达美国时,把美国想像为“一块自由的土地”,在那里人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享有信仰自由,享有经济上的机会,人们将从欧洲那种充满压迫性的社会等级制度中彻底得到解放。“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位波兰移民在写信回家时这样说道,“在这里,你不再是他人的佃农。”但钢铁工业的工作却背弃了所有这些期望。在战前,钢厂形同小型的专制国家,根据一份研究报告,工人们在其中面临着“一种不可抗拒的权力”;这种权力任意规定工人们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并残酷镇压一切组织工会的企图和努力。在战时,工人们蜂拥一般地参加“联合工会”,这个钢铁工人的工会在上一代人的霍姆斯特德大罢工失败后,遭到毁灭性打击,一直处于一蹶不振、气息奄奄的境地。随着停战而来的是钢产量的减少和削减员工,雇主也迅速恢复了反对工会的活动。“这场战争的意义是什么?”一个移民钢铁工人在工会会议上问道,“我们为了什么去买自由债券?是为了工厂吗?不,我们是为了自由和美国——是为了所有的人。我们不能再像一匹马和一辆篷车那样工作,我们要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如果说钢铁工人大罢工表现了由战争激发起来的对自由理想的追求,那么,这场罢工的彻底失败则标志着一个以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和工业自由思想的撤退为特征的时代的开始。<sup>①</sup>

争取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关系的要求和斗争被击败,这对于许多支持战争的进步主义者所抱有的理想是一种致命打击。1917年,伦道夫·伯恩尼一针

---

*Safety During World War I* (St. Paul, 1991), 62; Fernando Fasce, “Freedom in the Workplace? Immigrants at the Scovill Manufacturing Company, 1915-1921,” in *In the Shadow of the Statue of Liberty: Immigrants, Workers, and Citizens in the American Republic, 1880-1920*, ed. Marianne Debouzy (Urbana, 1992), 104-05; Jacqueline D. Hall, et al., *Like a Family: The Making of a Southern Cotton Mill World* (Chapel Hill, 1987), 186-94; David A. Corbin, *Life, Work, and Rebellion in the Coal Fields: The Southern West Virginia Miners 1880-1922* (Urbana, 1981), 176-90, 241-47; Pope, “Labor’s Constitution,” 945.

<sup>①</sup> David Brody, *Steelworkers in America: The Nonunion Era* (Cambridge, MA, 1960), 180-242; Ewa Morawska, “From Myth to Reality: America in the Eyes of East

见血地指出,他们(指进步主义者。——译者)对于战争的热情暴露了进步主义思想的阴暗面。他们关于重建社会的谈论实际上隐含着一套管理者态度,这种态度将民主的价值“贬低在技术的控制之下”。伯恩尼对知识分子那种自以为能够按“自由主义目的”来左右冲突的幼稚想法进行了无情的嘲笑。他预测说,这场战争并不会壮大进步主义改革派的力量,而只能增加“美国生活中  
177 最不具备民主性的力量”。伯恩尼的精辟预测很快就应验了。无论政府的宣传讲得如何天花乱坠和动听,一战却开启了美国历史上对公民自由最严厉的镇压活动。战争并没有为进步主义的胜利奠定基础,反而为美国历史上最保守的一个十年打下了基础。<sup>①</sup>

也许正是崇高的战时官方语言导致了对持异见者的大规模镇压。因为对于威尔逊和许多他的支持者来说,美国参战的目标是不言而喻地正确和正义的,一切反对这个目标的言论和行为自然都只能视作是对自由和民主理想的背叛。自1798年的惩治治乱法以来,联邦政府第一次立法限制言论自由。1917年的反间谍法不仅禁止任何人从事间谍工作和阻挠征兵工作,同时也严禁可能妨碍军事成功的任何“不实言论”。显然国会拒绝满足威尔逊提出的对报刊的新闻检查权,但却给予邮政总监极为宽泛的权力,允其下令禁止任何反战出版物进入联邦邮政通道。次年,惩治乱法又将任何怂恿对“政府形式”进行“蔑视、轻视、侮辱和毁誉”或鼓动干扰战争动员工作的言论和印刷品列为犯罪行为。随后不久,国会授权准允将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外国人递解出境。有2000多人被指控违反了这些法律,有100多人被判罪,其中包括尤金·V. 德布斯,他因为一次反战演讲被判处了十年监禁。(在对他宣判之前,德布斯给

---

European Peasant Migrant Laborers,” in *Distant Magnets: Expectations and Realities in the Immigrant Experience, 1840-1930*, ed. Dirk Hoerder and Horst Rössler (New York, 1993), 245-46; Irving Howe, *World of Our Fathers* (New York, 1976), 35; Camille Guerin-Gonzales, *Mexican Workers and American Dreams: Immigration, Repatriation, and California Farm Labor, 1900-1939* (New Brunswick, 1994), 2-4; John A. Fitch, *The Steel Workers* (New York, 1911), 11-12; John A. Fitch, “The Closed Shop,” *Survey*, 43, November 8, 1919, 91.

① Bourne, *Radical Will*, 307-08, 338-45; John P. Diggins, *The Promise of Pragmatism, Modernism and the Crisis of Knowledge and Authority* (Chicago, 1994), 252-54.

法院上了一堂关于美国自由历史的课,从托马斯·潘恩的异见讲到废奴主义和妇女选举权运动的领袖们,他指出美国历史上没有一次战争没有遇到过国内反对派的抵制。)许多的刊物,包括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的印刷品,以及许多外语报纸,都经常因它们的“总调子”,而不是因为它们违反了什么具体的法律,而被禁止进入邮政通道。<sup>①</sup>

许多民间团体也利用这种整肃镇压气氛作为打击国内反对派的武器。雇主们与政府狼狈为奸,击垮了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实现了西部商业利益集团长期以来要求达到的一个目标。1917年9月,在美国历史上范围最宽广的一个搜查命令的庇护下,联邦官员袭击了全国所有的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办公室,逮捕了数百名工会领袖,没收了文件和出版物。镇压不同政见的运动在1919-1920年间的“恐红”运动中达到了高潮。这场运动部分地是为了回应因俄国革命引起的社会冲突和战后出现的罢工浪潮。数千名激进分子遭到逮捕,数百人被递解出境,包括埃玛·戈德曼在内。“自由这个词”,一家意大利裔美国人的报纸宣称道,“已变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谜。”<sup>②</sup>

但是,更为极端的镇压却是由州政府来实施的。在战争期间,有33个州<sup>178</sup>禁止举行游行活动或展示红色和黑色的旗帜(这两种颜色分别象征着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23个州立法设立了“犯罪性工联主义”的罪名,把那些鼓动用非法行动来争取改变政治或“改变工业(财产)拥有方式”的言行统统归入此类(这样,爱国主义便与维持经济现状和支持战争联成一个整体了)。一位名叫约翰·怀特的俄亥俄州农场主,因为说了一句德国士兵对无辜妇女和儿童的屠杀与美国在菲律宾的所作所为大同小异之类的话,便被判处了21个

<sup>①</sup> Murphy, *World War I*, 25-30, 72-83, 99-118; Graber, *Transforming Free Speech*, 75; Jean Y. Tussey, ed., *Eugene V. Debs Speaks* (New York, 1972), 251-62, 281-88; Lucas A. Powe, Jr., *The Fourth Estate and the Constitution: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America* (Berkeley, 1991), 73-76.

<sup>②</sup> Walker, *Defense of American Liberties*, 25; William Preston, Jr., *Aliens and Dissenters: Federal Suppression of Radicals, 1903-1933* (Cambridge, MA, 1963), 118-50; Rudolph J. Vecoli, “‘Free Country’: The American Republic Viewed by the Italian Left, 1880-1920,” in *Statue of Liberty*, ed. Debouzy, 37-38.

月的监禁。使用德语成为那些支持战争的组织刻意打击的一个目标。在衣阿华州,威廉·L. 哈定州长签发了一个州长文告,要求在学校、公共场合和打电话时只能使用英语作为口头交流语言。他宣称,言论自由并不包括“使用一种非本国语言的权利”。明尼苏达州拥有一个庞大的德裔美国人口群体,工会活动也非常活跃,但该州在战时禁止了几乎所有的工会活动,并建立起公共安全委员会,专门根除州内的不忠诚因素。在整个国家,演奏德国音乐受到禁止,学校的课程活动都需经过严格审查,保证它们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内容,教师也被要求签署效忠国家的誓词。<sup>①</sup>

如果战争及其结果证明了什么东西的话,李普曼在1919年写道,那就是“传统的言论自由和意见自由并没有建立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但是,尽管一些进步主义者反对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但他们,包括李普曼自己在内,对大规模地镇压公民自由的行动却表示了默认。令人更为熟悉的倾向是将战时的持不同政见与对国家不忠诚等同起来。对于进步主义者来说,公民自由基本上不是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进步主义者往往将国家政府视为民主目的的代表,坚持认为自由来自于对社会生活的参与,而不是站在与社会隔离的立场上进行反对活动。许多进步主义者认为,对个人权利过于广泛的要求,是一种过度个人主义的症状,而后者正是他们所谴责的引起诸多社会弊病的根源。进步主义者相信通过积极使用政府权力,社会条件可以得到改善;他们对法院以“自由”的名义推翻民选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的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对于在多数或政府暴政的形势下如何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的问题,却没有发展出一套连贯的防范措施。从劳联到《新共和国》的知识分子们以及战争的支持者们,都把消灭社会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看成是一个将劳工和移民整合进秩序井然的社会的一个必要前奏。这是他们希望出现的一种战后结果。<sup>②</sup>

① Walker, *Defense of American Liberties*, 43; Murphy, *World War I*, 128-30; Chrislock, *Watchdog of Loyalty*, 57-60, 89-90, 114-17, 270; Kennedy, *Over Here*, 54.

② Walter Lippmann, “The Basic Problem of Democracy,” *Atlantic Monthly*, 124 (November 1919), 616; Arthur S. Link, ed.,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Princeton, 1966-), XLIV, 272, 393-94; Murphy, *World War I*, 138-50; R. Jeffrey Lustig, *Corporate*

美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卷入仅有 19 个月的时间,但它却给随之而来 179 的十年投下了一个长长的阴影。战争开始时所带有的那种充满理想主义的目标,年轻的牧师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评论到,好像已经被抛弃了:“我们正在迅速变成地球上最保守的国家。”在“自由的甜蜜土地”的标题下,《民族》杂志在 1923 年列举了一系列表现美国自由恶化和贬值的例子:在阿拉巴马、阿肯色和佛罗里达各地发生的私刑;一位本科生因为写了一封捍卫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信就遭到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的殴打;在新泽西州对一个工会领袖的逮捕;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位社会主义者要求演讲的权利遭到拒绝。在随后的几年中,镇压的势头有所减缓,用一位公民自由论者的话来说,原因是“已经没有什么可压制的了”。英国作家劳伦斯在 1923 年评论道:美国以生活在“自由的土地”引以为豪,但是,“自由的暴徒们”却把持不同意见者的权利给毁掉了。他写道,“我从来没有到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对他们自己的同胞抱有那样无奈的恐惧。”<sup>①</sup>

随着 1919 年劳工反抗运动的失败以及战时政府管制的取消,商业资本家抓住民主、崇美主义和“工业自由”等口号,作为武器,来反对集体签约权。在 20 年代,有的大公司实行了一种新型管理方式,配带有私人养老金、医疗保险计划,并带有就职保障的承诺等。但在这种“美国计划”的核心却矗立着“公开的工场”,即一个不设工会的工作场所。一群雇主宣称:集体签约权象征着“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和对一个自由人民的体制的威胁”。而无工会企业则代表了“个人自由的原则”,经济繁荣在于给予商业和企业自由管理的权力,不受工会或政府规定的干涉。雇主们怕工人们不明白他们的意思,还搞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来加强效果,这种宣传把工联主义与社会主义联在一起,把两者都说成是对自由的威胁和外国人对美国生活施加邪恶影响的例子。<sup>②</sup>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劳工运动丧失了 100 万会员,工会一次又一次地对雇

---

*Liberalism: The Origins of Modern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y, 1890-1920* (Berkeley, 1982), 148; Powe, *Fourth Estate*, 69.

① Richard W. Fox, *Reinhold Niebuhr: A Biography* (New York, 1985), 57-59; *The Nation*, July 4, 1923; Walker, *Defense of America Liberties*, 71; D. H. Lawrence, *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1923), 4.

② McCartin, “‘An American Feeling,’” 79-80; Lizabeth Cohen, *Making a New*



主们作出让步,力图保住自己的组织不被完全取消。在明尼阿波利斯这样的城市,前不久还是活跃的工运中心,工会有自己的互助社和消费组织,但此刻工会与它们的体制结构全都不复存在了。在这十年中,仍有一些由最受苦的工人组织的零星的反抗和暴动发生。南部的纺织工厂采用了科学管理制,工人们出于无奈举行了罢工,工人们称雇主把在这里工作的“男人和女人变成了奴隶”。一位工人把这种新的管理制度称作“强加在自由人民头上的最该死的制度”。但是,面对雇主、地方政客和法院联合起来的反对力量,这些罢工的结局只能是失败。<sup>①</sup>

在一战之后的时期内,进步时代那种工业自由和一个具有社会意识感的国家政府的理想被再度兴起的自由放任经济学理论所淹没。联邦最高法院再次强调契约自由的重要性,否定了一项联邦政府管理童工的法律,认为这项法律侵犯了州权。最高法院在1923年的一项判决中,甚至推翻了马勒诉俄勒冈案的判决,将哥伦比亚特区的一项规定妇女最低工资的法律宣布为无效。法官们宣判说,既然现在妇女已经享有了投票权,她们就与男人一样拥有选择工作场所的自由权。弗洛伦斯·凯利悲愤地说,这项判决“是一项新的司各特判决”,因为它以契约自由为名,但“却在字里行间充满了最痛苦和最残酷的嘲弄”。<sup>②</sup>

---

*Deal; Industrial Workers in Chicago, 1919-1939* (New York, 1990), 163-209; Lyman P. Powell, ed., *The Social Unrest: Capital, Labor, and the Public in Turmoil* (2 vols. New York, 1919), 1, 133-35; Dana Frank, *Purchasing Power: Consumer Organizing, Gender, and the Seattle Labor Movement, 1919-1929* (New York, 1994), 96-110.

① Lois Quam and Peter J. Rachleff, "Keeping Minneapolis an Open-Shop Town: The Citizens' Alliance in the 1930s," *Minnesota History*, 50 (Fall 1986), 105-06; Frank, *Purchasing Power*, 1-2, 139-146; Hall, *Like a Family*, 200-13; Bryant Simon, "Prelude to the New Deal: The Political Response of South Carolina Textile Workers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1929-1933," in *Race, Class, and Community in Southern Labor History*, ed. Gary N. Fink and Merl E. Reed (Tuscaloosa, 1994), 41-45.

② Susan Lehrer, *Origins of Protective Legislation for Women 1905-1925* (Albany, 1987), 70-73; Molly Ladd-Taylor, *Mother-Work: Women, Child Welfare, and the State, 1890-1930* (Urbana, 1994), 93-95; Joan G. Zimmerman, "The Jurisprudence of Equality: The Women's Minimum Wage, the First Equal Rights Amendment, and *Adkins v. Children's Hospital*, 1905-1923,"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8 (June 1991), 190, 221-22 (Kelley).

就在凯利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妇女运动正在分化成几个部分。一部分原因在于选举权的获得使不同种类的积极分子失去了团结的纽带。这些不同的群体“都在为自己理解的自由奋斗,”用劳工改革家朱丽叶·斯图尔特·派恩茨的话来说。黑人妇女们坚持认为,妇女运动此刻必须要求在南部强制实施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但这种要求并没有得到白人女权主义者的支持。少数几个著名的女权主义者,最有名的是哈里奥特·斯坦顿·布拉奇,参加了正在迅速消失的社会主义党;她们相信,妇女在取得选举权后,应支持一种独立的选举力量,借此来推进政府对所有可能受到伤害的工人而不仅仅是对妇女本身的保护。在妇女自由的定义上两个相互竞争的派别——一派基于母亲权益,另一派基于工作权利——此刻在针对一项平等权利的宪法修正案(ERA)的提议上将它们之间长期以来的分歧明朗化了。这项修正案是艾丽斯·保罗和全国妇女党提出来的。对保罗来说,消除一切“基于性别基础上”的法律区别是妇女取得选举权后一个顺理成章的后续工作。取得政治权利之后,妇女不再需要特殊的法律保护。但对于那些支持母亲津贴和保护妇女的立法的人来说,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会把对妇女的保护一扫而尽,她们认为这项提议代表了一个巨大的退步。最后,“平等”和“差别”两派都遭到重创。要求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的斗争失败了,1929年,国会又取消了1921年的谢泼德-汤纳法,这项法律要求联邦政府对妇女和儿童健康的计划提供资助,曾被认为是主张母亲权利的改革派的一项主要成就。<sup>①</sup>

战前女权主义者对个人自由的要求仍然存活下来了,但只是通过广大的消费者市场和在20年代中大吹大擂起来的“新妇女”们的实际行为。妇女解放,作为一个政治题目已经奄奄一息,但却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再度兴起,方兴未艾。生活方式是广告制作和大众娱乐的内容,与政治或经济上的激进主

<sup>①</sup> Lehrer, *Origins*, 107-12, 174; Cott, *Feminism*, 70; Ellen C. Du Bois, *Harriot Stanton Blatch and the Winning of Woman Suffrage* (New Haven, 1997), 224-29; Zimmerman, "Jurisprudence of Equality," 207-17; Florence Kelley, *Twenty Questions About the Federal Amendment Proposed by the National Woman's Party* (New York, 1922), 4-6; Linda Gordon, *Pitied But Not Entitled: Single Mothers and the History of Welfare* (New York, 1994), 94.

181 义完全没有联系。性自由此刻意味着坚持个人自主或个人反抗,这是自由选择的一种象征,与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改造毫无关联。一代人以前被认为是丑闻的事——即妇女有意识地追求性方面的愉悦——此时成了推销从香烟到汽车等市场商品的一种手段。(爱德华·伯尼斯负责筹划了诱惑妇女吸烟的公关活动,他给香烟取的绰号是:妇女的“自由火炬”。)如同广告和电影中描绘的,新妇女——即年轻的、未婚的、独立的妇女——一般都吸烟,饮酒,穿戴过度暴露的服装,过着一种比她母亲或祖母更为自由的性生活。一旦结婚,她会在家里找到满足感,用广告的话来说,新女性被省力的电器从“厨房奴隶制”和繁琐的家庭杂务的劳累中“解放出来了”。<sup>①</sup>

1924年,社会科学家霍勒斯·卡伦曾说,美国度过了自己历史上“最关键的一个十年”。在这其中所发生的变化中,包括了进步主义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和一种思想流派的解体。战时那种对有意识地创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信仰在巴黎就已经死亡,政府在鼓动群众的歇斯底里和仇视外国人方面的成功破坏了民主理念的真正基础——即那种自我主导的公民的思想。到20年代时,作为一种理性的集体实体,“人民”这个概念,创造于革命时期,现在看上去已经过时了。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徒们强调人类行为的下意识的直觉性动机;科学家用战时的智商测试结果来表明,大量的美国人在智力上并不适合行使自我管理。“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都是愚蠢的,”一位广告制造业的主管在解释为什么广告需要在感情上做手脚而不是提供真实信息时这样评论道。<sup>②</sup>

---

① Fishbein, *Rebels in Bohemia*, 158-59; Alice Kessler-Harris, *Out to Work: A History of Wage Earning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82), 224-26; Stuart Ewen, *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 Advertising and the Social Roots of Consumer Culture* (New York, 1976), 160-61; Roland Marchand, *Advertising the American Dream: Making Way for Modernity, 1920-1940* (Berkeley, 1985), 172-74; Ruth S. Cowan, “The Two Washes in the Morning and a Bridge Party at Night: The American Housewife Between the Wars,” in *Decades of Discontent: The Woman's Movement, 1920-1940* (Westport, 1983), 177-82; *Give Me Liberty* (Cleveland, 1969), 56.

② Horace Kallen,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24), 10; Westbrook, *John Dewey*, 278-86; Andrew Feffer, *The Chicago Pragmatists and American Progressivism* (Ithaca, 1993), 1-2; Wiebe, *Self-Rule*, 173-77; Marchand, *Advertising*, 66-68.

181 义完全没有联系。性自由此刻意味着坚持个人自主或个人反抗,这是自由选择的一种象征,与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改造毫无关联。一代人以前被认为是丑闻的事——即妇女有意识地追求性方面的愉悦——此时成了推销从香烟到汽车等市场商品的一种手段。(爱德华·伯尼斯负责筹划了诱惑妇女吸烟的公关活动,他给香烟取的绰号是:妇女的“自由火炬”。)如同广告和电影中描绘的,新妇女——即年轻的、未婚的、独立的妇女——一般都吸烟,饮酒,穿戴过度暴露的服装,过着一种比她母亲或祖母更为自由的性生活。一旦结婚,她会在家里找到满足感,用广告的话来说,新女性被省力的电器从“厨房奴隶制”和繁琐的家庭杂务的劳累中“解放出来了”。<sup>①</sup>

1924年,社会科学家霍勒斯·卡伦曾说,美国度过了自己历史上“最关键的一个十年”。在这其中所发生的变化中,包括了进步主义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和一种思想流派的解体。战时那种对有意识地创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信仰在巴黎就已经死亡,政府在鼓动群众的歇斯底里和仇视外国人方面的成功破坏了民主理念的真正基础——即那种自我主导的公民的思想。到20年代时,作为一种理性的集体实体,“人民”这个概念,创造于革命时期,现在看上去已经过时了。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徒们强调人类行为的下意识的直觉性动机;科学家用战时的智商测试结果来表明,大量的美国人在智力上并不适合行使自我管理。“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都是愚蠢的,”一位广告制造业的主管在解释为什么广告需要在感情上做手脚而不是提供真实信息时这样评论道。<sup>②</sup>

---

① Fishbein, *Rebels in Bohemia*, 158-59; Alice Kessler-Harris, *Out to Work: A History of Wage Earning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82), 224-26; Stuart Ewen, *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 Advertising and the Social Roots of Consumer Culture* (New York, 1976), 160-61; Roland Marchand, *Advertising the American Dream: Making Way for Modernity, 1920-1940* (Berkeley, 1985), 172-74; Ruth S. Cowan, “The Two Washes in the Morning and a Bridge Party at Night: The American Housewife Between the Wars,” in *Decades of Discontent: The Woman's Movement, 1920-1940* (Westport, 1983), 177-82; *Give Me Liberty* (Cleveland, 1969), 56.

② Horace Kallen,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24), 10; Westbrook, *John Dewey*, 278-86; Andrew Feffer, *The Chicago Pragmatists and American Progressivism* (Ithaca, 1993), 1-2; Wiebe, *Self-Rule*, 173-77; Marchand, *Advertising*, 66-68.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沃尔特·李普曼出版了两部对民主进行最透彻的批判的著作:《舆论》和《有名无实的公众》。这两部著作等于是对进步主义者将“智力”通过大众民主的途径来解决社会问题的理想所做的告别演说。李普曼认为,美国的选民没有对问题作仔细的考虑,甚至对个人和集体的自我权益也未作仔细思考,他们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因而相当的短视,倾向于受热情的左右。现代的问题不仅超出了普通男女的理解能力(这种意识曾导致李普曼支持由专家主持政府行政部门的工作),而且在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所谓独立(即有自己的主见)的公民只不过是一种并不存在的虚构而已。政府,如同广告业的抄写者和新闻记者一样,熟练地掌握了制造和操纵民意的艺术——李普曼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共识的制造”——与此同时,消费主义又在消磨吸吮美国人对公共话题的关注。杜威曾坚决地捍卫一个参与的公民群体是社会进步的182 基础的思想,在李普曼的批判之下,他也放弃了自己的看法。杜威写道,“公众好像是消失了,但它毫无疑问地是被弄糊涂了。”<sup>①</sup>

一战及其后果的另一个牺牲品是进步主义把联邦政府当作国家目的象征时而寄予的绝对信任。从战时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以及 1917 年为国会通过并在两年后为各州批准生效的禁止生产和销售含有酒精的液体的宪法修正案183 中,许多都市中的进步主义者和格林威治村的文化反叛者认识到,当公共权力落入错误之手,它将会干出何等荒唐的事,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例证。遵循战前由劳工、社会主义者和生育控制权的提倡者们力争表达自由的传统,一些进步主义者此刻懂得和珍惜公民自由——即一个公民可以有权不同意政府的意见——他们认为这是美国自由的核心内容。事实上,他们重新发现了麦迪逊当年的警告,民主政府本身可能威胁自由。这种认识的结果是进步主义者的政治语言开始出现一种微妙的变位,从强调多数人统治和有效民主转移到强调权利、限制政府的权力和个人自主。在这种“属于个人的

<sup>①</sup> Christopher Lasch, *The True and Only Heaven: Progress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1991), 363-64; Steel, *Walter Lippmann*, 180-83; Westbrook, *John Dewey*, 294-99; Jo Ann Boydston, ed., *John Dewey: The Later Works, 1925-1953* (17 vols. Carbondale, 1981-90), II, 308.

新自由”的名义下,一种关于公民自由的连贯观念在20年代得以产生,随之开始的是对言论自由不受政府干涉的、有实际意义的法律保护行动。<sup>①</sup>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富有创造力的反战主义者约翰·海因斯·霍姆斯后来回忆说,“公民自由的新问题突然成为了我们国家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反间谍和惩治乱法的允许下,对反战异见分子的逮捕导致了公民自由管理局在1917年的成立,该局在1920年变成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在随后的几十年内,公民自由联盟将参与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例的审理,这些案例促发了后来的“权利革命”,后者给传统的公民自由——如言论和出版自由等——填充了实质性的内容,并发明了新的公民自由,如隐私权等。但在它诞生的时候,公民自由联盟只不过是一个小型的、四面受到围攻的组织。它是由反战主义者、像杜威这样被战时镇压震惊的进步主义者以及那些对公然违反美国人权利的行为感到义愤的律师组成的联盟,它那些捍卫言论自由的小册子却被邮政检查官勒令禁止进入邮政通道。联盟早期历史中的主要人物是罗杰·鲍德温,他在战前是一个反战主义者。鲍德温是一个“极端的反国家主义者”。他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使他与大多数进步主义者分道扬镳,而且也促使他在推崇自主个人有权不受限制地表达自我的基础上来捍卫言论自由。<sup>②</sup>

联邦最高法院逐渐地被迫面对了表达政治和经济异见时所准允的尺度的问题。在最初的决定中,最高法院给公民自由的概念带来了一连串的摧毁性打击。1919年,大法官们维持了反间谍法的合宪性,维持了对查尔斯·T. 申克的判罪。申克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通过邮局寄送了反征兵的传单。大法官奥利弗·霍姆斯代表最高法院写出的判决意见宣称,第一条宪法修正案并没有阻止国会立法禁止那种带有“清楚的和当前的”危险的言论,因为这样的言论可能引起非法的行动。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中,霍姆斯的原则将成为第一修正案的测试 184

① Edward A. Stettner, *Shaping Modern Liberalism, Herbert Croly and Progressive Thought* (Lawrence, 1993), 111-15; Murphy, *World War I* passim.

② Murphy, *World War I*, 9, 153-68, 175; Walker, *Defense of American Liberties*, 3-4, 11, 21; Alan Ryan, *John Dewey and the High Tide of America Liberalism* (New York, 1995), 169.

准则。既然最高法院通常给予政府部门极大的回旋余地来决定什么样的言论事实上是“危险的”，在危机时刻，捍卫言论自由很难找到一个牢固稳定的基础。申克案宣判后的一周中，最高法院又一致维持对德布斯的判罪，尽管他反对战争的演讲没有号召人们抵制征兵活动或反对政府。最高法院同时也肯定了将一家德语报纸的主编在战时收监入狱的判决，这家报纸的社论仅仅对强制征兵的合宪性提出疑问。

同样也在1919年，大法官们维持了对雅各布·阿布拉姆斯和其他几个人的判罪。他们曾散发了批评美国在俄国革命后干涉俄国的行为。但这一次，霍姆斯和路易斯·布兰代斯却表示了异议，标志着最高法院内开始出现了一个立志保护一个较为宽广的言论自由范围的少数派。当最高法院维持对本杰明·吉特洛的判罪时，布兰代斯（他已开始后悔自己当初在对申克和德布斯两案投票时加入了法院的多数派）和霍姆斯再次表示反对。吉特洛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写作的“左派宣言”中，有号召人们起来革命的词句，因而违反了纽约州的无政府主义罪法，被判有罪。霍姆斯宣称，“言论自由的惟一意义”是指每一个信仰的鼓吹者和提倡者，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者，都有权在广大的“思想的市场上”（一个对消费者社会来说相当贴切的比喻）说服公众接受他们的主张。布兰代斯已经呼吁，第一条宪法修正案也应适用于对州的限制。他写道，“我不相信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保障的自由仅仅只有获取和享受财产的自由。”虽然吉特洛被判了罪，但最高法院的多数也同时认为，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对州也同样有约束，限制其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进行不合理的限制。这条意见十分重要，它表明权利法案开始从过去那种并不总是有效的原则陈述转换为一种对公民自由的有重要意义的保护。<sup>①</sup>

逐渐地，公民自由法学的浪潮开始转向。尽管想要准确地解释法官投票的动机和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战时和战后的镇压活动完全有可能至少

---

<sup>①</sup> Walker, *Defense of American Liberties*, 26-27; Graber, *Transforming Free Speech*, 36, 106-08; David Riesman, "Civil Liberties in a Period of Transition," in *Public Policy*, ed. C.J. Friedrich and Edward S. Mason (Cambridge, MA, 1942), 36-37; Philipa Strum, *Louis D. Brandeis: Justice for the People* (Cambridge, MA, 1984), 314-20.

震动最高法院中一部分法院成员,促使他们开始对公民自由的问题产生敏感力和给予较大的注意。到20世纪20年代末,最高法院否决了堪萨斯的犯罪性工团主义法和明尼苏达州的一项新闻审查法。尽管这些年里公民自由联盟主要关心的问题是政治表达中的言论自由,但言论自由的新趋势却不只局限于政治话题。1930年,最高法院推翻了根据科姆斯托克法对玛丽·维尔·丹尼特的判罪。丹尼特之所以被判罪,是因为她通过邮政寄送名为《生活中的性》的性教育传单。三年后,一个联邦法院推翻了科姆斯托克法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禁令。这是反对审查文学著作斗争中的一个转折点。<sup>①</sup>

与此同时,布兰代斯正在精心铸造一个保护公民自由的思想武器,他的出发点与霍姆斯那种竞争性的思想市场模式不同。1927年,当最高法院维持对阿妮塔·惠特尼的判罪时,布兰代斯从程序的角度对法院的意见表示同意。惠特尼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和女权积极活动家,她因参加了共产主义劳动党的一次集会而被判罪,因为这个党主张暴力革命。但布兰代斯写作了一份十分有力的保护言论自由的意见,他认为,言论自由是一个民主政体中积极的公民活动的核心内容:“那些为我们赢得独立的人相信……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对于政治真理的发现和传播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对自由的最大的威胁是毫无生气、惰性十足的人民。”最高法院判决一个月后,加利福尼亚州长将惠特尼予以特赦,称“言论自由是每个自由美国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毫不畏惧的惠特尼不久又被带回法院,这次是因为她违反了加州不准公开展示红旗的法律。这一次,惠特尼取得了更大的胜利。1931年,最高法院推翻了这条法律,认为其与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保障的自由有冲突。这样,一种从司法上对公民自由的保护开始降生了。<sup>②</sup>

① Henry J. Abraham, *Freedom and the Court: Civil Rights and Libe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5th ed. (New York, 1988), 67-69; Rochelle Gurstein, *The Repeal of Reticence* (New York, 1996), 109-10, 209.

② Strum, *Louis D. Brandeis*, 327-28; Vincent Blasi,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the Ideal of Civic Courage: The Brandeis Opinion in *Whitey v. California*,” *William & Mary Law Review*, 29 (Summer 1988), 655, 664-65, 696-697; Walker, *Defense of American Liberties*, 90.



## 谁是美国人？

尽管 20 年代中公民自由的生长扩大了美国自由的内容，但对移民的严格限制却大大缩小了美国自由享有者的范围。土生居民保护主义者的崇美主义的定义虽然取得了胜利，它并没有彻底否定进步主义，而是从战前思潮中吸收了一些关键的因素。我们习惯于把进步主义思想看成是一些 20 世纪的主要发展——如新政、大社会和增强全国政府权力等——的先行者，但有必要记住，在许多方面，进步主义者是怎样仍然带有他们所处的 19 世纪的印记的。“种族”思想，作为一个区别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永久性的决定性特征，在进步主义者的思想中占有极有影响力的位置。无论是否有意识，“种族”思想都限制了进步时代美国“想像的共同体”的范围。

在每一种进步时代的自由定义中，非裔美国人都被排斥在外。在某种意义上，解除南部黑人选举权的运动是一种典型的进步时代的改革活动，如同它的支持者所称，这样做是为了“提高”选民质量、允许在剩余选民之中实行范围更为广泛  
186 的民主。的确，在密西西比州，它率先以修改州宪法的方式，取消了黑人选举权，但随后马上实施了法官直选、公民提出立法议案、全民公决以及其他措施，使这个州进入了进步主义改革的主流。妇女选举权通过宪法修正案得以实现，使得州能够在其他方面自由限制选举权，所以妇女选举权修正案并没有帮助绝大多数的黑人妇女赢得政治权利。黑人工人为大多数工会所排斥，同时也被排除在技术工种之外；他们没有通向“工业自由”的通道和权利。大部分黑人妇女外出工作，但她们的工资并不能给她们带来独立自主的希望，她们的职业——绝大多数在家庭服务和农业领域之中——处于那些管制女工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的法律的影响之外。因为大部分黑人处在赤贫状态中，所以黑人也不能参与正在出现的消费者型经济，无论是在百货商店中担任雇员（除了担任清洁工或打扫清洁的女工外），还是成为源源不断流入市场的商品的购买者。

进步主义知识分子、社会科学工作者、劳工改革家、妇女选举权鼓吹者等都对黑人所处的境遇表示出非常明显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沃尔特·维尔在他

的《新民主》中,一直等到第15页时才谈到了“种族问题”。尽管他承认,“白人民主”在说法上存有严重的矛盾之处,但他却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推动美国民主向一种更为平等的标准发展。有些贫民救济社的工作人员企图面对都市黑人的贫困问题,但他们中没有什么人能够懂得黑人在劳动中所面临的数不清的困难和障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接受种族隔离,认为这是一种自然和平等的方式,同时认为应该在白人社区建立白人贫民救济社,在黑人居住区建立黑人贫民救济社。<sup>①</sup>

西奥多·罗斯福对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性深信不疑(他把印第安人称为“野蛮人”,把黑人叫做“完全不配享有选举权”的人),但这一切都丝毫没有削减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对他的新民族主义的热烈拥戴。珍妮·亚当斯是对黑人问题表示关注的为数不多的进步主义者之一,也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缔造者之一。即便如此,当1912年进步党代表大会否决了其党纲中的一条关于民权的内容并禁止具有争议的南部黑人代表进入大会时,她表示了默认。出生在弗吉尼亚的伍德罗·威尔逊可以大言不惭地谈论南部的“真正的代议制政府”和它的崇高的“自由标准”。他的政府在华盛顿市实行了全面的种族隔离,将一大批黑人雇员从联邦职位中赶除去。“你是不是给了美国白人一个‘新自由’,而给了你的非裔美国公民同胞一个新的奴隶制?”威廉·门罗·特罗特在1914年的一次问答中这样对威尔逊总统问道。<sup>②</sup>

黑人的地位问题只是被进步主义者称为这个时代的“种族问题”的一个部

---

① Sarah Henry, "Progressivism and Democracy: Electoral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8-1919,"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5, 311-12; Eileen Boris, *Home to Work: Motherhood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Home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94), 119; Walter E. Weyl, *The New Democracy* (New York, 1912), 345-46; David L. Lewis, *W. E. B. Du Bois: Biography of a Race, 1868-1919* (New York, 1993), 395.

② Tomas G. Dyer,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Idea of Race* (Baton Rouge, 1980), 16-19, 70-80, 100-09; Lewis, *W. E. B. Du Bois*, 422-23; Link, ed., *Wilson Papers*, XXIII, 551-52, XXIV, 112; Desmond King, *Separate and Unequal: Black Americans and the U. S. Federal Government* (Oxford, 1995), 11-14, 28-31, 107-08; Gaines, *Uplifting the Race*, 215.

187 分。1911 年由美国联邦移民问题委员会出版的《人类种族词典》将移民的“种族”排列成一个等级类型,盎格鲁—撒克逊人位居顶端,以下依次是希伯来人、北意大利人,位置最低的是南意大利人——据称这是一种具有暴力倾向的、无节制的、不可能真正被同化的人。1916 年由纽约动物学会会长麦迪逊·格兰特出版的《伟大种族的消逝》这本迎合大众口味的畅销书警告说,潮水般涌入美国的新移民和本地白人妇女的低生育率已经威胁到美国文明基础的存在。多数进步主义者认为,如果民主在经济权力极不平等的环境下不能开花结果的话,它也同样无法在一个永远为种族和族裔界限分割的国家中存在下去。但是,将美国政治与经济生活(民族)国家化的本身却提高了人们对族群和种族差别的重视和意识,并刺激了和推动了对“美国化”运动——一种有意识创造一个更为同一的民族文化的努力——的呼声。<sup>①</sup>

对新移民实行美国化的任务是由官方和各种类型的私人组织来担任的——包括教育工作者、雇主、劳工领袖、社会改良主义者以及政府官员等。美国化运动并不一定与对移民亚文化的尊重和移民对旧大陆保持忠诚的权利相冲突。在珍妮·亚当斯的赫尔堂(亚当斯在芝加哥等地创办的贫民救济社。——译者)里,老师们鼓励移民们尊重和珍惜他们的欧洲传统,用意大利人、希腊人和波兰人争取独立的斗争故事来教移民学习英语。但其他类型的美国化运动则更具有压迫性。福特汽车公司的著名的社会学部闯进移民工人家中,检查他们的服装、家具和烹饪,看是否符合美国的标准。在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化的工作无论是什么形式,大都是由私人组织来操作的。战争将美国化运动转化成为一场由政府支持的运动,它在新移民社区中力图建立一种忠贞不二的国家忠诚,从而给“美国人”这个概念加入了一个全新的保守内容。<sup>②</sup>

---

① U.S. Immigration Commission, *Dictionary of Races or Peoples* (Washington, DC, 1911), 81-85; Madison Grant, *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New York, 1916); Judith Stein, "Defining the Race, 1890-1930," in *The Invention of Ethnicity*, ed. Werner Sollors (New York, 1989), 78-80.

② Rivka S. Lissak, *Pluralism and Progressives, Hull House and the New Immigrants*,

战时那种对“百分之百的崇美主义”的信仰不仅导致了联邦和州政府对表达自由实行了前所未有的钳制,同时也要求新移民表现他们对美国坚定不移的忠诚。1917年9月,西奥多·罗斯福宣称说,在美国已经没有什么所谓“分离的忠诚”的余地了。爱国主义现在意味着对政府和战争的绝对支持。而激进的劳工运动、对俄国革命的同情以及保留外国文化的希望,那怕是保留移民的母语,统统被归为“非美”行为。到1919年,相当数量的州通过限制教授外国语言的规定。1922年,俄勒冈成为第一个要求所有学生必须上州立学校的州<sup>188</sup>——该州的总检察长说,这是一条必要的措施,这样做可通过废除宗教学校来减轻学生在“宗教上的怀疑”,并防止“布尔什维克分子、工联分子和共产党人”组织他们自己的学校。美国化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来势更加凶猛。在这个年代,在公立学校中实行了公民教育计划,雇主们也大张旗鼓地教移民学习英语,教会他们如何欣赏“美国价值”等。只有“那些头脑非常灵巧和意志坚定的移民,”《芝加哥论坛报》评论说,才可能“有希望利用为他们特殊利益准备的众多手段中的一种来逃脱美国化”。<sup>①</sup>

美国化计划的制作者们相信,无论这些计划如何地具有强制性,新移民(尤其是他们的孩子)能够调整自己适应美国生活,拥抱“美国的理想和思想”,成为有创造性和有能力的美国公民,并能享受美国自由的恩惠,但是,与此同时,战争也强化了这样一种趋向,即有些种类的移民必须要从美国生活中彻底

1890-1919 (Chicago, 1989), 25-34; Olivier Zunz, *The Changing Face of Inequality,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mmigrants in Detroit, 1880-1920* (Chicago, 1982), 311-13; Gary Gerstle, *Working-Class Americanism: The Politics of Labor in a Textile City, 1914-1960* (New York, 1989), 43-44.

① William Griffith, ed., *The Roosevelt Policy* (3 vols. New York, 1919), III, 887-89; 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New Brunswick, 1955), 242-55; James R. Barrett, "Americanization from the Bottom Up: Immigr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30,"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9 (December 1992), 1018; William G. Ross, *Forging New Freedoms, Nativism, Educa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1917-1927* (Lincoln, 1994), 61-68, 148; Ronald Edsforth, *Class Conflict and Cultural Consensus: The Making of a Mass Consumer Society in Flint, Michigan* (New Brunswick, 1987), 102-04; John F. McClymer, "Gender and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Women in the Americanization Movement,"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10 (Spring 1991), 3.

地踢出去。一位要求限制移民的人在 1919 年宣称说,比起“盎格鲁—撒克逊人来”,新移民并不愿意接受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所提供的证明是,新移民容易为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些“极端的政治信念”所吸引。征兵时采用的智能测验好像也“科学地”证实了,在智商(IQ)程度上,黑人、爱尔兰裔美国人和新移民远远低于美国本土出生的白人。<sup>①</sup>

然而,将种族主义、公民资格和自由思想重新联系在一起的最危险的反映是三 K 党在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的重新崛起。到 20 年代中期,三 K 党称它已拥有 300 万会员,几乎都为美国本土出生的白人新教教徒,大部分人是他们居住的社区中一些名高望重的体面人物。与重建时期的三 K 党不同的是,20 年代的三 K 党组织在北部也有很深的根基。三 K 党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印第安纳州最大的民间组织。在 20 年代,三 K 党声称,文明遭遇到比重建时期范围更广的敌人的威胁——这些威胁不光包括黑人或移民(尤其是犹太人和天主教移民),也包括所有其他的力量(女权主义、激进劳工主义,甚至有时也包括大公司在内)等,这一切都威胁到“个人自由”。尽管它的极端主义主张和行为使人不以为然,但三 K 党那种主张将把美国的控制权退回给“传统民族的公民”的思想在 20 年代的美国得到了广泛接受。<sup>②</sup>

将崇美主义、智能和“种族”联系在一起导致了对美国移民政策的永久性改变。这种改变是对一个古老的问题“谁是美国人”作出的新的回答。1924 年,国会废除了原来实行的对欧洲移民完全开放(除对个别明确规定的、由不  
189 值得期望的人组成的种类外)的传统,对欧洲移民设置了第一道硬性限制,建立起一套以原民族血统(国籍)为基础的配额制,以保证旧移民的后代永远超过新移民的后代。“美国必须始终是属于美国人的,”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在签署这条 1924 年的法律时说道。柯立芝的劳工部长詹姆斯·戴维斯说,美国

① Paul McBride, *Culture Class: Immigrants and Reformers, 1880-1920* (San Francisco, 1975), 27; Powell, *The Social Unrest*, II, 663-71; Gwendolyn Mink, *The Wages of Motherhood: Inequality in the Welfare State, 1917-1942* (Ithaca, 1995), 23-26.

② Leonard J. Moore, *Citizen Klansmen: The Ku Klux Klan in Indiana, 1921-1928* (Chapel Hill, 1991); Nancy MacLean, *Behind the Mask of Chivalry: The Making of the Second Ku Klux Klan* (New York, 1994).

的移民政策过去曾以政治避难所理想和劳工需求为基础,此刻必须以理想人口的生理因素来决定了。尽管1924年的移民法是由一个非常保守的国会通过的,但这项法律除了其他方面之外,也反映出进步主义者要求改善民主公民政体的“质量”,利用科学方法来使公共政策理性化的愿望。与此同时,这项法律也反映出,进步主义的这些目标是如何严重地受到关于“种族”高低贵贱的伪科学推论的影响,也受到旧移民的后代所掌握的政治权力的影响和对移民劳动力的现实需要的影响。其结果并不是一个对民族性界限的理性的划定,而是一堆相互矛盾的政策的大杂烩。<sup>①</sup>

1924年的移民法严格地限制了从南欧和东欧来的欧洲移民,禁止了所有那些不能得到归化公民资格的民族——即整个亚洲的全部人口——进入美国。随着此刻妇女已被认可成为政治社会的一部分,国会推翻了1907年的一项法律,这项法律要求与外国人结婚的美国妇女取得丈夫的国籍——除了那些嫁给亚洲人的美国妇女之外,而那些丈夫此刻仍然不能得到美国国籍。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加利福尼亚州那些大量使用墨西哥季节劳工的大农场主的要求,国会对整个西半球的所有国家没有建立移民配额制。那个看上去“科学地”计算国籍配额的新办法——以1790年美国人口的“民族血统”(原始国籍)为基础——要求对过去的人口普查资料进行高度的推测性分析,其结果是,如在爱尔兰裔美国人中出现的情形一样,原来的定额需进行调查,以增加允许进入美国的移民数量。与此同时,非白人却在计算美国人口的原始组成时被排除在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非洲国家将会得到一个比它们最终给予的那个小小配额高得多的数字。此时,整个作为公共政策基础的种族概念完全缺乏一个理性的基础。1923年,当最高法院拒绝了巴各特·辛·辛德要求得到归化公民资格的要求时,承认他实际上是一个白人。辛德是一个印度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声称自己是“纯粹的雅利安人种”。最高法院宣称,“白人”是“普通语言的一部分,只能通过普通人的理解来解释其内涵”(这是对后

---

<sup>①</sup>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311-13; Thomas F. Gossett, *Rac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America* (Dallas, 1963), 405-07.

来一代人所称的种族的“社会构成”的直截了当的肯定)。<sup>①</sup>

只有少数几个进步主义者对一战时期大规模的美国化运动提出了疑问。

190 霍勒斯·卡伦是“文化多元主义”这个词的发明者。他坚持认为,美国应该为自己民族和文化的多元化感到荣耀,而不应试图去镇压这种多元化。对差异的容忍本身是“美国思想”的一部分,卡伦写道。美国过去是,而且也应该永远是,一个“不同民族的联邦”,在其中,不同群体一方面保留自己的不同的特征,另一方面以公民的身份,相互合作,朝一个共同的目标奋进。路易斯·布兰代斯也如同卡伦,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坚持认为,“真正的崇美主义”所要求的不是强制性的同化,而是“每个种族或民族,如同每个人一样”应该能够享受到不受限制地发展自身的权利。对美国化运动最深刻的批判可能来自多产作家伦道夫·伯恩尼的笔下。他在1916年发表的名为“超越国界的美国”的文章中,将对美国化运动的要求与进步主义者对组成“一个统一而有秩序的美国”的偏执狂联系起来。“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美国文化,”伯恩尼写道,他指出了美国化运动模式的根本错误。美国的音乐、诗歌、哲学和其他的文化表现形式都是个人与群体之间相互交流的结果。接连不断的移民不仅不会对先前存在的文化造成威胁,相反,对文化的生命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除此之外的选择是“呆滞”。当卡伦认为群体特征是原生的和永不改变的,伯恩尼却设想应该有一种世界性民主社会的存在,在这个社会中,移民们和本土出生的人原有的地域忠诚溶入在一种“超越国家”的文化之中,而这种“超越国家”的文化并不受美国化鼓吹者那种强制性统一模式的约束。与此同时,那种认为南欧和东欧移民不配成为美国公民或只能在放弃自己的传统、皈依盎格鲁—撒克逊的生活方式才能成为公民的思想,也遭到了来自另外一个方面的挑战。人类学家弗朗兹·博阿兹、阿非尔德·克罗伯和罗斯·本尼迪克特认为,现存的科学知识既不支持所谓种族优越性的理论,也不能证明不同社会与种族生

---

① Virginia Sapiro, “Women,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ity: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Poli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s and Society*, 13 (March 1984), 1-14; Mae M. Ngai, “Illegal Aliens and Alien Citizens: U.S. Immigration Policy and Racial Formation, 1924-1965,”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8, ch. 1.

活在一个固定的、从“原始的”到“文明的”的范围内的流行思想。<sup>①</sup>

不论他们各自强调的重心如何不同,卡伦、伯恩尼、博阿兹和其他人播下了一个多元崇美主义前景的种子,这种前景最终将成为“自由启蒙主义的一块试金石”。但在当时,他们的写作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甚微。在 20 世纪 20 年代,对多元主义的最有力的捍卫来自移民自己,在面临限制移民、禁止移民、复活的三 K 党以及四处蔓延的反犹太主义和反天主教思潮的种种困境下,移民们坚持强调文化多元的合法性,坚持认为对差异——无论是宗教的、文化的和个人的差异——的容忍是美国自由的核心。事实上,他们把自己重新塑造成“族裔”美国人,提出要在国家的生活中占有一个平等的份额,而且,除此之外,还在许多方面有权保留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罗马天主教堂敦促移民努力<sup>191</sup>学习英语,接受“美国原则”,但另一方面却竭力坚持有权建立独立的学校和其他机构。1924 年,天主教圣名协会组织了一场万人向华盛顿进军的活动,对三 K 党和土生居民保护主义提出挑战,并表示他们对天主教的忠诚。在全国各地,类似“契约之子”和全国天主教福利委员会的组织展开了游说工作,要求制定禁止雇主、大学和政府机构对天主教徒的歧视行为和作法。芝加哥的一家波兰语报纸宣称道,美国化运动“连一丁点儿真正的美国精神和自由精神的成份也没有,美国精神的最明亮的品质在于它具有最广大的容忍度”。<sup>②</sup>

时间将证明,在一个日益为大众文化和消费经济编织在一起的社会中,几乎没有人可以逃离同化的重力的牵引。百货商店、歌舞厅、电影院等,与学校和工作场所一样,也都成为美国化运动的执行者之一。但在 20 世纪 20 年代,

---

① Kallen in Philip Gleason, *Speaking of Diversity: Language and Ethnic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Baltimore, 1992), 19-20, 147-54; Brandeis on Zionism (New York, 1942), 3-11; Bourne, *Radical Will*, 248-56; David A. Hollinger, *In the American Provinc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Ideas* (Bloomington, 1985), 56-65; Elazer Barkan, *The Retreat of Scientific Racism: Changing Concepts of Race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the World Wars* (New York, 1992), 76-95.

② Gleason, *Speaking of Diversity*, 57; Lynn Dumenil, *The Modern Temper: America in the Twenties* (New York, 1995), 250-83; John J. Bukowczyk, *And My Children Did Not Know Me: A History of the Polish Americans* (Bloomington, 1987), 70; McClymer, “Gender and Americanization,” 7.



每个大城市中仍然存在着不受外界干扰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在那里,各族裔有自己的民事机构、影院、教会和外文报纸,也存在着一种因战后东欧独立民族国家的出现所带来的分离的认同的气氛。当然,如果把族群社区看成是和谐一致的或完全联合起来反对同化的话,将是不对的。从许多妇女的角度来看,如一位意大利妇女移民所说,到新大陆来的航程本身标志着一种从“恐惧”和“奴役”中的逃脱。在这样的情形中,美国化运动经常不被看作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侵犯,反而被看作是一种对父权传统约束的松解和一种自由的扩展。“所有的女人必须要多少得到一些自由,”一位波兰裔美国妇女说道。她这番话当然不是对妇女自主毫不含糊的要求,但却是美国化运动的成果之一。<sup>①</sup>

移民社区对强制性美国化运动的抵制和天主教会对自己学校体制的捍卫扩展了自由对所有美国人的定义。在20年代的一系列重要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否定了俄勒冈州要求所有学生上州立学校的法律,同时否定了内布拉斯加州禁止教授英语以外的语言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的字面意思,拉丁语也被禁止)。最高法院在关于内布拉斯加法律案件的判决中指出,“宪法保护应扩大到所有的公民,包括那些生来就说英语和那些讲其他语言的公民,”这是对强制性美国化运动的惊人的否定。在这些案例中,最高法院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保护的平等自由权扩展到包括在不受政府的干涉下“结婚、成家和养育子女”以及按自己的选择信仰宗教的权利。这些权利为多元主义奠定了宪政上的基础,为在两代人之后最高法院建立起宪法意义上的公民隐私权开辟了道路。<sup>②</sup>

1927年,纽约市的社会研究新学院组织了一个以“现代世界中的自由”为

---

① Cohen, *Making a New Deal*, 55-64, 100-17; Barrett, “Americanization from the Bottom Up,” 1004-06; Maddalena Tirabassi, “Not to be Afraid. Rosa’s Travel,” *Quaderni dei Nuovi Annali*, 31 (1993), 603-13; Elizabeth Ewen, *Immigrant Women in the Land of Dollars: Life and Culture on the Lower East Side, 1890-1925* (New York, 1985), 15-16; Bruce Stave and John F. Sutherland, eds., *From the Old Country: An Oral History of European Migration to America* (New York, 1994), 158.

② Ross, *Forging New Freedoms*, 3-6, 115-30, 148-89; Martha Minow, “We, the Family,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American Families,”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4 (December 1987), 963-64.

主题的系列演讲。该学院是几年前建立的,它的宗旨是使“自由思想和知识公正”在战时高压的情况下能够生长和繁荣,它的杰出教员队伍中包括了杜威和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比尔德为了抗议校方解雇反战教授,辞去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这些演讲指出,19 世纪的价值观仍然存留在当代美国社会中,它们显然已经与时代不合拍了。经济学家沃尔顿·H. 汉密尔顿说,“自由的思想已经变成一种向后看的思想武器……契约自由成为个人自由的所有内容和全部目的……在自由的名义下,商业界得到了不受任何外界制约的保护。”但是,思想交流的自由并没有从一战的危机中恢复过来。马克斯·伊斯门是半途而废的《群众》杂志的主编,这份杂志曾是文化反叛者们的新闻喉舌。伊斯门指出,不同意见和观点仍被广泛地认作是“非美式的”,在大众心中,对自由的信仰已经为一种“国家效率的复杂机制”所取代。霍勒斯·卡伦因为为反战主义者的权利辩护,被迫离开威斯康星大学,他说,“爱国主义和大商业的神圣教条”仍然控制着教学、新闻和公共讨论。他接着说,“社会结构与社会目的对个人的联合控制从来没有像这样严格过。”如同伊斯门和卡伦的话语所提到的,除其他事情之外,这些演讲等于是对进步主义的告别辞。因为,对于进步主义思想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对“国家效率”和“社会目的”的信仰更为重要和基本的呢? 国家与民间齐心合力构建的社会凝聚力,竟能严重地威胁自由,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令人极不愉快的惊讶之一。卡伦注意到,这样的情形导致自由的意义成为了“自由派讨论的一个最重要的题目”。在这样的讨论中,一种新的自由概念得以播种,这个概念将两个看上去不相称的因素非常费力地综合进一个内容之中。其中的一个因素是进步主义者的信仰,即一个具有社会意识的政府将在经济安排方面促进杜威所称的“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变化”。另一个内容集中在对公民自由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尊重的问题上,宣称生活的某些方面,如群体认同、个人行为 and 思想的自由表达等,不在政府合理合法的干预范围之内。<sup>①</sup>

<sup>①</sup> Horace M. Kallen, ed., *Freedom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1928), viii-xi, 1, 17, 23-24, 29-33, 159-61, 250.

但在此时,另外一种不同的自由观却得以称雄。这种自由观得到了不受  
193 钳制的经济企业王国的滋养,同时又容忍对私人生活和个人良心进行强制性的  
监管。20 世纪 20 年代的繁荣和对“普遍贫困”的消灭(这是赫伯特·胡佛  
总统在 1929 年就职演说中提到的)看上去支持了这种自由的定义。<sup>①</sup> 当经济  
危机来临时,这样的自由观将被荡涤而去,让位于现代自由主义思想以及其对  
美国自由的重新界定。

---

<sup>①</sup> *The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Herbert Hoover 1929* (Washington, DC, 1974), 1.

## 第九章 新政与自由的重新定义

1929年股票市场的崩溃使美国堕入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之中。到1932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减少了三分之一,物价下降了将近一半,有1500万美国人——相当于劳动力队伍的23%——找不到工作。那些保住了工作的人,工资也大幅度地下降,直到1940年,他们的工资才能回升到1929年的水平。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就任总统时说,美国三分之一的人处在饥寒交迫、无家可归的境地之中。大城市的街上排满了由饥饿的男女组成的长队;更多的人住在被称为“胡佛村”的、由摇摇欲坠的简易屋组成的小城镇中,这些城镇在公园和废弃的土地上四处蔓延。由于前景不明,美国的出生率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sup>①</sup>

美国社会中没有一个部分逃脱了这场危机的影响。经济危机引发了一场政治革命,把除两届威尔逊政府之外、自从1896年起一直掌握总统大权的共和党人赶下了台,开始了一个长时期的民主党统治时期。在罗斯福的领导下,民主党从一个地方主义和州权的大本营转化成为了一个包括农场主、产业工人、具有改革意识的城市中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令人有些不可思议地)崇尚白人至上的南部势力在内的广泛政治联盟,所有这些党内群体都决心使用政府的196 干预力量来重建经济,为美国人提供社会保障。南部势力在国会中的存在意味着美国自由的范围将继续通过种族来界定。但是,新移民通过积极参加重新兴起的劳工运动,获得了政治上的权力和影响,加上新政本身的政治联盟,这一切都将对美国的民族性的重新界定发挥巨大的影响。

---

<sup>①</sup> Anthony Badger, *The New Deal: The Depression Years, 1933-1940* (New York, 1989), 11-65; William E. Leuchtenberg,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New York, 1963), 102; Robert S. McElvaine, ed., *Down and Out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Letters from the "Forgotten Man"* (Chapel Hill, 1983), 17-19.

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大萧条不可避免地迫使人们“对自由进行清算”。罗斯福宣称,对太多的美国人来说,“生活不再是自由的;自由也不再是真实的;人们不再能够去追求幸福。”所谓“美国式的生活”,这句曾代表 20 世纪 20 年代消费文化的时髦口号,此刻成了一个空洞的声音。经济危机的发生,使那种认为社会进步是以无限制的财富追求为基础的思想彻底破产;同时也使进步主义者的思想重新焕发了活力——即国家政府必须保护市场经济中各个方面的美国人。经济危机也将“社会公民权”——即一个范围广泛的对经济安全的公共保护——提高到美国人对自由的讨论的前沿位置。1941 年,欧文·埃德曼——一位极受欢迎的哲学和美学作者——发表了一份关于从古代社会到 20 世纪的民主思想的调查统计,他的结论是,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所具有的特征是,人们对“自由的社会条件”的意识和重视。由于经济危机,“经济保障”“终于被作为个人自由的一个政治条件得到承认。”<sup>①</sup>

## 保障与自由

如同内战,新政对自由思想的重新定义也是与扩大国家政府的权力联系在一起。但是此刻,主导自由问题讨论的不是前奴隶及他们后代的公民和政治权利的问题,而是经济保障的问题。约翰·A. 瑞安写道,“我们的民主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最有力的口号不是政治自由,而是社会自由和工业自由。”<sup>②</sup>在 20 世纪 30 年代,联邦政府担负起了这个责任,以追求和保证更大的自由的名义,为一个基础广泛的美国或福利国家奠定了基

<sup>①</sup> Alan Dawley, *Struggles for Justic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Liberal State* (Cambridge, MA, 1991), 342; Samuel I. Rosenman, ed.,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3 vols. New York, 1938-50), V, 233; Robert S. Lynd and Helen M. Lynd, *Middletown in Transition: A Study in Cultural Conflicts* (New York, 1937), 413; Leuchtenberg,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18-22; Irwin Edman, *Fountainheads of Freedom* (New York, 1941), 7, 186.

<sup>②</sup> Francis L. Broderick, *Right Reverend New Dealer: John A. Ryan* (New York, 1963), 195.

础。30年代那些开拓性立法之所以得以建立,是一系列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那些支持政府所倡导的各种改革的力量的聚集以及对要求深入改革经济和社会现状的群众力量的有效动员。

- 197 当大萧条开始的时候,许多美国人对此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或对自己的经济不幸自认倒霉;其他人则在开始自发地起来抗议,但他们的抗议活动大都是零散的、无组织的和无协调性的,因为能够提供有纪律的领导力量的工会和社会主义组织在20年代已经被整治得元气大伤。武装的农场主堵住公路,抗议农产品的低廉价格,防止银行强行收走抵押的农场和房屋。两万多失业的一战老兵聚集在华盛顿市,要求提前付给他们应在1945年兑现的一份退休金,但他们的抗议最终遭到联邦军队的驱散。在全国各地,失业者举行了示威游行,要求工作机会和公共救济,这种示威活动传送出一种早期的信号,表明公众对于政府在承担经济自由的责任的问题上,态度开始有了转变。<sup>①</sup>

富兰克林·D. 罗斯福在1932年的当选重新点燃了一些人心中的希望之火,这些人自称,用一位给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写信的工人的话来说,是“大萧条的奴隶”。的确,罗斯福的就职演说招致了潮水般涌向联邦政府的言辞尖锐的信件,这些信描述了一位路易斯安那的制糖工人所说的、许多工人所处的“可怕的非人境地”。“我们没有自由,也没有权利,”一位来自亚拉巴马的纺织厂的雇员写道。一位底特律的铜业工人对总统写信说,“在这里真实地存在着一种奴隶制。”另一位写信人称,罗斯福应该“成为另一个林肯,将我们从我们所处的被奴役的境地中解放出来”。“我相信这个国家欠每个男人、妇女和孩子一份生计,”一位纽约市的妇女对公共工程建设局(WPA)的主管哈里·霍布金斯这样写道。公共工程建设局是新政时期的负责公共工程事务的机构之一。“如果政府不能通过私有产业为我提供生计,那它必须利用公共途径和办法。(这是)每个生活在这个政府管辖之下的人所拥有的不可剥夺的权

---

<sup>①</sup> Elizabeth Cohen, *Making a New Deal: Industrial Workers in Chicago, 1919-1939* (New York, 1990), 261-71; Leuchtenberg,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24.

利。”<sup>①</sup>

20 世纪 30 年代出现了一大批关于自由的书籍和论文。大多数人都认为个人主义作为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哲学已经过时了,大萧条已经使自由的重新定义成为势在必行之事。深受瑞安的影响,全国天主教福利问题研讨会在 1935 年放弃了教会长期以来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反对,宣布“社会正义”要求政府保证人们能有持续的就业机会,保证所有美国人都有“一种说得过去的生活和足够的经济安全感”。一些书经常不无讽刺意味地使用《自由者的土地》作书名。在其中的一本书中,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将由农场保障局拍摄的移民、难民和贫穷的分租制农民的照片与他的诗并排在一起,质询困难时期的自由的现状。“我们曾对自己说,我们是自由的;”他写道,现在“我们却怀疑,自由是不是已经寿终正寝……或者,是否还有其他不同的东西可被称为自由。”《基督教世纪》杂志的一位作者宣称道,美国人曾如此“忙不迭地捍卫那种不受 198 政府控制的传统的自由概念”,他们甚至忘记了自由也能“为政府”所保护,而不只是用来防备政府。这样的观点很有市场。《财富》杂志在 1935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回答问卷的穷人中的有 90% 的人认为,政府应该保证“每一个想工作的人都有一份工作”。约翰·杜威在 1935 年坚持道,自由的概念应该被重新界定,在“今天,自由代表着从物质的无保障中得到解放”。<sup>②</sup>

在追求经济自由的过程中,30 年代最引人注目的发展是产业工人联合会(CIO)对数百万工人的动员和组织。产联于 1935 年创建,它的目标是将那些被全国劳联排斥在外的大型生产企业中的工人组织起来。30 年代中期和后期 199

<sup>①</sup> Gerald Markowitz and David Rosner, eds., "Slaves of the Depression", *Workers' Letters About Life on the Job* (Ithaca, 1987), 1, 19, 103-04, 178; McElvaine, *Down and Out*, 195, 208.

<sup>②</sup> Terry A. Cooney, *Balancing Acts: American Thought and Culture in the 1930's* (New York, 1995), 10, 44; David J. O'Brien, *American Catholics and Social Reform: The New Deal Years* (New York, 1968), 46-51; Aaron I. Abell, ed., *American Catholic Thought on Social Questions* (Indianapolis, 1968), 378-80; Herbert Agar, *Land of the Free* (Boston, 1935); Archibald MacLeish, *Land of the Free* (New York, 1938), 7-8, 84-86; Frederick Heimerberger, "Our Outworn Civil Liberties," *Christian Century*, April 22, 1936; McElvaine, *Down and Out*, 11-12; John Dewey, *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 (New York, 1935), 48.

利。”<sup>①</sup>

20 世纪 30 年代出现了一大批关于自由的书籍和论文。大多数人都认为个人主义作为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哲学已经过时了,大萧条已经使自由的重新定义成为势在必行之事。深受瑞安的影响,全国天主教福利问题研讨会在 1935 年放弃了教会长期以来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反对,宣布“社会正义”要求政府保证人们能有持续的就业机会,保证所有美国人都有“一种说得过去的生活和足够的经济安全感”。一些书经常不无讽刺意味地使用《自由者的土地》作书名。在其中的一本书中,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将由农场保障局拍摄的移民、难民和贫穷的分租制农民的照片与他的诗并排在一起,质询困难时期的自由的现状。“我们曾对自己说,我们是自由的;”他写道,现在“我们却怀疑,自由是不是已经寿终正寝……或者,是否还有其他不同的东西可被称为自由。”《基督教世纪》杂志的一位作者宣称道,美国人曾如此“忙不迭地捍卫那种不受 198 政府控制的传统的自由概念”,他们甚至忘记了自由也能“为政府”所保护,而不只是用来防备政府。这样的观点很有市场。《财富》杂志在 1935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回答问卷的穷人中的有 90% 的人认为,政府应该保证“每一个想工作的人都有一份工作”。约翰·杜威在 1935 年坚持道,自由的概念应该被重新界定,在“今天,自由代表着从物质的无保障中得到解放”。<sup>②</sup>

在追求经济自由的过程中,30 年代最引人注目的发展是产业工人联合会(CIO)对数百万工人的动员和组织。产联于 1935 年创建,它的目标是将那些被全国劳联排斥在外的大型生产企业中的工人组织起来。30 年代中期和后期 199

① Gerald Markowitz and David Rosner, eds., "Slaves of the Depression", *Workers' Letters About Life on the Job* (Ithaca, 1987), 1, 19, 103-04, 178; McElvaine, *Down and Out*, 195, 208.

② Terry A. Cooney, *Balancing Acts: American Thought and Culture in the 1930's* (New York, 1995), 10, 44; David J. O'Brien, *American Catholics and Social Reform: The New Deal Years* (New York, 1968), 46-51; Aaron I. Abeil, ed., *American Catholic Thought on Social Questions* (Indianapolis, 1968), 378-80; Herbert Agar, *Land of the Free* (Boston, 1935); Archibald MacLeish, *Land of the Free* (New York, 1938), 7-8, 84-86; Frederick Heimbarger, "Our Outworn Civil Liberties," *Christian Century*, April 22, 1936; McElvaine, *Down and Out*, 11-12; John Dewey, *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 (New York, 1935), 48.



是激进劳工运动的辉煌时代。联邦政府第一次站在了工人一边。在联邦政府的帮助下,产联将劳工合同从全国最强大的大公司手中抢夺回来,最终赢得了这场奋斗了数十年之久的战斗,在基础工业中建立了工会。在分布全国、控制严密的工业城镇中,产联的组织者向工人们传播这样的信息:“我们先辈们奋斗夺来的政治自由”被“经济上的无保障”和“工业暴政”变得“毫无意义了”。1933年的全国工业复兴法和两年后的瓦格纳法在法律上承认了工人們的集体签约权,工会变成了公民权的象征。“我们是自由的美国人,”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这样宣称道,“我们将行使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来使自己组织起一个伟大的工会。”

以大众消费为基础的美国生活标准,是繁荣的关键,这是20年代非常有影响的思想,产联领袖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向工人宣讲,大萧条是财富与收入不平衡情况下必然出现的后果。1929年,美国人口的百分之一中有十分之一所拥有的收入相当于42%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的收入,这样,社会无法吸收从现代化流水线上不断滚下来的产品。工会的功能就是与政府合作,通过提高工人的工资,重新分配财富,“创造一种消费者的需求,”以此来刺激生产,将国家重新推向繁荣之路。的确,1937年汽车工人工会与通用汽车公司之间签定的开创性协议讲到了“(工人們的)工资要与一个美国式的生活标准相称”。到30年代中期,关于大萧条的“低消费主义”解释为新政改革者广泛接受。他们从中得出结论说,政府必须采取行动,大幅度提高工资劳动者在国家收入中的份额。<sup>①</sup>

但是,除为生计工资奋斗外,劳工反抗的首要目标,用缝纫工会领袖悉尼·希尔曼的话来说,是“争取安全感”。杜威在30年代时写道,“从经济角度讲,目前生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没有保障。”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巨大经济转

---

<sup>①</sup> Robert H. Zieger, *The CIO 1935-1955* (Chapel Hill, 1995), 1-2; *Steel Labor*, August 1, 1936; Kenneth Casebeer, “Alaquipa: The Company Town and Contested Pow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aw,” *Buffalo Law Review*, 43 (Winter 1995), 645, 665-66; Steven Fraser, *Labor Will Rule: Sidney Hillman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Labor* (New York, 1991), 260-64; Ronald Edsforth, *Class Conflict and Cultural Consensus: The Making of a Mass Consumer Society in Flint, Michigan* (New Brunswick, 1987), 175; Patrick Renshaw, *American Labour and Consensus Capitalism, 1935-1990* (London, 1991), 14-21.

型已经将无安全感编织到工人阶级的生活结构中去了,大萧条显然加剧了这种发展和情形。面对普遍的经济不确定性及普遍存在的对雇主专断而且变化无常的权威的愤恨,工会组织分子重新使用了进步主义者使用过的“经济自由”和“工业民主”的语言,同时也使用了更早的、将压迫性的工作环境与“奴隶制”等同起来的说法。“解放”的内容不光意味着高工资,而且也包括稳定和固定的就业机会、工厂管理阶层“暴政”的终结以及对集体签约权的接受和认可。200 一家工会的报纸宣称说,工人们“不仅在投票站有权,而且在工厂也同样有权……如果在工厂的权利得不到承认和尊重的话,你能真正有自由吗?”大萧条之后,20 年代的那种“福利资本主义”迅速崩溃,厂主任意性的处罚和解雇事例数目急剧上升。工会的成立,一位纽约市交通工人组织的成员说,使工人们能够“理直气壮地走到我们的老板面前,像男子汉一样,而不是像奴隶那样,与他们谈话。”30 年代实施了不带偏见的申诉冤情的程序和工龄资深制的合同制,对雇佣、解雇和晋升等进行管理,这些合同的实施代表了产联工会的一个重大的成就,它帮助稳定了混乱无序的就业状况,为工会会员提供了一种尊严和自由感,结束了一个工会组织者所称的“工人对老板的完全服从”。“人们渴望在他们的工作中得到某种形式的保障,”一位汽车工人工会的地方领导人指出。产联则通过长期的努力为工人们提供了这种保障。<sup>①</sup>

在全国的工业重镇,劳工运动的高涨改变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均势,将工人的苦衷冤情——包括经济上的不安全和普遍的不平等状况——以及他

---

① Steve Fraser, “The ‘Labor Question,’ ”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w Deal Order, 1930-1980*, ed. Steven Fraser and Gary Gerstle (Princeton, 1989), 78; John Dewey, *Individualism Old and New* (New York, 1930), 54; Zieger, *CIO*, 13-15; 118; John L. Lewis, “the Battl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July 15, 1936, 678; Ronald W. Schatz, *The Electric Workers: A History of Labor at General Electric and Westinghouse 1923-60* (Urbana, 1983), 114-21; Joshua B. Freeman, *In Transit: The Transport Workers Union in New York City, 1933-1966* (New York, 1989), 127; Gary Gerstle, *Working-Class Americanism: The Politics of Labor in a Textile City, 1914-1960* (New York, 1989), 189-83, 207-12; David Brody, “Workplace Contractu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Industrial Democracy in America: The Ambiguous Promise*, ed. Nelson Lichtenstein and Howell J. Harris (New York, 1993), 179.

们追求一个更公正、更自由、更平等的美国的目标推到了政治的前沿。劳联在劳工与管理阶层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一向反感政府的干预;产联则不同,它提出了一套雄心勃勃的综合性计划,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为美国人提供免受经济和社会不安全的保护,这项计划包括:提供公共房屋(住房)、全民医疗保健制度、失业和老年保险金等。30年代中期的其他群众运动也将经济正义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复苏的问题,提到了政治议事日程上。1934年,休伊·朗发动了他的“分享我们的财富”的运动。朗是路易斯安那州的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同时也是该州非民主政治传统的继承者。朗呼吁对富人征收新的税收,用这笔新税收来为所有美国人提供一笔数目为5000美元的即刻赠款,并保证每人每年有一份最低限额的收入。同年,被誉为“收音机里的牧师”的查尔斯·E. 库格林吸引了数百万的听众,因为他不仅猛烈地抨击了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和贪婪成性的资本家们,而且还呼吁扩大公共事务的范围和采取其他措施来与失业作斗争。(库格林的进军运动后来将转向到反犹太主义和支持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方向上去)。与此同时,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外科医生弗朗西斯·汤森也提出了一项广受欢迎的建议,他提出:每位失业的老年美国人从政府每月领取200美元的收入,但要求他们把这笔钱立即花掉,以刺激经济的增长。<sup>①</sup>

富兰克林·D. 罗斯福入主白宫时,并没有一套对付大萧条或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宏伟蓝图。如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曾指出的,在罗斯福的档案中找不到一种在思想上有连贯性的宏观计划。在1932年的竞选中,他讲<sup>201</sup>到政府有责任保证“每个人都有一项谋取一份小康生计的权利”,但同时,他也强调要有一个收支平衡的政府预算,但也没有提供什么具体的复苏经济的措施。作为一个老练而且擅长于巧妙应付各种问题的老手和杰出的政治战术家,罗斯福在执政期间对他的目标和方向作过多次调整和转向。在1933和

<sup>①</sup> Cohen, *Making a New Deal*, 2-3; Michael Kazin, *The Populist Persuasion* (New York, 1995), 112-32, 138-39; T. Harry Williams, *Huey Long* (New York, 1969), 692-701; Alan Brinkley, *Voices of Protest: Huey Long, Father Coughlin,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1982); Linda Gordon, *Pitied But Not Entitled: Single Mothers and the History of Welfare* (New York, 1994), 215-30.

1934年间,新政集中在促进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复兴、改革银行制度和证券产业、提供紧急的公共救济和就业机会等方面。但早期的政策,并没有能将国家从大萧条中拯救出来(最高法院也否定了这些早期政策中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民众要求采取更大力度的措施,这一切都推动了罗斯福在1935年发起了“第二次新政”。这场新政极大地扩展了救济项目的范围,通过了一项广为宣传的对集中化财富的税收。但第二次新政的核心却是瓦格纳法和社会保障法。瓦格纳法使政府对集体签约权给予了全力支持。社会保障则是针对失业保险、老年养老金以及对残疾人和未成年儿童的资助等问题而设计的一个复杂体制。在这些法律之后,又有为兴建公共住宅的拨款和1938年的公平劳动标准法,这项法律建立了全国性最低工资制和工时限制制度。<sup>①</sup>

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欧洲式福利国家相比,美国式福利国家是分权式的,并包含了联邦政府以下各级公共开支之类的内容。但它代表了一种与美国政府的传统功能截然不同的转向。这些措施加起来,转换了联邦政府与经济 and 公民群体之间的关系,创立了现代美国自由主义的大部分政策议题。联邦政府承担了一项责任,即保证所有美国人有一份生计工资,在他们遭遇经济和个人不幸时能得到保护。第二次新政孕育和促成了民主党、组织起来的劳工与联邦政府之间亲密而长期的联姻关系。所有这几种力量都决心加强大众消费,驯服大企业的势力。“自由放任主义已经死亡,”沃尔特·李普曼写道,“现代国家已经开始对现代经济负起责任来,同时也承担保证维系它的人民的生活标准的任务。”<sup>②</sup>

除了是一个完美的政治家之外,罗斯福也是一位政治语言大师。他是第

---

①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New York, 1948), 315-52; Rosenman, ed., *Public Papers*, I, 742-56; Alonzo L. Hamby, *Liberalism and Its Challengers: FDR to Reagan* (New York, 1985), 23-28; Leuchtenberg,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167-97.

② Colin Gordon, *New Deals, Business, Labor,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1920-1935* (New York, 1994), 299; J. Joseph Hutchmacher, *Senator Robert F. Wagner and the Rise of Urban Liberalism* (New York, 1968), 131-33; Ronald Steel, *Walter Lippma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Boston, 1980), 308.

1934年间,新政集中在促进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复兴、改革银行制度和证券产业、提供紧急的公共救济和就业机会等方面。但早期的政策,并没有能将国家从大萧条中拯救出来(最高法院也否定了这些早期政策中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民众要求采取更大力度的措施,这一切都推动了罗斯福在1935年发起了“第二次新政”。这场新政极大地扩展了救济项目的范围,通过了一项广为宣传的对集中化财富的税收。但第二次新政的核心却是瓦格纳法和社会保障法。瓦格纳法使政府对集体签约权给予了全力支持。社会保障则是针对失业保险、老年养老金以及对残疾人和未成年儿童的资助等问题而设计的一个复杂体制。在这些法律之后,又有为兴建公共住宅的拨款和1938年的公平劳动标准法,这项法律建立了全国性最低工资制和工时限制制度。<sup>①</sup>

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欧洲式福利国家相比,美国式福利国家是分权式的,并包含了联邦政府以下各级公共开支之类的内容。但它代表了一种与美国政府的传统功能截然不同的转向。这些措施加起来,转换了联邦政府与经济 and 公民群体之间的关系,创立了现代美国自由主义的大部分政策议题。联邦政府承担了一项责任,即保证所有美国人有一份生计工资,在他们遭遇经济和个人不幸时能得到保护。第二次新政孕育和促成了民主党、组织起来的劳工与联邦政府之间亲密而长期的联姻关系。所有这几种力量都决心加强大众消费,驯服大企业的势力。“自由放任主义已经死亡,”沃尔特·李普曼写道,“现代国家已经开始对现代经济负起责任来,同时也承担保证维系它的人民的生活标准的任务。”<sup>②</sup>

除了是一个完美的政治家之外,罗斯福也是一位政治语言大师。他是第

---

①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New York, 1948), 315-52; Rosenman, ed., *Public Papers*, I, 742-56; Alonzo L. Hamby, *Liberalism and Its Challengers: FDR to Reagan* (New York, 1985), 23-28; Leuchtenberg,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167-97.

② Colin Gordon, *New Deals, Business, Labor,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1920-1935* (New York, 1994), 299; J. Joseph Hutchmacher, *Senator Robert F. Wagner and the Rise of Urban Liberalism* (New York, 1968), 131-33; Ronald Steel, *Walter Lippma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Boston, 1980), 308.

一位通过收音机将自己的声音传送到美国家庭的总统,在争取传统价值观对他的新政策的支持方面,他做得尤为得心应手。这样,在敦促国会通过工资工时法的法案时,他利用了“自由劳动”权利的思想。罗斯福有意识地抛弃了“进步主义的”这个词,选择“自由的”来取而代之,描述自己和自己的政府。这样一来,他也就转化了“自由主义”这个词的内涵,将其从一个关于弱政府和自由放任经济学的简语转换成为一种对能动式的、具有社会意识的政府的信仰,对于社会主义和非管制性资本主义来说,这种新自由主义同时也是另外一种制度选择。他同时也将自由这个词从保守派手中夺回来,将其变成支持新政的口号。“自由,”新闻记者多萝西·汤普森 1935 年在对美国妇女俱乐部的一次演讲中说,“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词。我们讲的是繁荣、高生活标准和高兴,……在自由的名义下,每一种非正义都被实践过。”但早在 1934 年,在第二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就将他自己的“自由”定义——即“普通人拥有的更大的安全感”——与早期的为“少数特权阶层”利益服务的契约自由并列。因此,罗斯福将始终把自由与经济安全感联系起来,将根深蒂固的经济不平等当成自由的最大敌人。在第二次新政的高潮期间,他将 1936 年的总统大选当成是反对“经济上的保守分子”的运动,保证联邦政府将建立起一个“为所有人(创造)机会的民主”。“工作的权利”和“生活的权利”与“投票的权利”一样都是同等重要的公民权的内容,对“政治自由”进行保护的同一联邦政府出于责任应采取行动反对“经济奴隶制”。他在 1938 年宣称,如果它的公民不能“维持一个可以接受的生活标准的话”,“民主制度的自由”将不会是安全的。<sup>①</sup>

在 30 年代中期,城市工人阶级选民成为民主党在这些地方的压倒性多数力量,大大小小的商业势力却因新政而与该党愤愤地疏远了。在新政时期,政

<sup>①</sup> James P. Young, *Reconsidering American Liberalism: The Troubled Odyssey of the Liberal Idea* (Boulder, 1996), 170-71; David Green, *Shaping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American from McKinley to Reagan* (Ithaca, 1987), 119; Dorothy Thompson, “Women and Freedom,”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December 16, 1935, 155; James MacGregor Burns, *Roosevelt: The Lion and the Fox* (New York, 1956), 264-88; Rosenman, ed., *Public Papers*, III, 422; VI, 122-23; VII, 232-34, 246-47; Howard Zinn, ed., *New Deal Thoughts* (Indianapolis, 1966), 121-22.

治上的阶级划分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更为明显和完整。对自由的不同的定义因而也尖锐地对立起来。《新共和》杂志的主编乔治·索尔写道,美国人遇到了“两套对立的自由概念的体系”,反映出“两个对立的人群的不同需要与目的”。一种是“为私营企业”自由服务的陈词滥调,另一种是以“一种对财富平等的分享”为基础的“社会化的自由”。

如果罗斯福启用这个词来支持新政,“自由”——这个词在镀金时代的本义是指有限政府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变成了他的对手的战斗口号。从富有的保守派到“民粹主义者”库格林神父,他们对新政的主要批评集中在新政限制了美国自由这一点上。1934年,当保守的商人和政客组织起来动员反对新政的力量时,他们把自己组织称为“美国自由联盟”。国会共和党反对派的领袖人物之一罗伯特·塔夫脱也指责罗斯福在一种“改进穷人处境”的思想的误导下,以牺牲“个人自由”方式,把美国带向共产主义的道路。逐渐地,反对新政的力量团结在“企业自由”的旗帜下,不光反对联邦政府对经济进行归化,也反对联邦政府针对就业问题制定任何规章制度。<sup>①</sup>

随着30年代的展开,新政反对者对自由语言的使用注入了越来越大的激情。他们相信,新政对个人自由的威胁已达到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赫伯特·胡佛对其继任者的抨击更为猛烈,批评罗斯福威胁了“那些最根本的美国自由”。胡佛认为自由意味着为那些有事业心的人提供不受限制的经济机会。追求经济安全不是自由的内容,而只是将美国人变成了依靠政府的“懒惰的寄生虫”而已。在他的余生,胡佛继续把自己称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强调,这个字已经“被污染了,原来的本义已经被强奸了”。《纽约时报》报

① Richard Oestereich, "Urban Working-Class Political Behavior and Theories of American Electoral Politics, 1870-1940,"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4 (March 1988), 1264, 1283; George Soule, *The Future of Liberty* (New York, 1936), 53-54, 118-20, 149-50; Ronald D. Rotunda,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Liberalism as Word and Symbol* (Iowa City, 1986), 15-17, 55-64; Russell Kirk and James McClellan, *The Political Principles of Robert A. Taft* (New York, 1967), 34-36; W.J. Cameron, "Industrial Freedom,"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December 1, 1938, 122; Milton Derber, *The American Idea of Industrial Democracy, 1865-1965* (Urbana, 1970), 357.

道说,1936年总统大选的中心问题是争夺对“自由思想”的主导权。反对新政的力量为后来那种反政府干预的保守主义思潮的生长蔓延播下了种子。这种思想支持自由市场,反对福利国家。但是,如同罗斯福以压制多数赢得连任的事实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在1936年时都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自由必须包含由政府保证的经济安全。<sup>①</sup>

罗斯福连任后一年之内,联邦最高法院对自由内容上这种划时代意义的转向予以了承认。早些时候,最高法院曾以契约自由和州权为名,否定了大大小小的一些新政立法。1937年,最高法院却来了一个令人惊诧的向后转,在相当程度上,这也是受到罗斯福高票连任的胜利和他企图用对新政有同情心的法官来“改组”最高法院的计划(此计划遭到国会的否定)所产生的影响的结果。最高法院以一项维护州最低工资法的合宪性开始,对州和联邦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表示出一种引人注目的、全新的捍卫态度。在随后的决定中,它又肯定了联邦政府管理工资、工时、童工、农产品和经济生活的其他若干方面的权力。在领导这场在新的司法意义上对自由进行定义的运动时,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指出,“契约自由”这个词没有出现在宪法中;但他继续说,“自由”却是在宪法中出现的,这就要求“法律的保护,来反对那些威胁人民的健康、安全、道德和福利”的邪恶。<sup>②</sup>

罗斯福把第二次新政,尤其是社会保障,构想成是一种对自由内容的扩展,即把向范围更为广泛的需要帮助的美国人群体——包括失业者、老年人和没有自立能力的人在内——提供政府帮助作为一种普遍的公民权利,而不是  
206 将其当作一种慈善事业或一种特权。根据弗朗西丝·珀金斯的观点,罗斯福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广泛的、包容性强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供给制度,保证每个美国人都能得到某种形式的经济保障。但在实施过程中,新政的措施远未

① Herbert Hoover, "Holy Crusade for Liberty,"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June 15, 1936, 570-73; Herbert Hoover, *Further Addresses Upon the American Road* (New York, 1940), 7; Green, *Shaping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121.

② William E. Leuchtenberg, *The Supreme Court Reborn: The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in the Age of Roosevelt* (New York, 1995), 216-23; Rudolph J. R. Peritz, *Competition Policy in America, 1888-1992* (New York, 1996), 163.



惠顾到所有的人。政治现实——尤其是北方城市政治机器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和南部黑人在政治上无选举权的现实——极有力地左右了新政立法的制定过程。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两级式的体制,这种体制对一部分美国人——主要是白人和男性——提供了非常慷慨的、全国性的福利,但对其他美国人提供的福利却相当地少,有的人甚至什么福利也没有得到。

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包括了一系列项目,它有不同的结构,并针对不同的目标人群。该法最慷慨的部分——即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部分——以自动的、不附带任何依赖性污名的方式提供资助。社会保障计划将福利与合格的工资工人所缴纳的税收联系起来,使政府提供的资助变成了一种公民的权利,而不是一种慈善行为。所得税的递减方式非常严厉,但罗斯福相信,这些税收将使纳税人获得“一种法律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回收他们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的权利”,而未来任何一届国会都不能取消这种权利。但这种与工资制工作相联系的福利计划将大多数妇女排除在外,也没有包括农业、家庭服务行业和各种零散性质的工人,这种排斥使有工作的黑人中大多数人没有得到社会保障计划的保护。

社会保障也包括公共资助的项目,这些项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缺乏自主能力的孩子和贫困老人的资助。这些资助项目对所有的美国人开放,不分种族,只要他们通过了对申请补助者进行的经济情况调查,都可得到。但这些项目将福利的标准定得极低,而且授权各州来决定这些受资助者的资格,这使得有些地方将申请人的道德行为也作为这种标准的一部分。这样做的结果之一是,公共资助计划在实施中出现了在分配福利方面的普遍性歧视。由于这些受资助者不缴纳社会保障税,他们很快就背上了依靠政府发放的救济而生存的屈辱性污名。这两套计划之间的沟壑在1939年加大了,那一年,那些为一般性公共救济计划覆盖的男性工人的妻子、老年寡妇和未成年子女被转移至社会保障系统中,这样,单身母亲和非白人的穷人就成了后来所谓的“福利”计划所覆盖的人中的大多数。<sup>①</sup>

<sup>①</sup> Frances Perkins, *The Roosevelt I Knew* (New York, 1946), 282-83; Gordon,

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是为了减轻贫困和经济无保障而设计的,但它却建立了随后半个世纪联邦政府社会政策的关键要素。从这个计划开始,性别和种族的界限就界定了经济自由的新定义。白人男性和部分女性工人享有与非白人和贫困妇女不同的保障和福利计划。这些计划的排斥性和包容性反映出盛行的社会形态和政治现实。大萧条促使许多已婚妇女提出,她们要退出劳动力市场,以便让失业的男人有机会找到就业机会。事实上,许多州和地方政府禁止雇佣那些丈夫已经有一份“生计工资”的妇女,从银行到州立学校的雇主们都采取措施,禁止雇佣妇女。尽管产联也在组织妇女工人,但它同时也支持家庭工资的传统。一位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副主席说,“那些丈夫有工作的工作妇女应被禁止进入工业领域。”社会保障法还将一种流行观念体制化了,这种观念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丈夫是一家之主和家庭经济的供给者,而妻子只是一个家庭妇女。在社会保障体系中,那些仍以家庭服务为职业的大批妇女没有享受到任何福利。“那些最需要保护的人完全被忽略了,”一位家庭服务业工人的妹妹对劳工部长珀金斯抱怨道。“谁去管过那些在私人家庭和私立机构中工作的穷苦帮工佣人们?你为他们做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做。”<sup>①</sup>

但更令人注目的是所谓“坚固的南部”如何施加影响,将新政福利国家变成了一种白人美国人的权利。罗斯福虽然声称新政的普遍性,但真正提出广泛全面的覆盖面是政治上的左派和黑人组织。代表明尼苏达的农工党的国会议员欧内斯特·伦丁在1935年曾提出一个法案,希望建立一个由联邦控制的体制,向所有种类的工人提供老年、失业和健康方面的福利(疾病是家庭经济

---

*Pitied But Not Entitled*, 3-11, 253-55; Alice Kessler-Harris, “Designing Women and Old Fool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Security Amendments of 1939,” in *U. S. History as Women’s History: New Feminist Essays*, ed., Linda K. Kerber, et al. (Chapel Hill, 1995), 88-106; Frank Freidel, *Franklin D. Roosevelt: A Rendezvous with Destiny* (Boston, 1990), 150; Gwendolyn Mink, *The Wages of Motherhood: Inequality in the Welfare State, 1917-1942* (Ithaca, 1995).

① Alice Kessler-Harris, *Out to Work: A History of Wage-Earning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82), 250-72; Nancy F. Gabin, *Feminism in the Labor Movement: Women and the United Auto Workers, 1935-1975* (Ithaca, 1990), 36-37; Mink, *Wages of Motherhood*, 126-33; Markowitz and Rosner, *Slaves of the Depression*, 65.

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社会保障计划完全忽略了这个因素),并对有未成年子女的单身妇女家庭提供资助。一些黑人组织,如都市联盟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等,担心黑人会长期在“福利”计划中处于不利地位,对伦丁的法案表示了支持。它们不遗余力地展开游说,敦促建立一个能帮助农业和家政工人得到失业和老年福利并能建立起全国性救济标准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不是伦丁的建议,而是社会保障法变成了法律。社会保障法的局限性,如一家名为《匹兹堡信使报》的黑人报纸所抱怨的那样,反映出“南部反动势力根本不能接受黑人得到养老金和补助金的想法”,它们害怕将黑人工人包括在社会保障之内会扰乱南部地区的低工资式的、种族隔离式的劳动力制度。<sup>①</sup>

尽管拥有极大的个人感召力和政治权力,罗斯福更愿意在民主党内的主流权力框架中推行改革。他认为自己无法直接正面挑战南部的民主党势力。在30年代中期,南部民主党人占据了国会一半以上委员会的主席的位置。1938年,当南部议员转向反对新政时(他们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害怕联邦政府对南部事务的继续插手会破坏那里的种族关系秩序),罗斯福曾企图说服选民选举那些愿意配合新政的议员来取代那些与自己唱对台戏的议员。南部那个被硬行斩断(指黑人没有选举权。——译者)的选民队伍却狠狠地回敬了他一下。最后,由于“南部的否决”,非白人的工人被局限在新福利国家中最薄弱、最不慷慨和最易受到伤害的一翼。全国资源计划委员会在1942年非常准确地注意到,由于那些“在相对有利条件下发放资助”的项目将黑人排斥在外,他们被迫不合比例地依靠着“一般性救济”,这项计划通常被大家瞧不上眼。这份报告指出,这种情形无疑让黑人背上了“接受”福利者的污名,福利计划也被扭曲成专门为少数民族设立的计划,从而使这项计划始终处于一种不充足的“资助标准”的地位。<sup>②</sup>

① Gordon, *Pitied But Not Equal*, 236-38, 266-76; Dona C. Hamilton and Charles V. Hamilton, "The Dual Agenda of African American Organizations since the New Deal: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and Civil Right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7 (Fall 1992), 436-42; Robert C. Lieberman, *Shifting the Color Line: Race and the American Welfare State* (New York, 1998); Kessler-Harris, "Designing Women," 103.

② Alan Brinkley, "The New Deal and Southern Politics," in *The New Deal and the*

总的说来,大萧条和新政对黑人来说,有非常矛盾的影响。他们虽受到大萧条最严重的打击,但黑人从联邦救济措施中得到的好处是极不合比例的。尽管罗斯福本人对种族关系或公民权利并没有什么兴趣,但他任命玛丽·麦克劳德·贝休恩——一位杰出的黑人教育家——担任他的少数民族问题顾问,同时还任命了一批黑人担任联邦政府的重要职务。他内阁中的关键成员,包括他的夫人埃莉诺和劳工部长哈罗德·伊基斯,将全国的注意力指向种族隔离、解除黑人选举权以及私刑等非正义行为的问题上。这些发展有力地促进了黑人投票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在黑人可以投票的北部和西部,在1934和1936年的选举中,黑人抛弃他们对林肯党的传统忠诚,转而支持民主党和新政。贝休恩宣称说,一个“新的日子”降临了,当黑人将最终抵达“自由的圣地”。<sup>①</sup>

但那种期盼迅速改变国家的种族制度的希望迅速破灭了。尽管此刻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说运动,但由于南部议员在国会使用冗长演说(filibuster)进行阻挠,国会的一项反对私刑的法律未能得到通过。在联邦救济和公共事务中的就业问题上仍然实施一种公然的歧视性的做法。在南部,许多新政的工程项目拒绝雇佣黑人。“他们把所有的工作都给了白人,什么也没有给我们,”一位密西西比州的黑人居民在1935年给总统写信说。新政开始了南部农业的现代化过程,但黑人和个人租佃者支付了这个过程的大部分账单。成千上万的分租制佃农,因为农业调整局付钱给地主让他们减少棉花生产的面积,从而支持农产品价格回升,但这个计划却将成千上万的分租式佃农赶出了土地。按理说,地主应该与佃户分享联邦资助,但许多地主并不这样做。对于民权的支持与否,最终变成了对自由主义者资格的一种测试。但在30年代,在支持

South, ed., James C. Cobb and Michael V. Namorato (Jackson, 1984), 99-112; Ira Katzenelsco, "Limiting Liberalism: The Southern Veto in Congress, 1933-1950,"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8 (Summer 1993), 284-86; 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 *Security, Work, and Relief Politics* (Washington, DC, 1942), 244-25.

① Walter A. Jackson, *Gunnar Myrdal and America's Conscience* (Chapel Hill, 1990), 5; Cooney, *Balancing Acts*, 120; David Howard-Pitney, *The Afro-American Jeremiad: Appeals for Justice in America* (Philadelphia, 1990), 111.

罗斯福的经济计划与支持反对私刑的立法或将黑人工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来这几者之间,并不存在对应的关系。罗斯福最初并没有对反对私刑法表示支持,与此同时,西奥多·比尔博这位来自密西西比州的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者,却是新政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sup>①</sup>

新政自由的局限性在联邦住房政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项政策有力地加强了种族间的居住隔离状况。拥有自己的家,这是为美国社会广泛享有的一种愿望。“一个人不能称作一个完整和全部的人,”沃尔特·惠特曼在19世纪50年代写道,“除非他拥有一幢房子和一块这所房子立于其上的土地。”尽管在有些方面,租房者比房主“更为自由”一些,在工业化时代,家庭房产的拥有逐渐取代生产资料的拥有,成为衡量经济自由的一种尺度。家庭住房不止是一种投资,也是中产阶级地位和尊严的标志,对于工人们来说,在一个低工资、就业不稳定和专业晋升机会有限的时代,家是一种经济保障的形式。在20世纪早期,为了购房,移民在本族裔的建筑和借贷协会中投资很多。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移民工人中的房产拥有者比例比起本地出生的中产阶级来说高出一大截子。<sup>②</sup>

大萧条摧毁了美国的住房产业。新住宅的建造完全停止了,为房产的拥有提供借贷资金的银行、储贷协会等倒闭了,或为了维持生存,强行收回抵押房屋(仅在1932年就有25万套住房被收押)。1931年,胡佛总统召开了一次关于住

---

① McElvaine, *Down and Out*, 83-84; Kevin Starr, *Endangered Dreams: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California* (New York, 1996), 299; James C. Cobb, *The Most Southern Place on Earth: The Mississippi Delta and the Roots of Regional Identity* (New York, 1992), 188-89; Richard Polenberg, *War and Society: The United States 1941-1945* (Philadelphia, 1972), 98; James T. Patterson, *Congressional Conservatism and the New Deal: The Growth of the Conservative Coalition in Congress, 1933-1939* (Lexington, 1967), 43.

② Kenneth T. Jackson, *Crabgrass Frontier: 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85), 50, 118; Olivier Zunz, *The Changing Face of Inequality: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mmigrants in Detroit, 1880-1920* (Chicago, 1982), 153-253; John Bodnar, et al., *Lives of Their Own: Blacks, Italians, and Poles in Pittsburgh, 1900-1960* (Urbana, 1982), 148-62; Becky M. Nicolaides, "In Search of the Good Life: Community and Politics in Working-Class Los Angeles, 1920-1955,"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3, 30-31.

房建设和住房拥有的讨论会,检讨住房方面的危机。他宣称说,拥有住房是一项对于“国家健康有序”至关重要的“生来具有的权利,”是“进取、独立和自由”精神的象征。胡佛指出,出租式的公寓楼并没有激发出像“家,甜蜜可爱的家”或“在西部的小灰屋”这样的“永恒的民歌”。讨论会透露出关于上百万的都市家庭生活拥挤不堪、肮脏不卫生的贫民窟里,数百万的其他美国人住在风雨飘摇的乡间破屋之中的情况。看起来,光指望私人企业,显然不能解决国家面临的住房危机。<sup>①</sup>

尽管胡佛对联邦经济干预甚为反感,但他的政府却建立起了一个由联邦政府支持的银行,发行住房贷款。但直到新政时期,政府才有计划有规律地进入了住房市场。罗斯福认为,“家庭住房的保障”是一项与“生计的保障和社会  
210 保险的保障”具有同样性质的基本权利。在1933和1934年,他的政府采取了有力的行动,来保护住房所有者不受丧失抵押赎回权的威胁,并刺激新的住房建设。家庭住房所有者贷款公司与联邦住房事务局为数百万项由私营银行支付的长期抵押贷款提供了保险。如同社会保障计划,新政住房政策也代表了一种与过去政府实践的背离。由于联邦住房事务局以及后来的退伍军人事务局的努力,几千万个家庭在经济实力允许的情况下,成为家庭住房所有者。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买一幢独立家庭的住房比租房还要便宜。<sup>②</sup>

同时,也如同社会保障法,住房政策也是由地方官员来实施的,他们建立一种双级式体制,从而更加强化了已经存在的种族界限。许多城镇退出了兴建公共住房的计划,几乎南北所有的城镇都要求公共住房必须实行种族隔离(在德克萨斯州,有些社区资助兴建了三种不同的住房项目——分别提供给白

① Gail Radford, *Modern Housing for America: Policy Struggles in the New Deal Era* (Chicago, 1996), 75-76, 86-87; Constance Perin, *Everything in Its Place: Social Order and Land Use in America* (Princeton, 1977), 72; Hoover in John M. Gries and James Ford, eds., *Housing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Washington, DC, 1932), x-xii.

② Radford, *Modern Housing*, 51-57, 91-104; Rosenman, ed., *Public Papers*, III, 292; Ronald Tobey, et al., "Moving Out and Settling In: Residential Mobility, Home Owning, and the Public Enframing of Citizenship, 1921-1950,"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5 (December 1990), 1395, 1416-18.

人、黑人和墨西哥裔人)。除此之外,联邦住房事务局对那些有种族限制的住房项目契约毫不犹豫地给予保险,它有时甚至会要求住房建设建立类似的限制,同时它坚决拒绝为不实行种族隔离的住宅项目安排资金。住房事务局宣布有一大片区域——大部分在大城市内——没有资格获得该局的贷款。在有的情况下,一条街上只有一户黑人家庭,但住房事务局为此宣布整个一条街都超出了享受联邦抵押贷款保险的范围。这样,在私营银行和房地产公司的歧视性做法之外,联邦政策也是美国住房种族隔离体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住房和其他问题上,新政无疑极大地扩展了美国自由的定义,但并没有触动、甚至可能还加强了阻止普遍享受自由恩惠的种族主义樊篱。<sup>①</sup>

### “一种新的美国观”

如果新政未能摧毁阻止非白人全面参与美国生活的那种不可逾越的界限,30年代里,其他的群体却被吸收到社会的主流群体之中。随着天主教徒和犹太裔美国人在罗斯福政府中占据了显赫的位置,新移民也成为支持罗斯福政府的一支重要选民队伍,新政使族裔多元化成为美国政治中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由于1924年东欧移民的中断,美国本土的电影、连锁店和大众广告开始大量打入各族裔社区,加上各族裔在经济危机中的共同经历,这一切都加速了30年代在这些社区出现的文化同化过程。但在一个已经转化的政治环境中,这个同化过程与前些年由土生居民保护主义者鼓动和公开支持的美国化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对新移民的子女来说,劳工运动和政治活动本身就 211 是一种不同的美国化运动的载体。30年代的实践表明,一个人可以完全地投身于广泛的社会活动和生活,而不必放弃自己的理想和族裔认同。“工会主义就是崇美主义”,成为了产联的一句口号。一位明尼苏达州的矿工在给劳工部长珀金斯的信中,对低工资和管理阶层对工会的敌视态度提出了批评,他说,

<sup>①</sup> Jackson, *Crabgrass Frontier*, 195-226; Carlos A. Schwantes, "Wage Earners and Wealth Makers,"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est*, ed. Clyde A. Milner II, et al. (New York, 1994), 441; Radford, *Modern Housing*, 104-05.

“我虽身在美国,但梅萨比岭(明尼苏达州境内的铁矿藏区之一。——译者)还没有美国化。”<sup>①</sup>

在30年代中期,美国的左派力量第一次在美国历史上发挥了影响国家政治和文化的作用。产联与美国共产党一起成为一个范围广泛的社会和思想运动的焦点,一个协助重新划定美国自由界限的“文化前线”。在大萧条初期,美共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充满内讧的组织,但在30年代,它却得到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壮大。美共的党员数目从未超过十万人,而且还有好几次因该党基本群众的离去而使这个数目变得更少。有的党员在对党感到深深失望之后,突然急转投向了右派势力,有的变成了反共左派,还有的以独立激进分子身份出现,但他们愿意参与与共产党有联系的活动。在美共影响力达到顶峰时,该党激烈的反法西斯主义思想吸引了许多新政自由派的支持,与此同时,该党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回应了大萧条时期广泛认可的一种看法,即大萧条的发生证明了资本主义的破产,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为建立一个更好的未来提供了惟一的综合性前景。杜威并不是约瑟夫·斯大林的支持者,但他指出,自由主义思想必须调整自己的观点,使自己认识到,“个人自由”要求采取有计划的行动“来实现生产力量的社会化”。

但是,美共在当时一度成为广泛民主运动的重心的原因并不在于它的意识形态,而是在于它的生气勃勃的组织和活动能力。美共积极参与了一系列令人难以想像的活动,包括失业者的示威游行、从肯塔基州哈伦县到底特律的汽车工厂的争取产业工会的重要斗争以及复活的争取黑人民权的斗争。这个在组织结构上专制性很强同时与斯大林的苏俄关系如此密切(至少对该党的上层来说如此)的组织,竟然为自由在美国的扩展作出了如此多的贡献,这不能不说是这个时代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故事之一。但那些加入共产党或与之

---

① Thomas Gobel, "Becoming American: Ethnic Workers and the Rise of the CIO," *Labor History*, 29 (Spring 1988), 173-98; Russell A. Kazal, "Revisiting Assimilation: The Rise, Fall, and Reappraisal of a Concept in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0 (April 1995), 438; George J. Sánchez, *Becoming Mexican American: Ethnicity,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Chicano Los Angeles, 1900-1945* (New York, 1993), 249-50; Kazin, *Populist Persuasion*, 143-45; Markowitz and Rosner, *Saves of the Depression*, 97.



进行合作的男男女女,并不只是为了捍卫国外的那个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的国家”,他们是希望在国内建立和巩固工会的力量,反对种族歧视和不公,推动美国生活的民主化。说到底,美共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新式的美国社会主义,而是协助新政自由主义获得动力和生机,使之带有更激进的精神以及一种对崇美主义的更为多元化的理解。<sup>①</sup>

从政治上看,这个称为“人民阵线”的时代——即美共积极努力寻求在自 212 己与自由派、社会主义者、独立的激进改革派之间建立一个拥有广泛基础的推动社会主义的运动——只延续了几年。人民阵线是在 1935 年发起的,但四年后因纳粹德国与苏联签定的互不侵犯合约而崩溃。在这之前,1937 年的莫斯科审判使得许多美共的同盟军,尤其是那些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同盟者,脱离了与党的关系。在这场审判中,苏联许多老牌革命家被指控为西方的间谍或代理人,被处以死刑。但在人民战线时期的顶峰年月,美共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共产党人与教会、学术界和民权组织之间展开了紧密的合作,并在许多地方选举中与民主党密切配合。美国的领袖厄尔·白劳德甚至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sup>②</sup>

左派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共产党以外,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分子都受到它的影响。人民阵线对美国社会的憧憬在文学作品、戏剧、电影和舞蹈中都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而且比那个带给它生命的政治运动存活的时间更长,而类似负责联邦艺术和戏剧项目这样的新政机构则给了它短暂的得以表现的机会。在这个广泛的左翼文化中,社会和经济中的激进主义,而不是对现状的支持,成为界定真正的崇美主义的标准,族裔和种族的多元化成为美

① Michael Denning, *The Cultural Front: The Laboring of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96); Fraser M. Ottanelli,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Depression to World War II* (New Brunswick, 1991); Dewey, *Liberalism*, 88-92; Louis Adamic, *My America* (New York, 1938), 329-30.

② Mark Naison, "Remaking America: Communists and Liberals in the Popular Front," in *New Studies in the Politics and Culture of U.S. Communism*, ed. Michael E. Brown, et al. (New York, 1993), 45-73; Ottanelli, *Communist Party*, 107-28; Judy Kutulas, *The Long War: The Intellectual People's Front and Anti-Stalinism, 1930-1940* (Durham, NC, 1995), 104-07, 144-53, 167-69.

国社会的光荣与骄傲，而“美国生活方式”的内涵是工会主义和社会公民权，而不是对财富的漫无节制的追求。美国“人民”这个概念，早在20年代被李普曼宣判为过时了，许多同代的知识分子也将此看成一种装有慈善扬恶的原教旨主义和粗俗不堪的商业主义之类东西的旧货仓库，但在这个时候，“人民”突然被发掘出来，成为民主品质的象征。无论是博物馆的展览、由公共工程建设局（WPA）资助的壁画等，还是由联邦资助的“人民剧场”，乃至好莱坞的电影，好像都重新发现了美国人民，并将它的定义扩展到新移民和他们的子女，甚至还包括非白人。描写人民的艺术——如多萝西娅·兰格拍摄的关于背井离乡的流民和分租式农民的照片、《划破大平原的犁》这样的记录片——以及人民的艺术，如民间歌曲、黑人教会圣歌等，都开始被看作是真正的崇美主义的表现形式。画家、雕塑家、摄影师和舞蹈编排家们都积极地担负起描写人民日常生活的创作，包括农民和都市居民的工作生活和休闲行动等。“我们国家的情感灵魂，”罗斯福宣称说，是“普通人的情感与灵魂”。<sup>①</sup>

“一种新的美国观是必要的，”激进的移民劳工路易斯·阿达米克在1938年写道。尽管新政将移民和北方的黑人选民吸引到民主党内来，但新政本身对族裔—文化问题并没有予以明确的重视，新政的主持者显然担心这样的问  
213 题会重新引发20年代那种分裂斗争。美国的力量在于她具有的多元化和容忍精神、对平等的热爱、对族裔偏见和阶级特权的否定，对这种思想在30年代直接正面地进行发扬光大的，不是民主党的主流派，而是人民阵线。产联把自己描述成为了共同利益而抛开偏见的普通美国人的代表，它竭力推动族裔和种族包容性。产联与劳联实行的排他性工会主义一刀两断，将文化多元化主义——一个过去只与兰道夫·伯恩尼和霍勒斯·卡伦这样的知识分子有关的

---

① Robert Cantell, *When We Were Good: The Folk Revival* (Cambridge, MA, 1996), 92-100; William Stott, *Documentary Expression and Thirties America* (New York, 1973); Warren I. Susman, *Culture as Histo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84), 153-57, 205; Roosevelt in Bruce I. Bustard, *A New Deal for the Arts* (Washington, DC, 1997), 21, 49.

思想,或与用以捍卫族裔和天主教居住区的口号——变成了一个群众运动的信念。美国共产党为本地出生的新教激进分子、黑人和新移民(尤其是犹太人)提供了汇合的场所,美共坚持强调,种族与民族偏见与这个国家的民主传统是不相称的。加入共产党本身就是一条走向文化同化的途径。那些在族裔社区长大的第二代新移民通过党的活动,接触到美国本土的区域和民间文化;同时,通过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自修,也接触到一个更广泛的都市文化。住在纽约市曼哈顿下东区的犹太青年不再光顾意第绪语剧院,而热心于现代舞蹈、立体主义画派以及易卜生和奥尼尔的剧目,这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美共教育的结果。<sup>①</sup>

后来左翼批评家们对人民阵线颇有微辞,认为它不应该对罗斯福、民主党和国家政府表现一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忠诚,不应该对所有的美国事物表现出一种充满小资情调的欢呼与歌颂。从随后来临的冷战的视角来看,共产党称自己是“杰斐逊、潘恩、杰克逊和林肯传统的继承者”,的确充满讽刺意味。1937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甚至组织了一场纪念保罗·里维尔夜奔报警的活动,而且斥责“美国革命之女”组织竟然没有为此举行纪念活动。但人民阵线文化也同时帮助传播了对美国的过去和现实的批判性研究。共产党人历史学家写出了开创性的黑人和劳工研究著作——这些领域为主流大学视而不见——为美国的过去描述了一幅并不那么令人赏心悦目的图画。玛莎·格兰姆编导的现代舞蹈的杰作,《美国文献》(1938年)是人民阵线文化的杰出代表,它强调美国的民俗传统和多族裔的种族传统,对美国历史的表现以独立宣言和葛底斯堡演讲为中心。但格兰姆没有忽略那些讲述者称为“我们应感到羞耻的事情”,包括印第安人的流离失所和失业者的困境。面对克雷维克的老问题:“谁是美国人?”格兰姆回答说:事实上,不光中产阶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而且黑人、移民和工人阶级都是美国人。厄尔·罗宾逊的“美国民谣”是人民阵线文化最精美绝伦的表现,它充分表现了美国社会中的宗教、种族和族裔

---

<sup>①</sup> Academic, *My America*, 218; Naison, “Remaking America,” 45-48; Denning, *Cultural Front*, 9; Cohen, *Making a New Deal*, 333-41.

214 的多元化,这组曲子风靡全国,并在 1940 年的共和党代表大会上演奏。<sup>①</sup>

《美国民歌》的其中一个版本是由著名的黑人演员和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演唱的,这个版本使《美国民歌》跃居当周歌曲排行榜的榜首,这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为人民阵线文化远远超越新政政治的地方,正是在于它猛烈地谴责和抨击了美国社会中的种族主义思想和实践,它认为种族主义与崇美主义是互不相容的,在 30 年代,全美犹太人委员会和全国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联合会等组织积极致力于推动族裔和宗教宽容的精神。但无论是在哈莱姆,还是在东洛杉矶,共产党是这一时代惟一主要的、将反对种族主义作为头等重要任务的白人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首席法律战略家查尔斯·H. 休士顿说“共产党人迫使所有想成为黑人领袖的人必须寸步不让地主张黑人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完全平等。”

美共的影响也波及到南部。在那里,美共帮助建立了南部人类福利同盟。这个同盟创立于 1938 年,它召集了一批出生于南部的新一代激进改革主义者——新政的拥护者、黑人激进活动家、分租式佃农工会的组织者以及其他劳工领袖,甚至还有少数几个民选官员——他们在一起共同为工会的合法化、失业救济制度的建立和树立种族正义而工作。国际劳工保卫组织起源于一战后保卫公民自由的斗争,但深受共产党的影响。它动员起群众,为那些受困于种族主义阴影笼罩下的刑事犯罪程序之中的黑人嫌疑人提供支持。在斯格茨博诺案件中,九名年轻的黑人因被指控犯了强奸罪,在阿拉巴马州未经正常程序而被判罪,国际劳工保卫组织将这个案件变成了一桩著名的国际事件。尽管指控“斯格茨博诺少年们”的证据存在明显的不实部分,但阿拉巴马州当局在

<sup>①</sup> Denning, *Cultural Front*, 116-17; Paul Buhle, "Themes in American Jewish Radicalism," in *The Immigrant Left in the United States*, ed. Paul Buhle and Dan Georgakis (Albany, 1996), 99; Ottanelli, *Communist Party*, 121-24; Elizabeth Fones-Wolf, "Industrial Unionism and Labor Movement Culture in Depression-Era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109 (January 1985), 8-16; Peter Novick, *The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New York, 1988), 225-26; Ellen Graff, *Stepping Left: Dance and Politics in New York City, 1928-1942* (Durham, NC, 1997), 127; Cantell, *When We Were Good*, 106. :

30年代三次对他们进行了审判,并三次将他们判为有罪。前两次判罪决定被联邦最高法院推翻。最高法院的这些判决建立了一批扩展了的关于公民自由定义的法律原则,其中包括:犯罪嫌疑人拥有要求得到有效的律师辩护的宪法权利以及州不能在体制上将黑人排除在陪审团成员之外。(第三次判罪决定没有受到质疑,结果导致五名黑人少年的长期监禁。)<sup>①</sup>

在全国各地,尽管白人工人为了保住自己对技术工种和晋升机会的传统垄断,对黑人工人加入工会进行了相当顽强的抵制,但产联,尤其是那些受到共产党影响的工会,却欢迎黑人工人加入工会,并主张通过反对私刑的法律,恢复南部黑人的选举权。全国产联第一次将大量的黑人工人吸收进到美国劳工运动中来。大萧条给黑人社区所带来的严重影响使得保证黑人群众的生存<sup>215</sup>成为黑人组织的首要任务。在这种气氛和背景下,许多黑人工人尽管因为过去遭到排斥而对工会抱有敌意,此刻对产联组织黑人工人的努力表示了极为热情的回应。工会不仅承诺保证工人获得较高工资,而且要为工人争取在工厂的尊严,以及终止那种经常为带种族主义偏见的工头们所施用的任意性权力。从他们自己的亲身历史经历中,黑人们深深懂得产联兴起的原因。A. 菲利普·伦道夫是车站搬运工工会的主席,也是这时期最著名的黑人工运领袖。他说,组织工会是“黑人解放未完成的任务”的一部分。孟菲斯城的一位白人产联工会组织者埃德·麦克雷报告说,要使黑人懂得为什么有必要组织工会并不困难,“因为他们本身体验到的压迫和所处的境地,向黑人解释这个问题是非常容易的,这是一个关系到自由的问题。”<sup>②</sup>

人民阵线公共文化的另一个核心内容是发动群众和各种力量,争取公民

① Naison, "Remaking America," 60-62; Stuart Svonkin, *Jews Against Prejudice: American Jews and the Fight for Civil Liberties* (New York, 1997), 11-16; Patricia Sullivan, *Days of Hope: Race and Democracy in the New Deal Era* (Chapel Hill, 1996), 85, 97-108; Sánchez, *Becoming Mexican American*, 229-43; Charles H. Martin, "The Rise and Fall of Popular Front Liberalism in the South: The Southern Conference for Human Welfare, 1938-1948," *Perspectives on the American South*, 3 (1985), 119-22; Dan T. Charter, *Scottsboro: A Tragedy of the American South* (Baton Rouge, 1969).

② Kazin, *Populist Persuasion*, 147-48; Beth Bates, "'The Unfinished Task of Emancipation': Protest Politics Comes of Age in Black Chicago, 1925-1943," Ph.D. dis-

自由,尤其是劳工要求成立组织的权利。产联工会争取权利的斗争曾遭遇到地方政府对言论自由的广泛限制,以及来自私家警察与公共警察势力的压制。当那些直接攻击南部佃农工会和北部工业社区的产联工会的大量暴力事件在全国广泛报道后,劳工的权利迅速上升为公民自由讨论中的一个中心议题。全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在20年代时主要的目标是反对政府的压制和迫害,但在1934年时,该组织得出结论说,那些“财富的主人们”与公共权威一样也对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造成了更大的威胁。“当今为公民自由的斗争”——一家名为《社会行动》的左翼报刊宣称道,“是一场租佃制农民和产业工人为争取经济解放和保障的斗争。”从1936年开始,由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小罗伯特·M. 拉福莱特主持的一个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举行调查听证,揭露了为雇主用来反对工会运动的大量手段,包括雇用大批的密探和私家警察队伍。工人们“没有任何自由,”一位在密执安州萨吉诺通用汽车公司的雇员在给拉福莱特小组委员会的信中写道。当加利福尼亚州棉农和生菜农工以及罐头厂的工人举行罢工时,他们遭到了大量的暴力镇压,拉福莱特小组委员会的报告说,这种情形使加州看上去“更像一个法西斯式的欧洲专制国家,而不像美国的一部分”。<sup>①</sup>

劳工的激进运动和美共在全国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努力,使人们对公民自由的理解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以前公民自由的概念是指公民个人的权利必须不受政府的侵犯,现在这个概念扩展为公民言论和集会自由权也不得受到私  
 216 有性集权的侵犯。这种转变的结果之一是,联邦政府不仅正开始成为经济安全的保障者,同时也成为言论表达自由的保护者。瓦格纳法对雇主反对工会的活动进行了严格限制,并明确无误地确认了工会成员集会和组织的权利。一位年轻的社会学家戴维·赖斯曼在1942年观察到,瓦格纳法是“我们时代公

---

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7; Michael K. Honey, *Southern Labor and Black Civil Rights: Organizing Memphis Worker* (Urbana, 1993), 117-38.

① Denning, *Cultural Front*, 13; Michael J. Klarman, "Rethinking the Civi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Revolutions," *Virginia Law Review*, 82 (February 1996), 39-42; Jerold S. Auerbach, *Labor and Liberty: The La Follette Committee and the New Deal* (Indianapolis, 1966), 1-11, 24-27, 75, 103-07; Starr, *Endangered Dreams*, 268-69.

民自由的最基本的支柱”之一。

然而对于言论自由未来发展更有预示作用的是最高法院的作用。最高法院刚刚放弃了自己对经济立法的“监察官”角色,现在又开始进入到扩展自己在公民自由问题上的权威的轨道上。大法官们将经济问题的判断让位于立法机关,但坚持认为对思想和表达自由的宪法保护是民主政府的基础,是“几乎所有其他自由形式”的基础,因此法院应该予以特殊的保护。这样,公民自由取代契约自由成为自由的基础。1937年,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以言论自由原则为理由,推翻了对监禁在佐治亚州的一位名叫安杰洛·赫恩登的美共组织者的判罪。三年后,他们又否定了阿拉巴马州一项禁止工人在劳资争执中组成纠察线的法律。自1937年起,用大法官们的话来说,被推翻的州和联邦的法律大多数都属于那种损害公民自由的法律。<sup>①</sup>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公民自由成为新政对自由理解的中心内容。1939年,联邦总检察长弗兰克·莫菲在司法部建立一个公民自由处。莫菲在 217 给总统的报告中写到,“在我们历史上,本部将首次把全部工作的重心用于保护本国自由的恩惠的工作上。”1941年,联邦政府大张旗鼓地隆重庆祝了权利法案150周年的纪念日。罗斯福说,权利法案代表了“自由的人民所拥有的自由选择权中包含的种种自由”。但是这种对言论和思想自由的新重视并不是普遍存在的。1938年,众议院建立了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对美国不忠诚的行为和活动。该委员会对“非美”一词的定义非常广泛,包括共产党人、激进劳工分子以及民主党内的左翼分子在内——总而言之,就是那些代表人民阵线的力量——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活动导致了一批联邦雇员背上颠覆罪名,而遭到解雇。两年后,国会实施史密斯法,该法将鼓吹推翻政府的言行划为联邦罪。在州一级,对那些非正统的观点也进行了同样的打击。纽约立

<sup>①</sup> Auerbach, *Labor and Liberty*, 210-13; David Riesman, "Civil Liberties in a Period of Transition," in *Public Policy*, ed. C. J. Freidrich and Edward S. Mason (Cambridge, MA, 1942), 78-81; Henry J. Abraham, *Freedom and the Court: Civil Rights and Libe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5th ed. (New York, 1988), 7-25; Peritz, *Competition Policy*, 161-64; Mark A. Graber, *Transforming Free Speech: The Ambiguous Legacy of Civil Libertarianism* (Berkeley, 1991), 156.

民自由的最基本的支柱”之一。

然而对于言论自由未来发展更有预示作用的是最高法院的作用。最高法院刚刚放弃了自己对经济立法的“监察官”角色,现在又开始进入到扩展自己在公民自由问题上的权威的轨道上。大法官们将经济问题的判断让位于立法机关,但坚持认为对思想和表达自由的宪法保护是民主政府的基础,是“几乎所有其他自由形式”的基础,因此法院应该予以特殊的保护。这样,公民自由取代契约自由成为自由的基础。1937年,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以言论自由原则为理由,推翻了对监禁在佐治亚州的一位名叫安杰洛·赫恩登的美共组织者的判罪。三年后,他们又否定了阿拉巴马州一项禁止工人在劳资争执中组成纠察线的法律。自1937年起,用大法官们的话来说,被推翻的州和联邦的法律大多数都属于那种损害公民自由的法律。<sup>①</sup>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公民自由成为新政对自由理解的中心内容。1939年,联邦总检察长弗兰克·莫菲在司法部建立一个公民自由处。莫菲在 217 给总统的报告中写到,“在我们历史上,本部将首次把全部工作的重心用于保护本国自由的恩惠的工作上。”1941年,联邦政府大张旗鼓地隆重庆祝了权利法案150周年的纪念日。罗斯福说,权利法案代表了“自由的人民所拥有的自由选择权中包含的种种自由”。但是这种对言论和思想自由的新重视并不是普遍存在的。1938年,众议院建立了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对美国不忠诚的行为和活动。该委员会对“非美”一词的定义非常广泛,包括共产党人、激进劳工分子以及民主党内的左翼分子在内——总而言之,就是那些代表人民阵线的力量——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活动导致了一批联邦雇员背上颠覆罪名,而遭到解雇。两年后,国会实施史密斯法,该法将鼓吹推翻政府的言行划为联邦罪。在州一级,对那些非正统的观点也进行了同样的打击。纽约立

<sup>①</sup> Auerbach, *Labor and Liberty*, 210-13; David Riesman, "Civil Liberties in a Period of Transition," in *Public Policy*, ed. C. J. Freidrich and Edward S. Mason (Cambridge, MA, 1942), 78-81; Henry J. Abraham, *Freedom and the Court: Civil Rights and Libe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5th ed. (New York, 1988), 7-25; Peritz, *Competition Policy*, 161-64; Mark A. Graber, *Transforming Free Speech: The Ambiguous Legacy of Civil Libertarianism* (Berkeley, 1991), 156.



法机构的拉普—库代尔委员会就对纽约市大专院校中的所谓“颠覆活动”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听证调查活动,调查结果导致该系统中大约 60 位教员因被指控为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而被解雇。<sup>①</sup>

在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时代,新政已经达到了顶峰,并开始走向衰落。1938 年秋,面对严重的经济衰退,选民们不仅对罗斯福清除南部保守势力的努力嗤之以鼻,而且还加强了共和党在国会中的力量。罗斯福政府的注意力和精力也逐渐加速转向,集中于聚集在欧洲上空的暴风雨之上。即便是在 1941 年 12 月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赢得战争博士”(这是用来指称罗斯福著名的短语)已经取代了“新政博士”。但是,尽管左派力量在华盛顿的影响减退了,但人民阵线所带来的崇美主义思想的影响却成为官方的美国社会观,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扩散。在第二次大战中,新移民将完全转变成为忠诚的族裔美国人,美国人缺乏自由这个问题将自重建时期起,第一次在全国政治议程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自由将成为美国组织和鼓动反法西斯力量的战斗口号。<sup>②</sup>

---

① Auerback, *Labor and Liberty*, 205-08; Samuel Walker, *In Defense of American Liberties: A History of the ACLU* (New York, 1990), 125-34; Michael Kammen, *A Machine That Would Go of Itself: The Constitution i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1987), 336-39; Alan Brinkley, *The End of Reform: New Deal Liberalism in Recession and War* (New York, 1995), 140-41.

② Patterson, *Congressional Conservatism*, 221-13, 236-37, 323-30; Fraser, “‘Labor Question’,” 75; John W. Jeffries, *Wartime America: The World War II Home Front* (Chicago, 1996), 159.

## 第十章 为自由而战

没有多少事件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生活。从“阳光地带”（西起加利福尼亚南部，东至弗吉尼亚，南至佛罗里达的西南部地区。——译者）的发展到当代黑人争取平等的斗争，几乎所有与战后出现的和我们休戚相关的经济趋势和社会运动都起源于二战。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时期的组织和动员扩大了政府的规模和职能范围，但是二战时期政府功能的扩展是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进行的。随着战时生产最终克服了经济大萧条，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失业几乎完全消失了。工业生产对劳动力的永无止境的要求，使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北部和西部的工业城市，这种人口流动永久性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地理。1940至1947年间，有2500万美国人——也就是相当于五分之一多的全国人口——四处流动，寻找新的经济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一个世界强国，并在由大公司主导的商业界和军事化的政府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形成了后来被艾森豪威尔总统所称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它在战争结束后，将长期地存在下去。<sup>①</sup>

与结果模棱两可的朝鲜战争以及围绕越战而引起的前所未有的分歧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人们的记忆中是一场“好战争”，是一个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共同追求一个不容置疑的高尚目标的时刻。但如同在任何战争中一样，要人们接受牺牲，必须对公众展开有意识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到40年代，

---

<sup>①</sup> John W. Jeffries, *Wartime America: The World War II Home Front* (Chicago, 1996), 4-5; Marilyn S. Johnson, *The Second Gold Rush: Oakland and the East Bay in World War II* (Berkeley, 1993), 2-9; Alan Brinkley, "World War II and American Liberalism," in *The War in American Culture: Society and Consciousness During World War II*, ed. Lewis A. Erenberg and Susan B. Hirsch (Chicago, 1996), 317.

## 第十章 为自由而战

没有多少事件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生活。从“阳光地带”（西起加利福尼亚南部，东至弗吉尼亚，南至佛罗里达的西南部地区。——译者）的发展到当代黑人争取平等的斗争，几乎所有与战后出现的和我们休戚相关的经济趋势和社会运动都起源于二战。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时期的组织和动员扩大了政府的规模和职能范围，但是二战时期政府功能的扩展是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进行的。随着战时生产最终克服了经济大萧条，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失业几乎完全消失了。工业生产对劳动力的永无止境的要求，使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北部和西部的工业城市，这种人口流动永久性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地理。1940至1947年间，有2500万美国人——也就是相当于五分之一多的全国人口——四处流动，寻找新的经济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一个世界强国，并在由大公司主导的商业界和军事化的政府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形成了后来被艾森豪威尔总统所称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它在战争结束后，将长期地存在下去。<sup>①</sup>

与结果模棱两可的朝鲜战争以及围绕越战而引起的前所未有的分歧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人们的记忆中是一场“好战争”，是一个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共同追求一个不容置疑的高尚目标的时刻。但如同在任何战争中一样，要人们接受牺牲，必须对公众展开有意识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到40年代，

---

<sup>①</sup> John W. Jeffries, *Wartime America: The World War II Home Front* (Chicago, 1996), 4-5; Marilyn S. Johnson, *The Second Gold Rush: Oakland and the East Bay in World War II* (Berkeley, 1993), 2-9; Alan Brinkley, "World War II and American Liberalism," in *The War in American Culture: Society and Consciousness During World War II*, ed. Lewis A. Erenberg and Susan B. Hirsch (Chicago, 1996), 317.

221 “要想推销商品,我们必须首先推销文字”成了广告制造业的金科玉律。当然,文字也帮助“推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斗口号是民主,那自由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口号。这个口号回应了从纳粹统治下逃亡出来的难民对“自由欧洲”的要求,就“热爱自由的国家”之间的联盟进行了讨论,并对世界上的“自由世界”和法西斯制度下的奴役制作出了语言上的划分。战时动员利用和借助了那些深植于美国历史经验之中的价值观。美国高举一束自由的火炬。置身于一个受到专制迫害的世界之中,这样的画面可以追溯到美国革命时期。而将政治世界划分成半自由制半奴役制的做法更是使人想起内战那场不可压制的战争以及伟大的解放者。最令人注目的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用“四大自由”将保卫美国的传统与一个普遍存在的、对更好未来的期望联系起来,这个口号后来成为美国参战目的的官方宣言。<sup>①</sup>

## 四大自由

远在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参加二战之前,那些坚信为遏制正在欧洲兴起的法西斯主义浪潮、政府必须出面干预的人就运用了自由的语言。为了唤醒和敦促不甚情愿的美国准备战争,这些主张干预的人竭力推广和宣传了一些后来为战时动员所利用的中心口号。1941年6月,从德国和其他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国家中逃亡出来的难民与美国人一起,组成了自由世界联盟。联盟的宗旨是敦促美国参加反对希特勒的战争。同年,“为自由而战委员会”成立,后来改名为“自由之家”。这个组织自称是“为争取一个自由世界的斗争指引方向的灯塔”。自由之家地位的显赫成员中,包括了大学校长、作家、商人和劳工领袖。它把发生在欧洲的战争看成是一种专制与民主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打败德国,对于保证“人类自由至关重要”。1941年10月,它发起了一场在纽约市麦迪逊花园广场召开的为自由而战的集会。会议结束时,还安排了以“自

<sup>①</sup> Roland Marchand, *Advertising the American Dream: Making Way for Modernity, 1920-1940* (Berkeley, 1985), 20; Daniel T. Rodgers, *Contested Truths, Keywords in American Politics Since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87), 214.

221 “要想推销商品,我们必须首先推销文字”成了广告制造业的金科玉律。当然,文字也帮助“推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斗口号是民主,那自由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口号。这个口号回应了从纳粹统治下逃亡出来的难民对“自由欧洲”的要求,就“热爱自由的国家”之间的联盟进行了讨论,并对世界上的“自由世界”和法西斯制度下的奴役制作出了语言上的划分。战时动员利用和借助了那些深植于美国历史经验之中的价值观。美国高举一束自由的火炬。置身于一个受到专制迫害的世界之中,这样的画面可以追溯到美国革命时期。而将政治世界划分成半自由制半奴役制的做法更是使人想起内战那场不可压制的战争以及伟大的解放者。最令人注目的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用“四大自由”将保卫美国的传统与一个普遍存在的、对更好未来的期望联系起来,这个口号后来成为美国参战目的的官方宣言。<sup>①</sup>

## 四大自由

远在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参加二战之前,那些坚信为遏制正在欧洲兴起的法西斯主义浪潮、政府必须出面干预的人就运用了自由的语言。为了唤醒和敦促不甚情愿的美国准备战争,这些主张干预的人竭力推广和宣传了一些后来为战时动员所利用的中心口号。1941年6月,从德国和其他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国家中逃亡出来的难民与美国人一起,组成了自由世界联盟。联盟的宗旨是敦促美国参加反对希特勒的战争。同年,“为自由而战委员会”成立,后来改名为“自由之家”。这个组织自称是“为争取一个自由世界的斗争指引方向的灯塔”。自由之家地位的显赫成员中,包括了大学校长、作家、商人和劳工领袖。它把发生在欧洲的战争看成是一种专制与民主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打败德国,对于保证“人类自由至关重要”。1941年10月,它发起了一场在纽约市麦迪逊花园广场召开的为自由而战的集会。会议结束时,还安排了以“自

<sup>①</sup> Roland Marchand, *Advertising the American Dream: Making Way for Modernity, 1920-1940* (Berkeley, 1985), 20; Daniel T. Rodgers, *Contested Truths, Keywords in American Politics Since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87), 214.

由真好”为名的娱乐节目演出,节目的名称看上去与这场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联合演出并不十分相称。演出以一项向德国宣战的要求而结束。<sup>①</sup>

然而,真正制定美国战时战斗口号的是罗斯福本人,他以保卫自由为理由,呼吁美国对遭到围困的英国提供不断扩大的军事援助。1940年,总统曾  
223 试图使用不同的方式来形容世界面临的危机,但在1941年1月6日的国情咨文中,他最终采用了精湛的语言,表述了一个基于四项“人类最根本的自由”之上的世界秩序: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他信誓旦旦地宣称,在未来,这四项自由将为“世界各地”的人民所享有。<sup>②</sup>

尽管咨文的大部分是由总统的写作班子完成的,但关于四大自由的那一段结束语却是由罗斯福自己动笔写成的。直到他在1945年去世时,也就是同盟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他一直把这场世界范围内的军事斗争描述成为一场“介于人类自由与人类奴役之间”的战争。在1941年8月,罗斯福谈到美国人必须肩负起保卫“伟大的自由,反对专制主义的黑暗力量对自由的围剿和攻击,反对它对世界的奴役”。四个月后,当美国进入战争后,四大自由成了罗斯福最钟爱的表述同盟国战争目的语言。在不同的场合,他将四大自由与圣经中的十诫、英国的大宪章和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进行类比。在1942年的一次无线广播讲话中,他宣称道,四大自由是“所有信仰、所有种族、无论在何处生活的人都应拥有的权利”的具体体现,它们显示了“我们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敌人之间存在着的关键区别”。<sup>③</sup>

因为他必须在这场规模巨大的斗争中保证全国的团结一致,罗斯福选择了自由作为一种纲领性的描述。他很少去讨论权力均衡外交之类十分枯燥无

<sup>①</sup> Mark L. Chadwin, *The Hawks of World War II* (Chapel Hill, 1968), v. 69-70, 161-68, 223-28, 275; *The Nation*, September 27, 1941; *Freedom House, 1941-1991* (New York, 1991), 5-9, 21.

<sup>②</sup> Samuel I. Rosenman, *Working with Roosevelt* (New York, 1952), 258-64; James MacGregor Burns, *Roosevelt: The Soldier of Freedom* (New York, 1970), 33-34; Samuel I. Rosenman, ed.,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3 vols. New York, 1938-50), IX, 672.

<sup>③</sup> Rosenman, ed., *Public Papers*, X, 192, 335, xi, 287-88; Burns, *Roosevelt*, 387-88.

由真好”为名的娱乐节目演出,节目的名称看上去与这场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联合演出并不十分相称。演出以一项向德国宣战的要求而结束。<sup>①</sup>

然而,真正制定美国战时战斗口号的是罗斯福本人,他以保卫自由为理由,呼吁美国对遭到围困的英国提供不断扩大的军事援助。1940年,总统曾  
223 试图使用不同的方式来形容世界面临的危机,但在1941年1月6日的国情咨文中,他最终采用了精湛的语言,表述了一个基于四项“人类最根本的自由”之上的世界秩序: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他信誓旦旦地宣称,在未来,这四项自由将为“世界各地”的人民所享有。<sup>②</sup>

尽管咨文的大部分是由总统的写作班子完成的,但关于四大自由的那一段结束语却是由罗斯福自己动笔写成的。直到他在1945年去世时,也就是同盟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他一直把这场世界范围内的军事斗争描述成为一场“介于人类自由与人类奴役之间”的战争。在1941年8月,罗斯福谈到美国人必须肩负起保卫“伟大的自由,反对专制主义的黑暗力量对自由的围剿和攻击,反对它对世界的奴役”。四个月后,当美国进入战争后,四大自由成了罗斯福最钟爱的表述同盟国战争目的语言。在不同的场合,他将四大自由与圣经中的十诫、英国的大宪章和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进行类比。在1942年的一次无线广播讲话中,他宣称道,四大自由是“所有信仰、所有种族、无论在何处生活的人都应拥有的权利”的具体体现,它们显示了“我们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敌人之间存在着的关键区别”。<sup>③</sup>

因为他必须在这场规模巨大的斗争中保证全国的团结一致,罗斯福选择了自由作为一种纲领性的描述。他很少去讨论权力均衡外交之类十分枯燥无

<sup>①</sup> Mark L. Chadwin, *The Hawks of World War II* (Chapel Hill, 1968), v. 69-70, 161-68, 223-28, 275; *The Nation*, September 27, 1941; *Freedom House, 1941-1991* (New York, 1991), 5-9, 21.

<sup>②</sup> Samuel I. Rosenman, *Working with Roosevelt* (New York, 1952), 258-64; James MacGregor Burns, *Roosevelt: The Soldier of Freedom* (New York, 1970), 33-34; Samuel I. Rosenman, ed.,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3 vols. New York, 1938-50), IX, 672.

<sup>③</sup> Rosenman, ed., *Public Papers*, X, 192, 335, xi, 287-88; Burns, *Roosevelt*, 387-88.

味的话题,直到他执政的晚期,他也绝少讨论可能赋予四大自由实质性内容的国内政策等。但是,这四项自由合为一体,却不容质疑地形成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框架。四大自由体现了与新政相关的原则,表明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策是一种深受珍重的美国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值得向世界推广。免于恐惧的自由不光是表达一种对和平的期望,也表达了人民希望在这个明显地失去了控制的世界上追求一种普遍安全感的期望。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并不需要更多的解释,尽管在战时,它们越来越多地引起了重视,并被作为将美国与纳粹主义区别开来的最关键特征。这两项自由在四大自由中的显赫位置加速推进了权利法案——尤其是第一条宪法修正案——的颁布,进而成为美国自由的核心内容。1943年,联邦最高法院以第一条宪法修正案为根据,推翻了一项1940年的决定,支持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有权在州立学校拒绝向美国国旗致敬。这项决定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强制性爱国主义的否定,肯定了即便在危机时候,对个人良心的神圣性的保护是美国自由的基石,从而使美国对不受欢迎的少数人的宪法保护与纳粹德国的暴政形成鲜明的对照。<sup>①</sup>

四大自由中最模糊不清的就是免于匮乏的自由,《财富》杂志这样写道。但一位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工人1942年给总统的信中,却把这一自由称为“令人振奋的伟大表述”。这项自由在刚从大萧条中走出的美国人中引起了最为深沉的共鸣。罗斯福最初所指的意思是,消除国际贸易中的障碍。但他很快将这项自由与那些与普通公民有关的经济期望联系起来——保证“美国工人和农场主的生活标准”,保证战后经济大萧条不再发生等。在珍珠港事件前一个月,总统宣布说,“如果没有开明的社会政策,普通人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的。”即便是热情鼓吹无限制的市场资本主义的《财富》杂志,也承认社会对经济安全的要求十分强烈,政府不得不“毫不含糊地”承担“保证就业”和在战后

<sup>①</sup> Frederick F. Siegel, *Troubled Journey: From Pearl Harbor to Ronald Reagan* (New York, 1984), 8; Alan Brinkley, *The End of Reform: New Deal Liberalism in Recession and War* (New York, 1995), 164; Samuel Walker, *In Defense of American Liberties: A History of the ACLU* (New York, 1990), 109-12; Michael J. Klarman, “Rethinking the Civi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Revolutions,” *Virginia Law Review*, 82 (February 1996), 43-44.



建立最低工资工资制的责任,以保障人民免于匮乏的自由。<sup>①</sup>

关于自由的讨论深入到战时美国的各个角落。在二战期间,大量的书籍、传单、广告源源不断地涌现,意在唤起美国人的爱国热情,推销战争股票(“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四大自由的一种象征,”财政部以这样的宣传词来描述战争股票),为战争理想提供具体的内容。《生活》杂志作了一次关于美国历史的调查,结果显示,“历史上的自由理想”是美国人认可的国家传统。艺术家们对以自由为题材而创作充满了热情。1942年雨果·巴林在加利福尼亚的伯班克,为一尊矗立在市政大厅前的巨大的“四大自由”雕塑揭幕。这个作品有许多形象,从印第安人到教皇,被誉为是“太平洋海岸线地区产生的最伟大的艺术作品”。次年,罗伯特·罗素·贝内特谱写创作了一部有四个乐章的交响曲,每一个乐章专门献给一个自由。但是最广泛流传的有关四大自由的创作是由非常受大众喜爱的艺术家和杂志插图大师诺曼·罗克韦尔的画。<sup>②</sup>

“自由(freedom & liberty)这些词”,一份战时广告这样写道,“只有当我们把它们打碎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碎片时,它们才能团结我们。”这句话十分独到地解释了为什么罗克韦尔的画会获得如此成功的秘诀。罗克韦尔的素材来源于他那些佛蒙特州邻居的生活。他将四大自由的内容翻译成四幅生活在美国小镇上的人民的真实生活的画面。每一幅画面都集中表现那些人们毫不费力就可以认出的熟悉的生活情景:一位工人站起来在镇民大会上发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在祈祷;一个家庭在享受感恩节的晚餐;一个母

① “Freedom from Want,” *Fortune*, 26 (October 1942), 126-28; Gerald Markowitz and David Rosner, eds., “Slaves of the Depression”, *Workers’ Letters About Life on the Job* (Ithaca, 1987), 32; Harold F. Gosnell, “Symbols of National Solidarit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23 (September 1942), 160; Warren I. Susman, *Culture as Histo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84), 194; Rosenman, ed., *Public Papers*, X, 184; Burns, *Roosevelt*, 387.

② Lawrence R. Samuel, *Pledging Allegiance: American Identity and the Bond Drive of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1997), 67-68; *Life*, November 10, 1941, 103-13; unidentified newspaper clipping, October 16, 1942, Norman Rockwell Museum;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9, 1943.

建立最低工资工资制的责任,以保障人民免于匮乏的自由。<sup>①</sup>

关于自由的讨论深入到战时美国的各个角落。在二战期间,大量的书籍、传单、广告源源不断地涌现,意在唤起美国人的爱国热情,推销战争股票(“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四大自由的一种象征,”财政部以这样的宣传词来描述战争股票),为战争理想提供具体的内容。《生活》杂志作了一次关于美国历史的调查,结果显示,“历史上的自由理想”是美国人认可的国家传统。艺术家们对以自由为题材而创作充满了热情。1942年雨果·巴林在加利福尼亚的伯班克,为一尊矗立在市政大厅前的巨大的“四大自由”雕塑揭幕。这个作品有许多形象,从印第安人到教皇,被誉为是“太平洋海岸线地区产生的最伟大的艺术作品”。次年,罗伯特·罗素·贝内特谱写创作了一部有四个乐章的交响曲,每一个乐章专门献给一个自由。但是最广泛流传的有关四大自由的创作是由非常受大众喜爱的艺术家和杂志插图大师诺曼·罗克韦尔的画。<sup>②</sup>

“自由(freedom & liberty)这些词”,一份战时广告这样写道,“只有当我们把它们打碎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碎片时,它们才能团结我们。”这句话十分独到地解释了为什么罗克韦尔的画会获得如此成功的秘诀。罗克韦尔的素材来源于他那些佛蒙特州邻居的生活。他将四大自由的内容翻译成四幅生活在美国小镇上的人民的真实生活的画面。每一幅画面都集中表现那些人们毫不费力就可以认出的熟悉的生活情景:一位工人站起来在镇民大会上发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在祈祷;一个家庭在享受感恩节的晚餐;一个母

① “Freedom from Want,” *Fortune*, 26 (October 1942), 126-28; Gerald Markowitz and David Rosner, eds., “Slaves of the Depression”, *Workers’ Letters About Life on the Job* (Ithaca, 1987), 32; Harold F. Gosnell, “Symbols of National Solidarit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23 (September 1942), 160; Warren I. Susman, *Culture as Histo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84), 194; Rosenman, ed., *Public Papers*, X, 184; Burns, *Roosevelt*, 387.

② Lawrence R. Samuel, *Pledging Allegiance: American Identity and the Bond Drive of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C, 1997), 67-68; *Life*, November 10, 1941, 103-13; unidentified newspaper clipping, October 16, 1942, Norman Rockwell Museum;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9, 1943.

亲和父亲守护在一个甜睡的孩子的身旁。这些作品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数百 227 万张复制品销售一空。这些画被视为极其成功的“四大自由战争债券展销”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在全国巡回展出。除了言论自由因描述一种公民的民主行为而成为一个明显的例外之外,其他三幅画都是属于个人权利的范畴,是由个人或在家庭中得以享受的权利。只有一幅画与战争有联系,免于恐惧的自由。在这幅画中,一位父亲拿着一份报纸,报纸的头条标题是关于伦敦被轰炸的消息。

这些画首先在 1943 年的《星期六邮报》中登出,发表时配有短文,强调罗克韦尔所描绘的价值观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价值观,与轴心国的价值观是相对立的。其中的三篇短文是由非常著名的作者写作的,包括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布思·塔金顿和威尔·杜兰特。但对“免于乏匮的自由”一图,杂志编辑部选中了默默无闻的菲律宾籍诗人卡洛斯·巴洛桑的短文。巴洛桑 16 岁时移民美国。他的短文展示了四大自由可以如何激励起人们对于—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的期望,同时也可以唤起人们对罗克韦尔想像中的那种已经逝去的小镇生活的温馨回忆,聊以慰藉心灵。巴洛桑写道,对于那些身处主流社会以外的美国人——移民工人、罐头厂的操作工、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黑人受害者等——来说,自由意味着能有足够的食物,能送孩子上学,能够“分享美国生活的承诺与成果”。<sup>①</sup>

四大自由内涵的模糊性导致了对它们极为不同的解释,这种情形充分反映出由新政所带来的政治上对立和分野仍然十分严峻地存在着。这一点通过战时新闻办公室(OWI)的历史表现出来。战时新闻办公室是 1942 年成立

<sup>①</sup> *Life*, October 12, 1942, 63; Robert B. Westbrook, "Fighting for the American Family: Private Interests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 in World War II," in *The Power of Culture: Critical Essays in American History*, ed. Richard W. Fox and T. Jackson Lears (Chicago, 1993), 202-04, 218-21; Lester C. Olson, "Portraits in Praise of a People: A Rhetorical Analysis of Norman Rockwell's Icons in Franklin Roosevelt's 'Four Freedoms' Campaign,"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69 (February 1983), 15-24; Stuart Murray and James McCabe, eds., *Norman Rockwell's Four Freedoms: Images that Inspire a Nation* (Stockbridge, MA, 1993), 62-91; *Saturday Evening Post*, February 20, 27, March 6, 13, 1943.

亲和父亲守护在一个酣睡的孩子的身旁。这些作品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数百 227 万张复制品销售一空。这些画被视为极其成功的“四大自由战争债券展销”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在全国巡回展出。除了言论自由因描述一种公民的民主行为而成为一个明显的例外之外,其他三幅画都是属于个人权利的范畴,是由个人或在家庭中得以享受的权利。只有一幅画与战争有联系,免于恐惧的自由。在这幅画中,一位父亲拿着一份报纸,报纸的头条标题是关于伦敦被轰炸的消息。

这些画首先在 1943 年的《星期六邮报》中登出,发表时配有短文,强调罗克韦尔所描绘的价值观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价值观,与轴心国的价值观是相对立的。其中的三篇短文是由非常著名的作者写作的,包括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布思·塔金顿和威尔·杜兰特。但对“免于乏匮的自由”一图,杂志编辑部选中了默默无闻的菲律宾籍诗人卡洛斯·巴洛桑的短文。巴洛桑 16 岁时移民美国。他的短文展示了四大自由可以如何激励起人们对于—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的期望,同时也可以唤起人们对罗克韦尔想像中的那种已经逝去的小镇生活的温馨回忆,聊以慰藉心灵。巴洛桑写道,对于那些身处主流社会以外的美国人——移民工人、罐头厂的操作工、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黑人受害者等——来说,自由意味着能有足够的食物,能送孩子上学,能够“分享美国生活的承诺与成果”。<sup>①</sup>

四大自由内涵的模糊性导致了对它们极为不同的解释,这种情形充分反映出由新政所带来的政治上对立和分野仍然十分严峻地存在着。这一点通过战时新闻办公室(OWI)的历史表现出来。战时新闻办公室是 1942 年成立

<sup>①</sup> *Life*, October 12, 1942, 63; Robert B. Westbrook, "Fighting for the American Family: Private Interests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 in World War II," in *The Power of Culture: Critical Essays in American History*, ed. Richard W. Fox and T. Jackson Lears (Chicago, 1993), 202-04, 218-21; Lester C. Olson, "Portraits in Praise of a People: A Rhetorical Analysis of Norman Rockwell's Icons in Franklin Roosevelt's 'Four Freedoms' Campaign,"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69 (February 1983), 15-24; Stuart Murray and James McCabe, eds., *Norman Rockwell's Four Freedoms: Images that Inspire a Nation* (Stockbridge, MA, 1993), 62-91; *Saturday Evening Post*, February 20, 27, March 6, 13, 1943.

的,目的是为了动员和影响公众舆论。战时新闻办公室的写作班子主要由自由派民主党人组成,他们打算将战争定义为一场“争取自由的人民战争”,定义为一次新政思想在全世界范围扩展的机会。他们担心美国人对战争的目的不甚了解或在宣传上出现自相矛盾和不连贯之处,担心公众只是热衷于向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事件讨还血债而不把消灭法西斯看成是战争的目的。战时新闻办公室使用了无线广播、电影、报纸和其他传播媒介来宣传关于战争的意识形态,但与此同时,又小心翼翼地避免重复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那种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战时新闻办公室的出版物批评了前总统胡佛这样的“反动派”,大力宣扬类似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的讲话,韦尔斯称,战后的世界将解决国内外存在的经济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一份战时新闻办公室的小册子说,联邦政府必须承担起“一定的责任,来解决经济问题”,其中还提到了免于匮乏的自由包括了有权得到一个公平工资的工作,有权得到足够的食物、衣物、住房和医疗保障。<sup>①</sup>

这样的宣传自然引起了保守派的愤怒。一位纽约人抱怨说,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固然不错,但免于恐惧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却是“新政的自由”,不是“美国的自由”,因为它们鼓励人人都变成依赖政府的人。参与战时新闻办公室广告制造的主管层对该办公室的活动目标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仅对自由派的言论颇为反感,而且相信,最有效的信息就是反复使用简单明了的口号,这样做也符合广告业的市场智慧的要求。他们主张,自由只需进行推广宣传,不必细加解释。在1943年6月,广告业的人开始当家作主,负责管理文字写作班子,后者中有一部分人辞职不干了,以示抗议,他们指责战时新闻办公室已经为一群“高压推销员所控制,这些人用狡猾的推销术

<sup>①</sup> Richard Polenberg, *One Nation Divisible: Class, Race, and Ethni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38* (New York, 1980), 47; Siegel, *Troubled Journey*, 3-4; Allan M. Winkler, *The Politics of Propaganda: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1942-1945* (New Haven, 1978), 1-6; Jeffries, *Wartime America*, 176; Charles D. Lloyd, "American Society and Values in World War II from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h.D. dissertati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1975, 46-48; Murray and McCabe, eds., *Norman Rockwell's Four Freedoms*, 111.

来取代诚实可靠的信息”。随后不久,因为担心战时新闻办公室以花在战争动员上的同样时间来扩大新政的社会改革计划,国会干脆取消了该办公室在国内进行宣传活动的经费。<sup>①</sup>

战时新闻办公室的命运象征着战时政治总的趋势。在由共和党和南部民主党人组成的保守联盟的把持下,国会虽然没有触动社会保障这样的新政项目,但却将那些被认为是由左派控制的机构,如平民资源保护队、全国青年事务局和公共工程建设局(WPA)统统取消。从第二次新政开始,联邦政府与大商业集团之间的关系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大公司的主管频频访问那些主管战时生产的联邦机构。罗斯福此刻匆匆停止了他对“经济上的保守分子”的批判,对他们提供了大量的金钱刺激——低息贷款、税收惠顾、无风险合同等——来鼓励和推进生产。联邦开支的一大部分实际上都进入100百家最大的公司的腰包中,进一步加强了经济集中化的长期趋势。战时制造业取得的奇迹——那些由美国组装线生产的成千上万架飞机、坦克和装甲车——再加上随着失业的消减所导致的收入的上升,使得在大萧条时期一度身败名裂的公司和商人们又有机会东山再起、恢复名声。<sup>②</sup>

对于劳工阶层来说,二战是一种忧喜参半的经历。绝大多数的工人支持战争,许多人同意产联反复宣传的一种看法,即二战是一场争取自由与民主的进军,是一场“人民战争”,将极有力地扩展国内外经济和政治民主,赋予工人在工业管理中一种重要的发言权。在战时,组织起来的劳工事实上与政府和商业资本家一起签订了一种三方协议,从而使工会会员人数达到了空前的数目。到1945年时,有1500万工人和1/3的非农场劳工都加入了工会,这是美

① Murray and McCabe, eds., *Norman Rockwell's Four Freedoms*, 67; Leila J. Rupp, *Mobilizing Women for War: German and American Propaganda, 1939-1945* (Princeton, 1978), 91-94; Winkler, *The Politics of Propaganda*, 18-19, 27-31; Sydney Weinberg, "What to Tell America: The Writer's Quarrel in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55 (June 1968), 73-89.

② John M. Blum, *V Was for Victory: Politics and American Culture During World War II* (New York, 1976), 118-24; Samuel, *Pledging Allegiance*, 23; Jeffries, *Wartime America*, 5, 44.

国历史上工会会员占劳工总数比例最高的时刻。由于政府对工资和物价的控制、失业的消减和工会的壮大,二战时期明显出现了有利于工人收入的重新分配。但如果劳工在政府中是一个伙伴的话,它只能算是一个资历很浅的小伙伴。它对国会和行政部门的影响力比起新政高潮时期已经大大减小了。<sup>①</sup> 230

在战时新闻办公室消失之后,“推销美国”变成了一桩主要由私营企业控制的活动。在战时广告委员会的严密监视下,私营公司也加入了宣传和推进爱国主义的运动。不消说,与此同时,它们也为自己和它们自己的品牌寻找战后世界中的位置。广告敦促美国人种植胜利的菜园,购买战争股票,防止泄露军事机密,与此同时,也有大量新杂志出版发行,兜售广告者们对自由的定义。广告上并没有直接批判罗斯福,但他们反复提到他忽视了另外一个自由的中心内容——“自由企业”。来自马萨诸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伊迪斯·N. 罗杰斯甚至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要求正式将组织“私营企业的自由”作为“第五大自由”;罗杰斯称,没有这一项自由,“美国总统宣称的”其他“四项自由是毫无意义的”。全国制造业协会与其他公司一起,通过消息的发布、无线电广播节目以及广告,对公众进行宣传轰炸,将战时出现的生产奇迹归功于“自由企业”。全国制造业协会主席罗伯特·盖洛德在1944年吹嘘说:“今天几乎没有一篇演讲不是以赞赏自由企业为开场白的。所有人都为它令人震撼的战时记录而折服。”商业界人士把战后世界描绘成为一个充满消费品的世界,消费者将有可能在丰富众多的选择中得到“选择的自由”,但前提是私营企业家必须要从政府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一个为罗伊尔打字机作的广告说,这场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广告解释说,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加速这一天的到来,即当你再一次走进国内的任何一家商店时,你能买到任何你想买的东西”。当然,战争并没有包含要改变美国体制的意思。“我是为自由而战的,”由纳什—凯

<sup>①</sup> Joshua Freeman, "Delivering the Goods: Industrial Unionism During World War II," *Labor History*, 19 (Fall 1978), 590; Brinkley, *End of Reform*, 201-25; Nelson Lichtenstein, "The Making of the Postwar Working Class: Cultural Pluralism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World War II," *The Historian*, 51 (November 1988), 44-50; Jeffries, *War-time America*, 23, 55-57.

国历史上工会会员占劳工总数比例最高的时刻。由于政府对工资和物价的控制、失业的消减和工会的壮大,二战时期明显出现了有利于工人收入的重新分配。但如果劳工在政府中是一个伙伴的话,它只能算是一个资历很浅的小伙伴。它对国会和行政部门的影响力比起新政高潮时期已经大大减小了。<sup>①</sup> 230

在战时新闻办公室消失之后,“推销美国”变成了一桩主要由私营企业控制的活动。在战时广告委员会的严密监视下,私营公司也加入了宣传和推进爱国主义的运动。不消说,与此同时,它们也为自己和它们自己的品牌寻找战后世界中的位置。广告敦促美国人种植胜利的菜园,购买战争股票,防止泄露军事机密,与此同时,也有大量新杂志出版发行,兜售广告者们对自由的定义。广告上并没有直接批判罗斯福,但他们反复提到他忽视了另外一个自由的中心内容——“自由企业”。来自马萨诸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伊迪斯·N. 罗杰斯甚至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要求正式将组织“私营企业的自由”作为“第五大自由”;罗杰斯称,没有这一项自由,“美国总统宣称的”其他“四项自由是毫无意义的”。全国制造业协会与其他公司一起,通过消息的发布、无线电广播节目以及广告,对公众进行宣传轰炸,将战时出现的生产奇迹归功于“自由企业”。全国制造业协会主席罗伯特·盖洛德在1944年吹嘘说:“今天几乎没有一篇演讲不是以赞赏自由企业为开场白的。所有人都为它令人震撼的战时记录而折服。”商业界人士把战后世界描绘成为一个充满消费品的世界,消费者将有可能在丰富众多的选择中得到“选择的自由”,但前提是私营企业家必须要从政府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一个为罗伊尔打字机作的广告说,这场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广告解释说,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加速这一天的到来,即当你再一次走进国内的任何一家商店时,你能买到任何你想买的东西”。当然,战争并没有包含要改变美国体制的意思。“我是为自由而战的,”由纳什—凯

<sup>①</sup> Joshua Freeman, "Delivering the Goods: Industrial Unionism During World War II," *Labor History*, 19 (Fall 1978), 590; Brinkley, *End of Reform*, 201-25; Nelson Lichtenstein, "The Making of the Postwar Working Class: Cultural Pluralism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World War II," *The Historian*, 51 (November 1988), 44-50; Jeffries, *War-time America*, 23, 55-57.



石。当时消费品是限量供应,人们对大萧条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

广告制作者们将“明日的世界”的图画仍然定位于以家庭为中心的富足与丰盛。从性别关系的角度讲,当在前方的男人回到家中时,他们将回到一个熟悉的世界,恢复他们熟悉的传统生活方式。这种对温暖舒适的家庭生活的强调充满了讽刺意味,因为当时全国上下正在前所未有地大量动员“妇女力量”,以此来填补男人上前线而空出来的产业工人的位置。战时新闻办公室的出版物鼓励妇女们走出家门去工作,好莱坞的电影也对独立自主的女性倍加赞颂,私营广告业对作为女产业工人象征的铆工罗茜更是不放过,频频宣传,赞不绝口。<sup>①</sup> 231

战时的经历的确扩展了妇女的理想范围,使她们变得更加独立自信。女工要求联合汽车工人工会这样的工会组织在与资方谈判时,正面提出有关男女同工同酬、女工的产假福利和为工作母亲提供幼儿设施等问题。妇女们在战时尝到了当时的一位工人所说的“自由的味道”——干“男人”所干的活,挣男人所挣的工资——许多人在和平来临后仍然希望继续留在劳工队伍中。但在政府、雇主和工会眼中,妇女外出工作只是一种临时性的需要,并不是妇女自由的一种永久性扩大。广告业对妇女外出工作给予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支持,但这种支持的基调是爱国主义式说教,即告诉工人们说,他们在工厂工作的目的也是“为自由而战”。但这种语言的调子是以奉献和军事胜利为主,而不是强调妇女的权利和自立,自由指的不是女权主义期望的那种通过劳动而取得的完全自决自主,而是指美国式的生活方式,“拥有一幢属于自己的小房子,有一个每天晚上都能在自己家门前迎归的丈夫”。在战时的一次无线电广播节目中,一位年轻人描述了他和平时期的目标:“有一个家,有几个孩子,能够呼吸到城郊的新鲜空气,……能够像自由人一样,清白而舒坦地生活与工作。”<sup>②</sup> 232

① Fox, *Madison Avenue*, 96; Westbrook, “Fighting for the Family,” 198-201; Rupp, *Mobilizing Women*, 138-53; Maria Diedrich and Dorteia Fischer-Nornung, eds., *Women and War: The Changing Status of American Women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50s* (New York, 1990), 4-7.

② Nancy F. Gabin, *Feminism in the Labor Movement: Women and the United Auto Workers, 1935-1975* (Ithaca, 1990), 47, 51-71, 83-87, 95-99; Karen Anderson, *Wartime*

对于一个富足的未来的美好期望,为新政支持者与保守派之间、商业与劳工之间提供了一个双方能够团结的基点。广告对经济安全的描绘和对大规模生产的丰富物质的赞美,在罗克韦尔那幅“免于匮乏的自由”的画中得到了反映。那幅画描绘了一个极为丰盛的感恩节晚餐的饭桌,桌上的食品极为丰盛,以至于有人认为这样的画法过于俗气,尤其是考虑到遭到战争肆虐的欧洲正在经历的苦难。(罗克韦尔自己后来写道,他担心自己的这幅画描绘了一种“过于丰盛的晚餐”。)这种消费繁荣的前景为战时发表的两篇对战后世界蓝图进行描述的最有影响的文章奠定了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前景甚至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其中一篇文章是《美国世纪》,1941年由出版家亨利·鲁斯出版,目的在于动员美国人民行动起来,迎接战争的到来,迎接战后(美国)主宰世界的新时代的到来。鲁斯在他的文章中强调,美国必须扮演历史赋予他们的角色,成为“世界的主导势力”,不失时机地抓住机会,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美国人对“自由和正义”的理解。在将来,美国的强权与美国的价值观将支持一个从前不敢想像的经济繁荣——鲁斯将其称为“一种充足富裕的生活”——这种繁荣是由“自由经济企业”创造的。<sup>①</sup>

鲁斯的文章预测到美国将在战后世界秩序中扮演的新角色,并极有远见地观察到,美国的大众文化——包括“我们的爵士乐、电影、俚语、技术和产品”在内——将与军事权威一样有效地成为一种国际强权的源泉。鲁斯的文章预见到了战后世界的许多重要方面的发展。但他的具有轰炸效应的词语和他那种可以很容易被当成是呼唤美国帝国主义扩张的题目,却立即引起了自由派和左派的反对。他们的反对意见由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在1952年5月发表的一篇演讲中表达出来。这篇演讲名为“自由世界胜利的代价”,是华莱士对

---

*Women: Sex Roles, Family Relations, and the Status of Women During World War II* (Westport, 1981), 59; Studs Terkel, *"The Good War": An Oral History of World War Two* (New York, 1984), 122; Westbrook, "Fighting for the American Family," 213; Elaine T. May, *Homeward Bound: American Families in the Cold War Era* (New York, 1988), 60.

<sup>①</sup> Murray and McCabe, eds., *Norman Rockwell's Four Freedoms*, 51; Henry R. Luce, *The American Century* (New York, 1941), 22-37.

自由世界协会发表的演说。华莱士提出了与鲁斯的美国世纪相对立的一幅战后蓝图。鲁斯描述的是一个商业霸权体制的时代,美国商业的霸权一点也不亚于其军事霸权;华莱士则预测到战争将把世界带入到一个“普通人的世纪”,这个世纪的基础应该是新政思想的全球化扩张。华莱士说,“自由的进军”将在战后的世界中继续进行。战后世界将奉行国际合作,而不是由一个强权进行主导和控制,政府将采取行动,消除饥饿和贫困,将资本主义加以“人道化”,重新分配经济资源。成千上万份华莱士的讲演稿被政府的各部门散发,使他成为左翼自由派反法西斯联盟力量的英雄人物。这个联盟可以说是旧的人民阵线在战时的复兴。<sup>①</sup>

鲁斯和华莱士两人都使用了自由的语言。如果鲁斯的自由观反映出全球自由企业那种“自信的沙文主义”思想的话,华莱士的自由观则是在鼓吹在世 233 界范围内为四大自由提供一个切实的保障。德怀特·麦克唐纳在一篇题为“(美国)人民的世纪”的文章中将鲁斯与华莱士简洁地联系起来。他洞察到,两者之间实际上有着双方都不愿承认的共同点。不管是全球自由企业,还是全球性新政的说法,战争产生出了一种新的思想和前景,即美国将在战后世界扮演一个帝国的角色,这种前景与经济上富足的前景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sup>②</sup>

但是,华莱士的演讲帮助界定和建立了这一时代自由主义的特征。即便国会已经行动起来,撤消了大部分的新政项目和措施,自由派的民主党人即他们的左翼同盟军仍然提出了一些计划,要在战后建立一种经济政策,保障所有美国人都能享受到“免于匮乏的自由”。1942 和 1943 年间,国家资源计划委员会(NR-

① Luce, *American Century*, 33; Henry A. Wallace, *The Century of the Common Man*, ed. Russell Lord (New York, 1943), 11-19; Henry A. Wallace, *The Price of Freedom* (Washington, DC, 1940), xii-xiv; Norman D. Markowitz, *The Rise and Fall of People's Century*; Henry A. Wallace and *American Liberalism, 1941-1948* (New York, 1973), 47-52.

② John M. Blum, ed., *The Price of Vision: The Diary of Henry A. Wallace 1942-1946* (Boston, 1973), 25-29, 76n.; Dwight Macdonald, "The (American) People's Century," *Partisan Review*, 9 (July-August 1942), 294-301.

PB)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和平时期的经济方案,该方案的前提是保证充分就业、一个极大地扩展了的福利国家以及一种得到普遍享受的“美国生活标准”。经济安全和充分就业是这个委员会的名言。国家资源计划委员会的1943年报告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权利法案”,以保证所有美国人享有一个扩展的社会保障计划体制,接受更多的教育机会、健康保险、适于居住的房屋住宅和为所有身体力行的人提供工作机会。这是战后世界的“自由前景”之一种。劳工和农场主组织、教会和民权组织以及自由派的新政支持者,都把这份报告颂扬为实现四大自由的具体措施。《民族》杂志说,NRPS提出的“高工资充分就业的经济”加上“收入的公平分配”的计划,概括了“自由人的生活方式。”<sup>①</sup>

如同艾伦·布林克利曾经指出的,国家资源计划委员会的报告代表了战时经济思想的一个转变。十年前,许多主张新政的人曾紧跟路易斯·D. 布兰代斯,力图使经济摆脱“大的恶果”;而其他的新政主张者则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热衷于探索商业企业的国有化或一种政府控制的经济活动与现代公司并存的“混合经济”的途径。现在,自由派不再寻求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改造,而是希望借助于政府的开支和财政政策,来保障充分就业,保证社会福利和大众消费,与此同时,不触动雇主的特权,把经济的运转和操作事务留给私人企业业主。政府的职能是刺激经济增长,制定一条生活水平的底线,保证不让任何美国人生活在这条底线之下。正如新闻记者马克斯·勒纳在《新共和》杂志上指出的,这些报告看上去反映出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点,当时这种观点在  
234 经济学圈子里刚刚开始走红。但勒纳也指出,呼吁政府在公用事业上进行大规模的投入——如都市的再开发、农村电力建设与供应(电气化)、对全国交通建设和基础设施的全面改革等——国家资源计划委员会的报告已经远远超出了凯恩斯的观点,凯恩斯之所以强调财政政策和赤字开支,因为他将这些措施看成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这些报告自然也远远超出了大多数国会议员愿

<sup>①</sup> 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 *Security, Work, and Relief Policies* (Washington, DC, 1942), 1-3, 545-49; 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 *Report for 1943* (3 vols. Washington, DC, 1943), I, 3-4; Keith W. Olsen, "The American Beveridge Plan," *Mid-America*, 65 (April-July 1983), 87-100; Brinkley, *End of Reform*, 254.

意接受的限度。国会对该委员会的拨款很快就终止了。<sup>①</sup>

罗斯福既没有宣扬过,也没有推动过1942—1943年国家资源计划委员会的报告,尽管在向国会递交这些报告时,他曾提到,他支持在将“自由转换成现代语言”时加进“新的自由”,包括考虑国家资源计划委员会所建议的内容。但当1944年总统大选年逼近时,罗斯福注意到舆论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希望政府对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提供一个就业保障,他立即打起国家资源计划委员会提出的“经济权利法案”的旗号。罗斯福宣称说,“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真正的个人自由在没有经济安全和独立的情况下是不存在的。”罗斯福借用了一个首先在18世纪使用过的警句——“贫者无自由”——他继而提出建立一种范围广泛的政府保障,包括一份有酬工作,一种还说得过去的生活、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标准,以及对因年老、疾病、事故和失业而导致的困厄提供的适当保障。<sup>②</sup>

此刻,罗斯福已经疾病缠身,并日夜为赢得战争操劳分心,他在1944年的竞选中只是偶尔提到了经济权利法案。再者,他选择哈里·杜鲁门取代华莱士,作为他的竞选伙伴,本身就意味着他并不准备与国会在经济政策上公开较量。尽管如此,经济权利法案不仅加强了公众对战后生活种类的期待,也将社会公民权的议题放到了国家的政治议程上。在产联新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带领下,自由派—左派联盟再度围绕一个新的社会民主思想联合起来,他们希望在战后推行一个重新复兴的、充满生机的扩大的新政,建设一个消费繁荣丰富和充分就业的经济。1944年提出的“人民计划”将成为后来30年里自由派阵营的基本社会政策计划,这个计划,如同联合钢铁工人工会所描述的,是为“四

<sup>①</sup> Alan Brinkley, "The New Deal and the Idea of the State,"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w Deal Order, 1930-1980*, ed. Steve Fraser and Gary Gerstle (Princeton, 1989), 87-112; Brinkley, *End of Reform*, 7-8, 138-39, 171; *The New Republic*, March 22, 1943.

<sup>②</sup> Rosenman, ed., *Public Papers*, XI, 52-53, XII, 122-23, XIII, 32-43, 370-77; Margaret Weir, *Politics and Jobs: The Boundaries of Employment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1992), 52; Olsen, "Beveridge Plan," 90-92; Blum, *V Was for Victory*, 247-50.

大自由”所付下的“一笔实实在在的定金”。<sup>①</sup>

随着战争接近尾声,争取充分就业和繁荣的目标(经常通过一种防止大萧条重新发生的话语来表示)成为政治讨论的主要话题。华莱士在1944年宣布说,“就业问题将成为对战后政治家能力的一次最重要的考验。”1945年,工会、民权运动组织和各种宗教组织敦促国会通过和实施蒙大拿州参议员詹姆斯·E. 默里提出的“充分就业”法案。这项法案提出,建立一种所有美国人都应享有的“就业权利”,要求联邦政府在经济无法产生足够多的工作机会时,调整开支,为失业的人提供补偿。纽约州的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说,充分就业是“未来美国”的关键,而“未来的美国应该是一个社会和经济进步永无止境的<sup>235</sup>国家。”9月,《新共和国》的一期特刊谈到了美国面临的一系列“极大的机会”,包括提高生活水平、重建城市、扩大教育和医疗保健设施等。这家杂志称,“民主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扩展和加大了“自由的领域”,而不是威胁了自由。在当代世界,政府是自由的“保卫者”,充分就业是“通向自由之路上的一块里程碑”。<sup>②</sup>

国会中的保守派对充分就业法案和左翼自由派计划中的其他内容并不热情。针对这份法案展开了紧张的游说活动。1946年这部法案得以通过,但在此之前,它已经被严重地修正,并不保证充分就业,也不保证其与创造就业机会和推动社会福利的政府政策之间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中,国会的确为退伍军人提供了一大堆健康和教育方面的福利和低息购房贷款,这些政策对刺激战后的繁荣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并没有延伸到普通的大众社会。<sup>③</sup>

<sup>①</sup> Markowitz, *Rise and Fall*, 85; Steven Fraser, *Labor Will Rule*; Sidney Hillman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Labor (New York, 1991), 506-09, 539; *Steel Labor*, May 28, 1943.

<sup>②</sup> Henry A. Wallace, *Democracy Reborn*, ed. Russell Lord (New York, 1944), 29; J. Joseph Huthmacher, *Senator Robert F. Wagner and the Rise of Urban Liberalism* (New York, 1968), 291-318; Brinkley, *End of Reform*, 228-33; *The New Republic*, September 24, 1945.

<sup>③</sup> Robert Griffith, "Forging America's Postwar Order: Domestic Politics and Poli

由于国会为保守势力所把持,经济政策上出现这样的局限性不应使人感到奇怪。这些局限性再次证实了自1938年国会选举以来开始的政治对峙。但更令人发人深省的是,知识界中又重新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即经济上的计划将构成对自由的威胁。当《新共和国》提到充分就业是“通向自由之路”时,它同时也婉转地承认了《通向奴役之路》一书的影响。这本书是1944年出版的一部出人意料的畅销书,作者是弗里德里克·A. 哈耶克,他是一位出生在奥地利的英国经济学者,早先并没有什么名气。哈耶克称,即便动机最好的支配经济的政府行为也都对个人自由构成了一种威胁。他的观点非常简单:既然“计划会导致专制”,“为自由而计划”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

如历史学家H. 斯图尔特·休斯在十年后提出的,《通向奴役之路》的出版是“美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像美国商会会长埃里克·A. 约翰逊那样的人在当时重弹“太多管制”危及美国自由的老调,这只不过是老生常谈而已。但哈耶克则不同,在他的这部著作出版之时,战时生产的奇迹已使许多自由派人士相信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斯大林的暴行和与纳粹的冲突也凸显出集中化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所带来的威胁,因此,哈耶克为那些反对有为政府的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想基础。他把自由定义为“免于强制的自由”,如果哈耶克的定义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起源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某个主题的一种回应的话,他在其他方面的论点却是十分现代的。他认为,在一个复杂的经济体系<sup>236</sup>中,没有任何一个或一群专家能够掌握足够的知识,来有效无误地指导经济活动。而一个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则能够动员和集中起那些散布在社会各处的、零散的、部分的、不完整的知识,这种动员的力量将比一种计划经济更为有效。哈耶克将建立就业目标和刺激消费开支的措施等间接干预行动也统统斥之为政府对整个经济活动领域的一种综合性主导计划,这种批评大大激怒了新政的支持者们。所有的计划,哈耶克声称,都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个人

---

tical Economy in the Age of Truman,” in *The Truman Presidency*, ed. Michael J. Lacey (New York, 1989), 68-70; Alonzo L. Hamby, *Beyond the New Deal: Harry S. Truman and American Liberalism* (New York, 1973), 60-69; Brinkley, *End of Reform*, 261-62; Jeffries, *Wartime America*, 158.

的自由。而如果没有“在经济事务中的自由”，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是不可能的。<sup>①</sup>

与他的许多弟子不同的是，哈耶克不是一个自由放任主义教条的鼓吹者。他的著作也支持实行这样一些措施——实施最低工资制和最高工时制，强制实施反托拉斯法，建立一个社会保障系统，保障所有公民需要的最基本的食物、住房和衣物等——这一切将为后来的保守派斥为相当于社会主义的措施（当《读者文摘》在1945年出版哈耶克著作的浓缩本时，所有涉及这些措施的部分都被删除）。除此之外，哈耶克也严厉地批评了那些传统意义上的保守派对那种早已为历史所唾弃的、与经济实验和自由市场进步对立的等级社会的怀念；他也反对他们对威权主义的偏爱。“我不是一个保守派，”他后来这样写道。但是，当他事实上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新政等同起来，将经济计划与自由的丧失等同起来时，他也就奠定了现代保守主义兴起的基础，为那些攻击自由主义和左派的人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武器，激发了古典经济思想的复活。除此之外，哈耶克的著作还成为了召唤保守派重新夺回“自由”这个词的号角。他认为，自由这个词被社会主义者、新政主义者和自由派篡改和歪曲了。这样，当战争结束时，为界定美国自由内容的新一轮的斗争而搭建的舞台已经准备就绪了。<sup>②</sup>

---

① F. A.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1994), 16-31, 132, 173; Hughes in George W. 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Since 1945* (New York, 1976), 35; Eric A. Johnson, "America Unlimited,"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June 15, 1943, 521-25; Abbott Gleason, *Totalitarianism, 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1995), 64; John Gray, *Hayek on Liberty* (Oxford, 1984); Theodore Rosenof, "Freedom, Planning, and Totalitarianism: The Reception of F. A. Hayek's *Road to Serfdom*," *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 5 (Fall 1974), 149.

② Hayek, *Road to Serfdom*, 21, 41-51, 133-34; Frank S. Meyer, ed., *What Is Conservatism?* (New York, 1964), 91-97; *The Nation*, April 28, 1945; Jerome L. Himmelstein, *To the Righ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Berkeley, 1990), 6.



## 爱国主义式的同化

将自由作为美国生活的最基本的特征,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这样做所包含的意义自然远远超出了战时动员的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说也改变了美国人对他们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看法和定义。反对纳粹专制的斗争以及对纳粹鼓吹的“统治种族”理论的反对,使美国的民族性的政治定义得到了新的重视,也使那些鼓吹种族和族裔优越至上性的说法不攻自破。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出现了一种将美国社会视为多元社会的声音,这种声音曾在 30 年代<sup>237</sup>首先出现,现却成为通用的官方语言。美国与战时的敌人之所以不同,不仅因为美国致力于四大自由这样的理想,而且还因为美国人有决心做到使人们一视同仁地享有这些自由。种族主义是我们的敌人所信奉的哲学;而美国价值观的基础则是对多元化的容忍和对全体平等的追求。在战争结束时,新移民的各个族裔群体作为族裔美国人而得到了百分之百的接受,他们不再是特别的和低贱的“种族”的成员,与此同时,所谓的美国信条与黑人的地位所存在的巨大矛盾,也逐渐成为国家生活中不可回避的主要问题。<sup>①</sup>

除其他结果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美国创立了一个巨大的“熔炉”。数百万的美国人离开都市中族裔社区和偏僻的乡村,加入军队或工业大军的行列,在那里他们与背景完全不同的同胞们并肩作战、工作和交往。这种被历史学家内尔森·利希滕斯坦所称的“爱国主义式的同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强制性的美国化运动有天壤之别。如果说威尔逊政府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树为一种标准的国家规范,那么罗斯福政府则致力于推动美国社会接受一种多元文化,因为它认定这将是一个多元社会争取和赢得和谐的惟一的力量源泉。小说家赛珍珠在一份战时新闻办公室的小册子中写道:美国生活的精华在于它拥有一种兄弟般的同仁感情,这是一个原则,它相信,“来自不同地域

---

① Lichtenstein, “Postwar Working Class,” 42-43; Philip Gleason, *Speaking of Diversity: Language and Ethnic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Baltimore, 1992), xi-xii.

的许多人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而且如果大家都相信自由的话,他们可以结为一个团结的民族。”<sup>①</sup>

政府和民间机构都不遗余力地推崇群体平等的思想,将其作为崇美主义的定义。官员们重新书写了历史,把对种族和族裔的容忍描写成美国人一贯的生活方式,把自由定义为全民共享的权利。罗斯福总统称,作一个美国人,其实一向是“一种感情和思想的问题”,而从来不是“一种种族和祖先的问题”。这样的表白当然能有效地动员民众对战争的支持;但却并不能准确地描述美国过去的历史。“我们一向认为——而且我们今天也认为”——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回应道,“所有的人,无论种族、肤色或宗教信仰有何不同,只要准备并愿意接受自由的责任,便有权享有自由。”政府当然没有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不容忍性,战时新闻办公室刻意突出了几乎所有移民群体对美国社会的贡献,甚至包括了意大利裔和德国裔移民及其后代所做出的贡献(这两个群体当然也代表了一个人数可观的兵源)。但这种宣传有时也与报上的政治漫画传递的信息发生冲突,因为那些漫画总是把德国人和日本人描绘成妖魔鬼怪或野蛮残忍的样子。尽管如此,官方的意图非常清楚:族裔和种族偏见不仅对美国的战争努力有害,而且也有悖于美国的传统。<sup>②</sup>

238 来自民间的战争动员工作也接受了官方的思想,视多元化为美国的力量所在,竭力刻画一个捐弃前嫌、众志成城的美国家形象。这种形象在30年代曾因人民阵线的努力而一度普及,现在则堂堂正正地进入大众文化舞台的中心。自然,因为要为战时团结这个目的服务,大萧条时期反映人民生活的大众文化中保留的批评性棱角被隐去了。1942年纽约市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大规模

<sup>①</sup> 内尔森·利希滕斯坦在即将出版的一部从1941到2000年的美国史中,使用了“爱国主义式的同化”这一说法; Erenberg and Hirsch, *War in American Culture*, 6; John J. Bukowczyk, *And My Children Did Not Know Me: A History of the Polish Americans* (Bloomington, 1987), 96; Lloyd, “American Society and Values,” 263.

<sup>②</sup> Ronald Takaki, *A Different Mirror: A History of Multicultural America* (Boston, 1993), 374; Lloyd, “American Society and Values,” 56, 226; Gleason, *Speaking of Diversity*, 58; Samuel, *Pledging Allegiance*, xiv-xv.

的许多人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而且如果大家都相信自由的话,他们可以结为一个团结的民族。”<sup>①</sup>

政府和民间机构都不遗余力地推崇群体平等的思想,将其作为崇美主义的定义。官员们重新书写了历史,把对种族和族裔的容忍描写成美国人一贯的生活方式,把自由定义为全民共享的权利。罗斯福总统称,作一个美国人,其实一向是“一种感情和思想的问题”,而从来不是“一种种族和祖先的问题”。这样的表白当然能有效地动员民众对战争的支持;但却并不能准确地描述美国过去的历史。“我们一向认为——而且我们今天也认为”——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回应道,“所有的人,无论种族、肤色或宗教信仰有何不同,只要准备并愿意接受自由的责任,便有权享有自由。”政府当然没有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不容忍性,战时新闻办公室刻意突出了几乎所有移民群体对美国社会的贡献,甚至包括了意大利裔和德国裔移民及其后代所做出的贡献(这两个群体当然也代表了一个人数可观的兵源)。但这种宣传有时也与报上的政治漫画传递的信息发生冲突,因为那些漫画总是把德国人和日本人描绘成妖魔鬼怪或野蛮残忍的样子。尽管如此,官方的意图非常清楚:族裔和种族偏见不仅对美国的战争努力有害,而且也有悖于美国的传统。<sup>②</sup>

238 来自民间的战争动员工作也接受了官方的思想,视多元化为美国的力量所在,竭力刻画一个捐弃前嫌、众志成城的美国家形象。这种形象在30年代曾因人民阵线的努力而一度普及,现在则堂堂正正地进入大众文化舞台的中心。自然,因为要为战时团结这个目的服务,大萧条时期反映人民生活的大众文化中保留的批评性棱角被隐去了。1942年纽约市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大规模

<sup>①</sup> 内尔森·利希滕斯坦在即将出版的一部从1941到2000年的美国史中,使用了“爱国主义式的同化”这一说法; Erenberg and Hirsch, *War in American Culture*, 6; John J. Bukowczyk, *And My Children Did Not Know Me: A History of the Polish Americans* (Bloomington, 1987), 96; Lloyd, “American Society and Values,” 263.

<sup>②</sup> Ronald Takaki, *A Different Mirror: A History of Multicultural America* (Boston, 1993), 374; Lloyd, “American Society and Values,” 56, 226; Gleason, *Speaking of Diversity*, 58; Samuel, *Pledging Allegiance*, xiv-xv.

些对美国历史的批评删除掉了。<sup>①</sup>

但是,如果说社会赞颂而不是社会批评是当时的主流思潮的话,那么,受到赞颂的是尊重多元、团结起来的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屈。崇美主义的含义是容忍,死抱偏见不放的人则被视为是比间谍或特务更具有危险性的一支第五纵队。《父母》杂志发出警告说,成年人的“不容他人”的言行已经使孩子和国家深受伤害。这份杂志还断言:“所有种族、肤色和信仰的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尊严,谁不相信这一点,四大自由对他就没有什么意义。”纳粹集团将生而不同的种族差别作为其政策的指南,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为此深为震惊和恐怖,他们全线从种族差别思想的领域中撤出,尽管种族研究最近成为了他们领域的重要题目。弗朗兹·博阿兹、罗思·本尼迪克特以及其他一些人类学家一向反对将种族、文化与人的能力联系在一起。此时他们的著作第一次传播到大众读者中去。本尼迪克特的《种族和种族主义》在1942年出版。该书将种族主义斥为“一种对科学知识的拙劣歪曲”。同年,阿什利·蒙塔古的《人类最危险的迷思:种族主义的谬误》成为畅销书。到战争结束时,种族主义和本土文化优越论在知识界中已经没有市场,统统被划归到病态和缺乏理智的思想之中。<sup>②</sup>

好莱坞也在这方面尽了自己的贡献。它的影片刻画的战斗连队中有不同地域、族裔和宗教群体的代表——通常包括犹太人、南方人,再加上零零散散的几个意大利裔、波兰裔、爱尔兰裔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代表——这些人抛弃原有的族裔偏见和忠诚,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而作战。在1943年上演的《巴滩战役》影片中,那个银幕上的步兵排,不仅在(白人)族裔构成上非常均衡,而

① Polenberg, *One Nation Divisible*, 52-54; Serge Guibault, *How New York Stole the Idea of Modern Art: Abstract Expressionism, Freedom, and the Cold War*,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Chicago, 1983), 88-89; “Dance Libretto: American Document, by Martha Graham,” *Theater Arts*, 26 (September 1942), 565-74.

② Murray and McCabe, eds., *Norman Rockwell's Four Freedoms*, 38-39; Polenberg, *One Nation Divisible*, 70; David H. Bennett, *The Party of Fear: From Nativist Movements to the New Right in American History* (Chapel Hill, 1998), 284-285; Gleason, *Speaking of Diversity*, 86; Barkan, *Retreat*, 279-81.

且居然还加进了一个黑人士兵。尽管当时美国军队中仍旧实行种族隔离制度。二战中最受欢迎的影片是《这就是军队》，出演者中包括有未来的总统唐纳德·里根。影片勾画了一幅战后社会的前景：四大自由与对美国人民族裔多元化的歌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sup>①</sup>

不容异端当然并没有从美国社会中消失。T. C. 厄珀姆是一位新泽西州的戏剧导演，他就对诺曼·洛克韦尔的“宗教自由”图画颇有微辞，说画中的许多面孔“看上去都像外国人似的”。但是二战却使成千上万的族裔美国人，尤其是作为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新移民后代，前所未有地感到完全地变成了美国人。如果说产联和人民阵线提倡的多元文化主义开拓了将新移民融入白人工人阶级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大大加速了这个过程。这批人享受到战时公平就业政策带来的巨大好处（大大多于黑人得到的惠顾，尽管这些政策的初衷是帮助黑人）。在战时，一个纽约市的“族裔”回忆说，“意大利裔美国人不再是意大利人，而开始变成美国人了。”但引发这样的评论的事件本身，即 1943 年的哈莱姆种族骚乱却正好说明战时的族裔同化并没有超越肤色的界限。<sup>②</sup>

尽管纳粹种族主义的罪行被揭露，世人皆知，战争的内容对于非白人群体来说，远比白人理解的更为捉摸不定。在珍珠港事件前夕，美国生活中的种族界限仍然根深蒂固。黑人中的大部分人生活在实行种族隔离制的南部，在一成不变的等级制度中动弹不得。亚洲人仍然被禁止移民美国或通过归化的途径成为美国公民。墨西哥裔美国人过去一直被归类为“白人”，在 30 年代期

① Blum, *V Was for Victory*, 63; Lary May, "Making the American Consensus: The Narrative of Conversion and Subversion in World War II Films," in *The War in American Culture*, ed. Erenberg and Hirsch, 76; Lary May, "Movie Star Politics: The Screen Actors' Guild, Cultural Conversion, and the Hollywood Red Scare," in *Recasting America: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the Cold War*, ed. Lary May (Chicago, 1989), 136-37.

② T. C. Upham to Norman Rockwell, February 25, 1943, Norman Rockwell Museum; Gary Gerstle, *Working-Class Americanism: The Politics of Labor in a Textile City*, 53-56; Gary Gerstle, "The Working Class Goes to War," in *The War and American Culture*, ed. Erenberg and Hirsch, 118.

间,他们被重新归为“非白人”一类。在大萧条时期,大约有 40 万墨西哥裔人被西南部各州的地方政府以“自愿”的名义引渡出境。那些“被鼓励”离开美国的成年人中大部分是近期移民到美国的,但同时离开的还有大约 20 万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这些人是具有美国的公民身份的。<sup>①</sup>

战争本身开创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将在战后的年代引起强烈的反响。由于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签订的布拉塞罗方案,大规模的合同工人跨越国界,进入美国。这个方案最初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意在解决战时西南部劳力短缺的问题,但它一直延续到 60 年代,激发了一场范围广泛的墨西哥男人、妇女和儿童进入美国的运动。1943 年,国会立法终止了实行数十年之久的排华法,规定了允许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国籍定额,因为当时的中国已经变成了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盟友,然而每年只有 105 个移民名额的规定,说明美国对向大规模的中国移民开放并无诚意和兴趣。即便如此,中国作为一个顽强勇敢的同盟军的形象对反亚裔的模式化形象提出了挑战。<sup>②</sup>

日裔美国人的经历可谓大相径庭。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种族仇恨和日本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合在一起,在美国人对日本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切齿痛恨。据历史学家艾伦·内文思的观察,“在我们的历史上,还没有任何别的敌人像日本人那样受到如此的痛恨。”政府宣传和战争影片将日本人妖魔化成老鼠、狗、猩猩和毒蛇,让他们充满兽性和非人的野蛮。日本人的侵略被说成是出自于日本人天生的种族特性或民族本性,而不是像德国人或意大利人那样,只是由于暴君的统治,才出现了侵略别国的结果。即便是弗兰克·西纳特拉的短片《我的家园》,本来是以一首人民阵线时期的歌曲为创作基础,歌曲本身是歌颂美国的,称赞美国是一个容忍“所有种族和宗教”的土地,但影片中

---

① Alan Dawley and Joe W. Trotter, Jr. "Race and Class," *Labor History*, 35 (Fall 1994), 487; Abraham Hoffman, *Unwanted Mexican Americans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Repatriation Pressures, 1929-1939* (Tucson, 1974), 95; Camille Guerin-Gonzales, *Mexican Workers and American Dreams: Immigration, Repatriation, and California Farm Labor, 1900-1939* (New Brunswick, 1994), 77-79.

② Guerin-Gonzales, *Mexican Workers*, 134-35; Ronald Takaki, *A Different Mirror*, 387.

却自始至终使用了“日本佬”这个词。<sup>①</sup>

随着太平洋战争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带有种族意味的战争,日裔美国人社  
区不能不受到影响,尽管社区中的大部分居民是美国公民。联邦政府竭尽全  
力,将德裔美国人和意大利裔美国人吸收到支持战争的队伍中来,对属于欧洲 241  
敌国的族裔公民的忠诚审查以个案的方式进行。但是,对于日裔公民,政府却  
认为他们人人都可能是潜在的间谍。军方担心日本可能会发起对加利福尼亚  
的进攻,另一方面,许多白人对日裔美国人的土地财产也投射出觊觎贪婪的目  
光,军方最终说服了罗斯福政府下令将所有居住在西海岸的日裔和有日本血  
统的人强行迁移。1942年的春夏期间,将近12万日裔男人、妇女和儿童被迫  
离开家园,迁移到集中营里去,他们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是美国公民。<sup>②</sup>

查遍战时的文献档案,也找不出任何非日裔美国人对此事举行公开抗议  
活动的记录。在国会,只有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公开批评了这场自奴隶制  
结束以来对公民自由最严重的侵犯事件。其他公开宣称反对歧视的组织,无  
论是共产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还是全美犹太人委员会,对日裔被关进集中  
营一事,不是替政府的行为开脱辩护,就是三缄其口,保持沉默。美国公民自  
由联盟一度曾答应为平林辩护,但后来又从该案中撤出。平林对西海岸的一  
项宵禁令提出抗议,因为这项法律仅对日裔美国人实施。1943年,联邦最高  
法院一致否决了平林的上诉。次年,最高法院在维详一案的判决中,又否定  
了一位日裔美国公民对集中营管理规定提出的挑战。大法官雨果·布莱克一向  
坚定地捍卫公民自由,但他在6比3的多数派判决意见中称,一项只适用于日  
裔的法律并不是基于种族的原因之上的,应该说,这样的说法连他自己也会觉

---

① John W. Dower, "Race, Language, and War in Two Cultures: World War II in Asia," in *The War and American Culture*, ed. Erenberg and Hirsch, 169-73; John W.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New York, 1986), 9-13, 81; Mary L. Dudziak, "Cold War Civil Righ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vil Rights and Foreign Affairs in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1992, 23.

② Roger Daniels, *Prisoners Without Trial: Japanese Americans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1993), 3, 29-46; Polenberg, *One Nation Divisible*, 59-60.

得十分勉强。在1944年秋天,最高法院的确命令释放一位女性日裔美国人,这是因为她对美国的忠诚得到了无可置疑的确认。但最高法院对囚禁日裔这项政策的合宪性从来没有提出疑问和进行审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政府仍然向关在集中营内的日裔兜售战争债券,并从他们中招收士兵,集中营的主要活动之一是教育日裔美国人的孩子。皮田·太田曾被关在科罗拉多的集中营内,他后来回忆说:“我们当时学习的基础科目之一是美国历史。他们时时刻刻都把自由挂在嘴上。”<sup>①</sup>

如果说日裔美国人的遭遇表现出美国生活中冥顽不化的种族主义,战时关于自由和宽容的信息却预示着黑人的地位在战后将有重大的转变。罗斯福宣称说:“地球上从来没有任何种族的人配做他们同类的主人,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有。”然而,纳粹德国却引证美国种族歧视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种族理论的合理和必要,与此同时,日本人(尽管他们自己极为专制地奴役朝鲜人、中国人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人民)也将自己塑造成非白人人民权利的捍卫者,声称自己的行动是为了反对一个实行种族主义的美国。在1940和1941年,当罗斯福号召美国人起来,为欧洲的自由人民提供帮助时,美国国内还发生了13起私刑事件。由于政府战时宣传的影响和美国可能会受到的对其言行不一致的责难,联邦政府感到,继续说明黑人为何应该处于目前这种状况,越来越难以说服人。1942年的一次由陆军部情报局主持的民意测验显示,大部分美国白人“并没有意识到美国还存在一个黑人问题”,并且相信黑人对他们所处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一定感到心满意足。他们很快发现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错误的。<sup>②</sup>

戴维·里斯曼指出过,“我们宪法作出的那些字面上的承诺与缺少自由的

① Ronald Steel, *Walter Lippman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Boston, 1980), 395; Cheryl Greenberg, “Black and Jewish Responses to Japanese Internment,”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14 (Winter 1995), 4; Daniels, *Prisoners*, 47, 59-62; Terkel, “Good War,” 30.

② Rosentman, ed., *Public Papers*, X, 69;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5;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Bureau of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Report 35, August 7, 1942, Library of Congress (copy at Norman Rockwell Museum).



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正是这种差异激发了新一轮的争取黑人平等权利的运动。这场运动实际上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美国战时工业急速扩张,但黑人却在这些产业中被全面排斥(1940年在10万个飞机制造业工人中仅有不到300个黑人工人)。这种情形激怒了黑人群众。黑人劳工领袖A. 菲利普·伦道夫在1941年1月号召举行一场向华盛顿进军的活动,不仅要求允许黑人进入国防工业工作,而且要求在政府各部和联邦军队中全面废除种族隔离。伦道夫将罗斯福自己的语言又掷还给总统,宣称种族歧视是“非民主的、非美国化的和亲希特勒的”做法。<sup>①</sup>

数千名愤怒的黑人涌进华盛顿,这种前景“把政府吓得半死”。当时在租赁局工作的约瑟夫·L. 劳这样说。为了说服伦道夫取消这场抗议活动,罗斯福签署了一个总统行政命令,禁止了国防工业就业中的种族歧视行为,建立了一个公平就业实践委员会(FEPC),负责监管行政命令的实施。黑人报纸将这条行政命令称赞为新的解放宣言,一种对“经济自由”的希望和承诺。公平就业实践委员会基本上是一个调查性的机构,本身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法律实施权。但是它的存在却标志着政府的一个重大转变,它举行的听证活动暴露出种种种族歧视和排斥黑人的模式,这些做法在各个公司早已司空见惯,以至于它们在招聘广告中,公开写着招搬运工和清洁工时要“有色人种”,招技术产业工人时要“白人”,黑人妇女只能干洗衣工和厨子这类的工作。公平就业实践委员会是重建以来第一个为争取黑人平等就业机会而工作的联邦机构,它在为黑人谋取制造业工厂和舰船制造厂的工作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对于从南部农村来的黑人移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进步。到1944年,有100多万以上的黑人得到了制造业的工作,其中有30万是妇女。(“我姐姐经常说,是希特勒帮助我们跳出了白人家庭的厨房,”一位黑人妇女这样回忆说。)其他的关于平等权利的措施也接踵而至。全国战时劳工委员会禁止公司实行工人

---

<sup>①</sup> David Riesman, “Civil Liberties in a Period of Transition,” in *Public Policy*, ed. C.J. Friedrich and Edward S. Mason (Cambridge, MA, 1942), 85-86; Jeffries, *War-time America*, 107-110; August Meier, et al., eds., *Black Protest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dianapolis, 1971), 221-22.

243 因种族原因而在工资收入上有差别的做法。1944年,最高法院取消了只准白人选民参加州和地方预选的做法。白人预选提名是南部解除黑人选举权的众多机制之一。<sup>①</sup>

在战争期间,联邦官员公开谈到改变现行种族关系秩序的需要,其谈论的公开程度远远超过20世纪30年代。当国会在针对一项取消人头税的法案进行辩论时,来自肯塔基州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阿尔本·W. 巴克利称这个问题与政府的基本原则有关,因为政府必须建立在人民认可的基础上,这是“民主和自由的最根本的基础”。但是这项法案最终的失败却表明,南部的民主党人比起巴克利来在种族问题上更不愿让步妥协,它们继续保持对各级政府权力的控制。的确,战时新闻办公室终结的原因之一应归咎于南部对它的强烈反对和抗议,因为战时新闻办公室为了争取黑人对战争的支持,在它的宣传材料中谴责了种族主义,将其斥为非美思想和行为,并公开坦率地承认许多黑人只是在“名义上”是“自由的”。在整个二战期间,华盛顿始终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美国军队容忍继续进行一场种族隔离的战争,而红十字会也继续拒绝在血库中将白人和黑人的血液混合在一起储存(批评者指出,这样做等于是变相地接受了纳粹的种族主义理论)。

大量南部黑人搭乘他们称之为“自由列车”的火车涌入美国北部和西部的工业中心地带,但他们遭遇到了当地居民的敌意,这种敌意有时甚至是以暴力的方式来表现的。1943年6月,底特律市经历了一场种族骚乱,致使34人死亡,并引发了一场有两万名汽车制造业工人参加的“仇恨罢工”事件。这场罢工是为了抗议一家制造飞机引擎的工厂对黑人工人实行加薪加等等做法。在同年发生的祖特·休特骚乱中,手舞大棒的大兵、水兵和警察,猛烈地袭击洛杉矶街头的墨西哥裔青年。这桩事件也说明战时对于多元文化

---

<sup>①</sup> Terkel, "Good War," 337-38, 340; Beth Bates, "'The Unfinished Task of Emancipation': Protest Politics Comes of Age in Black Chicago, 1925-1943,"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7, 381-83; Martha Biondi, "The Struggle for Black Equality in New York City, 1945-1955,"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7, 22-29; Shema B. Gluck, *Rosie the Riveter Revisited: Women, the War and Social Change* (Boston, 1987), 23-24.

主义和宽容的那种推动是相当有限的。二战也未能终止私刑在美国的出现。1944年,一位名叫艾萨克·西蒙斯的黑人牧师拒绝向一个白人出售自己的土地(这个白人买主认为西蒙斯的地下可能有原油)。在此之后,他被人谋杀了,罪犯却逍遥法外。此事发生的地方是密西西比州一个名叫“自由”的小镇。<sup>①</sup>

尽管如此,官方的宣传鼓动仍然极大地激发了黑人争取权力的新的信心和决心。一位黑人钢铁工人在1944年宣称说,种族主义是“我们面临的法西斯敌人的一种邪恶的特征”,当罗斯福总统说我们应该有四大自由时,他把“所有的种族”都包括在内。银行、保险公司、公共交通系统以及其他无数的用人单位因为过去拒绝雇佣黑人,在战时成为了被抗议的对象。“人们处在一种要大干一场的情绪之中,”一位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民权运动活动者回忆说。1942年2月,《匹兹堡信使报》发明了“双重胜利”的短语,这在后来成为了战时黑人态度的一个集中性表示:这家报纸说,战胜德国和日本的胜利必须伴随着在国内战胜种族隔离的胜利。大多数白人报业把二战看成是美国理想的展示而予以支持,而黑人报纸则坚持指出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危机》杂志在其刊登的战争债券的广告旁边写道:“一支实施吉姆·克罗制的军队是不可能为一个自由的世界而战的。”(“吉姆·克罗”是种族隔离制的俗称。——译者)政治学者霍勒斯·戈斯内尔对战时的出版物进行了一次调查,他的结论是“国家团结的象征”对白人和黑人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黑人来说,免于恐惧的自由,除了其他意义之外,指的是终止私刑的使用,免于匮乏的自由应该包括消除“在争取工作机会时面临的歧视”。如果在白人眼中,自由是一种“需要保卫的财产”,戈斯内尔观察到,对于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来说,自由仍然是一个“需要争取的目标”。“我们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战斗,”一位从太平洋战场归来的黑人退伍军人说,

<sup>①</sup> Sullivan, *Days of Hope*, 119; Lloyd, “American Society and Values,” 206-07; Gretchen Lemke-Santangelo, *Abiding Courage: African American Migrant Women and the East Bay Community* (Chapel Hill, 1996), 6, 64; Johnson, *Second Gold Rush*, 83-96; Nelson Lichtenstein, *Labor's War at Home: The CIO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1982), 125-26; Takaki, *A Different Mirror*, 394; Steven F. Lawson, *Running for Freedom: Civil Rights and Black Politics in America Since 1941* (Philadelphia, 1991), 2-15.

“是从我们抵达旧金山的那一刻开始的。”<sup>①</sup>

在二战期间,一个范围广泛的政治联盟发出呼吁,要求终止美国存在的种族不平等现象。这个联盟是以左派力量为中心的,但同时包括了左派之外的相当广泛的力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与美国犹太人协会密切合作,共同谴责了在种族关系和宗教方面的不容异族的行为,鼓动制定在就职和住房方面禁止种族歧视的法律。反对反犹主义和反对种族主义的同时进行,显然拓宽了犹太人和黑人的政治视野,但与此同时,也巧妙地遮掩了一个事实,即在美国的法律与社会习俗中种族主义要比宗教上的不宽容更为根深蒂固。二战使得寓言般的黑人—犹太人联盟得以诞生。这个联盟将在民权运动时代到达顶峰。(难道除了犹太人和黑人之外,其他人就没有什么烦恼了吗?一位纽约左翼报纸《PM》的订户非常不满地抱怨道。)<sup>②</sup>“自由之家”在自己纽约市的总部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提供了办公用地,对黑人在军队中受到的歧视性待遇进行了谴责;它还呼吁联邦政府通过立法,来禁止就业中的歧视行为,“以表明政府在这方面的诚意,既然政府正在号召(黑人)起来为四大自由这样的理想而战斗。”<sup>③</sup>

尽管来自基层的白人工人表示坚决的抵制,全国产联的一些工会——尤其是那些左翼自由派和美共影响力较强的工会——还是进行了大量的努力来组织黑人工人,并为他们争取得到进入技术工种工作的机会。但在大多数的工业工厂中,以种族为界的就业天花板长期地存在着;全国劳联在很大程度上

① Philip S. Foner and Ronald L. Lewis, eds., *The Black Work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Present* (7 vols. Philadelphia, 1978-83), VII, 385; Adam Fairclough, *Race and Democracy: The Civil Rights Struggle in Louisiana, 1915-1972* (Athens, GA, 1995), 74-82; C. Alvin Hughes, "Let Us Do Our Part: The New York City Based Negro Labor Victory Committee, 1941-1945," *Afro-Americans in New York Life and History*, 10 (January 1986), 19-30; Blum, *V Was for Victory*, 180-85; Gosnell, "Symbols of National Solidarity," 157-60; Jeffries, *Wartime America*, 111.

② Cheryl Greenberg, "Plu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Case of Black and Jews," in David Biale, et al., eds., *Insider/Outsider: American Jews and Multiculturalism* (Berkeley, 1997), 10; Paul Milkman, *PM: A New Deal in Journalism, 1940-1948* (New Brunswick, 1997), 146-49; Aaron Levenstein, *Freedom's Advocate: A Twenty-Five Year Chronicle* (New York, 1965), 45-50.

继续遵循它那种排斥黑人工人的传统。但是在二战期间,全国产联可能是自劳工骑士团以来,在种族融合方面做得最彻底的工会组织。其结果是,工人第一次成为全国各地黑人社区中的重要力量(除了全部由黑人组成的车站搬运工工会的例子之外)。<sup>①</sup>

这种要在政治、经济和公民权利方面争取平等的毫不妥协的要求成为《黑人想要什么?》这本书的综合性主题。此书由 14 位著名的黑人领袖写作的文 245 集,由历史学家雷福特·洛根编辑,并在 1944 年出版。书中几乎每一篇文章都呼吁赋予南部黑人选举权,摧毁种族隔离制度,提供享有“可以接受的美国生活标准”的机会。A. 菲利普·伦道夫在书中以最为迫切的口吻写道:“黑人是不自由的……他不自由是因为他与其他人之间并不平等。”好几篇文章谈到了目前的战争如何经常性地使黑人将自己的斗争与殖民世界统治下的“臣属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相互认同,他们都坚持认为和平必须伴随着欧洲帝国主义的终结。“我们希望将四大自由,”洛根写道,“提供给世界上所有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sup>②</sup>

《黑人想要什么?》同时也体现了南部白人自由主义所面临的危机。这本书的写作是由 W. T. 库奇约稿的。库奇是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出版社的社长,曾就私刑、工会主义和南部贫困等问题写过一些非常有创意的著作。但是,当他看到该书的原稿时,大吃一惊。他对洛根说:“如果这是黑人想要的东西的话,那么事情显然再清楚不过了,黑人需要的,而且最迫切需要的,就是修改他们想要的东西。”最后,库奇还是照原样出版了书稿,但是他加上了一个自己写的、非同寻常的前言。这个前言实际上是在诋毁整部著作。库奇的反因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南部白人自由派中是非常典型的。他们曾推动对种族关系的渐进性改善。

① Robert Korstad and Nelson Lichtenstein, “Opportunities Found and Lost: Labor, Radicals, and the Early Civil Rights Movement,”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5 (December 1988), 768-88; August Meier and Elliott Rudwick, *Black Detroit and the Rise of the UAW* (New York, 1979), 175-206.

② Rayford Logan, ed., *What the Negro Wants* (Chapel Hill, 1944), 7, 110-11, 137; Penny M. Von Eschen, *Race Against Empire: Black Americans and Anticolonialism 1937-1957* (Ithaca, 1997), 22-43.

但是,随着黑人提出了终止种族隔离制度的要求,加上居心叵测的白人煽动家又鼓动白人起来捍卫白人至上主义,于是,他们感到自己曾经占据的、那种具有前瞻性的中间地带突然萎缩和消失了(白人煽动家有时会使用战时那种保卫自由的语言词句,以此来说明他们有权不受外界干涉,自行决定本区域的制度结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沃尔特·怀特说,“看来这场战争受伤害最多的是南部白人中的自由派。”<sup>①</sup>

在全国的其他地区,战争却将黑人的地位问题推到了开明的自由主义的首要位置。温德尔·威尔基是罗斯福在1940年总统竞选中的对手,他曾在大选后周游世界,宣示美国的团结,动员支持同盟国的力量。他在归来后于1943年出版一本名为《大同世界》的书。该书标价一美元,卖出一百万册,销售速度之快超过美国历史上任何非虚构性的著作。他在世界各地的旅行,使他意识到,即将成为“第三世界”的那些国家将在战后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呼吁战后应该有一个新的国际合作的时代,合作的基础是所有民族的独立和对所有民族“按自己的方式获取自由”的愿望的尊重(这是对鲁斯曾提出的“美国世纪”观点的否定)。但此书最令人震惊之处是威尔基对“我们国内的帝国主义行为”的猛烈攻击。他开诚布公地谈到,除非美国面对种族主义这个“令人尴尬的矛盾”,否则,它对世界领袖地位的要求将缺乏道德上的权威。”威尔基写道,“如果我们要谈论自由,我们必须同时谈论其他人和我们自己的自由,我们必须谈论我们疆界内所有人的自由。”<sup>②</sup>

没有其他的事件能比1944年《美国的困境》的出版更能引起战时的这种

---

① Chadwin, *The Hawks*, 159; Walter A. Jackson, *Gunnar Myrdal and America's Conscience* (Chapel Hill, 1990), 251; Kenneth R. Janken, *Rayford Logan and the Dilemma of the African-American Intellectual* (Amherst, 1993), 154-61; John T. Kneebone, *Southern Liberal Journalists and the Issue of Race, 1920-1944* (Chapel Hill, 1985), xiii-xx, 180-96; Morton Sosna, *In Search of the Silent South: Southern Liberals and the Race Issue* (New York, 1977), 109.

② John M. Jordan, "A Small World of Little Americans: The \$1 Diplomacy of Wendell Wilkie's, *One World*," *Indiana Magazine of History*, 88 (September 1992), 173-204; Philip Beindler, "Remembering Wendell Wilkie's, *One World*," *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 24 (Spring 1994), 87-104.

对种族问题的重视了。这本书是应卡内基基金会的邀请,由瑞典社会科学家冈纳·缪尔达尔主持写作的。它对美国的种族关系从过去、现在到将来都作了一个连续性的叙述。缪尔达尔的结论非常地清楚和肯定:“在这场战争之后,黑人的地位必将有一次重新的定位。”该书详尽叙述了种族压迫的长期历史,坦率地分析了不平等的经济后果。米尔德尔写道:美国“特殊的民族主义的标志”的基础是“美国信条”——即对平等、正义、机会均等和自由的信仰。战争使美国人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这种信念与种族不平等的现实之间存在的矛盾。其结果是,得以启蒙的人们开始抛弃种族偏见,种族偏见此刻成为一种局限于“偏僻落后”的南部乡村的那些“贫穷和未受过教育的”人所特有的一种特征。这样,美国使自己居于一个有利的位置,来面对如何实现自己宣示的理想挑战。<sup>①</sup>

缪尔达尔关于美国价值观和种族政策之间的冲突的议论并不是什么新的思想——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和杜波伊斯早都讲过类似的话。但是当全世界都在进行反纳粹主义的斗争和美国国内黑人提出平等的要求的背景下,缪尔达尔的书便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如果此书一方面指出了一个严重的全国性问题,它同时也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即道德说服,加上有计划的渐变,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联邦政府应该带头废除种族歧视的法律,保证所有的美国人都享有一个“小康的生活标准”。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将这本书称为“关于美国文明的最透彻和最重要的著作”。尽管该书的题目用了“困境”一词,缪尔达尔在书中展示了种族主义如何根深蒂固地进入了美国的法律、政治、经济和社会习俗之中,这说明种族不平等远不止是一种道德困境或白种美国人心灵和思想中存在的一种冲突的问题,说明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的干预。对美国原则的诉诸与对政府的社会调控功能的提倡两者之间的结合,形成了在种族关系问题上的一种自由主义正统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将长期地存在下去。

---

<sup>①</sup> Gunnar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 (New York, 1944), 3-5, 997; Jackson, *Gunnar Myrdal*, 186-97.

247 到1945年,对种族正义的支持成为了自由派资格的一种检验标准,也是自由派有关美国自由概念中的一个中心内容。作家凯里·麦克威廉斯出版了《当你不在的时候》的文集,意在向从前线归来的士兵报告国内发生的变化,他提到“种族问题”已经成为公众意识中的首要问题。种族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保障所有人都处于“一种普遍的公民自由的状态之中,并配之以“特别的改善性措施”来消除在住房、教育和就业等方面所存在的歧视的长期影响。<sup>①</sup>

麦克威廉斯的观点反映了一个左翼自由派政治运动的主张;种族正义与充分就业、个人性的公民自由和扩展了的新政福利社会一起成为这个运动的目标。这些内容是四大自由的表现和逻辑性的延伸。这里所发生的,与其说是新政经济自由主义为一种“以权利为基础”的观点所取代,不如说是对半重合、半分离的种族和阶级问题之间出现的相互交叉的情况一种新的认识。充分就业和公平就业成为了战时组成的进步联盟的代表性口号。在1944年的竞选中,罗斯福自己就坚持认为他的经济权利法案不设种族界限和障碍,要求将公平就业实践委员会变成一个永久性的机构(这个建议遭到国会的阻挠未能实现)。许多自由派则走得更远,坚持认为应通过一系列直接行动来挑战种族主义,包括通过联邦反对私刑的立法,将工会组织延伸到南部,终止就业中的种族歧视行为,以及在住房和接受教育方面的歧视行为,将社会保障和其他新政的计划扩展到包括农业和家庭服务业中的工人。这里出现的是一幅种族融合一致的完整的经济,一个介于新政和60年代伟大社会之间的桥梁。产联官员威拉德·S. 汤森在为《黑人想要什么?》写的评论文章中写道:这样的政策将导致一种“现实的四大自由的实现,”因为它们将使四大自由适用于所有美国人。<sup>②</sup>

随着日本在1945年的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战争结束前四个月

---

① Jackson, *Gunnar Myrdal*, xi; Brinkley, *End of Reform*, 168-70; Myrdal, *American Dilemma*, 209-14; Jack Goodman, ed., *While You Were Gone: A Report on War-time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46), 107-10.

② Biondi, "Struggle for Black Equality," 99-159; Sullivan, *Days of Hope*, 167-80; Brinkley, *End of Reform*, 10, 170; Logan, *What the Negro Wants*, 185.



罗斯福逝世,杜鲁门接掌总统职位。他说,世界将“在这个地球上享有一个自由历史的新开端。”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他反复声明战争的意义在于“自由精神”的胜利。但是,冷战紧跟胜利的喜悦而至,冷战的来临,又开始了对于界定美国自由内容展开了新的较量。<sup>①</sup>

---

<sup>①</sup> *The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Harry S. Truman 1945* (Washington, DC, 1961), 223, 256.

## 第十一章 冷战年代的自由

249

1947年9月16日是联邦宪法颁布160年的纪念日。那一天,“自由列车”在费城对公众开放。这趟用红、白、蓝三种颜色装饰起来的列车是一个载有133件历史文献的流动展览。列车随后开始了16个月的旅行,将流动展览带到了300多个城市。在这之前或之后,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珍贵文献——包括五月花号公约、独立宣言和葛底斯堡演讲——被汇集在一处。展览的灯光设计得很暗(不是为了保护文献,而是为了创造一种宗教圣坛般的气氛),要想仔细咀嚼每份文献的含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自由列车出来后,参观者会被引导去参加“自由宣誓”,以示重新献身于美国价值的决心,并在一个“自由长轴”上签名留念。

自由列车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中最大型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这个展览最初是由司法部在1946年提出的,杜鲁门总统对此表示支持,认为这是将美国自由与“希特勒暴政对自由的毁灭”进行对比的一种方式。因为政府的直接资助都用在了宣传上,该项目转而向非赢利的美国传统基金会求助。传统基金会董事会的成员多为大银行家和工业家,基金会主席是大通银行董事长温斯洛普·W. 奥尔德里奇。民间赞助解决了自由列车的费用,同时也解决了伴随其开展的广告活动的费用,而后者的目的被设计为“向美国人重新推销美国”。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自由列车都是一项巨大的成功。它吸引了3500多<sup>250</sup>万的参观者,还有更多的人参加了伴随这项展览开展的各种公民教育活动以及爱国主义游行。与后来的一些庆祝活动(如1986年的自由女神像100周年纪念活动)不同的是,自由列车没有屈就于粗俗的商业文化的摆布——自由列车展览没有替任何商品做宣传,也没有接受任何著名品牌的赞助。《新共和国》写道,那种来自普通人民的对自由列车的强烈反响充分表现出一种

深切而普遍的渴求，人们希望看到“美国自由的有形有体的证据”。但在这个展览的背后，自由列车所表现出的自由的定义仍一如既往地充满争议。国家档案馆里那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馆员们在送展文献清单上列有瓦格纳法和罗斯福的关于四大自由的演讲，但它们却被更为保守的美国传统基金会删除了。同时被删除的还有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以及罗斯福关于建立公平就业实践委员会的行政命令，当时的国会刚刚终止了这个委员会的运转期限。最后，自由列车没有收到任何有关工会运动或 20 世纪社会立法方面的文献，仅有的与黑人有关的文献是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和一封由南卡罗来纳州的爱国者亨利·劳伦斯在 1776 年写的批评奴隶制的信。<sup>①</sup>

在展览计划的准备过程中，黑人几乎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许多黑人甚至对展览本身持有怀疑的态度。“我要自由本身，而不需要自由列车，”保罗·罗伯逊说道。在自由列车揭幕的前夜，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说，他希望“自由列车上将不会实行种族隔离法”。当自由列车在密西西比州内停留时，休斯问道，“会不会直言不讳地说/每个人都有权登上自由列车？”事实上，杜鲁门政府已在准备将民权作为一个主要问题来优先处理，鉴于这种背景，自由列车的组织者宣布，他们不会容忍任何带有种族隔离性质的参观活动。在佐治亚州，一辆展有南部邦联的宪法和其他南部历史文献的经过改装的行李车厢，始终伴随着自由列车在该州的展出。当孟菲斯的地方政府坚持要对参观者实行种族隔离的规定时，美国传统基金会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取消了自由列车在当地的展出。自由列车在 47 个南部城市巡回展出，没有发生任何意外，黑人的报纸为它欢呼，认为它冲破了一——哪怕是极为短暂的——那些被认为是无

---

① Frank Monaghan, *Heritage of Freedom: The Hi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Basic Documents of American Liberty* (Princeton, 1948); Michael Kammen, *Mystic Chords of Memo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 i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1991), 576-79; Stuart J. Little, "The Freedom Train: Citizenship and Postwar Political Culture 1946-1949," *American Studies*, 34 (Spring 1993), 35-67; James G. Bradsher, "Taking American's Heritage to the People: The Freedom Train Story," *Prologue*, 17 (Winter 1985), 229-34; *The New Republic*, September 20, 1948.

深切而普遍的渴求，人们希望看到“美国自由的有形有体的证据”。但在这个展览的背后，自由列车所表现出的自由的定义仍一如既往地充满争议。国家档案馆里那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馆员们在送展文献清单上列有瓦格纳法和罗斯福的关于四大自由的演讲，但它们却被更为保守的美国传统基金会删除了。同时被删除的还有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以及罗斯福关于建立公平就业实践委员会的行政命令，当时的国会刚刚终止了这个委员会的运转期限。最后，自由列车没有收到任何有关工会运动或20世纪社会立法方面的文献，仅有的与黑人有关的文献是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和一封由南卡罗来纳州的爱国者亨利·劳伦斯在1776年写的批评奴隶制的信。<sup>①</sup>

在展览计划的准备过程中，黑人几乎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许多黑人甚至对展览本身持有怀疑的态度。“我要自由本身，而不需要自由列车，”保罗·罗伯逊说道。在自由列车揭幕的前夜，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说，他希望“自由列车上将不会实行种族隔离法”。当自由列车在密西西比州内停留时，休斯问道，“会不会直言不讳地说/每个人都有权登上自由列车？”事实上，杜鲁门政府已在准备将民权作为一个主要问题来优先处理，鉴于这种背景，自由列车的组织者宣布，他们不会容忍任何带有种族隔离性质的参观活动。在佐治亚州，一辆展有南部邦联的宪法和其他南部历史文献的经过改装的行李车厢，始终伴随着自由列车在该州的展出。当孟菲斯的地方政府坚持要对参观者实行种族隔离的规定时，美国传统基金会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取消了自由列车在当地的展出。自由列车在47个南部城市巡回展出，没有发生任何意外，黑人的报纸为它欢呼，认为它冲破了一一哪怕是极为短暂的——那些被认为是无

---

① Frank Monaghan, *Heritage of Freedom: The Hi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Basic Documents of American Liberty* (Princeton, 1948); Michael Kammen, *Mystic Chords of Memo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 i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1991), 576-79; Stuart J. Little, "The Freedom Train: Citizenship and Postwar Political Culture 1946-1949," *American Studies*, 34 (Spring 1993), 35-67; James G. Bradsher, "Taking American's Heritage to the People: The Freedom Train Story," *Prologue*, 17 (Winter 1985), 229-34; *The New Republic*, September 20, 1948.

法冲破的种族隔离的厚墙。<sup>①</sup>

如果自由列车展览反映出了全国上下日渐增长的对毫不掩饰的种族不平等行为的反感情绪,它的旅行也揭示了冷战的影响。自由列车的计划是在二战结束后开始构思的,专题是对比美国自由与纳粹暴政,但自由列车很快卷入了正在出现的美国与共产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斗争(尽管与自由列车最为类似的一个先例是1918年的列宁列车),这辆列车将布尔什维克的书籍、报纸、电影和先锋派的张贴画送到了俄国农村)。1947年春天,就在自由列车启程前的几个月,杜鲁门总统将美国置于一场在世界范围内遏制苏联强权的斗争中。随后不久,联邦总检察长汤姆·C. 克拉克对自由列车大加赞颂,说它是一种防止“外来意识形态”侵入美国的手段,是“为政府在打击颠覆因素的内部斗争中所提供的一种援助”。联邦调查局同时开始行动起来,收集有关那些反对自由列车的人的情况。因此,如果说自由列车拉开了一个新时代——即自由的语言浸透弥漫于美国政治、文化与社会各个方面的时代——的序幕,它同时也表现出了这样的现实,即冷战如何微妙地重新界定了自由的内容和实践,将自由与反共主义、“自由企业”以及对社会和经济现状的辩护等同起来。<sup>②</sup>

## 自由世界

回想起来,美国和苏联这两大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的强国将陷入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两国在战时结盟是因为它们需要面对共同的敌人,而不是因为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长期利益、价值观或历史,而这种盟友关系几乎在宣布和平的那一天起就崩溃了。1946年初,在那份发自莫斯科的著名的冗长电文中,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告诫杜鲁门政府说,苏联人决心要在全球扩

① Little, "Freedom Train," 53-61; *The New Republic*, September 15, 1947; Bradsher, "American's Heritage," 234-41; *Library Journal*, February 1, 1948.

② Kammen, *Mystic Chords of Memory*, 573-76; Bradsher, "America's Heritage," 237-238; Robert Griffith, "The Selling of America: The Advertising Council and American Politics, 1942-1960,"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57 (Autumn 1983), 397-98.

张他们的权力,美国对此将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两周后,在密苏里州富尔顿的一次演讲中,英国的战时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宣称道,一道“铁幕”在欧洲降落,将自由的西方与共产主义的东方一分为二。但是要等到1947年3月,当他在演讲中提出了后来为人熟知的“杜鲁门主义”之后,杜鲁门总统才正式将冷战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并将其定位为一场全球范围的有关自由未来的斗争。<sup>①</sup>

当英国宣布它不能继续为处于共产党领导的暴动威胁之下的备受困扰的希腊和土耳其政府继续提供经济援助的时候,实际上立即为杜鲁门政府作出划时代意义的决定提供了一个机会。杜鲁门的结论是,美国担负起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共产主义的责任的时代已经来临。杜鲁门的智囊们明显地意识到,如杜鲁门的演讲起草人约瑟夫·M. 琼斯后来所回忆的,“美国历史上一个主要的转折点”就“在眼前”,他们前后一共将杜鲁门的演讲写了九稿。一些草稿曾强调遭到战争破坏的欧洲在经济上的需要。但总统抱怨说,稿子写得枯燥 253 无味,就事论事,“把整个事情弄得听上去像一份投资申请报告。”后来的几稿就变得更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了。参议院领袖阿瑟·范登堡告诉杜鲁门说,如果总统想要说服并不情愿的公众和国会支持美国在海外扮演一个永久性的角色,惟一的办法就是“大大地吓唬吓唬”美国人民。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杜鲁门动用了他的语言武器库中的最重型的武器——捍卫自由。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现在必须承担起支持“热爱自由的人民”的责任,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在18分钟的演讲中,杜鲁门一共24次使用了“自由的”或“自由”的字眼。<sup>②</sup>

① Melvyn P.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1992), 99-109; Lynn B. Hinds and Theodore O. Windt, Jr., *The Cold War as Rhetoric: The Beginnings, 1945-1950* (New York, 1991), 89-94.

② 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New York, 1969), 220-21; Joseph M. Jones, *The Fifteen Weeks* (New York, 1955), 138-43; Thomas J. McCormack, *America's Half-Centur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in the Cold War* (Baltimore, 1989), 77-78; Leffler, *Preponderance of Power*, 146-51; *The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Harry S. Truman 1947* (Washington, DC, 1963), 178.

“杜鲁门主义”沿用了战时那种将世界划分为自由的和受奴役的两分法模式,同时运用了一个历史悠久的救世主思想,即美国的使命就是战胜黑暗力量对自由的进攻,可以说,杜鲁门主义创造了一种语言,大部分美国人就是通过这种语言来认识战后世界的。参议员 J. 威廉·富布赖特后来写道,在建立“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性原则”方面,杜鲁门主义的作用胜过任何其他声明或宣言。随着冷战在随后几个月中变得日益激烈和紧张起来——包括柏林封锁、共产党政府在中国的建立、北约的成立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等事件在内——冷战的语言也变得尖锐起来。苏联的目的,《生活》杂志在 1950 年宣称说,是要“奴役全世界的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那一年,另一份重要的冷战文件,即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68 号文件(NSC68),发出了响亮的号召,要求美国开始建设永久性的军事力量,以便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反共斗争。这份文件由国务院官员保罗·尼策为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它将冷战描述成为一场“自由的思想”与“在克林姆林宫那个面目狰狞的寡权政治控制下的奴隶制思想”之间的斗争。这种语言构成了一个基本的思维框架,杜鲁门正是在这个框架之下来理解他的总统任期的历史意义的。1953 年他退休后回忆说,“我在办公室里度过的每一天几乎都为这场全方位展开的斗争所占据,这是一场热爱自由的人与想把世界带回到奴役与黑暗中的人之间的斗争。”<sup>①</sup>

虽然他们并不同情苏联的共产主义,但也有一些当时的批评家指出,将冷战生硬地定位成世界范围内自由与奴役的斗争,会产生一些不幸的后果。凯南的冗长电报导致了“遏制”政策的产生,但他认为杜鲁门主义那种一概而论的语言使得以个案方式来审视国际危机或判断哪一个危机才真正威胁到自由或美国的利益,统统变得不可能了。在其对杜鲁门政策的深刻批评中,沃尔特·李普曼反对将外交政策变成一种“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讨伐运动”。李普曼支持对希腊和土耳其进行援助。但他指出,欧洲以外的世界正在经受革命民族主义的洗礼,在这场巨大的变革中,共产党人势必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他非

<sup>①</sup> J. William Fulbright, *The Crippled Giant* (New York, 1972), 6-24; *Life*, August 7, 1950; Ernest R. May, ed.,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Interpreting NSC 68* (Boston, 1993), 1-27; Leffler, *Preponderance of Power*, 313-56, 495.

常正确地预测到：如把任何对现状的挑战都看成是苏联权力的扩张的话，美国将不得不网罗和资助“一大批形形色色的卫星国、受庇护者、依附者和傀儡政权”，同时也不得不连续不断地干涉其他国家的政治事务，而发生在那些国家中的政治变动并非都是因苏联的扩张所导致，也并非都可以随意地用自由与奴役的两分法来界定。亨利·华莱士也谴责了杜鲁门的政策。他代表了另外一部分人的声音，这部分人认为经济合作比起军事对抗将更为有效地传播美国自由。1948年，他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总统大选，支持者中包括了已经变得势单力薄的共产党人以及许多梦幻破灭的新政拥护者。他的惨败也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对美国外交政策基础的公开批评都变得不再可能了。<sup>①</sup>

在实践中，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远不像冷战语言所描述的那样具有救世情结和救世精神。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与自由的思想一起，对美国外交政策具有同样的影响力。但是那种为自由而战的语言一直没有改变，这种语言被用来说明为什么政府必须建立一大堆不受民主监督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机构，如原子能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CIA)(分别建立于1946和1947年)，同时也用来证明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行动是合理的有必要的，尽管那些行动无论从哪一种自由的定义出发与自由都毫无关系。中央情报局在20世纪50年代初策划在危地马拉和伊朗的政变，用那些拥护美国利益的独裁者取代了民选政府，因为后者被认为对美国的海外投资形成了威胁。这些事件在当时都被奉为“自由进步”的样板。<sup>②</sup>

---

① George F. Kennan, *Memoirs* (2 vols. Boston, 1967-72), I, 312-22; Walter Lippmann, *The Cold War: A Study in U. 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47), 13-26, 44-46; Barton J. Bernstein, "Walter Lippmann and the Early Cold War," and Ronald Radosh and Leonard P. Liggio, "Henry Wallace and the Open Door," in *Cold War Critics: Alternatives to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Truman Years*, ed. Thomas G. Patterson (Chicago, 1971), 19-40, 76-107; Steven M. Gillon, *Politics and Vision: The ADA and American Liberalism, 1947-1985* (New York, 1987), 25-31, 55-58.

② Leffler, *Preponderance of Power*, 14-16; Melvyn P. Leffler, *The Specter of Commun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17-1953* (New York, 1994), 126; Tony Smith, *America's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冷战时期的自由是一个循环论证的概念。如果一个国家是美国领导的世界反共军事同盟中的一员,它就自动成为了“自由世界”的一部分。对自由的这种使用产生了一系列非常诡异反常的现象,如艾森豪威尔总统竟然对法西斯主义的西班牙赞不绝口,称赞其对自由所做出的贡献;尽管南非共和国中占人口少数的白人几乎剥夺了那个国家黑人人口的所有权利,但它仍被包括在“自由世界”的范围之内。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艾森豪威尔所作的最严厉的批评只是称其为“一件棘手的事”。他把那些在越南为捍卫摇摇欲坠的法兰西帝国的士兵称为捍卫“人类自由事业”和“自由世界生存”的勇士。一位评论家问道,有没有什么别的途径使美国能够现实地接受“暴君们的支援,而不将暴君与自由等同起来,以避免污染我们的语言”?<sup>①</sup>

如果冷战导致了一个令人难堪的海外同盟的产生,它也使国内对公民自由255 的攻击变得合法化起来。将世界分成自由与奴役两个极端自然将那些与共产主义有关联的人划入自由的敌人之列。尽管自由一直被赞颂为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基础,但随着冷战的升级,保持异见的权利也不可避免地遭到攻击。在宣布杜鲁门主义后不到两周内,杜鲁门总统建立起一个忠诚审查计划,在这个计划的实施中,在无法面对指控人的情况下,联邦政府的雇员被强迫性地要求表现他们对美国的爱国主义,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受到了什么指控。随后不久,国会的委员会以及州一级的类似委员会开始传召公民去作证,要求他们公开过去和现在的政治活动与思想。突然之间,所有参加受共产党影响的组织的行为,甚至对有共产党人参与的运动的卷入,如十年前反对佛朗哥叛乱,保卫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战争等,都具有了邪恶的涵义。在全国各地,到处都在进行忠诚宣誓,“颠覆分子”纷纷被解职开除。学术界也得了一种“集体性意志失落症”,对

---

*for Democr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1994), 197-98; Allen Dulles, "Progress of Freedom Abroad,"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December 1, 1954, 869.

① Hinds and Windt, *Cold War as Rhetoric*, 129, 139;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1987), 165-67; *The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Dwight Eisenhower 1954* (Washington, DC, 1960), 399; *Dwight D. Eisenhower 1959* (Washington, DC, 1960), 871; Glenn E. Hoover, "Freedom vs. Power,"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October 15, 1959, 22.

于那些利用宪法权利来反对自证有罪或拒绝作证反对他人的教师,大学将他们除名。这样的行动是必要的,罗特杰大学校长路易斯·W. 琼斯说,这样才能确保高等教育机构始终是“西方自由传统的卫士”。<sup>①</sup>

到1950年,反共运动已经制造出一种影响广泛的恐惧气氛。在从华盛顿写来的信中,历史学家霍华德·贝尔把华盛顿的城市生活描写成充满了“监视偷听、怀疑以及造谣中伤”,“民主自由”面临危险,权力落入到某些人手中,“他们的价值观正是极端主义的价值观,他们的方法正是警察国家的方法。”四年后,类如《生活》这样的主流杂志评论说,对拒绝归顺主流的行为的打击迫害致使美国人不愿讲真话。《生活》杂志指出,“自由”因为“不被使用”而可能面临了比共产主义颠覆活动更具有威胁性的危险。<sup>②</sup>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反共主义达到了高潮,对美国政治和文化的结构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但这个以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名字命名的时代带有一种神秘感。麦卡锡的专门委员会制造和散布了大量的指控,指责政府雇员、军队官员以及民主党的领袖人物是共产党或共产党的同情者。那个弱小的美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安全谈不上有任何威胁,许多“恐红”时期的受害者与共产主义也并没有多少联系,甚至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反共主义有许多不同的面目和目的。它是一个有影响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尤其是在那些当时处在苏联控制之下的东欧国家移民居住区里和那些天主教影响巨大的社区(如爱尔兰裔社区)中。反共主义也成为一些个人和 256 团体的武器,被用来进行那些与反颠覆和保卫美国完全无关的活动。

对于麦卡锡和他的共和党追随者来说,反共主义的目标往往不是斯大林,而是罗斯福。反共主义实际上成为保守派推翻新政的长期斗争中一件威力无

① Samuel Walker, *In Defense of American Liberties: A History of the ACLU* (New York, 1990), 174-88; Albert Fried, ed., *McCarthyism: The Great American Red Scare* (New York, 1997), 7, 24-34; Ellen W. Schrecker, *No Ivory Tower: McCarthyism and the Universities* (New York, 1986), 9, 117, 309-39; Peter Novick, *The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New York, 1988), 328.

② Howard K. Beale to Merle Curti, April 8, 1950, Merle Curti Papers,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 *Life*, July 5, 1954.

比的工具。对许多民主党人来说,反共主义既是一种抵挡共和党人提出的不忠于美国的指控的自卫形式,也是一件维护该党未来的武器,同时也是重新划定可以接受的自由主义界限的一个新机会,以便将一切共产党人或那些愿与共产党人进行合作的势力(如在人民阵线时期那样)驱除出去。的确,对共产党人“带有同情感的组织”——无论是在过去还是此时——都成为政府忠诚计划之下被审查和指控的基础。对于商业界来说,反共主义运动成为它们指责政府奉行社会主义原则、干预经济的整个运动的一部分。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来说,反共主义成为反对黑人争取民权的武器之一,也成为雇主反对工会、传统的性道德和性别等级的卫道士反对同性恋的工具,所有这些异端统统被视为对美国的战斗精神有着巨大的腐蚀性和破坏性。(同性恋者和裸体俱乐部的成员被正式禁止受到联邦政府部门雇用。)<sup>①</sup>

毫无疑问,在美国有苏联间谍。但同样不可怀疑的是,大部分在麦卡锡时代被监禁和剥夺了生活来源的人的所谓罪行,不过是坚持了一种不受欢迎的信仰和从事了完全合法的政治活动。如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一样,联邦法院默认了这样的政治迫害,再次验证了麦迪逊说过的至理名言,大众性歇斯底里将冲破“羊皮纸障碍”而对自由进行限制。在20世纪50年代,公民自由的倡导者约翰·弗兰克写道:“第一条宪法修正案……已经进入了冬眠状态。”1951年,联邦最高法院以史密斯法的名义支持将11名美共领导人投入监狱的判决。大法官雨果·布莱克写道:显然只有“安全”的意见才能受到权利法案的保护。即便是许多自由派人士,此刻也纷纷从原来的立场上后撤,不再将表达自由看成是所有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全国公民自由联盟拒绝为定罪

---

<sup>①</sup> Frederick F. Siegel, *Troubled Journey: From Pearl Harbor to Ronald Regan* (New York, 1984), 48, 78; M. J. Heale, "The Triumph of Liberalism? Red Scare Politics in Michigan, 1938-1954,"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39 (March 1995), 44; Leffler, *Specter of Communism*, 121; Charles H. Martin, "The Rise and Fall of Popular Front Liberalism in the South: The Southern Conference for Human Welfare, 1938-1948," *Perspectives on the American South*, 3 (1985), 124-30; John D'Emilio and Estell B.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s: A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1988), 292-93.

的共产党人辩护。在1950年发表的一篇名为“是异端邪说,但不是阴谋”的颇有影响的文章中,曾经是前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家悉尼·胡克宣称,对学术自由的正常保护不适用于共产党人。胡克是全美争取文化自由委员会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个委员会斥责苏联使文化生活与思想生活屈从于政治,但它却企图将美国知识分子动员起来为冷战充当马前卒。这个委员会的领导层很快与麦卡锡主义握手言和。德怀特·麦克唐纳讥讽说,这个委员会应当把自 257 己称为是全美争取俄国文化自由委员会。<sup>①</sup>

冷战势必也影响了国内政治的议程。195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含糊其辞地提到,为了资助军备,必须推迟“某些被期望实施的项目”。尽管要求国内改革的呼声并没有消失,而且这种呼声还可被当作是增加美国在保卫自由战斗中的力量的合理要求,但国内政治讨论的范围却大大缩小了。在杜鲁门政府的初期,美国面对了被有些学者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的运动。全国产联开展了“迪克西战役”,希望借此在南部建立工会组织,动摇南部白人种族主义者政治控制权的基础,随着这一活动,杜鲁门企图实施罗斯福的经济权利法案。但“迪克西战役”遭到了失败,国会大权仍然掌握在保守派手中。杜鲁门的建议根本无望得到实施。1948年杜鲁门的连任胜利说明选民无意抛弃新政的改革。事实上,在50年代,由作为新政的象征的社会保障计划所覆盖的人数大大增加了。在新增加的人数中有第一次得以享受社会保障的家政业和农业的工人。<sup>②</sup>

但冷战为那些反对进一步改革的人提供了有力的弹药。美国医学协会

---

① Frank in Michael J. Klarman, "Rethinking the Civi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Revolutions," *Virginia Law Review*, 82 (February 1996), 34; Walker, *Defense of American Liberties*, 175, 187; Richard H. Pells, *The Liberal Mind in a Conservative Age: American Intellectuals in the 1940s and 1950s* (New York, 1985), 264; Fried, ed., *McCarthyism*, 64; Michael Wrezsin, *A Rebel in Defense of Tradition: The Life and "Politics" of Dwight MacDonald* (New York, 1994), 273.

② May, NSC 68, 154; David Plotke, *Building a Democratic Political Order: Reshaping American Liber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New York, 1996), 311-12; Ira Katznelson, "Was the Great Society a Lost Opportunity?"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w Deal Order, 1930-1980* (Princeton, 1989), ed. Steve Fraser and Gary Gerstle, 187-94.

(AMA)发起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公关运动,成功地借助“社会化医疗”的幽灵来诋毁杜鲁门关于建立全国性健康保险制度的建议。房地产业动员起来反对公共住房计划,将其称为“社会化的住房”,是一个与莫斯科相关的整体的一部分。随着福利国家进一步扩大化的思想逐渐消失,各种私人福利机构和安排纷纷出现。加入工会组织的工人通过合同建立起了医疗保险计划、生计工资费用的自动加升、带薪假期以及失业补助金等福利,但这些福利并不为大多数人所享有。<sup>①</sup>

每个政治和社会组织都必须与反共主义达成某种默契,否则将面临灭顶之灾。这对于劳工和民权运动来说是非常痛苦的经历,因为在这些运动中的一些非常具有战斗能力的组织者是共产党人。1947年的塔夫脱-哈特利法要求工会领袖宣誓表明他们不是共产党,否则便取消该工会的集体谈判权和法律保护权。在这项法律通过之后,全国产联开除了一大批左翼工会领袖,宣布与11个共产党人领导的工会脱离关系,这些工会代表着将近100万工人群众。<sup>②</sup>民权运动也经历了一个改头换面的过程。在杜鲁门政府的初期,美国黑人258人的地位问题在全国事务中占据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突出地位。在1945至1951年间,有11个北部州建立了公平就业实践委员会,相当数量的城市立法反对就业中的种族歧视和使用公共设施方面的偏见等,这些立法和政策的取得是一个由劳工、教会和黑人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1947年10月,杜鲁门的民权问题调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名为《保障这些权利》的报告,其中对美国社会中的种族不平等提出了毫不留情的指责,要求政府出面干预,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在住房、就业、教育和刑事犯罪程序方面保证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杜

① Alonzo L. Hamby, *Liberalism and Its Challenges, FDR to Reagan* (New York, 1985), 63-70; Robert Griffith, "Forging America's Postwar Order, Domestic Poli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Age of Truman," and Nelson Lichtenstein, "Labor in the Truman Era: Origins of the 'Private Welfare State'," both in *The Truman Presidency*, ed. Michael J. Lacey (New York, 1989), 83-84, 148-55; Marilyn S. Johnson, *The Second Gold Rush: Oakland and the East Bay in World War II* (Berkeley, 1993), 218-20.

② Steven Rossworm, ed., *The CIO's Left-Led Unions* (New Brunswick, 1992); Robert H. Zieger, *The CIO 1935-1955* (Chapel Hill, 1995), 253, 291-93.

鲁门说,这份报告是“一份美国式人类自由宪章”。他接着说,如果美国希望“世界上其他人民”在“自由与奴役之间作一个选择”的话,美国必须“改正我们民主实践中的不完美之处”。1948年,自由派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将一个口气强硬的保证民权的承诺写进党纲中,这个举动使得几个南部的代表团愤然退席,以示抗议。<sup>①</sup>

起初,类似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都市联盟这样的主流黑人组织反对杜鲁门的忠诚计划,并质问为什么将共产主义而不是种族主义列为“非美”行为。但当几位著名的黑人领袖,如保罗·罗伯逊和杜波依斯,开始对冷战提出批评的时候,其他大部分领袖认为他们除了加入反共的行列,没有其他选择。协进会因此开始了一场从自己的地方分支机构和团体中清除共产党人的运动。当政府剥夺了罗伯逊持有护照的权利,并难以置信地以没有登记自己是苏联代理人的罪名将杜波依斯定罪时,没有什么黑人领袖或白人领袖站出来表示抗议。(对杜波依斯的指控如此的荒诞不经,以致即便在反共歇斯底里的高潮中,一个陪审团也宣判他无罪。)这一切事件的结果之一是民权组织在思想和战术上发生了一种微妙的改变。在全国黑人联合会和南部人类福利同盟会等组织中,共产党人与非共人士曾共同合作,将争取种族平等与组织劳工和追求经济改革等目标结合起来,在30年代和二战时期的民权斗争中发挥过关键作用。但这些组织在麦卡锡时代消亡了。它们的终结给民权运动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白,而此时仅靠奉行狭窄的法庭斗争策略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努力,是远远不能填补这个空白的。<sup>②</sup>

---

① Walter A. Jackson, *Gunnar Myrdal and America's Conscience* (Chapel Hill, 1990), 274-79; Robert Korstad and Nelson Lichtenstein, "Opportunities Found and Lost, Labor, Radicals, and the Early Civil Rights Movement," *Journals of American History*, 75 (December 1988), 799-800;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Civil Rights, *To Secure These Rights* (Washington, DC, 1947); David S. Horton, ed., *Freedom and Equality, Addresses by Harry S. Truman* (Columbia, MO, 1960), 16; Harvard Sitkoff, "Harry Truman and the Election of 1948: The Coming of Age of Civil Rights in American Politics,"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37 (November 1971), 597-613.

② Martha Biondi, "The Struggle for Black Equality in New York City, 1945-1955,"

黑人组织此刻完全接受了冷战的思维与语言,并以之来推动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样的发展使自由的思想变得复杂起来,同时也使冷战意识形态更加牢固地作为政治文化的基础建立起来。民权组织和杜鲁门政府都坚持认为,种族不平等是自由社会的一个变异,它玷污了美国的国际形象,被俄国人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事实上,在联邦政府支持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判决的陈述中——在这份 1954 年的判决中,联邦最高法院宣判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制度违反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政府方面敦促大法官们将“种族歧视的问题放到目前世界上正在进行的自由与暴政的斗争背景下”来考虑,并认为种族隔离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造成了“反面效果”。<sup>①</sup>

即便如此,冷战的高潮时期也是一个不能随心所欲地批评美国自由不完美的时间。杜鲁门在发表杜鲁门主义的讲话两个月后,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选择在三角洲委员会上作一次主题演讲,为杜鲁门宣布的支援“自由人民”、保障他们“民主体制”的斗争的承诺进行辩护,三角洲委员会是一个由密西西比州的种植场主、银行家和商人组成的组织。艾奇逊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所选择的为冷战进行辩护的地方是一个后来被历史学家戴维·奥辛斯基称为“美国的西伯利亚”的地方。如果他睁眼看看会场之外的地方,他将会发现当地绝大部分的美国公民并没有享有那些仅在理论上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自由。占三角洲地区人口 70% 的黑人在选择他们的政府方面没有任何发言权,在生活中处于赤贫状态,而且面临着经常性的合法和非法的暴力威胁。“我把这种状况称为奴隶制,”一位分租制佃户农民后来这样描述当地种植园的情形。在他 1969 年发表的回忆录中,艾奇逊把那一天的活动记忆为是“完全彻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7, 386-461; *The Autobiography of W. E. B. Du Bois* (New York, 1968), 380-95; C. Alvin Hughes, "We Demand Our Rights: The Southern Negro Youth Congress, 1937-1949," *Phylon*, 48 (March 1987), 38-50; Adam Fairclough, *Race and Democracy: The Civil Rights Struggle in Louisiana, 1915-1972* (Athens, GA, 1995), 146-47.

① Penny M. Von Eschen, *Race Against Empire: Black Americans and Anticolonialism 1937-1957* (Ithaca, 1997), 2-17, 194, 216-20, 291; Mary L. Dudziak, "Cold War Civil Righ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vil Rights and Foreign Affairs in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2, iii, 170-71.

底的美国式的”，他把三角州地区描述为“一个欣欣向荣、五谷丰登的农业区”。不管怎么说，密西西比三角州是自由世界的一部分。<sup>①</sup>

1948年杜鲁门发布命令，取消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制度，除此之外，在杜鲁门政府中热闹了一阵的民权问题并没有产生其他的结果。州和地方政府通过了一些新的禁止在就业和住房方面实行歧视的法律，但基本上都没有得到实施。1952年，民主党人提名阿德莱·斯蒂文森为总统候选人，斯蒂文森本人对民权问题并不担心，他又选择了一个南部的支持种族隔离的约翰·斯帕克曼作为竞选伙伴，这一切都表明民权问题多么迅速地从政治议程中变得销声匿迹。即便是自由派人士，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注意到，也都变得“对那些他们愿意保存的东西比对那些他们愿意改变的东西更为敏感和留意”。1953年，“颇受尊敬的”纽约州反对住房歧视委员会的主席霍藤斯·加贝尔说：“恐惧”的阴影笼罩在运动之上，结果是“许多人纷纷避免卷入与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有关的活动”。时间将表明，这种民权脉冲的减弱是十分短暂的，但这种减弱却是发生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此时正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住房和就业高潮迅速改组美国社会的结构的时刻，这个时刻为美国白人开放了许多的机会，却将黑人锁定在南部农村或北部那些日益破落衰败的贫民窟中。<sup>②</sup>

到20世纪50年代末，热爱自由是美国社会的根本特征的思想完全融入260到大众意识形态之中。一份民意调查的报告指出，美国人对有关自由的说法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反响，说明一个关于自由价值的“非常广泛的共识”已经建立。看起来，每个国内的政治动议——从肯尼迪政府作出的送人上月球的决

①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227-29; Nan E. Woodruff, "Mississippi Delta Planters and Debates Over Mechanization, Labor, and Civil Rights in the 1940s,"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60 (May 1994), 264-84; David M. Oshinsky, "Worse Than Slavery", *Parchman Farm and the Ordeal of Jim Crow Justice* (New York, 1996), 55; Neil McMillen, *Dark Journey: Black Mississippians in the Age of Jim Crow* (Urbana, 1989), 124-25.

② Biondi, "Struggle for Black Equality," 163-69, 459, 538-41; Plotke, *Democratic Political Order*, 282-84; Gillon, *Politics and Vision*, 87-101;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New York, 1955), 13-14.



定到普通的发展人力资源或修建高速公路的建议——都采用了言过其实的自由语言。在美国文化的评论性著作中,自由成了“压倒一切的词”,将约翰·波洛克的自发性“动态绘画”、约翰·凯奇的表现命运的音乐作品以及乔治·布兰钦设计的由芭蕾舞女演员表现的“优雅的自由”等与美国生活的本质联系在一起。批评家迈耶·夏皮罗指出,美国现代艺术培育出了一个“最确定的自由世界——一个幻想、感受和感情上的内部世界”。历史学家佩里·米勒声称说,美国作品可以吸引“所有地方的自由的人们”,因为这是“一种充满自由的文学”。<sup>①</sup>

在 50 年代,自由也是学术研究、大众媒体新闻、大众文化和官方宣传中的一个逃脱不掉的主题。冷战以公开和隐含的方式,建立起了这种讨论的框架。这一时期最雄心勃勃的关于自由的研究,要数旧金山的哲学研究所主持的项目。这个研究所集中了 20 多位学者,对自古以来西方作者的著作仔细进行研读,弄清它们对自由的理解。这些研究的结果由这个项目的主持人哲学家莫蒂默·阿德勒综合起来,写成了一部厚厚的两卷本的《自由的概念》的著作(1958—1961 年)。阿德勒是 30 年代芝加哥大学“伟大的著作”课程的开创人之一,他本身则代表了美国大众文化的一个新的类型——明星知识分子(或当时人们所称的“学问家”)。他经常出现在电视上或收音机节目中,向听众解释哲学,兜售他关于伟大著作的思想。阿德勒深信自己能够把 2500 年的思想史理清楚,固执己见地把数百位作者的思想硬塞进三种自由的分类: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一个人变成他自己希望的那种人的能力)、作为自我保护的自由(通过智慧和美德所习得的道德状态)以及作为自决的自由(按自己的意愿和行动作出决定的能力)。阿德勒的目标是使当时进行的自由讨论具有一些实质意义,而不仅仅流于一种立场选择的形式。但他的自由体系却使人感到,自由基

---

① Robert B. Fowler, *Believing Skeptics: American Political Intellectuals, 1945-1964* (Westport, 1978), 229; Herbert McCloskey, "Consensus and Ideology in American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8 (June 1964), 365; John F. Kennedy, "Freedom's Cause,"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June 15, 1961, 514-18; Thomas Bender, *New York Intellect* (New York, 1987), 338-39; Miller in Kammen, *Mystic Chords of Memory*, 573.

本上是一种内在素质,而不是一种社会素质。阿德勒虽然提到了政治自由的问题,但它只是被当成自我实现中的一种“特殊变异体”。在他的体系中,有些内容明显地被忽略或排斥了,这些内容曾在历史上影响过美国人关于自由的辩论,如自由与经济结构的关系、与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关系等。另外,他将 261 非西方的思想家排斥在外的做法更加强了这样的看法,即自由是西方社会独有的思想。<sup>①</sup>

除了哲学系的学生外,许多读者不太可能从头到尾通读阿德勒写的厚厚的著作。更适合大众读者口味的和更具有影响力的是“关于自由的两个概念”一文。这是由俄国出生的英国哲学家艾赛亚·伯林在 1958 年发表的一篇文笔优雅的论文。伯林写道,“消极自由”意味着不存在任何阻挡实现自己愿望的外部障碍;“积极自由”指的是一种境况,在这种境况之中,个人能够克服和超越获取自由的内部障碍,如不可控制的需求以及不真实的需要等,从而达到真正的自我实现。伯林的积极自由是一种内心世界的状态,而不是一种社会组织的形式或一种公共政策。但在 50 年代的气氛下,他那种极易使人误解的对自由的简单划分很快被人抓住,用来作为攻击共产主义的工具。“消极自由”代表了西方,因为西方对个人的选择提供了宪法上的保障;积极自由代表了苏联,因为在那里国家将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强加于社会。令伯林极为恼怒的是,他的论文被广泛理解成这样一种意思,即一切干预经济决策的政府行动都属于“积极自由”一类,因此也与共产主义是一丘之貉。伯林的目的不是要否定福利国家的合法性,而是要迫使福利国家主张的支持者通过经济学本身来捍卫经济平等的理想,而不是把经济平等当成一种自由的形式。事实上,当他在 1969 年重新发表这篇论文时,伯林特意指出,消极自由通常被用来作为剥削的通行证,经济上的不平等剥夺了人类享受自由的社会条件。<sup>②</sup>

① Mortimer J. Adler, *Philosopher at Large: 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 (New York, 1977), 225-79; Mortimer J. Adler, *The Idea of Freedom: A Dialec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ions of Freedom* (2 vols. New York, 1958-61).

② Michael D. Torre, ed., *Freedom in the Modern World: Jacques Martain, Yves R. Simon, Mortimer J. Adler* (Notre Dame, 1989), 69; 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与自由的概念一起,冷战的另一个重要的“具有动员和团结力量的概念”是“极权主义”,这个概念强化了存在两个尖锐对立的阵营的现实。这个词出现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最初用来形容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和纳粹德国——这些政体充满了侵略性,受意识形态的驱使,力图将整个公民社会控制在国家权威之下,不给予任何个人权利和其他思想和价值存在的空间。到1950年,麦卡伦国内安全法禁止“极权主义者”进入美国,“极权主义者”也就成了冷战中处在自由对立面的人的代名词。当时的一些主要鼓吹者,如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后来曾后悔当年把苏联“神秘地”描述成一个不会改变的极权国家。但是这个词的广泛使用的确反映出一种非常流行的观念,即自由要求保证个人信仰和活动的私人领域不受政府的干涉,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于管得过多过宽的政府。<sup>①</sup>

因此,如同与纳粹的斗争影响了二战时期对美国自由的理解,冷战再一  
262 次重新改变了美国自由的内容。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在1949年抱怨说,既然美国政治是以“一种颠倒过来的俄国式的否定方式”进行的——即凡是莫斯科捍卫的从定义上讲都是自由的对立面——那么可以说俄国已经征服了美国。自由意味着宪政制度、法治和民主的政治结构,这是区别美国与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志。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便在麦卡锡主义惩罚那些超越了可被接受的政治信仰和个人行为界限的人的同时,不受政府惩罚的、自由表达个人意见的权利却被当成西方自由最完美的内容之一得到赞颂。这样的定义将麦卡锡主义者(尽管他们否定给予“自由的敌人”和“性的叛逆者”以自由的福祉)

---

*Liberty* (New York, 1969), xliii-xlix, 118-72; John N. Gray, "On Negative and Positive Liberty," *Political Studies*, 28 (December 1980), 518; Nancy J. Hirschmann, "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Freedom," *Political Theory*, 24 (February 1996), 50; Perry Anderson, *A Zone of Engagement* (London, 1992), 239-40.

① Abbott Gleason, *Totalitarianism: 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1995), 3, 10-28, 61, 87-88; Les K. Adler and Thomas G. Patterson, "Red Fascism: The Merger of Nazi Germany and Soviet Russia in the American Image of Totalitarianism, 1930's-1940'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5 (April 1970), 1046-48;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Vital Center: The Politics of Freedom* (New York, 1988), x-xiv;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Eight Essays in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1968), 140-58.

与那些反对清洗共产党人的人相提并论起来。对于后者来说,那些孤零零的持异见者正好是自由的象征,正好表现了表达不受欢迎的意见的权利是一个自由社会的特征这一事实。<sup>①</sup>

1950年,自由之家开始对世界各国的自由状况进行评估。它使用的标准是彻头彻尾地政治性的,标准强调公民参加公开选举的权利以及对公共政策发表意见的权利。自由之家坦率地承认在“自由世界”中的一些地方自由并不完美。但它的民意调查明确否定了自由本身包含有相当分量的经济内容的说法。将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保险和其他类似的内容看成自由定义的一部分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错误”。这种结论为路易斯·哈茨在《美国的自由传统》(1955)一书中的观察提供了一个非常贴切的例子,哈茨注意到,冷战的结果之一是流行的观点变得生硬而狭窄,它们不能再欣赏“非政治性定义的自由,并为这些自由的使用弄得不知所措”。<sup>②</sup>

## 消费自由的胜利

事实上,冷战自由的确包含了一个很强的经济内容。在50年代,自由与消费资本主义——或此刻众所周知的“自由企业”——等同起来了。除了政治民主或言论自由之外(这些东西是许多美国的盟国也没有的),将自由世界各国联合起来的是一个基于私有制之上的经济制度。免于匮乏的自由以及它所带有的模糊不清的社会主义思想,此刻已从大众话语中消失了。在宣布杜鲁门主义的讲话前一周,杜鲁门发表了一个重要的关于经济政策的讲话,他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减为三大自由。他保留了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但免于匮乏和恐惧的自由却被换成了自由企业的自由,杜鲁门说,这是“我们美国的最基

① MacLeish in Studs Terkel, *"The Good War": An Oral History of World War Two* (New York, 1984), 13; John D'Emilio, *Sexual Politics, Sexual Communities, The Making of a Homosexual Mino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1983), 43-44.

② Raymond D. Gastil, ed., *Freedom in the World: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1978* (Boston, 1978), 4-5; Louis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1955), 306.

263 本内容”。因此,自由企业取得了一种基础自由的位置,变成了美国生活方式的官方定义的一个内容。<sup>①</sup>

在冷战时期,“自由企业的推销”变成了一个主要产业,牵涉到大公司的广告制作、学校的教育计划、报纸的社论写作及公民活动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对自由企业的歌颂无处不在地体现在美国生活中。广告业委员会深信,广告业“在世界范围的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是“一件新式武器”,它运用了素为美国人珍爱的自由女神塑像和独立钟来为“竞争性的自由企业”服务;与此同时,商业杂志则拼命鼓吹,自由意味着经济活动不受政府控制等。显然,这些鼓吹自由企业的人并不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意见一致。广告业委员会代表了可被称为商业界中的自由派的声音,它主张自由企业与政府-商业间的合作,在它1949年花费了100万美元制作的“美国经济制度”的广告宣传中,这个委员会肯定了劳工的集体谈判权。但广告的主题思想却是,现存的经济秩序产生出了“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和最大的自由”,它将是神圣而不可改变的。到1958年,一个民意调查显示,82%的回答者(以及87%的“有影响的人”)都认为“我们的自由取决于自由企业制度”。<sup>②</sup>

如德国出生的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所指出的,市场竞争变成了“个人自由的某种主要模式”。用自由企业来描述一种经济,看上去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做法,因为这种经济的主要部分是由少数几个大公司控制的。另外,20

---

① Robert Skidelsky, *The Road from Serfdom,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End of Communism* (New York, 1995), 5-8;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Truman 1947*, 169.

② Elizabeth A. Fones-Wolf, *Selling Free Enterprise: The Business Assault on Labor and Liberalism 1945-1960* (Urbana, 1994), 1-3, 44-51; Robert H. Haddow, *Pavilions of Plenty, Exhibiting American Culture Abroad in the 1950s* (Washington, DC, 1997), 46-52; Griffith, "Selling of America," 388-412; Francis X. Sutton, et al., *The American Business Creed* (Cambridge, MA, 1956), vii-2, 22-26, 253; Marver H. Bernstein, "Political Ideas of Selected American Business Journal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7 (Summer 1953), 258-67; Howell J. Harris, *The Right To Manage: Industrial Relations Policies of American Business in the 1940s* (Madison, 1982), 8-9, 189-92; Herbert McCloskey and John Zaller, *The American Ethos: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MA, 1984), 133.

世纪 50 年代对自由企业的赞颂并不一定包括对组织劳工的权利的支持,也不见得对由新政开创的政府干预模式的支持。自由派对自由企业的热情丝毫不亚于保守派。不容置疑的是,因为自由企业与冷战自由联系在一起,保守派作者的观点因而变得名正言顺,他们将自由企业严格地限定在自由放任主义的意义之内。但他们发挥最重要影响的时刻还是在未来。在 50 年代,自由企业的定义与经济权力的结构,与新政的传统影响关联不大,它指的主要是一个繁荣兴旺的市场的存在,尤其是在消费品的生产方面。商标基金会的一个广告宣称:“没有商品的自由交换,就不会有拥有自由的人民。”

随着消费文化在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达到了它的顶峰,把消费主义当成自由的象征的赞美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1952 年,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戴维·利连索尔写道,美国人必须抛弃在进步时代和第二次新政时期中的那种强烈突出的对“大商业”的厌恶和反感,必须抛弃那种认为集中起来的经济力量会威胁“我们拥有的自由”的恐惧心理。大规模的生产对于冷战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可以通过消费品的成倍增加来增强自由。利连索尔写道,“在我看来,自由基本上指的是能够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进行选择的自由,……自由意味着当一个消费者花钱时,他有一个最大的选择范围。”当然,这种思想在 50 年代以前就出现了,但此时美国人口中的大多数人开始第一次享受到了消费经济的全部好处。<sup>①</sup>

在这个史无前例的经济扩张和生活水平迅速上升的时代中,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得到了回报。1946 至 1960 年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在每一个可测量的方面——食物质量、住房、工资、教育和娱乐消遣等——美国人都生活得比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要好得多。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住房建筑业的发展和在消费产品上的花费;战后婴儿潮的出现,加大了对住房、电视机、家

---

① Norbert Elias, *Reflections on a Life*, trans. Edmund Jephcott (Cambridge, UK, 1994), 138-39; Sutton, *American Business Creed*, 253;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 (New York, 1994), 8; David E. Lillienthal, *Big Business: A New Era* (New York, 1952), ix-9, 40, 137-40; Stuart Ewen, *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 Advertising and the Social Roots of Consumer Culture* (New York, 1976), 211.

用电器和汽车的需求。新的城市郊区在全国版图上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使大多数的美国人拥有房屋的梦想成真。到1960年,居住在郊区独门独产的住房的人口数超过了居住在都市和乡村的人口数,单门独户的家庭住房(指不与邻居住房连接、完全独立的家庭住房。——译者)成为一种质量更高的生活的具体象征。拥有家庭住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成为一种美国信条。战后繁荣的受惠者之一的里卡·卡提德斯是一个清洁工人,他毅然决定把家搬到波士顿的郊区,对他来说,家变成了“自由的中心”。尽管城郊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联邦政府的税收补贴、房屋购买的贷款担保、高速公路的建设、军事开支以及在退伍军人福利法下的各种优惠政策,但冷战时期的繁荣大大扩大了那些将自由与自由企业并为一体的人的阵营。<sup>①</sup>

1953年,《美丽家居》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人已经达到一个新的自由水平,赋予了追求幸福以及追求自我实现这个永恒目标新的内容,美国人拥有了“比人类文明史上其他任何人民更多、更大的机会来成为自己本来意义上的人”。在一个消费文化中,对自由测量的尺度是一个人满足自己的市场愿望的能力,而不是像19世纪那样,是劳工的社会关系。加州大学柏克利校区校长克拉克·克尔在1960年写道,工业社会可能损害“工作场所”的自由,但在“商品和服务业的选择”上更大的范围可对自由提供补偿,因此,美国人的“个人生活中”拥有了“更大的自由范围”。民意测验显示,此时美国人更关注的是工资水平和工余时间,而不是工作条件和生产过程等问题。<sup>②</sup>

---

① Ronald Edsforth, "Affluence, Anti-Commun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Unionism Among Automobile Workers, 1933-1973," in *Popular Culture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Modern America*, ed. Ronald Edsforth and Larry Bennett (Albany, 1991), 106-10; Elaine T. May, *Homeward Bound: American Families in the Cold War Era* (New York, 1988), 162-70; David Halle, *America's Working Man: Work, Home, and Politics among Blue-Collar Property Owner* (Chicago, 1984), 11-14; Matthew Edel, et al., *Shaky Palaces: Homeownership and Social Mobility in Boston's Suburbanization* (New York 1984), 3-13; Barbara M. Kelly, *Expanding the American Dream: Building and Rebuilding Levittown* (Albany, 1993), 11-16.

② Thomas Hine, *Populuxe* (New York, 1986), 4; Ewen, *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 200; Clark Kerr, et al., *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Cambridge, MA, 1960), 33-41, 295; Howell, *Right to Manage*, 99-105.

对于数百万大都市的居民来说,城郊的乌托邦满足了他们拥有自己家庭<sup>265</sup>住房和中产阶级收入的梦想,这个梦想因为大萧条和战争的原因被推迟。迁往城郊的过程也是美国化的一个重要的推动者,这个过程将城市居民从族裔社区中分离出来,让他们全面进入到中产阶级的大众消费世界中去。一连串的家庭服务业——中央供热系统、室内抽水马桶、电话、电冰箱和洗衣机等——这些在老一代人的记忆中只有真正的中产阶级才能享有的服务和设施,现在变成了普通人家生活中的设置;面对这种繁荣,谁还能够否认资本主义的市场是个人自由的最重要的化身呢?《生活》杂志宣称,“正是通过美国式的自由,目前这种财富和权力的成就才得以形成。”经济繁荣不仅显示了美国生活方式相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绝对优越,而且几乎重新界定了美国的历史使命。历史学家戴维·波特评论说,“我们以为我们的使命是‘民主改变世界’,但在现实中却是‘富有改变世界’”。<sup>①</sup>

一位评论家在1959年写道,“自由的概念对我们来说,变得像一顶旧帽子或一辆新福特车一样熟悉。”除了帽子之外,一辆新福特汽车看起来与投票权和工作场所的自主权在过去的功能一样,都是享受自由福利的必需品。除了家庭住房和电视机外,汽车也变成了社会学家所称的50年代“标准的消费需求组合”的一部分了。汽车的普及是城郊生活发展的支撑点,因而保证了汽车制造商和石油公司占据了“公司化美国”中的头几把交椅,转换了美国的社会画面和日常生活。早在1933年,总统的近期社会动向委员会就将汽车列为“对个人生活的一种主要影响”。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拥有汽车才成为大多数美国人可企及的现实。到1959年,美国的4400万个家庭拥有5600万辆汽车。汽车象征着一种个人移动和私人选择的自由。驾驶汽车的途中,美国人不断地为各色广告、电视节目和流行歌曲所提醒;他们是真正“自由的”;这种情景如同开发西部的探险先驱或乘坐大筏漂流在

① Hine, *Populuxe*, 3-17; Richard W. Fox, "Epitaph for Middletown," in *The Culture of Consumption: Critical Essays in American History, 1880-1980*, ed. Richard W. Fox and T. Jackson Lears (New York, 1983), 103; *Life*, August 14, 1950; Potter in David Farber, *The Age of Great Dreams: America in the 1960s* (New York, 1994), 15-16.



密西西比河上的哈克贝里·费恩的现代版，他们能够把喧闹拥挤的城市和工作场所的紧张压力远远地甩在身后，轻松愉快地扑向“开放的道路”。<sup>①</sup>

城郊居住区作为美国自由的一个主要场所的出现，也使家庭承受了更多的压力——尤其是妇女——以实现自由的承诺。战争的结束使妇女在家庭外就业的人数急剧下降，同时也导致一种旧的妇女就业模式的回返，即工作的妇女集中在收入低的秘书、销售和服务业中。尽管妇女就业人数很快有所回升，  
266 妇女工作的性质和目标却发生了变化。《观望》杂志说，现代妇女只是半日制地工作，工作的目的是支持家庭的城郊中产阶级式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帮助家庭摆脱贫困或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以及获得独立的职业生涯。尽管妇女就业的人数在上升，但郊区化生活的梦想指的是，父亲外出工作，母亲全职照顾孩子（每家平均有 3.2 个孩子）、丈夫和家庭。家庭生活是尘世的避风港和全职母亲是妇女的“领域”，这种传统的看法在美国有很长的历史。但要到战后城郊化出现之后，这种传统思想才几近成为现实，家庭生活是在与工作场所、亲戚朋友以及社会关系网等城市生活的典型特征在空间上分离后，才得以实现。如同其他一切事物，家庭也成为冷战的一件武器。肯尼迪政府的劳工部副部长詹姆斯·奥康奈尔说，美国妇女能够呆在家里，不进入劳动大军，是将“我们与共产主义世界区分开来”的显著特征之一，因为在共产主义国家，工作妇女的比例很高。<sup>②</sup>

① Everett Case, "The Idea of Freedom: 1959," *Saturday Review*, July 4, 1959, 8; Karal Ann Marling, *As Seen on TV: The Visual Culture of Everyday Life in the 1950s* (Cambridge, MA, 1994), 133-34; Kenneth T. Jackson, *Crabgrass Frontier: 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85), 187; May, *Homeward Bound*, 162; James O. Robertson, *American Myth, American Reality* (New York, 1980), 128; Roland Marchand, *Advertising the American Dream: Making Way for Modernity, 1920-1940* (Berkeley, 1985), 360-61.

② Leila J. Rupp, *Mobilizing Women for War: German and American Propaganda, 1939-1945* (Princeton, 1978), 179; Maureen Honey, *Creating Rosie the Riveter: Class, Gender, and Propaganda During World War II* (Amherst, 1984), 23-24; *Look*, October 16, 1956; May, *Homeward Bound*, 137; Christopher Lasch, *Women and the Common Life: Love, Marriage, and Feminism* (New York, 1997), 94-104; Judith Sealander, "Moving Painfully and Uncertainly: Policy Formation and 'Women's Issue', 1940-1980," in *Federal Social*

在 50 年代,美国的男人和妇女热心地从事于一种恢复家庭美德的工作。比起 40 年代来,他们结婚更早,离婚更少。冷战高潮期间颂扬的家庭不是那种旧式的、勤俭度日的、父权当道的家庭,而是一种现代的家庭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夫妻双方分担家庭责任,通过共同分享的消费、休闲生活和性生活的乐趣来获取个人自由的满足。换言之,以前所认为的那种与工作妇女联系在一起的个人自由,现在可以在婚姻和家庭中得到。由于现代生活设施的种种方便,妇女们能够在家中坐享她们希望的“最大的自由”。冷冻食品和食物成品,食物专栏作家波培·坎农在 1953 年欢呼道,为现代家庭妇女们提供了“从单调乏味的生活、空间、工作和无经验的窘迫下解放出来的自由”——这真是一个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四大自由截然不同的变化。<sup>①</sup>

如果郊区提供了一个享受美国自由的新地方,这里仍旧保留了一个旧的特征,即硬性的种族界限。郊区生活从不像它的支持者或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是完整统一的。郊区的种类分为上层阶级郊区、工薪阶层郊区、工业化郊区以及都市地界内的“城郊化”居住区。但是,如果城郊化中的阶级同一性被过分夸大了的话,它的种族同一化却是再真实不过了。直到 1993 年,白人居民中的 90% 居住在非白人人口不到 1% 的社区中——这是当年政府、房地产开发商、银行和最初的居民有意识作出的决定所留下的后果。<sup>②</sup>

民权委员会的报告《保障这些权利》指出,如果拥有家庭住房是自由的一个要素,那么,购买房屋方面“机会的平等”“应该为所有美国人所拥有”。但在战后城郊化发展的高潮中,联邦机构继续拒绝按种族限制的条款来为房屋贷款提供担保,这样做的结果是,为住房种族隔离制度提供了资助。即便在 267

---

*Policy: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ed. Donald T. Critchlow and Ellis W. Hawley (University Park, 1988), 85.

① May, *Homeward Bound*, 4-9, 22; Stephanie Coontz, *The Way We Never Were: American Families and the Nostalgia Trap* (New York, 1992), 24-27; Hine, *Populuxe*, 24-29.

② Becky M. Nicolaides, “In Search of the Good Life: Community and Politics in Working-Class Los Angeles, 1920-1955,” 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3, 3-13, 45-54; George Lipsitz, “The Possessive Investment in Whiteness, Racialized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White’ Problem in American Studies,” *American Studies*, 47 (September 1995), 373-74.

1948年联邦最高法院宣布类似的协定不能实施后,银行和私人房地产发展商继续禁止黑人家庭进入郊区,联邦政府的机构拒绝为黑人提供房屋抵押贷款,除非他们是在被隔离的黑人区内买房。由房地产发展商威廉·莱维特兴建的巨大而崭新的社区标志着居住城郊化的革命,但他拒绝黑人在这些社区中居住或买房。1957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莱维特城的六万居民中,没有一户黑人家庭(直到1960年时,莱维特为了应付一件法律诉讼案,才同意向黑人出售房屋)。与此同时,在“旧城改造”的口号下,城市政府用它们的征用权将穷人从一些划为开发区的都市地带迁移出去,并经常以一些白人中产阶级收入标准的公寓楼群取而代之,如1947年开放的纽约州的斯泰弗森特城。在经过多年的抗议和诉讼之后,这些社区才同意接受一小批黑人家庭。<sup>①</sup>

随着从南部农村到北部城市黑人移民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1940至1960年间有300万黑人从南部移民到北部,随后的十年内又有140万黑人来到北方),种族排斥的过程成为一种自动贯彻实施的和自动证明为合理的过程。随着工业行业的工作离开中心城市,流向郊区和南部——这个过程很快将被称为“去工业化过程”——越来越多的黑人被困陷于城市的贫民窟中,在白人心目中,他们始终是与犯罪和社会福利联系在一起。对于住在郊区的居民来说,家庭住房不仅是自由的象征,也是家庭资本的主要积累,他们面对非白人的涌入非常恐惧,担心这样会降低他们原来的生活质量,贬低他们财产的价值。“住房平等也是一种自由”成为了推动住房种族混合化运动的一句口号。但是,拥有郊区住房始终是一种白人的权利,而非白人想要在他们所期望的地方租房或买房的自由,却为由私人财产权、隐私权以及“结社自由”等强有力的理由一起否定。所以,虽然白人内部存在的族裔界限在郊区的熔炉中逐渐消失,虽然在南部出现了一个抗议体制化种族隔离的黑人群众运动,住房

---

① President's Committee, *To Serve These Rights*, 67-70; Gail Radford, *Modern Housing for America: Policy Struggles in the New Deal Era* (Chicago, 1996), 199-204; Richard Polenberg, *One Nation Divisible: Class, Race, and Ethni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38* (New York, 1980), 163; Arnold Hirsch, *Making the Second Ghetto: Race and Housing in Chicago, 1940-1960* (New York, 1983), 3-9, 125-73, 269.

中的种族障碍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公共教育和就业中的种族障碍却在得到强化。对许多美国黑人来说,自由与不自由世界之间的界限是以肤色而不是以铁幕来划分的。一位黑人居民后来在评论洛杉矶的一条标志着进入白人居住区的大街时说:“我们过去常说,阿拉梅达街就是柏林墙。”<sup>①</sup>

冷战时期的繁荣和富有与都市的衰败与种族主义同时存在,后两者是不久将爆发的愤怒抗议的种子。但对于许多 50 年代的观察家来说,美国社会的 268 问题看上去好像已经解决了。与 30 年代和紧随战后那几年的动荡相比,50 年代看上去是一个相当宁静平和的年代,一方面是由于普遍富裕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允许进行政治辩论的范围的缩小。繁荣后的不景气周期、大量失业、资本主义的经济无保障好像基本上消失了。问题当然还是有的,但这些问题解决需要技术上的个别的调整,而不是结构上的调整或激烈的政府干预。尽管有麦卡锡主义的过分举动,学者们仍在欢呼“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的“共识”的胜利;在这个共识中,所有美国人,除那些不满现状的人和狂热分子之外,都在分享同样的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在一个和谐一致的城郊社会中,阶级不再是美国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特征,或不再提供一种有效的社会分析的语言。《财富》杂志声称,美国,而不是俄国,已经取得马克思主义想要争取的无阶级社会的目标。50 年代的作者们强调说,麦迪逊得以重新发现自由的最安全的保障在于将利益集团多元化,使任何一个利益集团都无法控制国家。事实上,在这个精心调制的美国政体中,每个人(除了那些被认为是颠覆分子的人之外)都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思想、商品和政治,极端权力将自动地受到“反对”力量的限制,“其结果是所有的自由和平等都变得更大。”<sup>②</sup>

① Thomas J. Sugrue, *The Origins of the Urban Crisis, Race and Inequality in Post-war Detroit* (Princeton, 1996), 76-88, 127-28, 194, 209-27; Thomas J. Sugrue, "Crabgrass-Roots Politics: Race, Rights, and the Reaction Against Liberalism in the Urban North, 1940-1964," and Arnold R. Hirsch, "Massive Resistance in the Urban North: Trumbull Park, Chicago, 1953-1966,"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2 (September 1995), 522-78; Nicolaides, "In Search of the Good Life," 1-3, 368-73.

② Hobsbawm, *Age of Extremes*, 264-73; Pells, *Liberal Mind*, 130-39; Fowler, *Be-*

宗教差异曾是美国历史上长期紧张关系的原因之一,但这些差异在一个共同的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大前提之下被略去不计了,共同的宗教传统成为50年代文化和政治对话中的中心内容。这种“发明的传统”力图展示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徒之间共享同一历史和价值体系,都为美国自由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在麦卡锡时代,意识形态上的多元主义也许可能被看成是一种“非美”的思想,但群体多元化却成为主流思潮,因为宗教信仰的自由表现了另外一种对美国的社会生活方式与共产主义社会生活方式的区分。为了突出显示美国与无神论的俄国之间的对比,“加强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全民抵抗”,国会在50年代把上帝也请出来作为冷战的盟友,在忠诚宣誓中加入了“在上帝之下”的词语,并宣布“我们将信任寄托于上帝”为国家的官方格言。如果说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思想淡化了不同宗教派别之间长期对立的历史,它同时也反映出反犹太和反天主教势力的衰退以及美国生活中不断扩大的世俗化。如同威尔·赫伯格在那本极富影响的著作《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人》(1955年)的书中所指出的,现在宗教不再与那些教会活动或神学价值体系联系在一起,更多的是指个人的认同和群体的同化。他认为,社会的“共同宗教”是美国式的生活,这是一个由民主价值和物质繁荣共同组成的内容,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自由企业”<sup>①</sup>

但偶尔也能听到一些不同意见的声音,这些声音怀疑那些对富有生活的赞美和那种非友即敌的冷战思维方式是否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即美国在何种程度上并没有实现自己的自由的理想。1957年,政治学家汉斯·J. 摩根索注意到自由企业“产生出了新的权力积累,其对个人自由的威胁如同政府权力过

---

lieving Skeptics, 4-18; *Fortune*, 39 (July 1955), 87; Rudolph J. R. Peritz, *Competition Policy in America 1888-1992* (New York, 1996), 181-88; David Riesman, *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 (New Haven, 1961), xxxvi.

① Mark Silk, "Notes on the Judeo-Christian Tradition in America," *American Quarterly*, 36 (Spring 1984), 65-85; Philip Gleason, *Speaking of Diversity: Language and Ethnic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Baltimore, 1992), 177, 212, 246;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inneapolis, 1992), 168; Marvin E. Frankel, *Faith and Freedom: Religious Liberty in America* (New York, 1994), 34-42, 59; Will Herberg, *Protestant—Catholic—Jew: An Essay in American Religious Sociology* (New York, 1955), 46-49, 88-93.

去的威胁一样”。摩根索对进步时代和新政时期思想家的理论作了回应,他认为,废除政府的监管和干预造成了“私有权力不受阻碍的蔓延生长”,此时有必要将国家“呼唤回来”行使“保卫自由”的角色。摩根索相信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府可以扮演一个代表共同福利的角色。社会学家 C. 赖特·米尔斯在指出美国社会中权力不平等时则更为激进,但他对进行有意义的改革的前景也更为悲观。米尔斯的著作对 50 年代主流思想领域的那种自我陶醉的民主多元制观点提出了挑战。他坚持认为,政府权力并不是分散在一个多元的社会群体之中的,相反,它集中在一个“权力精英”手中——这个利益交叉的权力集团是一个由大公司老板、政客和军队中的人组成,他们主宰着政府和社会的命运,把民主变得一钱不值。米尔斯强调说:自由的意义远远超出仅仅拥有“做自己想做的事的机会”,自由要求拥有得到“组合所有现存的选择机会”,而大多数美国人的这个机会实际上都被剥夺了。<sup>①</sup>

现代美国人真的享有自由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政府和媒体把美国描绘成一个自由的大本营,正在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50 年代出现的一系列有影响的社会分析著作却指出,美国人甚至不期望自由。对于米尔斯来说,造成这种情形的祸根不是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结构,而是现代性本身以及心理和文化中的不满足。小施莱辛格在他那部有影响著作《核心》(1949 年)开篇中宣称:“处在 20 世纪中的西方人紧张不安,飘浮不定。”现代生活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孤独和忧虑,使人期望稳定和权威。在《逃避自由》(1941 年)一书中,埃里克·弗洛姆讲述了纳粹主义的起源。在冷战年代,这本书广为流传,许多人都曾读过。弗洛姆提到,在欧洲,这种异化导致许多人甘愿牺牲他们的自由。

在美国也是如此,现代官僚体制似乎完全淹没了自由的个人这种思想。如同戴维·里斯曼在他的名为《孤独的人群》(1950 年)的书中形容的,美国人 270

---

<sup>①</sup> Hans J. Morgenthau, “The Dilemmas of Freedom,” in *The Essentials of Freedom: The Idea and Practice of Ordered Liber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 Raymond English (Gambier, 1960), 137-38; C. Wright Mills,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1957); C. Wright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1959), 174.

是“受他人指导的”顺民,缺乏内在的力量来过一种真正独立自主的生活。其他的社会评论家认为,公司企业制已将曾经有独立思想能力的雇员转化成了“组织化了的人”,大众文化将思想生活和艺术表现降低至一个最低的平均值。从社会学调查的一个新的亚领域——大众传播研究——中发现,经济权势已经以一种“更为微妙的心理剥削”——即对口味、观点和意识的左右和影响——来取代了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中的“直接剥削”。城郊居住区正是千篇一律、墨守成规的大本营,是个人主义的死敌,甚至消费自由也是一种神话,因为广告制作者在“制造共识”方面技艺精湛,完全能够任意操纵一群被动的公众,刺激这个群体增长自己的消费欲望。<sup>①</sup>

这些美国社会的图景汇合起来,几乎可以复制出一个极权主义的定义,在这个意义上的社会中,个人以自由的名义受到控制。有的评论家担心,俄国人甚至获得了比美国更大的为了共同目标而作出牺牲的能力。乔治·凯南以一种使人联想起基督教的自由定义的口吻指出,美国人对“消极自由”的偏执使这个国家丧失了道德目的感。事实上,凯南几乎把冷战看成是一场带有上天旨意的机会,希望美国人能借此投身于一个比只是无止境地消费更有意义的目标。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在他的《丰裕社会》(1958年)中问道:什么样的社会会在削减学校、公园和公共服务设施方面的投资的同时,又不断制造出更多的产品,来满足广告刺激起来的消费愿望?当苏联人为他们的女科学家、女医生和女工程师们取得的成就热烈欢呼、高奏凯歌的时候,数百万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却呆在美国城郊的家中追求幸福,这究竟是一桩值得令人赞叹的奇迹,还是一种对宝贵的“妇女人力资源”的浪费?<sup>②</sup>

---

① Schlesinger, *Vital Center*, 1, 52-53, 65; Erich 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1941); Riesman, *Lonely Crowd*, xiv, xxxii-xxxiii; Pells, *Liberal Mind*, viii-ix, 185, 232; Wilfred M. McClay, *The Masterless: Self, and Society in Modern America* (Chapel Hill, 1994), 197-211, 236-63; Paul Lazarsfeld and Robert K. Merton, "Mass Communication, Popular Taste and Organized Social Action," in Lyman Bryson, ed.,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New York, 1948), 96-99; Joseph T. Klapper, "Mass Media and the Engineering of Consent," *American Scholar*, 17 (Autumn 1948), 419-29.

② Dorothy Ross, "Grand Narrative in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From Romance to Uncertaint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0 (June 1995), 659-60; McClay, *The*

在那份 1960 年发表的《给新左派的一封信》中,米尔斯呼唤一种能够应对已经变化了美国和世界状况的新激进主义的降生。但是,大多数社会批评家对广大群众充满了不信任,他们只是无可奈何地举起双手,完全惊慌失措,不知如何重新使自由的思想焕发活力。其实,威廉·怀特的《组织人》(1956 年)和万斯·帕卡特的《隐秘的说服者》(1957 年)在对现代工作的单调乏味、官僚制度的角色和城郊生活的空虚无物进行批评时,已经无意之中创造了一种就在眼前的、批判美国政治体制和社会价值的政治语言。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271 大众社会的批判虽然在知识分子中开始有了相当的影响,但没有能够打消那种高昂的乐观主义情绪,这种情绪是因富裕和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沾沾自喜而产生的。不管怎么说,号召大众起来反对消费主义,在许多人看来,是一种反对爱国主义的行为。克莱斯勒公司的一位副总裁 M. C. 帕特森说,美国人不会打算放弃“物质的东西”的,“不会放弃新的动力船——不会停止对那个现代化的厨房的设计”。帕特森挥舞着冷战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宣称说,“经济斯巴达主义”(指禁欲主义。——译者)是与社会主义思想一脉相承的,是对我们的“自由企业制度”的一个威胁。消费产品为美国提供了最好的宣传品,《美丽家居》的记者约瑟夫·巴里写道。与“有些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巴里声称,到美国商品展览参观的外国人往往对“洗衣机、洗碗机、吸尘器、汽车和电冰箱提供的自由”表示欣赏。<sup>①</sup>

这个年代有许多美国产品展览,正是在其中的一个展览上,一场著名的关于自由涵义的冷战冲突发生了。这就是 1959 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展览会上发生在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之间的

Masterless, 222-24, 234; John K. 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1958); Robert M. Collins, "Growth Liberalism in the Sixties," in *The Sixties From Memory to History*, ed. David Farber (Chapel Hill, 1994), 26; Joanne Meyerowitz, ed., *Not June Cleaver: Women and Gender in Postwar America, 1945-1960* (Philadelphia, 1994), 8.

<sup>①</sup> James Farrell, *The Spirit of the Sixties: The Making of Postwar Radicalism* (New York, 1997), 149; Edward Shils, "Daydreams and Nightmares: Reflections on the Critique of Mass Culture," *Sewanee Review* 65 (Fall 1957), 587-608; Rochelle Gurstein, *The Repeal of Reticence* (New York, 1996), 263-267; M. C. Patterson, "Word and Deed in a Changing America,"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October 1, 1960, 758-59; Haddow, *Pavilions of Plenty*, 44.



在那份 1960 年发表的《给新左派的一封信》中,米尔斯呼唤一种能够应对已经变化了美国和世界状况的新激进主义的降生。但是,大多数社会批评家对广大群众充满了不信任,他们只是无可奈何地举起双手,完全惊慌失措,不知如何重新使自由的思想焕发活力。其实,威廉·怀特的《组织人》(1956 年)和万斯·帕卡特的《隐秘的说服者》(1957 年)在对现代工作的单调乏味、官僚制度的角色和城郊生活的空虚无物进行批评时,已经无意之中创造了一种就在眼前的、批判美国政治体制和社会价值的政治语言。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271 大众社会的批判虽然在知识分子中开始有了相当的影响,但没有能够打消那种高昂的乐观主义情绪,这种情绪是因富裕和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沾沾自喜而产生的。不管怎么说,号召大众起来反对消费主义,在许多人看来,是一种反对爱国主义的行为。克莱斯勒公司的一位副总裁 M. C. 帕特森说,美国人不会打算放弃“物质的东西”的,“不会放弃新的动力船——不会停止对那个现代化的厨房的设计”。帕特森挥舞着冷战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宣称说,“经济斯巴达主义”(指禁欲主义。——译者)是与社会主义思想一脉相承的,是对我们的“自由企业制度”的一个威胁。消费产品为美国提供了最好的宣传品,《美丽家居》的记者约瑟夫·巴里写道。与“有些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巴里声称,到美国商品展览参观的外国人往往对“洗衣机、洗碗机、吸尘器、汽车和电冰箱提供的自由”表示欣赏。<sup>①</sup>

这个年代有许多美国产品展览,正是在其中的一个展览上,一场著名的关于自由涵义的冷战冲突发生了。这就是 1959 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展览会上发生在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之间的

Masterless, 222-24, 234; John K. 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1958); Robert M. Collins, "Growth Liberalism in the Sixties," in *The Sixties From Memory to History*, ed. David Farber (Chapel Hill, 1994), 26; Joanne Meyerowitz, ed., *Not June Cleaver: Women and Gender in Postwar America, 1945-1960* (Philadelphia, 1994), 8.

① James Farrell, *The Spirit of the Sixties: The Making of Postwar Radicalism* (New York, 1997), 149; Edward Shils, "Daydreams and Nightmares: Reflections on the Critique of Mass Culture," *Sewanee Review* 65 (Fall 1957), 587-608; Rochelle Gurstein, *The Repeal of Reticence* (New York, 1996), 263-267; M. C. Patterson, "Word and Deed in a Changing America,"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October 1, 1960, 758-59; Haddow, *Pavilions of Plenty*, 44.

高生活水平”，美国有 5600 万辆汽车和 5000 万台电视机等。他宣称说，美国已经取得了苏联人只能梦想的事情——“在一个无阶级社会中的、所有人共同享有的繁荣”。

在展览会的第二天，尼克松与苏联领导人就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谁优谁劣的问题进行了两次没有事先准备的辩论，第一次是在一个展出的现代城郊平房住宅的厨房，第二次是在展出的一个未来世界的“梦幻厨房”，那里有一个移动机器人在扫地。根据理解，带有车库的平房住宅是一个普通炼钢工人的家庭住宅，因而是展览的中心。尼克松宣称说，这个厨房象征着在一个城郊家庭为中心的环境中普通美国人对自由的享受——对色彩、款式和价格的选择的自由，将“我们的家庭妇女”从枯燥乏味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这个厨房尤其包含了它对妇女的作用。在整个辩论中，尼克松交换使用了“女人”和“家庭妇女”这两个词。副总统指着一台自动清扫地板的机器说，“你不需要一个妻子。”（在设计这个展览时，一位设计师曾提出配一幅有一个男人在扫地的照片，但这个建议被认为是不代表美国式生活而遭到否定。）<sup>272</sup>

尼克松决心利用城郊住宅厨房的背景来捍卫和宣扬美国的价值观，这是极为漂亮的一招。赫鲁晓夫在回答时，却嘲笑美国人过于迷信家用电器。他问道：“你们有没有把食物送进嘴里再压下去的机器？”赫鲁晓夫以他那种举世无双的风格，发出了与他的美国批评者相似的对消费文化的评价。他认为，展出的许多东西虽然“有意思”，但却“没有任何有用的目的”。但是，当他预测说在七年之内他的国家在消费品生产上会超过美国时，这位苏联领袖在某种意义上已在辩论中认输。这样，看起来，两种制度间的竞争不是在政治理想或军事力量方面，而是在于谁能提供更大程度的物质富裕。如果这被当成是自由的战场的话，那只能说这个战场是美国作出的选择。<sup>①</sup>

<sup>①</sup> *New York Times*, July 25, 1959; *Newsweek*, August, 3, 1959; Richard M. Nixon, "What Freedom Means to Us,"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September 1, 1959, 677-78; May, *Homeward Bound*, 16-18, 162; Hine, *Populuxe*, 129-69; Haddow, *Pavilions of Plenty*, 2, 213-29; Marling, *As Seen on TV*, 244-52.

## 第十二章 六十年代的自由

275

1955年12月1日,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民权运动的一位老战士罗莎·帕克斯遭到逮捕,理由是她拒绝遵守该市的法律,不肯在公共汽车上给一个白人乘客让座。这个事件引发了一场持续一年之久的抵制公车运动。这场抵制运动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群众运动的开端。在十年之内,民权运动革命推翻了法律种族歧视的大厦,为南部黑人公民赢得了选举权。但是,民权运动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仅限于结束了美国自由故事中尤其令人极为难受的一章,他同时打破了戴维·里斯曼所称的“两党间的深深的封冻”,这种封冻几乎等于把自由降低为一种枯燥无味的宣传口号。<sup>①</sup>民权运动对冷战时期不容质疑的正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将国家的注意力重新引导到国内自由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上。

今天,小马丁·路德·金的生日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假日,蒙哥马利、小石城、伯明翰和塞尔马等地的斗争也作为自由历史上光辉的英雄篇章,为人们赞颂不已。这一切自然容易使人忘记,当民权运动革命降临时,它竟然犹如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件。回想起来,引发这场革命的前因是非常清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种族歧视制度的动摇;离开种族隔离的南部的黑人移民运动使黑人选民成为民主党联合阵线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冷战与非洲独立民族国家的兴起,这两者都使美国的宣传语言与国内种族关系现实之间的差距成为一个令人尴尬的国际耻辱。但这并不等于说,这场群众运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由于黑人与左派力量之间的传统合作关系遭到麦卡锡主义的摧毁和扼杀,大 276 多数工会领袖们不愿在他们领导的工人群众中对种族不平等的现象提出挑

---

<sup>①</sup> Martin Luther King, Jr. *Strides Toward Freedom* (New York, 1958); David Riesman, *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 (New Haven, 1961), xxxv.

战,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法庭斗争方面,因此,争取民权的斗争迫切地需要一种新的组成力量和一套新的战略战术。民权运动发现黑人教会正是这样一种能对种族隔离制度发动一场激烈勇猛但又是非暴力攻击的组织性力量。从1960年的“入座抗议”开始,黑人和白人大学生将民权斗争推向了一个群众参与和公民不服从的新水平。到1960年底,有七万人参加了民权示威活动。“入座抗议”活动开始了“伟大梦想”的十年,在其中,美国的年青人第一次在美国历史上变成了社会改革的生力军。

作家詹姆斯·鲍德温宣称说,民权运动的意义不光是将黑人的地位提高到完全的公民地位,而且也迫使美国重新思考“自由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新闻记者莎莉·贝尔弗雷奇的著作《自由夏天》将记述发生在1964年的事件,当她在为该书作准备时,她的朋友劝告她选择另外一个书名,因为“‘自由’这个词带有极为令人厌恶的中央情报局的内涵”。伴随着他们的自由乘车运动、自由学校、自由歌曲、自由进军以及他们持续不断的“现在就给我自由”的口号,美国黑人 and 他们的白人同盟军重新夺回了冷战语言的中心词,重新发现了它拥有的革命性潜力。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普通男女——包括家庭佣人、劳工和与其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的教师、商人和牧师——表现出非凡的勇气,他们冒着身体和经济上遭受惩罚的危险,提出了对自由的要求;他们的斗争激发了其他一连串的向现状挑战的斗争,包括一个多数由白人学生参加的“新左派”运动、“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以及其他被压迫少数民族对权利的要求等。所有这些运动联合起来,恢复了经常被冷战的精神胜利所淹没的自由的关键内容,使其重新成为被压迫者的战斗口号。<sup>①</sup>

---

<sup>①</sup> Richard H. King, *Civil Rights and the Idea of Freedom* (New York, 1992), 141; David Farber, *The Age of Great Dreams: America in the 1960s* (New York, 1994), 67; James Baldwin, *Nobody Knows My Name* (New York, 1961), 66; Sally Belfrage, *Freedom Summer* (Charlottesville, 1990), xx.

## 自由运动

从一开始,自由的语言就渗透贯穿于黑人运动。自由不仅回响在黑人民权领袖的演讲中,而且也出现在参加民权运动的普通群众所作的即兴发言中和他们手中举着的手写标语牌上。1955年12月,在罗莎·帕克斯被带人法庭那一天——此时,正式的抵制公车运动尚未正式开始——在蒙哥马利市法院广场的公共汽车站候车棚上,出现了一块用撕破的硬纸板写的标语,告诫乘客们“今天不要乘坐公共汽车。为了自由,不要乘坐公共汽车”。<sup>①</sup>

“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一位抵制公车运动的参加者后来回忆说,“但我们却一个劲儿地呼喊自由。”在1964年夏天,当学生非暴力联络委员会(SNCC)在密西西比全州内为黑人孩子开办“自由学校”的时候,学生们学习的第一课是给自由下定义。有的学生的回答非常具体(如“能够进公立图书馆”),有的则比较抽象(如“捍卫你自己的权利”)。有的年轻人把自由与“在政治体制中拥有权力”联系起来,有的则认为自由意味着法律上平等;还有人则将自由基本上看成是一种“精神状态”。<sup>②</sup>

安妮·布雷登是一个出生在南部的白人,她在自由夏天运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她认为,对于自由夏天运动的参加者来说,自由意味着“一切不合理的事情的终结”。显然,黑人并不支持50年代关于自由的标准定义——如艾赛亚·柏林关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区分。自由同时包括了两者,而且还包括了更广泛的内容——平等、权力、得到承认、权利和机会等。

<sup>①</sup> Juan Williams, *Eyes on the Prize: America's Civil Rights Years, 1954-1965* (New York, 1987), 72.

<sup>②</sup> King, *Civil Rights*, 13, 56-57, 148; Daniel P. Hinman-Smith, “‘Does the Word Freedom Have a Meaning?’ The Mississippi Freedom Schools, the Berkeley Free Speech Movement, and the Search for Freedom Through Educatio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1993, 2, 98-101, 184; Daniel Perlstein, “Teaching Freedom, SNCC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ississippi Freedom Schools,”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30 (Fall 1990), 297-303.

要上升到社会的上层,地球上的穷人将要摆脱他们的劳役和陷井”。<sup>①</sup>

尽管他们“所受到的待遇”使“我们对自由的信仰变得荒诞不经,”一位在田纳西州黑人大学教书的白人教员说,美国黑人却“全心全意地”相信宪法权利平等的理想。民权运动利用了独立宣言、解放宣言和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等并未实现的承诺,要求国家实现字面上的法律保证及其宣称的价值观。“在1963年追求在1863年就许诺的自由,”1963年向华盛顿进军途中,有一条标语这样写道。如同废奴主义者一样,民权运动的参加者也将美国珍爱的自由象征与他们的事业联系在一起,正如1965年学生们组织了一场在自由钟周围的人座抗议,以支持南部黑人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争取物质商品在民权运动的自由思想中所占的位置远不如在外部大文化环境中那样重要。尽管如此,运动的最激烈阶段却始于消费文化的中心:黑人要求在午餐柜台前和市中心的百货商店中得到应有的服务,这一点不应使人感到惊奇。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伯勒,组织第一次人座抗议的富兰克林·麦凯恩说,商业公司没有权利一方面“在公共媒体上打广告”,同时又阻止黑人全面参与消费市场的活动。<sup>②</sup>

对于民权运动的参加者来说,公共自由和私人自由的目标是不能分离的。学生非暴力联络委员会曾强调说,“心灵的自由”是最大的自由。但是,种族平等同盟(CORE)的一位领导人詹姆斯·法默说,正是通过“争取非个人性的种族自由的事业”的行动,“一个人,如同感受神灵启示一样,感受到一种为广泛

① Hinman-Smith, "Does the Word Freedom," 98; King, *Civil Rights*, 4-7; John Dittmer, "The Politics of the Mississippi Movement, 1954-1964," in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America*, ed. Charles W. Eagles (Jackson, 1986), 65-66; Theodore Rosengarten, *All God's Dangers: The Life of Nate Shaw* (New York, 1974), 7.

② Merrill Proudfoot, *Diary of a Sit-In* (Chapel Hill, 1962), 52; Martha Solomon, "Covenanted Rights: The Metaphoric Matrix of 'I Have a Dream'," in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ermonic Power of Public Discourse*, ed. Carolyn Calloway-Thomas and John L. Lucaites (Tuscaloosa, 1993), 77; Charlene Mires, "We the People: Defining Citizenship in the Shadow of Independence Hall," Unpublished paper,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annual meeting, 1997; Howell Raines, *My Soul Is Rested: Movement Days in the Deep South Remembered* (New York, 1977), 76.

意义上的个人自由……一种将自我的界限扩大了的感觉。”这场运动本身变成了一种全方位的经验,这种经验产生了一种被学生非暴力联络委员会的积极分子们所称的“高度自由”,一种包含了个人目的和个人成就的感觉,它鼓舞人对现有体制和各种权力机制进行挑战。学生非暴力联络委员会对以教会为基础的组织中那种常见的所谓“摩西式领袖人物”表示怀疑,它坚持认为,一个追求更广泛民主的运动本身必须是民主的。埃拉·贝克是一位久经沙场的黑人运动积极分子,对学生积极分子有很大的影响。她说,与其说采纳一个事先决定的政治议程,还不如“让受压迫的人来界定他们自己的自由”。<sup>①</sup>

但是,抗议者对自由的多种理解和定义最终在小马丁·路德·金的激越高昂的演说中,汇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金比任何人都更有力地成为民权运动的领导人和象征。在打动美国白人的良心但又不使他们感到危险或受到威胁这方面,金可谓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他使用一种弥合种族间的沟壑、将黑人的经历与美国的历史融汇在一起的语言,向白人社会讲述了黑人为什么此刻要争取平等的权利。从他担任蒙哥马利市抵制公车运动的发言人、开始建立起全国性的影响的时候起,自由一直是金的语言中的一个中心词。他选择了《为争取自由而斗争》作为他的第一本书的书名,这是一本追述抵制公车运动历史的书。他最备受推崇的演讲是1963年的名为“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演讲的开始提到了解放黑人时的承诺并未实现(“100年后,黑人仍然未获得自由”),演讲以从黑人教会的圣歌中借来的一句歌词结束:“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感谢万能的上帝,我们最终自由了!”<sup>②</sup>

金的演说充满了基督教的内容,这是来自于他的家庭背景和他在黑人教

① Mary King, *Freedom Song: A Personal Story of the 1960s Civil Rights Movement* (New York, 1987), 440, 456; Charles M. Payne, *I've Got the Light of Freedom: The Organizing Tradition and the Mississippi Freedom Struggle* (Berkeley, 1995), 331; Sara Evans, *Personal Politics* (New York, 1979), 94; Clayborne Carson, *In Struggle: SNCC and the Black Awakening of the 1960s* (Cambridge, MA, 1981), 170, 303; King, *Civil Rights*, 143-44.

② David Howard-Pitney, *The Afro-American Jeremiad: Appeals for Justice in America* (Philadelphia, 1990), 142-45; Clayborne Carson, et al., eds., *The Eyes on the Prize*

会接受的训练,这些演说在更为广泛的文化中能够引起深深的共鸣。他反复使用圣经来宣传正义和宽恕,甚至宽恕那些“想要剥夺你的自由的人”。他的神学核心是“出埃及记”的故事,这是黑人教会布道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将美国黑人的经历比喻成为一种有神指引的、通向自由圣地迦南的进步历程。除其他事情之外,出埃及记也暗示个人权利与群体的势力之间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加强的,当金宣称“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将到达自由圣地”时,他对这个观点作了极为有力的强调。如同他以前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样,金力图争取美国白人社会的支持;他坚持认为,抗议者的动机是出于对美国的热爱和对美国价值观的崇敬。“我们将达到自由的目标,”他在《写自伯明翰监狱的信》中写道:“因为美国的目标是自由。”金清楚地表明,当“自由、正义和平等来临的时候,”不仅对于黑人,而且对于整个美国社会,都将是一个崭新的黎明。<sup>①</sup>

此时,冷战意识形态竭力渲染了过度政府将危害自由的观点,并将“公民社会”与政治领域的区分当成了自由派思想的一块基石,民权运动的积极分子却将联邦政府是自由的监护人这一概念重新复活过来。尽管长期以来,联邦政府对种族隔离抱着一种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的态度,但黑人的历史经历说明,联邦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或者那些并无恶意但自愿容忍种族隔离的白人群众,是他们争取正义的希望所在。黑人之所以有这种想法,不光是因为南部 280 对种族融合的抵制,也因为北部各州在 40 年代末并没有忠实地实施公平就业法。公民社会的各种体制——企业、工会、家庭住房联合协会、私人俱乐部及其他类似机构——远不是自由的堡垒,相反它们到处都布满了种族主义的影响,只有联邦政府的权力才可能将其摧毁。

---

*Civil Rights Reader* (New York, 1991), 48-52; Diana Wells, ed., *We Have a Dream African-American Visions of Freedom* (New York, 1993), 168-72.

① James J. Farrell, *The Spirit of the Sixties: The Making of Postwar Radicalism* (New York, 1997), 82-93; Clayborne Carson, ed., *The Papers of Martin Luther King, Jr.* (Berkeley, 1991-), III, 428; King, *Civil Rights*, 29-31; Keith D. Miller, “Alabama as Egypt: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Religion of Slaves,” in *Martin Luther King, Jr. ed. Calloway-Thomas and Lucaites*, 28-31; Taylor Branch, *Parting the Waters: America in the King Years 1954-63* (New York, 1988), 743; Carson, *Eyes on the Prize Reader*, 48-51.



当国会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愿面对这个问题时,最高法院便承担起这个责任,将民权问题不可逆转地推上了国家政治议程。最初,对最高法院在1954年作出的强制性取消公立学校中种族隔离制度的决定,两大政党采取了躲闪回避的态度。1955年,大法官们自己又决定:各州对法院决定的执行不必是即刻的,而可以“按照慎重的速度”进行。这种决定无意之中助长了“全面抵制”的运动,从而使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民权运动陷入瘫痪状态。南部白人社会对黑人权利要求的断然拒绝和对联邦法院命令的拒不执行,使得民权运动的领导者深信,只有通过华盛顿方面积极有力的介入和干预,公民才可能获得他们的宪法权利。<sup>①</sup>

尽管在1957年,艾森豪威尔派出军队到小石城去强制实施一项关于黑白合校的法院决定,但在他的政府任内,联邦政府一般不介入黑人的斗争,而保持较远的距离。但是到了60年代,民权运动不断增长的激烈程度及其面临的暴力性抵抗,造成了一种波及全国的危机状态,迫使并不情愿卷入的联邦政府站到了黑人群众一边。约翰·F.肯尼迪在1961年1月发表的就职演说,是一个极有感染力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冷战自由颂歌,其中对国内的民权问题连提也没有提到。到1963年6月,示威运动遍及美国全国(在一个星期内,有15000人在全美186座城市举行了示威活动),在伯明翰市示威抗议的黑人遭到了暴力的袭击,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肯尼迪发表了电视讲话,宣布美国面临了一个“道德危机”。肯尼迪用民权运动的语言宣布说,在黑人获得完全的公民权利之前,“这个国家无论有什么样的期望或如何地吹嘘自己,都不会是完全自由的。”两年之后,在塞尔马发生的危机——在那里,争取选举权的抗议者遭到了阿拉巴马州警察力量的攻击——导致了肯尼迪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向“这个国家愤怒的良心”呼吁和寻求支持;约翰逊将塞尔马进军称为“人类尚未完成的寻求自由的征途中”的一个里程碑。他在结束演说时,引用了示威者最喜爱的歌曲,“我们将会克服万难”。民权运动从来没有从联邦政府那里

---

① King, *Stride Toward Freedom*, 131-32; Dennis C. Dickerson, *Out of the Crucible: Black Steelworkers in Western Pennsylvania, 1875-1980* (Albany, 1986), 1-5; Patricia Sullivan, *Days of Hope: Race and Democracy in the New Deal Era* (Chapel Hill, 1996), 274; Harvard Sitkoff, *The Struggle for Black Equality* (New York, 1993), 23.

得到过如此全面而有力的支持。<sup>①</sup>

到1965年,法院的命令摧毁了法律上的种族隔离,新联邦法禁止在使用公共设施、就业和选举时的一切种族歧视行为,民权运动成功地推翻了次等公民地位的法律基础。同一年,哈特-塞拉法抛弃了原来的国籍定额制,而代之以“家庭团聚”和“工作技能”等不以种族为界的准允移民的新标准,这项法律的实施部分地是受到种族主义不再被当成国家政策的基础这一思想的影响。<sup>282</sup> 1924年的移民法曾将意大利人、希腊人、波兰人和东欧国家的犹太人斥为不适合当美国公民的人,但随着冷战形势的加剧,这种做法看上去已经不合时宜。但1965年移民法的主要结果是为从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亚洲的新移民大批进入美国打开了大门。民权革命和移民政策的改革加在一起,标志着—一个以多元性和公民性为主体的崇美主义的定义获取了胜利。到1976年,一份民意测验报告显示,85%的回答者同意这样的说法:即“美国应该是……—一个由许多种族、宗教和民族血统的人组成的国家”。<sup>②</sup>

然而,即使在这个胜利的时刻,当民权运动企图将目标从争取进学校、使用公共设施和进入投票站的权利转移到解决黑人与其他美国人之间的经济分离这一棘手问题时,它就面临了危机。在头一个十年中,民权运动并没有完全忽略黑人自由的经济层面,扩大就业机会是结束1963年伯明翰危机的“条约”的一个内容;同年举行的向华盛顿进军的活动中,曾提出“工作与自由”作为口号。但经济自由问题后来失去了声音,一方面是因为运动需要将挑战集中在反对不平等的法律和政治权利方面,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冷战的原因,民权运动被迫与左翼组织断绝关系,而后者时常将黑人的境况与对经济不平等的广泛批评联系起来。尽管民权运动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发生在南部以外的黑人

<sup>①</sup> *The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John F. Kennedy 1961* (Washington, DC, 1962), 1; Branch, *Parting the Water*, 824-25; David J. Garrow, *Bearing the Cross: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New York, 1986), 408-09.

<sup>②</sup> Rogers Smith, *Civic Ideals: Conflicting Visions of Citizenship in American Public Law* (New Haven, 1997), 473; Herbert McCloskey and John Zaller, *The American Ethos: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MA, 1984), 23.

得到过如此全面而有力的支持。<sup>①</sup>

到1965年,法院的命令摧毁了法律上的种族隔离,新联邦法禁止在使用公共设施、就业和选举时的一切种族歧视行为,民权运动成功地推翻了次等公民地位的法律基础。同一年,哈特-塞拉法抛弃了原来的国籍定额制,而代之以“家庭团聚”和“工作技能”等不以种族为界的准允移民的新标准,这项法律的实施部分地是受到种族主义不再被当成国家政策的基础这一思想的影响。<sup>282</sup> 1924年的移民法曾将意大利人、希腊人、波兰人和东欧国家的犹太人斥为不适合当美国公民的人,但随着冷战形势的加剧,这种做法看上去已经不合时宜。但1965年移民法的主要结果是为从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亚洲的新移民大批进入美国打开了大门。民权革命和移民政策的改革加在一起,标志着—一个以多元性和公民性为主体的崇美主义的定义获取了胜利。到1976年,一份民意测验报告显示,85%的回答者同意这样的说法:即“美国应该是……—一个由许多种族、宗教和民族血统的人组成的国家”。<sup>②</sup>

然而,即使在这个胜利的时刻,当民权运动企图将目标从争取进学校、使用公共设施和进入投票站的权利转移到解决黑人与其他美国人之间的经济分离这一棘手问题时,它就面临了危机。在头一个十年中,民权运动并没有完全忽略黑人自由的经济层面,扩大就业机会是结束1963年伯明翰危机的“条约”的一个内容;同年举行的向华盛顿进军的活动中,曾提出“工作与自由”作为口号。但经济自由问题后来失去了声音,一方面是因为运动需要将挑战集中在反对不平等的法律和政治权利方面,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冷战的原因,民权运动被迫与左翼组织断绝关系,而后者时常将黑人的境况与对经济不平等的广泛批评联系起来。尽管民权运动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发生在南部以外的黑人

<sup>①</sup> *The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John F. Kennedy 1961* (Washington, DC, 1962), 1; Branch, *Parting the Water*, 824-25; David J. Garrow, *Bearing the Cross,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New York, 1986), 408-09.

<sup>②</sup> Rogers Smith, *Civic Ideals: Conflicting Visions of Citizenship in American Public Law* (New Haven, 1997), 473; Herbert McCloskey and John Zaller, *The American Ethos: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MA, 1984), 23.

贫民窟的暴力骚乱——1964年在哈莱姆、1965年在沃茨(在约翰逊签署了1965年选举权法后几天内发生)以及在随后一年发生在其他城市的骚乱——使公众注意到,种族正义是一个全国性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南部的问题,与此同时,公众也注意到,法律上隔离制度的废除并没有触动到就业、教育和住房方面的不平等。

在60年代中期,经济问题上上升到民权运动议程的主要位置。此时,黑人的失业人数是白人的两倍半,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比白人家庭的一半稍强,民权运动力图探索不同的方式,使美国黑人能得到“真正和实在的自由”。1964年,金提出要建立一个“弱势者权利法案”,以动员国家资源,消灭经济贫困的灾难。金的提议是针对普遍的贫困现象提出来的,但他同时也坚持,美国在“对黑人进行了数百年的刻意剥夺和压迫”之后,现在有责任“为黑人刻意做些什么”——这是一个对后来被称为“鼓励性措施”政策的早期呼吁。1966年,黑人工会活动家A. 菲利普·伦道夫和民权运动的骁将贝亚德·拉斯廷曾提出设立一项“自由预算”,允许联邦政府在十年时间内 283 斥资100亿美元,专门用来资助一项创造就业和都市改造的联邦计划。<sup>①</sup>

同在1966年,金发起了芝加哥自由运动,提出了与南部运动完全不同的要求——即要求提高黑人就业的层次、终止雇主和工会的种族歧视做法、争取在发放房屋贷款方面的平等、在区域内修建低收入家庭住房等。金的目标是摧毁芝加哥的黑人贫民窟,使这座城市成为一个“开放的城市”。但在市长理查德·戴利控制的民主党机器和愤怒的白人住房拥有者的拼命反对下,这次运动失败了。南部运动的战术——包括示威、入座抗议、大规模的逮捕等——在看上去较不明显但实际上充满同样性质的种族不平等的北部社会结构面前,显得毫无效力。芝加哥族裔居住区中的白人居民表现出来的充

---

① Garrow, *Bearing the Cross*, 284; Carson, *Eyes on the Prize Reader*, 163; Penny M. Von Eschen, *Race Against Empire: Black Americans and Anticolonialism 1937-1957* (Ithaca, 1997), 377; Martin Luther King, Jr. *Why We Can't Wait* (New York, 1964), 23-4, 133-39; Alonzo L. Hamby, *Liberalism and Its Challengers, FDR to Reagan* (New York, 1985), 168-77; Jervis Anderson, *Bayard Rustin, Troubles I've Seen* (New York, 1997), 284-89.

满暴力的反应，令金感到十分震惊。他说，即便是在南部，他“也从未见过如此强烈的仇恨。”到1967年，当他在整理编辑他的最后一本书《我们从此走向何方？》时，金在南部斗争中始终持有的乐观主义开始消逝了。他写道，开放住房和平等就业机会仍然是一个“遥远的梦想”，而激进的经济改革——充分就业、年收入的保障、对资本主义本身的“结构性的改造”——对于将黑人纳入主流生活仍然是必要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金的白人顾问斯坦利·利维森敦促金尽量缓和他的语气，而利维森因早期与共产党有过关系，从而导致联邦调查局局长J. 埃德加·胡佛把整个民权运动看成是共产党的一个阴谋。利维森说，大多数白人将永远不会“为了解放黑人”而接受一个“改变美国社会结构”的计划。）<sup>①</sup>

如果说民权运动的第一阶段产生了一套清楚的目标、影响深远的成就以及一系列有时相互竞争但却有连贯性的组织〔SNCC, CORE, 金自己的南部基督教领导联盟（SCLC）等〕和一个颇为显著的全国性领袖人物，第二阶段则出现了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分裂，没有取得什么显著的胜利。甚至在1965年以前，怒气冲冲的黑人演说家马尔科姆·艾克斯已经给出了一个不同的自由的定义。他以马丁·德莱尼和马库斯·加维的民族主义传统为基础，坚持黑人必须控制他们自己社区中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能依靠与白人的结盟或依靠联邦政府的资助来争取最终的解放。马尔科姆·艾克斯宣称，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sup>②</sup>

284 当他于1965年被“伊斯兰民族”组织刺杀身亡的时候，马尔科姆并没有留下一个有系统的观念，也没有留下一个有效而稳定的组织。“伊斯兰民族”是一个民族主义式的宗教组织，马尔科姆曾在其中显赫一时，但后来却弃之而去。但在他去世之后，他的极富感染力的语言和他喊出的黑人必须依靠自己的资源的口

<sup>①</sup> James R. Ralph, Jr. *Northern Protest: Martin Luther King, Jr., Chicago,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Cambridge, MA, 1993), 1-14; 30-33, 70-71, 102-23, 220; Martin Luther King, Jr.,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 (New York, 1968), 6-13, 190-93; Garrow, *Bearing the Cross*, 420, 539-40.

<sup>②</sup> Alexander Bloom and Wini Breines, eds., *"Takin' It to the Streets": A Sixties Reader* (New York, 1995), 141.

号却在年轻一代民权活动分子中引起了强烈共鸣。与其他人相比,马尔科姆·艾克斯是真正的“黑人权力”思想之父。“黑权”是在1966年第一次引起全国注意的一句口号,在密西西比州的一次示威游行中,学生非暴力联络委员会领袖斯多克利·卡迈克尔和其他年轻黑人使用了这样的口号。但对金来说,“黑权”是一种“令人失望的口号,肯定会使白人感到敌意”。“黑权”的支持者则不这样认为,如同他们中有人指出的,“黑人权力意味着黑人自由”。学生非暴力联络委员会在1966年宣称道,“为了使人民解放自己,我们需要一个全部由黑人参与的计划。”就具体内容而言,几乎无法准确地对“黑权”下定义。“黑权”囊括了从选举更多的黑人官员(从美国族裔政治的长期历史来看,这实际上并无新意),到将黑人看成是一个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的民族的想法;在后一种思想中,黑人被视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是同一类人,只有通过争取民族自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彻底赢得自由。不管这句口号是如何被使用的,它所取得的显赫地位标志着黑人自由定义方面的一种微妙的变位;自由的意义不再仅仅是与美国主流社会融汇一体,而更重要的是与群体自决联系在一起。将自由与权力等同起来,并非是新的概念,但黑权运动给多元主义抹上了一层分裂主义的色彩,同时,也在其他少数民族中激发了类似的运动,包括土著美洲人、奇卡诺族群,同时还激发了第三代白人移民对族裔认同的重新重视。<sup>①</sup>

尽管紧随60年代初期胜利的是一个令人沮丧失望的时代,但黑人运动成功地将经济自由的问题重新提上了全国的政治议事日程。约翰逊在1964年大选中取得的压倒性胜利严重地动摇了国会中的保守势力,他不仅领导了民权运动时代一系列立法方面的胜利——1964年的民权法、1965年选举权法和1968年的公平住房法——而且发动了一场自新政以来影响最深远和范围最广泛的国内改革运动。约翰逊力克长期以来存在的对“社会化医疗”、公共住

---

① King, *Where Do We Go?*, 34-51; John T. McCartney, *Black Power Ideologies, An Essay in African-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Philadelphia, 1992), 120-22; *New York Times*, August 5, 1966; Bloom and Breines, eds., *Takin' It to the Streets*, 159; August Meier, et al., eds., *Black Protest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dianapolis, 1971), 484; Philip Gleason, *Speaking of Diversity: Language and Ethnic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Baltimore, 1992), 75-76.

房和干预性联邦权力的敌视态度,他的“伟大社会”计划为穷人和老年人提供了医疗保险服务(通过新的医疗补助制度和老年保健医疗制度)来实施,并对教育和住房方面投入大量联邦资金。政府的影响力通过一系列联邦机构来传播,如环境保护署和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后者实际上是顶着一个新的名称的、要求在战后建立一个永久性公平就业实践委员会的运动的的结果)。这些措施一起完成了自1938年以来被滞留在国会的社会改革计划,第一次创造了一个“平等机会的福利国家”,将那些被排除在新政福利措施之外的人,尤其是黑人285 人和工作妇女,包括进联邦福利的覆盖范围之内。<sup>①</sup>

但“伟大社会”的核心内容是约翰逊消灭贫困的努力。在50年代那些沾沾自喜的、歌颂美国普遍富裕的言论过去之后,普遍的贫困被重新发现。这一方面是因为迈克尔·哈林顿在1962年出版的《另一个美国》一书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民权运动的影响(尽管约翰逊将反贫困运动看成是一种联邦政府在帮助黑人和提高处于贫困状态的白人的生活水平——白人在当时全国的贫困人口中占多数——两者之间的一种平衡性政策)。在“向贫困宣战”的口号指引下,约翰逊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帮助把穷人提高到加入美国社会和经济的主流。在新政时期,贫困被看成是经济权力不平衡和经济体制有缺陷的结果,但60年代的看法将贫困归咎于缺乏技能和机会以及缺乏正确的态度和习惯。虽然约翰逊也可动情地谈论自己在得克萨斯东部山区中所经历的贫困,但他对传统的观念坚信不移,即依赖政府的救济和资助与真正的自由是不相配的。他对政府直接提供资助的做法十分反感,这种态度也广为政策制定者们所享有——其比例超过大众社会。在1964年的一次民意测验中,有一半以上的选民认为,政府有责任保证所有美国人能够享受一个舒适的生活水平,而只有三分之一的所谓“有影响人士”赞成这种看法。

这样,虽然向贫困宣战包括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对那些需要的人提供食品

<sup>①</sup> Kevin Boyle, *The UAW and the Heyday of American Liberalism 1945-1968* (Ithaca, 1995), 7; Frederick F. Siegel, *Troubled Journey: From Pearl Harbor to Ronald Reagan* (New York, 1984), 156, 250; Jill Quadagno, *The Color of Welfare: How Racism Undermined the War on Poverty* (New York, 1994), 9-12, 89.

卷之内,但约翰逊否决了最直接的消除贫困的办法——包括建立一个有保障的所有美国人人均有份的年收入,为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积极推动工会发展,或尽力阻止商业界把企业搬迁到南部的低工资地区去等。相反,向贫困宣战的重点集中在为穷人进行技能培训,通过训练、教育、法律服务和社区发展等项目来帮助他们重铸精神和进取心。向贫困宣战也要求贫困人口自身在设计和执行地方政策方面扮演重要的领导角色,这种要求可以说是对学生非暴力联络委员会提出的赋予普通人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的哲学口号的一种回应,也是一种应对长期以来因地方政治领袖惯于控制联邦资金流向而引起的冲突的解决办法。<sup>①</sup>

在为这些措施辩护时,约翰逊使用了一种从新政继承而来、又为民权运动强化了自由语言(他自己的政治生涯始于新政时期)。1963年,在他就任总统后不久,他重新复活了在50年代消失和被抛弃的“免于匮乏的自由”这句话,将其看成是衡量“社会正义的最完整的尺度”。在196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sup>286</sup>上,约翰逊重述了罗斯福的思想:“一个面临饥饿、无法找到工作、无法送孩子上学、不得不向匮乏低头屈服的人,不是一个拥有完全彻底的自由的人。”在一年之内,他宣布争取民权的战斗,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和“更深刻的阶段”。约翰逊认识到,黑人贫困与白人贫困从根本上是不同的,因为黑人贫困的根源在于“过去的非正义和目前的偏见”,为此,他在1965年宣布,将经济自由仅仅定义为机会均等是远远不够的:

自由是不够的。你不能仅仅凭说上一句:现在你自由了,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做你想做的事,选择你喜欢的娱乐和休闲活动,就可以将数个世纪之久的伤痕一笔勾销。

---

<sup>①</sup> Barbara Ehrenreich, *Fear of Falling: The Inner Life of the Middle Class* (New York, 1989), 42-47; Gareth Davies, "War on Dependency: Liberal Individualism and the Economic Opportunity Act of 1964,"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26 (August 1992), 205-30; Quadrango, *Color of Welfare*, 67-75; Herbert McCloskey, "Consensus and Ideology in American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8 (June 1964), 369; Farber, *Age of Great Dreams*, 106-08.



这是民权运动的下一个和更深刻的阶段。我们要争取的……不光是作为一种权利的平等和一种理论的平等,而是作为一个事实的平等和一个结果的平等。

约翰逊宣称,“伟大社会”将帮助美国人超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实现更为扩展的自由的内容——“学习的自由”、“成长的自由”、“希望的自由”以及“过上(人们)所希望过的那种生活”的自由。对那些把国家看成是“一种对个人自由的威胁”的人,约翰逊回答说,政府是一种解放性力量,政府能够帮助个人摆脱“他所处的环境中的奴役力量的影响”。<sup>①</sup>

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代表了对社会公民权和种族平等思想的与众不同的肯定,它是美国历史上一次最全面广泛的努力,动员联邦国家的权力,解决处在最不利地位的美国人的需要。向贫困宣战大大降低了造成贫困的偶发因素,差不多完全消灭了老年贫困现象。但这个计划所花费的金额(一共有几十亿美元)显然太低,不能实现完全消灭贫困的乌托邦设想或完成改造贫困都市社区的生活条件这样更为现实紧迫的任务。与民权运动一样,政府的行动为美国黑人打开了机会大门,有力地促进了黑人中产阶级的生长发展。但是,数百万非裔美国人仍然处于贫困之中。到20世纪90年代,白人与黑人在教育、收入和取得技术性工作机会方面的历史性沟壑大大缩小了。但白人家庭的平均财富仍然是黑人家庭的四倍;失业率大大降低了;约四分之一的黑人孩子生活在贫困之中。范妮·卢·汉默原为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无名的分成制佃农,后来成长为民权运动的一个全国性象征人物,在她去世前不久,她对一位朋友说,“迈克,我们还没有获得自由。”<sup>②</sup>

① *The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Lyndon B. Johnson 1963-64* (Washington, DC, 1965), 130, 1012; *Public Papers, Johnson 1965* (Washington, DC, 1966), 636; *Public Papers, Johnson 1966* (Washington, DC, 1967), 210; Michael J.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 (Cambridge, MA, 1996), 281-83.

② Hamby, *Liberalism*, 258-62; Farber, *Age of Great Dreams*, 108-09; Jennifer L. Hochschild, *Facing Up to the American Dream: Race, Class, and the Soul of the Nation*

1965年,贝亚德·拉斯廷对政客们在不断增长的军费预算上花费数千亿美元百思不解,但他们“在全面改建学校、清理贫民窟、真正消除贫困等各种需要面前却两手空空”。这一时代“增长的自由主义”所带有的那种不可抹煞的乐观主义在约翰逊的思想上也反映出来,他坚持认为,随着一个不断扩张的经济,美国人能够“既能创造国内的进步,又能满足起担负外部责任的要求”。但随着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程度的升级,同时进行消除国内贫困和在东南亚的战斗变得不可能了。到1967年,向贫困宣战有了停止实施的理由。随着贫民窟的暴乱在全国各地发生,反战运动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规模,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公然反对和拒绝主流社会的价值观,美国社会面临了自大萧条以来的最大社会危机。<sup>①</sup>

## 新 左 派

如同民权革命一样,白人青年抗议运动的兴起也是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在20世纪20年代,学生们基本上属于“沉默的一代”,如同一位教授曾悲哀地感叹的,那时的学生“既没有伟大的爱,也没有深沉的恨,他们拥有的热情少得可怜。”到那时为止的大部分时间内,大学基本上是一种培养精英的机构,学生来自美国人口中的一个享有特权的很小部分。大学同时也是保守主义的大本营——1919年当波士顿的警察举行罢工时,哈佛大学的学生主动取而代之,这样的事情比起30年代广泛报道的纽约市立大学的激进学生来,是更为普通的校园政治的表现。如果黑人的苦难悲痛对于任何对美国生活略有皮毛经验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学生们所经历的苦痛在许多方面则是难以理解的。雷蒙·芒戈是一位年轻的新闻记者和反战运动积极分子,他在

---

(Princeton, 1995), 40-49; John Dittmer, *Local People: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in Mississippi* (Urbana, 1994), 426-34.

① Meier, et al., eds., *Black Protest Thought*, 447-50; Robert M. Collins, “Growth Liberalism in the Sixties,” in *The Sixties: From Memory to History*, ed. David Farber (Chapel Hill, 1994), 11-31.

1968年写道：“我21岁的时候，已经能够自食其力，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挣一笔丰厚的收入，……除了自由之外，我什么都有。自由是我最珍爱的，也是我必须争取得到的东西。”是什么原因使大量来自富裕白人家庭的孩子们认为他们是“不自由的”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将有一部分来自后来被称为“新左派”的人对自由的定义。<sup>①</sup>

新左派之所以新，在于它否定了过去那些在20世纪中大部分时间内为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带来活力的思想和政治范畴。学生们谈论的话题不再是经济贫困、阶级斗争和社会公民权，而代之以孤独、与世隔绝、异化、在官僚机器面前的无能为力以及富裕生活所无法满足的对真实的渴望。当然，在50年代，也有社会批评家提出类似的问题，并表示不满。但这些批评和不满此刻却在美国人口中的一个主要部分中形成了一个群众运动。在50年代中期，共有270万大学生。到1968年，由于婴儿潮一代人已经成长为人，以及随之而来的高等院校的扩展，大学生人数猛然增至到700万人（高于农民、矿工和炼钢工人的人数）。到那时为止，年轻人奋起反对现存体制和传统左派的行动，已经成为一种国际现象，不仅出现在巴黎和布拉格的街头，也出现在纽约、伯克利和芝加哥。<sup>②</sup>

当然，新左派实际上并不是像它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新。新左派关于公民参与民主的口号可以追溯至美国革命时期的共和思想；它对美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所进行的道德批判，也可追溯到废奴主义者；它在同一性现实面前对真实的强调，使人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波希米亚反叛文化；它对令人窒息的消费文化的批判无疑受到C. 赖特·米尔斯、德怀特·迈克唐纳以及50年代社会批评家思想的影响的启发。但新左派的最主要思想源泉来自黑人争取自由的运动。入座抗议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为有力地刺激了白人学生的反抗运动。一位学者认为，“对于新左派来说，自由的意义始于黑人的斗争。”

<sup>①</sup> John P. Diggins, *The Americ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73), 156; Terry H. Anderson, *The Movement and the Sixties: Protest in America from Greensboro to Wounded Knee* (New York, 1995), 19; Mungo in Massimo Teodori, ed., *The New Left: A Documentary History* (Indianapolis, 1969), 349; Kirkpatrick Sale, *SDS* (New York, 1973), 318.

<sup>②</sup> Sale, *SDS*, Teodori, ed., *New Left*, 73.

美国社会中最遭排斥的成员要求得到享受所有社会福利的完整机会,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断然否定了社会主流的价值观,这两种力量交汇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具有爆炸性的联合力量,导致了后来为人们熟知的“60年代”的大反叛。黑人运动与白人新左派运动共有一些基本的观点:需要改正的邪恶已经浸透于美国社会机制之中,为了向美国人说明改革的迫切性,采取直接行动是完全必要的。新左派从黑人运动那里,尤其从学生非暴力联络委员会那里学到了日常生活是一个政治领域、日常生活的决定都带有政治内容的思想。两个运动都充满了乐观主义(后来的更为玩世不恭的时代将把这种60年代的乐观主义叫作乌托邦或幼稚),两者都认为,对美国社会的道德观和体制进行大规模大范围的改革,不仅必要,而且完全可行。<sup>①</sup>

1962和1963年出版了一些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从不同的层面对冷战共识提出批评和挑战。詹姆斯·鲍德温的《第一次的下一回》为黑人革命提供了一个愤怒的声音。雷切尔·卡森的《沉默的春天》揭露了漫无止境、随心所欲<sup>289</sup>的经济增长和消费所带来的生态代价。迈克尔·哈林顿的《另外一个美国》表现了在富裕中经久不衰的贫困的存在。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对所有问题最有影响的批判来自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在1962年发出的一份宣言。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业民主联盟的一个小的分支,而工业民主联盟本身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60多名大学生在密执安州的休伦港开会,采纳了最初由汤姆·海顿起草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准确地表达了这一代学生抗议者的情绪,概括地总结了他们的信念。

休伦港声明用了五分之四的篇幅来批判美国社会的体制,从政党到公司企业、工会、军工复合体等。但使这份文件成为激进主义指导思想的,却是另外五分之一的内容。这一部分内容为社会改革提出了一种新的设想。海顿写道:“我们寻求建立一种个人参与的民主,这种民主由两个中心目标为指导——一是个人应该分享那些决定他生活的质量和方向的社会决定;二是社

<sup>①</sup> Wilfred M. McClay, *The Masterless: Self and Society in Modern America* (Chapel Hill, 1994), 270; Farrell, *Spirit of the Sixties*, 2-7, 16-19; Michael Kazin, *The Populist Persuasion* (New York, 1995), 199-200.

会应该组织起来，鼓励人们的独立自主，并为他们的共同参与提供途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份文件呼吁创建一个新的左派，“一个具备真正的思想技能的左派，”由在战后世界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组成。

这实际上是来自于爱默生、加里逊、德布斯和杜威，又经民权运动的经历过滤了的语言，经过再生成为了对一个军事化、官僚化的社会及组织化的人一种批判。它对“参与性民主”的强调，宣布了一个新的政治概念，其功能是把美国人“带出孤立和与世隔绝，带入到社区之中”。“参与性民主”从未有过准确的定义，它既是一种对美国生活中不民主成分的批判，也是一种不同的美国社会蓝图。但它很快成为一种检验现行社会体制的标准——工作场所、学校、政府、政党和老左派的组织内部等——这些机构都受到了这条标准的检查，并都被发现没有实施参与性民主。尽管休伦港宣言呼吁政府推动更大的经济平等，修建更多的学校，提供全民医疗保险等，它同时也对集权化政府表示疑虑。它对一种建立在“人类之上”的政治的呼吁使自己与20世纪的大多数左派拉开了距离。参与性民主的思想也否定了自由主义思想的精英主义，这种主义在从进步主义者到战后全国性经济计划的鼓吹者之中都明显存在过，它同时也否定了社会科学的边际主义学说，这种学说将公民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领域中都降低成为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海顿在为休伦港会议准备的笔记中，呼应杜威当年的思想：“自由的内容远远超过免受政府对个人发展的武断限制”；自由最终的意义在于拥有能够参与那些影响个人生活的决定过程的权力。<sup>①</sup>

到1962年底，入座抗议活动已经点燃了北部学生运动之火，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成员增加到8000人。1964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发生的事件突然表明，在参与性民主的名义下，一个更大范围的学生运动可以得到动员

① James Miller, *"Democracy Is in the Streets": From Port Huron to the Siege of Chicago* (New York, 1987), 79-101, 143, 275; Sale, *SDS*, 50-53; Richard J. Ellis,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s* (New York, 1993), 56, 71-72; Teodori, ed., *New Left*, 49-51, 195; Paul Berman, *A Tale of Two Utopias: The Political Journey of the Generation of 1968* (New York, 1996), 52-53.

和形成。伯克利是冷战时期所谓“巨型大学”的经典之作，它是一个硕大无比、毫无人情味的机构，许多课程的听课人数多达千人以上，引起“言论自由”抗议运动的是校方的一道行政措施。这项措施禁止使用校园的中心地带来散播政治思想。在随后的几个月的抗议中，有好几千名伯克利的学生参加了运动。在抗议中，学生领袖们要求校方改变新的规定，对整个学校的体制进行了批评，他们还批评整个教育制度都是为了白领阶层公司培养人才。“我们要所有美国人都获得自由，而不仅仅是为了黑人取得自由。”马里奥·萨维奥这样说道。他是言论自由运动的最著名的领袖，也是密西西比自由夏天运动的老将。自由通过学生非暴力联络委员会—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参与性民主的语言定义之后成为了“运动的旗帜”。当校长在1965年初做出让步之后，学生积极分子芭芭拉·加尔森宣称道：“我们至少应该为扭转一次世界范围内的背离自由的漂流而感到骄傲。”<sup>①</sup>

但是，真正彻底地将学生抗议运动转化成为整个一代人的全方位反叛的不是其他事件，而是在越南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冷战政策和判断的逻辑结果，也是一种谬误的自然结果。这场战争悲剧性地揭示了用非友即敌的反共透视镜来观察判断世界和世界上每一地区的形势的危险。真正了解越南历史和文化的美国人寥寥无几（那些有这方面知识的人早在麦卡锡时代就遭到清洗，被逐出了国务院）。一场由当地共产党人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美国人眼中，被定义成为决定冷战胜负的战场。早在1949年，杜鲁门政府就与当地的法国殖民势力站到了一起。到1960年代初，美国已经承诺支持腐败专制的南越政权的生存，这种承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美国的军事介入，先是“顾问”，而后是成千上万的地面部队。

无论约翰·F. 肯尼迪还是林登·B. 约翰逊都害怕“失掉”越南而逃脱不了公众的斥责，这种恐惧使他们两人谁也无法将美国从一种逐渐明显站不住脚的情形中抽脱出来。对肯尼迪来说，如同他在就职演说中宣布的，越南战争

---

<sup>①</sup> Teodori, ed., *New Left*, 30; Sale, *SDS* 163-67; Hinman-Smith, "Does the Word Freedom," 3, 302-13; Bloom and Breines, eds., *Takin' It to the Streets*, 120.

变成了“不惜任何代价和负担”来确保“自由……的生存”的承诺的考验。约翰逊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这种信念，即越南战争是“各地为自由而战”的一部分。在签署 1964 年民权法时，他不由自主地将国内黑人抗议者与“在越南的战士”联系起来，两者“都愿意为自由而献身”。到 1967 年，美国在越南的军队超过了 50 万人。<sup>①</sup>

随着伤亡人数的增加以及美国炸弹对越南北部和南部的狂轰滥炸，美国国内的冷战共识开始动摇。到 1968 年，越战使“伟大社会”计划大部分化为泡影，使家庭、大学和民主党陷入严重的分裂之中；迫使约翰逊宣布他将不寻求连任。由于整个政治领导阶层，包括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内，在 6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都致力于支持越战，年轻的激进分子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他们转向别的地方寻求自由派的支持者。

反对越战因而成为组织原则，围绕这个原则，一切的怀疑、失望以及各种隐藏的不满在此刻汇集起来。一份学生非暴力联络委员会立场的大标语写道：“我们充满恐惧地认识到，一个所谓‘自由’社会的言行不一致。在这个社会中，对自由的责任竟然与全力以赴的支持军事侵略的责任相互等同。”在很大程度上，学生非暴力联络委员会对战争、尤其是对比例失调的大量黑人青年被征入伍参加越战的事实所抱有的极度愤怒，是它最终全面接受黑权思想的原因。<sup>②</sup>

至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它的领导者早就在怀疑冷战思维的基础。在休伦港，一位来自一个与美共有关联的学生组织的代表，被允许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来自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宗主组织的工业民主联盟的成员（包括迈克尔·哈林顿，当时他只有 34 岁）非常强烈地反对这一决定，其态度之坚决，令许多学生非常迷惑不解。这场辩论预示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将采取自己的行动的决定，也预示了学生激进分子将与冷战自由派决裂。

<sup>①</sup> Michael H. Hunt, *Lyndon Johnson's War* (New York, 1996), 3-18; Siegel, *Troubled Journey*, 140; *Public Papers: Johnson 1964*, 842, 1048.

<sup>②</sup> Anderson, *Rustin*, 249; Teodori, ed., *New Left*, 54; Bloom and Breines, eds., *Takin' It to the Streets*, 228-29.

1965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取消了成员资格中有关禁止“极权主义”支持者加入的条文,将其看成是“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残迹”。当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邀请所有反对美国对越政策的人四月在华盛顿集会时,哈林顿和拉斯廷以及其他人都劝告大家回避这场集会。但竟然有2.5万人出席了会议,这使会议组织者分外吃惊,表明反战运动将很快拥有一个大规模的支持者群体。在集会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主席保罗·波特发表了演讲,他表示要将自由的语言从政府手中夺回来:

总统说我们是在越南保卫自由。谁的自由?决不是越南人的自由……战争为美国的自由做了什么呢?战争导致政府更加有力地控制了信  
292  
息,操纵媒体,通过篡改的或彻头彻尾的不真实的文件来压制和欺骗公众……如果总统坚持认为在越南进行的战争是在保卫美国的自由,那他就是在嘲弄自由。<sup>①</sup>

如同波特提到的,战争为参与性民主提供一个极好的对立面,因为美国介入越战逐渐变成了一种以偷偷摸摸、谎话连篇和精英决策为特征的行动,公众完全没有对此进行公开辩论的机会和可能。在1965年11月举行的第二次反战集会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领导人卡尔·奥格尔斯比明确地将越战与对美国总体外交政策的强烈批判联系起来——包括中央情报局对危地马拉和伊朗内政的干涉,美国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支持,约翰逊当年夏天派兵前往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决定等——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一种反共偏狂症。奥格尔斯比说,有人也许会感到“我的话听起来是反美国的;对这些人,我的回答是:不要为此而怪罪我!怪罪那些出卖了我的自由主义价值的人吧,怪罪那些令我的美国心破碎的人吧!”一位新闻记者观察说,这篇演讲是“一篇与传统的美国自由主义原则决裂的独立宣言”和“一种要求改变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根

---

<sup>①</sup> Sale, *SDS*, 54-58, 177-79; Miller, “Democracy,” 116; Albert Gleason, *Totalitarianism: 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1995), 130; Bloom and Breines, eds., *Takin' It to the Streets*, 215-16.



本结构的号召”。<sup>①</sup>

随着围绕战争的分歧的加深,许多学生在赫伯特·马尔库塞那里发现了一个令人意料不到的精神领袖。马尔库塞是从纳粹德国逃离出来的一个信仰新马克思主义的难民,他的著作《单面人》(1964年)对一个奉行自由主义原则的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他认为,在那种社会中,作为绝妙完美的自由主义价值的宽容精神事实上只是帮助强化具有压迫性的现状的继续存在。马尔库塞认为,工人阶级因为被谋取消费商品的狂热摆弄得麻木不仁,已经不再是具有改革力量的先锋队了,只有那些“被社会彻底抛弃的人和处于社会(权力机制)之外的人”——如少数民族、失业者和青年人——才能意识到他们自己所处的受压迫的环境和状态。马尔库塞的著作加强了这样的信念,即美国自由是一种“神话”。这个词的大量使用表明新左派与白人工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后者现被视为“体制内”的一部分。随后不久,一些白人学生将第三世界国家的各种革命都看成是“为人类自由的斗争”。到1969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领导权已经转移到一批信仰暴力革命的自命为革命者的人手中。第二年,当他们制造炸弹的机械器具在格林威治村的一个连墙住宅的地下室里发生爆炸时,三人当场身亡。<sup>②</sup>

但比这个向“革命”方面的转向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战争带来的广泛的文化冲击。尽管后来被称为“反文化”的运动由来自不同方面的源流汇合而成,如果不是战争粉碎和动摇了权威机构的合法性,这种一代人对主流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的反抗是不可想像的。到20世纪60年代末,数百万年轻人公开向他们上一代人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挑战。在这些人中,不光有大学生,也包括青年工人,尽管许多工会对反战示威运动和反文化运动的展览充满敌意。在  
293 美国历史上,对“资产阶级”的穿着方式、语言、性行为等方面规范的炫耀否定

<sup>①</sup> Berman, *Tale of Two Utopias*, 59; Teodori, ed., *New Left*, 182; Sale, *SDS*, 242-45.

<sup>②</sup>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1964); Peter Clecak, *Radical Paradoxes, Dilemmas of the American Left, 1945-1970* (New York, 1973), 186-203; Robert B. Fowler, *Believing Skeptics: American Political Intellectuals, 1945-1964* (Westport, 1978), 218-24; Bloom and Breines, eds., *Takin' It to the Streets*, 126-27.

以及服用毒品(先前只限于艺术家和波希米亚组织成员的做法),第一次成为一场群众运动的基础。这场运动的战斗口号是“解放”。

这简直就是三个世纪前约翰·温斯洛普的恶梦成真——一个以对所有权威的否定为前提的、对自由的大规模的重新界定。对反文化运动不屑一顾的人也许认为这不是一场真正的反叛运动,而只是在某些方面正好代表了消费市场的成功之处,亦即将其作为个人选择权利的自由定义浸透和延伸至生活的各个方面和领域。(的确,这场反叛运动的象征和标记——蓄胡须、留长发、五颜六色的着装、摇滚乐、吸毒,甚至黑人革命和性自由的图像——很快通过合法和非法的方式得以批量生产制作,成为一种时尚。)反文化运动当时认为,经济繁荣将永远持续下去,所以,年轻人即便从传统的就业世界中暂时地“落伍”,将来也可以重新回到这个世界中来。除此之外,享乐主义和自我毁灭也同样根植于反文化运动之中。蒂莫西·利里原为哈佛的科学家,后摇身一变成为药物致幻的倡导者。他的信徒们认为,迷幻药(LSD)象征着一种新的“第五大自由”——“扩展你的意识的自由”,由此,人们不仅可以逃离社会的限制,而且也可以摆脱理性本身的束缚。但是反文化运动的内容远远不止它那种斑驳陆离的表象——即那部有名的性自由、吸毒和摇滚乐三部曲。对于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来说,个性解放代表了一种颇具创意的实验精神,一种对新的生活方式的探索;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友谊与愉悦的重要大大超过了对财富积累和消费的一心一意的追求。个人解放意味着否定他们前辈所创造的世界,将自己从官僚化的教育和呆板无味的工作、虚伪不实的社会习俗和由大众传媒操纵的政治中解脱出来,最终使自己从那个打着自由的旗号而实际上给远离美国的(越南)人民带来无尽灾难的军事化国家中解脱出来。<sup>①</sup>

没有人比阿比·霍夫曼更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反文化运动的内在矛盾:即严肃政治与自我放纵的融合。霍夫曼以傲慢无礼的天之骄子身份风靡60年代。他力图建立一种新的激进主义,这种激进主义将包括现代生活中的现

---

<sup>①</sup> Anderson, *The Movement and the Sixties*, 241-87; Clecak, *Radical Paradoxes*, 252; Jay Stevens, *Storming Heaven: LSD and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1987), 171, 203; Farrell, *Spirit of the Sixties*, 203-04.

实——消费主义、大众传播以及青年一代所受到的异化和隔离。在某种意义上,他把马尔库塞的理论颠倒过来。他认为,大众文化可以成为反抗正统社会的一种力量源泉,激进改革者可以利用大众媒体来改变公众意识。他对左翼力量传播其思想的传统方式提出了挑战,将幽默与戏剧性效果作为新的方式引进到抗议活动中。当他向纽约证券交易所大厅里抛撒大量一元面值的美元钞票时,交易人纷纷抢夺那些钞票,致使交易一度暂时中断(这种事情老左派  
294 从来也没有干过)。霍夫曼是一个极为自我中心的人,但他并没有在他 1968 年出版的《为革命而革命》书上署名,这本书的作者只是简单地以“自由者”来标示。但他在吸用毒品方面越陷越深,表现出当个性解放成为政治的基础时所暗藏的陷阱。<sup>①</sup>

尽管反文化运动强调的社区理想主义——该运动在纽约的东村和旧金山的海特—阿什伯里区建立了自己的小天地,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两千多个社区——但它的解放概念却包含了强有力的个人色彩和内容。在这场一代人的反叛中,没有什么比性自由占据了更为中心的位置。在这方面,马尔库塞同样是提供了思想的源泉。他的《性欲与文明》是在 1955 年出版的,但在十年之后为造反的年轻人所发现和利用。马尔库塞在书中将不受限制的性爱描绘成一种对压抑性的、强制统一性的社会所发动的颠覆性挑战。但人们并不需要阅读马尔库塞才能发现,性的愉悦是通向自由之路。对于男人来说,这是由《花花公子》杂志传递出的信息,此时因鼓吹“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这部杂志正在变成畅销杂志。1962 年,在她那本名为《性与单身女郎》的畅销书中,海伦·格利·布朗为女性展示了女性过着的放荡不羁生活。与此同时,从 1960 年开始,避孕药丸的大量生产和销售,从而使长期以来“自由爱人们”所要求的性与生育的分离成为可能。<sup>②</sup>

① Johan Raskin, *For the Hell of It: The Life and Times of Abbie Hoffman* (Berkeley, 1998).

②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1955); Ruth Rosen, "The Female Generation Gap: Daughters of the Fifties and the Origin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Feminism," in *U.S. History as Women's History: New Feminist Essays*, ed. Linda

在50年代,C. 赖特·米尔斯曾嘲笑过“革命的性腺理论”。到60年代末期,性自由与长发和吸毒一样成为了显著的反文化的象征。从1964年的密西西比州的自由夏天运动到三年后的旧金山的“性爱夏天”的转向,标志着“性爱革命”如何有力地取代了政治革命。但在复杂的方式方面,对性自由的要求对60年代出现的另一个运动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个运动就是女权主义的“第二波”。<sup>①</sup>

1962年,随着贝蒂·弗里丹的《女性奥秘》的出版,女权主义意识开始在美国公众社会重新觉醒过来。弗里丹在40年代曾是《UE 新闻》的记者,写过不少东西,这份杂志是由美国联合电气、无线电和机械工人联合会(UE)出版的。她就女工的同工同酬和工作场所的种族主义问题写过大量文章。但如同许多五六十年代的批评家一样,她此刻不再针对那些老左派关心的主题,如阶级或种族不平等等,而是将消费文化的空洞无物和中产阶级的失望不满作为自己的写作主题。弗里丹把自由定义为个人的自我实现的机会,并想将这种自由的定义用于到城郊的社区环境之中,她认为,“当今妇女面临的问题的核心”是一套现存的社会价值观不允许妇女“像人一样的成长和实现个性”。由于她们“使用自己全部能力”的机会被剥夺,居住在城郊的家庭妇女缺少“实现自身的那种自由”。弗里丹著作的第一章题为“没有名称的问题”,这一章令人震撼的描写记录了富有天赋、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被局限于一个小天地中,来展示和实现她们的女人气质——书名中的“女性奥秘”——指的就是婚姻和母亲的责任,而那些希望谋求职业生涯的女性则被视为是神经病和非女性化的人。虽然争取进入公共生活的同等机会的斗争进行了100年,但令人不解的是,厨房仍然是妇女生活的中心。三年前,在莫斯科,理查德·尼克松把城郊住宅当成美国自由的象征。弗里丹则使用了这个时代象征着所有邪恶的万能词,她把城郊住宅看成是一个“舒适的集中营”。<sup>②</sup>

K. Kerber, et al. (Chapel Hill, 1995), 325-30; Anderson, *Movement and the Sixties*, 357; Sally Banes, *Greenwich Village 1963: Avant-Garde Performance and the Effervescent Body* (Durham, NC, 1993), 2-9, 212-17.

① Michael Wrezsin, *A Rebel in Defense of Tradition: The Life and "Politics" of Dwight MacDonald* (New York, 1994), 194-95; Stanley Aronowitz, "When the New Left was New," in *The 60s Without Apology*, ed. Sohnya Sayres, et al. (Minneapolis, 1984), 24.

② 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1983), 15-24, 43, 77, 282,

为数不多的书曾经产生过像《女性奥秘》这样强大的效果。弗里丹几乎为女性读者写来的充满如潮一般的强烈情绪的信件所淹没。看上去,“没有名称的问题”是一种普遍的感受。对许多妇女来说,城郊住房的梦想已经变成了一种恶梦。一个南卡罗来纳州的城郊居民这样描述她的女邻居朋友们:她们完全依赖酒精、镇定药物和安眠药而活着,她们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她们是一具“强制性的制造婴儿的机器”,一个近似于变态的清洁工,一个有秘密情人的、两面三刀的家庭妇女。读者们把家称为“微妙地奴役”她们的“监狱”,而《女性奥秘》是妇女的“解放宣言”。一位亚特兰大市的妇女写道:“自由是一个我从来想当然的词,”但在读了弗里丹的书之后,她意识到,“我自愿地在奴役自己。”许多信里也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对教育和无目的的生活的深深怨恨。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的妇女写道,“我的遭到出卖的感情不只是针对社会,同时也针对我们中间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因而也具有特殊地位的人,是我们自己穿上黑色透明的丝织睡衣,自愿而充满快感地这样生活,而并不回头去看看交到我们手中的自由是女权主义者(男人和女人统统包括在内)经过了如何艰苦的努力才取得的。”<sup>①</sup>

显然,弗里丹的书在他的目标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显示出尽管美国社会有着前几代人难以想像的富裕,但普遍的不满依然存在。弗里丹的邮袋也包括了不同的阶级和宗教背景的人对她的著作的不同反应。在《女性奥秘》出版后不久,弗里丹在《麦考尔》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记述了她的主要观点  
296 的概要,这是一个销路很大的杂志,但读者的反馈却并不十分赞同。许多读者认为弗里丹的文章对家政工作进行了攻击和羞辱,刻意否定这是一项高尚的职业和“令人满意的职业生涯”。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读者坚持认为,“为她

306-20; Daniel Horowitz, "Rethinking Betty Friedan and *The Feminine Mystique*: Labor Union Radicalism and Feminism in Cold War America," *American Quarterly*, 48 (March 1996), 1-17, 22-29; Glenna Matthews, "Just a Housewife": *The Rise and Fall of Domesticity in America* (New York, 1987), 199-218.

① Letters to Betty Friedan [correspondents' names omitted], May 14, 1963, Brookline; June 23, 1963, Atlanta; March 9, 1964, South Carolina; March 12, 1964, Sioux City; June 22, 1964, Pomona; Nella Yount to Friedan, April 22, 1964; Betty Friedan Papers, Schlesinger Library, Radcliffe College.

的家庭(创造)一个舒适而幸福的家庭环境,”对于一个妇女来说,正是“成为上帝想要她应该成为的人”。《麦考尔》的读者多为来自劳工阶层背景的人,对她们来说,弗里丹的分析提出了阶级关系的问题,而这正是给弗里丹写信的那些城郊妇女忽视的问题。一位北达科他州法戈的妇女写道,弗里丹号召家庭妇女走出家门,去找工作,以及建立自己独立的人格,这好像说,家庭佣人随时可以得到,帮助妇女照看自己的孩子。“如果对家庭和孩子的照顾,对于一个妻子和母亲来说,是如此地没有回报和无成就感的工作的话,”她问道,“为什么这样的工作对其他妇女就不是如此呢?为什么其他的妇女就必须干这样的工作呢?”一位田纳西州的读者也有同感,认为弗里丹完全忽视了“那个不得不取代我的位置而把自己束缚于家务管理工作中的可怜的女人。”“她怎么办?”“我们同时也必须解放她。”<sup>①</sup>

这些声音预示了随后许多年内影响妇女运动的阶级分歧。但弗里丹著作的现实结果是将公众的注意力集聚到美国声称的理想和美国的现实之间的又一个差距上。慢慢地法律开始对女权主义者的要求作出回应。1963年,国会通过了男女同酬法,禁止在拥有同种工作职位的人中实行性别歧视。1964年民权法也禁止以性别和种族为基础的不平等,关于性别歧视这一条是由国会中的保守派提出来的,他们的原意是要使民权法泡汤,但没有想到国会中的自由派和妇女议员却接受了这一修正案,以此作为扩展民权法范围的途径之一。其结果是,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成为摧毁妇女就业障碍的一支主要力量。1966年,全国妇女组织(NOW)正式成立,弗里丹担任会长。这个组织以传统的民权组织为样板,力图追求妇女在公共生活、就业、教育和政治参与方面的完全平等。<sup>②</sup>

如果说全国妇女组织是中产阶级妇女的产物,另外一种女性反抗则在民

<sup>①</sup> Letters to *McCall's* by Mildred Wells, February 19, 1963; Dorothy Knapp, February 22, 1963; Shirley A. Gadd, February 26, 1963; Friedan Papers.

<sup>②</sup> Joan Hoff, *Law, Gender, and Injustice* (New York, 1991), 233; Donald G. Matthews and Jane S. De Hart, *Sex,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ERA* (New York, 1990), 31-33; Nancy F. Gabin, *Feminism in the Labor Movement: Women and the United Auto Worker, 1935-1975* (Ithaca, 1990), 189-93.

的家庭(创造)一个舒适而幸福的家庭环境,”对于一个妇女来说,正是“成为上帝想要她应该成为的人”。《麦考尔》的读者多为来自劳工阶层背景的人,对她们来说,弗里丹的分析提出了阶级关系的问题,而这正是给弗里丹写信的那些城郊妇女忽视的问题。一位北达科他州法戈的妇女写道,弗里丹号召家庭妇女走出家门,去找工作,以及建立自己独立的人格,这好像说,家庭佣人随时可以得到,帮助妇女照看自己的孩子。“如果对家庭和孩子的照顾,对于一个妻子和母亲来说,是如此地没有回报和无成就感的工作的话,”她问道,“为什么这样的工作对其他妇女就不是如此呢?为什么其他的妇女就必须干这样的工作呢?”一位田纳西州的读者也有同感,认为弗里丹完全忽视了“那个不得不取代我的位置而把自己束缚于家务管理工作中的可怜的女人。”“她怎么办?”“我们同时也必须解放她。”<sup>①</sup>

这些声音预示了随后许多年内影响妇女运动的阶级分歧。但弗里丹著作的现实结果是将公众的注意力集聚到美国声称的理想和美国的现实之间的又一个差距上。慢慢地法律开始对女权主义者的要求作出回应。1963年,国会通过了男女同酬法,禁止在拥有同种工作职位的人中实行性别歧视。1964年民权法也禁止以性别和种族为基础的不平等,关于性别歧视这一条是由国会中的保守派提出来的,他们的原意是要使民权法泡汤,但没有想到国会中的自由派和妇女议员却接受了这一修正案,以此作为扩展民权法范围的途径之一。其结果是,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成为摧毁妇女就业障碍的一支主要力量。1966年,全国妇女组织(NOW)正式成立,弗里丹担任会长。这个组织以传统的民权组织为样板,力图追求妇女在公共生活、就业、教育和政治参与方面的完全平等。<sup>②</sup>

如果说全国妇女组织是中产阶级妇女的产物,另外一种女性反抗则在民

<sup>①</sup> Letters to *McCall's* by Mildred Wells, February 19, 1963; Dorothy Knapp, February 22, 1963; Shirley A. Gadd, February 26, 1963; Friedan Papers.

<sup>②</sup> Joan Hoff, *Law, Gender, and Injustice* (New York, 1991), 233; Donald G. Matthews and Jane S. De Hart, *Sex,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ERA* (New York, 1990), 31-33; Nancy F. Gabin, *Feminism in the Labor Movement: Women and the United Auto Worker, 1935-1975* (Ithaca, 1990), 189-93.

权运动和学生运动中孕育成长。一位来自新泽西州的家庭妇女向弗里丹问道：“我们如何告诫我们的女儿们，让她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显然，到60年代中期为止，成千上万的女儿正在自己学习性别不平等的教训。

如同废奴主义运动一样，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成为女权主义反抗的发源地。那些年轻的女性在吸收社会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思想、学习组织政治的同时，也遭遇到非常普遍和严重的不平等待遇和性剥削。她们被排斥在民权运动组织中那些有实权的位置之外，经常被分配去干一些为男同志打杂的工作，如打字、煮饭、洗衣和打扫卫生之类，她们也经常受到男同志提出要求发生性关系的压力。不管他们之间的政见如何不同，类似金、马尔科姆·艾克斯的男298性民权运动领导人和许多学生非暴力联络委员会的骨干分子都在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那就是，种族主义得以蓄意制造的一种结果就是剥夺黑人男性的男子汉意识感，所以，重新诉诸男性权威，对于黑人解放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在1963年向华盛顿进军的整整三小时的集会中，没有出现一个女性演讲人。与此同时，妇女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活动，但这个组织的领导层却几乎无一例外地由男性担任；在1964年，该组织执行委员会中的委员中仅有6%为女性。<sup>①</sup>

在一份1965年发布的备忘录中，年轻的学生非暴力联络委员会积极分子凯西·海登和玛丽·金总结说，“我们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在对待黑人和对待妇女方面，存在着许多相同之处。”她们的这种观察是一个世纪前阿比·凯利类似观察的回音。但真正使海登和金感到极为愤怒的是妇女在这些运动中的地位问题。同样的不满和抱怨情绪很快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出现。随着反文化运动的自由性爱思想开始传播，许多男性激进分子将妇女自由的概念，几乎全部通过性方面的标准来定义。年轻女性接受性革命的概念，尤其是

<sup>①</sup> Letter to Betty Friedan, March 13, 1963, Ridgewood, Friedan Papers; Alice Echols, *Daring to Be Bad: Radical Feminism in America 1967-1975* (Minneapolis, 1989), 26-31; Bloom and Breines, eds., *Talkin' It to the Streets*, 45; Branch, *Parting the Water*, 880; Elsa Barkley Brown, "Negotiat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Public Sphere: African American Political Life on the Transition from Slavery to Freedom," *Public Culture*, 7 (Fall 1994), 144-45; Evans, *Personal Politics*, 112.



欣赏它对传统双重标准的攻击。但许多人则批评说,性革命加强了这样的形象,即女性是男性性欢愉的目标。“这场运动应该是争取人类的解放,”年轻的小说家玛吉·皮尔西写道:“但为什么在运动之中的妇女的地位并不比在运动之外的妇女高?”到1967年,全国各地的妇女建立起小型的“提高觉悟”学习小组,来讨论她们种种不满情绪的根源进行讨论。许多人认为,建立她们自己运动的时刻已经来临,这个运动不仅要争取全国妇女组织提出的平等权利,而且还要争取妇女的“解放”。<sup>①</sup>

一种激进的新女权主义,在一群年轻女性的带领下,突如其来地在1968年9月美国小姐的选美比赛中闯入了全国的意识之中。当时,抗议比赛的人将各种各样的象征“压迫”的东西,如女用紧身褙、胸罩、高跟鞋以及《花花公子》和《妇女家庭杂志》的期刊等,装满了“自由垃圾罐”。(与传统的抗议方式相反,她们没有将这些东西付之一炬,但媒体还是迅速送给了这些激进妇女抗议者一个绰号:“焚烧胸罩者”。)在举行选美赛的大厅内,抗议者展示了写有“妇女解放”和“为了妇女的自由”的口号的横幅。四个月后,在尼克松总统的就职仪式上,一群妇女又焚烧了她们的选民证,这个举动不仅代表了一个与男人焚烧征兵卡的性质相同的女性行动,同时也表明妇女所受的不平等待遇并没有因为赢得了选举权而有所改变。<sup>②</sup>

当60年代开始的时候,休伦港宣言曾力图将传统政治与美国人的“私人烦恼”联系起来。反文化运动则强调,政治牵涉的内容远远超过投票选举或群众示威。但正因为妇女解放运动比其他任何群体都更彻底地探索了这样一句口号的内容,即“私人的就是政治的”。妇女们将“性歧视主义”和“性别政治”这些词引进到政治语言中来,她们坚持,权利占有上的不平等和自由的缺少,

① Bloom and Breines, eds., *Takin' It to the Streets*, 48; Evans, *Personal Politics*, 83-101, 152-54; Piercy in Robin Morgan, ed., *Sisterhood is Powerful* (New York, 1970), 421; Ellen Willis, *Beginning to See the Light: Sex, Hope and Rock-and-Roll* (Hanover, 1992), 62; Echols, *Daring to Be Bad*, 42-44; Teodori, ed., *New Left*, 355.

② Alice Echols, “Nothing Distant About It: Women's Liberation and Sixties Radicalism,” in *The Sixties*, ed. Farber, 149-51; Echols, *Daring to Be Bad*, 3-12; Evans, *Personal Politics*, 206-07.

不仅存在于公共生活之中,同时也存在于私人生活的领域之中。性别关系、婚姻条件、判断美貌的标准、家庭生活的本质等——这些都是如同战争和民权运动一样具有“政治性”的问题。女权主义者夏洛特·邦奇写道,“在个人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私有的领域不是政治性的,没有任何一个政治问题不是最终与个人有关的。”旧的屏障已经倒塌了。激进女权主义者的第一个主要的政治攻势是要求废除那些禁止堕胎或由医生来决定是否终止孕期的法律,这是凸显妇女缺乏真正的决定自身的自由的权力。一位女权主义者写道:“妇女如果没有限制自己生育的完全能力,她的‘其他自由’不过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装饰,是不能得到应用的。”这是19世纪提出的妇女控制自己身体的要求,为60年代对婚姻内外性快感的强调所驱动。<sup>①</sup>

但是,妇女解放的要求远远超过性方面的内容。一位早期的激进女权运动领导人达纳·登斯莫尔抱怨说,“人们好像相信,性自由就是自由。”事实上,1970年出版的《姐妹关系是强有力的》——一本包括文章、辩论和个人经历的极有影响的文集——就讨论到一系列广泛的问题,从妇女遭受的暴力迫害到法律、教会和工作场所的不平等。但这一切的中心是家庭。纽约的女权主义团体红丝袜组织在1969年提出,“赢得我们的自由”要求承认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不平等,与阶级压迫是同等重要的问题,而后者是激发激进的社会抗议活动的思想源泉。在女权主义运动的最激进的时刻,这项运动将家庭看成是妇女缺少自由的焦点所在——这是对50年代那种以家庭为中心的大众文化的震撼性否定。如果说设计一个可以取代家庭的一致性选择是异常困难的话,激进女权主义者至少成功地将这样的思想介绍到公共辩论中来了,那就是,家庭生活不应再被排除在权力、正义和自由等问题的讨论范围之外。<sup>②</sup>

① Echols, “Nothing Distant,” 163; Dick Cluster, ed., *They Should Have Served that Cup of Coffee* (Boston, 1979), 194; Echols, *Daring to Be Bad*, vii-ix, 13-17; Bunch in Evans, *Personal Politics*, 212; Morgan, *Sisterhood Is Powerful*, 246.

② John D’Emilio and Estelle B.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s: A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1988), 312; Morgan, ed., *Sisterhood Is Powerful*, Bloom and Breines, eds., *Takin’ It to the Streets*, 486; Willis, *Beginning to See the Light*, xiii.

不仅存在于公共生活之中,同时也存在于私人生活的领域之中。性别关系、婚姻条件、判断美貌的标准、家庭生活的本质等——这些都是如同战争和民权运动一样具有“政治性”的问题。女权主义者夏洛特·邦奇写道,“在个人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私有的领域不是政治性的,没有任何一个政治问题不是最终与个人有关的。”旧的屏障已经倒塌了。激进女权主义者的第一个主要的政治攻势是要求废除那些禁止堕胎或由医生来决定是否终止孕期的法律,这是凸显妇女缺乏真正的决定自身的自由的权力。一位女权主义者写道:“妇女如果没有限制自己生育的完全能力,她的‘其他自由’不过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装饰,是不能得到应用的。”这是19世纪提出的妇女控制自己身体的要求,为60年代对婚姻内外性快感的强调所驱动。<sup>①</sup>

但是,妇女解放的要求远远超过性方面的内容。一位早期的激进女权运动领导人达纳·登斯莫尔抱怨说,“人们好像相信,性自由就是自由。”事实上,1970年出版的《姐妹关系是强有力的》——一本包括文章、辩论和个人经历的极有影响的文集——就讨论到一系列广泛的问题,从妇女遭受的暴力迫害到法律、教会和工作场所的不平等。但这一切的中心是家庭。纽约的女权主义团体红丝袜组织在1969年提出,“赢得我们的自由”要求承认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不平等,与阶级压迫是同等重要的问题,而后者是激发激进的社会抗议活动的思想源泉。在女权主义运动的最激进的时刻,这项运动将家庭看成是妇女缺少自由的焦点所在——这是对50年代那种以家庭为中心的大众文化的震撼性否定。如果说设计一个可以取代家庭的一致性选择是异常困难的话,激进女权主义者至少成功地将这样的思想介绍到公共辩论中来了,那就是,家庭生活不应再被排除在权力、正义和自由等问题的讨论范围之外。<sup>②</sup>

① Echols, “Nothing Distant,” 163; Dick Cluster, ed., *They Should Have Served that Cup of Coffee* (Boston, 1979), 194; Echols, *Daring to Be Bad*, vii-ix, 13-17; Bunch in Evans, *Personal Politics*, 212; Morgan, *Sisterhood Is Powerful*, 246.

② John D’Emilio and Estelle B.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s: A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1988), 312; Morgan, ed., *Sisterhood Is Powerful*, Bloom and Breines, eds., *Takin’ It to the Streets*, 486; Willis, *Beginning to See the Light*, xiii.

性战术,采用了它们提出的“权力”和“解放”的口号,并采取了它们对传统组织和法律方式的嘲笑立场。

如果“权利革命”始于街头,但却是通过最高法院来争取到最终的法律承认和合法地位的,而最高法院在历史上是联邦政府中最为保守的一个权力分支,这不能不被认为是这个时代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历史讽刺之一。厄尔·沃伦从1953至1969年担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在他的指导下,最高法院极大地扩展了所有美国公民享有的权利,并将这些权利置于立法机构和地方政治的多数派所不能侵犯到的地方。最高法院成为种族关系革命的一个同盟军,将政治与社会内容融进受宪法保障的平等的法律保护原则之中,最终实现了重建时期提出的政治承诺。最高法院同时重新界定了政治民主应该如何301运作,并为权利法案注入新的活力,使其成为对公民自由的一种广泛保护。<sup>①</sup>

早在1937年,便有迹象表明,最高法院可能成为公民自由的一个有力的保护者。当时大法官开始抛弃了契约自由的教条,并声称应该加强对第一条宪法修正案下的自由表达权利的保护。但是麦卡锡主义阻止了公民自由的进一步扩展。民权运动的发生,迫使最高法院重新审视和界定表达自由和政治结社自由的法律地位。

如果说言论自由因为劳工在30年代争取权利的斗争而至少部分地得到了加强的话,在50和60年代中,言论自由则与民权运动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从1958年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诉阿拉巴马州案的判决开始,最高法院否定了一系列南部法律;为了达到摧毁民权运动组织的目的,这些南部法律强迫民权组织公布成员名单,要求学校教员报告他们所参加的各种组织的名称。最高法院还采取行动保护民权运动,防止立法机关对其活动任意进行调查。但是,当同样的调查是针对美共时,最高法院却予以支持。起初,最高法院称,政府对民权组织的骚扰与对待美共的类似行动是“完全不同的”。直到1961年,最高法院仍然以史密斯法为依据,维持了对北卡罗来纳州共产党组织主席的

<sup>①</sup> Morton J. Horowitz, *The Warren Court and the Pursuit of Justice* (New York, 1998); Stanley N. Katz, "The Strange Birth and Unlikely History of Constitutional Equalit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5 (December 1988), 757-59.

判罪。但后来大法官们很快从仅仅保护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转移到对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提供一种更为宽泛的保护,并将两者视为一个民主政体的命脉。

到沃伦任职结束时,最高法院甚至将发表最不受欢迎的观点的权利也置于第一条宪法修正案的保护之下,实际上瓦解了冷战时期的忠诚保障体系;最高法院甚至裁决说,提倡使用暴力不应受到禁止,除非煽动非法行动的危险就在眼前。除此之外,在1964年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这项关于新闻自由的里程碑式的判决中,最高法院推翻了阿拉巴马州一个陪审团作出的诽谤罪裁决,州法院的裁决意在惩罚美国的最重要报纸,因为它刊登的一个广告对地方政府官员对待民权示威运动参加者的态度提出了批评。最高法院的判决意见写道:“第一条宪法修正案的核心”在于公民有权批评政府;此外,最高法院还宣布约翰·亚当斯政府的惩治法是违宪的,此时,这项法律已经终止约有一个半世纪之久了。在1960年以前,为数不多的最高法院案件涉及到新闻报纸出版业。一位学者指出,正是沙利文案的判决开启了“当代新闻自由的宪法保护”。<sup>①</sup>

与此同时,最高法院推动了“纳入”权利法案的进程。此刻,最高法院要求  
302 各州必须遵循权利法案对一系列公民权利的保护原则,包括反对强制性的自证有罪的权利、禁止非法搜查和扣押的权利、迅速审判的权利、与对自己不利的证人进行对质的权利、反对酷刑和非常规惩罚的权利以及贫困的被告人得到由公共财政资助的律师代理人的权利等。最高法院同时也对地方破坏政教分离的“分离之墙”的违法行为表示出强烈的关注。在1961年,大法官们一致同意地将马里兰州宪法中的一句自相矛盾的话宣布为违宪,这句话宣称该州将不对州公职官员进行信仰规定,仅要求他们“公开表明对上帝存在的信仰”。

---

① Michael J. Klarman, "Rethinking the Civi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Revolutions," *Virginia Law Review*, 82 (February 1996), 42; Samuel Walker, *In Defense of American Liberties: A History of the ACLU* (New York, 1990), 217, 240-41; Adam Fairclough, *Race and Democracy: The Civil Rights Struggle in Louisiana, 1915-1972* (Athens, GA, 1995), 324-25; Geoffrey R. Stone, "Reflections on the First Amendment: 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Jurisprudence of Free Expressio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31 (September 1987), 253-55; Lucas A. Powe, Jr., *The Fourth Estate and the Constitution: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America* (Berkeley, 1991), ix, 92-96.

随后不久,最高法院又宣布,在公立学校中举行非宗教性的祈祷仪式和举行圣经阅读活动也是违反第一条宪法修正案的行为,事实上否定了新教作为非官方的美国国教的地位。最高法院也承担起监察州和地方民主体制程序运作是否公正的责任。在一系列的“一人一票”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坚持每个国会选区必须人数相等,并在1964年废除了人头税。<sup>①</sup>

沃伦时期的法院不仅极大地扩展了对所有美国人的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实实在在的保护(尤其是为那些因多数对地方政治的控制而可能遭受歧视的公民提供了保护),同时也发现了一批全新的权利,对美国社会迅速变化的走向作出反应。其中最具革新意义的事件是1965年最高法院在格利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的判决中对受宪法保护的隐私权的提出和坚持。这项判决推翻了康州的一项禁止使用避孕措施的法律。“隐私”这个概念是在1890年首先由路易斯·布兰代斯和塞缪尔·沃伦介绍到法律语言中来的,当时它指的是反对新闻界对人们生活死皮赖脸地刺探和侵犯以及禁止广告商们在未经个人授权的情况下使用个人肖像和画像。到20世纪60年代,“隐私”的内容演变成为了这样的意思:在不用害怕受到政府侵犯的情况下过私生活的能力。在否定康州的法律时,大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他早先曾写下“不受干扰的权利是一切自由的开端”这样的话——面临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是,20世纪20年代最高法院曾作出过一系列的決定,肯定了结婚以及抚养和教育孩子的权利不受政府的干预,但除此之外,法院没有其他的可以用来构建关于隐私的司法权的法律基础,而且宪法本身也没有在任何条款中提到过有关隐私权的规定。道格拉斯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的结论是,受宪法保护的隐私权可以从权利法案的“半影”和“扩散”中推断而定,这些“半影”和“扩散”创造了一个立法机关不能侵犯的“隐私权区域”。在他的支持意见中,大法官阿瑟·戈德堡写道,“自由的概念是要保护那些最基本的个人权利,”包括“在婚姻关

<sup>①</sup> Walker, *In Defense of Liberties*, 219-24; Marvin E. Frankel, *Faith and Freedom: Religious Liberty in America* (New York, 1994), 66; Henry J. Abraham, *Freedom and the Court: Civil Rights and Libe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5<sup>th</sup> ed. (New York, 1988), 73-115.

系和婚姻家庭中”的隐私权。

如果说格利斯沃尔德案判决将隐私权和婚姻与家庭的神圣性联结在一起了,那么,隐私权原则将很快转化为一种不受阻挠地进行节制生育的个人权利,这种权利将延至未婚的成年人乃至最终扩及到未成年人——这表明最高  
303 法院承认法律已经无法逆转性革命的潮流。这些决定直接导致了沃伦时期法院的最有争议的罗诉韦德案判决(虽然这个判决是在1973年作出,此时沃伦本人已经离开最高法院四年之久了)。这项判决建立了公民终止孕期的宪法权利。最高法院宣称,决定堕胎的权利是受宪法保护的一项根本性的个人自由,这是对激进女权主义早期要求的有力支持。罗案比格利斯沃尔德案更具有争议性,直到今天,情况依然如此。当格利斯沃尔德案判决做出时,只有两个州禁止避孕,而罗案则否决了不下46个州的法案。<sup>①</sup>

政治哲学家琼·科恩写道:“一种受宪法保护的隐私权对于任何现代自由概念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直到1970年,俄亥俄州的最高法院还在坚持说,一个妻子“最多只是她丈夫的高级佣人”,没有“任何法律上认可的感情和权利”。但格利斯沃尔德案和罗案判决导致了一大批法院判决和立法的产生,这些判决和立法看上去最终都接受了女权主义的观点,即家庭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社会集合体,而不是一个由一个人主宰的单位。由此而来,妇女在家庭领域中的法律权利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扩展。“无过失”离婚法取代了过去那种只能因为通奸、过度虐待或抛弃家庭而终止婚姻的法律,执法机关也逐渐接受了起诉那些婚内强奸和摧残性案件的观念。在法律上,主张(男女)平等的女权

---

① David J. Garrow, *Liberty and Sexuality: The Right to Privacy and the Making of "Roe" v. "Wade"* (New York, 1994), 213-60, 376-77; William W. Fisher III,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merican Legal Theory and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ll of Rights," in *A Culture of Rights: The Bill of Right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Law 1791 and 1991*, ed. Michael J. Lacey and Knud Haakonssen (New York, 1991), 348-49; Martha Minow, "We, the Family: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American Families,"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4 (December 1987), 960-61; Osmond K. Frankel, ed., *The Curse of Bigness: Miscellaneous Papers of Louis D. Brandeis* (New York, 1934), 289-315; Michael Kammen, *Sovereignty and Liberty: Constitutional Discourse in American Culture* (Madison, 1988), 90-91.

主义和主张(男女)“差别”的女权主义之间的源远流长的辩论以前者的胜利而得以解决,这个结果为数百万妇女反对以前不会受到起诉的罪行提供了法律手段,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未能预见到的困难。譬如,无过失离婚几乎取消了妇女从前拥有的取得离婚赡养费的权利;在现存的经济结构中,大多数妇女获取收入的权利远远低于男人,所以,婚姻的终止往往成为妇女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女权主义者曾将“隐私”概念斥为掩饰公共权力和社会关系影响家庭生活的一个借口,此刻这个概念却成为了妇女在争取平等的继续斗争中所使用的首要法律原则,这的确不无讽刺意味。但现代“隐私”概念所基于的理论,不再是那种社会是由一个处于“私人领域”的家庭组成的思想,而是认为,社会是由具有主权的男女个人所组成的。<sup>①</sup>

“权利革命”完成了美国自由的一种转化,自由从一套主要由白人男性享有的限制性权利转化为一种拥有平等、社会承认和自决权的非限制性权利。到60年代末及其之后,政府和法律机关收到了大量来自几乎所有的受到冤屈的群体的权利要求——包括黑人、妇女、同性恋者、社会福利接受者、族裔群体、老年人以及残疾人等。对权利的要求也扩大到那些无发言权者的权<sup>304</sup>利——即“尚未出生的人”(这是反对堕胎的人用来称呼胎儿的名词)、环境以及濒临危险的植物和动物之类。国会与最高法院将在20世纪剩余的时期内花费大量的时间来界定不同群体的美国人的权利,以及明确政府在推动和限制这些群体权利方面应该扮演的角色。<sup>②</sup>

① Jean L. Cohen, "Redescribing Privacy, Identity, Difference, and the Abortion Controversy," *Columbia Journal of Gender and Law*, 3 (1992), 44; Hoff, *Law, Gender, and Injustice*, 277-81;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108-11; Reva B. Siegel, "'The Rule of Love': Wife Beating as Prerogative and Privacy," *Yale Law Journal*, 105 (June 1996), 2171-96; Mary Poovey, "The Abortion Question and the Death of Man," in *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 ed. Judith Butler and Joan W. Scott (New York, 1992), 240-41.

② Lacey and Haakonssen, *A Culture of Rights*, 1; Robert H. Wiebe, *Self-Rule: A 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n Democracy* (Chicago, 1995), 223-26; Daniel T. Rodgers, *Contested Truths: Keywords in American Politics Since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87), 217-20.



随着因 60 年代而兴起的社会运动,先是采用了“权力”、后又用了“权利”作为它们喜爱的口号,这些运动将“自由”的语言转让给了一个重新复苏的保守主义势力;这个新的保守势力能够拥有众多的支持,本身就是 60 年代风云动荡的结果。“权利”由联邦政府中最不具民主性的一个部门来保护和发现,这一事实本身就为民粹主义反响的兴起打开了大门;新保守势力指责华盛顿的官僚机器盛气凌人地践踏了地方自治传统和地方选择权。到 60 年代末,保守派的领导人抓住那种变革“走过了头”的普遍意识,呼吁重新致力于“法律与秩序”的建设和社会的稳定。1968 年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的当选开始了一个不断增强的保守势力主导美国政治的时代,这个趋势因对水门丑闻的强烈反感而一度中断,尼克松也因此于 1974 年离开白宫。随着保守势力的上升,美国自由的故事将出现另一个转折。<sup>①</sup>

如同“漫长的 19 世纪”一样——它以 1789 年法国革命开始,于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结束——20 世纪 60 年代也延至它的纪年界限之外。在尼克松政府期间,伟大社会的计划达到了一个看上去似乎不可能的顶峰,在那个时代,为黑人而提出的鼓励性措施全面地得以体制化(而这项措施在约翰逊时代则处于襁褓时期),政府在老年医疗保健和医疗补助制度上的开支大大增加,在一段时间内,总统甚至提出政府必须承认公民拥有一种有保障的年收入人的“权利”。学生运动也在 1970 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那年,在美国入侵柬埔寨、肯特州立大学的四名反战抗议者遭到国民自卫队的枪杀之后,全美 500 多所大学都经历了全校性的罢课和罢教,课程被取消,国民自卫队被召进到 21 所院校的校园恢复秩序。虽然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已经解散和分化,反战运动一直持续到 1973 年巴黎和平协定的签署才结束。正是在 70 年代初,那些诞生于 60 年代后期的运动——如同性恋权利运动和美洲印第安人权利运动——达到了它们最激烈的阶段。印第安人权利运动还夺取占领了联邦印第安人事务局的办公大楼,并参与了苏部落对翁迪德尼的占领,翁迪德尼是

---

① Kazin, *Populist Persuasion*, 222-25.

80年前那桩臭名昭著的屠杀印第安人事件发生的地方。<sup>①</sup>

在60年代的所有成就中,最为持久的成功要数这一年代大众在对待妇女的角色和权利、性以及家庭等问题上的态度的改变。70年代的十年中,性革命从反(正统)文化变成了社会的主流,导致了离婚率的急剧上升,妇女在有薪工作行业中的人数有了很大的提高(在1980年所有已婚妇女中有一半人属于这类人),在民意测验中继续认为婚前性关系是错误行为的人数下降了一半。如同一战前的波希米亚派看到他们的许多价值观为20世纪20年代的主流文化所吸收一样,60年代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虽经常以非政治化的形式出现,却成为了70年代美国的一部分。当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要求回答者将一系列价值就其重要性进行排序时,回答者将“选择自由”列在首位,放在“遵循上帝意志”、“高收入”或“成就感”的前面。与此同时,个人和政治的重叠扩展了许多美国人的个人自由经验,同时也使得大众对正统政治产生了一种日渐强烈的疏离感,事实上,大众对任何概念上的公共性公民生活都产生了疏离感。在某种意义上,尽管新左派对消费主义有诸多批判,但在某种意义上,不断增长的对解放和个人成就的要求,恰恰反应出战后消费文化的语言和刺激力。60年代的抗议者提出,为了追求自我实现,个人必须要获得能够“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在他们的这种要求与随后而来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惟我”年代之间,具有比表面上所反映出来的更多的继承性。<sup>②</sup>

正如内战为后来几代人的美国政治建立了基本的框架一样,罗斯福去世后许多年的政治竞选活动都是围绕新政的思想和政策进行的。种族关系、女

---

① Hamby, *Liberalism*, 318-21; Anderson, *Movement and the Sixties*, 250-51; D'Emilio and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s*, 318; Paul C. Smith and Robert A. Warrior, *Like a Hurricane: The Indiana Movement from Alcatraz to Wounded Knee* (New York, 1997), 201-65.

② E. J. Dionne, Jr., *Why Americans Hate Politics* (New York, 1991), 53-54, 98; Elaine T. May, *Homeward Bound: American Families in the Cold War Era* (New York, 1988), 217-23; William G. Mayer, *The Changing American Mind* (Ann Arbor, 1993), 36, 225; Robert Wunthnow, *The Restructuring of American Religion: Society and Faith Since World War II* (Princeton, 1988), 260; Peter Clecak, *America's Quest for the Ideal Self: Dissent and Fulfillment in the 60s and 70s* (New York, 1983), 4.

权主义、政府在改正社会弊病方面的作用、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合适角色等——这些问题并非起源于 60 年代,但发生在那个时代的历史事件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更具有分裂性。随着美国逐渐转向更为保守的方向,60 年代将被怪罪为导致了所有现实和想像中的社会弊病泛滥的年代,这些弊病从犯罪、吸毒、少女怀孕到对权威的尊重感的下降(好像经过越战、水门事件及其对种族主义长达数十年的容忍之后,权威本身并没有发生自我贬值似的)无所不包。但是,正是由于有了 60 年代,美国才变成了一个更开放、更具有宽容性——简言之,更自由的国家。

### 第十三章 保守主义的自由

从1960年在约翰·肯尼迪和理查德·尼克松之间进行的那场充满戏剧性的总统竞争开始,新闻记者西奥多·怀特接连出版了四部极为畅销的关于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的著作。1964年,怀特在美国大地来回穿梭,不仅参加过数不清的民权示威活动,也出席过许多次支持巴里·戈德华特——保守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群众集会。怀特注意到了一种对他来说甚为奇特的现象:

这两个群体相互仇视,但它们使用的最重要的词却都是“自由”。双方都要求“现在就要自由”或“给所有人以自由”。这个词带有如此强烈的感情力量……如果哪位记者追问一下它们使用的“自由”一词意味着什么,他马上就会遭到斥责。

对于怀特来说,从此事中只能得出一个不能回避的结论:“美国急需一个共同接受的自由概念。”<sup>①</sup>

怀特亲眼目睹了60年代中期兴起和发展的争取控制“自由”定义的斗争,也目睹了在这个被称为激进主义的年代中得以复苏的保守主义。尽管林登·约翰逊以压倒性多数赢得了1964年的总统大选,但当年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却是美国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东山再起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场竞选同时也表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教条,包括其对自由的理解,也逐渐重新赢得了选民的支持。尽管这一点在当时很少有人注意到。

---

<sup>①</sup> Theodore White,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4* (New York, 1965), 332n.

## 保守主义的再生

308

从 20 世纪末的观点来看,人们很难想像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保守主义的艰难处境。当时在许多人心目中,保守主义与欧洲法西斯主义的罪行以及导致大萧条的经济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阴谋诡计、反犹主义和笃信等级制的精英主义观点也是一丘之貉。面对战后的种种问题,保守主义提不出任何有效的政策建议,处于束手无策的地位。“此时在美国”,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在他的《自由主义的幻象》中写道,“自由主义不仅是占主导地位的和是惟一的思想传统。因为在当今通行的思想传播中,保守主义和反动的观点已经不存在了。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了。”显然,特里林在此有些言过其实;如同即将出现的麦卡锡主义所表明的,保守主义还远远没有被驱逐出美国的生活。但是对于特里林和他那个时代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既然所有不同种类的意识形态已被一种支持新政福利国家的共识所取代,保守主义如同激进主义一样,在当时都成为过去的遗迹。当保守主义思想的确开始复苏和流传时,自由派则将其视为一种由那些孤立无援、心理上有障碍或丧失了地位的人表现出的一种过渡性的反“现代性”的反应。<sup>①</sup>

“我很不理解,”哈耶克在 1956 年写道,为什么在美国保守派居然允许“左派”来控制自由“这个几乎不可或缺的词”的定义。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一群保守派的思想家开始了重新夺回自由概念的主导权的工作。尽管除了在他们自己的封闭小圈子内,这些人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他们却建立了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纲领,这些纲领将成为直到 20 世纪末的保守主义思潮发展的主导思想。纲领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反国家(干预)主义。这是一种来源于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世界观,因保守派对新政的切齿痛恨,这种世界观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与此

<sup>①</sup> Lionel Trilling, *The Liberal Imagination* (New York, 1950), ix; John A. Andrew III, *The Other Side of the Sixties: 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 and the Rise of Conservative Politics* (New Brunswick, 1997), 12; Jerome L. Himmelstein, *To the Righ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Berkeley, 1990), 1-3, 137-38.

同时,哈耶克自己的写作为保守主义提供了思想上的合法性。根据反国家主义的观点,自由意味着非集中化的政治权力、有限政府和一种自由的市场经济。这种观点为1950年开始出版的《自由者》杂志所推崇和宣扬,同时也出现在诸如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的著作之中。50年代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悲哀:认为个人的自由能力在一个大众社会中明显地减少了。在某种意义上,保守主义思想是对这种悲叹的回应。1956年,在一个名为“人的自由问题”的讨论会上,曾是大萧条时期激进的小说家、但后来成为保守派思想家的约翰·多斯·帕索呼吁“重新使用自由的语言”来批判流水线式的生产、社会趋同主义和具有侵犯性的政府。<sup>①</sup>

309 但是真正将这些“自由至上主义”保守派与其他社会批评家区分开来的是前者将个人自由与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的做法。在1956年的会议上,弗里德曼坚持认为,保守派没有必要为资本主义道歉。他强调说,自由的市场是个人自由的必要基础。1962年也就是迈克尔·哈林顿的《另一个美国》出版和休伦港宣言发布的那一年,弗里德曼出版了《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对主流自由主义思想提出了毫不妥协的批判。弗里德曼呼应哈耶克当年的思想,坚持认为一个不受制约的市场是最真实的“自由的表达方式”,因为竞争“为人民提供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不是政府或经济计划家们认为人民应该拥有和需要的东西。但弗里德曼的观点超越了他的导师和其他计划经济的批判者的观点,他提出将下至国家公园的管理在内的几乎所有的政府功能统统私有化,废除最低工资法,废除递增式所得税法,以及废除社会保障体制。<sup>②</sup>

保守的自由至上主义将市场选择的观点推进到几乎每个生活领域,在某些方面,它甚至预示了生活方式多元化的语言的到来,而这种语言将很快为新左派和妇女运动所采纳。弗里德曼写道:“一个人如何处置他的自由……不应

① F. A.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1994), xxxv-vi; George W. 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Since 1945* (New York, 1976), 22-27; Felix Morley, ed., *Essays on Individuality* (Philadelphia, 1958), 4-5, 15-33.

② Himmelstein, *To the Right*, 46; Morley, ed., *Essays on Individuality*, 168-74;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1962), 1-4, 12-15, 31-36.

该由国家说了算。”政府不能对道德问题立法；在他看来，“道德问题”应该由每个人自行解决。弗里德曼实际上是在间接批判“新保守主义”，后者是在 50 年代迅速变得热门起来的第二股思潮。像拉塞尔·柯克和理查德·韦弗这样的作家坚信，为了与共产主义较量，自由世界必须在道德上和思想上武装自己，而不只是在军事上武装自己；他们坚决否定了那种好像腐蚀了西方自信心的“相对主义”，呼吁重新建立起一套基于宗教和永恒的是非标准之上的抽象价值观体系。韦弗的《思想是有结果的》（1948 年）是一部杂谈体的哲学著作，它出乎意料地变成了这种新传统主义思想的最具影响力的表现。这部著作哀叹“西方的解体”，呼唤回归到一个主要基于“超验的”、但实际上是基督教价值观的文明中去。对差别的容忍——现代自由主义的基本宗旨——绝对不能取代这种对绝对真理的探求。

新保守派与自由至上主义者一样对现代自由主义国家持仇视态度。对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来说，市场是个人自由的象征。对韦弗来说，商业世界的道德规范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堕落，这种堕落将“物质利益置于精神追求之上”。他认为，自由是一种道德境况，自由并不仅仅意味着不存在强制，自由绝不能与对消费品和个人成就的一意孤行的追求相妥协。保守派历史学家克林顿·罗西特<sup>310</sup>以一种呼应约翰·温斯罗普和其他基督教自由观的信仰者的笔调写道，美国人“为自由鬼迷心窍”，他们实际上应该去关心责任、职责和道德秩序。<sup>①</sup>

从此时开始，保守派阵营中出现了分裂，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末期。保守主义的目的是将个人从侵略性的政府中解放出来，还是鼓励个人去过一种道德生活？保守主义的目的是像罗西特所说是为了创造一个“自由人”，还是创造一个“好人”？如果男人和女人不愿意以一种道德方式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已经从经济领域中被淘汰出局的政府是否还能被委以管理个人行为的职责呢？有些保守派作者，如 M. 斯坦顿·埃文斯，力图做到两全其美，

<sup>①</sup>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12-14; Nash,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xiii, 38-69, 82; Himmelstein, *To the Right*, 49; Richard M. Weaver, *Ideas Have Consequences* (Chicago, 1948), 1-3, 29-40; Clinton Rossiter, *Conservatism in America* (New York, 1955), 72.

在谴责政府在道德问题上过于“宽容放任”的同时，又谴责政府在公共政策方面太过于“国家意志主导化”。但保守派内部的分歧实际上更为深刻。这些分歧通过弗里德曼和埃文斯对麦卡锡时代政治的反应表现出来。弗里德曼对麦卡锡时代搞黑名单的做法予以强烈的谴责，认为这是一种极不合法的对个人追求生活的权利的干扰；埃文斯则支持（政府实施的）联邦忠诚安全计划，理由是爱国主义是超验价值观中的一种，政府有权支持和助长这种价值观的生长，哪怕是采取强制性的手段。这种哲学上的分歧最终都是基于现实生活中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之上：一个人不能在为一个不受管制的市场和永恒的价值观进行辩护同时，又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反传统实践。资本主义的扩张按照自己的意图改组了家庭、社区、学校和教会，将人类所有的关系都置于账本底线的计算之下。如同卡尔·马克思在一个多世纪前指出的，资本主义市场“在人与人之间，除了自身的利益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当然也不会留下一个道德社会的基础。<sup>①</sup>

美德和不受限制的个人选择是讨论自由的有着两个天壤之别的出发点。其中一方将社会看成一个由道德约束联结起来的有机整体，另外一方却认为社会是具有自主性的个人组成的集合体。一方把现代社会的问题归咎于个人主义的泛滥，另一方则怪罪于对个人自由的过分限制。尽管如此，许多保守派仍竭力寻找能弥合这些思想潮流之间的分歧的途径，这种努力至今仍在进行之中。

在这方面，没有谁比《国家评论》的编辑威廉·巴克利发挥的作用更为引人注目。《国家评论》自1955年创刊起，每周都开辟一个专栏，供保守派思想阵营中的各种意见进行交流和表达。巴克利也因此很快在保守主义复兴的过程中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小心谨慎地将保守主义的思想运动与一些偏激组织划清界限，包括自由游说集团和约翰·伯奇协会，前者是一个反犹太人的组织，

<sup>①</sup> Rossiter, *Conservatism*, 72; M. Stanton Evans, *Revolt on the Campus* (Chicago, 1961), 13-22, 75-87, 179-82;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20; Christopher Lasch, *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New York, 1994), 98; Robert C. Tucker, ed., *The Marx-Engels Reader*, 2d ed. (New York, 1978), 475.



公开否认(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事实,后者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描述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自觉的代理人。巴克利也曾致力于在保守主义的两大流派之间进行疏通调和,但是并不成功。在60年代早期的一系列文章中,巴克利在《国家评论》中同弗兰克·S. 迈耶一起想展示自由至上主义者的自由与“道德权威”之间是可以兼容并包的。一种“自由经济”也许并不等于“具有美德的生活”,迈耶说,但是如果没有它,“自由之保存”将是不可能的。但到最后,迈耶的“调和主义”还是站到了反国家主义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一边。他强调说,人们可能是自由的,即便他们没有“选择好的德行”。迈耶呼吁两派彼此之间相互尊重,以和为贵(埃文斯把传统主义者称为“权威主义者”,柯克则将否定一切道德权威的自由至上主义者称为“浪荡子”),劝说双方看清楚保守主义运动不需要有一条“大一统的党派路线”。<sup>①</sup>

令保守派感到幸运的是,思想上的和谐连贯虽往往无助于一个政治运动的生长,却有利于识别一个共同的敌人。在这方面,保守派倒有许多共同之处。首先,两个强大的对手自动成为了保守派一致的焦点——国外的苏联和国内的自由主义政府。当然,有的保守派分子,其中也包括赫伯特·胡佛自己在内,起初对杜鲁门主义持保留态度,担心增强政府权力,会导致美国变成世界警察。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的保守派都同意这样的结论,如巴克利所说,既然只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发动和领导一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反对苏联的运动,那么,只能接受“持续的大政府的”现实。的确,与弗里德曼不同的是,大多数保守派分子都是麦卡锡主义的坚决支持者,他们显然相信,个人自由决不能延伸至共产党人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在外交政策方面,

---

<sup>①</sup> E. J. Dionne, Jr., *Why Americans Hate Politics* (New York, 1991), 154-161, 266-81; Andrew, *Other Side of the Sixties*, 8-16, 102; David H. Bennett, *The Party of Fear: From Nativist Movements to the New Right in American History* (Chapel Hill, 1988), 356; John B. Judis, *William F. Buckley, Jr.: Patron Saint of the Conservatives* (New York, 1988), 147-69; Frank S. Meyer, *In Defense of Freedom: A Conservative Credo* (Chicago, 1962), 1-9, 20-23, 38-59, 68-70, 150-51; Nash,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172-177; Frank S. Meyer, ed., *What is Conservatism?* (New York, 1964), 8-19, 69-74.

保守派认为,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问题并不在于他们反共产主义反过了头,而是在于他们做得远远不够。但反共主义不能清楚地区分保守派和自由派,因为自由派的大多数也是冷战的支持者。保守派的特征在于它对国内“大政府”的反对和仇视。迈耶写道,“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明朗化”是一种对自1932年罗斯福当选开始的“美国的革命性转变的迟到的反应”。在60年代,又一批敌人出现,使得保守派可以更清楚地界定自己。<sup>①</sup>

60年代里,为意识形态驱动的年轻人以自由的名义改变了美国社会的面貌。这个时代既有其激进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保守派有他们自己的“自由学校”,由新闻报纸的编辑罗伯特·勒菲弗尔在科罗拉多州创办,专门教授自由放任经济学和不受制约的个人主义的学说;沃尔特·诺特在他的加利福尼亚浆果农场中建立了一个“自由中心”,专门鼓吹推进自由企业,谴责福利国家是共产党把“自由民族”打入“奴隶制”深渊的一个阴谋。随着“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YAF)在1960年的建立,保守派学生也以一种十分强悍的力量出现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坦率地讲,聚在巴克利在康涅狄格州沙伦家中创建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的90多个保守派年青人,与同年创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青年学生之间,在1960年的沙伦宣言和休伦港宣言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与休伦港宣言对社会弊病提出的冗长分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宣言只用了一页纸来宣示它的总原则。但两部宣言都认为,美国现在面临着一种危机,青年人是新的激进运动的先锋队,两者都宣称将提供通向更大自由的道路。沙伦宣言对过去十年在保守派圈子里流行的普遍原则进行了总结:自由的市场是“个人自由”的支柱;政府的权力必须被限制在维持秩序、主持正义和从事外交活动的领域之内;“国际共产主义”是对自由的最严重的威胁,必须予以消灭。<sup>②</sup>

① Hodgson, *World Turned Right Side Up*, 89-90; Himmelstein, *To the Right*, 15-17, 32-45; Ronald Lora,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s, the Cold War, and McCarthyism,” in *The Specter: Original Essays on the Cold War and the Origins of McCarthyism*, ed. Robert Griffith and Athan Theoharis (New York, 1974), 54-60; Nash,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148-61; Meyer, ed., *What is Conservatism?*, 15.

② Evans, *Revolt*, 109-11, 167; Lisa McGirr, “Suburban Warriors: Grassroots Con-

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的大部分活动是致力于把共和党的领导权从那些准备与新政休战和对共产主义采取绥靖政策的人手中抢夺回来。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的成员很快成为巴里·戈德华特参加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活动的冲锋队。1958年，戈德华特在亚利桑那州赢得了国会参议员的席位，从而确定了自己全国最著名的保守派民选官员的地位，两年后，他出版了《一个保守派的良心》一书，该书卖出300万册，在大学校园中尤其受到欢迎。如同沙伦宣言一样，这本书带有反国家主义的观点，但又要求采取更有进攻性的冷战行动（他甚至建议说，核战争可能将是“自由的代价”）。但戈德华特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反对来自“内部的”对自由的威胁，尤其是谴责福利国家，他认为，福利国家鼓励人们依赖政府，毁掉了个人的自主能力，其效果犹如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口。戈德华特认为，“一个依靠中央政府的资助和补贴而生活的人民不能称自己是自由的。”戈德华特承认他的计划对于“更为不幸的公民们的境地”也许看上去显得有些“麻木不仁和轻视”，但他呼吁用私人慈善事业取代公共福利计划和社会保障，要求取消递增所得税制度。但与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宣言不同的是，戈德华特也采用了一种传统式的语言。他强调，保守主义的原则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精神上”的内容，是从“人的本质和上帝所揭示的真理中”中总结和推衍出来的。他声<sup>313</sup>称，自由主义者完全采用一种纯粹的经济眼光来看社会，所以推动唯物主义的正是自由主义。<sup>①</sup>

戈德华特在1964年的提名是保守主义运动的一个了不起的胜利，因为这个运动常被看成是由一群吵吵闹闹地要“否定整个20世纪”的狂热分子发动的运动。戈德华特将竞选集中在从约翰逊和新政政府手中重新夺回“自由的

---

servatism in the 1960s.”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5, 117-18; Andrew, *Other Side of the Sixties*, 8, 55-58; *National Review*, September 24, 1960.

① Mary C. Brennan, *Turning Right: The Conservative Capture of the GOP* (Chapel Hill, 1995); Andrew, *Other Side of the Sixties*, 5-6, 17; Barry Goldwater, *The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 (Shepherdsville, 1960), 3-5, 10-22, 70-74, 89-91, 118-22; Barry Goldwater, “We Cannot Have Economic Freedom and Political Dictation,”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March 15, 1960, 337-39.

语言”的工作上。他在接受提名演说中提到,“捍卫自由的极端主义并非是一种罪恶。”这句话后来为人们长期记忆。他的演说也包括一个极为学术性的对自由和秩序之间的关系的讨论。这个讨论的其中一部分是由信仰自由至上主义的政治学者哈里·贾法写作的。戈德华特借用了一些在美国根深蒂固的观念和思想,坚持认为上帝的意图是要“这个强大的共和国……成为自由人的土地,”他描绘的图景是世界在美国领导下,由“一个强大的”自由繁荣和相互依存的体制联合起来。<sup>①</sup>

戈德华特被民主党人描绘成一个将要废除社会保障和冒险发动核战争的极端主义者,他在大选中遭到了严重的挫败,只赢得40%的选票。但这场大选却使保守力量动员和组织起来。1964年的选举使保守派的主张得以明朗化,并将成为今后若干年的保守主义的基础。在反共主义的基础上(在这一点上,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并无区别),戈德华特又对福利国家进行了指责,说它毁灭了“个人的尊严”,同时要求减少税收和政府管制,这些内容将为后来30年的共和党人不断重复使用。戈德华特展示了,当自由派控制着华盛顿时,保守派可以利用传统的反政府的民粹主义,以此来扩大他们的选民基础,消除他们过去那种精英势力的传统形象。在一次竞选集会上,他甚至宣称:“我对华盛顿和集权政府的恐惧更甚于我对莫斯科的恐惧。”(戈德华特的几个追随者,包括他的演讲稿起草人卡尔·赫斯特遵循这个逻辑,在后来几年内谴责冷战导致了列维坦式的国家。)戈德华特也直接呼应不断增长的对社会稳定的希望,面对民权和学生运动的抗议活动,贫民窟的暴乱和正在上升的都市犯罪率,呼唤建立“法律与秩序”。<sup>②</sup>

① *Commonweal*, April 14, 1961;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April 15, 1964; 642-44; Dionne, *Why Americans Hate Politics*, 176-79.

② Andrew, *Other Side of the Sixties*, 211-14; Michael Kazin, *The Populist Persuasion* (New York, 1995), 4; Jonathan M. Kolkey, *The New Right, 1960-68, with Epilogue, 1969-1980* (Washington, DC, 1983), 183-84; Murray N. Rothbard, *For a New Liberty* (New York, 1973), 3-11, 184-229; Michael W. Flamm, “‘Law and Order’: Street Crime, Civil Disorder, and the Crisis of Liberalism,”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7, 60-114.

戈德华特为保守主义阵营征集了新的支持者。来自急速扩张的南加利福尼亚和西南部的郊区选民的支持,以及从“阳光地带”的石油工业和航空工业的新贵中滚滚而来的竞选基金,都预示着保守主义的一种新的人员和资金基础。他赢得了五个南部州的事实——他是 20 世纪第一个获得如此记录的共和党人——表明民权革命已经重新绘制了国家的政治地图,为“南部战略”打开了大门。四年后,这个战略将帮助共和党人夺回白宫。

314

早在黑权运动兴起之前,一种对黑人民权运动的强烈反击为保守派提供了新的机会,对民主党联盟的稳定造成了威胁。没有内在的理由能够解释,为什么保守派为种族主义所吸引——如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所挖苦的,为什么那些被“苏联无赖”排斥的人想到要“恢复奴隶制”?但是在美国的传统中,对联邦政府的敌意与捍卫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度是联结在一起的。而与此同时,自内战起,黑人就一直是一个积极的、强有力的和坚定不移的全国政府的支持者。在 20 世纪 50 年代,当南部白人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作出的解除公共学校种族隔离制度的决定进行谴责的时候,许多保守派对此种态度大为欣赏,表示赞同和支持。有的时候,保守派的写作也表露出一种毫不掩饰的种族主义思想,如弗兰克·迈耶把非洲称为“文明前的文化”;《国家评论》把南部白人称为“高等种族”,并以“文明的权利高于全民选举权”为由来为南部取消黑人选举权的做法辩护。<sup>①</sup>

如果说更为极端的保守派倾向于把白人南部看成是传统基督文明的最后堡垒,自由至上主义者则对黑人被剥夺了经济和教育机会的现实表现出一种令人震惊的漠不关心。譬如,弗里德曼不顾所有的事实,坚持认为,因为自由的市场将自动惩罚那些实行种族歧视的公司,所以(联邦政府的)公平就业法是不必要的。他支持以由州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取代公立学校,尽管他承认许多私立

① McGirr, "Suburban Warriors", Frederick F. Siegel, *Troubled Journey: From Pearl Harbor to Ronald Reagan* (New York, 1984), 157-59; John P. Diggins, *Up from Communism: Conservative Odysseys in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 York, 1975), 8-9; Hodgson, *World Turned Right Side Up*, 65-81; Nash,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199-200; Meyer, *In Defense of Freedom*, 8; Judis, *Buckley*, 138.

学校的兴起完全是为了逃避“强制性的种族合校政策”。戈德华特自己虽然谴责法律上的种族隔离,但却对1964年的民权法投了反对票,他坚持认为,种族平等必须通过自愿的途径来实现,而不是通过联邦政府的强迫命令来争取。他说,他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种族融合的社会”,而是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在这个自由社会中,个人有“不与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人进行交往的自由”。对于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来说,它总是从有限政府的角度来看民权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提出一种可以取代联邦干预的方法,作为在面临地方抵制的情况下争取种族正义的途径。事实上,整个保守派阵营对地方社区自治的强调很少讨论到这些社区中的权力关系问题,没有就(这些社区中的)异见持有者和遭到歧视的少数人的权利如何受到保护的问题进行明确的讨论。1962年,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将一枚“自由奖章”授予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瑟蒙德是全国最有名的反对民权运动的人之一。<sup>①</sup>

20世纪60年代初,巴克利逐渐摆脱他的早期支持者的种族隔离立场,毫不掩饰地谈论种族的优劣的保守派也越来越少,有的人甚至直截了当地否定了这种语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保守派喋喋不休的关于法律与秩序、地方自治、结社“自由”、福利的邪恶、私有财产的神圣性的陈述中,经常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的口气。阿拉巴马的州长乔治·华莱士以一句“不仅现在要实行种族隔离,今后要实行种族隔离,将来也永远都要实行种族隔离”而臭名远扬于全国。但他在1964年民主党预选中的强劲表现显示出政客们可以利用白人社会对民权运动成就的不安感而在争取选民支持上大有斩获。这种不安感当然并不仅局限于南部。<sup>②</sup>

同年,对未来的更为明显的预告在加利福尼亚州出现;加州以公决的方式通过的第14号提案废除了一条1963年制定的法律,该法律禁止在房地产销

<sup>①</sup>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110-18; Goldwater,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 31-37; Whit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332; Diggins, *Up from Communism*, 8.

<sup>②</sup> Judis, *Buckley*, 191-207; Kazin, *Populist Persuasion*, 224-36, 246-51; Kenneth Durr, “When Southern Politics Came North: The Roots of White Working-Class Conservatism in Baltimore, 1940-1964,” *Labor History*, 37 (Summer 1996), 309-31.

售业中实行种族歧视。拥有家庭住房现已称为自由思想的一个中心内容。对于白人来说,不受外界干涉随意处置他们财产的权利,也是同等重要的。在本州房地产商和房地产业主的支持下,加州的保守派在1964年反对公平住房法的运动中,利用了自由作为他们聚集力量的旗帜。房地产协会的月刊封面上将自由女神塑像重叠在一个郊区家庭的住房画面上,画面下面的文字说明将反对开放售房与“维护自由”等同起来。尽管林登·约翰逊席卷了加州,第14号提案也得到了一个相当可观的多数的支持,白人中还是每四个人中就有三人投票支持了这项提案。当联邦最高法院在两年后重新恢复了开放售房的法律时,法院的决定反而加强了这样一种公众印象,即种族关系政策方面的改革是在违背民主的大多数的意愿的前提下得到推动的。这件事帮助前电影演员罗纳德·里根赢得了1966年的州长选举。里根公开为一个“自由社会”中的住房拥有者的权利进行辩护,认为,如果他们愿意(或选择这样做)的话,这些人有权“歧视黑人”。

加利福尼亚的住房斗争预示着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如在波士顿发生的为争取种族合校、围绕法院命令的校车接送政策发生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种族主义思想、对社区稳定的忧虑和担心以及对犯罪活动的恐惧等混合在一起,为保守派在从前属于民主党的族裔工人阶级选民中动员和拉拢反对有为的自由主义政府的力量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那些反对校车接送政策和开放售房政策的人,在波士顿南区、纽约的卡纳西和其他类似的社区中,经常以粗鄙不堪的绰号和语言辱骂黑人。这种行为显然加强了蓝领族裔是反动的种族主义者的公众形象。但住在富裕郊区的居民虽然学会了避免和放弃使用这种低级下流的语言,但如同加州的提案所示,在保持他们社区始终是白人化的居住区方面,他们的坚决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他人。<sup>①</sup>

前民主党选民中出现的反对力量帮助理查德·尼克松分别在1968和 316

---

① Thomas Casstevens, *Politics, Housing, and Race Relations: The Defeat of Berkeley's Fair Housing Ordinance* (Berkeley, 1965), 9-11, 72-73, 99-108; *California Real Estate Magazine*, 44 (September, 1964), cover; McGirr, "Suburban Warriors," 227-28, 246-47; Jill Quadrango, *The Color of Welfare: How Racism Undermined the War on*

1972 年入主了白宫。但保守派对尼克松的不满程度并不亚于对他的前任。尼克松可以对保守派在口头上进行呼应,尤其是在谴责反战示威者和呼吁建立法制与秩序方面,但当他进入白宫之后,他却是扮演了一个主流共和党派的角色,他扩大了福利国家的政策,继续寻求与苏联实行和缓战略,而不是战略对抗。在 20 世纪 70 年代,国内和国际事件进一步影响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为 1980 年保守派的胜利创造了先决条件。在这些事件中最首要的是 1973 年出现的二战后经济扩张和消费繁荣的长时期终止和一个增长缓慢和高通货膨胀期的开始。其结果是战后社会契约的分裂,大公司在面临利润下降、海外竞争力提高的情况下,要求获得合同上的让步和提高生产力的效益,这加速了已经开始的将收入很高的制造业工作转移到美国的低工资地区和国外去。劳工运动过去一直是民主党联合阵线中的一个小伙伴,现在不得不在公司保守主义的动员中处于守势。劳工运动从那时起便一直处于这种地位。这也是美国人的实际工资长期处于冻结状态的众多原因之一,美国人的真实工资从 1973 年起在 20 年中基本上没有增长过,经济危机和由此产生的普遍焦虑心情显然增强了保守派提出的要求的吸引力。保守派的呼吁包括,降低税收,减少政府管制,削减政府的社会(项目)开支,以刺激商业投资和恢复生产力。这些要求对强调道德的保守派和自由至上主义的保守派都有强大的吸引力,从而使这两个保守派群体在对自由定义有严重分歧的情况下,能够继续一起工作。<sup>①</sup>

经济上的混乱显然助长了全国性的不安感的产生和蔓延。其中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例子是美国自由列车的命运。这部列车作为美国独立 200 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于 1974 年发起。这列由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四家大公司赞助的

---

*Poverty* (New York, 1994), 96-98; Ronald P. Formisano, *Boston Against Busing: Race, Class, and Ethnicity in the 1960s and 1970s* (Chapel Hill, 1991); Jonathan Rieder, *Canarsie: The Jews and Italians of Brooklyn Against Liberalism* (Cambridge, MA, 1985); Arnold Hirsch, *Making the Second Ghetto: Race and Housing in Chicago 1940-1960* (New York, 1983), 171, 198.

① Judith Stein, *Running Steel, Running America* (Chapel Hill, 1998), chs. 9-10; Hodgson, *World Turned Right Side Up*, 189-91; Dionne, *Why Americans Hate Politics*, 247-57; Himmelstein, *To the Right*, 132-45.



列车与其著名的 1947 年的前身有许多显著的不同。列车上的历史文献全是复制品,不是原件。车上还附加了其他一些展品,如喜剧演员杰克·本尼的小提琴、篮球运动员鲍勃·拉尼尔穿过的 20 码的球鞋、朱迪·加兰在电影《绿野仙踪》中穿过的服装和用过的一个呼拉圈,这些新加进的东西看上去是在将自由与现代消费文化和大众娱乐联系起来,而不是与美国的政治与思想传统联系起来。但是,当时的美国还未从在越南的失败和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丑闻的冲击中站稳脚跟,参观自由列车的观众人数之少,说明国家在自信自尊方面面临了一种危机。随后不久,几十名美国人在伊朗被捕捉为人质,更加强了一种公众感觉,<sup>317</sup>即美国作为一个主宰世界力量的时代已经结束。1979 年,吉米·卡特总统也警告说美国面临着一种“信心上的危机”。他把这种情形部分地归咎于美国“对自由的误解”,这种误解将“自我陶醉和消费”置于对全国性的共同目的的关心和投入之上。<sup>①</sup>

所有这些新的发展都为保守主义的阵营增添了新的力量。其中一套新的人马是一群自称为新保守主义者的人,这是由一个由前自由派知识分子组成的群体,他们指责 60 年代导致了道德标准和对权威尊重的下降。他们对这种保守主义思潮的接受很快导致他们对其他保守思想的全面拥抱,包括那种即便动机良好的政府社会计划给社会带来的坏处也是大于好处的说法。他们同时也否定了卡特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进行重新定位的努力(卡特说,美国害了“一场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症”),卡特想将外交政策从冷战转向为推动人权,包括在“自由世界”的国家内。新保守派重新利用了 60 年代已经基本被抛弃的极权主义理论,认为由于卡特对苏联威胁视而不见,“自由的生存”已经受到了威胁。<sup>②</sup>

作为一种群众运动,70 年代的另一个现象更为引人注目,这就是宗教保

① *Time*, July 28, 1975; *New Yorker*, April 21, 1975; Wilfred M. McClay, *The Masterless: Self and Society in Modern America* (Chapel Hill, 1994), 279.

② John Ehrman, *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 Intellectuals and Foreign Affairs 1945-1994* (New Haven, 1995), 28-31, 108-22; Alonzo L. Hamby, *Liberalism and Its Challengers: FDR to Reagan* (New York, 1985), 300-01; Abbot Gleason, *Totalitarianism: 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1995), 11, 192-203.

守势力作为一种重要政治力量的兴起。推动这种力量兴起的是另外一种政治上的“反弹”，但造成这种反弹不是因为民权运动，而是出自于沃伦时期的法院的一系列决定，包括禁止在公立学校中进行宗教性祈祷仪式，将淫秽作品出版作为一种言论自由加以保护，使堕胎合法化。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宗教右派对性革命和第二波女权主义的兴起甚为反感，他们认为女权主义破坏了家庭的稳定和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福音派基督教派在美国的历史可追溯到殖民地时代，它本身及其卷入政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 19 世纪，宗教复兴曾引发了废奴主义运动以及其他一系列的改革运动。但在 20 世纪中，福音基督教教徒与那种看上去在轻视宗教和歌颂非道德化的文化越来越格格不入。当宗教福音派在 70 年代步入政治时，他们主要是与右派站在一起。<sup>①</sup>

基督教保守派（它们中许多人在利用大众传媒筹集资金和传播思想方面身手不凡，做得得心应手）完全接受了自由至上主义保守派的自由市场经济学。杰里·福尔维尔牧师是自封的“道德大多数”组织的创办人。他宣称说，  
 318 在旧约和新约全书中的“上帝的语言中”都为“资本主义和自由企业”提供了正名之说。但是，基督教右派的自由定义更多地是来源于这样一种思想，即自由意味着过一种有道德感的生活——如果可能的话，以自愿的方式接受，但如果必要的话，以一种强制实施的结果来实行。<sup>②</sup>

如果基督教保守派对在市场上追求个人利益予以了宗教意义上的支持，他们对 60 年代提出的私生活领域的解放目标却予以全盘否定，尤其是否定了性革命和妇女角色的转化。许多妇女对自己成为拥有独立自主权利的个人这一新的定义也并不十分乐于接受。这一点在围绕批准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的斗争中反映出来。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最初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由艾丽丝·保罗和妇女党提出来的，后为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重新复活。在权利革命的

① Hodgson, *World Turned Right Side Up*, 176; George M. Marsden, *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 The Shaping of Twentieth-Century Evangelicism 1870-1925* (New York, 1980), 3-7, 86-92, 141-70; Dionne, *Why Americans Hate Politics*, 110-12, 219-43.

② Kazin, *Populist Persuasion*, 247-56; Robert Wunthnow, *The Restructuring of American Religion: Society and Faith Since World War II* (Princeton, 1988), 248-49.

尾声阶段,修正案所提出的“法律面前的权利平等”不能因“性别原因”而遭到剥夺这一思想,看来并无任何争议。1977年,这条修正案为国会所通过,没有遇到什么障碍,然后送至各州去批准。这条宪法修正案的初衷是消除一切阻碍妇女全面参与公共生活的障碍,但它却很快引起意料不到的一些人的强烈反对。反对者称,这条修正案将破坏家庭,贬低妻子和家庭主妇的角色,他们还用一种呼应20年代辩论的语调称,这条修正案将迫使一些专门优惠妇女的法律——如产假的规定以及在离婚时把孩子判给母亲一方的倾向等等——遭到废止。

围绕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的辩论既反映出妇女内部的分歧,也反映出性别之间的冲突。对于修正案的支持者来说,修正案为妇女的自由提供了一种保障。对于它的反对者来说,妇女的自由仍然局限在上帝所指定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之中。反对者称,修正案将妇女看成是独立自主的个人,将毁掉家庭的有机整体,让男人“逃脱”责任,否认他们对妻子和孩子应负的责任。反对修正案势力的领袖人物菲利浦·施拉夫利写道,女权主义是在“牺牲婚姻结合和社会妥协的基础上”推崇“自身的自由”。民意调查始终显示,美国人大部分的男性和女性中都赞同平等权利修正案。但如同先前的禁酒运动一样,反对修正案的运动是以保护婚姻和家庭的名义发起的,因而将成千上万的妇女吸引到公共领域中来。这条修正案因为没有得到所要求的38州的批准而失败,它的失败是保守派妇女所进行的基层动员工作的一个重大胜利。这个失败同时也显示许多妇女仍然对传统的性别分类持支持态度,尽管女权主义者将这些传统观念谴责为美国自由的障碍。<sup>①</sup>

更具有分裂性的是围绕堕胎权进行的斗争。在保守派眼中,这是自由主义政府牺牲道德价值,推动性方面的不道德行为和自私的个人主义的又一例

---

① Donald G. Mathews and Jane S. De Hart, *Sex,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ERA* (New York, 1990), x-xii, 67-79, 152-56, 169-71; Kazin, *Populist Persuasion*, 259; Rebecca E. Klatch, *Women of the New Right* (Philadelphia, 1987), 7, 122-28; Jane S. De Hart, "Rights and Representation: Women, Policies, and Power in the Contemporary United States," in *U. S. History as Women's History, New Feminist Essays*, ed. Linda K. Kerber, et al. (Chapel Hill, 1995), 219.

319 证。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拥有安全可靠的合法堕胎权,对于控制自己身体的能力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对保守派来说,尤其是对那些来自于主张“因信称义”的新教教派和天主教會的保守派来说,堕胎无异于谋杀生命。在这种极为对立的立场之间,妥协是完全不可能的。由于有了最高法院在 1973 年在罗诉韦德案中的判决,妇女将继续享有终止孕期的权利,这一权利将持续至本世纪(20 世纪末。——译者)末。但是,堕胎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画出了一条充满仇恨的、有时甚至是充满暴力性的界线,在那些笃信宗教的妇女与较为世俗的妇女之间、家庭妇女与在家庭外工作的妇女之间,挑起了一场恶战。如同针对平等权利修正案的纷争一样,关于堕胎权的战斗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一种关于妇女自由的辩论。维护堕胎权的人将“选择的权利”奉为自由的根本,这也是最高法院的大多数在 1992 年肯定罗诉韦德案的一个判决中支持的观点。法院的意见写道,“自由的核心是(一个人)界定自己生存的概念的权利”和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作出“最隐秘的和最个人性的决定”的权利。那些反对堕胎的人倾向于将自由理解为是在家庭单位内部享有的东西,他们一般反对同性恋、婚前发生性关系、宽松的离婚法和避孕措施等。在根本上,他们否定整个性革命。但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反堕胎者谴责第二波女权主义将个人决定当成集体责任的对立面来过分强调时,却采用权利革命的现在看来无处不在的语言,把他们自己的运动称为“争取生命权”的运动,声称他们代表了“未出生的孩子”的“权利”。

在某种意义上,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和堕胎权的人所进行的是一场无望取胜的、反对性别关系上不可逆转的革命的斗争。事实上,尽管保守派重新将珍妮·亚当斯曾提出的“家庭权利”供奉在首要位置,参加工作的妇女人数(包括有幼年子女的母亲)仍在继续不断地迅速增加。两种不同类型的妇女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那些力图在从前只对男性开放的专业和技能性行业中寻求职业生涯的妇女和那些涌入传统的低工资、“粉红领”工种中的大批劳动妇女,这是由于男人工资停滞不动、家庭收入需要扩大的要求所导致的现象。但无论如何,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和堕胎权的运动为保守派联合战线的扩张加进了一股新的势力。在 1980 年,由于对经济混乱的普遍不

满、美国在世界上影响的日渐衰落和传统的社会角色和价值观的明显衰弱，罗纳德·里根以风卷残叶之势入主白宫。“里根革命”将完成美国自由的又一次转变，这一次是将它从左派的战斗口号转换为一种右派的所有物。<sup>①</sup>

## 里根革命及其之后

320

罗纳德·里根是走过了一条最不寻常的路而成为总统的。他最初是一个拥护新政的民主党人，当过(好莱坞)电影演员工会的领袖(他是惟一进入白宫的工会领袖)，50年代他是通用电气公司的公关专家，因其在演讲中竭力为资本主义歌功颂德而崭露头角。他在1964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名戈德华特时所作的演讲，使他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两年后，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选举中获胜，奠定了他作为保守派重新夺回总统职位的最佳希望人选的地位。他在1980年总统大选中的胜利将一个由新老保守主义势力组成的杂牌联合阵线带进了权力中心。这个联合阵线包括阳光地带的郊区居民和劳工阶级中的族裔天主教徒、反有为政府的积极分子和主张更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的人、自由至上主义的宣传家和那些企图将“传统道德价值观”回归美国生活的人。

与罗斯福一样，里根是利用媒体的大师，他有一种超凡的能力，能将他的政治对手的词汇盗用过来，赋予其新的含义。令他的对手感到十分恼怒和讨厌的是，他非常乐于引用自由主义思想的英雄们的词语，从托马斯·潘恩到富兰克林·D. 罗斯福，再到约翰·F. 肯尼迪，统统包括在内。他可以运用女权主义的语言为保守主义目的服务，当他的政府废除了新政时期一项严禁在家中从事工业性工作的法律时，他将此称赞为妇女寻求就业机会权利的一个胜

---

<sup>①</sup> Kristin Luker, *Abor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Motherhood* (Berkeley, 1984); Klatch, *Women of the New Right*, 26-30, 45; Michael J.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 (Cambridge, MA, 1996), 99; Christopher Shannon, *Conspicuous Criticism: Tradition, the Individual, and Culture in American Social Thought, from Veblen to Mills* (Baltimore, 1996), 186-87; Dionne, *Why Americans Hate Politics*, 105.

利。他承诺要将政府从“特殊利益集团”的控制下解脱出来,但他指的“特殊利益集团”不是指游说集团或寻求政府好处的商业界——这两者都是自由派的传统打击目标——而是指黑人、工会活动家以及其他希望利用华盛顿的权力来纠正社会不公正的人。在里根的司法部里,约翰·马歇尔·哈伦的名言,宪法必须是“色盲的”——原本是一个世纪前掷向最高法院多数派的、向法律支持的不平等的自由制度提出挑战的观点——但却成为削减政府实施民权法的努力的理由。<sup>①</sup>

里根很善于扮演象征意义明显的领袖角色,他将自己与美国民族性的象征物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国旗,而且反复重申由来已久的关于美国拥有上天赋予的成为“自由的大本营”的神圣使命之类的陈词滥调。新闻记者丹尼尔·肖尔写道,共和党“下定决心要‘自由’”。里根的许多具体政策,从削减税收、减少政府管制到大幅度增长军费开支,都是由卡特开创发起的,但却是由里根将这些政策用自由的语言来加以推崇歌颂。的确,“自由”成为了里根革命的关键词。在公共场合和官方文件中,里根比他以前和之后的任何总统都更多地使用了自由这个词。里根在职期间,自由这个词也完成了一个转换的过程,从一个逐渐为自由派和左派抛弃的词,变成了一个与保守主义的目标和价值观完全等同的词。<sup>②</sup>

在外交政策方面,里根赋予了将世界一分为二的旧语言一种新的生命。

① Hodgson, *World Turned Right Side Up*, 11-12, 18; Alfred A. Balitzer and Gerald M. Bonetto, eds., *A Time for Choosing: The Speeches of Ronald Reagan 1961-1982* (Chicago, 1983), 41-57, 232; Eileen Boris, *Home to Work: Motherhood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Home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94), 16-17, 358; Kazin, *Populist Persuasion*, 261; T. Alexander Aleinikoff, "Re-Reading Justice Harlan's Dissent in *Plessy v. Ferguson*: Freedom, Antiracism, and Citizenship,"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92 (1992, 4), 973.

② Daniel T. Rodgers, *Contested Truth: Keywords in American Politics Since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87), 213-16; Schorr in Ronald D. Rotunda,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Liberalism as Word and Symbol* (Iowa City, 1986), xi; *The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Ronald Reagan 1981* (Washington, DC, 1982), 1; *Public Papers, Reagan 1985* (Washington DC, 1988), 70, 118; *Public Papers, Reagan 1986* (Washington, DC, 1988), 1505.

旧语言将世界分为一个自由的西方和一个受奴役的东方,将美国及其盟友描绘为“争取自由”的一部分。里根大胆地给“自由战士”一个新定义。这个词原先是用来形容 1956 年起来反对共产党政府的匈牙利造反者的,后来被新左派借用来描绘第三世界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那些运动。卡特已经开始用这个短语来形容与苏联支持的政府作战的阿富汗人。里根将这个范畴扩大了,将第三世界国家中那些武装起来推翻亲苏政府的群体统统囊括进“自由战士”的范围。在这个“自由战士”的队伍中也包括了前尼加拉瓜独裁者阿拉斯塔修·萨莫扎的支持者和屠杀了数百万自己同胞的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同时还包括了在安哥拉全国大选中心怀不满的落败者以及在阿富汗废除妇女所有公共权利的伊斯兰原教旨分子。在里根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由“自由、即那种激发了我们先辈的那个思想”所推动的。他对南非人民推翻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却不用这个词,对那些反对亲美独裁者的人不用这个词,无论这些独裁者如何地专断残酷。居住在自由世界的居民已经“有了他们的自由”。为了强调他的世界观,里根甚至宣布说,“自由”一词在俄语中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这是真的话,里根的语言外交学的训练将揭示苏联与美国文化之间的一个深刻的区别。但遗憾的是,俄语中的的确确地有一个完美贴切地表达自由的词:svaboda。<sup>①</sup>

在 1964 年提名戈德华特的演说中,里根宣布自由是美国生活的中心价值观,同时列出了自由的生存所面临的两大威胁:国外的共产主义与国内的大政府。作为总统,里根创造了一种反对两者的冷战语言。“自由的市场”,与自由世界一同成为了自由的核心内容。里根政府标志着新政作为一种主导性公共政策思想和政治联盟的终结。如同他之前的罗斯福和约翰逊,里根也大谈“经济自由”,也提出了一个“经济权利法案”,但与他前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前任用这句话来支持开创就业机会、消灭贫困和加强社会保障系统——里根的经济自由指的是取消经济管制和削减工会的力量,所有这一切

---

① Mark P. Lagon, *The Reagan Doctrine: Sources of American Conduct in the Cold War's Last Chapter* (Westport, 1994), xii-3, 81-89, 113; *Public Papers: Reagan 1985*, 770, 1310; *Public Papers: Regan 1986*, 445-45, 739.

都是为了保障个人有权“自由地签定商品和服务的合同”。但“经济自由”的关键是税收的急剧减少。里根说,高税收将产生被政府“奴役”的状态,而“挣你应得的钱和保留你所挣的钱的权利”是“自由的意义”。里根的减税政策不仅降低了税收的水平,同时消除了累进税的原则,这项原则是 20 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力图纠正由市场经济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均现象的途径之一。这样做的结果是财富从较穷的美国人一方大量地流向较富的美国人一方。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美国人口中最富有的 1% 的人拥有美国财富总数的 40%,这个比例是 20 年前他们所占比例的两倍。<sup>①</sup>

1986 年,在里根政府第二届任期的中期,为了回应保守派对“自由”的使用,杰里·福尔韦尔将他的“道德大多数”组织改名为“自由联盟”,并在弗吉尼亚的林奇堡建立了自由大学。帕特·罗伯逊是一位颇有声望的福音派教会牧师,他创建了“自由委员会”,该委员会拥有 550 百万美元的运作经费,为罗伯逊竞选总统做准备。但就自由的语言而言这一年最有影响的事件是“自由周末”。这是一场纪念自由女神塑像 100 周年的盛事。在参加游行的队伍中,高桅杆的帆船浩浩荡荡,焰火绚丽多彩,令人印象深刻。这场由好莱坞制片人戴维·沃尔珀设计的活动可谓是一场奉献给自由的豪华庆典。与此同时,这也是一场商业文化毫无节制的纵欲,四处充斥着大公司的赞助,并将转播庆典的电视广播权只卖给一家电视网。如同《时代》杂志评论所报道的,这场对“美国自由”的庆祝活动“没有放过任何陈词滥调”。《时代》自己也并不是那样清白无暇,它的纪念特刊里充满了陈腐无味、有时甚至是艰涩难懂的文章。“自由是一个冲破重重障碍的强大动物,”《时代》的社论这样写道。但它无意之中却提供了一个里根如何改变自由的公众话语的生动例子。《时代》特刊改写了历

① Balitzer and Bonetto, *A Time for Choosing*, 41-57; Tony Smith, *America's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1994), 291; Steve Fraser and Gary Gerstle, ed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w Deal Order, 1930-1980* (Princeton, 1989), ix; *The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Ronald Reagan 1984* (Washington, DC, 1986), 1282, 1627; *Public Papers: Reagan 1985*, 1186; *Public Papers: Reagan 1986*, 1624; *Public Papers: Reagan 1987* (Washington DC, 1989) 741-44; *The Nation*, August 26, 1996.



史,将非保守主义传统的自由内容一笔抹煞,坚持从一开始,美国人就关注如何“从政府,尤其是从压迫性政府的邪恶下,争取自由”,而从未想过“把自由交给政府”。<sup>①</sup>

里根自己则利用百年庆典活动宣布,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正是美国伟大之处的关键所在。在这样做的时候,里根实际上提供了一部新的美国历史叙事,这部历史是一部关于白人的长篇故事——即那些意志坚强、雄心勃勃的人的后代,如何从欧洲来到美洲,寻找“自由和机会”,尤其是寻找“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和他们的家庭的能力”。里根的美国历史观明显地把黑人从“想像的共同体”中抹去了,黑人的祖先被贩奴船运到美洲,他们的劳动在数百年的历史中用于养活并非属于他们自己的家庭。的确,许多美国黑人对“自由周末”抱着一种普遍的怀疑态度。“对我们来说,自由女神塑像不过是一个苦涩和荒唐的象征,”詹姆斯·鲍德温这样写道。有些黑人领袖,如都市同盟的约翰·雅各布敦促黑人参加庆典活动,“我们一定不能将自由和平等的象征拱手让给右派的思想家,”雅各布这样写道。但他的呼吁来得有些太迟了。<sup>②</sup>

里根政府表现出当代保守主义思想核心深处的矛盾。在语言上,里根企图呼应宗教右派提出的问题,他坚决反对堕胎,鼓吹一种“对精神价值观的回归”方式来加强传统家庭和巩固社区团结。他强调说,自由同时带有责任感:“我们拥有自由,但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要成为罪恶的奴隶。”如大多数保守派一样,他将经济领域排除在对个人自私自利行为的谴责和对道德行动的要求之外,从而使对利润穷追不舍的追求成为判断正确与错误的惟一裁决者。最终,里根革命破坏了保守派竭力维护的价值观和社会体制。为了打消人们依赖政府补助的念头,奖励诚实劳动和商业自发性,里根的政策刺激了一种投机狂

① Bennett, *Party of Fear*, 402; Kathy Evertiz, “The 1986 Statue of Liberty Centennial: ‘Commercialization’ and Reaganism,”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29 (Winter 1995), 214-19; David E. Procter, *Enacting Political Culture: Rhetorical Transformations of Liberty Weekend 1986* (New York, 1991), 14-32, 77-91; *Time*, June 16, July 14, 1986.

② *The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Ronald Reagan 1986*, 896, 916; Mike Wallace, *Mickey Mouse History* (Philadelphia, 1996), 57; Baldwin and Jacob in Procter, *Enacting Political Culture*, 38-45, 61-65.

史,将非保守主义传统的自由内容一笔抹煞,坚持从一开始,美国人就关注如何“从政府,尤其是从压迫性政府的邪恶下,争取自由”,而从未想过“把自由交给政府”。<sup>①</sup>

里根自己则利用百年庆典活动宣布,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正是美国伟大之处的关键所在。在这样做的时候,里根实际上提供了一部新的美国历史叙事,这部历史是一部关于白人的长篇故事——即那些意志坚强、雄心勃勃的人的后代,如何从欧洲来到美洲,寻找“自由和机会”,尤其是寻找“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和他们的家庭的能力”。里根的美国历史观明显地把黑人从“想像的共同体”中抹去了,黑人的祖先被贩奴船运到美洲,他们的劳动在数百年的历史中用于养活并非属于他们自己的家庭。的确,许多美国黑人对“自由周末”抱着一种普遍的怀疑态度。“对我们来说,自由女神塑像不过是一个苦涩和荒唐的象征,”詹姆斯·鲍德温这样写道。有些黑人领袖,如都市同盟的约翰·雅各布敦促黑人参加庆典活动,“我们一定不能将自由和平等的象征拱手让给右派的思想家,”雅各布这样写道。但他的呼吁来得有些太迟了。<sup>②</sup>

里根政府表现出当代保守主义思想核心深处的矛盾。在语言上,里根企图呼应宗教右派提出的问题,他坚决反对堕胎,鼓吹一种“对精神价值观的回归”方式来加强传统家庭和巩固社区团结。他强调说,自由同时带有责任感:“我们拥有自由,但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要成为罪恶的奴隶。”如大多数保守派一样,他将经济领域排除在对个人自私自利行为的谴责和对道德行动的要求之外,从而使对利润穷追不舍的追求成为判断正确与错误的惟一裁决者。最终,里根革命破坏了保守派竭力维护的价值观和社会体制。为了打消人们依赖政府补助的念头,奖励诚实劳动和商业自发性,里根的政策刺激了一种投机狂

① Bennett, *Party of Fear*, 402; Kathy Evertiz, “The 1986 Statue of Liberty Centennial: ‘Commercialization’ and Reaganism,”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29 (Winter 1995), 214-19; David E. Procter, *Enacting Political Culture: Rhetorical Transformations of Liberty Weekend 1986* (New York, 1991), 14-32, 77-91; *Time*, June 16, July 14, 1986.

② *The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Ronald Reagan 1986*, 896, 916; Mike Wallace, *Mickey Mouse History* (Philadelphia, 1996), 57; Baldwin and Jacob in Procter, *Enacting Political Culture*, 38-45, 61-65.

在公共政策方面,里根革命使许多保守派备感失望。尽管他实施大幅度的减税政策,但由于增加军费联邦政府开支也不断增加,从而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财政预算赤字。与此同时,伟大社会计划中的反贫困项目遭到挫折和消减,福利国家的核心内容,如社会保障、老年医疗保健以及医疗补助并未被触动。在他的第二届任期内,里根甚至缓和了他的反共语调,与苏联领导人米哈依·戈尔巴乔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里根和他的继任者乔治·布什控制的总统部门或1994年后由保守派控制的国会,也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更加具有美德的社会,他们也未能成功地劝说妇女放弃从事公共活动的愿望,老实地“去干结婚、抚养孩子的事”,如共和党的国会领袖理查德·阿米十分粗俗地描述的那样。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传统主义者开始考虑保守派是否应该重新审视自由是一个最重要的社会价值的观点。联邦法官罗伯特·伯克敦促美国人对“我们现代的几乎不受限制的对自由的热情”要予以否定。有的保守派甚至情有独钟地远眺新加坡,想以此作为美国的榜样,因为在那里一个蓬勃生长的市场经济与一个权威主义的政体和文化同时并存。这些想法与那种认为市场自由、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是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思想,显然是大相径庭的。<sup>①</sup>

尽管如此,没有人像里根那样成功地改变了政治的语言。在20世纪90年代,几乎没有任何政客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自由派。大众媒体和政治辩论为推崇自由市场的神圣性和斥责“大政府”的邪恶性的保守主义思想所充斥,既为作为民主党人的比尔·克林顿总统全盘接受,同时也为许多共和党人接受。90年代里,各级政府不再充当推动社会和种族进步的角色,反而削减规模,否定了向社会不平等宣战的传统。<sup>②</sup>

<sup>①</sup> Siegel, *Troubled Journey*, 251; Dick Armey, *The Freedom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1995), 306; Robert H. Bork, *Slouching Towards Gomorrah* (New York, 1996), 65; *The New Republic*, April 18, 1994; December 9, 1996.

<sup>②</sup> Hodgson, *World Turned Right Side Up*, 18, 248; Christopher Lasch, "Liberalism in Retreat," in *Liberalism Reconsidered*, ed. Douglas and Claudia Mills (Totowa, 1983), 105-06; Margaret Weir, *Politics and Jobs: The Boundaries of Employment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1992), 3-4.

在其他方面,20世纪90年代同样表现为一个保守主义胜利的年代。这个年代以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力量的崩溃和苏联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终结为其开端。1994年,共和党在保守派势力的带领下,赢得了自50年代以来的对国会的首度全面控制。他们把自己的胜利宣称为是“自由革命”,尽管这种话有时听起来更像是一种推销产品的说法。“不管你鼓吹和提倡什么事业,”此刻升任为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的理查德·阿米提到,“你必须以自由的语言来推出。”除了其他的问题,胜利者们宣称,冷战的结束已经将一个积极干  
325 扰美国人民事务的强大中央政府存在的惟一合法理由消除了。现在,保守派的主要敌人之一已经消失了,他们可以腾出手来,全力以赴去消灭另外一个敌人,这就是联邦政府——尤其是尚存的新政和伟大社会的计划和机构(尽管有的时候保守派令人不可思议地推动增加军费开支)。1996年在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的同意下,国会全面废除了新政建立的“援助无自立能力儿童”的计划,这项计划通常被称为“福利”,而代之以由联邦政府向州提供基金的计划,国会希望那些需要援助的人能够利用阿米所称的“自然的安全网系统——家庭、朋友、教会和慈善机构”。<sup>①</sup>

90年代美国人关于自由的讨论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可能要算是那种旧的和思想和辩论不断地重新出现。表达自由是当代美国社会的一个中心内容,它为此提供了一个范例。1942年,戴维·里斯曼曾警告说,鉴于他们倾向于退缩到诉诸“因袭而来的口号”的习惯上去,当言论自由受到威胁时,美国人并没有“做好面对危机的准备”。这种情形在半个世纪后仍然真实地存在。此间,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文章继续全力关注政府限制表达自由的危险性。言论自由的最有力的捍卫者是“网民”——使用互联网的公民,他们面对1996年的通讯风化法,坚持自由表达意见的绝对权利。这项法律将在网络空间中使用下流不雅的“语言”列为联邦罪之一种。但是,把政府看成是言论自由的主要威胁的传统观点对另外一种现象却束手无策,这就是集权化财富对思想传

---

<sup>①</sup> Arney, *Freedom Revolution*, 49, 67, 229; Newt Gingrich, *To Renew America* (New York, 1995), 102;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7, 1995.

播和民主程序本身所施加的影响。在 90 年代,在法院里出现要求言论自由权的人通常不再是一个遭到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一个有极大权势的大公司,它们竭力反对对竞选资金的公共管制措施,反对政府限制过分集中拥有媒体的措施。在美国自由联盟的支持下,最高法院对大公司的观点表示赞同,即花钱(影响选举)是受第一条宪法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这种情形给未来一代留下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当经济市场的权力越来越紧密地与思想市场的权力联系在一起时,自由本身的涵义将会是什么。<sup>①</sup>

与此同时,关于社会公民权的不断变化的辩论,也反映出过去曾一度受到贬责的思想重获新生。1944 年,理查德·霍夫斯达特在他的经典著作《美国生活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下结论说,这个思想体系(指社会达尔文主义。——译者)“过去曾一度时兴并十分强盛”,现在已经“崩溃了和被遗忘了”,他不可能预见到半个世纪之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方式——326如果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名字的话——将死灰复燃。这种思维方式认为:政府不应试图干预和影响经济运作的“自然”方式;财富的分配反映的是个人的能力,而不是历史环境的局限;那些较为不幸的人,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阶层或一个种族,他们之所以不幸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失败。如同在 19 世纪末期,社会对穷人遭受的不幸所表现出来的冷漠,被当成是一种现实的迹象,而并非是一种麻木不仁和冷酷无情。

在社会和经济条件是怎样影响了自由的运用这个古老的问题上,两大政党的领导人除了说让市场自行其是之外,别无他论。早在 19 世纪 90 年代期间,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有一种预感,即“现代工业生活中的金融、商业和占有性权力集团是以国际化方式组织起来的”。一个世纪后,这种预感实在是再真实不过了。然而经济国际化对自由本身包含和继承的思想的涵义还有

---

① David Riesman, "Civil Liberties in a Period of Transition," in *Public Policy*, ed. C.J. Freidrich and Edward S. Mason (Cambridge, MA, 1942), 33, 73-76; John Katz, "The Netizen: Birth of a Digital Nation," *Wired* (April 1997), 49-50, 184-91; Peritz, *Competition Policy*, 249-50, 292; Mark A. Graber, *Transforming Free Speech: The Ambiguous Legacy of Civil Libertarianism* (Berkeley, 1991), 13, 168, 207-22.

待进一步全面的考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保守派的著作中,经济集权的问题从来没有被提及过;此外,当基本的经济决定是由商业界领袖、投资者和货币交易者在除了对他们自己负责而无需对其他任何人拥有甚至假装的责任感的情况下作出的时候,经济集权对民主的影响是什么,保守派的著作也未加讨论。在保守派眼中,对自由的威胁仍然继续来自具有干涉性的政府权力。<sup>①</sup>

尽管市场原教旨主义凯歌高奏,但有关经济安全的旧观念并没有完全消失,显然,这些思想不再以一种自由的语言来表现。民意测验继续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支持政府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的行动,国会对联邦“津贴”计划的全面攻击引起了许多选民的极度反感,这种情形极大地帮助了克林顿在 1996 年赢得连任。在 20 世纪末期,美国人在私人生活领域中享有比从前更多的自主权,但在经济领域中,享有的前几代人所称的“工业自由”却越来越少,这不能不算是一种对时代的讽刺。从 90 年代早期的衰退中经济复苏一直连续不停,但这种复苏没有完全消除普遍存在的经济不安全感——这是由于没有浮动的工资、贫富悬殊的继续扩大以及半时制就业人数的增加而产生的后果。经济产业国际化的继续发展将工人当成生产中的一种可以不经预告而随意撤出或遣散的因素,这种情形使得个人(甚至国家)主权变得毫无意义。<sup>②</sup>

即便当美国消费文化在全世界取得了胜利,对于未来的怀疑也是与日俱增。1996 年,《商业周刊》报道说,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机会平等、个人自由和社会上升性”逐渐变得模糊不清,遥不可及。保守派的作者坚持说,市场  
327 经济不是对经济不满的根源。罪魁祸首乃是一整套不现实的期望和一种被夸大了的权利感,而这两者都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繁荣的刺激形成的,

① 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Philadelphia, 1944), 68-71; George McKenna, ed., *American Populism* (New York, 1974), 128-29; Richard J. Bernet and John Cavanaugh, *Global Dreams: Imperial Corporation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1994); Gingrich, *To Renew America*; Lamar Alexander and Chester E. Finn, eds., *The New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 (Indianapolis, 1995).

② Seymour M.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1996), 75;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118; James L. Hutson, *To Secure the Fruits of Labor: The American Concept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1765-1900* (Baton Rouge, 1998), ch. 12.

待进一步全面的考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保守派的著作中,经济集权的问题从来没有被提及过;此外,当基本的经济决定是由商业界领袖、投资者和货币交易者在除了对他们自己负责而无需对其他任何人拥有甚至假装的责任感的情况下作出的时候,经济集权对民主的影响是什么,保守派的著作也未加讨论。在保守派眼中,对自由的威胁仍然继续来自具有干涉性的政府权力。<sup>①</sup>

尽管市场原教旨主义凯歌高奏,但有关经济安全的旧观念并没有完全消失,显然,这些思想不再以一种自由的语言来表现。民意测验继续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支持政府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的行动,国会对联邦“津贴”计划的全面攻击引起了许多选民的极度反感,这种情形极大地帮助了克林顿在 1996 年赢得连任。在 20 世纪末期,美国人在私人生活领域中享有比从前更多的自主权,但在经济领域中,享有的前几代人所称的“工业自由”却越来越少,这不能不算是一种对时代的讽刺。从 90 年代早期的衰退中经济复苏一直连续不停,但这种复苏没有完全消除普遍存在的经济不安全感——这是由于没有浮动的工资、贫富悬殊的继续扩大以及半时制就业人数的增加而产生的后果。经济产业国际化的继续发展将工人当成生产中的一种可以不经预告而随意撤出或遣散的因素,这种情形使得个人(甚至国家)主权变得毫无意义。<sup>②</sup>

即便当美国消费文化在全世界取得了胜利,对于未来的怀疑也是与日俱增。1996 年,《商业周刊》报道说,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机会平等、个人自由和社会上升性”逐渐变得模糊不清,遥不可及。保守派的作者坚持说,市场  
327 经济不是对经济不满的根源。罪魁祸首乃是一整套不现实的期望和一种被夸大了的权利感,而这两者都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繁荣的刺激形成的,

① 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Philadelphia, 1944), 68-71; George McKenna, ed., *American Populism* (New York, 1974), 128-29; Richard J. Bernet and John Cavanaugh, *Global Dreams: Imperial Corporation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1994); Gingrich, *To Renew America*; Lamar Alexander and Chester E. Finn, eds., *The New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 (Indianapolis, 1995).

② Seymour M.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1996), 75;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118; James L. Hutson, *To Secure the Fruits of Labor: The American Concept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1765-1900* (Baton Rouge, 1998), ch. 12.

刻却成了美国社会享受不起的一种奢侈。<sup>①</sup>

在某种意义上,保守派在语言上不断地将联邦政府描绘成为一种怪异的、危险的事物,而不是将其看成是一种民意的表现,这反映出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一种格外强大的内在素质,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但它对大众的更新的328吸引力却是指向广泛地脱离政治的方向。1985年,也就是里根革命的巅峰之际,《心灵的习性》得以出版,这是一部由罗伯特·贝拉领衔的一群社会学家写作的探讨美国价值观的畅销书。这本书的作者为个人主义在美国“像癌症一般地生长蔓延”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团结的衰落悲叹不已。这本书将责任归咎于美国人对自由的理解。作者们写道,这个“最具共鸣性的、深为人们珍惜的美国价值”现在不过意味着“不受他人的干扰”和不被强制性地要求去支持“其他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种自由的定义使人几乎不可能以一种对良好生活的共同期望去思考,什么样的社会或政治结构对于一个良好的社会是必不可少的。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继续推崇个人利益高于公共利益的价值观,一种共同的公民文化也在继续不停地衰落。不知什么原因,冷战的结束不但没有带来一种对民主体制的极度兴奋,反而产生了一种对这种体制的信任危机。公众对政治体制和政治领袖人物的失望与冷漠无处不在。参加投票选举的人数始终低于其他民主制国家。随着各级政府竞相将它们的活动“私有化”,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纷纷选择住进那种以相同社会背景为界的封闭社区,建立一种共同的公共文化的理想看上去已经消逝了。<sup>②</sup>

在保守主义极端派一端,始终弥漫着这样一种思想,即自由只能通过反对联邦政府才能得以保护。这种思想导致了一大批组织的诞生——包括自封的爱国者、武装民兵以及自由斗士——这些人将自己武装起来,与具有压迫性的政府当局对垒。对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来说,拥有枪支变成了拥有自由的最基

① *Business Week*, March 11, 1996; Robert J. Samuelson, *The Good Life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American Dream in the Age of Entitlement 1945-1995* (New York, 1995).

② Robert H. Wiebe, *Self-Rule: A Cultural History of American Democracy* (Chicago, 1995), 3-5, 243; Robert N. Bellah, et al.,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Berkeley, 1985), vi-vii, 23-25;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203.



本象征。“我们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我们热爱自由,”1995年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反对国会立法禁止半自动杀伤性武器的集会上,一位参加者这样表白道。全国持枪公民协会宣称,携带武器的权利是“第一自由”,其他自由均需依此而成立。许多武装民兵组织也都采用美国革命的标志和语言,给他们自己套上“召之即来的民兵”的形象,以增强吸引力,并从托马斯·杰斐逊、帕特里克·亨利和其他独立战争领袖人物的著作中精心挑选一些对暴政性中央政府权威的危险的警告,包括“不要欺负我”这样的口号。尽管这些组织已经存在了一些年,但是在1995年当一位满怀怨恨的爱国者,以自由为名,在俄克拉荷马市的一幢联邦政府大楼引爆了一枚炸弹、炸死168人后,武装民兵的问题才突然间成为了全国媒体关注的话题。<sup>①</sup>

1996年,一群自称为“自由人”的人在蒙大拿州与联邦官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对抗战。这群“自由人”呼吁美国人民拒绝纳税,并销毁他们的“社会保障卡”。如同其他许多自封的爱国者一样,譬如雅利安民族组织等,这些“自由人”也力图重新启用一种以种族为界的崇美主义的定义。“自由人”宣称道,公民由两个种类组成:“我们人民”或白人和其他种族的人,前者是由原始宪法和 329 “上帝法”赋予选举权的,而后者则是由“人造法”(即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赋予选举权的,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美国人。“自由人”警告说,“自由的”白人丧失了对政府的控制,现在成为了“外国人和异己分子”统治的对象。

尽管他们看上去怪诞不经,但“自由人”这类群体的存在显示出,在崇美主义的公民和文化定义之间存在着一种持续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表面上已经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和民权运动所化解,但却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抬头。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经济的发展不光带来了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的感觉,而且也导致了被阿根廷政治哲学家欧内斯托·拉克罗所称的“排他主义的

---

① Christine Stock, *Rural Radicals: Righteous Rage in the American Grain* (Ithaca, 1996), 148; Chip Berlet, *Eyes Right!* (Boston, 1995); James R. Kennedy and Walter D. Kennedy, *Why Not Freedom! America's Revolt Against Big Government* (Gretna, 1995); *Philadelphia Inquirer*, June 5, 1995; *New York Times*, April 20, 23, May 15, 1995, September 11, 1997.

反叛”——即重新强调种族和族裔的认同感以及坚持要求争取群体的认同和群体的权利。这种对区域和族群忠诚的重新强调,也许反映了因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由资本的流动、消费文化和瞬时性通讯所联结起来的世界上,民族国家的权力日渐衰落的事实。在美国,随着亚裔和拉丁裔人口的急速增长,种族多元化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但这种发展不但没有导致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欢呼,反而引起了一种感觉上对文化碎化的警惕。关于移民政策的公众讨论迅速扩大到对其他问题的充满恶意的辩论,这些问题包括双语教育、“多元文化式”的课程设置、将英语作为美国“官方语言”的提议,以及限制申请政治避难的方法等等。1996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甚至提议废除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所创立的出生地公民资格的原则。这些辩论开始了新一轮的重新界定美国民族性的斗争。<sup>①</sup>

在民权运动之后,从长期遭受其实的少数群体——种族的、文化上的和性别上的——中爆发出来一种对群体差异的赞赏和对群体认同的要求。在20世纪90年代,保守派——同时也包括许多自由派人士——将“认同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斥为对建立一种共同的美国认同感具有破坏性的作用,并指责它们提倡了一种人为的思想;即种族和“文化”背景决定了一个人的终极命运。但与此同时,保守派的另一分支却发展出他们自己的“认同政治”,这种“认同政治”的基础是一种陈旧的推断,即世界是划分成了永久不变的种族群体,每个群体在从高级到低级的序列上有自己特定的位置。由查尔斯·默里和理查德·赫恩斯坦在1994年发表的畅销书《钟曲线》得到保守派基金会的赞助,为保守派杂志大加赞赏。这本书力图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表现非白人人种在智力思辨能力上的天生低下。皮特·布赖姆洛,一位出生在美国的归化美国公民,在《外国人的国家》(1995年)中声称,非白人移民对于美国历史文化330 化的认同传统造成了一种威胁。布赖姆洛否定了关于美国国民性中的公民性

① *New York Times*, April 12, August 13, 1996; Ernesto Laclau, *Emancipation(s)* (New York, 1996), viii;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 (New York, 1994), 428; 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New York, 1992).

定义,坚持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是“一个族裔—文化的共同体”,并认为任何成功的文化必定拥有—种“通过血缘关系而产生的联结体”。这些书对于那些有历史知识的读者来说,也许会引起一种似曾相识或似曾经历过的感觉。默里和赫恩斯坦在检测智商系数时运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优生学家用于衡量判断不同群体天生智能程度的方法。布赖姆洛则呼应 20 世纪初的理论家们的忧虑,那些人曾使用了不同的婴儿出生率来“证明”真正的美国人——即白人——处在一种被次等种族吞没的危险之中的事实。布赖姆洛甚至怪罪新来的移民把南加州“密密麻麻地铺了一层”,尽管事实上,许久以前,精力充沛的白人公民早就如此做过了一遍。<sup>①</sup>

布赖姆洛的议论分化了保守派的基本群众,有的保守派否定了布赖姆洛那种毫不掩饰的种族主义态度,坚持认为移民对美国经济增长和维护“家庭价值观”做出过贡献。保守派内部的分歧反映了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分歧,即自由是否还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在冷战结束所迸发出来的兴奋之中,弗朗西斯·福山曾宣称“历史的终结”以及自由主义民主体制在所有国家、文化和人民中的全球性胜利——即长期以来所期待的美国价值观的全球化。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许多保守派看起来却表现出更为悲观和更为狭隘的情绪。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1996 年)描绘了一幅冷战后的世界的图景。在这幅图景中,那些根植于种族和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文明将相互角逐,争夺霸权。对于亨廷顿来说,自由是一种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种族环境下的权利,不是一种普遍性的权利——尽管他没有明确地说出来,但他的这种观点不禁使人想起 18 世纪的“英国人的自由”传统和 19 世纪以种族为基准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他否定了西方文化与世界其他各地区的“相关性”,这是对传统的普适性自由观明确的背离,后一种思想起源于美国革命时期,并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被极为有力的强化了。<sup>②</sup>

① Charles Murray and Richard Herrnstein, *The Bell Curve* (New York, 1994); Peter Brimclow, *Alien Nation: Common Sense About America's Immigration Disaster* (New York, 1995), xvii, 10-15, 46, 188, 203-22.

②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1992); Sam-

定义,坚持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是“一个族裔—文化的共同体”,并认为任何成功的文化必定拥有—种“通过血缘关系而产生的联结体”。这些书对于那些有历史知识的读者来说,也许会引起一种似曾相识或似曾经历过的感觉。默里和赫恩斯坦在检测智商系数时运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优生学家用于衡量判断不同群体天生智能程度的方法。布赖姆洛则呼应 20 世纪初的理论家们的忧虑,那些人曾使用了不同的婴儿出生率来“证明”真正的美国人——即白人——处在一种被次等种族吞没的危险之中的事实。布赖姆洛甚至怪罪新来的移民把南加州“密密麻麻地铺了一层”,尽管事实上,许久以前,精力充沛的白人公民早就如此做过了一遍。<sup>①</sup>

布赖姆洛的议论分化了保守派的基本群众,有的保守派否定了布赖姆洛那种毫不掩饰的种族主义态度,坚持认为移民对美国经济增长和维护“家庭价值观”做出过贡献。保守派内部的分歧反映了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分歧,即自由是否还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在冷战结束所迸发出来的兴奋之中,弗朗西斯·福山曾宣称“历史的终结”以及自由主义民主体制在所有国家、文化和人民中的全球性胜利——即长期以来所期待的美国价值观的全球化。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许多保守派看起来却表现出更为悲观和更为狭隘的情绪。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1996 年)描绘了一幅冷战后的世界的图景。在这幅图景中,那些根植于种族和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文明将相互角逐,争夺霸权。对于亨廷顿来说,自由是一种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种族环境下的权利,不是一种普遍性的权利——尽管他没有明确地说出来,但他的这种观点不禁使人想起 18 世纪的“英国人的自由”传统和 19 世纪以种族为基准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他否定了西方文化与世界其他各地区的“相关性”,这是对传统的普适性自由观明确的背离,后一种思想起源于美国革命时期,并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被极为有力的强化了。<sup>②</sup>

① Charles Murray and Richard Herrnstein, *The Bell Curve* (New York, 1994); Peter Brimclow, *Alien Nation: Common Sense About America's Immigration Disaster* (New York, 1995), xvii, 10-15, 46, 188, 203-22.

②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1992); Sam-

随着 20 世纪即将结束,自由继续是一种争论的起因,同时也继续是个人和社会自我界定的一个关键要素。一份民意测验问道:“你作为美国人最感到骄傲的是什么?”69%的人回答说:“自由。”<sup>①</sup>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对互联网上与自由有关的网址的研究显示,自由这个词已经如此全面和完整地自由的市场和与对政府的敌视态度紧密地结合起来了。除了一些公司利用自由为名来推销产品(如自由软件公司)外,大量的与自由有关的网址都是出自于那些反政府的自由至上主义者、推崇私有财产神圣性和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组织、武装爱国者和民兵组织。公民自由组织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们的网址提供关于第一条宪法修正案、宗教自由、和通讯风化法的信息。<sup>②</sup>这种对自由的新理解的基础是进入消费市场的要求和对一系列事物的否定——包括对政府、对社会公民权、对有关个人自我界定的限制以及对一种共同的公共文化的否定。至于这样的自由定义能否提供一种了解 21 世纪世界的有效语言,还有待于观察。

美国人有时相信,他们享有所有自由中的最大自由——没有历史包袱的自由。但是没有任何民族可以完全逃脱他们的过去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的约束。如果说,历史真的教给了人们什么启示的话,这个启示应该是,自由的定义和有权享有自由的共同体的定义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或终极意义上的。我们也许没有掌握托马斯·潘恩在 1776 年所宣称的那种“将世界重新创造一遍”的权力。<sup>③</sup>但是,我们能够决定自由对我们自己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没有人可以预测到目前对自由的这种理解的最终命运将是什么,没有人可以预测到现在仍然处于阴影地带的其他的自由定义——如经济保障的自由、对民主政治管理进行积极参与的自由、为那些长期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和群体争取正义的自由等——是否会被重新发现并被融入进来。面对新世纪的挑战,我们

---

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1996), 20-31, 310.

① Wunthrow, *Restructuring of American Religion*, 260.

② 这些结果是 1997 年 9 月通过在互联网上搜索“自由”(freedom)一词获得的,所用程序为 Excite 和 Alta Vista.

③ Eric Foner, *Tom Paine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 (New York, 1976), 78.

所能期望的只能是，在未来，我们生命本质中的那些更为优秀的天使们（借用林肯的话来说）能够在永远不会结束的美国自由的故事中重新占据它们应有的地位。

## 致 谢

395

一切史学研究,无论多么具有原创性,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史学家之间合作努力的结果。《美国自由的故事》主要取材于现有的研究成果,因此更是这样一种合作的结果。我在书中使用了一大批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对于他们,我致以最深切的谢意。我的注释不光只是为读者标示有关见解和材料的来源或引语的出处,而同时也是对一大批学术研究成果表示的崇高敬意。这些研究在过去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美国历史的了解。

我对乔依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艾伦·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乔舒亚·弗里曼(Joshua Freeman)和阿瑟·王(Arthur Wang)等深为感激,他们通读了本书的全稿,提出了极宝贵的评论和建议。我也感谢那些阅读了本书部分章节的同仁,他们是耶鲁大学法学理论讨论班、哥伦比亚大学20世纪政治研讨班和安德斯·斯蒂芬森(Anders Stephenson)教授开设的一年级研究生阅读课的成员。在过去几年里,我与福里德·西格尔(Fred Siegel)多次讨论了自由的问题,从中受益匪浅。其他的朋友和同事为我提供了有关的思想、信息或忠告,他们是:尼尔·比森(Neil Besen)、艾拉·柏林(Ira Berlin)、贝齐·布莱克默(Betsy Blackmar)、南西·考特(Nancy Cott)、艾伦·C. 杜波依斯(Ellen C. DuBois)、威利·福巴斯(Willie Forbath)、艾拉·卡茨内尔森(Ira Katznelson)、威尔伯·米勒(Wilbur Miller)、莱斯利·S. 罗兰(Leslie S. Rowland)、詹姆斯·P. 申顿(James P. Shenton)和埃米·斯坦利(Amy Stanley)。我的父亲杰克·方纳(Jack Foner)为我提供了他惯有的充满睿智的忠告。乔舒亚·布朗(Joshua Brown)和奥利维亚·马奥尼(Olivia Mahoney)为本书的插图工作提供了慷慨的帮助。

396 在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有幸在哥伦比亚大学指导了一批才华横溢的研究生。他们中有些人的博士论文和著作在我的注释中得以引用,其他人则与我分享了他们的思想和各自研究中的相关材料。在我对自由问题的思考的形成过程中,他们所有人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我很高兴能够在此逐一向他们致谢:贝思·贝茨(Beth Bates)、斯文·贝克尔特(Sven Beckert)、马莎·比昂迪(Martha Biondi)、南西·柯恩(Nancy Cohen)、彼得·菲尔德(Peter Field)、玛格丽特·加布(Margaret Garb)(她在担任我的研究助手时,做出了极为出色的工作)、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塞拉·亨利(Sarah Henry)、马克·西格比(Mark Higbee)、安妮·柯恩豪泽(Anne Kornhauser)(她也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作了评论)、梅林达·劳森(Melinda Lawson)、莉萨·麦吉尔(Lisa McGirr)、丽贝卡·麦克伦南(Rebecca McLennan)、普雷米拉·纳德森(Premilla Nadesen)、梅·赖(Mae Ngai)、贝基·尼古莱德斯(Becky Nicolaides)、阿黛尔·奥尔特曼(Adele Oltman)、约翰·雷丘依特(John Recchuiti)、马尼沙·辛哈(Manisha Sinha)、戴维·斯蒂本(David Stebenne)、迈克尔·休格鲁(Michael Sjugrue)、米多雷·高山(Midori Takagi)、拉雷·瓦普奈克(Lara Vapnek)、塞洛斯·维斯尔(Cryus Veese)、彭尼·冯·埃辛(Penny von Eschen)、王希(Wang Xi)和迈克尔·扎基姆(Michael Zakim)。哥伦比亚大学的另外两名研究生,查尔斯·福塞(Charles Forcey)和埃伦·斯特劳德(Ellen Stroud)把我带入了网上的研究世界,使我有机会同时领略了其中令人神往的奇迹和意想不到的暗井。

在此我也向协助我研究工作的图书馆员们致谢。首先要感谢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尤其是咨询部、馆藏部、馆际借阅部和电子文献服务处的工作人员。1993—1994年当我以哈姆斯沃斯美国史讲座教授(Harmsworth Professor of American History)的身份在牛津大学讲学时,曾得到罗兹中心(Rhodes House)图书馆员的大力协助。我同时感谢一批档案馆员,尤其是美国古代文献研究学社(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的乔治亚·巴恩希尔(Georgia B. Barnhill)和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的马加·基奇(Maja Keech),他们帮助我搜索和落实了本书所用的插图。



我在诺顿书屋(W. W. Norton)的责任编辑斯蒂夫·福曼(Steve Forman)在本书写作出版的每个阶段都给予我极大的鼓励,并提出了极有见地的建议。安·阿德尔曼(Ann Adelman)为本书做了十分出色的文字编辑工作。我同时向桑德拉·迪克斯德拉(Sandra Dijkstra)致谢,她是一位最富才华的文学经纪人。国家人文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Humanities)向我提供的资深学者基金承担了我写作本书那一年的主要费用,为此我深表谢意。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授研究项目也帮助了解决了一部分研究费用。

我再次向我的妻子琳恩·加拉福拉(Lynn Garafola)致以衷心的感谢,她给予我一种非同寻常的同志般情谊,她本人也树立了一个杰出的知识分子、作者和编辑的榜样。这本书是献给我的女儿达莉娅(Daria)的。对她来说,与这个写作项目相伴,的确是一次分量不轻的考验,但她对我的亲情、宽厚的性格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并未因此得到丝毫的削弱。

# 索引

(索引后的页码为边码,斜体页码为插图边码)

- abolitionism 废奴主义, 32, 33-34, 70, 80, 82, 84-94, 164, 288  
in Civil War 内战时期的, 95, 100-101  
suppression of discussion of 对(废奴主义)讨论的镇压, 85-86
- abortion rights 堕胎权, 299, 303, 304, 317, 318-19, 323
- Abrams, Jacob 雅各布·阿布拉姆斯, 184
- Acheson, Dean 迪安·艾奇逊, 259
- ACLU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183, 241, 256, 325
- Adamic, Louis 路易斯·阿达米克, 212
- Adams, Abigail 阿比盖尔·亚当斯, 16-17
- Adams, John 约翰·亚当斯, 16-17, 20, 22, 41, 43, 44, 301
- Adams, John Quincy 约翰·昆西·亚当斯, 53
- Adams, Samuel 塞缪尔·亚当斯, 22
- Addams Jane 珍妮·亚当斯, 144, 156, 186, 187, 319  
on World War I 论第一次世界大战, 169
- Adler, Mortimer 莫蒂默·阿德勒, 260-61
- Adorno, Theodor 西奥多·阿多诺, xvi
- Advertising 广告制作业, 181, 219-21, 225, 227-29, 230, 231-32, 249, 263
- Advertising Council 广告业委员会, 263
- AEA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美国经济学会, 130
- affirmative action 鼓励性措施(又译平权措施), 282-83, 304
- Affluent Society, The* (Galbraith) 《丰裕社会》(加尔布雷斯著), 270
- Afghanistan 阿富汗, 321
- AFL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美国劳联, 135-36, 143, 144-45, 175, 178, 199, 200, 213, 244
- African-Americans 非裔美国人(即美国黑人),  
barred from West 被禁止进入西部, 76  
Civil War military service of 在内战时期的军事服务, 97  
colonization proposed for (将黑人)殖民海外的计划的提出, 97  
definition of freedom among (黑人内部)关于自由的定义, 277-78  
emigration of 移民海外, 89  
employment of 就业, 126, 174, 186, 242-44, 282  
inferiority ascribed to 强加于(黑人)低贱地位, 40-41, 71, 74, 188  
Jefferson on 杰斐逊论, 40  
Jews' alliance with 犹太人与(黑人)的联盟,

- 244
- labor movement and 劳工运动与, 142, 174, 214-15
- in Louisiana Purchase 在路易斯安那购买中, 78
- New Deal's exclusion of 新政对(黑人)的排斥, 206-9
- northward migration of (黑人)移民北部的运动, 173-74, 267
- Progressives and 进步运动者与, 185
- Reagan and 里根与, 322
- after Reconstruction 在重建之后, 112
- in Reconstruction 在重建之中, 102-9
- scholarly studies of 对(黑人的)学术研究, 213
- self-help for (黑人的)自助, 135
- "sex slavery" metaphor rejected by (黑人)对“性别奴隶制”比喻的否定, 83-84
- Theodore Roosevelt on 西奥多·罗斯福论, 186
- unions and 工会与, 142
- in Vietnam War 在越战中, 291
- in World War I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172-73
- in World War II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173, 240-47
- see also civil rights movement; segregation; slavery; slaves 同见民权运动; 种族隔离; 奴隶制; 奴隶
- African-American voting rights 非裔美国人(即黑人)投票权, 39, 71, 74-75, 79, 92, 97, 102, 103, 105, 154, 208, 243
- in civil rights movement 在民权运动中, 274, 278, 280
- disenfranchisement and 剥夺(黑人)选举权(运动)与, 131-32, 136-37, 154, 172, 185, 186, 208, 314
- Agitator, The* 《鼓动者》, 109
- Agnew, Samuel 塞缪尔·阿格纽, 103
-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 农业调整局, 208
- agricultural workers 农业工人, 206, 207, 257
- Aid to Dependent Children 对无助儿童的援助, 201, 205, 325
- Aldrich, Winthrop W. 温斯洛普·W. 奥尔德里奇, 249
- Alger, John B. 约翰·B. 阿尔杰, 64
- Alien and Sedition Acts (1798) 惩治外治乱法(1798年), 43, 177, 301
- Alien Nation* (Brimelow) 《外国人的国家》(布赖姆洛著), 329-330
- alimony (离婚后一方付给另一方的) 赡养费, 303
- Allen, John 约翰·艾伦, 33
- Allen, Joseph 约瑟夫·艾伦, 12
- AMA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美国医学学会, 257
- Amalgamated Association 联合工会, 176
- American Railway Union 美国铁路工会, 126
- American Anti-Slavery Society 美国废奴协会, 83, 90
- American Century, The* (Luce) 《美国世纪》(鲁斯著), 232
-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 183, 241, 256, 325

- American Committee for Cultural Freedom 全美争取文化自由委员会, 256
- American Dictionary* (Webster) 《美国词典》(韦伯斯特编), 60
- American Dilemma, The* (Myrdal) 《美国的困境》(缪尔达尔著), 246
- American Document* 《美国文献》, 213, 238-39
-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EA) 美国经济学会, 130
-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 美国劳工联合会, 135-36, 144-45, 175, 178, 199, 200, 213, 244
- American Heritage Foundation 美国传统基金会, 249, 250
- American Indian Movement 美洲印第安人运动, 304
- Americanization 美国化(运动), 162, 187-91, 211
-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全美犹太人委员会, 214, 241
- American Jewish Congress 美国犹太人协会, 244
- American Liberty League 美国自由联盟, 204-5
-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 美国医学学会, 257
- American National Exhibition (1959) 美国全国展览会(1959年), 271, 272
- "(American) People's Century, The" (Macdonald) 《(美国)人民的世纪》(麦克唐纳著), 233
- American Plan 美国计划, 179
- American Progress* (Gast) 《美国的进步》(加斯特绘), 51
-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国革命, 3-28, 47, 97, 328
- 与重建的比较, 107
- 与奴隶制, 10, 11, 31, 33-34, 36-37, 89-90
- American standard of living 美国生活标准, 144, 146-47, 199, 233, 327
- American System 美国体制, 54
- American way of life 美国式的生活方式, 148, 196, 212, 231-32, 263
- American Women's Club 美国妇女俱乐部, 204
- anarchism 无政府主义, 165, 177, 178, 188
- Anderson, Benedict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xx
- Andrews, Sidney 悉尼·安德鲁斯, 103
- Anglicans (英国) 圣公会教徒, 26
- Anglo-Saxon "race" 盎格鲁-撒克逊“种族”, 77, 88, 131, 134, 186, 187, 188, 190, 330
- Angola 安哥拉, 321
- Anthony, Susan B. 苏珊·B. 安东尼, 80, 84, 108-9
- anthropology 人类学, 239
- Anti-Federalists 反联邦主义者, 24-25
- Anti-Imperialist League 反帝国主义联盟, 134
- Anti-Semitism 反犹主义, 190, 244, 268
- apartheid (南非) 种族隔离制度, 254, 292, 268
- Appeal in Favor of That Class of Americans Called Africans, An* (Child) 《为被称为非洲人的美国群体而呼吁》(蔡尔德著), 86
- Appleton, Nathan 内森·阿普尔顿, 29
- apprentices 学徒工, 10, 19
-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5
- Arkansas 阿肯色, 55, 56
- Armey, Richard 理查德·阿米, 324, 325
- Arnold Benedict 阿诺德·本尼迪克特, 23

- Arnold, Isaac N. 艾萨克·N. 阿诺德, 100
- arts 艺术, 166, 194, 260  
    在新政时期, 212
- Aryan Nation 雅利安民族, 328-29
- Asian-Americans 亚裔美国人, 108, 137, 329  
    voting rights for 的投票权, 79
- Asian immigrants 亚洲移民, 39, 240
- assembly, freedom of 集会自由, 164
- assimilation 同化:  
    of Indians 印第安人的, 78  
    patriotic 爱国主义式的, 236-41
- association, freedom of 结社自由, 267, 301, 314
- Atkinson, Edward 埃德华·阿特金森, 118
- Atlanta Cotton Exposition (1895) 亚特兰大棉花  
    州展览会 (1895 年), 135, 136
- Atlantic Monthly* 《大西洋月刊》, 151
-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原子能委员会, 254,  
    261
- Austro-Hungarian Empire 奥匈帝国, 131
- automobiles 汽车, 263
- baby boom generation 婴儿潮一代, 288
- Bachelor girls Social Club 单身女郎俱乐部, 146
- Baker, Ella 埃拉·贝克, 278-79
- Balanchine, George 乔治·巴兰钦, 260
- Baldwin, James 詹姆斯·鲍德温, 276, 288, 322
- Baldwin, Roger 罗杰·鲍德温, 183
- "Ballads for Americans" "美国民谣", 213-14
- Ballin, Hugo 雨果·巴林, 225
- Bancroft, George 乔治·班克罗夫特, 77
- bankruptcy laws 破产法, 77
- Baptists 浸礼会教徒, 26
- "Barbie's Liberty" (Haacke) "芭比的自由"(哈克  
    作), 327
- Barkley, Alben W. 阿尔本·W. 巴克利, 243
- Barry, Joseph 约瑟夫·巴里, 271
- Bataan* 《巴滩战役》, 239
- Beale, Howard K. 霍华德·K. 贝尔, 255
- bear arms, right to 携带枪支的权利, 328
- Beard, Charles 查尔斯·比尔德, 192
- Becker, Carl 卡尔·贝克尔, xiv, 170
- Beecher, Henry Ward 亨利·沃德·比彻, 110
- Belfrage, Sally 莎莉·贝尔弗雷奇, 276
- Bellah, Robert 罗伯特·贝拉, 328
- Bellamy, Edward 埃德华·贝拉米, 128, 129,  
    145
- Bell Curve, The* (Murray and Herrnstein) 《钟曲  
    线》(默里和赫恩斯坦著), 329-330
- Benedict, Ruth 罗恩·本尼迪克特, 190, 239
- Benet, Stephen Vincent 斯蒂芬·文森特·贝尼  
    特, 227
- Benhabib, Seyla 塞拉·本哈比, 85
- Bennett, Robert Russell 罗伯特·罗素·贝内特,  
    225
- Benny, Jack 杰克·本尼, 316
- Berlin, Isaiah 艾赛亚·柏林, xiv, xviii, 261,  
    277
- Berlin blockade 柏林封锁, 253
- Bernays, Edward 埃德华·伯奈斯, 170, 181
- Bethune, Mary McLeod 玛丽·麦克劳德·贝休  
    恩, 208
- Beveridge, Albert 阿尔伯特·贝弗利奇, 134
- bicentennial, U. S. 美国诞生两百周年纪念日,

- 316
- Bilbo, Theodore 西奥多·比尔博, 209
- bilingual education 双语教育, 329
- Bill of Rights, U.S. (美国宪法) 权利法案, xvii, 24-26, 36, 107, 228, 301
- abolitionists's use of 废奴主义者(对其)的运用, 86
- incorporation of 被纳入, 163-64, 184, 301-2
- limited early role of 早期功能的有限性, 163-64
- in McCarthy era 在麦卡锡时代, 256
- 150th anniversary of 150 周年纪念日, 217
- "Bill of Rights for the Disadvantaged," "弱势群体权利法案", 282
- Birmingham, Ala. (阿拉巴马州) 伯明翰市, 280, 282
- birth control 节制生育, 109, 110, 111, 166, 167-68
- birth control pills 避孕药丸, 294, 301-3
- Birth of a Nation* 《一个民族的诞生》, 173
- Bisno, Abraham 亚伯拉罕·比斯诺, 146
- Black, Hugo 雨果·布莱克, 241, 256
- Black Codes 黑人法典, 104
- Black Power 黑人权力(黑权), 284, 291, 314
- Blackstone, Sir William 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 9
- Blackwell, Henry 亨利·布莱克威尔, 82
- Blanchard, Jonathan 乔纳森·布兰查德, 57
- Blatch, Harriot Stanton 哈里奥特·斯坦顿·布拉奇, 145, 180
- Bloch, Marc 马克·布洛克, xiv-xv
- Block, Herbert 赫伯特·布洛克, 248
- Bloom, Allan 艾伦·布卢姆, xiv
- B'nai B'rith 契约之子教派, 191
- Boaz, Franz 弗朗兹·博阿兹, 190, 239
- bohemia 波希米亚, 166-67, 288
- Bork, Robert 罗伯特·伯克, 124
- Boston, Mass. 波士顿(马萨诸塞州), 59
- Boston Gazette* 《波士顿公报》, 14
- Boucher, Jonathan 乔纳森·鲍彻, 5
- Bourne, Randolph 伦道夫·伯恩尼, 153, 168, 176-77, 190, 213
- Boy scouts of America 美国童子军团, 228
- Bracero program 布拉塞罗方案
- Braden, Anne 安妮·布雷登, 277
- Bradwell, Myra 迈拉·布拉德韦尔, 112
- Brandeis, Louis D. 路易斯·D. 布兰代斯, xx, 142, 157-58, 159, 160, 184, 185, 190, 233, 302
- Brand Names Foundation 商标基金会, 263
- Brimelow, Peter 皮特·布赖姆洛, 329-30
- Brinkley, Alan 艾伦·布林克利, 233
- Brook Farm community 布鲁克农庄社区, 62
- Brotherhood of Sleeping Car Porters 卧车搬运工人工会, 198, 215, 244
- Browder, Earl 厄尔·白劳德, 212
- Brown, Helen Gurley 海伦·格利·布朗, 294
- Brown, Olympia 奥林皮亚·布朗, 108
- Brownson, Orestes A. 奥雷斯蒂斯·A. 布朗森, 60, 62
-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 258, 314
- Bryce, James 詹姆斯·布莱斯, xiii
- Buchanan, James 詹姆斯·布坎南, 101

- Buck, Pearl 赛珍珠, 237
- Buckley, William F. 威廉·F. 巴克利, 310, 314-15
- Bulosan, Carlos 卡洛斯·巴洛桑, 227
- Bunch, Charlotte 夏洛特·邦奇, 299
- Bunche, Ralph 拉尔夫·邦奇, xiii
-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U.S. 联邦印第安人事务局, 304
- Bureau of Intelligence, U.S. 联邦情报局, 242
- Burgess, John W. 约翰·W. 伯吉斯, 132
- Burke, Edmund 埃德蒙·伯克, 8, 13, 31, 35, 64-65, 121
- Bush, George 乔治·布什, 324
- Bushnell, Horace 霍勒斯·布什内尔, 55
- Business Week* 《商业周刊》, 326
- busing (为消除种族隔离教育而实行的) 校车接送制, 315
- Byllesby, Langdon 兰顿·拜勒斯拜, 60
- Cage, John 约翰·凯奇, 262
- Calhoun, John 约翰·C. 卡尔霍恩, 63
-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at Berkeley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 264, 290
- California, voting rights in 加利福尼亚州的选举权, 79
- Call, The* 《召唤》, 167-68
- Calvinists 加尔文派教徒, 57
- Cambodia 柬埔寨, 304, 321
- campaign financing 筹集竞选基金, 325
- Campbell, Helen 海伦·坎贝尔, 148
- Canada, African-Americans' flight to 非裔美国人逃往加拿大, 89
- Cannon, James 詹姆斯·坎农, 31
- Cannon, Poppy 波培·坎农, 266
- Capital* (Marx) 《资本论》(马克思著), 125-26
- Capitalism and Freedom* (Friedman) 《资本主义与自由》(福里德曼著), 309
- Capitol, status on 国会大厦顶端上的塑像, 93
- Carey, Henry C. 亨利·C. 凯里, 55, 147
- Carmichael, Stokely 斯多克利·卡迈克尔, 284
- Carnegie Corporation 卡内基基金会, 246
- Carpenter, The* 《木匠》, 143
- Carson, Rachel 雷切尔·卡森, 288-89
- Carter, Jimmy 吉米·卡特, 317, 320, 321
- Catholics 天主教徒(会), 5, 26, 58
- education and 教育与, 191
- McCarthyism and 麦卡锡主义与, 256
- in New Deal 在新政时期, 210
- in postwar era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时期, 268, 319
- prejudice against (对天主教徒的) 歧视, 77, 79, 190, 268
- in World War II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239
- Catt, Carrie Chapman 卡丽·查普曼·凯特, 136, 171
- Census Bureau, U.S. 联邦人口统计局, 117, 240
-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中央情报局, 254, 276, 292
- Chaffee, Zechariah, Jr. 小泽卡赖亚·查菲, 163
- Chariot of Liberty, A* 《自由的战车》, 12
- Chartist movement (英国) 宪章派运动, 59
- Chase Manhattan Bank, 大通银行, 249
- checks and balances (权力) 制衡, 22

- Cherokee nation 彻罗基民族, 78
- Cherokee nation v. Georgia* 彻罗基民族诉佐治亚州案, 78
- Chevalier, Michel 米歇尔·切瓦里尔, 50
- Chicago, Ill. (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市, 166, 283
- race riot in (1919) 1919 年发生(在芝加哥)的种族暴乱, 174
- Chicago Commission on Race Relations 芝加哥市种族关系委员会, 174
- Chicago Defender* 《芝加哥捍卫者报》, 198
- Chicago Freedom Movement 芝加哥自由运动, 283
- Chicago Tribune* 《芝加哥论坛报》, 119, 125, 188
- Chicanos 奇卡诺人, 284, 300
- Child, Lydia Maria 莉迪亚·玛丽亚·蔡尔德, 73, 81, 86
- child labor 童工, 155, 157, 180
- Children's Bureau, U.S. 联邦儿童福利局, 156
- China 中国, 116, 240, 253
- in World War II,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241
- Chinese-Americans 华裔美国人, 76, 108, 133
- Christian Century* 《基督世纪》, 198
- Christian (moral) freedom 基督教(道德)自由, xvii-xviii, 3-5, 31-32, 57, 270, 310
- Christianity 基督教, 4, 15, 31-32, 84
- evangelical 福音派, 317
- free market linked to 与自由市场的联结, 317-18
- in King's speeches 在(小马丁·路德)金演说中的, 279
- Chrysler Corporation 克莱斯勒集团公司, 271
- CIA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中央情报局, 254, 276, 292
- Cigarettes 香烟, 181
- CIO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产联, 198-99, 200, 211, 213, 215-15, 234, 239, 244, 247, 257
- cities 城市, 59
- deindustrialization of 的非工业化, 267-68
- Citizens Committee 公民委员会, 132
- citizenship 公民资格, 公民身份, xxi, 17, 38-39
- Fourteen Amendment and 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与, 133, 329
- voting rights and 选举权与, 53, 112
- 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 平民资源保护队, 229
- civil liberties 公民自由, xvii, 107
- birth of 的诞生, 161-93
- in Civil War 在内战时期, 98-99
- Cold War constraints on 冷战(对公民自由)的限制, 255
- Progressives and 进步主义者与, 183
- World War I repression of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对公民自由)的镇压, 177-179
- see also specific rights 同见, 具体的公民权利
- Civil Liberties Bureau 公民自由管理局, 183
- See also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同见,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 Civil Liberties Unit,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联邦司法部所辖的公民自由管理处, 216-17
- Civil Rights Act (1866) (1866 年)民权法, 105
- Civil Rights Act (1875) (1875 年)民权法, 106
- Civil Rights Act (1864) (1964 年)民权法, 284, 291, 296, 314



- civil rights movement 民权运动, 257-58, 274, 275-87, 299-303, 313, 329
- conservative views on 保守派(对民权运动)的看法, 314-15
- economic inequality addressed in (民权运动)对经济不平等的讨论, 282-83, 285-87
- King's rhetoric in 马丁·路德·金(在民权运动中)的语言, 279
- McCarthyism and 麦卡锡主义与, 256
- massive resistance and 群众性抵制与, 280
- separatism in (民权运动中的)分裂主义, 284
- Supreme Court and 联邦最高法院与, 300-304
- Women subordinate in 妇女(在民权运动中)处于次等地位, 296-98
- Civil War 美国内战, 95-108, 96, 115, 132, 305
- African-Americans military service in 非裔美国人(在内战中)的军事服务, 97
- arbitrary arrests in (内战时期的)任意性逮捕, 98
- private agencies' role in 私人团体(在内战中的)的角色, 169
- Clark, Tom C. 汤姆·C. 克拉克, 252
-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e* (Huntington) 《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著), 330
- Clay, Henry 亨利·克莱, 53
- Clayton Act (1914) (1914年)克莱顿法, 144
-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doctrine "清楚的和当前的危险"原则, 184
- Cleveland, Grover 格罗弗·克利夫兰, 116
- Clinton, Bill 比尔·克林顿, 324, 325, 326
- Cobb, Ned 内德·科布, 278
- Cohen, Jean 琼·科恩, 303
- Cold War 冷战, 250-62, 269, 275, 290, 327
- Conservatives and 保守派与, 312, 313, 317, 321, 324
- end of 冷战的结束, 325, 328, 329, 33
- foreign interventions in (冷战时期的)外国干涉, 292, 321
- military buildup in (冷战时期的)军事集结, 257
- see also Vietnam War 同见:越南战争
- Coleman, William 威廉·科尔曼, 113
- collective bargaining 集体谈判, 141, 142, 179, 200, 201, 263
- Colorado 科罗拉多, 127
- Colton, Calvin 卡尔文·克伦顿, 66
- Colu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 192
-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Blackston) 《英国法律评论》(布莱克斯通著), 9
- Commission of Public Safety 公共安全委员会, 178
-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 民权委员会, 258, 266-67
-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 工业关系委员会, 141, 164
-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PI) 公共信息委员会, 169-70
- Commons, John R. 约翰·R. 康芒斯, 139
- Common Sense* (Paine) 《常识》(潘恩著), 15, 16
-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1996) 通讯风化法 (1996年), 325, 332
- Communist Labor Party 共产主义劳动党, 185
- Communists 共产党人, xvi, 25, 184, 204-5,

- 301, 311, 312
-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民权运动与, 282
- in Depression 在大萧条时期, 211-12, 213, 214
- Freedom Train and 自由列车与, 250-52
- In interwar period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188
- McCarthyism and 麦卡锡主义与, 248
- Port Huron statement and 休伦宣言与, 291
-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and 非美活动委员会与, 217
- in Vietnam War 在越战时期, 290
- in World War I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178
- in World War II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241
- see also Cold War; Soviet Union 同见: 冷战, 苏联
- communitarians 社群主义者, 62
- "Composite Nation" (Douglass) "混合的民族", 108
- Comstock, Anthony 安东尼·科姆斯托克, 167-68
- Comstock (obscenity) laws 科姆斯托克法(反淫秽法) 110, 111, 164, 166, 168, 184
- Confederacy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南部邦联, 95, 97
- Conference on Home Building and Home Ownership 住房建设和住房拥有讨论会, 209
-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CIO) 产业联, 198-99, 200, 211, 213, 214-15, 234 239, 244-247, 257
- 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 (CORE) 种族平等同盟, 278, 283
- Connecticut 康涅狄格 302
-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 The* (Goldwater) 《一个保守派的良心》(戈德华特著), 312
- conservatives 保守派, 保守主义者, 263
- in Depression 在大萧条时期, 200, 205
- libertarianism and 自由意志论者, 309, 311, 313, 314, 317, 331
- religious 宗教保守派, 317, 323
- resurgence of 保守派的复兴, 304, 307-30
- traditionalist 传统的保守派, 309, 311, 314
- in World War II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227, 235-36
- Constitution, U.S. 美国联邦宪法, 21, 22, 23, 24, 27, 108, 112
- citizenship and 与公民资格, 38, 39
- equality and 与平等, 107
- on Freedom Train 在自由列车上展出, 249-52
- habeas corpus and 与人身保护令, 98-99
- "people" in (联邦宪法) 中的"人民", 38
- and right to privacy 与隐私权, 302
- slavery and 奴隶制与, 35-36, 38, 87
-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U.S. 联邦宪法修正案:
- Thirteenth 第十三条修正案, 104, 111, 124, 250
- Nineteenth 第十九条修正案, 172
- proposed Equal Rights Amendment 提出的(男女)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 180, 318
- Reconstruction 重建宪法修正案, 104, 107, 113
- see also Fifteenth Amendment; First A-

- mendment, Fourteenth Amendment 同见;  
 第十五条修正案, 第一条修正案, 第十四条  
 修正案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1787) 制宪大会(1787  
 年), 17, 22, 35, 52  
 consumerism 消费主义, 消费, 147-51, 181-82,  
 199, 201  
 in postwar era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时  
 期, 262-73, 305, 332  
 World War II and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 232  
 consumer rights 消费者权利, 300  
 containment policy 遏制政策, 253  
 Continental Congress, first 第一届大陆会议, 13  
 contraception, see birth control 避孕, 见, 节制生  
 育  
 contract, freedom of 契约自由, 122-23, 124,  
 125-26, 140, 157, 180, 216, 301  
 in Depression 在大萧条时期, 205  
 labor's redefinition of 劳工(对契约自由)的  
 重新定义, 135  
 convicts, transported 流放的罪犯, 10  
 Cook, Samuel DuBois 塞缪尔·杜波依斯·库克,  
 xxi  
 Coolidge, Calvin 卡尔文·柯立芝, 189  
 CORE (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 种族平等同  
 盟, 278, 283  
 Cornish, Samuel 塞缪尔·科尼什, 88  
 Cotton 棉花, 76  
 Couch, W. T. W. T. 库奇, 245  
 Coughlin, Charles E. 查尔斯·E. 库格林, 200,  
 204  
 counterculture 反正统文化运动, 292-94  
 CPI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公共信  
 息委员会, 169-70  
 Crawford, Thomas 托马斯·克劳福特, 93-94,  
 93  
 Creel, George 乔治·克里尔, 169, 170  
 Crevecoeur, Hector St. John 埃克托尔·圣约  
 翰·克雷维克, 12, 39, 213  
 Crisis, The 《危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会刊),  
 173, 244  
 Croly, Herbert 赫伯特·克罗利, 140, 142, 153,  
 161  
 on World War I 论第一次世界大战, 169  
 Croly, Jane 简·克罗利, 108  
 Cromwell, Oliver 奥利弗·克伦威尔, 170  
 Crosby, Ernest H. 欧内斯特·H. 克罗斯比, 139  
 Cuba 古巴, 134  
 Cupid's Yokes 《丘比特的枷锁》, 111  
 currency, national 联邦货币, 127  
 Curtis, George William 乔治·威廉·柯蒂斯,  
 97-98  
 Cusack, Nell 内尔·丘萨克, 125  
 Customs Service, U. S. 联邦税务署, 185  
 Daley, Richard J. 理查德·戴利, 283  
 dance 舞蹈, 166, 213, 260  
 Darrow, Clarence 克莱伦斯·达罗, 164  
 Darwin, Charles 查尔斯·达尔文, 121  
 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国革命  
 之女组织, 213  
 Davis, James J. 詹姆斯·J. 戴维斯, 189  
 Davis, Jefferson 杰斐逊·戴维斯, 83, 93-94

- Davis, Pauline 波林·戴维斯, 80
- Debs, Eugene V. 尤金·V. 德布斯, 126, 129, 143, 158-59, 168, 184
- in World War I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177
-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776) 独立宣言 (1776 年), 15, 20, 32, 40, 63, 65-66, 107, 124, 213, 278
- abolitionists' appeals to 废奴主义者(对独立宣言)的运用, 86, 89, 92
- on Freedom Train 在自由列车上展出, 249
- Lincoln's invocation of 林肯(对独立宣言)的启用, 105
- rewriting of 独立宣言的重写, 126
- defendants' rights 被诉讼人的权利, 214
- Delany, Martin 马丁·德莱尼, 88-89, 283
- Delta Council 三角洲委员会, 259
- democracy 民主, xvii, 12, 20, 22, 50-58, 63, 141, 179
-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民权运动与, 278-79
- immigration and 移民与, 188
- Lippmann on 李普曼论, 181-82
- Madison on 麦迪逊论, 22-23
- in New Left 新左派中的(民主), 289, 290
- Progressives and 进步主义者与, 140, 154, 155, 159 183, 185, 187, 189
- after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 179
- in World War I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民主), 170, 171, 173, 174, 175
- Democracy in America* (Tocqueville) 《论美国民主》(托克维尔著), 48
- Democratic-Republicans 民主-共和党人, 43
- Democratic Review* 《民主评论》, 77
- Democrats 民主党人, 54, 60, 63, 99, 275, 283, 313, 315
- anticommunism of (民主党人的)反共产主义, 313
- conservative 保守的(民主党人), 315, 316
- in Depression 在大萧条时期, 195, 201, 207, 208, 212-13, 218
- in elections of 1948 在 1948 年选举中, 258
- McCarthyism and 麦卡锡主义与, 256
-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and 非美活动委员会与, 217
- Vietnam and 越南(战争)与, 291
- in World War II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民主党人), 227, 229, 233
- Dennett, Mary Ware 玛丽·维尔·丹尼特, 184
- Densmore, Dana 达纳·登斯莫尔, 299
- Denver, Colo. 丹佛(科罗拉多州), 164
- Depression, Great 大萧条, 195-218, 225, 230,
- governmental role in (大萧条时期)政府扮演的角色, 195-96, 201
- labor movement in (大萧条时期的)劳工运动, 198-99, 214-15, 216
- labor regulation in (大萧条时期的)劳工管制, 199, 200, 201, 205
- Detroit, Mich., race riot (1943) 底特律(密执安州)的种族骚乱(1943 年), 243
- Detroit Free Press* 《底特律自由新闻报》, 238
- Dewey, John 约翰·杜威, xvii, 116, 129 153, 154, 181-82, 192, 211, 289
- on Depression 论大萧条, 199

- on World War I 论第一次世界大战, 169
- DeWitt, Benjamin P. 本杰明·P. 德威特, 140
- Dickinson, John 约翰·迪金斯, 31
- Dictionary of Races of Peoples* 《人类种族词典》, 187
-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Webster) 《英语词典》(韦伯斯特编), 53
- disability insurance 残障人保障, 201
- Disney, Walt 沃尔特·迪斯尼, 222
- Dissenters 持不同政见者, 26
- divided sovereignty 分裂的主权, 22
- divorce 离婚:
- laws on 离婚法, 109, 303
- rates of 离婚率 305
- Dodge, Mabel 梅布尔·道奇, 166
- domestic servants 家庭佣人, 18
- domestic violence 家庭暴力, 109, 110
- domestic workers 家庭佣工, 10, 206, 207, 257
- Dominican Republic 多米尼加共和国, 292
- Donald, David 戴维·唐纳德, 98
- Dos Passos, John 约翰·多斯·帕索, 308
- double-V 双重胜利, 243-44
- Douglas, Stephen A. 斯蒂芬·道格拉斯, 91-92
- Douglas, William O. 威廉·O. 道格拉斯, 302
- Douglass, Frederick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66, 87, 88, 89, 99, 101-2, 108, 132, 246, 279
- on Constitution 论联邦宪法, 87
- death of 的逝世, 135
- Dred Scott decision* 德雷特·司各特案判决, 75
- Drift and Mastery* (Lippmann) 《漂流与制服》(李普曼著), 155
- drugs, illegal 非法毒品, 293-94
- Dryden, John 约翰·德莱登, 6
- Du Bois, W E. B. W. E. B. 杜波伊斯, 132, 173, 174, 246, 258
- Duncan, Isadora 伊莎多拉·邓肯, 166
- Duniway, Abigail Scott 阿比盖尔·司各特·达尼韦, 109, 137
- Durant, Will 威尔·杜兰特, 227
- Eastman, Crystal 克里斯特尔·伊斯门, 157, 166, 167
- Eastman, Max 马克斯·伊斯门, 192
- Economic Bill of Rights 经济权利法案, 234, 247, 257, 321
- economic freedom 经济自由, xviii, 143, 198, 199
- economic independence 经济独立:
- denied African-Americans 非裔美国人的经济独立遭到否定, 77
- ex-slaves and 前奴隶与, iii
- freedom and 自由与, 9-11, 18-19, 20, 21, 32, 41, 59-60, 62, 95
- West and 西部与, 75-76, 92
- economic privileges 经济特权, 6
- economy 经济:
- market revolution and 市场革命与, 48, 55, 57, 58, 59, 67
- in postwar era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期, 264-73, 316
- slavery and 奴隶制与, 65
- Social Darwinism and 社会达尔文主义与, 121, 124, 129, 139, 140

- World War II and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 233-34
- see also inequality, economic; laissez-faire economics 又见: 经济不平等, 自由市场经济
- Edman, Irwin 欧文·埃德曼, 196
- Education 教育, 187-88, 191
- bilingual 双语教育, 329
- funding of 对教育的资助, 314
- in Great Society “伟大社会”计划中的, 284
- religion and 宗教与, 188, 191
- school prayer and 校内祈祷仪式与, 302, 317
- segregation in 教育中的种族隔离, 88, 258-59, 280, 314, 315
- voting rights and 选举权与, 136
- eighteen-year-olds, voting rights for 18 周岁公民的投票权, 97
- eight-hour day 八小时工作制, 160, 176
- Eisenhower, Dwight D. 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 219, 254, 280, 311
- elections of 1800 1800 年选举, 44
- elections of 1912 1912 年选举, 158-61, 186
- elections of 1932 1932 年选举, 197, 201, 311
- elections of 1936 1936 年选举, 204, 205
- elections of 1938 1938 年选举, 235
- elections of 1940 1940 年选举, 245
- elections of 1944 1944 年选举, 231, 247
- elections of 1948 1948 年选举, 254, 257, 258
- elections of 1952 1952 年选举, 259
- elections of 1960 1960 年选举, 307
- elections of 1964 1964 年选举, 284, 286, 313, 315, 320, 321
- elections of 1966 1966 年选举, 315
- elections of 1968 1968 年选举, 304, 316
- elections of 1972 1972 年选举, 316
- elections of 1980 1980 年选举, 316
- elections of 1994 1994 年选举, 324
- elections of 1996 1996 年选举, 326
- electoral reforms 选举制度改革, 154
- Elias, Norbert 诺伯特·埃利亚斯, 263
- Eliot, George 乔治·埃利奥特, 82
- Elliott, Robert B. 罗伯特·B. 埃利奥特, 106
- Ely, Richard T. 理查德·T. 伊莱, 130
- Emancipation 奴隶解放, 35, 37, 76, 99, 103-4, 120, 124
- Emancipation Acts 奴隶解放法案, 39
-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1862) 黑奴解放文告(1862 年), 97, 250, 278
- Emerson, Ralph Waldo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54, 57, 62
- on Anglo-Saxon superiority 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优越性, 77
- on marriage 论婚姻, 72
- employment, see free labor; labor movement; women workers; workers 就业, 见: 自由劳工, 劳工运动, 妇女工人, 工人
- Engels,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43
- English language 英语, 329
- entail (财产的)继承, 21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环境保护署, 284
-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 284, 296

- equality 平等, xxi, 16-17, 20, 21-22, 42  
 Constitution and 宪法与, 107  
 legal 法律上的, 87, 88, 105  
 in property distribution 在财产分配上的, 62  
 see also inequality, economic 又见: 经济不平等
- Equality League of Self Supporting Women 自立妇女平等联盟, 146
- equal pay, women and 妇女与平等工资, 109, 145, 294
- Equal Pay Act (1963) 平等工资法(1963年), 296
- equal protection 平等保护, xxi, 105, 301
- Equal Rights Amendment (ERA) (男女)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 180, 318
- Eric Canal 伊利运河, 53
- Eros and Civilization* (Marcuse) 《性欲与文明》(马库塞著), 294
- Escape from Freedom* (Fromm) 《逃避自由》(弗洛姆著), 269
- Espionage Act (1917) 反间谍法(1917年), 177, 183
- Essay on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Priestley) 《论政府之首要原则》(普里斯特利著), 6
- ethnic identity 族裔认同, 211
- eugenicists 鼓吹优生学的人, 330
- Evans, George Henry 乔治·亨利·埃文斯, 63
- Evans, M. Stanton M. 斯坦顿·埃文斯, 310, 311
- Everett, Edward 爱德华·埃弗里特, 48
- Excel Electric Cooker 埃克塞尔电饭锅, 182
- Exodus story (圣经中) 犹太人出埃及的故事, 174, 279
- factory slavery, see wage slavery 工厂奴隶制, 见: 工资奴隶制
- factory system 工厂制, 117, 142-43
- Fair Employment Practices Commission (FEPC) 公平就业实践委员会, 242, 247, 250, 284
- Fair Housing Act (1968) 公平住房法(1968年), 284
- 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1938) 公平劳动标准法(1938年), 201.
- Falwell, Jerry 杰里·福尔维尔, 317-18, 322
- family rights 家庭权, 110
- family wage 家庭工资, 74, 80, 144
- Farmer, James 詹姆斯·法默, 278
- Farmer-Labor Party 农工党, 207
- farmers 农场主:  
 independent 独立的, 21, 76, 120  
 in Populist era 在平民党运动时代, 126-27
- Farmers Alliance 农场主联盟, 126-27
- 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农场保障局, 197
-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254, 261
- fear, freedom from 免于恐惧的自由, 223, 227, 244
-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FHA) 联邦住房事务局, 210
- Federalist, The* 《联邦主义者文集》, 22
- Federalists 联邦党人, 42
- Federal Reserve Board 联邦储备委员会, 152
-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联邦贸易委员会, 152
- Federated Trades of the Pacific Coast 太平洋海

- 岸联合行业, 126
- Felix Holt, the Radical* (Eliot) 《激进者费利克斯·霍尔特》(埃利奥特著), 82
- Feminine Mystique, The* (Friedan) 《女性的奥秘》(弗里丹著), 294-95
- feminism 女权主义, 81-84, 109, 111, 123, 136, 144, 757, 180, 294-96, 317, 318
- obscenity laws opposed by 对反淫秽法的反对, 164
- see also women's rights movement 又见: 女权运动
- Feminist Alliance 女权主义联盟, 146
- FEPC (Fair Employment Practices Commission) 公平就业实践委员会(缩写), 242, 247, 250, 284
- FHA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联邦住房事务局(缩写), 210
- Field, Stephen J. 斯蒂芬·J. 菲尔德, 122, 123
- Fields, J. D. J. D. 菲尔兹, 127
- Fifteenth Amendment 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 105, 112, 111, 180, 250
- NAACP and enforcement of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与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的实施, 173
- Fight for Freedom Committee 为自由而战委员会, 221, 245
- "Fight for Freedom" rally "为自由而战"集会, 222
- Filene, Edward 埃德华·法林, 147
- First Next Time, The* (Baldwin) 《第一次的下一回》(鲍德温著), 288
- First Amendment 第一条宪法修正案, 25, 27, 183-84, 216, 256, 301, 302, 325, 332
-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doctrine and 与"清楚的和当前的危险"原则, 184
- Four Freedoms and 四大自由与, 223,
- Fitzhugh, George 乔治·菲茨休, 63, 64, 65, 68, 82
- Flag Day 国旗日, 134
- Florence 佛罗伦萨, 7
- Flynn, Elizabeth Gurley 伊莉莎白·格利·弗林, 164
- folk traditions 民俗传统, 213
- Food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食品服务管理局, 169
- food stamps 食品券, 285
- Ford Motor Company 福特汽车公司, 187
- foreign languages 外国语, 178, 187-88, 191-92
- Fortune* 《财富》, 198, 225, 231, 268
- Four Freedoms 四大自由, 221-33, 237, 239, 243, 245, 247, 250, 262
- Four Freedoms, The* (Ballin) 《四大自由》(巴利著), 225
- Four Freedoms, The* (Rockwell) 《四大自由》(罗克韦尔绘制), 225-27, 226
- "Four Freedoms War Bond Show" "四大自由战争债券展销", 227
- Fourier, Albert 阿尔伯特·傅立叶, 62
- Fourteenth Amendment 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 86, 105, 108, 112, 122, 131, 185, 250, 278
- Bill of Rights incorporated through 权利法案(经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被纳入 184
- citizenship and 公民资格与, 133
- criticism of (对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的批



- 评, 329
- expanded interpretation of (对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的)扩展性解释, 191-92
- NAACP and enforcement of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与(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的)实施, 173
- Plessy decision and 普雷斯案判决与, 132
- school segregation and 教育隔离与, 258-59
- social welfare and 社会福利与, 158
- Fourth of July 七月四日, 89, 102
- France 法国, 32, 50, 78, 116
- empire of 法兰西帝国, 254, 290
- Statue of Liberty and 自由女神塑像与, 115
- in World War I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170
- Frank, John 约翰·弗兰克, 256
- 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 《弗兰克·莱斯利插图新闻报》, 61, 114
- Franklin, Benjamin 本杰明·富兰克林, 8
- Frazier, Garrison 加里逊·弗雷日尔, 102
- Freedmen's Bureau, U.S. (联邦)自由人局, 110
- Freedom Center 自由中心, 312
- Freedom Council 自由委员会, 322
- freedom fighters 自由战士, 321
- Freedom from Fear* (Rockwell) 《免于恐惧的自由》(洛克韦尔绘制), 226, 227
- Freedom from Want* (Rockwell) 《免于乏匮的自由》(洛克韦尔绘制), 226 227 232
- Freedom House 自由之家, 221, 244, 262
- "Freedom in the Modern World" "现代世界中的自由"演讲, 192
- Freedom of Speech* (Chaffee) 《言论自由》(查菲著), 163
- Freedom of Speech* (Rockwell) 《言论自由》(洛克韦尔绘制), 226, 227
- Freedom of Worship* (Rockwell) 《宗教自由》(洛克韦尔绘制), 226, 239
- Freedom Pledge 自由宣誓, 249
- Freedom Revolution 自由革命, 324-25
- Freedom School 自由学校, 111-12
- Freedom's Journal* 《自由日报》, 88
- Freedom Summer 自由夏天, 277, 277, 290, 294
- Freedom Summer* (Belfrage) 《自由夏天》(贝尔弗雷奇著), 276
- Freedom Train 自由列车(展览), 249-52, 251
- free enterprise 自由企业制, 205, 269
- in Cold War 在冷战中, 262, 263
- as "fifth freedom" 作为第五大自由, 230, 231
- in World War II rhetoric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语言中, 230, 231, 232-33
- see also laissez-faire economics 又见, 自由市场经济学
- free labor 自由劳动, 自由劳(动)力, 自由劳工 65-68, 73, 75, 76, 80, 100, 105, 108, 124
- Black Codes and 黑人法典与, 104
- Franklin Roosevelt and 富兰克林·罗斯福与, 201
- labor regulation and 劳工管制与, 120-23
- wage labor as 作为自由劳力的工资劳力, 135
- women and 妇女与, 112
- free land 自由土地, 63
- free love 自由恋爱(自由性爱), see sexual liberation 见, 性解放

- Freeman, The* 《自由者》, 308
- free market, *see* laissez-faire economics 自由市场, 见: 自由市场经济学
- Freemen 自由人, 328-29
- Free Speech* 《自由言论》, 132
- Free Speech League 自由言论联盟, 163
- Free Speech movement 言论自由运动, 290
- free will 自由意志, 57
- free world 自由世界, 221, 252-61
- Free World Association 自由世界联盟, 221, 232
- French-Americans 法裔美国人, 78
- French Convention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大会, 37
-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 43-44, 93-94
- Freudians 弗洛伊德学说信奉者, 181
- Friedan, Betty 贝蒂·弗里丹, 294-95, 296
- Friedman, Milton 米尔顿·弗里德曼, 308, 309, 310, 111
- Fromm, Erich 埃里克·弗洛姆, 269
- Frugal Housewife, The* (Child) 《勤俭的家庭主妇》(蔡尔德著), 73
- fugitive slave clause (联邦宪法中的)逃奴条款, 36
- Fugitive Slave Law (1850) 逃奴法(1850年), 87, 89
- Fukuyama, Francis 弗朗西斯·福山, 330
- Fulbright, J. William J. J. 威廉·富布赖特, 253
- Full Employment bill 充分就业法案, 234-35
- Gabel, Hortense 霍藤斯·加贝尔, 259
- Gabriel (blacksmith) 加布里埃尔(领导奴隶暴动的黑人铁匠), 44, 89
- Gage, Francis D. 弗朗西斯·D. 盖奇, 81, 111-12
- Galbraith, John Kenneth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 270
- Garfield, James A. 詹姆斯·A. 加菲尔德, 100
- Garland, Judy 朱迪·加兰, 316
- Garrison, William Lloyd 威廉·洛伊德·加里逊, 66, 85, 87, 88
- Garson, Barbara 芭芭拉·加尔森, 290
- Garvey, Marcus 马尔库斯·加维, 174-75, 283
- Gast, John 约翰·加斯特, 51
- Gaylord, Robert 罗伯特·盖洛特, 230
- gays and lesbians 男同性恋者, 256
- rights for 同性恋者的权利, 167, 300, 304
- General Electric 通用电器公司, 320
- General Motors 通用汽车公司, 199, 215, 316
- "Genius of the Anglo-Saxon Race" (Emerson) "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天才"(爱默生著), 77
- George, Henry 亨利·乔治 116, 128-29, 139, 144
- Georgia 佐治亚, 36
- Cherokees in 在佐治亚的彻罗基人, 78
- voting rights in 佐治亚州的选举权, 74, 154
- German-Americans 德裔美国人, 169, 170, 237, 241
- German language, repression of 对德语的压制, 178
- Germany 德意志, 德国, 116, 261
- in World War I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171, 173, 175
- in World War II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221,

- 237, 240, 241
- Gettysburg Address (1863) (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1863年), 105, 213, 249
- GI Bill of Rights (1944) 退伍军人权利法案(1944年), 235
- Gilded Age 镀金时代, 116-30, 140, 143, 151, 152
- Gilman, Charlotte Perkins 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 80, 145, 169
- Gitlow, Benjamin 本杰明·吉特洛, 184
- Godey's Lady's Book* 《戈蒂的妇女必读》, 82
- Godkin, E. L. E. L. 戈德金, 119
- Goldberg, Arthur 阿瑟·戈德堡, 302
- Goldman, Emma 埃玛·戈德曼, 146, 167, 168, 177
- Goldsmith, Oliver 奥利弗·戈德史密斯, 37
- Goldwater, Barry 巴里·戈德华特, 307, 312-13, 314, 320, 321
- Gompers, Samuel 塞缪尔·冈波斯, 111, 135, 143
- on World War I 论第一次世界大战, 169
- Goode, Kenneth 肯尼思·古德, 147
- Gorbachev, Mikhail 米凯尔·戈尔巴乔夫, 324
- Gosnell, Horace 霍勒斯·戈斯内尔, 244
- governmental role 政府的角色
- in Cold War 在冷战中, 263
- conservative views on 保守派关于政府角色的观点, 308, 111, 314, 316, 317, 320, 321, 323, 324
- in Depression 在大萧条时期, 195-96, 201
- economic planning and 经济计划与, 235-36
- growth of 政府功能的增长, 152-61
- McCarthyism and 麦卡锡主义与, 256
- in postwar era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期, 256, 261, 269, 320
- Progressives and 进步主义者与, 152-61, 182-83, 196
- size of 政府的规模, 53-55
- in World War I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169
- in World War II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219, 235
- Graham, Martha 玛莎·格兰姆, 213, 238-39
- Grant, Madison 麦迪逊·格兰特, 187
- Gray, Mary 玛丽·格利, 49
- Great Awakening 大觉醒运动, 5
- Great Awakening, Second 第二次大觉醒运动, 55-57, 84
- Great Britain 大不列颠, 5-7, 15, 26, 32, 59, 94
- as model of liberty 作为自由的榜样, 88
- trade with 与不列颠的贸易, 42
- in World War I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170
- in World War II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221
- see also American Revolution 又见: 美国革命
- Great Depression, see Depression, Great 大萧条, 见: 大萧条
- Great Society “伟大社会”, 185, 247, 284-86, 291, 324, 325
- Greece 希腊, 252, 254
- Greeley, Horace 霍勒斯·格里利, 63
- Green, T. H. T. H. 格林, 153
- Greensboro, N. C., sit-in 发生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的人座抗议, 278
- Greenwich Village 格林威治村, 166-67

- Gregory, Arnold E. 阿诺德·E. 格雷戈里, 175
- grievance procedures (申诉)冤情的程序, 200
- Grimke, Angelina 安杰利娜·格里姆克, 86-87
- Griswold v. Connecticut* 格利斯沃尔德诉康涅迪格州案, 302-3
- Guadalupe Hidalgo, Treaty of (1848) 瓜达卢普—希达尔戈条约(1848年), 78-79
- Guatemala 危地马拉, 254, 292
- gun ownership rights 枪支拥有权, 328
- Haacke, Hans 汉斯·哈克, 327
- habeas corpus, writ of 人身保护令, 98-99
- Habits of the Heart* (Bellah) 《心灵的习性》(贝拉著), 328
- Hahn, Michael 迈克·哈恩, 97
- Haiti 海地, 37, 44
- Hale, Edward Everett 埃德华·埃弗里特·海尔, 98
- Hale, Sarah J. 塞拉·J. 海尔, 82
- Hall, Thomas 托马斯·霍尔, 113
- Hamer, Fannie Lou 范妮·卢·汉默, 286-87
- Hamilton, Alexander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24, 421, 152
- Hamilton, Walton H. 沃尔顿·H. 汉密尔顿, 192
- Hammond, James Henry 詹姆士·亨利·哈蒙德, 64
- Harding, William L. 威廉·L. 哈定, 178
- Harlan, John Marshall 约翰·马歇尔·哈伦, 132-33, 320
- Harlem riot (1943) 哈莱姆骚乱(1943年), 200
- Harlem riot (1964) 哈莱姆骚乱(1964年), 282
- Harper's Weekly* 《哈泼周刊》, 98
- Harrington, Michael 迈克尔·哈林顿, 285, 289, 291, 309
- Hart-Cellar Act (1965) 哈特-塞拉法(1965年), 281-82
- Hartz, Louis 路易斯·哈茨, 2162
- Haskell, Thomas 托马斯·哈斯克尔, 59
- Hayden, Casey 凯西·海登, 298
- Hayden, Tom 汤姆·海顿, 289-90
- Hayek, Friedrich A. 弗里德里克·A. 哈耶克, 235-36, 308, 309
- Haynes, Lemuel 莱缪尔·海因斯, 34
- health insurance 健康保险, 160, 200, 207, 257, 284
- Medicare and Medicaid 医疗保健和医疗补助, 284, 304, 324
- Hendricks, Thomas 托马斯·亨德里克斯, 107
- Henry, Patrick 帕特里克·亨利, 214-25, 328
- slaves' quotation of 奴隶对帕特里克·亨利的语言的引用, 44
- Herberg, Will 威尔·赫伯格, 268-69
- "Heresy Yes, Conspiracy, No" (Hook) "是异端邪说,但不是阴谋"(胡克著), 256
- Herndon, Angelo 安杰洛·赫恩登, 216
- Herrnstein, Richard 理查德·赫恩斯坦, 329, 330
- Hess, Kari 卡尔·赫斯, 313
- Hewitt, Abram 阿布拉姆·休伊特, 116, 119
- Heywood, Ezra 埃兹拉·海伍德, 111
- Hidden Persuaders, The* (Packard) 《隐秘的说服者》, 270

- Higginson, Thomas Wentworth 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 xiv
- Hillman, Sidney 悉尼·希尔曼, 175, 199
- Hirabayashi, Gordon K. 戈登·K. 平林, 241
- Hispanic-Americans 西班牙语裔美国人, 329
- History of Slavery and Serfdom* (Ingram) 《奴隶制与农奴制的历史》(英格拉姆著), 125
-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Ramsay) 《美国革命史》(拉姆什著), 31
-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2121, 242
- Hobbsawm, Eric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xxi-xxii
- Hoffman, Abbie 阿比·霍夫曼, 293
- Hofstadter, Richard 理查德·霍夫斯达特, xxi, 200-201, 259, 3215-26
- Holland 荷兰, 32
- Holman, William 威廉·霍尔曼, 104
- Holmes, John Haynes 约翰·海因斯·霍姆斯, 183
- Holmes, Oliver Wendell 奥利弗·霍姆斯, 183-84
- Holy Name Society 天主教圣名协会, 191
- Home Owners Loan Corporation 家庭住房拥有者贷款公司, 210
- Homestead, Penn., strike (宾夕法尼亚州) 霍姆斯特德大罢工, 130, 176
- homosexuals 同性恋者:  
     gay rights and 同性恋者权利与, 167, 300, 304  
     McCarthyism and 麦卡锡主义与, 256
- Hook, Sidney 悉尼·胡克, 256
- Hooker, Thomas 托马斯·胡克尔, 4
- Hoover, Herbert 赫伯特·胡佛, 170, 193, 205, 209, 227, 311
- Hoover, J. Edgar 埃德加·J. 胡佛, 283
- Hooverilles 胡佛村, 195
- Hopkins, Harry 哈里·霍布金斯, 197
- House, Edward 埃德华·豪斯, 174
- House Beautiful* 《美丽家居》, 264, 271
- House I Live In, The* 《我的家园》, 240
-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U.S. 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 217
- Housing 住房, 257, 283  
     in Depression 在大萧条时期, 200, 201, 209-10  
     in Great Society 在“伟大社会”时期, 284  
     loans for (为住房提供的) 贷款, 210  
     segregation in (住房) 种族隔离, 174, 209, 210, 258, 259, 266-67, 315  
     in World War II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233
- Houston, Charles H. 查尔斯·H. 休士顿, 214
- Howard, Merrimon 梅里蒙·霍华德, 102
- Howells, William Dean 威廉·迪安·豪厄尔斯, 137
- Hubenthal, Karl 卡尔·哈本索尔, 300
- Hughes, Charles Evans 查尔斯·埃文斯·休斯, 205
- Hughes, H. Stuart H. 斯图亚特·休斯, 235
- Hughes, Langston 兰斯顿·休斯, 250
- Hull, Cordell 科德尔·赫尔, 237
- Hull House 赫尔堂, 187
- human rights, foreign policy and 外交政策与人权, 317
- Hume, David 大卫·休谟, 33

- Huntington, Samuel P. 塞缪尔·P. 亨廷顿, 330
- Hutchinson, Thomas 托马斯·哈钦逊, 32
- Ickes, Harold 哈罗德·伊基斯, 208
- Idaho 爱达荷, 127
- Idea of Freedom, The* (Adler) 《自由的概念》(阿德勒著), 260
- Ideas Have Consequences* (Weaver) 《思想是有结果的》(韦弗), 309
- identity politics 认同政治, 329
- "I Have a Dream" speech (King) "我有一个梦想"演讲(小马丁·路德·金著), 279
- Illinois 伊利诺斯, 112
- African-Americans barred from 非裔美国人被禁止进入, 76
- Illinois Central Railroad 伊利诺斯中心铁路, 67
- Illinois Supreme Court 伊利诺斯州最高法院, 123
- immigration 移民, 39-40, 48, 76, 79, 133, 137, 146, 155, 162, 329-30
- Americanization and 美国化运动与, 162, 187-91, 211
- democracy and 民主与, 188
- in Depression 在大萧条时期, 210-11
- Douglass on 道格拉斯论, 108
- Hart-Cellar Act and 哈特-塞拉法与, 281-82
- in interwar period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185-92
- labor movement and 劳工运动与, 176, 196
-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在19世纪末期, 130-31
- patriotic assimilation and 爱国主义式同化与, 236-41
- Statue of Liberty and 自由女神塑像与, 115-16
- voting rights and 选举权与, 136, 154
- in World War II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218, 240
- see also pluralism 又见:多元主义
- Immigration Commission, U.S. 联邦移民问题委员会, 187
- immigration law (1924) 移民法(1924年), 189, 282
-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134-35
- independence and 独立与, 174
- impressment 强行征用, 6, 10
- income tax, graduated 递增所得税, 127
- indentured servants 契约劳工, 10, 19
- independence 独立:
- colonialism and 殖民主义与, 174
- political 政治上的, 15, 18, 23
- see also economic independence 又见:经济独立
- Independence Day 独立日(美国国庆日), 89, 102
- Independent, The* 《独立》, 139, 140
- India, immigrants from 来自印度的移民, 189
- Indiana 印第安纳, 188
- African-Americans barred from 非裔美国人被禁止进入, 76
- Indians, American 美洲印第安人:
- in *American Document* 在《美国文献》中, 213
- assimilation of 印第安人的同化 78

-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民权运动与, 284, 300
- Constitution and 宪法与, 38
- as indentured labor 作为契约佣工, 76
- legal status of 拥有的法律地位, 78
- territory lost by 丧失的土地, 50, 51, 53, 77
- Theodore Roosevelt on 西奥多·罗斯福论, 186
- voting rights for 拥有的选举权, 79
-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57-58, 81, 122, 178, 270, 312, 328
- industrial freedom 工业自由, 141, 142, 179, 180, 186
-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 73
-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 世界产业工人协会, 164, 168, 169, 177
- inequality, economic 经济不平等, 118-23, 141, 144, 159, 187, 262, 326
-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民权与, 282-83, 285-87
- Depression as result of 作为大萧条的原因, 199
- freedom consistent with 与自由一致的, 1131 121-22, 139
- freedom inconsistent with 与自由不一致的, 125-28, 140, 204
- Great Society and “伟大社会”与, 284-86
- Reagan Revolution and 里根革命与, 322, 324, 326
- see also equality 又见: 平等
- Ingram, John K. 约翰·K. 英格拉姆, 125
- initiative, the (公民直接)立法动议权, 154, 186
- Institute for Philosophical Research 哲学研究所, 260
- insurance 保险:
- disability 残障保险, 201
- medical 医疗保险, 160, 200, 207, 257, 284, 304, 324
- Old age 老年保险, 160, 200, 201, 205-6, 207
- Unemployment 失业保险, 160, 200, 201, 205-6, 207
- see also Social Security 又见: 社会安全保障
- International Labor Defense 国际劳工保卫组织, 214
-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国际工人联合会(第一国际), 111
- Internazionale, L* 《国际》; 165
- Internet 因特网, 325, 330-32, 331
- Intolerable Acts (1774) 不可容忍法(1774年), 13
- Iowa 衣阿华:
- African-Americans barred from 非裔美国人被禁止进入, 76
- foreign languages banned in 外国语被禁止, 178
- Iran 伊朗, 254, 292
- Iran hostage crisis 伊朗人质危机, 317
- Irish-Americans 爱尔兰裔美国人, 77, 79, 169, 188, 189, 256
- Irish Potato Famine 爱尔兰白薯大饥荒, 77
- “iron curtain” speech (丘吉尔)“铁幕”演说, 252
- Islamic fundamentalists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 321

- Italian-Americans 意大利裔美国人, 130, 237, 239-30, 241
- Italy 意大利, 261
- in World War II 在二战期间, 240
- IWW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产业工人协会, 164, 168, 169, 177
- Jackson, Andrew 安德鲁·杰克逊, 18, 48, 53, 54, 63, 69
- abolitionist debate and 废奴主义者的辩论与, 85
- Jacob, John 约翰·雅各布, 322-23
- Jaffa, Harry 哈里·贾法, 313
- Japan 日本, 221, 227, 237, 241, 247
- Japanese-Americans 日裔美国人, 240-41
- Jay, John 约翰·杰伊, 33, 36
- Jefferson, Thomas 托马斯·杰斐逊, xv, 15-16, 57, 64, 76, 152, 170
- Alien and Sedition Acts opposed by 对惩治外治乱法的反对, 63
- on assimilation of Indians 论印第安人的同化, 78
-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ritten by 写作独立宣言, 20, 63, 124, 126
- on dependence 论独立, 9, 21
- on equality 论平等, 16
- Louisiana Purchase and 与路易斯安那购买, 50
- militias' references to (当代) 自卫民兵对杰斐逊的引用, 328
- on press 论新闻, 26
- racess compared by 对种族的比较, 40, 41
- on religious freedom 论宗教自由, 26
- on slavery 论奴隶制, 33, 40, 82
- slaves owned by 拥有的奴隶, 32
- on voting rights 论选举权, 72
- Jeffersonian Republicans 杰斐逊派共和党人, 42, 43-44
- Jehovah's Witnesses 耶和华见证会, 223
- Jennings, Samuel 塞缪尔·詹宁斯, 30, 37
- Jews 犹太人(教徒), 26, 214
- African-Americans' alliance with 与非裔美国人的联盟, 244
- in New Deal 在新政时期, 210
- in postwar era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时期, 268
- prejudice against 遭遇的偏见, 190, 244, 268
- in World War II 在二战中, 239
- John Birch Society 约翰·伯奇协会, 311
- Johnson, Andrew 安德鲁·约翰逊, 104, 107
- Johnson, Eric A. 埃里克·A. 约翰逊, 235
- Johnson, Lyndon B. 林登·B. 约翰逊, 280, 286, 290, 291, 292, 304, 307, 313, 315, 321
- Johnson, Samuel 塞缪尔·约翰逊, 32
- Jones, Joseph M. 约瑟夫·M. 琼斯, 252
- Jones, Lewis W. 路易斯·W. 琼斯, 255
- Jones, Mary "Mother" 玛丽·琼斯"母亲"142
- Joyce, James 詹姆斯·乔伊斯, 185
- Judeo-Christian heritage 犹太-基督教传统, 268
- Kallen, Horace 霍勒斯·卡伦, 152, 181, 189-90, 192, 213



- Kansas 堪萨斯, 123, 176  
     free press in 出版自由在, 184  
 Kartides, Rica 里卡·卡提德斯, 264  
 Kasson, John 约翰·卡森, 111  
 Kelley, Abby 阿比·凯利, 82, 298  
 Kelley, Florence 佛罗伦斯·凯利, 123, 124, 145-46, 148, 156, 180  
     on World War I 论第一次世界大战, 169  
 Kelley, William D. 威廉·D. 凯利, 105  
 Kendall, Amos 阿莫斯·肯德尔, 85  
 Kerman, George 乔治·凯南, 252, 253, 270  
 Kennedy, John F. 约翰·F. 肯尼迪, 260, 280, 290-91, 307, 320  
 Kent State University 肯特州立大学, 304  
 Kerr, Clark 克拉克·克尔, 264  
 Keynes, John Maynard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233  
 Khrushchev, Nikita 尼基塔·赫鲁晓夫, 271-73, 272  
 King, Martin Luther, Jr. 小马丁·路德·金, xxi, 279, 282, 283, 284, 298  
 King, Mary 玛丽·金, 298  
 King, Rufus 鲁弗斯·金, 42  
 Kirk, Russell 拉塞尔·柯克, 309, 311  
 "kitchen debate" "厨房辩论" 271-72, 272  
 Knights of Labor 劳工骑士团, 124, 126, 135, 144, 244  
 Knott, Walter 沃尔特·诺特, 312  
 Korea 朝鲜, 241  
 Korean War 朝鲜战争, 219, 253  
 Korematsu decision 维详案判决, 241  
 Kroeber, Alfred 阿菲尔德·克罗伯, 190  
 Ku Klux Klan 三 K 党, 112, 188, 190, 191  
 labor, transvaluation of 劳工价值转换, 67  
 "Laboring Classes, The" (Brownson) "劳动阶级"(布朗森著), 60  
 labor movement 劳工运动, 744, 111, 118, 121, 122, 124-30, 135, 142-45  
     African-Americans and 非裔美国人与, 142, 174, 214-15  
     anticommunism and 反共主义与, 257  
     in Cold War 在冷战中, 257, 263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集体签约与, 141, 142, 179, 200, 201, 263  
     in Depression 在大萧条时期, 198-99, 214-15, 216  
     immigration and 移民与, 176, 196  
     McCarthyism and 麦卡锡主义与, 256  
     open shops and 开放(即无工会)工场与, 179  
     in postwar era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时期, 256, 257, 263, 293, 316, 321  
     in Progressive era 在进步时代时期, 141  
     and right to organize 与组织(工会)的权利, 160, 164, 215  
     scholarly studies of (对劳工运动的)学术研究, 213  
     social insurance and 社会安全保障与, 257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and (众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与, 217  
     Vietnam War and 越南战争与, 293  
     women and 妇女与, 141  
     after World War I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 179-80  
in World War I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175, 187  
in World War II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229-30  
see also free labor; strikes; women workers; workers 又见: 自由劳(动)力; 妇女工人; 工人  
Labor Reform Party 劳工改革党, 66  
labor regulation 劳工管制, 120-23, 124, 157-58, 160, 180  
in Depression 在大萧条时期, 199, 200, 201, 205  
Freedom Train and 自由列车展览与, 250  
work-day limits 工作日限制, 160, 176, 201  
in World War II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239  
Laboulaye, Edouard de 爱德华·德·拉布莱, 115  
Laclos, Ernesto 欧内斯托·拉克罗, 329  
Lafayette, marquis de 拉法耶特侯爵, 47  
La Follette, Robert M., Jr. 小罗伯特·M. 拉福莱特, 215  
laissez-faire (free market) economics 自由市场经济学, 120-23, 127, 129, 130, 139, 152, 155, 159, 161, 236, 263  
in Depression 在大萧条时期, 201  
in postwar era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时期, 309, 310, 312, 317, 321, 323, 324, 326  
after World War I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180  
see also free enterprise 又见: 自由企业  
Lake Mohonk conferences 莫洪克湖研讨会, 135  
*Land of the Free* (MacLeish) 《自由者的土地》(麦克利什著), 197  
Lange, Dorothea 多萝西娅·兰格, 212  
languages 语言:  
English 英语, 329  
foreign 外国语, 178, 187-88, 191-92  
Lanier, Bob 鲍勃·拉尼尔, 316  
Lathrop, Julia 朱莉亚·莱恩罗普, 156  
Laurens, Henry 亨利·劳伦斯, 250  
Lawrence, D. H. D. H. 劳伦斯, 179  
Lawrence, Mass., strike (发生在)马萨诸塞州劳伦斯的罢工, 141-42  
Lazarus, Emma 埃玛·拉扎勒斯, 115  
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 工业民主联盟, 289, 291  
Leary, Timothy 蒂莫西·利里, 293  
Lee, Arthur 阿瑟·李, 33  
LeFevre, Robert 罗伯特·勒菲弗尔, 312  
*Left-wing Manifesto* (Gitlow) 《左翼宣言》(吉特洛著), 184  
Lend-Lease administration 租赁局, 242  
Lenin Train 列宁号列车, 252  
Leo XIII, Pope 教皇利奥十三世, 144  
Lerner, Max 马克斯·勒纳, 233-34  
*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 (King) 《写自伯明翰监狱的信》(小马丁·路德·金著), 279  
*Letter to the New Left* (Mills) 《给新左派的一封信》(米尔斯著), 270  
Levison, Stanley 斯坦利·利维森, 283  
Levitt, William 威廉·莱维特, 267  
Levittown, Penn. 宾夕法尼亚州的莱维特城,

- 267
- Lewelling, Lorenzo 洛伦佐·卢埃林, 127
- Liberal Imagination, The* (Trilling) 《自由主义的想像》(特里林著), 308
- liberalism, classical 古典自由主义, 8-9, 33, 120, 161, 308
- liberal reformers and 自由派改良家与, 119-20
- liberalism, twentieth-century 20 世纪自由主义, 246, 247, 259, 329
- in Depression 在大萧条时期, 211-12
- dominance of (占据的)主导地位 308
- flight from term 从(20 世纪自由主义)概念(原义)的逃离, 324
- Franklin Roosevelt's use of term 富兰克林·罗斯福(对自由主义)的运用, 201-4
- McCarthyism and 麦卡锡主义与, 256
- New Left's rejection of 新左派(对其)的否定, 287, 289
- new meaning of (该词具有的)新涵义, 161, 193
- in postwar era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时期, 263, 279, 287, 313
- white southern 南部白人(信奉的), 245
- in World War II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233, 234
-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The* (Hartz) 《美国的自由传统》(哈茨著), 262
- libertarianism 自由至上论, 自由至上主义, 309, 311, 313, 314, 317, 331
- Liberty as Goddess of Youth Feeding the American Eagle* (Savage) 《作为青年女神的自由在给美国鹰喂食》(萨维奇雕刻), 49
- Liberty Bell 独立钟(自由钟), 70, 89-90, 263
- sit-in at (在独立钟处举行的)入座抗议, 274, 278
- liberty cap 自由帽, 14, 93-34, 93
- Liberty Displaying the Arts and Sciences* (Jennings) 《自由展现艺术和科学》(詹宁斯绘), 30, 37
- Liberty Federation 自由联盟, 322
- Liberty Loans 自由贷款, 170
- Liberty Lobby 自由游说集团, 311
- Liberty Motors and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自由汽车和工程公司, 231
- Liberty Weekend 自由周末, 323
- Library Company of Philadelphia 费城图书馆公司, 30
- Lichtenstein, Nelson 内尔森·利希滕斯坦, 237
- Lieber, Francis 弗朗西斯·利伯, 52, 97, 98
- Life* 《生活月刊》, 225, 251, 253, 255, 265
- Lilienthal, David 戴维·利连索尔, 263, 264
- Lincoln, Abraham 亚伯拉罕·林肯, 67-68, 75, 162, 224, 332
- assassination of 被刺, 115
- on freedom 论自由, 97
- Gettysburg Address of (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 105, 213, 249
- habeas corpus suspended by (林肯下令)终止人身保护令, 99
- on slavery 论奴隶制, 90-91
- Lincoln, James 詹姆斯·林肯, 24
- Lippmann, Walter 沃尔特·李普曼, 148, 155, 160, 181-82, 201, 212, 253-54

- on World War I 论第一次世界大战, 169, 175, 178
- literacy tests 文字能力测试, 154
- Little Rock, Ark., crisis 阿肯色州小石城危机, 280
- Livermore, Mary 玛丽·利弗莫尔, 109
- living wage 生计工资, 144, 145, 160
- Living Wage, A* (Ryan) 《一份生计工资》(瑞安著), 144
- Lloyd, Henry Demarest 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 xv, 117, 139, 326
- Lochner v. New York* 洛克纳诉纽约案, 123, 157-58
- Locke, Alain 阿兰·洛克, 174
- Locke, John 约翰·洛克, 5, 20, 40, 59, 64
- Logan, Rayford 雷福特·洛根, 111, 245
- Lonely Crowd, The* (Riesman) 《孤独的人群》(里斯曼著), 270
- Long, Huey 休伊·朗, 200
- Long Telegram (1946) 长电报(1946年), 252, 253
- Look* 《观望》, 266
- Looking Backward* (Bellamy) 《回顾》(贝拉米著), 128, 129-30
- Los Angeles, Calif.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 164
- Los Angeles Herald-Examiner* 《洛杉矶—探索者报》, 300
- Louisiana Purchase 路易斯安那购买, 50, 53, 78
- Loyal Publication Society 忠诚出版协会, 169
- loyalty programs 忠诚计划, 178, 255, 256, 258, 310
- Luce, Henry 亨利·鲁斯, 232-33, 245-46
- Lundeen, Ernest 欧内斯特·伦丁, 207
- Lutherans 路德宗教徒, 26
- lynching 私刑, 172, 172, 173, 174, 179, 208, 209, 214, 242, 243
- Lynd, Helen 海伦·林德, 146, 196
- Lynd, Robert 罗伯特·林德, 146, 196, 246
- Lynn, Mass., shoemakers' strike 发生在马萨诸塞州林恩的制鞋工人罢工, 61
- McCain, Franklin 富兰克林·麦凯恩, 278
- McCall's* 《麦考尔》, 295-96
- McCarren Internal Security Act (1950) 麦卡伦国内安全法(1950年), 261
- McCarthy, Joseph 约瑟夫·麦卡锡, 255-56
- McCarthyism 麦卡锡主义, 25, 248, 255-57, 262, 268, 301, 308, 310, 311
- McClure's Magazine* 《麦克卢尔杂志》, 158
- Macdonald, Dwight 德怀特·麦克唐纳, 233, 257, 288
- McDuffie, George 乔治·麦克达菲, 64
- McIlvaine, Samuel 塞缪尔·麦基尔文, 95
- MacLeish, Archibald 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 197, 262
- McNeill, George 乔治·麦克尼尔, 126
- McRea, Ed 埃德·麦克雷, 215
- McWilliams, Carey 凯里·麦克威廉斯, 247
- Madison, James 詹姆斯·麦迪逊, 15, 17, 23-24, 183, 256, 268
- on abuses of liberty 论对自由的滥用, 22
- on African-American colonization 论将非裔美国人殖民海外, 40

- Alien and Sedition Acts opposed by 对恠外  
 治乱法的反对, 43  
 on constitutional debates 论制宪大会的辩  
 论, 35  
 on danger of propertyless 论无产者的威胁,  
 52  
 on equality 论自由, 21-22  
 on religious freedom 论宗教自由, 27  
 on small farmers 论小农场主, 21  
 Maine 缅因, 74  
 Maine, Sir Henry 亨利·梅因爵士, 120  
 Malcolm X 马尔科姆·艾克斯, 283-84, 298  
 Manent, Pierre 皮埃尔·马尼特, 8  
 manifest destiny 天定命运, 50, 51, 77  
 Manly, Basil 巴兹尔·曼利, 141  
*Man's Most Dangerous Myths: The Fallacy of  
 Race* (Montagu) 《人类最危险的迷思: 种族主  
 义的谬误》(蒙塔古著), 239  
 "Man Without a Country, The" (Hale) "一个没  
 有祖国的人"(海尔著), 98  
 March on Washington (1963) 向华盛顿进军运动  
 (1963年), 281, 282  
 March on Washington, proposed (1941) 策划的  
 向华盛顿进军运动(1941年), 242  
 Marcuse, Herbert 赫伯特·马尔库塞, 292, 293,  
 294  
 market revolution 市场革命, 48, 55, 57, 58, 59,  
 67  
 marriage 婚姻, 72, 137, 189  
     alternatives to (婚姻的) 交通方式, 83  
     divorce and 离婚与, 109, 303, 305  
     likened to slavery 与奴隶制的联系, 82-84,
- 109  
 privacy and 隐私权与, 302-3  
 rape and sexual submission in (婚姻关系中  
 的) 强奸与性屈从, 83-84, 111, 137, 167,  
 299, 303  
 of slaves 奴隶的, 110  
 Marshall, John 约翰·马歇尔, 78  
 Martin (preacher) 马丁(牧师), 44  
 Martin, Luther 路德·马丁, 36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111, 125-26, 151,  
 310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143, 211  
 Mason, George 乔治·梅森, 19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 13, 26  
     desegregation in 种族隔离在, 88  
     voting rights in 选举权在, 79  
 Masses 《群众》, 192  
 massive resistance 大规模抵制运动, 280  
 Mayflower Compact (1620) 五月花号公约(1620  
 年), 249  
 media 媒体, 293-94, 325  
 Medicaid 医疗补助(项目), 284, 304, 324  
 medical insurance 医疗保险, 160, 200, 207,  
 257, 284  
 Medicare 医疗保健(项目), 284, 304, 324  
 Meir, Golda 戈达尔·梅厄, 162  
 Melville, Herman 赫尔曼·梅尔维尔, 60  
 Mencken, H. L. H. L. 门肯, 154-55  
 Mennonites 门诺教徒, 26  
 Mexican-Americans 墨西哥裔美国人, 76, 78-79,  
 240, 243  
 Mexican immigrants 墨西哥移民, 189, 240

- Mexican War 美墨战争, 77, 98
- Mexico 墨西哥, 50, 53, 115
- Meyer, Frank S. 弗兰克·S. 迈耶, 311, 314
- Middle Ages 中世纪, 6
- Middletown* (Lynd and Lynd) 《中镇》(林德夫妇著), 146
- Middletown in Transition* (Lynd and Lynd) 《转型中的中镇》(林德夫妇著), 146
- military 军事力量, 军队 17, 97
- integration of (军队中的) 种族融合, 259
- spending on 军费开支, 324, 325
-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军事-工业复合体, 219
- militias (自卫) 民兵;
- in American Revolution 在美国革命中, 17
- right-wing 右翼(民兵组织), 328-29, 331
- Mill, John Stuart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xiv, 71, 82
- Miller, Perry 佩里·米勒, 260
- Mills, C. Wright C. 赖特·米尔斯, 269, 270, 288, 294
- Milton, John 约翰·弥尔顿, 5
- minimum wage laws 最低工资法, 158, 201, 205
- for women 针对妇女的, 180
- Minnesota 明尼苏达, 75, 178, 207
- free press in 出版自由在, 184
- Minor, Virginia 弗吉尼亚·迈纳, 112
- Miss American pageant 美国小姐选拔赛, 298
- Mississippi, voting rights in 选举权在密西西比州, 131, 154, 186
- Mitchell, John L. 约翰·L. 米切尔, 123, 145
- Montagu, Ashley 阿什利·蒙塔古, 239
- Montesquieu, Baron de La Brede et de 孟德斯鸠, 33
- Montgomery, Ala., bus boycott 阿拉巴马州蒙格马利市的公车抵制运动, 275, 276, 279
- moral (Christian) freedom 道德(基督教)自由, xvii-xviii, 3-5, 31-32, 57, 270, 310
- Moral Majority 道德大多数, 317, 322
- Moravians 莫拉维亚教会教徒, 26, 27-28
- Morgenthau, Hans J. 汉斯·J. 摩根索, 269
- Mormons 摩门教教徒, 83
- Moscow Trials 莫斯科审判, 212
- mothers' pensions 母亲劳保费, 157, 180
- movies 电影, 212
- Muller v Oregon* 马勒诉俄勒冈州案, 157, 180
- multiculturalism 多元文化主义, 329
- Mungo, Raymond 雷蒙·芒戈, 287
- Murphy, Frank 弗兰克·莫菲, 216-17
- Murray, Charles 查尔斯·默里, 329, 330
- Murray, James E. 詹姆斯·E. 默里, 234-35
- Museum of Modern Art 现代艺术博物馆, 238
- My Bondage and My Freedom* (Douglass) 《我的奴役和我的自由》(道格拉斯著), 89
- Myrdal, Gunnar 冈纳·缪尔达尔, xix, 246
- NAACP, se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见: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 NAACP v. *Alabama*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诉阿拉巴马州, 301
- NAM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全国制造业主协会) 缩写, 230

- Napoleon I, emperor of France 拿破伦一世(法国皇帝), 37
- Nash-Kelvinator Corporation 纳什-凯尔文脱公司, 230
- Nation, The* 《民族》杂志, 118, 119, 179, 233
- National 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 全美妇女选举权联合会, 136
- National Archives 国家档案馆, 250
-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173, 174, 186, 214
- in postwar era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时期, 258, 276
- in World War II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241, 244, 245
-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NAM) 全国制造业主协会, 230
- national bank 联邦银行, 42
- National Catholic Welfare Conference (1935) 全国天主教福利问题研讨会(1935年), 197
- National Catholic Welfare Council 全国天主教福利委员会, 191
-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ristians and Jews 全国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联合会, 214
- National Consumers' League 全国消费者联盟, 148
- National Guard 国民自卫队, 304
- 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 (1933) 全国工业复兴法(1933年), 199
-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37-45, 98
- National Negro Congress 全国黑人联合会, 258
-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NOW) 全国妇女组织, 296, 298
- 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 (NRPB) 国家资源计划委员会, 208, 233
- National Review* 《国家评论》, 310-11, 314
-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全国持枪者协会, 328
-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国家安全委员会, 253
- National War Labor Board 全国战时劳工委员会, 242-43
- National Women's Party 全国妇女党, 171, 180
- National Women's Rights Convention (1860) 全国妇女权利大会(1860年), 84
- 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 全国青年事务局, 229
- Nation of Islam 伊斯兰民族(黑人组织), 283-84
- nativists 土生居民保护主义者, 131, 191, 211
- NATO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253
- naturalization (移民)归化, 79, 108, 189
- Naturalization Act (1790) 移民归化法(1790年), 39
- naturalization law (1870) 移民归化法(1870年), 108
- natural rights 自然权利, 天赋人权, 4, 8, 12-13, 15, 32-33, 40, 64, 78, 86, 92-93, 109-10, 111, 144, 146, 153
- Nazism 纳粹主义, 223, 235, 236, 239, 240, 241, 243, 261-62, 269
- Nazi-Soviet Pact (1939) 纳粹德国-苏联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 212
- Nebraska 内不拉斯加, 191
- negative liberty 消极自由, 261, 270, 277
- neoconservatives 新保守主义者, 317

- Nevins, Allan 艾伦·内文思, 240
- New Deal 新政, 127-28, 158, 185, 195-218, 216, 247, 312, 313  
     critics of (新政的)批评者 204  
     legacy of (新政的)遗产, 257, 269, 285, 321, 325  
     proposed postwar expansion of 计划中的战后扩展, 234  
     Supreme Court and 最高法院与, 201, 205  
     World War II and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 229, 232, 233
- New Democracy, The* (Weyl) 《新民主》(维尔著), 186
- New England Magazine* 《新英格兰杂志》, 86
- New Freedom 新自由, 159, 160
- New Harmony community 新和谐公社, 62, 83
- New Jersey 新泽西, 42, 56  
     women's voting rights in 妇女选举权在, 71
- New Left 新左派, 276, 287-99, 305, 309
- New Mexico 新墨西哥, 79
- New Nationalism 新民族主义, 186
- New Negro, The* (Locke) 《新黑人》(洛克著), 174
- New Northwest, The* 《新西北》, 109
- New Republic* 《新共和》, 140, 141, 169, 178, 200, 233, 235, 250
-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社会研究新学院, 192
- Newsweek* 《新闻周刊》, 271
- New Woman 新妇女, 180
- New York (state) 纽约(州), 53, 217-18  
     free speech in 言论自由在, 184  
     voting rights in 选举权在, 74  
     women's rights in 妇女权利在, 82
- New York, N. Y. (纽约州) 纽约市, 59, 116, 117, 119
- New York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1821) 纽约州制宪大会(1821年), 74
- New York Court of Appeals 纽约州上诉法院, 123
- New York Herald* 《纽约号角报》, 71, 72
- New York Journal of Commerce* 《纽约商业日报》, 54-55
- New York State Committee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Housing 纽约州反住房歧视委员会, 259
- New York State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 纽约妇女选举权协会, 116
-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纽约证券交易所, 294
-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98, 205
- New York Times v. Sullivan* 《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 301
- Niagara movement 尼亚加拉运动, 173
- Nicaragua 尼加拉瓜, 321
- Niebuhr, Reinhold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 179
- Nineteenth Amendment 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 172
- Nitze, Paul 保罗·尼策, 253
- Nixon, Richard M. 理查德·M. 尼克松, 271-73, 272, 295, 298, 304, 307, 316
-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253
-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Jefferson) 《弗吉尼亚州记事》(杰斐逊著), 40
- NOW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全国妇



- 女组织, 296, 298
- NRPB (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 国家资源计划委员会, 208, 233
- NSC 68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68 号文件, 253, 257
- nuclear weapons 核武器, 313
- obscenity (Comstock) laws 反淫秽法(科姆斯托克法), 110, 111, 164, 166, 168, 184
- O'Connell, James 詹姆斯·奥康奈尔, 266
-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 战时新闻办公室, 220, 224, 226, 227, 229, 230-31, 237, 243
- Ogelsby, Carl 卡尔·奥格尔斯比, 292
- Ohio Supreme Court 俄亥俄州最高法院, 303
- Oklahoma City, Okla., bombing 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 328
- old age insurance 老年保险, 160, 200, 201, 205-6, 207
- see also* Social Security 又见: 社会安全保障
- Omaha Convention (1892) 奥马哈(平民党)代表大会(1892 年), 127
- One-Dimensional Man (Marcuse) 《单面人》(马库塞著), 292
- Oneida community 奥奈达公社, 62, 83
- O'Neill, John 约翰·奥尼尔, 143
- One World* (Willkie) 《大同世界》(威尔基著), 245
- On Liberty* (Mill) 《论自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著), xiv, 71
- open shop 开放工场(即不设工会的工场), 179
- Operation Dixie 迪克西战役, 257
- Oration on the Beauties of Liberty (Allen) 《论自由之美丽的演说》(艾伦著), 12
- Oregon 俄勒冈, 74
- African-Americans barred from 非裔美国人被禁止进入, 76
- education in 教育在, 187-88, 191
- Oregon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1857) 俄勒冈州制宪大会(1857 年), 74
- O'Reilly, Leonora 莉奥诺拉·奥赖利, 156
- Organization Man. *The* (Whyte) 《组织人》(怀特著), 270
- organize, right to 组织起来的权利, 160, 164, 215
- Oshinsky, David 戴维·奥辛斯基, 259
- O'Sullivan, John L. 约翰·L. 奥沙利文, 50
- Ota, Peter 皮特·太田, 241
- Other America, The* (Harrington) 《另一个美国》(哈林顿著), 285, 289, 309
- Otis, James 詹姆斯·奥底斯, 29-31
- Owen, Robert 罗伯特·欧文, 62, 83
- OWI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战时新闻办公室, 220, 224, 226, 227, 228, 229, 230-31, 237, 243
- Packard, Vance 万斯·帕卡特, 270
- Paine, Thomas 托马斯·潘恩, 15, 16, 18, 22, 31, 64, 177, 320, 332
- Parents* 《家长杂志》, 239
- Paris Peace Agreement (1973) 巴黎和平协议(1973 年), 304
- Paris Peace Conference (1919) 巴黎和会(1919

- 年), 174
- Parkman, Francis 弗朗西斯·帕克曼, 77
- Parks, Rosa 罗莎·帕克斯, 275, 276
- Parliament, British 英国议会, 25-26, 29-31
-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The* (Grant) 《伟大种族的消逝》(格兰特著), 187
- Paterson, N.J., silk strike 新泽西州帕特森市的丝织产业罢工, 142
- patriotic assimilation 爱国主义式的同化, 236-41
- patriotism 爱国主义, 134, 187
- in World War I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169, 170, 175
- Patten, Simon W. 西蒙·W. 巴顿, 133, 151
- Patterson, M. C. M. C. 帕特森, 271
- Paul, Alice 爱丽丝·保罗, 171-72, 180, 318
- Pearl Harbor attack 袭击珍珠港事件, 221, 227, 200
-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 18, 26, 53-54, 76
- voting rights in 选举权在, 74
- Pennsylvania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1837) 宾夕法尼亚州制宪大会(1837年), 75
- Pennsylvania Magazine* 《宾夕法尼亚杂志》, 14
- People's Party, *see* Populists 人民党, 见: 平民党人
- People's Program (1944) 人民计划(1944年), 234
- Perkins, Frances 弗朗西丝·珀金斯, 156, 197, 206, 207, 211
- personifications of freedom 自由的人格化, 46, 47-48, 49, 55
- petition, right to 请愿权, 85, 86
- Phantom Public, The* (Lippmann) 《有名无实的公众》(李普曼著), 181
- Philadelphia, Pa. (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117
- Philippines 菲律宾, 134, 178
- Phillips, David 戴维·菲利普斯, 144
- Phillips, Wendell 温德尔·菲利普斯, 66, 84, 97
- Piccirilli, Attilio 阿蒂利奥·皮卡西里里, 194
- Piercy, Marge 玛吉·皮尔西, 298
- Piggly Wiggly 皮格利·威格利, 147-48, 151
- Pike, James 詹姆斯·派克, 2
- Pinckney, Charles Cotesworth 查尔斯·科茨沃斯·平克尼, 36
- Pittsburgh Courier* 《匹兹堡信使报》, 207, 243
- Playboy* 《花花公子》, 294
- Pledge of Allegiance 效忠宣誓, 134, 268
- Plessy, Homer 荷马·普雷西, 132
- Plessy v. Ferguson* 普雷西诉弗格森案, 132-33
- Plow That Broke the Plains, The* 《划破大平原的犁》, 212
- pluralism 多元主义, 190-91, 210, 211-13, 268, 269, 309, 329
- promoted in World War II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以推动 236-41
- PM* (PM)杂志, 244
- Poincaré, Arthur 阿瑟·波伊尼尔, 238
- Pole, J. R. J. R. 波尔, xix
- Pollock, Jackson 约翰·波洛克, 260
- poll taxes (投票时征收的)人头税, 243, 302
- Pol Pot 波尔布特, 321
- poor 贫穷:
- deserving vs. undeserving 值得救济和不值得救济的(穷人), 121
- voting rights of 贫困者的投票权, 154

- see also property, voting rights and 又见:财产,选举权与财产
- women's work with 妇女的工作与, 155-56
- Popular Front 人民阵线, 212-18, 232, 238, 239, 200, 256
- Populists 平民党人, 127-28, 130, 143, 204
- pornography 淫秽出版物, 317
- Port Huron Statement (1962) 休伦港宣言(1962年), 289-90, 291, 298-99 309
- positive liberty 积极自由, 261, 277
- Postal Service, U.S. 联邦邮政总局, 177
- Potter, David 戴维·波特, 265
- Potter, Paul 保罗·波特, 291-92
- Powderly, Terence V. 特伦斯·V. 鲍德利, 124
- Presbyterians 长老会, 26
- Prescott, Walter H. 沃尔特·H. 普雷斯科特, 77
-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Recent Social Trends 总统近期社会动向委员会, 265
- press, freedom of 出版自由, 25, 26, 43, 301
- abolitionism and 废奴主义(运动)与, 86
- in interwar period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184-85
- in World War I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177, 183
- Price, Richard 理查德·普莱斯, 9, 32
- "Price of Free World Victory, The" (Wallace) "自由世界的代价"(华莱士著), 232
- Priestley, Joseph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 6
- primogeniture 长嗣继承权, 21
- privacy, right to 隐私权, 267, 302-3
- privilege 特权, 6, 16-17, 20, 64
- "Problem of Man's Freedom, The" "人类自由的问题", 308
- Progress and Poverty (George) 《进步与贫困》(乔治著), 128
- Progressive Movement, The (DeWitt) 《进步运动》(德怀特著), 140
- Progressives 进步主义者, 127-28, 140-61, 164, 181, 183, 192, 269, 289
- democracy and 民主与, 140, 154, 155, 159, 183, 185, 187, 189
- governmental power and 政府权力与, 152-61, 182-83, 196
- immigration and 移民与, 185
- race as viewed by (进步主义者的)种族观, 185
- Theodore Roosevelt and 西奥多·罗斯福与, 160-61, 186
- World War I and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 168-70, 176-77, 178
- prohibition 禁酒运动, 183
- propaganda 宣传, 169-70, 171
- property 财产, 11, 102
- abolition of (对财产的)取消, 62, 83
- equal distribution of (财产的)平等分配, 62
- as essential to freedom 作为自由的根本, 9, 20-21, 32, 41, 62, 113, 143
- freedom without 没有财产的自由, 113
- one's person as (作为财产的)自我人身, 83
- protection of (财产的)保护, 33
- segregation and 种族隔离与, 267
- slavery and 奴隶制与, 35, 95, 104
- voting rights and 选举权与, 6, 9, 17, 18.

- 39, 51-52, 63-64, 74, 119
- women as (作为财产的)妇女, 109, 111
- Proposition 14 (加利福尼亚州)第 14 号立法动议, 315
- prostitution 娼妓业, 144
- Protestant-Catholic-Jew* (Herberg)《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人》(赫伯格著), 268-68
- Protestantism 新教, 5, 26, 77, 268
- Public Opinion* (Lippmann)《舆论》(李普曼著), 181
- Puerto Rico 波多黎哥, 134
- Pullman Company 普尔曼公司, 126
- Pullman strike 普尔曼大罢工, 130
- Pure Food and Drug Act (1906) 纯净食品药品法 (1906 年), 152
- Puritans 清教徒, 4
- Pyntz, Juliet Stuart 朱丽叶·斯图尔特·派恩茨, 180
- Quakers 教友会教徒, 26
- Quartering Act (1765) 营房法, 13
- Quincy, Edmund 埃德蒙·昆西, 88
- race 种族, 38, 131-32, 188, 189, 329-30
- academic view of (关于种族的)学术观点, 238
- Anglo-Saxon defined as 盎格鲁-撒克逊被定义为(种族), 77
- Depression and 大萧条与, 196
- Progressives' views on 进步主义者(对种族)的看法, 185
- Races and Racism* (Benedict)《种族与种族主义》(本尼迪克特著), 239
- Radical Republicans 激进共和党人, 105, 107, 113
- radio, Franklin Roosevelt's use of 富兰克林·罗斯福对无线电收音机的使用, 201,
- railroads 铁路, 116-17, 127
- regulation of (对铁路的)管制, 159
- segregation on (铁路上的)种族隔离, 132
- Ramsay, David 戴维·拉姆什, 31, 35
- Randolph, A. Philip 菲利普·A. 伦道夫, 215, 242, 245, 282-83
- Randolph, Edmund 埃德蒙·伦道夫, 39
- Rapp-Coudert Committee 拉普-库代尔委员会, 217-18
- Rauh, Joseph L. 约瑟夫·L. 劳, 242
- Rauschenbusch, Walter 沃尔德·劳申布什, 130
- Reader's Digest*《读者文摘》, 236
- Reagan, Ronald 罗纳德·里根, 239, 315 319, 320-24, 327-28
- Real Estate Association 房地产商协会, 315
- Reason, Charles L. 查理·L. 里森, 88
- recall, the 罢免(议员), 154
- Reconstruction 重建, 102-12, 119, 124, 188
- amendments in (宪法)修正案在, 104, 107, 113
- opposition to (对重建的)反对, 107
- retreat from (从重建)退却, 131
- women and 妇女与, 108-12
- Red Cross 红十字会, 243
- Red Scare of 1919-20 1919-20 年间的“恐红”运

- 动, 25, 177
- Redstockings 红丝袜组织, 299
- Reed, John 约翰·里德, 166
- Reedy, William M. 威廉·M. 里迪, 166
- Reese, James 詹姆斯·里日, 174
- referendum, the 公决(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立法), 154, 186
- Reformation (欧洲)宗教革命, 58, 67
- Regulators 课税调节者, 7
- Reisman, David 戴维·里斯曼, 216
- relativism 相对论, 309
- religion 宗教, 55-57, 58
- education and 教育与, 188, 191
- in postwar era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时期, 268-69
- revivals and 宗教复兴与, 57
- slavery defended by (宗教)对奴隶制的辩护, 64
- religion, freedom of 宗教自由, 25, 26-27, 214, 302, 332
- in Four Freedoms 在四大自由中, 223, 227
- voting rights and 选举权与, 18
- religious conservatives 宗教保守派, 317, 323
- Remond, Sarah Parker 塞拉·帕克·雷蒙德, 83-84
-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7
- republicanism 共和主义, 7-9, 23, 288
- Republicans 共和党人, 65, 92, 98, 100-104, 111, 119
- anticommunism of (共和党人的)反共主义, 313
- in Depression 在大萧条时期, 204-5, 214, 218
- Franklin Roosevelt's defeat of 被富兰克林·罗斯福击败, 195
- McCarthyism and 麦卡锡主义与, 256
- nineteenth-century domination of 在19世纪(对联邦政府)的主导, 151
- in postwar era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时期, 320, 324, 329
- Radical (重建时期的)激进派(共和党人), 105, 107, 111, 113
- Southern strategy of 南部战略, 314
- in World War II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229, 230
- Republicans, Jeffersonian 杰斐逊式的共和党人, 42, 43-44
- Rerum Novarum* (Leo XIII) 教皇通谕(利奥十三世), 144
- restrictive covenants 限制性协定, 267
- Revere, Paul 保罗·里维尔, 14, 213
- Revolution for the Hell of It* (Hoffman) 《为革命而革命》(霍夫曼著), 294
- Rhode Island 罗得岛, 26
- Richmond, Va., slave plot (弗吉尼亚)里士满奴隶起义预谋, 44
- Richmond Enquirer* 《里士满绅士报》, 65
- Riesman, David 戴维·里斯曼, 242, 270, 275, 325
- Road to Serfdom, The* (Hayek) 《通向奴役之路》(哈耶克著), 235
- "Road to Victory" "通向胜利之路", 238
- Robertson, Pat 帕特·罗伯逊, 322
- Roberson, Paul 保罗·罗伯逊, 214, 250, 258

- Robinson, Earl 厄尔·罗宾逊, 213-14
- Robinson, Harriet Hanson 哈里雅特·汉森·鲁宾逊, 80
- Rock, John S. 约翰·S. 罗克, 97
- Rockwell, Norman 诺曼·罗克韦尔, 225-27, 226, 239
- Rodel, Peter 彼得·罗德尔, 62
- Roe v. Wade 罗诉韦德案, 303, 319
- Rogers, Edith N. 伊迪斯·N. 罗杰斯, 230
- Roosevelt, Eleanor 埃莉诺·罗斯福, 208
- Roosevelt, Franklin D. 富兰克林·D. 罗斯福, 195, 196, 200-202, 207, 212, 213, 256, 320, 321  
in elections 在选举中, 197, 201, 204, 205, 234, 247, 311  
Four Freedoms of (提出的)四大自由, 221-33, 237, 239, 243, 245, 247, 250, 262  
in World War II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221-22, 234, 237, 241-42, 245
- Roosevelt, Theodore 西奥多·罗斯福, 116, 155, 158, 160, 187  
racial views of 种族观, 186
- Rose, Ernestine 欧内斯廷·罗斯, 82
- Rossiter, Clinton 克林顿·罗西特, 310
- Rousseau, Jean-Jacques 卢梭, 15, 170
- Royal Navy, impressment into 被强制充编进皇家海军, 6, 10
- Royal typewriters 罗伊尔打字机公司, 230
- Rush, Benjamin 本杰明·拉什, 24, 33
- Russian-Americans 俄裔美国人, 78, 130-31
- Russian Revolution (俄国)十月革命, 175, 184, 187
- Rustin, Bayard 贝亚德·拉斯廷, 282-83, 287, 291
- Rutgers University 拉特格斯大学, 255
- Ryan, John A. 约翰·A. 瑞安, 144, 152, 158, 196
- Sage, Russell 拉塞尔·塞奇, 139
- Saint-Domingue slave revolution 圣多明各奴隶革命, 44
- salvation, spiritual 灵魂的拯救, 4-5
- San Diego, Calif. (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 165
- San Francisco, Calif. (加利福尼亚)旧金山, 166
- Sanger, Margaret 玛格丽特·桑格, 167-68
- Saturday Evening Post 《星期六晚间邮报》, 151, 227
- Savage, Edward 爱德华·萨维奇, 49
- Savio, Mario 马里奥·萨维奥, 290
- Schapiro, Meyer 迈耶·夏皮罗, 260
- Schenck, Charles T. 查尔斯·T. 申克, 183, 184
- Schlafly Phyllis 菲利斯·施拉夫利, 318
- Schlesinger, Arthur, Jr. 小阿瑟·施莱辛格, 261, 269
- school prayer 学校祈祷仪式, 302, 317
- Schorr, Daniel 丹尼尔·肖尔, 320
- Schroeder, Theodore 西奥多·施罗德, 163
- Schurz, Carl 卡尔·舒尔茨, 100, 106, 119
- scientific management 科学管理, 142-43, 179-80
- Scottsboro Case 斯格茨博诺案件, 214
- Screen Actors Guild 屏幕演员工会, 320
- SDS *see*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见: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

- S. D. Warren S.D. 沃伦, 323
- seals, official 官印, 55, 56
- Second Great Awakening 第二次大觉醒运动, 55-57, 84
- Sedition Act (1798) 治乱法(1789年), 43, 177, 301
- Sedition Act (1918) 治乱法(1918年), 177, 183
- segregation 种族隔离, 132-33, 135, 172, 186, 208, 240, 241, 743-44, 245, 258, 276, 280-81  
conservative views on 保守派(关于种族隔离)的观点, 314-15  
in education 在教育中, 88, 258-59, 280, 314, 315  
Freedom Train and 自由列车展览与, 250  
in housing 在住房中, 174, 209, 210, 258, 259, 266-67, 315  
in public accommodations 在公共设施的使用中, 278  
in transportation 在交通中, 132, 275  
Wilson's imposition of 威尔逊强制实施(种族隔离), 186
- self-help 自助, 135
- Selma, Ala. (阿拉巴马州)塞尔马, 280
- Seneca 塞涅卡, 4
- Seneca Falls Convention (1848) 塞尼卡·福尔斯大会(1848年), 81, 108
- seniority systems 工龄资深制, 200
- "separate but equal" doctrine "隔离但平等"原则, 133
- separatism, African-American 非裔美国人的分离主义, 284
- servants 佣工, 佣人, 10-11  
domestic 家庭的, 18  
indentured 契约, 10, 19
- 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 贫民救济社运动, 155, 160, 186
- Sex and the Single Girl* (Brown) 《性与单身女郎》(布朗著), 294
- sexism 性歧视, 299
- Sex Side of Life, The* (Dennett) 《生活中的性》(丹尼特著), 184
- sex slavery 性别奴隶制, 48, 81-84
- sexual liberation 性解放, 109-10, 166-67, 180-81, 293, 294, 298, 305, 317, 318, 319
- sexual politics 性政治, 299
- Seymour, Horatio 霍雷肖·西摩, 98
- Shahn, Ben 本·谢安, 216
- Shakers 震颠派教徒, 83
- sharecropping 分租式农业制, 126, 208-9
- Share-Our-Wealth movement "分享我们的财富"运动, 200
- Sharon Statement (1960) 沙伦宣言, 312
- Shays' Rebellion 谢斯反叛, 23
- Sheppard-Towner Act (1921) 谢泼德-汤纳法(1921年), 180
- Sherman, William T. 威廉·T. 谢尔曼, 102
- Siegfried, Andre 安德烈·西格弗里德, 151
- Silent Spring* (Carson) 《沉默的春天》(卡森著), 288-89
- Simmons, Isaac 艾萨克·西蒙斯, 243
- Simpson, Stephen 斯蒂芬·辛普森, 62
- Sinatra, Frank 弗兰克·西纳特拉, 240
- Sioux, Lakota 那克达苏(部落), 51
- Sisterhood Is Powerful* (Densmore) 《姐妹关系是

- 强有力的》(登斯莫尔著), 299
- Sitting Bull 西廷·布尔, 51
- Skidmore, Thomas 托马斯·斯基德莫尔, 62
- Slaughter-House cases* 屠宰场案, 122
- slaveholding, freedom compatible with 自由与拥有奴隶的相称, 6, 11, 31-37, 63-65
- slavery 奴隶制, 奴役, xvi, 10, 19, 35, 41, 69-71, 77, 95, 104
- Civil War and 内战与, 95-108
- as Cold War metaphor 作为冷战的隐喻, 253, 254, 255
- Constitution and 宪法与, 35-36, 38, 87
- economic growth and 经济增长与, 65
- France and 法国与, 37
- Jefferson on 杰斐逊与, 40
- Lafayette on 拉法耶特与, 47
- male authority destroyed by 对男性权威的破坏, 84
- marriage likened to 与之相连的婚姻, 82-84, 109
- metaphorical meanings of 其包含的隐喻内涵, 29-31, 48, 58, 142; *see also* wage slavery 又见: 工资奴隶制
- Otis on 奥底斯论, 29-31
- sex 性别(奴隶制), 48, 81-84
- westward movement of (奴隶制的) 西进运动 63, 76, 90; *see also* abolitionism 又见: 废奴主义
- slaves 奴隶,
- citizenship denied to 不能拥有公民地位和资格, 38-39
- emancipation of 解放, 35, 37, 76, 99, 103-4, 120, 124
- female, physical violation of 对女性(奴隶)的身体侵犯, 83
- language of freedom among (奴隶中的) 自由语言, 33-35, 44-45, 101
- marriage of 婚姻, 110
- rebellions of 反抗活动, 44
- slave trade, abolition of 奴隶贸易的废除, 36
-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32-33, 64, 65, 151
- Smith, John 约翰·史密斯, 10
- Smith Act, (1940) 史密斯法(1940年), 217, 256, 301
- SNCC, *se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见: 学生非暴力联络委员会
- Social Action 社会行动, 215
- Social Darwinism 社会达尔文主义, 121, 124, 129, 139, 140
-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Life* (Hofstadter) 《美国生活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霍夫斯塔特著), 325-26
- socialists 社会主义者, 82-83, 141, 143, 151, 168, 178, 179, 188
- in Depression 在大萧条时期, 211
- in elections of 1912 在 1912 年的选举中, 158-59
- free speech sought by 寻求言论自由, 164
- utopian 乌托邦式, 62
- after World War I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180
- World War I and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 169, 177, 179
- Social Security 社会安全保障, 201, 205-6, 209,



- 210, 229, 233, 257, 312, 313, 324
- Social Security Act (1935) 社会安全保障法, 206, 207
- "Solitude of Self, The" (Stanton) "自我的孤独" (斯坦顿著), 81
- Somerset 桑门塞特案, 36
- Somoza, Anastasio 阿拉斯塔修·萨莫扎, 321
- Sons and Daughters of Liberty 自由之子女(组织), 12
- Soule, George 乔治·索尔, 200
- Souls of Black Folks, The* (Du Bois) 《黑人的灵魂》(杜波伊斯著), 132
- South Africa 南非, 254, 292, 321
-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来纳, 34, 36, 63-64  
voting rights in 选举权在, 74
-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uncil 南部基督教领导联合会, 283
- Southern Conference for Human Welfare 南部人类福利同盟, 214, 258
- Southern Tenant Farmers Union 南部租佃农场主工会, 215
- Soviet Union 苏联, 211, 256, 311  
Cold War and 冷战与, 252-61  
collapse of (的)崩溃, 324  
as totalitarian 作为极权政体的, 261
- Spain 西班牙, 50, 78, 254, 255
- Spanish-Americans 西班牙裔美国人, 78
- Spanish-American War 美西战争, 134
- Sparkman, John 约翰·斯帕克曼, 259
- speech, freedom of 言论自由, 25, 26, 27, 43, 187, 301  
abolitionism and 废奴主义与, 86  
in Civil War 在冷战中, 98  
corporate use of 大公司的运用, 325  
in Depression 在大萧条时期, 215, 216  
first effective enforcement of 首次有效的实施, 163-66, 168  
in Four Freedoms 在"四大自由"中, 223, 226-27  
on Internet 因特网上的, 325  
Supreme Court on 最高法院论, 183-85, 216, 301  
in World War I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177, 178, 183
- Spencer, Herbert 赫伯特·斯宾塞, 121
- Spokane, Wash. (华盛顿州) 斯波坎, 164-65
- Stalin, Joseph 约瑟夫·斯大林, 211, 235
- Stamp Act (1765) 印花税法(1765年), 13, 34
- Standard Oil Company 标准石油公司, 117
- Stanton, Elizabeth Cady 伊莉莎白·卡迪·斯坦顿, 81, 84, 108, 110, 145
- "Star-Spangled Banner, The" "星条旗永不落" 134
- State Department, U.S. (美国) 国务院, 290
- states' rights 州权, 54, 87, 95, 99, 107, 152, 159, 180
- "Statue of Freedom" "自由塑像", 93-94, 93
- Statue of Liberty 自由女神塑像, 114 115-16, 148, 162, 216, 263, 297, 315  
centennial of 一百周年的纪念, 250, 322-23, 323  
in political cartoons 在政治漫画中, 165, 172  
in World War I propaganda 在第一次世界大

- 战的宣传中, 170, 171
- steel industry 钢铁工业, 176
- steel strike of 1919-20 1919-20 年的钢铁工人罢工, 176
- Steel Workers' Organizing Committee 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 199
- Stegner, Wallace 华莱士·斯特格纳, 50
- Stephens, Alexander H. 亚历山大·H. 斯蒂芬斯, 95
- Stevens, Thaddeus 撒迪厄斯·史蒂文斯, 113
- Stevenson, Adlai 阿德莱·斯蒂文森, 259
- Stewart, William 威廉·斯图亚特, 104
- Stone, Lucy 露西·斯通, 82, 84
- Straus, Samuel 塞缪尔·斯特劳斯, 151
- Stride Toward Freedom* (King) 《为自由而斗争》(小马丁·路德·金著), 279
- strikes 罢工, 124, 130, 141-42
- in Depression 在大萧条时期, 202, 215
- right to 罢工权, 164
- after World War I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175-76
- in World War II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243
-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NCC) 学生非暴力联络委员会, 277, 278, 283, 284, 285, 288, 290, 291, 298
- student protests 学生抗议运动, 287-92, 304
-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 289, 290, 291, 292, 304, 312
- suburbia 城郊, 265-67, 270, 295
- Summer of Love 性爱夏天, 294
- Sumner, Charles 查尔斯·萨姆纳, 99, 106, 108, 111-12
- Sumner, William Graham 威廉·格莱姆·萨姆纳, 121, 139
- Supreme Court, U.S. 联邦最高法院, 142, 191-92
- on abortion rights 论堕胎权, 303, 319
- African-American lawyer admitted before 接受非裔美国人律师, 97
- on African-Americans' rights 论非裔美国人权利, 75
- Bill of Rights incorporated by 将权利法案的纳入, 163-64, 184, 301-2
- on defendants' rights 论被起诉人的权利, 214
- on education 论教育, 191
- on freedom of association 论结社自由, 301
- on free speech 论言论自由, 183-85, 216, 301
- on immigration 论移民问题, 133, 189
- on Japanese internment 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日裔美国人的囚禁, 241
- on labor 论劳工, 122, 123
- on labor regulation 论劳工管制, 157, 180
- in McCarthy era 在麦卡锡时代, 256
- New Deal and 新政与, 201, 205
- on religious freedom 论宗教自由, 223, 302
- rights revolution and 权利革命与, 300-304
- on segregation 论种族隔离, 132, 258-59, 267, 280, 320
- on voting rights 论选举权, 243, 302
- women and 妇女与, 112

- Taft, Robert 罗伯特·塔夫脱, 204-5, 241
- Taft, William Howard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134, 158
- Taft-Hartley Act (1947) 塔夫脱-哈特利法 (1947年), 257
- Taney, Roger B. 罗杰·B. 坦尼, 75
- Tarkington, Booth 布斯·塔金顿, 227
- "Tartarus of Maids, The" (Melville) 《女仆的地狱》(梅尔维尔著), 60
- taxation 税收:
- conservative views on 保守派的观点, 312, 313, 320, 321-22, 324
  - in Depression 在大萧条时期, 200, 201, 206
  - in postwar expansion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扩展, 264
  - representation and 代表权与, 13, 29-31
  - single tax 单税(制), 128
  - voting rights and 选举权与, 18
- Taylor, Frederick W. 弗雷德里克·W. 泰勒, 143
- temperance 禁酒运动, 58, 72
- Tennessee 田纳西, 53
- territorial expansion 领土扩张, 48, 50-52, 75-79
- Test and Corporation Acts 测试和组合法, 26
- Texas 得克萨斯, 77
- Thatcher, Peter 皮特·萨切尔, 45
- theater, in New Deal 新政时期的戏剧(界), 212
- Thind, Bhagat Singh 巴各特·辛·辛德, 189
- Thirteenth Amendment 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 104, 111, 124, 250
- This Is the Army* 《这就是军队》, 239
- Thompson, Dorothy 多萝西·汤普森, 204
- Thurmond, Strom 斯特罗姆·瑟蒙德, 314
- Tilton, Elizabeth 伊莉莎白·蒂尔顿, 110
- Time* 《时代》, 212, 322
- Tocqueville, Alexis de 阿历克塞·托克维尔, 48, 52, 57
- To Secure These Rights* 《保障这些权利》, 258, 266-67
-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 261, 270, 291, 317
- Townsend, Francis 弗朗西斯·汤森, 200
- Townsend, Willard S. 威拉德·S. 汤森, 247
- Townshend Act (1767) 汤森法(1767年), 13
- "Trans-National America" (Bourne) "超越国界的美国"(伯恩尼著), 190
- Treitschke, Heinrich von 海因里希·冯·特雷奇克, 98
- trial by jury 陪审团审判(制度), 13
- Trilling, Lionel 莱昂内尔·特里林, 308
- Trotter, William Monroe 威廉·门罗·特罗特, 173, 186
- Truman, Harry S. 哈里·S. 杜鲁门, 234, 247, 249, 250, 252, 258, 290
- civil rights and 民权与, 257, 258
- Truman Doctrine 杜鲁门主义, 252-54, 255, 259, 262, 311
- Trumbull, Lyman 莱曼·特朗布尔, 104
- trusts 托拉斯, 148, 160
- Tucker, George 乔治·塔克, 44
- Tugwell, Rexford 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 151
- Turkey 土耳其, 252, 254
- Turner, Frederick Jackson 弗里德雷克·杰克逊·特纳, 137
- Turner, Nat 纳特·特纳, 89

- Twain, Mark 马克·吐温, 117
- Tweed Ring 特威德伙帮, 119
-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Berlin) "关于自由  
的两个概念"(柏林著), xiv, 261
- UE News* 《UE 新闻》, 294
- Ulysses* (Joyce) 《尤利西斯》(乔伊斯著), 185
-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U. 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  
委员会, 217
- unemployment insurance 失业保障, 160, 200,  
201, 205-6, 207
- Union Leagues 联邦同盟, 169
- United Auto Workers 汽车工人联合工会, 207,  
231
- United Electrical Workers 钢铁工人联合工会,  
294
- United Labor Party 联合劳工党, 116
- United Mine Workers 煤矿工人联合工会, 145
- United Textile Workers 纺织工人联合工会, 175
- Upham, T. C. T. C. 厄珀姆, 239
- Urban League 都市联盟, 258, 322
- Utah 犹他, 123
- utilities, regulation of 公共设施的管制, 159
- utopian socialists 乌托邦社会主义者, 62
- Vandenberg, Arthur 阿瑟·范登堡, 253
- Vesey, Denmark 登马克·维西, 89
-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退伍军人事务局, 210
- Vietnam, French in 法国人在越南, 254
- Vietnam War 越南战争, 97, 219, 287, 291  
protests against (反对越战的) 抗议活动,  
290, 291-92, 304
-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Wollstone-  
craft) 《女权辩护》(沃斯通拉克夫特著), 41-42
- Virginia 弗吉尼亚, 19, 21, 27  
colonial charter of 殖民地宪章, 12  
Constitution ratified by 批准联邦宪法, 35  
freedmen barred from 禁止获得自由的黑人  
进入, 44  
land and slave given to veterans in 将土地和  
奴隶授予(本州的)退伍军人, 32  
voting rights in 选举权在, 74
- Virginia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1829) 弗吉  
尼亚州制宪大会(1829年), 52
- Virginia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1867) 弗吉  
尼亚州制宪大会(1867年), 103
- Virginia Declaration of Rights (1776) 弗吉尼亚  
权利宣言(1776年), 19
- Vital Center, The* (Schlesinger) 《核心》(施莱辛  
格著), 269
-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当代重要演说》, 271
- voter turnout 选民参与人数, 151, 328
- voting rights 选举权, 17-18, 67, 80, 152, 302  
for American Indians 印第安人的, 79  
for Asian-Americans 亚裔美国人的, 79  
citizenship and 公民资格与, 53, 112  
educational requirements for 受教育程度与,  
136  
for eighteen-year-olds 十八周岁成年人的,  
97  
for immigrants 移民的, 136, 154

- property restrictions on (选举权的)财产限制, 6, 9, 17, 18, 39, 51-52, 63-64, 74, 119
- taxpaying and 缴纳税收与, 18
- for women 妇女的, 17-18, 71, 80, 81, 97, 108, 109, 111, 112, 136, 138, 146, 151
- see also* African-American voting rights; women's suffrage 又见:非裔美国人的选举权;妇女权利
- Voting Rights Act (1965) 选举权法(1965年), 282, 284
- wage slavery 工资奴隶制, 60, 61, 62, 66-67, 68, 81, 85, 121, 124, 125, 128, 143, 144, 176, 199, 200, 202
- Wagner, Robert 罗伯特·瓦格纳, 235
- Wagner Act (1935) 瓦格纳法(1935年), 199, 201, 216, 250
- Waite, Morrison 莫里森·韦特, 112
- Walker, Francis Amasa 弗朗西斯·阿玛撒·沃克尔, 131
- Wallace, George 乔治·华莱士, 315
- Wallace, Henry 亨利·华莱士, 232-35, 254
- Walsh, Mike 迈克·沃尔什, 60
- want, freedom from 免于匮乏的自由, 223, 225, 227, 262, 285-86
- War Advertising Council 战时广告委员会, 230
- Ward, Lester 莱斯特·沃德, 130
- War Industries Board 战时工业委员会, 169
- War Labor Board 战时劳工委员会, 169
- Warren, Earl 厄尔·沃伦, 300, 303
- Warren, Samuel D. 塞缪尔·D. 沃伦, 302
- Warren Court 沃伦法院, 317
- Washington, Booker T. 布克尔·T. 华盛顿, 135, 136
- Washington, D.C.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 180
- march on (1963) 进军(1963年), 281, 282
- proposed march on (1941) 提出的进军计划(1941年), 242
- Washington, George 乔治·华盛顿, 34, 42, 47
- Watts riot (1965) 沃茨骚乱, 282
- WCTU (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 妇女基督教禁酒联合会, 110-11
- Wealth Against Commonwealth* (Lloyd) 《财富挑战国家》(劳埃德著), 117, 139
- Weaver, James B. 詹姆斯·韦弗, 133
- Weaver, Richard 理查德·韦弗, 309
- Weber, Max 马克斯·韦伯, 140
- Webster, Daniel 丹尼尔·韦伯斯特, 99
- Webster, Noah 诺厄·韦伯斯特, 20, 53, 60
- welfare state 福利国家, 312, 313, 324; *see also* New Deal 又见:新政
- Welles, Sumner 萨姆纳·韦尔斯, 227
- Wells, David A. 戴维·A. 韦尔斯, 120
- Wells, H. G. H. G. 韦尔斯, 140
- Wells, Ida B. 艾达·B. 韦尔斯, 132
- West 西部, 50-52, 63, 75-79 92
- West Virginia Supreme Court 西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 123
- Weyl, Walter E. 沃尔特·E. 维尔, 141, 154, 186
- "What Every Girl Should Know" "姑娘须知" 167-68

"What Freedom Means to Us" (Nixon) "自由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尼克松著), 271

*What Social Classes Owe to Each Other* (Sumner) 《社会各阶级究竟谁欠谁》(萨姆纳著), 122

*What the Negro Wants* (Logan, ed.) 《黑人想要什么》(洛根编著), 245, 247

Wheatley, Phillis 菲莉斯·惠特利, 35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King) 《我们从此走向何方?》(小马丁·路德·金著), 283

Whigs 辉格党人, 53, 54, 65-16

*While You Were Gone* 《在你们离去的日子里》, 247

Whiskey Rebellion 威士忌反叛, 42

White, Horace 霍勒斯·怀特, 119, 120

White, John 约翰·怀特, 178

White, Theodore 西奥多·怀特, 307

White, Walter 沃尔特·怀特, 245

white slavery 白人奴隶制, 144

Whitman, Walt 沃尔特·惠特曼, 209

Whitney, Anita 阿妮塔·惠特尼, 185

Whittier, John Greenleaf 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 85

Whyte, William 威廉·怀特, 270

Willard, Frances 弗朗西丝·威拉德, 110

Willkie, Wendell 温德尔·威尔基, 245

Willoughby, William F. 威廉·F. 威洛比, 153

Wilson, Edmund 埃德蒙·威尔逊, 314

Wilson, Henry 亨利·威尔逊, 105

Wilson, James 詹姆斯·威尔逊, 11

Wilson, Woodrow 伍得罗·威尔逊, 142, 158, 159, 160, 237

on African-Americans 论非裔美国人, 132

segregation implemented by 执行种族隔离措施, 186

on women's suffrage 论妇女选举权, 171

World War I and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 169, 174, 775, 177

Winthrop, John 约翰·温斯罗普, 4, 293, 310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威斯康星大学, 192

*Wizard of Oz, The* 《绿野仙踪》, 316

Wollstonecraft, Mary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41-42, 82

Wolper, David 戴维·沃尔珀, 322

*Woman Rebel, The* 《妇女叛逆者》, 168

*Woman's Journal* 《妇女日报》, 110

Women 妇女:

Abigail Adams on status of 阿比盖尔·亚当斯论妇女地位, 16

Bellamy on 贝拉米论妇女, 129

in civil rights movement 在民权运动中, 296-98

consumerism and 消费主义与, 147, 181

dependence ascribed to "天生的"依赖性, 10, 11

domestic violence against 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 109, 110

as immigrants 作为移民, 191

inferiority ascribed to "天生的"低贱, 71, 72

in "kitchen debate" 在"厨房辩论"中, 272

labor movement and 劳工运动与, 144

legal status of 法律地位, 41

maximum working hours for 最多工作小时, 157-158

minimum wage for 最低工资, 180

- moral superiority ascribed to 天生的道德优越性, 84
- New Deal and 新政与, 206-7
-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denied to 政治参与遭到剥夺, 41
-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政治参与, 72, 82
- as property 作为财产, 109, 111
- in Reconstruction 在重建中, 108-12
- sexual abuse of (对妇女的)性欺辱,
- on job 在工作中的, 125
- sexual liberation and 性解放与, 166, 180-81
- sexual submission resisted by (妇女对)性屈从的抗拒, 83-84, 111, 137, 167, 299, 303
- Social Security and 社会保障与, 206
- unpaid labor of 未付工资的(妇女)劳动, 109
- voting rights for (妇女的)选举权, 17-18, 71, 80, 81, 97, 108, 109, 111, 112, 136, 138, 146, 151
- 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 (WCTU)  
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 110-11
- Women's Party 妇女党, 318
- women's rights movement 妇女权利运动, 80-84  
108-12, 296-98, 297, 303, 304-5
- abortion rights and 堕胎权与, 299, 303, 304, 317, 318-19, 323
- ERA and 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与, 180, 318
- women's role and 妇女的角色与, 304-5
- see also feminism 又见, 女权主义
- women's suffrage 妇女选举权, 156, 171, 298
- amendment for 宪法修正案, 154, 172, 18
- coalition for (争取妇女选举权力量的)联合, 155
- in elections of 1912 在 1912 年选举中, 160
- women's movement after (取得选举权后的)妇女运动, 180
- World War I and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 171-72
- women workers 妇女工人, 72-74, 80, 109, 125, 126, 129, 145, 146, 157, 167
- equal pay for (女工的)同等工资, 109, 145, 294
- increase in 增加, 305, 319
- industrial home work and 工业化的家庭工作与, 320
- in postwar era 在战后时期, 265-66, 305
- in World War II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230-31
- Wood, Gordon 戈登·伍德, 6, 67
- Woodhull, Victoria 维多利亚·伍德霍尔, 109-10
- work-day limits 工作日限制, 160, 176, 201
- workers 工人, 9, 19, 58-68, 191, 239, 244, 258, 259
- African-Americans as (作为工人的)非裔美国人, 126, 174, 186, 242-44, 282
- agricultural 农业工人, 206, 207, 257
- children as 童工, 155, 157, 180
- in Depression 在大萧条时期, 200
- domestic 家庭佣工, 10, 206, 207, 257
- entrepreneurs and managers valued more than 企业主和管理者被当成比工人更有价值的阶层, 118-19
- in Gilded Age 在镀金时代, 117-23
- guaranteed employment and 有保障的就业

- 与, 234-35
- minimum wage for 最低工资, 158, 180, 201, 205
- wage slavery and 工资奴隶制与, 60, 61, 62, 66-67, 68, 81, 85, 121, 124, 125, 128, 143, 144, 176, 199, 200, 202
- work-day limits for 工作日限制, 160, 176, 201
- see also free labor; labor movement; women workers 又见: 自由劳力; 劳工运动; 妇女工人
- Workingman's Advocate* 《工人权利倡导者报》, 74
- Workingmen's Party 工人党, 62
- workmen's compensation 工人的赔偿补助, 158, 159
-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WPA) 公共工程建设局, 194, 197, 212, 229
-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战, 97, 99, 157, 168-78, 183, 256
- civil liberties in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 公民自由, 177-79
- democracy in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 民主, 170, 171, 173, 174, 175
- governmental powers in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 政府权力, 169
- pluralism promoted in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 推动的多元主义, 236-41
- propaganda in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 宣传, 169-70, 171
- veterans of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老兵, 197
-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 219-47, 220, 228
- African-Americans in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 非裔美国人, 173, 240-47
- labor movement in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 劳工运动, 229-30
- Wounded Knee, S. Dak. (南达科达州) 翁迪德尼, 304
- WPA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公共工程建设局, 194, 197, 212, 229
- Wright, Frances 弗朗西丝·赖特, 80, 82
- Wright, Henry C. 亨利·C. 赖特, 83
- YAF (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 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 306, 312, 314
- Yiddish theater 意第绪语剧院, 213
- 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 (YAF) 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 306, 312, 314
- Young Communist League 青年共产主义联盟, 213
- Zenger, John Peter 约翰·皮特·曾格, 9, 26
- Zoot Suit riots (1943), 祖特·休特骚乱(1943年), 243



## 附录 方纳：一个并非神话的故事 (代译者的话)

《美国自由的故事》的作者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1969年,年仅26岁的方纳以一部研究美国内战起因的博士论文一鸣惊人,在美国历史学界崭露头角。此后,他勤奋耕耘,孜孜不倦,出版了八部主要著作,编辑出版了五部论文集、史料集和参考书,为美国内战、重建、黑人史、美国政治文化传统等领域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多部专著以观点独到、史料扎实、文笔精美而成为美国史研究的经典著作。在公共史学领域内,方纳同样也是才华横溢、成就斐然。他筹划和撰文的大型历史展览以新美国史观重新解释了美国历史的重大问题,引起了全国性的轰动。在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中,他独树一帜,从左翼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出发,以历史学家的严谨和清醒,通过大量的报刊文章和电视评论,冷静而客观地评说美国的历史和政治。在众多的美国历史学家中,方纳也是为数不多的同时具有国内和国际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和英国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曾在世界许多著名大学——包括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莫斯科大学、希伯来大学等——担任美国史讲座教授,并被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推举为最受尊敬的“伟大的教师”。1993和2000年,方纳分别当选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AH)和美国历史学会(AHA)的主席。这两个美国史学界最大专业组织的主席职位一向由史学界公认的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来担任,而能够在一生中同时担任两组织主席的人屈指可数;方纳的当选说明美国史学界对他在学术研究、教学和社会影响方

面的巨大成就予以了最高形式的承认。方纳在 30 年里取得的成就,与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才华和精力一样,时常被历史学界视为一个不可重复的神话故事。但是,方纳的学术生涯并非一个神话故事,而是一个天赋与勤奋、继承与发展、批判与创造之间完美结合的故事。这个故事有着一个不同寻常的开始。

# 一

方纳于 1943 年出生在纽约市一个犹太裔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一位中学美术教师,父亲杰克·方纳(Jack Foner)和叔父菲力普·方纳(Philip S. Foner)都是历史学家。这个历史世家同时也是一个“老左派”家庭,曾遭受过长期的政治和经济迫害。20 世纪 40 年代初,方纳的父亲和叔父因反对西班牙法西斯政权和支持美国工运,受到纽约州、市政府的审查,因他们拒绝向调查委员会作证,被扣上共产党人的帽子,与纽约市立大学其他 60 多名教授一起被列入黑名单,强迫离职,并不准在大学任教。但即便在政治迫害最残酷的麦卡锡时代,他们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继续在工会夜校和民权运动训练班教书,并与包括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内的其他左翼学者一起,开始了发掘和整理美国黑人和工运历史的工作(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成为了新美国史学的组成部分)。<sup>①</sup>直到 60 年代民权运动之后,两人才得以重返大学讲坛。

---

① 杰克·方纳(1910—1999)的主要著作包括:Jack Foner, *United States Soldier between Two Wars: Army Life and Reforms, 1865—1898*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70); *Blacks and the Military in American History: a New Perspective* (New York: Praeger, 1974)。菲力普·方纳(1910—1994)的代表著作包括:Philip S. Foner, *History of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7—);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Frederick Douglass* (1950—55); *A History of Cuba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1962); *The Spanish-Cuban-American War and the Birth of American Imperialism, 1895—1902* (1972); *History of Black American* (1975); *Blacks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976); *American Socialism and Black Americans: from the Age of Jackson to World War II* (1977); *The Great Labor Uprising of 1877* (1977); *Women and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Eve of World War* (1979); *Racism, Dissent, and Asian Americans from 1850 to the Present: a Documentary History* (with Daniel Rosenberg, 1993)。

1981年,纽约市政府才正式公开向受迫害者道歉,使这桩长达40年的政治迫害案终于了结。<sup>①</sup>1994年1月,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年会上,方纳在发表主席演讲之前,特别介绍了他的父母;全场上千名历史学家起立,长时间地鼓掌致意,场面甚为感人。方纳并提到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当年他父亲被迫离开纽约市立大学的市立学院后,接替空缺的不是别人,正是后来成为美国史学界“共识”学派的棋手,两度获得普利策史学著作奖的理查德·霍夫斯达特(Richard Hofstadter)。<sup>②</sup>霍夫斯达特后来被誉为“我们时代最优雅和最富有人文素质的历史智慧”[历史学家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语],但当时他还名不见经传,正在为稻粮谋。更巧合的是,20多年后,方纳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霍夫斯达特是他的学士和博士论文导师;又过了20多年,霍夫斯达特生前拥有的、代表哥大历史系最高学术荣誉的德威特·克林顿讲座教授的头衔由方纳继承至今。

特殊的家庭背景和父辈的经历,使方纳从小就受到一种与主流教育界相悖的美国史教育。方纳后来回忆说,他从父亲那里知道了一大批被正规历史教科书过滤掉的美国历史事件、思想和人物,学会了如何通过历史来认知现实。<sup>③</sup>这种特殊的历史启蒙教育将使方纳终生受益,但当他1959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时,研究历史并不是他的第一志愿。他当时对天文学兴趣盎然,想成

① Eric Foner, "My Life as a Historian," in *Historians and Race*, ed. Paul A. Cimbala and Robert F. Himmelber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92; "Jack D. Foner, 88, Historian and Pioneer in Black Studie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6, 1999.

② 霍夫斯达特(1916—1970)最有影响的著作包括: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944);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1948);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 (1955, 获1956年普利策奖); *Great Issues in American History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Civil War, 1765—1865* (1958);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1962, 获1964年普利策奖);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 (1968); *The Idea of A Party System: the Rise of Legitimate Oppos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780—1840* (1969). 关于霍夫斯达特学术成就的详细介绍,见:Stanley Elkins and Eric McKittrick, "Richard Hofstadter: a Progress", in *The Hofstadter Aegis: a Memorial*, ed. Stanley Elkins and Eric McKittrick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4), 300—336.

③ Foner, "My Life as a Historian," 95; 王希,“近30年美国史学的新变化——埃里克·方纳教授访谈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第71—72页。

为一个天文物理学家,直到大学三年级时,才改为攻读历史。促使他改弦易辙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哥大著名教授申顿(James Shenton)的美国内战史研究课,二是方兴未艾的民权运动。申顿教授对历史研究的激情深深地感染了方纳,重新点燃了自幼受父辈影响而产生的对历史的兴趣。民权运动对美国社会种族压迫的揭露以及黑人群众为追求权利平等所表现出来的不屈精神,促使他加入到同代的众多历史学家中间,重新审视影响黑白种族关系发展的历史因素,并重新检讨美国政治和思想传统中那些理所当然的内容。方纳的学士论文——一篇关于19世纪中叶纽约州“自由土地党人”(Free Soilers)的意识形态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他的研究发现“自由土地党人”在内战前的反对奴隶制斗争具有相当程度的保守成分,他们反奴隶制不是为了解放黑人,而是害怕一旦奴隶制蔓延到全国,奴隶劳动力将对北部的白人劳工形成威胁,损害后者在市场资本主义秩序中通过自由竞争获取成功的机会。1965年,这篇得到霍夫斯达特指导的论文在《纽约史期刊》上发表,成为了方纳丰富多彩的学术生涯的起点。此刻,他刚20岁出头。<sup>①</sup>

## 二

1963年,方纳从哥伦比亚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本科部)毕业,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在那里,他得到著名内战史和重建史专家内文思(Allen Nevins)的指导,并在史学研究基本功、知识面和写作等方面接受了严格的培训,为日后高质量的多产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两年后,他回到哥大历史系,在霍夫斯达特的指导下,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此刻,民权运动已经进入高潮,种族歧视从法律上遭到彻底否定,女权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等此起彼伏,传统的主流价值观和政治权势面临极大的挑战。方纳认为,60年代的政治对他那一代美国知识分子的影响非常大,

---

<sup>①</sup> Eric Foner, "Racial Attitudes of the New York Free Soilers," *New York History*, XLVI (October 1965): 311-29.

民权运动所暴露的种族压迫和保守势力对民权运动的坚决抵制和极端仇视,彻底动摇了传统史学所构建的美国价值的“共识”基础,揭示了为“自由”、“平等”和“民主”口号所掩饰的一大堆不自由、不平等和不民主的美国历史和现实。<sup>①</sup>到底什么是美国历史的本质?什么是美国政治的本质?奴隶制早在100多年以前就废除了,但为什么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尤其对美国黑人来说),美国不但不是自由的,而且还时时刻刻充满了残酷的政治暴力和经济暴力?真正的美国精神是什么?这个国家还是不是一个以自由和民主为目标的国家?带着这些问题,方纳将目光投向了对美国历史发展具有关键转折意义的美国内战问题,尤其是关于内战起因问题的讨论。

内战起因是美国史学界的一个经典题目,一向存有争议。当时主要的争议表现在进步学派(Progressive School)和修正学派(Revisionist School)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上。进步学派认为,内战是因相互对立的南北区域经济体制之间的冲突导致的,北部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南部的奴隶制经济在经济利益上势不两立,必然走向对立。<sup>②</sup>修正学派则强调,内战的起因在于南北政客滥用政党政治和选举机制,导致协调区域经济体制和利益冲突的宪政机制失效,

---

① 所谓“共识”(consensus)史观,指的是在20世纪40至7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美国史学思想,领军人物正是方纳的导师霍夫斯达特。“共识”史学家认为,以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和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等人为旗帜的进步主义史观,夸大了美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冲突,忽视了美国历史上各个不同利益集团在根本利益和核心价值观方面的“和谐一致”,他们认为,美国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美国特色的核心价值观,并以自己的特殊历史经历,铸造了为所有美国人欣赏的同一的民族性格。1948年,在他的重要著作《美国政治传统》中,霍夫斯达特曾指出,虽然历史上不同的美国人群体在利益上有冲突和矛盾,但所有利益集团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不同种类的政治运动和这些运动的领袖人物所强调的核心价值观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都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欣赏、对个人权利重要性的重视、对个人自主的尊崇和对宪政民主的维护,而这些构成了美国思想和美国政治的核心价值。霍夫斯达特的这种看法后来被认为是“共识”学派的理论基础(尽管霍夫斯达特本人从来不以“共识”学派领袖自居)。参阅:Richard Hofstadt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1948); *Great Issues in American History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Civil War, 1765-1865* (1958)。同时参见:John Higham, “The Cult of the ‘American Consensus’: Homogenizing Our History,” *Commentary*, XXVII (Feb., 1959), 93-100。

② 最具影响的代表性观点见:Charles A. Beard and Mary R. Beard,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2 vols., 1927)。

南北妥协失败,因而引起内战。<sup>①</sup>方纳认为,进步学派的经济体制冲突观不足以解释内战不可避免的问题,因为宪政机制曾经成功地解决了先前的区域经济利益冲突,修正学派则否认了内战前所有政治讨论的道德意义,简单地将内战起因归咎于宪政秩序的失误。他认为,两者都程度不同地忽视了奴隶制与内战的关系,都未能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以林肯为代表的北部共和党人能够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将北部各种分散的政治力量组织起来,以反对奴隶制无限制扩张的竞选纲领,赢得1860年的总统大选(林肯的当选成为南部退出联邦的借口,从而使内战爆发)。方纳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探讨隐藏在南北经济体制和政治冲突背后的“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个“意识形态”,实际上指的是一种“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ousness),一个同时包括了“信仰、价值观、恐惧、偏见、反思和意愿的(思想)体系”。<sup>②</sup>于是,内战前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就成为了方纳的博士论文题目。

1969年,在霍夫斯达特的指导下,方纳在阅读和研究了上百部共和党领袖人物的手稿档案、数百种内战时期的历史资料以及数百种现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一部两卷本的博士论文。次年,论文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就是后来使方纳一举成名《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内战前共和党的意

---

① 关于修正学派的观点,参阅:Avery Craven, *The Repressible Conflict, 1830-1861* (Baton Rouge, 1939);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 (1942); James G. Randall, *Lincoln the President, Springfield to Gettysburg* (2 vols., 1945)。

② 方纳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分别受到历史学家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和乔丹(Winthrop Jordan)的影响。吉诺维斯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南部奴隶制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作了非常透彻的分析。乔丹的研究则强调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对美国种族主义产生的作用。尽管方纳承认老一代左派历史学家[如赫伯特·阿普特克(Herbert Aptheker)等]对他认识“意识形态”也有影响,但他使用的“意识形态”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有区别的。在方纳接触到新社会史学的成果后,他对“意识形态”的认识更进一步远离教条主义式的意识形态定义。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4-5; Foner, “My Life as a Historian,” 98; Gary Murrell, “On Herbert Aptheker and His Side of History: an Interview with Eric Foner,” *Radical History Review* (Fall 2000), 9。吉诺维斯和乔丹的观点见,Eugene Genoves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lavery: Studies in the Economy & Society of the Slave South* (1961); Roll, Jordan, Roll, *the World that Slaves Made* (1974); Winthrop D. Jordan, *White over Black: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the Negro, 1550-1812* (1968)。

识形态》(以下简称《自由土地》)。<sup>①</sup>

《自由土地》对美国内战前夕共和党的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形成过程进行仔细清楚的梳理。方纳发现,共和党是由北部的废奴主义者、自由土地党人、辉格党人、前民主党人和土生居民保护主义者等不同的政治力量组成,这些政治力量有着不同的政治诉求,所以共和党的意识形态中同时包含了多种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意识”成分:对南部奴隶制社会的批判和对黑人种族的鄙视,对市场资本主义的信心和对具有竞争性的移民和奴隶劳动力的仇视,对奴隶主势力篡夺联邦权力阴谋的恐惧和对至高无上的联邦主义的推崇,对平等公民权的追求和对天主教徒和有色种族的排斥等。这些“意识”成分早在内战之前就存在,并与南北经济体制的不同有密切关系,但因19世纪50年代以前的政党政治故意排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南北的对立被限制在区域利益的讨价还价层次上。19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双方在西部领土建州、关税和逃奴等问题上的冲突加剧,原先被压抑的“意识形态”冲突开始上升,南北之间每一宪政问题之争都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对国家政治基础和立宪原则的定义之争;现实政治的恐惧感转化了共和党人对奴隶制和南北冲突的认识,将反对奴隶制扩张的斗争看成一场捍卫美国立宪和立国原则的斗争,原先分散的政治目标和意志在“自由劳动”(free labor)思想的联结下,形成了一个新的强大的共和党意识形态,其核心是强调人拥有自身、并有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权利。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为北部政治力量的重组提供了一个范围广泛的“道德共识”,从而使得不同诉求的共和党人能够团结起来,以维护自由和捍卫联邦原则为名,坚决抵制南部奴隶制在未建州的联邦领土上的蔓延扩展,将区域之间的经济利益之争转化成为一场决定国家政治性质的斗争。当经济利益之争被转化成自由与奴役制度之争时,南北之间不再具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内战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sup>②</sup>

《自由土地》给史学界带来的冲击是震撼性的,方纳引入“意识形态”的分

① Eric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reprint, 1995).

②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304, 310—17.

析概念,揭示了内战发生的深层原因,表现了“意识形态”对社会和政治运动所具有的强大的反作用力。当时的内战研究已经走入了一种狭隘的经济和体制研究的死胡同,思想的作用和角色完全被忽视了,《自由土地》“逆流而行”,重新恢复了意识形态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自由土地》同时令人信服地阐述和论证了奴隶制是内战的首要原因这一观点,推翻了修正学派关于内战是一场不必要的、可以避免的战争的结论,也将进步学派的经济体制之争提高到一个具有深刻的道德和政治涵义的层次。简言之,方纳的研究重新定义了内战的性质:内战是自由与奴役、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之间的较量,是一场决定美国未来的斗争,而北部的胜利本身说明了美国政治的根本原则必须是自由,而不是奴役。

令史学界尤为震撼的是,这部在史料深度和广度上足令资深历史学家叹为观止、观点清晰新颖、论述周密流畅、语言铿锵有力、气势磅礴浩荡的著作竟然出自一位年仅27岁的青年人之手。《自由土地》是方纳一生中带给史学界的众多“惊奇”中的第一个。《自由土地》的写作和研究风格也将成为他后来作品的标志和特征。方纳始终认为,在史学研究和写作上,是霍夫斯达特教给了他一种“高品质的史学风格”,因为霍夫斯达特始终要求他最大限度地追求最优秀的研究成果,要求他准确而优雅地把握和表现思想和史实的流动。<sup>①</sup>

《自由土地》代表了年轻方纳的一种学术雄心:他要揭示一种不同于“共识”学派所强调的美国思想和政治传统的新东西,他希望通过揭示内战前共和党人的意识形态,来强调和恢复“自由”(尤其是劳动者的自由)和“平等”(所有人在人权上的平等)在美国政治传统中的中心位置。方纳的这种雄心和努力反映了受到民权运动时代洗礼的新一代美国历史学者对美国政治的传统和未来的思考。尽管如此,在史学思想和史学风格上,《自由土地》仍然带有明显的霍夫斯达特影响的痕迹。方纳仍旧将“意识形态”看成是一种单一性的、为北部社会共享的社会集体意识,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其中可能包含的更为复杂的成分,尤其没有考虑到“自由劳动”思想本身的内在矛盾,以及被其掩饰的不同

<sup>①</sup> 王希,“近30年美国史学的新变化——埃里克·方纳教授访谈录”,72。



种类的“自由劳动力”(如工资劳动力和独立的小有产者劳动力)之间的紧张关系。<sup>①</sup>此外,他的研究主体仍然是北部共和党人的领袖人物,他关注的仍然是这些政治精英的世界观及其差别,虽然他对黑人废奴主义者、女权和劳工的思想有所讨论,但这些并没有成为他研究的重点。但这一切很快将因为他与新社会史学的接触得到改变。事实上,几年之后,在他讨论内战起因的论文中,方纳已经开始对北部的“自由劳动”意识形态作更为冷静的评价。他认为,内战的确是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转折,但林肯和共和党人想要捍卫的是一个以自食其力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共和政治,而南部奴隶主势力则力图永久性地维护他们在南部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优势,两者都不具备“建设一个以全国性市场为基础的并为一个工业资产阶级完全控制的现代集权性全民国家”的政治远见,南北双方都为捍卫自己笃信的美国观而战,但内战却粉碎了两者想维护的美国理想。<sup>②</sup>

### 三

《自由土地》出版的那一年,方纳被哥大历史系破格留用。这种做法在美

---

① 方纳后来认为,共和党人意识形态之所以得到北方社会的支持,其微妙之处在于,它将奴隶制看成是威胁北部自由劳工的权利和利益的原因,而没有指出资本主义内部本身的内在逻辑对工人权利和利益的威胁。所以在“自由劳动”的概念之下,两种劳动力——作为小生产者的劳工和作为自愿进入工资合同的工资劳工——始终并存,两者对自由的享有和认识是不同的。林肯对北方社会的捍卫实际上掩盖了北部社会的内部分歧。当林肯把争取控制自己劳动和享有自己劳动成果的愿望和努力看成一种人类的天性时,他实际上将那些在市场资本主义经济中不能独立的人排除在“自由劳动”之外;而在内战前夕,独立的小有产者队伍逐渐萎缩,工资劳动力队伍逐渐扩大,北部工资劳动力人数已经超过了南部的奴隶人口。方纳指出,工资劳动力的出现和体制化直接剥夺了工人的控制自己“劳动”的权力,因为劳动契约强调的不是工人的经济自主权,而是注重契约双方的“自愿权”,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工资劳动力实际上处在与南部奴隶相似的经济无权的地位,并因此而导致政治上的无权。所以,共和党人在内战前的意识形态包含了严重的内在矛盾,并始终成为共和党在内战和重建时期改革的制约因素。Eric Foner, “The Idea of Free Labor in Nineteen-Century America,” in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1995), xi—x.

② Eric Foner, “The Causes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Recent Interpretations and New Directions,” in *Civil War History*, XX (Sept. 1974), 197—214, reprinted in Eric Foner,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the Age of the Civil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15—33.

国大学中极为少见,足见母校对他的器重。留校后,方纳率先开出了哥大 200 多年历史上的第一门美国黑人史课。这在当时是需要有些勇气的,除了要面临传统史学的挑战外,还要面对来自黑人学生的“抗议”(因为他们要求大学必须雇用黑人教授来教黑人史)。方纳面对了这场后来被他称之为“火的洗礼”(baptism by fire)考验,不仅顶住压力,完成了教学,而且利用这个机会编写了两部重要的黑人史读本,开始继续他父辈那一代人的工作,将黑人史逐渐地介绍到主流历史研究和教学中来。<sup>①</sup>1972—73 年,方纳第二次前往英国,开始一项关于美国激进主义传统的研究。此刻,新社会史学在英国史学界方兴未艾,历史学的研究重心从传统的精英政治转向到底层社会,从纯粹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研究转向到对社会结构、政治文化、社会行为和群体关系的研究,种族、社会性别、社会结构、文化和阶级一起成为主要的分析概念。这种转型后来也成为新美国史学的特征。当时,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等人的研究尤其给方纳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使他开始关注新社会史学的成果和发展。<sup>②</sup>

1973 年从英国回来后,方纳到纽约市立大学的市立学院任教,同时任市立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当时的市立大学是美国新劳工史和黑人史研究的重镇之一,领衔人物是著名历史学家赫伯特·戈特曼(Herbert Gutman)。戈特曼不仅是美国新劳工史的创始人之一,而且在黑人史、奴隶制研究、社会史和政治文化史方面也成就显著,对新美国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巨大。<sup>③</sup>对于刚刚感受了汤普森影响的方纳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更为理想的学术环境。若干年后,方纳回忆说,汤普森、戈特曼等人对英美新劳工史的研究帮助他重新认识

---

① Eric Foner, ed. *America's Black Past: A Reader in Afro-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Foner, comp. *Nat Turner* (Prentice-Hall, 1971); Foner, "My Life as a Historian," 98—100.

② 爱德华·汤普森(1924—1993)是英国著名左派历史学家,新劳工史学的创始人,最著名的代表作作为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

③ 赫伯特·戈特曼(1928—1985),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在美国劳工史、奴隶制史和黑人史研究方面有重要的影响,代表性著作包括: *Work, Culture 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izing America: Essays in American Working-Class and Social History* (1975); *Black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 1790—1925* (1976)。

了“意识形态”的涵义,使他看到了意识形态包含的丰富的内容和文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同时也学会了历史学家应该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语言表象后面的社会思想。<sup>①</sup>在新社会史学的影响下,方纳开始摆脱传统的“意识形态”的研究模式,将注意力转移到被传统史学忽略的工人阶级普通成员(而不只是工运领袖)的历史、普通黑人的历史等方面,并在研究中将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他在1976年出版的《汤姆·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以下简称《潘恩》)表现了方纳在史学研究和写作上的这种转变。<sup>②</sup>

潘恩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重要政治文献《常识》的作者,《常识》对美国革命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杰斐逊的《独立宣言》,但传统史学却把来自英国下层社会、后来又坚决支持法国大革命中的激进派的潘恩排除在美国“建国之父”的行列之外。现存的潘恩研究中,没有一本完整地表现了潘恩思想的精髓及其与欧洲政治思想的联系,更没有深入地分析《常识》与美国革命和美国政治传统的关系。方纳决心要恢复潘恩在美国政治传统中的位置,写一部潘恩思想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一部关于“思想探索和政治传播的社会史”。<sup>③</sup>在《潘恩》中,方纳详细勾画了潘恩思想的发展,着重讨论了他的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以及这些背景如何影响了他对共和主义、平等、人权和自由资本主义等问题的认识。方纳认为,潘恩对美国革命做出了两个独特的贡献:他彻底否定了英国宪政,提出了建立共和政体的思想,使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同时成为创造新共和国的斗争;与此同时,潘恩创造了一种美国革命的政治语言,其中将欧洲的启蒙思想与北美殖民地中下层人民要求政治权力的愿望结合起来,对于鼓动下层社会(尤其是工匠阶层)参加独立战争起了重要作用,并为独立后的美国政治社会走向民主奠定了思想基础。方纳在《潘恩》中使用了大量篇幅来讨论潘恩的政治语言与当时费城等地工匠阶层的政治诉求之间的关系。远在“语言转向”成为当前史学研究的一种时尚之前,他已经开始注意政治语言

① 王希,“近30年美国史学的新变化——埃里克·方纳教授访谈录”,75。

② Eric Foner, *Tom Paine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③ Foner, *Tom Paine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 xiv.

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在思想提炼过程中的作用。方纳认为,《常识》的成功在于“人与时间、作者与他的听众之间的完美结合”。<sup>①</sup>

从表面上看,《潘恩》仍然是一部关于“精英”意识形态的研究,但与《自由土地》相比,它明显地开始注重思想的社会化过程和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它尤其强调社会底层对美国革命思想的贡献,并指出了美国革命思想来源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在这里,方纳开始提出了他在《美国自由的故事》中将全面发挥的一个观点,即不同的社会群体对同一政治思想或口号的认知是不同的。但《潘恩》与《自由土地》在史学思想的追求上是一致的:两者都在力图发掘和强调一种以民主和平等为基础的美国政治传统,一种与只是强调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绝对推崇和对个人权利(尤其是有产者的权利)的绝对尊重的传统不同的美国政治传统。显然,方纳希望通过《潘恩》,重新解释美国政治传统的起源,展现美国政治传统中那些富有激进民主理想和追求政治平等的思想内容。<sup>②</sup>

当时方纳的确有一个设想,希望写作一部完整的关于美国激进主义传统的著作,讨论美国历史上各种激进的改革运动的起源、思想和形式。但不料《潘恩》刚出版,他就收到来自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莫利斯(Richard Morris)和亨利·斯蒂尔·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的邀请,约请他为哈泼出版公司的新美国国家史丛书(The New American Nation Series)写一部重建史。方纳最初认为,这部主要为大众读者阅读的断代史用两三年时间可以完成,没有想到,这部著作最终占用了他十多年的时间。

#### 四

重建是内战后美国的宪政机制、经济秩序、政府功能和种族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时期,其过程跌宕起伏,纷繁复杂,始终是历史学家关注的重点。重建

① Foner, *Tom Paine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 87.

② Foner, *Tom Paine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 269.

史学成果丰富,但也十分庞杂零散。要写出一部有新意的重建史,作者必须在材料、观点和方法上有较大的突破,必须有效地提炼和吸收现有的研究成果,必须有力地整合分散的地方和个案研究,最重要的是提出一种新的重建史观。

对方纳构思重建史起了关键作用的是两次学术访问。一次是在1978年,他应邀到南卡罗来纳大学访问讲学,其间他在南卡罗来纳州档案馆内读到了一批关于黑人在内战后如何争取政治和经济权利的档案。这次阅读档案对他的启发很大,促使他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南部各州和地方的重建档案,并开始将黑人在重建中的活动放到重建史的核心位置,将黑人的重建历史与重建的政治联系起来。另外一次访问是1980—81年间他应邀到英国剑桥大学讲学,在那里他读到了大量关于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和南非等地的奴隶解放运动的研究成果和原始材料,获得了一个认识重建的比较角度。1983年出版的《除了自由一无所有》反映了这两次访问的成果,并为重建史的最终写作定下了基调。<sup>①</sup>

《除了自由一无所有》由三篇论文组成,分别从三个层次——国际、区域和地方——讨论了加勒比海英属殖民地和美国南部在废除奴隶制后建立新政治和经济秩序的过程,并进行了比较。方纳指出,奴隶制废除后,前奴隶与奴隶主阶级之间斗争的核心问题是争夺对有限的经济资源的控制权和利用政治机制来确定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在加勒比海地区,奴隶制废除后,政治制度的结构没有改变,选举权与财产权挂钩,被严格地控制在有产者手中,前奴隶并没有获得政治参与的权利,始终被排除在新经济秩序的建设之外,而种植园主则与统治者勾结起来,利用歧视性税收阻止前奴隶拥有土地,并以契约劳动制取代奴隶制,迫使前奴隶继续依赖他们的前主人,所以以种植园经济为基础的变相奴役制度得以长期延续。<sup>②</sup>重建时期的美国南部的情形则不同:黑人在获

<sup>①</sup> Eric Foner, *Nothing But Freedom: Emancipation and Its Legac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3). 在此书出版之前,方纳已经开始讨论“自由劳动”与重建时期的经济改革的关系,指出在决定是否给予获得解放的奴隶以一定数量的土地的问题上“自由劳动”思想所表现出来的极大保守性和局限性。参见:Foner,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the Age of the Civil War*, 97—126, 128—149.

<sup>②</sup> Foner, *Nothing But Freedom*, 37—38.

得解放后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选举权,在联邦政府的支持下,与北部的自由劳动力力量联合起来,进行了“19世纪世界的一个令人惊奇的试验”,“在奴隶制的废墟上建立一个(短暂的)跨种族的民主。”<sup>①</sup>拥有选举权的前奴隶与前奴隶主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南部重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包括禁止引入契约劳工,保护佃农的利益,改革旧的税收体制(提高土地税,降低人头税,迫使大土地所有者支付公共财政),将州和地方税收用于公共教育和公用事业的建设等。方纳指出,虽然重建没有根本解决黑人的土地问题,但分成式租佃制(sharecropping)的建立也阻止了前奴隶主重新完全地和绝对地奴役黑人的企图,黑人拥有了控制和掌握自己劳动时间和强度的自由。

《除了自由一无所有》是一本小书,但却表达了一种崭新的重建史观。方纳的注意力集中在奴隶制废除后前奴隶的“自由”的界定问题上,并突出表现了黑人积极主动争取和捍卫经济权利的斗争,以及政治权利的享有与新经济秩序的关系。他正面评价了国家(政府)机制在重建中的作用,并把重建的宪政改革看成是美国黑人历史的一段辉煌记忆和改革历史上的一笔政治财富。这些思想将在方纳的重建史中得到更为全面和深入的展开讨论。

1981年,方纳结束了在剑桥大学的讲学,直接回到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任教。大约八年前,也是正当他在英国讲学期间,哥大没有考虑给他终身职务,此刻却以终身职务加正教授的地位请他重返母校,其间的感慨可想而知。回到哥大后,方纳即开始了重建史的写作。1988年,近700页、共12章的《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1863—1877》(以下简称《重建》)得以问世。在经过十多年的研究之后,方纳又带给了美国史学界一个“惊奇”。<sup>②</sup>

按照传统的历史分期,重建的历史应该从1865年内战结束时起,但方纳却将重建的起点定为1863年林肯发布奴隶解放宣言。这个变动非常关键,本身就反映了方纳的重建史观。在他看来,重建不是一种对为内战所破坏了的美国宪政的简单修复,不是北部对南部的一种惩罚性的报复,也不是共和党精

<sup>①</sup> Foner, *Nothing But Freedom*, 40.

<sup>②</sup> Eric Foner, *Reconstruction: 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1863—1877*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8).

英阶层的伟大政治设计,而是内战之后美国社会经历的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是美国宪政和国家制度建设的一场现代化运动;重建的主题是奴隶制废除后如何将前奴隶“变成自由的劳动力和平等的公民”,推动重建的动力之一是黑人争取政治参与权和经济自主权的斗争。<sup>①</sup>围绕这一中心思想,方纳详细讨论了重建历史上五个主要内容:1)获得解放的奴隶是如何在内战和重建中争取政治参与权、公民权和经济自主权的,以及他们的斗争如何决定性地影响了重建政治的内容和程序;2)奴隶制废除后南部不同阶级和阶层——尤其是前奴隶主、小自耕农、商人和贫穷白人——之间的新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是如何形成的,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如何影响了南部白人内部的政治秩序的变化;3)在重建时期,南部新型的种族意识和种族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南部和全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如何影响了这个过程;4)一个以保护公民权利平等原则为基础的强大的集权式联邦国家是如何出现的,以及它在国家宪政和经济秩序的重建方面发挥了什么样的功能;5)北部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如何影响了重建的进程和结果。方纳不仅在每一个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提出了新的观点,而且还讨论了这五个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

与传统的重建史学相比,方纳的《重建》以雄厚扎实的研究展现了南部黑人在争取经济自立和政治平等、创办教育、建立社区组织等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揭示了黑人的草根性斗争与联邦重建的直接联系,分析了重建时期黑人斗争与美国政治传统之间的联系,分析了黑人领袖的思想和组成成分,实实在在地开辟了重建研究的一个极为广阔的天地,推翻了传统重建史学对黑人重建的诋毁。<sup>②</sup>与新社会史学的重建研究成果相比,《重建》提供了一个完整而连贯的历史画面,在整合分散的地方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不仅赋予了这些研究本身在脱离整体

① Foner, *Reconstruction*, xxiv-xxv.

② 关于重建史学史的讨论,见:Eric Foner, "Reconstruction Revisited,"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10 (December, 1982), 82-100; Bernard A. Weisberger, "The Dark and Bloody Ground of Reconstruction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25 (November 1959), 427-47; Francis B. Simkins, "New Viewpoints of Southern Reconstruction,"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5 (February 1939), 49-61; 王希, "重建史学述评", 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编,《当代欧美史学评析》(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91-310.

研究情况下无法表现出来的历史涵义,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重建的内容。《重建》证实了早期左翼历史学家(如杜波依斯)提出的一些观察,但它更全面和客观地解释了重建,更深刻地揭示了重建与美国激进改革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更富有历史感地揭示了美国思想和美国体制所包含的进行正面意义上的改革的潜力。<sup>①</sup>方纳认为,重建时期的许多改革建树——包括第十三、十四和十五条宪法修正案、联邦公民资格和公民权利、黑人选举权、联邦政府在分配经济资源和保护公民权利方面职能的扩大、自由劳动思想和实践的全国化、南部新税收制度的建立、南部公共教育的创建、南部大种植园土地的分解等——实际上都为美国在19世纪后期进入全面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他强调说,在一个奴隶制生存了200多年、种族主义偏见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度,能够在内战后几年之内,通过国家的干预,不仅将黑人从奴隶变为公民,还将他们纳入政治体制之内,建立起以法律平等为原则的种族平等关系,这不能不称之为是19世纪美国的一场伟大革命,其意义不亚于1776年的美国独立。重建不仅界定了黑人的“自由”,也重新界定了美国“自由”的涵义,为20世纪美国民主的发展和黑人的最终解放提供了历史资源和基础。至于重建为什么成了一场“未完成的革命”,方纳将原因归咎于现代国家机器的缺乏、旧宪政秩序的牵制、自由劳动思想的局限性、前南部奴隶主势力的抵抗和北部政治的保守性。

《重建》再次展现了方纳驾驭和组织史料的非凡能力和他那种浑然一体、流畅顺达的写作风格。出版一年之内,《重建》同时获得了包括班克罗夫特史学著作奖(Bancroft Prize)在内的几项主要学术大奖。《重建》被重建研究者誉为该领域的“圣经”,但它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从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到普通的黑人群众都成了它的读者。<sup>②</sup>

① W. E. B. Du Bois,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5).

② 除班克罗夫特史学著作奖之外,《重建》还获得了 Francis Parkman Prize, Los Angeles Times Book Award for History, Lionel Trilling Award, Oswley Award 等,并列为 National Book Award 和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 的最后入选作品(finalist)。王希,“过去30年来美国史学的变化——埃里克·方纳教授访谈录”,71;作者与方纳教授的交谈,2001年11月6日。为满足普通读者和大学本科教学的需要,方纳又出版了《重建》的简写本。见:Eric Foner, *A Short History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Harpers & Row, 1993)。



## 五

《重建》使方纳成为了重建研究的领衔学者,也给他的学术生涯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转折:步入公共史学领域,在这个学院派历史学家过去很少涉足的领域内,方纳同样做出了令人钦佩的成就。1990 和 1995 年,他应邀分别参加了筹划和写作由芝加哥历史学会主办的美国内战历史展览和由弗吉尼亚州历史学会主办的重建史展览,产生了强烈的公众效应。<sup>①</sup>1990 年,方纳受美国历史学会之托,编写了《新美国史学》,系统总结了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史学各个领域的成果,为大、中学的美国历史教育提供了非常及时和必要的专业指南。<sup>②</sup>他与著名历史学家加勒第(John Garraty)合编的《美国历史读者指南》(1991)修正了旧史学的概念和解释,及时弥合了专业史学和公共史学之间的差距。<sup>③</sup>他利用《重建》研究的资料编写的《自由的立法者们》开辟了整理黑人史料的新途径。<sup>④</sup>此外,方纳还帮助迪斯尼乐园重新策划了有关美国总统的主题展览,担任了公共电视节目《历史频道》和百老汇音乐剧《内战》的历史顾问。在 90 年代中期关于《全国中小学美国史教学指南》的全国大辩论中,方纳作为史学界的前沿学者,始终站在前列,捍卫新美国史的成就。<sup>⑤</sup>在谈到历史学家的社会功能时,方纳认为,历史学家有责任与大

① 内战史展览还获得了伊利诺斯州人文委员会的 Lawrence W. Towner Award 和美国历史学会的 James Harvey Robinson Prize。两个展览的内容都已经出版,见:Eric Foner, *A House Divided: America in the Age of Lincoln* (New York: Norton, 1990) (with Olivia Mahoney); Eric Foner, *America's Reconstruction: People and Politics after the Civil War*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5)。

② Eric Foner, ed. *New American Histo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1997)。

③ Eric Foner and John A. Garraty, ed. *Reader's Companion to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Mifflin, 1991)。

④ Eric Foner, *Freedom's Lawmakers: a Directory of Black Officeholders during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revised editio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⑤ 关于中小学美国历史教学指南的辩论的详细介绍,见王希:“何谓美国历史?——围绕《全国历史教学标准》引起的辩论”,《美国研究》,1998 年第 4 期,7—40。

众分享史学研究的成果,将正确的历史知识有效地传达给大众,但历史学家必须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将历史研究和写作简单地当成创造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和满足个人或群体心理需求的工具。<sup>①</sup>

在围绕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大辩论中,方纳注意到,保守势力攻击新美国史学刻意渲染了美国历史上的“黑暗”面,过分强调了以种族、性别和阶级为限的群体历史经验,破坏了美国人民的国家和公民认同的基础;保守派最常用的攻击武器不是其他,而是“自由”的概念——一种只是强调个人免受外力压迫、市场免受政府干预、以牺牲社会公平和正义来换取对个人权利的保护的自由观。<sup>②</sup>与此同时,历史研究中的“碎化”问题——即以孤立和分离的方式进行的群体历史研究——给历史学界提出了挑战,促使历史学家探索新的美国通史叙事体,要求新的叙事体既能反映不同群体美国人的历史经验,又能体现群体历史经验之间的交叉性和复杂性,并能展现一种“共有的传统”。这些思考成为了方纳写作《美国自由的故事》(以下简称《自由故事》)的主要动力。

从《自由土地》到《重建》,方纳一直关注一种具有激进意义的美国政治传统的形成和变化,他研究的主要问题——无论是自由劳动思想、潘恩的共和主义理想、奴隶解放、还是重建——都与美国自由的问题密切相关。所以,“自由”问题从来没有脱离过方纳的研究视野,这是他写作《自由故事》的重要基础。但与此同时,这个题目的难度也很大,因为在知识结构上,他必须超越他最得心应手的19世纪美国史,熟悉和掌握其他时期关于自由问题的研究成果,并能有效地对其进行综合和提炼;在方法上,他必须创立新的写作模式,既不能将自由的历史写成一部爱国主义的教科书,也不能只是将相互割裂的群体争取自由的历史拼装起来。<sup>③</sup>为此,方纳决定采用一种他称之为“质疑性叙

① 王希:“近30年来美国史学的新变化——埃里克·方纳教授访谈录”,70—71。

② 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辩论,见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及其局限性”,《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44—80。

③ 事实证明,方纳对材料的处理十分成功。《自由故事》高度概括和集中了近年来美国史学界关于自由问题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正如新政史专家艾伦·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所说,将如此复杂广泛的研究成果如此连贯有力地组织起来,没有人比方纳做得更好。有心的读者可以通过此书脚注获得极好的关于美国自由史的阅读和研究信息。布林克利引语见:Karen J. Winkler, “Noted Histori-

事物”(contested narrative)的方式,以“自由”为组织性主题,写一部“自由”的思想在美国历史上演变的历史。方纳没有忽略对自由的抽象意义的讨论,但《自由故事》中所讨论的美国“自由”是一种“贯穿于法律和公共政策中的经验”,是一种对社会权力的真实而具体的分享。在方纳看来,学者们所下的自由定义,无论如何完美,也无法完整地捕捉到“处于历史中的个人对自由的体验和解释”。<sup>①</sup>从史学方法来看,方纳的确在几个方面“反潮流”,针对美国自由的必然性史观,他提出自由发展的“不确定性”;针对“碎化”性的群体取向研究,他提出写作美国自由的历史,不但要表现其复杂性,还必须要保持其完整性;针对史学研究对专著(monograph)的迷信,他提出要开辟综合研究的新思路。难怪他把这次写作比喻成一场“赌博”。<sup>②</sup>

在《自由故事》中,方纳叙述了“自由”的概念从殖民地时期到当代美国的发展历史,分析了作为思想(idea)和作为经验(experience)的“自由”相互间的关系,仔细描述了美国“自由”的四个主要维度——政治自由、公民自由、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和演变的。在对每一历史阶段的“自由”和每一种美国“自由”的维度的讨论中,方纳使用了三个相关的分析角度:自由的认知(什么是自由)、自由生长的社会条件(自由如何在权力体制中得以实现)和自由的界限(谁应该享有自由)。所以,《自由故事》所关心的远不是“自由”的抽象定义,而是处在历史中的不同的“自由”定义所产生的社会背景、不同的“自由”思想之间的斗争以及这些斗争的结果最终如何进入美国“自由”的内涵和范围并成为了美国自由传统的一部分。

方纳在《自由故事》中对美国“自由”的历史所做的最主要观察可以这样加以总结:首先,美国自由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思想或概念,而是一个价值复合体(a complex of values)。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个复合体的内部

---

ans Traces Changing Notions of Freedom i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American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October 23, 1998, A15.

① Foner, *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 xviii.

② Winkler, “Noted Historians Traces Changing Notions of Freedom i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Americans,” A15.

存在着不同种类的矛盾和对立：个人自由与公共自由，个人自由与群体自由，不允许政府侵犯的自由与政府必须加以保护的自由，资本家的契约自由与劳工的生存自由，奴隶主的拥有财产的自由与奴隶的人身自由，妇女要求控制自己身体的自由与男性在家庭中拥有绝对权威的自由等。这些“自由”在现实生活中都是由具体的“权利”来表现的，是法律和政治安排的结果。在美国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始终存在着不同自由观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围绕“自由”的定义的斗争始终是美国历史发展的核心内容。美国自由的定义不但不是亘古不变的，相反，它始终处于被挑战和质疑之中；美国自由的故事也不是一个按照（上帝或圣贤）事先设定的程序顺理成章地展现的“充满神秘色彩的英雄史诗”，而是一个“充满辩论、争议和斗争的故事”，是美国民族“就自己政治文化中的关键思想展开的一场永无止境的争论的记录”。<sup>①</sup>揭示美国“自由”思想的复杂性、多面性和发展性，揭示美国“自由”历史的不确定性，应该算是本书最具有原创意义的贡献。

其次，自由往往是通过不自由来界定的，这两种看上去是相互排斥的思想事实上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奴隶主拥有奴隶的自由的前提是奴隶不能拥有人身自由，“契约自由”所掩盖的正是劳工在市场经济中所处的无自由状态，维护男性在家庭中“主权个人”的结果是牺牲妇女的个人自由。超越特定的社会和经济基础的自由或不自由是不存在的。认识这一点，对于美国人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它表明：美国自由不是一个一往无前的神话，而是一个带有沉重历史包袱（甚至带有血腥味）的现实；历史上为一部分美国人所欣赏的“自由”，对另一部分美国人来说，却是一种痛苦的记忆。对某种“自由”的强调，往往成为对某种“不自由”、“不准自由”或“剥夺自由”行为的辩护。离开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的“自由”并不存在。

再者，美国自由思想的发展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在运动，而是充满了反复、倒退和曲折。例如，平等的原则在革命时期得以建立，但在立宪时受到压制；

---

<sup>①</sup> Foner, *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 xxii; Eric Foner, "American Freedom in a Global Ag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6:1 (February 2001), 5.

重建时期的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再度确立了平等的原则,但在工业化时期再度被“契约自由”的原则所取代;直到在民权运动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才比较牢固地重新纳入到自由的思想之中。公民自由的发展也是如此。言论自由是权利法案保护的“第一自由”,但是在内战、重建、一战和冷战期间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压制。这种具有反复性的发展说明,自由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可以给予的自由,也可以被终止,一切取决于政治斗争的结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对自由的界定最终取决于对权力的掌握和对权力机制的运用。

从《自由土地》到《自由故事》,方纳的写作跨越了30年的历史。这30年也正是新美国史学形成和成为主流的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方纳研究和写作的轨迹反映了美国史学的变化。方纳曾说,他是新旧史学的产物,他研究的问题是传统的问题,但他对这些问题研究的方法却更多地受到新史学的影响。<sup>①</sup>在《自由故事》的导言中,他专门提到了霍夫斯达特对他的影响,尤其提到了他研究的问题与霍夫斯达特那一代历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是相似的:即捕捉美国历史的本质、思想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作为霍夫斯达特最优秀的学生,方纳已经名副其实地继承了他的导师在美国史学界的地位和影响。但是,如同我们通过方纳的写作所看到的,在观察美国政治传统和核心价值观的演变方面,方纳与霍夫斯达特的结论显然是不同的。如果说霍夫斯达特力图证明,美国历史上存在着一种能够超越差别的价值共识的话,方纳的研究则是在说明:如果这种价值共识存在的话,它应该是而且必须是政治异见和思想分歧通过权力斗争而得出的结果。

## 六

《美国自由的故事》是方纳著作的第一部中文译本,但方纳的家庭与中国——尤其是中国的美国史学界——的关系却是渊源流长。早在20世纪40年

<sup>①</sup> 王希,“近30年来美国史学的新变化——埃里克·方纳教授访谈录”,75。

代,新中国美国史研究创始人之一的黄绍湘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曾在纽约听过菲利普·方纳的美国史讲座。中美关系正常化后,菲利普·方纳曾应邀来中国进行过访问讲学,他的著作也为许多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熟知。方纳教授本人于2000年春以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身份应邀来中国访问,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讲学,并与中国史学会的领导成员举行了会谈。他的访华观感在美国历史学会通讯上刊出后,在美国历史学家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sup>①</sup>1998年《美国自由的故事》的原著在纽约首次出版后,在美国学术界内外引起轰动,并很快被译成外国文字(该书的意大利版于2000年出版)。国内多家出版社曾通过各种渠道与方纳教授或原出版社联络,希望出版该书的中文译本。在方纳教授和商务印书馆的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下,《美国自由的故事》中文版终于与读者见面,方纳教授还专门为中文版作了序。商务印书馆译作室的编辑在整个过程中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在推荐原著、洽谈版权、校读译稿、设计版式等方面都提出非常专业和周到的建议,在此特别致谢。

王 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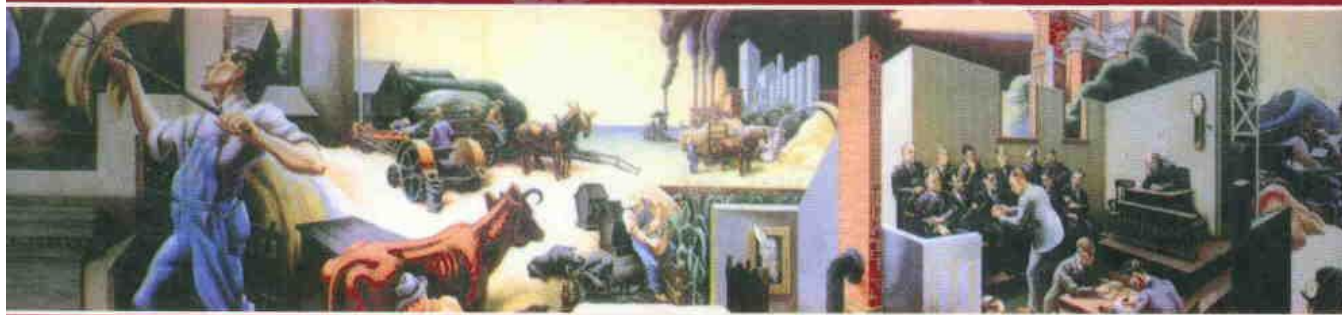
2001年11月初稿

2002年8月改毕

---

<sup>①</sup> Eric Foner, "Interpreting the Past in a New Present: Brief Encounter of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Perspectives*, (September, 2000).

# 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



“这是一次极不寻常的努力。埃里克·方纳极为卓越地将自由思想漫长而复杂交错的历史梳理得连贯而清楚。在这个过程中，他取得了历史学家们谈论了数十年之久，但从不知道如何去争取的成就。他为我们写作了一部新的综合性美国史，将近期的史学成果以及由这些成果所创造的更为复杂的美国历史有力地结合起来，并成功地保持了自由故事的整体性。这是一部真正了不起的著作。”

——艾伦·布林克利 (Alan Brinkley)

“《美国自由的故事》是一部由美国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写作的关于美国人最珍惜的那个词的、充满深刻指导意义的著作。”

——兰德尔·肯尼迪 (Randall Kennedy)

ISBN 7-100-03559-7



9 787100 035590 >

ISBN 7-100-03559-7/K · 741

定价：46.00 元